

## 罗章龙简介

罗章龙（1896-1995），湖南浏阳人。1912年就学于长沙第一联合中学，1918年4月与毛泽东等发起组织新民学会。同年8月考入北京大学，1920年初参与组织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920年5月，在与李大钊等人会见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后，成立共产主义小组，成为中共最早的党员之一。1921年参与创办《工人周刊》，同年11月参与领导陇海铁路工人大罢工。1923年2月参与组织京汉铁路总工会，领导“二七”大罢工。同年6月参加在广州召开的中共三大，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央局委员。会后任中共中央会计，与陈独秀、毛泽东等负责中共中央日常工作。1924年参加共产国际五大，并出席在汉堡召开的第四次国际运输工会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国书记。1925年1月参加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四大，被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1927年任中共武汉中央局委员，中共武汉市委书记和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长。同年5月在中共五大上被选为中央委员，任中共湖南省行动委员会执行委员，参与秋收起义领导工作。11月参加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在上海召开的扩大会议，会后任中央工委书记，全国总工会委员长和全总党团书记。1928年参加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1931年初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前后，因组织成立“中央非常委员会”被开除出党。从1934年起，先后在河南大学、西北大学、华西协和大学、湖南大学、中南财经学院、湖北大学任教。1980年任中国革命博物馆任顾问，1995年2月3日在北京逝世。

整理者：无文 罗星原 罗平海

责任编辑：曾芸 王笑梅

封面设计：李格朗

U.S.A. \$24.99

ISBN 1-933447-01-X



9 781933 447018



溪流出版社

Fellows Press of America, Inc.

允斋文存



# 罗章龙回忆录

Memoirs Of Luo Zhanglong

(下)

漓江出版社

Memoirs of Luo Zhanglong (Volume 2)

《亢斋文存·罗章龙回忆录》(下)

First Published in 2005 by Fellows Press of America, Inc.  
Copyright © 2005 by Luo Zhanglong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copyright holder.

International Standard Book No 1-933447-01-X  
Published Date: September, 2005

Written by Luo Zhanglong  
Reorganized by Wu Wen, Luo Xingyuan, and Luo Pinghai  
Edit by Yun Zeng and Xiaomei Wang  
Cover by Li Gelang

12937 Honey Locust Cir., Euless, TX, 76040, U.S.A.  
Web: <http://www.fellowspress.com>  
E-mail: [mailmaster@fellowspress.com](mailto:mailmaster@fellowspress.com)

溪流出版社出版品受国际版权公约保护  
版权所有，禁止翻印，转载，复印，改编，违者必究。

Fellows Press of America, Inc. (溪流出版社) 出版的一切作品均不代表本社立场

本出版品缺页或装订错误请寄回更换

定单号: SF 110 971 214 02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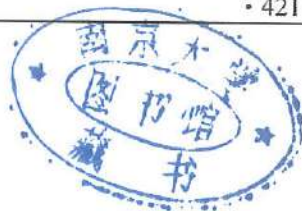
亢斋文存

# 罗章龙回忆录

(下)

溪流出版社

Fellows Press of America, Inc.



## 三十二、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sup>1</sup>

远溯中共一大会是在上海召开的，三大会是在广州，五大会是在武汉，均在本国召开。六次大会却在国境以外的莫斯科举行。当时中苏断绝外交关系，进出国境甚感困难，全体代表在克服种种困难后始完成大会工作。

一、六大会筹备：一九二八年五月间，共产国际派人来到上海，向中央传达国际指示，决定本年六月在莫斯科召开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至于大会决定在莫斯科举行的理由，一是为了大会代表的安全；同时，国际认为在东方部直接领导下召开大会，可以完全控制，以防意外。当时中共中央为此召集一次特别会议，讨论有关筹备六大事项各问题，如出席代表人选标准，代表人数，出国手续，大会报告准备问题，作了详细研究。关于出席六大代表，大致确定为一百二十名至一百五十名，代表条件是前线的工农代表要有较大比例，五届中央委员一般参加，共青团中央负责人、各省的负责人、全国总工会、铁路总工会、海员总工会、上海总工会（以纱厂工人为主）都有代表参加。湖北、湖南、广东、上海、北方党组织按规定的党员人数，选出代表，其他省如江西等也有代表。各地代表的确定，第一步由党与工会党团系统分别通知各省委与工会党团支部，按规定办法分批选出出席代表上报中央，再由中央通知各地代表先到上海集中。各地区代表到上海集中后，学习一周再统一行动，分组出发。为了加强组织纪律性起见，出席大会代表按各地区及工会系统分为几个代表团，每团推举团长一人，负责政治领导。编组工作完成后，立即关照国际方面，分批出发。当时分批情况大致如下：（1）毛筒青、陈海青等，（2）

<sup>1</sup>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共党史资料》第七十七辑（中共党史出版社2001年3月版）全文登载了此章，题目改为“参加中共六大”，内容略有不同。

— 补注

袁炳辉、余茂怀等，(3)文虎、苏兆征等，(4)蔡和森、史文彬等，(5)中夏、特立等，(6)关向应、◇◇◇等，(7)王仲一、蔡畅等，(8)李立三、黄平等，(9)张兆平、项英等，(10)家属夏明等各为一组，并其它组合计约二十多个组，先后参差出发。

二、满洲里越过国境：文虎、阿苏等四人在六月上旬出发，先乘日轮至营口，经大石桥转南满即被日本派出所警察盘查，但查无所获。临行一日警说：“你们速离南满，不要停留！”四人遂安全登车，经长春到哈尔滨，在南岗某旅社向苏联所设代表招待站办理过国境手续。该站负责同志自称名叫怀特(White)，操英语指示关于过国境时应注意事项：(1)过境时进入苏联所用通行证为一元美钞一张，应默记该钞票号码，随时可以说出来。(2)对苏联哨兵询问口号时高呼Ton-nd-go。(3)过国境后与苏联接待站所用暗号为Eguedor厄瓜多尔为西班牙语，译汉文意为赤道国的意思。(4)过境时身边不得携带任何东西，未用完的中国货币及其它物件一律交站存放。据怀特相告：东北中苏国境关卡有黑沙、满洲里、绥芬河三处，各处除守军外，另有国境警察一二〇至二〇〇名。万一遇到国境警察麻烦时应保持镇定，护送人员自会采取措施，不必惊慌。临行怀特并告诉在满洲里预派马车迎候，并将马车样式、御者面貌特征、马匹毛色一一交代清楚，言毕握手为别。

我们辞怀特后即持预先购好车票到车站去，乘坐开赴满洲里火车向西北行驶。在车中我们几人互不相识，分坐各车厢一隅，车行经过齐齐哈尔、海拉尔等站，于次晨破晓车抵满洲里车站。此时天气晴朗，缓步向一高大木栅门走去，正徘徊间，忽见一人持长鞭走近前来，细审面貌，知为事先约定迎候之人，遂尾随其后。行约十分钟，见道旁停有马车十余辆，中间一辆特别宽大，车前有栗色壮马四匹，车左边座上有一少年，环眼卷发，状极英武，持长鞭者伫足，略一注视，一跃登右边车座。我们见状，亦紧随其后登车，坐甫定，少年御者略一扬鞭，驷马昂首扬鬣，并驾齐驱，如风驰电掣，绝尘而去。车行半小时后，越过一广阔草原，即缘山岗前驶。山岗列碉堡一群，约每隔五百公尺即有碉堡一座，堡上哨兵荷枪监视，碉堡外远远有马队巡逻。此时驭者聚精会神驱车急驰，穿插于丘山溪谷间约一小时后，行抵一山丘下车停。此时只见四马汗流浃背，毛片尽湿，驭者声言现已越过中国国境，进入苏联边界，可暂休息片刻再行前进。从驭者谈话中知他们二人系父与子，父子二人操此业驰骋于中苏国境上已十余年，勇敢机智，驾轻就熟，想古之造父王良也不过如此。我们下车稍憩，即有一位苏籍少年向导前来，引导四人步行前进，经过重重苏方岗哨，出示证件，毫无阻留，不久行抵一小车站，略进饮食，随即登开往赤

塔火车向西续行。

三、赤塔集合：车抵赤塔，代表们被引至城内一中型旅舍安置，时中国代表陆续到达先后有十余人，共住旅舍一层楼，大家聚首一室共道途中经历，知道先前出发一组同志五人曾在途中遇到留难。据谈他们在大连登岸时，即被金州警视厅埠头派出所警察认为形迹可疑，被带至派出所问话。警官劈头问道：“你们是上海来的共产党吗？你们来关东州干甚么的？”当时被询者故做镇定，把预先准备好的回答及表明正当身份的证件拿出来阅看，日警询问半小时毫无破绽，即停止讯问。随说道：“你们就是共产党我们大日本政府也不管，只要你们不在南满地带活动。希望你们不要在南满多停留，迅速离开这里。”说毕遂派警察把五人送往火车站，直到登车离开大连为止。后来在火车上又遇见向◇◇，向语文虎：他与吉光炯等过大连时亦被拘讯一小时始释，其经过情况与上述同行一组所遇大致相同。大家认为此事如果发生在长春或沪滨，那就不免会引起更多的麻烦。我们在赤塔住了一星期，乘暇游览近郊，并组织俄语临时学习组，帮助男女工人同志学习日常生活用语及沿途地理知识，随后仍然分批登车向莫斯科进发。一星期后车抵莫斯科，未及进城，即转乘火车赴郊区某小站下车，改坐马车到一别墅，即会场所在地。

四、鸥林别墅：别墅在莫斯科郊外，距市区约四十公里，原为帝俄时代贵族邸第，有旧式楼房二幢，平房数十间，礼堂一大间，有音乐台、钢琴等。门外草地一区辟为球场，附近有中型芬兰式浴室二大间，洗衣房、烤面包房、牛奶棚、厨房等设备，足供应居留一百余人需要。文虎住在楼上正房，坐北朝南，同室四人，其三人为刘伯承、潘家询(翻译)等，邻室为瞿秋白、邓中夏等。别墅外面，泉流淙淙，牛羊饮水过去，草带泥痕，四望林木参天，鹰隼成群，巢窟高枝，别有一番宁静幽趣。特别是黄昏以后时间，鸱鸢鸣声发自深林，因名鸥林别墅。别墅警卫严密，设有岗哨，稽查出入。

五、出席代表人名：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于六月十八日正式开幕，七月一日结束。正式代表一百二十余人，内列席四十余人。当时有党员四万人，军队及农村党员比重较大。正式代表中包括五届中央委员会之一部，八七会议后中央委员会一部工作人员，少共中委之一部，各省级党委选派代表，全总、铁总、海总、上总等工会选派的代表，其主要人名如次：史文彬、苏兆征、唐鸿景、徐兰芝、罗章龙、项德隆、王震异、孙秀峰、刘俊才、张兆丰、张国焘、瞿秋白、周恩来、李立三、刘天章、何孟雄、张金刃、关向应、贺昌、李子芬、刘昌群、毛简青、刘义、陈海青、黄评、任弼时、蔡和森、韩麟符、阮小仙、汪泽楷、余茂怀、邓中夏、温禹成、袁炳辉、吴汝铭、李昌荣、

刘伯垂、吴服景、殷鉴、李求实、张昆弟等。列席代表包括少共中委之一部，在莫斯科学习干部之一部，中委家属之一部，主要人名如次：卜士奇、刘伯承、夏曦、沈泽民、罗章凤、秦茂暄、林伯渠、曾仲圣、熊受暄、郑超、庄东晓、潘家询、李泽、汤正清、秦缦云、徐特立、何叔衡、李梅羹、冀朝鼎、杨子烈等。

**六、大会决议起草委员会：**各地代表到齐后略事休息，乃由国际主持大会事务的人，召集各代表组织负责人及五大会一部分中央委员，举行会议准备会议，研究六大议事日程，政治报告内容，各小组委员会组织名单以及有关大会的各项事务问题，并成立大会秘书处，随后便于六月十八日宣布大会正式开幕。

六大会成立各项议案小组委员会，从事讨论与草拟大会各项议案，这些小组中最重要的为政治决议、党章、大会宣言等，各委员会成员有国际代表与中国各代表团负责人组成。小组前后开会十余次，充分搜集各方意见，最后草拟各种决议草案，然后提出大会讨论通过。政治决议案起草委员会工作放在第一位，政治决议案通过文虎、苏兆征、王仲一、项英、瞿秋白等为起草委员，以国际代表为召集人。该草案原由布哈林用俄文写成，翻译成中文后提交委员会讨论，经小组反复讨论，定稿后向大会提出。政治问题决议起草委员会一连举行两天一晚的会议，讨论的问题集中在下列各点：即大革命经验教训、革命性质与革命动力、十大政纲等等问题。对于总结大革命经验与教训问题所收集各代表的意见极多。

**七、国共合作的成败及其经验与教训（文虎在六大会发言提纲）：**政治决议小组曾广泛开展讨论关于国共合作成败及其经验教训的问题，大家认为这是一个工农革命势力与资产阶级合作所共同发生的问题。在中国演变情况如此，在其它条件相同的国家，在运用联合战线时，也会有相同的问题发生，可供参考与借鉴。

文虎在三大至六大会期间担任中央委员，在武汉政府时期在中共中央工作，同时兼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长。七月十五日以后领导中共湖南省委及秋暴中指挥工作，十一月回上海中共中央担任中央工委书记。本发言提纲主要是就以上期间亲身经历诸问题所组成。由于全文过长，现仅就关于国共合作问题部分摘要引述，余从略。

1. 国共合作的成就：国共合作问题是大革命时期最重要的事件，也是六大会政治决议文献集中讨论的问题。提纲中谈到国共合作问题系统地说明国共合作、国共争衡与国共分离的主要进程，全文包括历史教训与政治现实诸问题。

溯自中共建党以还（一九二一至一九二七年上期）由于政治路线方向正确与决策合宜，同时党内组织采取精诚团结，万众一心，艰苦

卓绝，戮力向前，摧毁强敌，因此七年之间，结集了强大的革命动势与动量，造成一九二七年的全国范围的革命高潮。在革命高潮期间，中共党组织扩大党员与团员达五十万人，工会、农会等革命组织实力超过四百万人，革命武装近五万人。与此同时，政治威信提高，革命各条战线汹涌澎湃，沛然莫之能御！大革命高潮时期，显著的成就便是第一次与第二次北伐完成后，扫荡北洋军阀的专制恶毒。武汉革命政府拥有长江流域广大地区和亿万人口（两广、湘、鄂、赣等省区）与资源。当时在中共支持下收回汉、浔租界，削弱封建势力，给予反动势力以沉重的打击。武汉政府时代，革命形势发展迅速，由此更进一步争取非资本主义前途，统一全国，指日可待，完成民主社会革命任务并进而开辟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康庄大道，前途是充满无限希望的。中南革命大势扶摇直上，瞬息千里，其业绩震荡世界，有目共睹！

从以上所谈情况看来，其中后期革命是与一九二四年起国共合作有相当关联的。这也是国共合作的积极方面的表现。特别值得提出的是，从一九二六年北伐军到武汉时起至一九二七年七月止，前后十一个月时间，中共中央及其所直属湖北省委、江西省委与湖南省委等，在长江流域从事建党、建军、建立工农革命组织，推动革命进展各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全党同志壮志凌云，大刀阔斧，雷厉风行，卓著成效。其中最显著的历史伟绩如：奠定武汉政府基础，铲除贪污，建设廉洁政治；收回汉口与九江英国租界；发展工农群众革命组织，建立革命武装部队；顺利完成中共五大会决议；临危不乱多次击退夏斗寅、杨森、刘佐龙等武装叛乱。凡此诸端都是在武汉中共中央时期完成的。上述革命业绩声光广被，影响深远，均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意义。但是遗憾的是不幸在关键时刻，由于党经验欠缺，人谋不臧，决策失当，致使大革命事业功败垂成，这样酿成历史上国民党统治的黑暗时代。

由上所谈可见国共合作虽有成功的一方面，同时也有失败的一方面，其失败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2. 国共合作失败的原因：中共上述诸成就后来经过国民党反动派的摧残，受到了严重的损失，这就使新军阀统治中国重复得势，帝国主义再抬头，中国政治一时出现倒退现象。中国大革命中途发生顿挫，原因在何处？党内同志议论纷纷，但综合起来不外两方面：一是理论认识不够明确，其次是在实践方面发生偏差。前者是属于意识形态的问题，后者是属于战略部署的问题。在思想意识方面，首先可以回溯到一九二四年国际关于国共合作问题的决议。共产国际一九二四年所通过关于国共合作问题决议案，寥寥数百字，从理论方面观察是十分疏略的文件。该文只着重说明两党合作的需要，却没有深入研究合作

的具体策略与部署问题。因此，决议全文既有失粗疏，而且，后来在国共合作三年的过程中，也没有一个具有纲领性质、双方共同遵守的文件。这样，对于合作问题的解释就不免各持一端，无共同纲领作为依据。后来遇到实际问题时，也就彼此观点分歧，发生争执，无所适从了。

再说当时党报《向导》等刊物，对于国共合作的文章，有些也是片面不全，谬误滋多。特别是对于革命领导权问题认识模糊，同时是对于合作革命进程中可能发生的风险情况缺少预见。当时党员群众对合作问题的思想意识不用说也是受到不正当影响。

更从实践方面去考察，中共方面自国际代表至中央造成一种气氛，对于国民党左派总是全力以赴，万分迁就，唯恐影响团结。也就是说：一味强调合作，容忍让步，疏于警惕，不作思患预防之计。如自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二日事变以还，直到赣州、安庆事变，国民党多次发动进攻，中共多次遭到袭击，完全失其主动便是最显著的例子。结果造成左派骄矜放纵，独断独行，得陇望蜀，漫无止境！一九二七年上半年，上海（四·一二）、广州（四·一五）、长沙（五·二一）等地连续发生反革命政变，中共中央及国际代表仍采取消极态度，机械执行联左政策，对敌犹存幻想。这样演变直到一九二七年六月郑州会议蒋冯勾结，汪唐反水，中共中央负责人及国际代表犹漫无准备。这便是由于平日认识不清，理论既失诸疏阔，实践更不免疏于防范，可以说两者关系是如影随形的，中间纵然偶有觉察，但亦旋觉旋迷。在大革命危机的关键时刻，当时湖北省委曾提出紧急行动方案，以图挽救危局，事尚可为。但中央畏首畏尾，优游寡断，于是这个重要倡议在中央会上未被采纳，坐令千载一时的战略部署稍纵即逝，闻者均引为憾事！同时在南昌起义与广州起义方面，中共在决策与具体战略部署方面，也产生过不少的错误，大局遂完全不堪收拾了！

3. 国共合作的责任问题，重蹈辛亥革命覆辙：说到国共合作失败的责任问题，应从历史演变的客观事实加以考察，实事求是以探讨经验与教训。历史上革命事业的成功与失败，均有其当代历史背景与国际环境的渊源，但人事亦属因素之一。综计诸因素，便知道一代革命大事业，其成功乃积千万人之烈绩所致，其失败亦有其历史因缘。总的说来：国共分裂及其所发生反动政治的种种罪恶，应由国民党反动派负其全部责任，这是毋庸争辩的事。蒋、汪等人罪无可恕！其他附和为恶者也是如此！但是，如果从革命阵营方面加以考察，中共在执行国共合作政策时，由于人谋不臧所造成的种种失策，亦自有其责任。特别是当时决策与领导人不能置身事外，更不能辞其咎。但这不是说应由某些个人独尸其咎，因为历史发展的成功与失败，往往不纯然是

由于个人起决定作用。综观大革命的失败轨迹，与十五年前辛亥革命失败经过颇有相通之处，也就是说类似辛亥革命失败的重演。如所周知，辛亥革命发动时期人心倾向革命，如领导有方，民主革命可以完成。但当时北洋军阀袁世凯伪装赞成共和，运用种种阴谋诡计愚弄南京政府。（按：此指一月二日孙中山电袁世凯表示“推功让能”，但要求北政府南迁，袁佯允其请。一月二十九日夜袁嗾使第三镇曹錕所部军队，在北京放火行劫，通宵达旦，天津、保定继续兵变，袁遂藉口不能离开北京，拒绝政府南迁。）于是孙中山拥袁为总统，放弃领导革命，自动辞职，结果南京政府解散，让政权于北洋军阀，由是太阿倒持，授人以柄，造成中国历史上倒退，使革命一蹶不振，中国国民蒙受长期灾难。这种情况说明历史上每当新旧变革的时候，新兴势力往往被旧势力所倾覆，这是由于新兴势力经验缺乏，遂被狡诈的旧势力所制服。中国两次革命失败均遇到同样的历史逆流，使革命蒙受损失，这也是值得注意的教训。

八、代表言论集锦：出席代表各就本人对政治见解发表意见，同时并结合自己在大革命高潮中，曾亲自参加各种实际斗争（包括政治、经济、工会斗争、农民斗争与武装斗争等）说出各条战线的经验与教训等，大都是显示出具体、生动，足以惩前毖后，昭示全党。如广州代表对于广州暴动问题，湖南代表就马日事变教训，自述所见，各有独到的地方。其中对上届临时中央所推行的冒险政策与宗派统治情况，尤多阐明与发挥，现分述如下：

1. 盲动主义：大会代表一致谴责“八七”临时中央盲动主义。主要是就一九二七年七月以后持续一年的全国暴动政策的严重失败事实，分析盲动主义的形成、内容与错误。大家公认最先传播盲动主义者为洛米那则，洛初到中国来接替罗易，他们的前后作风是从极右走向极左。这种做法不仅在十月革命前沙皇时代不敢采用，就是在东欧诸国也未曾实行。但当时主事者竟悍然不顾，不惜用强迫命令方式，实行持续不断的暴动，这样，使中国革命元气大伤，延缓了真正革命的来临，其错误是显然的。临中负责人尝自称是“奉命行事”，但在洛的启发与指使下，他们自己也有些自以为是的发挥，以下是临中常用的话语。他们说：中国革命的性质是“不断革命”，中国革命的进展是“不断高涨”，因此在奉行政策时，就应该如放连珠炮一样，只要放手扳机枪，一刻不停，就会把国民党政权冲垮。他们常自称奉令工作就必须不断采取暴动手段，因为如果不这样干，就会无命可革了。所以他们明明知道所有的暴动都无胜利希望，但仍不能不硬着头皮干下去，“为暴动而暴动！”

广东方面代表对盲动主义体会最切，驳斥最力。他们认为临时中

央所策划的多次暴动，结果都归于失败，最后闹得人仰马翻，牺牲惨重，这些经验可谓十分沉痛，而且具有历史教训的意义。

2. 宗派统治：出席六大代表们，对于“八七”以后临时中央的失职及其错误行为，普遍感到不满，特别严厉谴责它破坏党的组织路线所造成的宗派统治及其罪恶行径。党内宗派是中国旧社会积习遗留下来的事物，它是从封建社会、宗法组织与宗教行会等杂揉而生的混合体。宗派组织是反映种种落后意识而形成的。这种思想大都来自没落的统治阶级与非劳动人民（如流氓与把头），所以客观上它是不利于革命的、有危害性的组织，是党的内部隐藏的破坏力量。

党内宗派组织盛行于八七会议以后。当时临中大力培植宗派组织，这是符合于临中上层少数人的需要的。因为临中的产生，他们出任领导工作是一时权宜之计，并无广大群众基础，这个时机便容易发生宗派统治。当时宗派组织的作用主要适应于在政治上推行盲动主义，组织上有利于独断独行，排斥异己，实现派系的清一色。宣传上树立“一言为定”作风，他人无发表意见的余地。由于中共广大革命同志坚决反对党内上述宗派统治，曾先后提出批评，同时又尽力制止纠正临中的错误政策，这样就引起临中掀起党内残酷斗争的阴谋。

在宗派统治下党内残酷斗争象征着取消党内民主，抑制批评与自我批评。事实上临中在导演残酷斗争时，广泛地运用组织手段惩办同志，粗暴地践踏党章，实行顺我者昌，逆我者死。在发展残酷斗争过程中，他们对待发表不同意见的同志，更是不择手段，穷凶极恶，如同仇敌一样，时时怀着“你死我活”的情绪，事事强调“先下手为强”，充分发挥政治迫害，造成党内离心离德，以致为亲者所痛，仇者所快！他们在暂时取得党内控制权以后，高高在上，脱离群众，志得意满，不可一世，便妄自尊大，目空一切起来。他们予智自雄，一意孤行，瞧不起其他同志，更瞧不起群众，在革命事业方面一筹莫展，毫无作为。后来渐渐丧失信心，思想僵化，生活腐朽，意志消沉！结果是宗派组织活动到处破坏党的优良传统，危害革命，造成党组织瓦解，同时自己也怜于毁灭的境地！

基于上述事实与教训，大多数出席代表鉴于党内宗派统治存在经年，后果可虑，因此群起一致倡议，彻底摧毁宗派组织，以便和缓组织上的危机。这个倡议深得出席大会全体代表的赞同。

九、十大纲领与党章：代表进行广泛辩论后通过各项决议案（另见六大文献），兹纪其中二事如次：

1. 十大纲领：在讨论十大纲领时，字斟句酌，主要是从中国人民各阶层角度提出动员全体革命群众的口号，包含下列十点，规定了十大政纲。（1）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2）没收外国资本的企业和银

行。（3）统一中国，承认民族自决权。（4）推翻军阀、国民党的政府。（5）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政府。（6）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度，增加工资、失业救济及社会保险等。（7）没收一切地主阶级的土地，耕地归农。（8）改善兵士生活，发给兵士土地和工作。（9）取消一切政府军阀地方的捐税，实行统一的累进税。（10）联合世界无产阶级和苏联。

当讨论到拥护苏联，不干涉中国革命二个口号时，有人建议把顺序颠倒一下，但是结果仍照顾原来译文未加更正。又在政治决议案尚有译文不正确处，如Rationalisierung应译为合理化，误译成节省主义，虽经文虎指出，亦未改正。

按：Rationalisierung乃以统制技术及计划的提供增进经济能率之一切适用的手段，其目的在使货物低廉，数量增加，质量改良，藉以促进经济。

2. 党章：六大通过的党章，内容颇为严整，主要规定：正确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反对独裁制，中央委员的选举及中央委员会的组织均须经过全国性代表大会产生，对国际有独立自主之权。监察委员会有监督中央委员会工作的权利，对中央错误与过失有随时检举之权。但是这个党章墨迹未干即被向、李等弃置不顾，一九三一年临时中央成立事实上完全把党章撕毁了。

3. 工农武装提案搁浅：在大革命期间，中共武装力量保有五万人左右，由于“八七”会议以后临时中央指挥不当，各次战役着着失败。南昌暴动与广州暴动结果将“三大”以还历年集聚的武装力量大部被断送。在六大会上，有不少来自基层，长期参加斗争的工农代表感到工农徒手赴敌，牺牲重大，一致要求大会讨论武装工农的具体问题。经过交换意见后推中夏、文虎整理文字，提出方案。二人将初步方案提出后经过大家研究，认为应先向国际代表提出，征询同意，再作决定。随后即将方案转知国际代表，内容要点如下：（1）选择几个有群众基础的地区，建立地下武装，武装工会纠察队及农民自卫队。（2）先筹款十万元，就地购买或从外部运入武器，成立地下武装。

此案向国际代表提出时，国际代表立予拒绝，认为不可行。同时又说：“需款太巨，国际并非银行，不能照办。”

各代表闻悉，认为国际代表不重视此事，且措辞失当，殊不可解，又找国际代表交涉。国际代表承认措辞不当，但仍认为问题重大，不能立即做出决定，事遂搁置。事后愤愤不平地说道：“国际先后送给蒋介石、冯玉祥等武器各值数百万元，我们所要求尚比不上一点零头，何重彼而轻此，可谓本末倒置。”

十、六大中委选举：六大代表到达莫斯科向大会登记的代表按



照地区主要分为几个代表团，如北方代表团（团长王仲一），湖南代表团（团长文虎），湖北代表团（团长项英），广东代表团（团长苏兆征），江苏代表团（团长于非），其他省份代表人数较少，则联合组织代表团。

中共中央六大会最后议事日程是选举中央执行与监察委员会。当时国际负责人出主意，成立选举小组，由五人小组主持大会选举事务。经过研究后，小组参考了欧美资产阶级议会制中的经验，采用代表团集体提名与记名投票方式。根据这个方案，将大会各个代表团作为提名单位，首先由各代表团提出中委候选人名单，人数比定额多一倍。如文虎是由湖南代表团提名，苏兆征由广东代表团提名，史文彬由北方代表团提名。代表人数较少的省份可以联合几个单位提名，按代表党员比例决定提名人数。各代表团选举人名汇齐后，先交选举小组审查，经过初步研究，召集各代表团负责人共同进行协商，调剂盈虚，考虑对妇女、青年进行照顾。再经小组讨论同意后打印成中央委员选举人名单，然后发给大会各代表圈定。圈定后把选票送小组核对无误，据此公布。

选举时只见代表们大家交头接耳，情绪颇为紧张。如有人担心自己得票不够，与同伙往来奔走，如热锅上蚂蚁一样，最后考虑到本派利益起见，左顾右盼地用笔将◇◇名字勾去选上别人。（全部选票均交选举小组核算，◇◇是参加选举小组成员，所以确知经过情况。）

中央监察委员也是采取同样方法进行选举，时选举小组单独举行会议，商讨有关问题。按照小组研究，中共中央监察委员大都是党龄较长，年龄较高的产业工人与从事工农兵工作资历较久的战士。

大会选举小组成员是由各代表团推选组成。选举小组工作经过时间约一周以上，选举完毕后解散，全部选票送国际存案。

六大会中央执行委员（包括候补中委）：

唐鸿景 罗章龙 项英 苏兆征 余茂怀 孙秀峰 黄平 王若飞 王仲一 邓中夏 蔡和森 张国焘 周恩来 瞿秋白 彭湃 杨殷 陈潭秋 李立三 徐锡根 刘伯坚 阮啸仙 罗绮园 陈郁 朱宝廷 吴汝铭 李震瀛 蔡畅 刘俊山 任弼时 恽代英 张金保 毛泽东 孙津川 关向应 林育南 方志敏 贺昌 李求实 陈寿昌 何孟雄 沈先定 袁乃强 于渭珊 谭寿林 顾顺章 向忠发

中央监察委员：史文彬，徐兰芝、邓发、刘义、王凤飞、毛简青、张昆弟、刘俊才、杨匏安等。

十一、六届一中全会（在克林姆宫召开）：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完成后第三天，国际负责部门通知各新中委进城开会，一时喜气充盈鸥林别墅，代表们渴望离开这个逗留四个星期的古老乡村，重返

本国革命工作岗位上去。

次日清晨全体代表乘专车进城，直往联共本部下，随即进入会议厅，正式举行六届一中全会。会议地点在联共党礼堂会议厅，举行仪式颇为隆重。厅内陈设华丽，宫灯高照，帘幕低垂，六大在莫京执行委员与监察委员全部出席，此外还有国际来宾多人。

会议开始后，首先由国际书记◇◇致词，随后是联共党书记、德共党书记等讲话。法共党书记、职工国际代表与苏联工会代表均列席讲话，共祝中共六大会胜利完成。联共书记发言经时颇长，反复说明国际局势与中国革命形势，详细解释目前马鞍形的革命高涨趋势等问题。并重申六大政治决议及其他决议案在国际领导下的正确性，强调遵守党章，动员一切力量开展群众斗争工作。会议在柔和灯光下举行，历三小时始完。

会议后大家即夕到国立大戏院观戏，第二天起部分中委、监委分别到京内外列宁格勒、基辅及南俄各大城市参观访问，并出席当地党员与工人群众会，报告中国革命问题。有些委员旅行到黑海海滨疗养，逗留经时始联袂东返。这次会议是一个空前盛会，为前所罕见，数年以后各国支部变化极大，风流云散，后来共产国际本身亦宣告停止活动。

十二、国际往来：六大会会场内外充满浓厚的国际气氛。由于实际需要起见，大会会场用俄文与中文。国际友人懂懂往来，络绎相属，会外交际及生活则用英、德、法等语文。大会翻译机构人员众多，打字员工作颇忙。

六大会会议举行第一日，由第三国际书记 Buchyin (1888-1937) 出席致开幕词，并即席作政治报告，报告甚长，连续两日（约十六小时）始完毕。随即印成书面报告，发给出席代表开始进行讨论，讨论时间经过二星期（包括翻译时间）。Buchyin 时年四十许，头已光秃，精力过人。他对于大会作了政治报告兼讨论均全力以赴，大会政治决议案及宣言均由彼起草，历十余日未尝间断。某日讨论会结束，已近黄昏，他携枪到附近树林中行猎，随猎获猫头鹰一只归来，足证其目力与射击技术均佳，并富有闲情逸致。却未料到 Damocles 利剑已高悬到他的头上！

不少曾经与中国同志相认的国际友人如卫金、魏尔德、鲍氏夫妇等纷纷来到鸥林别墅访问旧友。大家结伴郊游到列宁山远足，畅叙广州、上海与武汉往事，历久不倦。台尔曼 Tailman 三年前在德国与文虎相识，久别重逢，他乡遇故知，另有一番情绪。大家结伴出游，河梁携手，莫河荡舟，漫谈往事。在交谈中台尔曼极重视中国运输工人组织，谓其与西方运输工人斗争有直接关连。他告诉文虎，以菲门 Fimen

为首的西欧运输工人阵营，已起了重大变化，不再是一九二四年前形势。同时还谈到关于中国工人斗争特殊战略及武装斗争等问题。台尔曼胸怀开阔，气韵沉雄，远非他人所能望其项背。

**十三、阿莫尔洪流拯溺：**一九二八年八月文虎与项英偕第一批中委及工作同志毛简青等二十二人从莫斯科起程回国。大家归心似箭，趑趄前进，经过二星期后，始到达哈巴罗夫斯克。因铁路被阿莫尔河水淹没，乃决定改乘轮船前进。

在伯力候船南行期间，忽然发生一桩意外事件。一个周末下午，我们正在江滨游息的时候，游人往来颇多，有一群青年正在打球和游泳。忽见一女生在大江中被急流冲走。女生力弱，不能自振，随波逐流，载浮载沉，情况非常危急，乃高声呼救。堤上游人喧声盈耳，但一时急切无法施救。文虎见状，乃商同代表柳谊等三人疾趋埠头，解缆跃登舢板，驾小舟，操长挠，犯波涛，奋勇前进。柳本国内南方水手，坐后艄掌舵，三人努力拨桨，舟行如飞，一里外追及溺者，卒将女生救起，安置艇中。她脱险后，初时神智昏迷，不省人事，众人围集，设法急救，渐渐苏醒，恢复体力。其家属同学多人等闻讯赶到，见文虎等衣履尽湿，精疲力竭，大为感动，乃热情邀文等到附近学校休息，并开茶会招待慰劳。他们对中国学生舍己救人精神表示十分感谢，并挽留文等一行盘桓数日，在当地从事参观游览。经此一番酬应，于是当班轮船未及登轮，延迟至二日后始继续出发。

**十四、夜渡绥芬河：**汽轮行一昼夜，再乘火车，乃抵海参崴，已秋末冬初。在海参崴红河子某山庄停留一星期，等待越度国境。山庄主人名尼考夫，年四十许，热情待客，但为保密起见，禁止客人外出。入夜，尼考夫为客奏三弦，并令其子女伴歌，以慰旅中寂寥。尼所奏为“阿莫尔河畔”、“贝加尔湖倒影”、“地上撒满豆子”等歌曲，琴韵悠扬动人。某日向晚，主人宣称今晚启程，乃亲导余等四人循山阿小河畔步行前进，约十公里至一山岗，改穿红军制服披外套，乘坐马车，继续乘月色前进。途中丛草没胫，巨蚊叮人极痛，约一小时后下车步行七、八里，遥见前面横一小溪，尼考夫吩咐大家卸去军服，轻装涉水前进。时已午夜，月色昏暗，朔风凄厉，繁星烂天，尼考夫头系白巾，大家望其影摸索前进。遥望远山，老松岭一带野火焚林，火龙飞舞，漫延数里，高入云中。近水处村庄灯火已熄，万籁无声，忽闻一犬猛吠，众犬争鸣，此起彼落，大家闻声，不顾一切，衔枚疾走。此时众人足履桦皮凉鞋，手扶短棒，俯首弯腰，越过溪流，后经一村落，到一狭长丘陵地带。四顾阒无声响，尼考夫令大家徐行，过一设置障碍物沟渠，遂抵一处。尼开言道：“现已到达目的地”，并叫大家席地而坐，休息片刻，整理衣服。顷之，黑暗中闪出一青年向

导，引我们缓步进入车站（五站），并交给每人当晚西去卧铺票一张，及旅费与途中日用必需品等物。据尼考夫谈话，越绥芬国境比较黑河、满洲里困难，所以必须夜行，万一被国境警察发觉即当献贿求释。苟不获允许，则准备坐狱。如果吃官司，往往旷日持久，悬而不决云。

去国时正当夏季，回到上海已届冬初，征途往返，前后经过半载，此行山川人物与诗思梦境，历历如绘。时若萍重病以后，方出院不久。廉思无恙，尚留江北，阿京已回海门。询查上海工作处于半瘫痪状态中，乃共南平、北平等召集会议，重新起步！半年后，全局发生骤变！

补记：六大中委选举时，工贼向忠发忽被选入。此事突然发生原因有二：一为瞿、李等结成死党，处心积虑，幕后策动阴谋所致，由是以向为傀儡，重组宗派统治。二为◇◇◇昧于知人，偏听偏信，以个人私见强加于大会，未经选举，指定向忠发为中央书记，遂致铸成大错。向后来在工作中与李立三、◇◇◇、王明等狼狈为奸，破坏革命，罪行累累，最后投降南京，公开进行毁党工作，白区工作全部瓦解，后果严重，人所共知！均向、李、刘、王等宗派集团所为。

### 三十三、中央工委及全总

(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〇年)

(上)

自一九二七年起至一九三一年止，在此期间，中共主持全中国革命工人运动的机构，党内为中央工委（设书记一人，委员若干人），工会为全国总工会（设主任一人，委员若干人），全总主任有时由书记兼职。文虎任中央工委书记前后历四年，本章所述内容均文虎任期内史事。

一、中央工委恢复 一九二七年七月武汉政变以后，中共中央以全力充实各省武装斗争，中央工委负责人星散，工作陷于停顿达半年之久。一九二八年一月，国际代表建议恢复中央工委及全总系统工会工作，经国际党与工会代表决定，一九二八年二月召集全总第一次扩大会议（二月八日至十二日），重整工人运动阵营。会议做出几项重要决议，其中最主要的是恢复中央工委及全总，并从各方面调回中委及省委重要工作人员来上海重建赤色工会组织，加强中央领导力量。先是中央工委负责人一九二四年书记为文虎，一九二五年为王荷波，一九二七年为文虎、兆征，至是（一九二八年）决定文虎自湖南回到上海，担任中央工委书记，苏兆征自广东回上海担任全总常委负责人。同时又从湖北调回吴汝铭、项德隆、林育南担任上总工作，从广东调回陈郁负责海总工作，并派张昆弟、张金刃、孙云鹏到铁总工作，刘成章（陕西人，北方书记部成员）到唐山五矿工作。人事布置既定，于是全国工会运动激扬动荡，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下逐渐开展起来。

二、全总扩大会议后斗争形势 全总系统所属工会对敌斗争浪涛起伏，成败互见，简约纪述，见于下述各事：

根据扩大会议决定由全总发布宣言（全文长四千字），申讨蒋介石、李济深、冯玉祥、唐生智、汪精卫等军阀屠杀工农的滔天罪行，提出政治与经济斗争一致行动的要求。

全总第一次扩大会议详情见文虎（笔名真君）所写《中华全国总工会扩大会议的意义》，刊布在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七日《布尔什维克》第十九期。在扩大会后约一个月，全总于一九二八年三月十日策动上海八十九家丝厂，工人六万四千五百人罢工，反对厂警殴打女工，经过一星期胜利复工。国民党与政府见工人斗争抬头大为不安，乃设计加强防御。

一九二八年五月国民党上海市党部联合国内各方面破坏工人运动分子如马超俊、冯自由、杨德甫、谌小岑、陆京士、潘公展、朱学范等工贼在上海成立工会整理委员会与全总对抗。全总采取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各种形式击退工贼分子的反攻。是年九月一日国际青年节纪念日，全总在上海公共租界南京路组织群众示威游行，公共租界捕房出动军警大队逮捕李伟森等二十多人。华界与租界同时戒严，搜查全总宣传及印刷等机关。（李伟森不久释出。）

一九二八年十月二日，上海邮政工人为要求改革工资和待遇，爆发约三千人的大罢工。全总派张之钰、吴雨铭等前往领导，与工贼陆京士、朱学范等展开正面斗争，（陆、朱等初为工统会直接屠杀汪寿华的凶手，后为蒋介石△下七大工会主持人。）结果全总工作人员被逐，经过三日，罢工失败，全总秘书张之钰在杭州被捕被害。张，浙江肖山人，被害时二十六岁。上总组织部长吴雨铭被捕入西牢，文虎在南京路新新公司被敌探张廷浩所追踪，几陷囚车，经工人群众翼护脱险。吴汝铭一九二三年二月七日入保定军法处狱，一九二五年出狱。一九二六年在天津被捕入狱，一九二七年出狱。一九二八年十月在上海入工部局狱，一九二九年二月始出狱，计前后入狱四次，居狱中四年。出狱后即赴北方工作。<sup>1</sup>

全总所领导上海邮务罢工虽然失利，但在天津方面斗争却获得成功。一九二八年十月，河北省邮务工人罢工胜利，取得八小时工作制待遇。

一九二八年冬间，冯玉祥、岳维峻在北方自组御用工会，指使工贼大规模残杀铁总工作人员，铁总受到重大破坏，全总乃加派王仲一、吴汝铭等到北方组织铁总领导机构，恢复各路被破坏组织，击退冯玉祥进攻，在斗争中损失同志姚佐唐等五人。

在东北方面，全总与张学良政府间的冲突日烈。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下旬，张学良纵兵屠杀哈尔滨工人、市民和学生，死伤一百余人，

<sup>1</sup> 此处所述吴雨铭的四次被捕入狱，与吴自己的回忆略有出入。— 补注

被捕工会会员及工会工作人员十余名。（全总于十二月常委集会，讨论张学良前在上海、近在哈尔滨屠杀工人学生问题曾发表宣言。）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国际劳工局局长汤麦（法国社会党）来到中国与蒋介石、冯玉祥、白崇禧、阎锡山会见，共商反共问题。全总于十一月十四日决定开始举行反汤麦周并发布反汤麦宣言，在反汤麦宣传示威中，工会会员四人被拘于西牢。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三日，法界电车工人为吴同根被法国水兵殴死（八月间发生）事举行罢工，并提出经济要求，由于国民党走狗从中破坏，未达到要求，于十二日复工。全总派人重新组织斗争，十六日再度举行第二次罢工，但又为工贼刘云、洪东夷出卖，于三十日复工。在双方激斗中全总工作人员被拘陷入西牢者有徐炳根等三人。

以上记述自全总恢复至一九二八年十二月止全总工作萃萃各大端，于此足见敌我斗争激烈情况一斑。在这期间内有几个关于中国革命运动的重大事件，首为召开太平洋劳动会议，次为“中国工人”复刊及“斗争导报”等几个刊物的创办，在群众宣传方面与国民党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

**三、太平洋工会会议** 太平洋会议是在上海举行。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至二十四日，文虎代表全总出席太平洋劳动会议秘书处会议，在外白渡桥百老汇路某洋房二楼秘书处举行，连日会议食宿均在秘书处。出席代表：中国、朝鲜、苏联、法、美等国工会代表二十四人，代表会员约一千万人。会场用英语记录。主席团：佐治（英）、柏尔德（美国）、卡尔登（澳洲）、罗章龙（中国）。开幕执行主席佐治。

第一日会议开始后，首由文虎作中国工会及斗争情况报告，报告通过英文翻译，由书记以英文速记，再笔译成各国文字交各国代表传阅，所以费时间很长。报告主要在分析当前国内外局势，自一九二八年四月至九月，中国全总领导罢工九十九次，参加斗争工人共十二万六千人，其中全胜十五次，部分胜利三十二次。谈及白色恐怖问题时，提出比较可靠统计数字，自一九二七年四月至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全国工农被屠杀者约十万人，其中经过法庭正式宣布死刑者为 27,699 人，蒋介石所杀者为四万人，冯玉祥所杀者为三万人，李济深、唐生智所杀者为三万人以上。当时被蒋、冯等判刑囚禁狱中者为 17,200 人，工人因政治原因解雇失业者约十万人。（报告在《中国工人》一九二九年一月一日第四期刊出）

当时太平洋各国工会阵营颇为整肃，具有不可轻侮的群众组织力量，但是，由于一九三〇年以还，国际工会内部的派别斗争，中坚组织迭遭破坏，最后工会实力大损，终致名存实亡！一九三二年，负责

人 Newland 被捕入狱，秘书处被查封。

**四、《中国工人》复刊** 在大革命前中共中央工委及全总系统举办重要刊物凡十数种，其对群众发行数量远在党内刊物之上。自一九二七年中央工委工作陷于停顿后，《中国工人》亦停止出版。一九二八年十月，太平洋秘书处书记首先向文虎建议恢复《中国工人》，作为指导工人斗争理论刊物。经全总常委开会决定于一九二八年十二月正式复刊，由阿苏、文虎、项英三人分负编辑兼发行责任。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起复刊，第一期出版（随后于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十五日出版第二期，一九二九年一月一日起出版第三、四、五期，一九二九年二月出版第六期，一九二九年五月一日出版第七期，五月十五日出版第八期）。复刊后《中国工人》因地下印刷发行条件均极困难，故撰稿者人数减少，主要论文第一期沧海（文虎笔名）论文二篇，第二期伯尔德、沧海、仲一各一篇，第三期沧海、炳辉各一篇，第四期沧海、溪石（童昌荣）各一篇，第五期沧海五篇，溪石一篇，第六期沧海、文彬、石溪各一篇，第七期至第八期，沧海、项英、苏兆征各一篇。（后略）《中国工人》恢复出刊到第八期，由于地下印刷工厂发生故障，遂于一九二九年六月起决定停刊，改出不定期刊物，同时又刊行《斗争导报》、《上海日报》、《混战》三日刊等小型报。

**五、《斗争导报》** 《斗争导报》于一九三〇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创刊，由文虎、但一、求实、育南四人编辑。育南笔名南平，负责头二版新闻编辑，求实笔名北平，负责本市群众性斗争采访兼摄影（自设暗室冲洗），文虎笔名沧海（发刊词误作海沧）。编辑室初设在小沙渡路小学，继迁虬江路育南寓内。编辑四人每日必集虬江路会谈编辑事务。某次求实在南京路采访群众集会游行示威新闻稿，并摄影几幅，归来求实头上鞭痕犹在。中有一幅为印度巡捕骑马挥鞭驱逐游行队伍摄影，在上版时换了几次标题均觉未妥，最后育南援笔题云：“看我们的血痕”，大家同意，标题遂定。《斗争导报》印刷由毛泽民负责，发行由谭寿林经理。派报地点分设在市内工人区各小茶馆及俱乐部内，每期发行五千份至七千五百份。

《上海日报》以上海学生、工人为读者对象。《上海日报》由求实主编，曹典琦、谢觉斋、若冰等参加写稿（曹、谢马日事变后流亡到沪），每日印行二千五百份。

《混战》三日刊以上海一般市民为宣传对象，育南主编，每日印行三千份，随派报社发行，出版两月后被查封。

此外在全总系统各工会均自办刊物，如铁总于北平、唐山、天津、太原、石家庄各出版周刊一种。海总在香港、上海各出版刊物。

中央工委自一九二九年二月一日起开始编印“工人宝鉴”，由文

虎、项英、孟雄分任主编，每期印行二千四百份。

六、《全总通讯》 一九三〇年二月起开始印行《全总通讯》，每月十五日刊行一次，自二月十五日至八月十五日共印五集，自四月全总印刷厂被工部局搜查以后印刷陷于困难，勉强维持至八月困难愈甚，《全总通讯》停刊。《全总通讯》集文虎所写主要论文如下：“中国职工运动的状况”（第二集），“经济斗争，我们的策略及各国共产党的任务”（译自台尔曼原著）（第二集），“组织全国铁路工人同盟罢工计划”（第三集），“一九三〇年六月全国斗争统计”（第五集）（其它论文从略）。此外尚有以笔名张俊所写论文多篇。《全总通讯》停刊后，一九三〇年七月出版《全总政治工作》。

七、全总印刷厂 一九二九年九月，全总常委为加强工会系统报刊书籍印刷业务起见，决定自办印刷厂，负责筹备人由文虎、毛泽民、成玮共同商定办理。时毛泽民任中央印刷厂经理，毛一九二七年在湖南省委工作，秋暴中被派往湘西常德一带工作。秋暴失败后到上海主办印刷厂，厂设上海天后宫南某里，厂中工人均由同志家属担任，泽民有两侄毛特夫、毛汉章均在厂当学徒。文虎与泽民商量结果决定由他出面定购印厂设备全套（对开印刷机二部，圆盘机一部，铅字、铸字、排字架等全套）并拨工人一批为新厂骨干。逾月筹备就绪，当推成伟为经理（成，宁波人，原为印刷工会负责人），开始营业，但营业未久即被工部局传讯，理由是违反租界印刷条例，经人疏通，罚款了事，乃继续营业。至四月又遭传讯一次，成在传讯期间白天停业，夜间开工，源源印行各项报刊，直到一九三一年临时中央派顾顺章劫夺时止。经理成伟在党内斗争中入狱，生死不明。印厂筹备人毛泽民一九三一年进入闽粤赣苏区任军区经理部长，一九三八年任新疆财厅长，一九四二年在统一战线工作中被盛世才所枪杀。

八、全总第二次扩大会议 文虎为了继续部署下年度工人斗争方略起见，因决定召开全总第二次扩大会议。全总第二次扩大会议是在职工国际与太平洋劳动会议第三次会后举行，会期自一九二九年二月十七日至二十五日。全总各产业代表十七人参加会议。会议主要报告有三：（1）过去一年来职工运动发展的形势和目前总任务。（2）出席职工国际代表报告（苏兆征）。（3）出席太平洋劳动会议秘书处第三次会议报告（文虎）。

在全总扩大会议上曾讨论到武装工人纠察队问题，全总曾为此对全国工会组织发表声明（宣言推文虎与国玉起草），阐明工人武装组织的必要性，但在实行中却遇到很多困难。由于统治阶级在城市驻有重兵，军警防守极为严密，工人取得大量武装是非常困难的。至于在缺乏国际海口或内陆通途（如张家口）的地区对于接受国外武器接济

更不可能。因此，当时全总只考虑到少量工人自卫武装问题。据颜昌颐意见，少量轻武器在城市矿山区域是可以存储，并能从上海租界军火商购取，运输方面与海员铁路工人联络亦无多大困难。因此曾经计划在主要产业工会所在地区成立少数武装纠察队，作为进行斗争时期的自卫手段，但限于经费及其他条件，始终未能实现。这次会议后，决定全总常委分途到南北各地指导各产业工会斗争。

九、石溪赴江北工作 最先是石溪往南通考察江北工作，经时三个月返沪，报告南通情况与上海环境大异。据石溪报告，南通大生公司是一个规模颇大的托拉斯组织，公司企业包括炼铁、纺织、面粉、轮埠、碾米、榨油等企业，均为资本家张謇所掌握，同时亦系江北政治幕后主持者。张为前清状元，好粉饰门面，以文采风流自期，纵情声色，延梅兰芳、欧阳予倩二人在家演戏，为二人建梅欧阁以馆之。梅欧阁落成时，张发启征文，高张筵宴，大会宾客。某名士从北京来，心殊不怿，作诗遗张，有句云：“金迷纸醉驴登殿，断袖分桃雄妇人。”张大惭，但亦无如之何，当地人民传为笑柄云。石溪并谈到张对其所属企业的工人职员，另有一套羁縻方术。大生公司各厂大都依同乡姻亲关系雇用工人，工人平日互相联保不受外人煽惑利用。因此，石溪建议革命工人组织应仿照当年长辛店十人团办法从最基层入手组织。并建议工会工作人员须设法参加工厂生产，从内部发动瓦解厂内原有的封建性小集团，才能成立真正的革命基层组织。在组织形成相当力量后，进一步便可以发动政治与经济综合性斗争。（因张謇当时总揽当地政治经济大权，所以一切斗争都会形成对张的斗争。）由于后来向忠发、李立三、王明的暴动计划，当地组织遭到全部破坏，上述计划无由实施。

十、苏兆征病逝 一九二八年十月以后，“六大会”中委及东大新派回国的干部先后抵达上海，停顿几月的国内革命重新开展起来。一九二九年二月间，不幸苏兆征患盲肠炎（阑尾炎）不治逝世。于是革命工人运动阵营又弱一个。兆征一八八五年生，广东香山人，少家贫，投大洋轮上做洋务工人（组织大餐间）。一九二二年三月组织海员罢工，胜利后组织全港粤海员罢工，名振一时。一九二三年在广州入党，一九二七年任武汉政府工人部长，大革命失败后与文虎、项英等主持中央工委工作。一九二八年出席中共“六大会”，当选为中央委员。一九二九年二月二十五日患病逝世于上海医院，年四十四岁。

兆征身高长清癯，眉发青黛如染，沉默寡言笑，外训谨而内刚强，有至性，真诚不苟，朴实无华。在劳动部长任内谦抑谨慎，从无自满之色，常自言本人为洋轮侍者出身，骤登高位，只求做事，不愿做官。又说：“与汪精卫等共事极难相处。”人询其故，他说：“汪等富贵

习气重，瞧不起下层人民，唐生智纯系军阀，且有流氓气派，也不好交接。”因此他在武汉国民政府时期，除会议及公事外，绝不与彼等接触。他对向忠发流氓作风极为不满，常当面批评李立三与向忠发，说二人均够不上做党员。李、向因此怀恨，故时造蜚语中伤苏。

兆征平日生活节俭，无任何不良嗜好，故持躬清廉，取与不苟。一九二八年兆征与文虎同行赴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会，行前兆征请文虎会同将过去经手海员工会帐目结清交寿林转海总以清手续。因为兆征估计在赴苏途中度越国境时可能发生意外，所以先期将该款料理交代，足见其处事丝毫不苟的精神。兆征身后萧条，为其遗孤生活计，曾公开发起一次募捐运动，略有成数，五月间送其夫人及子女二人到苏联避难、学习。

### (下)

以上为中央工委及全总日常工作之一部，以下就全国南北各地巡视与重要性会议，略述梗概。

**一、北方巡视** “六大”会后，中央仍在盲动政策轨道上依惯性运动时，南北军阀对革命进攻不止，全国各地工作旋起旋落。为了继续防御敌人进攻，开展群众性斗争，中央工委讨论认为各负责人必须深入地方群众组织，及时采取冲破敌人包围，重整被击散的队伍方略，才能屡败屡战，再接再厉，向敌人作坚定不移的斗争。基于上述理由，文虎在正常安排全国性工作计划以后，遂行到北方巡视，同时参加当地工作。文虎于一九二八年冬季经海道北行（同行者王、疆），于十一月下旬乘轮到达天津。当时天津党委为韩麟符、李希逸、郭隆贞、于国桢、孙良田、安幸生等。韩谈过去天津省委房屋多居租界，自一九二八年奉军出关后，傅作义来到天津，六月二十日傅作义派队搜查天津俄领事馆，天津俄领事馆被搜查后于六月二十九日总领事率全体馆员下旗回国，天津环境日益恶劣。文虎此行除解决北方当前工作中所发现的困难问题，出席铁总扩大会议外，同时还要查明近几年来北方所发生的若干重大事件，并随时纠正向、李等所推行的错误政策。

**二、天津二惨案** 在大使馆案发生以前，北方曾经发生几次重大事件。溯自一九二六年奉军进关以后，对于南方正在勃兴的革命运动感到异常恐怖，为维持其武力统治起见，近年来对革命势力采取残酷的镇压手段。如一九二六年一月，国民二军退出天津，奉军乃占天津。十一月义庆里市党部被搜查，捕去中共党员江震寰等十七人，一九二七年四月十八日加以杀害。八月又捕去李季达、粟泽等人，于十一月

被杀害。由此可见张作霖对中共活动时常在密切注意中。

**三、王荷波等四十人牺牲** 在大使馆案发生以后，时中央驻在武汉，南北交通阻梗，对于北方情况不甚了解，北方工作已陷于停顿状态。一九二七年六月中央常委会决定派中委王荷波到北京去办理善后并开展工作。荷波离武汉前决定将家眷送返福州，由其夫人携大女儿职工同行。时新生一女婴不满二月，托西怀照管，但西怀本人工作繁忙照顾不来，乃另托他人代抚。安排停妥，荷波遂于七月初间单身北行（经浦口北上）。荷波北去后文虎亦南往长沙，自后党内迭经事变，北方消息阻隔不明真象。文虎到上海后曾遇和森从北方南返，当询荷波遇难情事，和森竟茫然不知所对。后遇到另一从北京南来的同志谈及北方所发生事情，彼云：“当时和森因北方军警密布，并未亲履北京城内一步，所以一切不知。”此乃由于和森为人本习于空谈，短于实践，且行动怯懦，到北方后深居简出，不敢与群众接近。自从几次暴动失败后，群众基础已荡然无存，既不能动弹更不敢直言，后来只好硬着头皮悄然回到上海。

文虎到北京、天津巡视时，经多方查访始知梗概。在延庆事变发生后五月，即一九二七年十月，北京市总工会曾一度被张学良军警搜查，捕去负责人杨会恭、赵铨林等十人。十一月军警利用投机分子作眼线，又捕去王荷波、段百川、吴可、杨惠工等十八人于十一月十五日一律处以死刑。随后又到丰台、长辛店等处继续捕去铁总特派员陈国华、杨宝昆等十二人于一九二八年一月在天桥枪杀。北方经过三次大破坏，先后牺牲重要干部四十人。北方自大使馆案后，党的精华至此又蒙受一重大损失。有人问张学良：“北京、天津屠杀过甚，未免有失人心！”张答：“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我做的事虽未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由此可见他对京津诸案几十条人命还是心安理得的。张后一度对南京实行兵谏，但受愚屈服。

**四、冯玉祥屠杀河南民众** 文虎北巡从京汉路南下到河南视察，时北方军阀冯玉祥为直接镇压屠杀河南民众的屠夫。文虎到开封时，省委马尚德（杨靖宇）说：“狱中政治犯挤满，乃辟新监收容。”河南省委谈冯玉祥与蒋介石自在徐州结拜兄弟后，天天捉杀共党，一九二八年一月冯派吉鸿昌在彰德卫辉纱厂屠杀工人，死伤达百人之多，并在焦作、郑州、开封、洛阳大杀工人，死者累累，掘坑掩埋灭迹。某次逮捕工人二人，冯亲自审问，工人拒不回答，冯大怒，视为顽固分子，用朱笔在二人头上各画一杠，令行刑者推出斩首。当时流行二句话道：“徐州冯、蒋结拜，杀共产党如砍瓜切菜！”后来沧海曾为文揭露冯的野蛮行径说：“冯玉祥是现在军阀中最好滑的一个。因为他最好滑，所以他在一切战争中总是滑头滑脑，鹜虚名而兼重实利。”

他更有一种欺骗民众的手腕，遇事花言巧语，不知道他底细的人，一时竟容易为他所欺骗，把他捧为‘革命左派’。冯玉祥统治河南以来，屠杀无数工农群众，同时更十分害怕河南工农的势力。他常自言他的军事纵然失败还有办法，如果被河南工人农民所推倒，连鬼也没法做。”（《中国工人》第一期，沧海：《冯玉祥的矛盾》，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一日刊出）

**五、铁总扩大会议** 文虎北巡时曾偕铁总秘书赴天津，此次去天津主要为组织五矿罢工事。抵天津时，适交通系叶恭绰、郑洪年等派京绥路司机工人张济海等组织天津同乡会暗中与铁总对抗。张利用王藻文、李德贵（二人均京绥铁路工会负责人，任铁总特派员，受张利诱投敌）破坏铁总工作，并在国民饭店谋行刺文虎及昆弟，铁总干部在天津遂无法立足。铁总负责人商量结果遂派郭宗鉴（党员、铁总干部）周昌渭二人访王，立谈间郭出手枪将王藻文击毙。王妻张健生鸣警拘郭，囚于天津第三监狱，逾年郭瘐死狱中。此举郭为工会除害，张济海等气馁，声势渐衰，张昆弟遂重返天津工作。

文虎令昆弟重新部署北方工会斗争阵容后，遂决定于二月十五日在天津召开铁总扩大会议，会毕，文虎始返上海。（决议载《全总通讯》第五集）

**六、北方兵暴** 文虎北巡归来时，向、李等正在北方策动兵士暴动。所谓兵士暴动是脱离群众，采取孤注一掷的方式，一般说来只求鞭爆响，不问结果成败。所以在没有工农群众组织基础上发动的兵暴有的功败垂成，有的毫无效果，致使党在北方军队中长期扶植的地下武力消耗殆尽！其主要事例如下：

1. 栾城兵暴张兆丰被害：一九二九年北方局奉令组织农民暴动，当时不顾条件命令军委书记张兆丰前往武安、磁县发动农民武装斗争，旋即失败。是年又令张兆丰组织平汉北段兵暴，教张从李生达部第二四一团中拖出枪支建立苏维埃政权，事泄，张即被逮捕，一九三〇年一月七日被杀于河北栾城。张兆丰，河北磁县人，为北方党军事特出人才，北方书记部成员。陕西陆军讲武堂毕业，在靖国军任军官。一九二五年后曾任方振武部第三师师长，一九二七年冬离职。一九二八年出席“六大”会，回国后担任北方局军委书记，至是被害。

2. 平定兵暴谷一雄被难：张在栾城牺牲后数月，向、李等再令谷一雄于一九三一年在平定组织兵暴。谷一雄在高桂滋部队中拉出武装七连，约一千人，攻占河北阜平县，最后孤军奋斗，为石友三部沈克所包围，全军覆灭，谷一雄被俘解北京，八月被杀。谷一雄，河北安国县人，保定育德中学毕业，北京马学会会员。考入西北陆军干部学校，结业后任方振武部参谋。一九二八年入方振武所办军事政治学校

任区队长，加入中共，并在校内成立党支部，有党员二十人，受张兆丰节制。一九二九年任山西省委军委书记，牺牲时二十六岁。

3. 完县兵暴韩永禄牺牲：一九三〇年夏继续执行暴动政策，令韩永禄发动完县五里岗暴动，旋即失败，韩永禄被逮捕下狱，于一九三一年秋被杀于北京天桥。韩永禄，河北完县人，原保定育德中学生，北方书记部成员。

**七、南方巡视** 文虎从北巡归来后约一月，即一九二九年七月，文虎到广东香港巡视，其理由是因为自广暴以后当地党与工会活动十分困难，省委由于一时无计划进行工作，遂将海总取消，全市工会陷于蛰伏状况，因此前往设法打开僵局，将工作重新部署一番。文虎遂准备后，决定八月初起程。文虎在动身赴粤前夕，秘书谭寿林相告：据报，广州陈济棠近来勾结香港政府订立联合对付 C.P. 活动条约，凡从外部航粤轮船到香港，抵埠时先由双方军警上轮搜索，见有形迹可疑外江人即暗中监视，下船时绑架到警厅非法审讯，宣布作红色人物驱逐出境，转手间送上广州派来槛车运往深圳广九车站引渡。（传说蔡和森即在香港失足，陷敌。）因此在轮中应小心在意。寿林已通知省委轮船到岸时，派一同志到码头迎接，文虎须按照约定暗号，辨明对方，跟随接待同志登岸。随后寿林亲送文虎到外滩码头，登乘威尔逊总统号直航香港。该轮于八月八日到达香港。轮船到港抛锚停泊，省委先已得到上海通知派人到码头迎接。文虎立船舷尾前方，着唐装，手拿乳色雨衣作为记号，远远见到一位著香考绸白鞋女同志向文虎招手示意，下船时在拥挤人流中随她进入大街，在转弯处二人同登上预先等候的汽车开往跑马场附近，车停，下车后紧跟随她走过几条小街就是省委临时设立的招待所。该屋有房三间，文虎住外间，主人姜秀珠与其母同住里间，亲为料理膳食及一切杂务。

**八、周文雍、陈铁军与叶铺被害** 贺昌为文虎北大旧友，时来造访，南天重逢，每以畅谈前事为快。文虎询及前年广州暴动失败情况，贺答不知其详，仅云：广暴时周文雍脱险赴香港，一九二八年三月重返广州工作。周与陈燮君同住，伪为夫妇（陈为中山大学学生，当时改名陈铁军），由于省委秘书投敌，将二人实况告讦，二人立即被捕处死。又广暴失败后第四师师长叶铺亦回香港，此次亦与周、陈二人同时被捕，为李济深所杀。

**九、省港工作会议** 文虎到香港后当即召开省港工作会议讨论及布置工作。当时省委书记赖发（绰号烂风炉，九龙船厂工人），组织部邓发、宣传部贺昌、工委陈郁、军委聂荣臻、妇委姜秀珠、海总刘达潮、方才、叶全等负责人均到会。会议进行二天始将当时港粤工作不能开展的症结弄明白。由于向李政策长期站在左的一端，地方同志

虽反对，有怀莫白，有时话说到嘴边又咽下去了。这次文虎让大家畅所欲言，大家认为这是对于广暴与海陆丰失败后作了第一次工作检查。文虎在会外还听到不少久蕴未宣的意见，如九龙船厂一个工人同志说：“自从广州暴动失败，海陆丰政权摧毁后，革命元气斫丧无余，全身瘫痪，经使革命无法向前走一步，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另一个同志说：“我们听从上级的命令，总算养了两个先天不足的苏维埃细仔（指广州与海陆丰苏维埃政府），可惜不久夭折，徒供历史凭吊！还有更多的苏仔胎死腹中，没有养下来，这一切早产与流产的牺牲使我们竟不能养出一个壮健的儿子出来，这是蠢婆娘的做法。”还有一位同志说：“想着从前孙中山搞军事投机，时时在注目耸动海外华侨作为筹款的张本，我们今天的军事投机居然也在模仿老孙的做法，难道非如此便不能邀功吗？”这些话都是以前所未闻到的意见。过了两天，贺昌来文虎处谈话，谈到工作无法开展，文虎顺便把听来的那些话转告贺昌，贺说：“让他们谈吧，反正我们保证不在香港暴动就行了。”贺又说：“论理这些意见也很对，但要做领导，就只能面对任务，完成多少算多少，万一完不成，也是没有办法的事。”话题随后又转到领导人身上，有同志说：“书记烂风炉是最近提拔的工人干部，平日坐茶馆，逛大街，酗酒胡闹，实在有亏职守。”贺说：“向忠发能当中央书记，烂风炉为什么不能当省委书记？”那同志道：“这也是不合逻辑的逻辑。”贺闻言大窘，说：“我们总该重视领导威信哩！”

**十、九龙庙会议** 省委会议以后，文虎建议举行一次工作干部部会议，报告目前时局，探讨工作方略等问题，经省委同意后遂由省委做出决定召集全体干部会议，并通知驻广州特派员参加会议，目的是让中央来人与干部见面有鼓舞作用。全体干部会议选定在九龙郊区一座大庙中举行，庙距宋王石约十里，殿槛高深来往行人稀少，大家作为游客散坐廊庑下，一面喝茶一面讲话，由文虎作报告，整整谈了几个钟头。这是广州暴动以后粤港干部公开集会的第一次，所以大家感到兴奋，纷纷提出问题和意见，对于改进当前工作起了积极作用。

到港巡视工作约经过六星期告竣。事毕贺昌与秀珠等乃导文虎游览香港浅水湾海滨、大旗山、九龙宋王石等处。宋王石乃宋帝昀逃难落海处。文虎遂于九月二十日乘英轮返航上海。返上海数月后，得香港讯息：秀珠后被派回广州工作，一去不返。事后方知为李济深等所拘囚杀害。后又续闻烂风炉因生活贪污腐败，工作无能，自感前途无望，竟将省委公款全部席卷而逃，查无下落。向忠发、李立三护短，不肯追究，并通知党内不准再提此事！

文虎前在香港时，贺昌在香港办一小报，自任编辑，销数不大，他要求文虎设法找一个编辑送港，但自烂风炉卷逃后，该报停刊，贺

亦随即离港返沪。

又文虎离跑马场前夕，忽遇强级台风自南海方面袭击香港，风力强劲，海潮涌入堤内，浪沉木船数十艘，房屋倒塌，伤人无数，满目灾象，一时交通为之断绝。经过三十六小时始告平息。风止后秀珠送文虎到码头，乃乘英轮皇后号直航上海。中途各港均未停靠。越二日到达上海外滩，易服装下船，在埠头至成与慕兰来会，三人同车返极斯非尔路寓所。时已深秋天气，见兆丰公园黄花满径，枫林如染。稍事休息即偕万良同赴宜兴、无锡出席当地鼋头渚会议，计议有关诸问题。

**十一、南巡报告会** 文虎到上海后，某日在中央会议上报告南巡经过，会议上公认为南方工作已重新送到战斗轨道上去，文虎并建议调陈郁到上海海员工会工作，理由是香港海员工会已有相当组织基础，上海以宁波帮为中心的海员群尚处于资方均安会影响之下，朱宝廷已无法发挥全力，朱陈对调可望工作好转，当即由会议决定照办。但是正当大家在开会的时候，参加会议的向忠发忽然离座外出，历时颇久始返会场，秘书谭寿林诘问何事？向啜嚅云：“我家来人有事呢。”德隆回顾室外，忽听高跟鞋声，见向妾匆匆返身下楼梯，大为不怪，正色斥向道：“这是中央会场，怎能让你小老婆来这里，以后我们还能在此开会吗？”向嘻嘻一笑，涎着脸说：“叫她以后再不来就是。”时众议纷纷，均不直向所为，向恼羞成怒，在开会中呆若木鸡，一言不发。寿林余愠未息，自语道：“太不象话！”向乃向主席请假先退，大家继续开会。从此以后向忠发便屡向国际代表暗放冷箭，搬弄是非，说：“北方书记部是‘二七’派，向来藐视国际代表，并敢违抗我的命令。”向又当众对立三说：“我拼着总书记不干也可得，决不让他们占便宜！”后来向到南京，指使搜查党与工会机关，火上加油，大肆破坏，许多人都说这是向在发泄对革命的怨气。

**十二、全总特派员会议** 中央工委与全总系统中央委员及各级干部对瞿向等集团无论在政策或组织方面均持严格批评态度纠正其错误，使瞿、向等怀恨不已。双方对峙历时很久，直到全总特派员会议乃集中表现出来。

一九三〇年二月二十五日，全总通知决定于三月十二日召开全国特派员会议。由于散处各地的特派员旅程耽搁，直到三月中旬始到达上海集中。会议实到代表二十三人，铁总、海总、广州、香港、满洲、顺直、南京、武汉、青岛、江西、信阳（京汉路）、湖南、云南、闽西各一人，唐山三人，上海五人。参加全总特派员会议者有刘俊才（济南）、孙秀峰（青岛）、林仲丹（即张浩）、吴芳、邓发、震瀛、朱宝廷、文虎、育南、项英、孟雄、梁鹏万（唐山）、张树棠（张家口）、



殷鉴（顺直）、刘国章（陕西）、伍和敬（哈尔滨）等。

十三、向、李等腾雾蹈空而行 会议自一九三〇年三月二十日起，二十八日完毕，开会时间向忠发作政治报告，内容是说：“国际形势为帝国主义大战更快来到，中国革命走向革命高潮，走向直接革命。组织罢工与总同盟罢工。武装暴动。建立苏维埃政权。”向念完上述各语句，李立三起立帮腔说：“第十次共产国际扩大会议指出革命高潮就要到来，认为革命高潮到来的中间尚有一个阶段便是右倾。现在时期是世界革命时期，国民党断不能统一中国。目前是实行武装暴动而不是准备武装暴动。红军要向大城市进行游击战术，避免与敌主力冲突是大大右倾。党内右倾是主要危险，他们比取消派还要坏，应坚决铲除他们！在农村要反对红军军阀，反对◇◇◇，反对富农路线！”

在这次会议讨论形势及任务时，全体代表与向忠发、李立三间发生重大的争论。大家不同意向、李的报告及总暴动策略，当时指斥向、李报告大部分是毫无事实根据，对革命不负责任的空谈。汉口代表说：“武汉三镇驻有敌军二十万人，工会会员人数不及敌军二百分之一，且均为徒手，南京敌我力量悬殊也是如此。视暴动为儿戏，结果是纸上谈兵，空中楼阁！”孟雄抨击向、李路线谓其腾云驾雾蹈空而行。育南说：“在毫无准备条件，强迫命令同志徒手暴动，必然招致一败再败，斫丧革命元气。”向恼羞成怒，大吼大叫，说：“你们全总整个右倾，给老子滚开去，老子是不好惹的。”李立三在旁附和杂以谩骂，全场秩序大乱，会议无法继续进行，遂草草通过决议。

当时有些坦率的代表善意批评向、李言行是“瓜未熟而摘食，孕未满而趋生。”另有代表说：“还不止此，他们是无孕趋娩，无米强炊，他们那种奇离古怪行为，大概与白痴相像。”向对同志不断以恶声相加，他说：“君子报仇三年，小人报仇眼前，老子迟早总有一天要收拾你们的。”由此可见向、李集团当时对党、对革命的危害性达到了何等猖狂程度。会后青岛代表写了两句话送向忠发道：“老子天下第一，革命无双，全党整个右倾，该当何罪？”大家称此次为“冤枉会”。

十四、全总实力检查 但是经过这次会议，对全国革命工会实力却做了一番检查。检查结果，截至一九三〇年止，全国有赤色工会会员四万多人，主要分布在北方铁路矿山（唐山），南方上海海总（香港），其次为武汉、天津、沈阳等处。偏远区域如四川、云南、香港有千人以上，安源残破已极，尚存五十余人，景德镇二百余人。据一九三〇年全总文献可以判明当时列于全总预算表内的工会基层组织有上海、武汉、东三省、天津、唐山、广州、香港、青岛、无锡、南通、南京、厦门、九江、太原等十四城市。此外铁总、海总、矿山等产业

工会组织尚未计算在内，由此可见由文虎负主要责任推动下的全总近年已有显著变化，全总在全国范围内南北各大城市以及海员、铁路、矿山各地区，党与革命工人群众组织大致已恢复到一九二五年五卅前的水准，在主要产业工人组织中已奠定群众斗争基础。在上述群众组织基础上，一九三〇年二月全总据赤色职工国际来函在中国选派代表二十二人出席赤色职工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代表四月出发。同时选出代表六十名组成中国代表团，赴苏联参观十月革命典礼。

十五、干部进工厂 于此须特为指出者，即全总由于向、李严重的政治错误路线，使工作发展受到极大限制，与此同时又发生经费绌窘现象。中国革命工会自一九二一年以来，工会会计通常是采取独立、自给自足原则，各级工会自筹经费，上级经费由下级按百分率上缴，但在地下工作困难环境下，实际并不能贯彻此项原则，因此工会财政情况一般是非常紧张的，工会开支往往入不敷出。其临时开支不列入预算中者尚不在内，所需经费大都用在宣传方面，占全额约百分之八十，其余占百分之二十。

在地下工作期间，工会会员生活困难大都免缴会费，全总本身在经费拮据时经常动员干部亲至工厂劳动，或向有社会职业同志取得捐助，以维持最低生活开支。如大汉曾到德士古火油公司做搬运工人，仲钧到汇丰驳船公司当水手，刘炎到中华橡胶厂工作，金伯祥到虹口某餐馆做侍役。当经费极度困难时，有人建议劫取某银行支行存款，以资罢工费用，事为虞卿所闻，不以为然，另筹款项，始度过难关。

十六、第五次全国劳动大会 全总决定于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七日在上海召开第五次全国劳动大会。会议自十月间开始筹备，在秘密环境下举行，十一月九日正式开幕，至二十日结束。全国南北各地区赤色产业工会代表约五十余人，会议经过十天，大会重要决议包括全总工作报告决议，全总宣言，工会组织宣传问题决议案，工人武装斗争问题决议案，青工、女工问题决议案，工厂委员会问题决议案，工农联合斗争纲领等各项决议案，内容要旨主要根据一九二九年六月中共二中全会职工运动决议作成。五劳大会选举全总执行委员史文彬等人成立全总常委会（常委九人）指导经常工作。

常委会委员为：史文彬、文虎、林育南、项英、何孟雄、唐鸿景、张金保、刘达潮等九人，秘书长谭寿林。

全总执行委员为：文虎、项英、史文彬、张金保、刘达潮、唐鸿景、林育南、何孟雄、李震瀛、吴雨铭、朱宝廷、马骥、刘俊才、徐锡根、霍昆镛、孙秀峰、陈炳生、陈郁、孙章重、许维参、李昌荣、王仲一、袁炳辉、温禹成、陈寿昌、孙津川、邓发、邓中夏、余茂怀等三十人。

### 三十四、六届三中全会及其瓦解

从上述各章看来，中共六届一中全会到三中全会，一年以来全党工作在农村与城市各方面总算有所发展，特别是城市工人运动有相当成就。但是由于向忠发、李立三等人的宗派统治在上层占有优势，于是盲动主义再次抬头，同时狭隘的宗派斗争泛滥党内，造成党与革命的严重损失。

一、盲动主义再次抬头 一九三〇年五月间，向李集团在国际东方部代表监临与领导之下，发出《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案》。他们以反右倾为藉口，把当时农民战争说成是：“一种极错误的”，“农民意识的地方观念与保守观念”，“割据主义”等，同时诬蔑中央工委与全总领导人，说成是有“右倾倾向。”向李制定全国总暴动计划是以中央名义发布的，其主要内容是调动红军主力攻取长沙，会师武汉，并命令上海、南京、广州、天津等城市实行广泛暴动政策。向说：“打蛇要打头，南京是反动政府的头，南京暴动就是打破敌人的头，全国都会起来革命。今天是中国革命，明天就会爆发世界革命！”等等。李提出口号是：“猛烈地扩大！猛烈地扩大！！再来一个猛烈地扩大！！！”高喊：“到武汉过端午节，到南京吃月饼！”他们倡议取消工会系统一切经常斗争，代以武装暴动，成立总行动委员会，主持一切。

当时中央工委、全总与江苏省委等负责中委对于向、李集团的错误路线立即采取严正批评并予以制止，他们感到恼羞成怒！遂加强党内斗争，企图维持残局。但是后来事实上证明军事进攻大城市政策确无法实现（如长沙、南昌均未完全占领），进攻武汉的第二军团损失军力五分之四，七军损失三分之二，各城市工人运动也因此受到严重摧残。于是国际变计决定召集三中全会打破僵局。

当时向、李等听到国际决定召开三中全会，感到进退维谷，立即

纠集本派讨论自救办法，以冀度过难关，稳定宗派统治。他们在研究对策时最后决定牺牲立三，叫他作替罪羔羊，藉以保持本派势力于不坠，办法是由瞿秋白出面负责扭转局势。瞿当时在莫斯科尽力斡旋此事，表示绝对服从国际命令，保证实现国际意图，并愿白告奋勇回国工作，纠正立三路线的错误。于是国际东方部决定派瞿秋白回国召集三中全会。瞿回国后，召集本派所属干部决定对于三中全会的策略。当经◇◇◇<sup>1</sup>决策，大致分为如下几项：

1. 在总的方面坚持左方阵地，居高临下，对待来自各方的攻击。就是说不要放弃左方高地，采取以左抗左的策略，否则便陷于被动，处处挨打。

2. 尽力掌握现有中央局实际权力，勿使滑脱，不惜任何代价（所谓实际权力指军事、财政、政保等）。

3. 继续反对右倾，反对城市保守主义（以全总党团及江苏省委何孟雄为代表）及苏区富农路线（以润之为代表）。因为他们反对总暴动及向大城市进攻。（根据一九二九年六月国际关于农民问题来信指示加强反富农路线）

4. 对国际委曲求全，表示无条件服从，立三自请退位，保留向忠发书记位置。

5. 允许政治局改组，容纳米夫派人参加，欢迎陈绍禹、秦邦宪加入政治局（以党章作交易）。

6. 加选贺昌、任弼时为中委，以保持本系多数。

二、三中全会失败经过 一九三〇年九月三中全会在周密布置之下正式开幕。先是全总党团及江苏省委何孟雄等对向忠发中央六月十一日与七月二十二日决议曾表示异议，责向、李骂空而行，不符合革命要求。此项意见虽被向、李等曲解，目为右倾，但党内群众均表赞同，因此三中全会开幕时，特别邀请反对向李的全总党团成员及何孟雄等参加，貌示宽容。三中全会向忠发担任主席宣布开会，瞿在三中全会担任形势报告，瞿在报告中只是为本宗派作保全实力掩护退却，对国际大事吹捧，对立三批评是伤皮不伤骨，小骂大帮忙。说一九三〇年六月以前中央是完全正确，以后也不是完全不正确。师爷口吻，有气无力，大概他当时已气馁神昏，方寸凌乱，故不自知语无伦次。报告毕，在讨论中，向派列席者按照瞿作报告依样葫芦各诵一遍。文虎发言批评向忠发、李立三政策错误，作风不正，无辨别分析错误的的能力兼缺乏承认错误的勇气，从来不知正视革命利益，只知各逞宗派私图，建议党的政策改弦更张，目前群众工作应放在第一位。接着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史文彬诸人继续发言，针对向、李平日工作

<sup>1</sup> ◇◇◇，指周恩来。— 补注

提出批评和建议。最后瞿秋白作结论，虚以逶迤地表示接受大家意见，但同时又说工作中不应有第一位主义，如果把群众工作当作第一位，那么其它（瞿意指武装暴动，不好说出口来）工作就不是第一位了。随后向忠发说孟雄、育南的观点不妥。育南立即问何以不妥？向急忙改口说：“我不是说不对，也不是说有什么错误，不妥不是不好，不妥只是不妥……。”何等见向理屈词穷，遂不再诘，但大家已经看出瞿派只是在原位置上踏步、打圈子，中央政策并没有朝向挪动一步。至于瞿所写的三中全会决议挖空心思，咬文嚼字，语意混沌，护短曲说，大家均一致认为此会大可不开，决议有等于无，草草散场而去。但向忠发、瞿秋白看来，三中全会是胜利完成了，政治上是换汤不换药，向瞿派牺牲了李立三，保全了更多的人，认为天大一场风波总算可以平息，他们今后仍可以控制中央，政治本钱确保无虞。

**三、全总党团与江苏省委等反对三中全会意见** 三中全会后全总党团与江苏省委及北方党与工会等方面纷纷表示对三中全会严厉批评，并指出目前立即召开紧急会议的主张，同时主张筹备全国第七次代表大会，从根本上清除“左倾”错误路线，前后用书面表达反对三中全会意见，使三中全会中央大伤脑筋，其中尚存林育南一信，现引述如次。

林育南在三中全会后由全总党团决定派往江西中央苏维埃区工作，林在出发前写了一封信给三中全会中央，仍申述前项反对意见，其原文云：

听说政治局最近决议认为三中全会的决议案是不正确的，是调和主义的路线，因此决定废除它，再来一个决议案代替它，这是更进一步的反对立三路线、接受国际来信的表现。我在临走的时候，认为这一问题关系于我党及革命前途，异常重大，因此不得不再把我的意见提出，以供采纳。

（一）废除三中全会决议，再来一个真正接受国际路线的决议，这是非常重大的事件，在党目前执行紧急任务的时期，必须很郑重的采用中央紧急会议的方式。这一会议由国际代表（远东局）主持召集，除中央委员外，应有工作上特殊有关系者参加。在紧急会议上应明白指出六月十一日前后数日中，中央政治局完全为立三路线所领导，中央的路线即是立三的路线，这一路线完全是反正确路线的。三中全会是站在调和主义的立场上，不但没有揭发立三路线的错误，反将正确路线和立三路线模糊混淆起来，说中央路线是正确的，是和正确路线一致的，并为立三路线辩护。谁要将中央路线与立三路线、国际路线对立起来，谁就是右倾，这给予立三路线以合法的保障，故在三中全会后许多地方的工作及中央的指导中，仍然有继续立三路线的错误。这就如国际来信所说模糊混淆这两条路线，那就有继续过去错误的极大危险。因此，紧急会议应

该坚决的宣布三中全会的调和路线是根本错误的，完全废除三中全会的决议案，从新通过彻底接受正确路线，反对立三路线的正确决议案，以代替三中全会的决议，从此指导目前形势异常严重的全国的革命行动。

（二）在紧急会议上及会议后，中央应加紧改造，光明组织制度，严紧政治纪律，过去由于党的无产阶级的薄弱及客观环境的关系，使党的组织有历史遗留的许多病象，再加以政治上立三路线的流毒，使党的组织在组织上军事化，“家长式的领导”、“命令主义”、“委派制度”、“惩办制度”等等都继续扩大起来，这完全是违反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的组织原则，这使党员达到消极、达到盲从，使党脱离群众，减弱党战斗力量。在家长式的命令主义和惩办制度之下，当然也就不能执行铁的纪律，尤其是政治纪律。“铁的纪律”是党的布尔什维克化的基本条件之一，党应该以最大努力去保证它，在紧急会议上应明白指出过去党组织制度的根本错误，从此应坚决彻底的改正，肃清一切家长式领导的命令、委派、惩办等制度，保证党内必要限度的“民主化”，发展党内布尔什维克的“自我批评”和“政治讨论”，尽量在秘密工作条件许可之下实行党的选举。总之必须以正确的“民主集中制”代替“家长制度”，以说服和教育同志的态度去执行“铁的纪律”以代替“惩办制度”。对于过去反立三路线或其他处置失当的被处罚的同志，应重新加审查。对于三中全会以后，尤其国际来信发表以后，在实际工作仍然执行立三路线而没有坚决彻底改正错误的表现者（特别是负领导责任的同志）中央应严格执行政治纪律，撤换其工作，加强其政治教育。当然同时要严厉加强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反对一切错误倾向及小组织破坏党的活动。

（三）为适应客观的正发展的革命形势，为集中两年以来党的工作经验，为彻底改正过去的错误，坚决执行新的正确路线，紧急会议上必须准备——在不久的将来，召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目前正在变动不定的形势中，当然不能很快的召集大会，当我们可以料想，在三、四月内有一个新的形势之开展。在这一比较明显的形势之后，党的大会是必要召集的。所以此时决定召集大会的大概时期是应该的。在预备全国大会时，中央及地方党部应在执行正确路线检阅过去工作，以备担任目前紧急任务及加紧实际工作中联系到大会的预备工作。——如收集各种材料，讨论党的各种问题等等。我认为我们如果是坚决执行正确路线，加紧实际工作，同时在实际工作上联系到大会的预备工作时，这是没有妨害的，而且更能提高同志的政治教育，使其彻底了解和执行正确路线，以加强党的战斗力量。

此信既送到三中全会中央，他们照例不理，置不作答。育南在某次会议上遇向忠发，严词质问何故接信不答。向诿称不知信内容。会后，向乃央文虎说：“请老兄向老林疏通一下，请他放弃召开紧急会议与筹备七大会议意见吧。”并说：“七大会在没有经过国际批准，

就是再等十年八载也莫浪弹。”育南旋从文虎处获闻向语，愤甚，连呼“老废物”不已！

按：随后林因参加苏维埃准备会议担任秘书长，乃推迟赴江西行期，及准备会开完，林拟成行，但被临时中央阻挠，加以◇◇名义终于没有成行，此是后话。

**四、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三中全会闭幕后，向等怙恶不悛，拒绝接受正确意见，且自以为从此逢凶化吉，大难过关，今后补苴罅漏，仍可稳坐地下王位，不料米夫对驱逐瞿等，扶植陈、秦早已胸有成竹，决不因彼等偷天换日手段而有所改变，因此三中全会结束不久，立即发起新的进攻。一九三〇年十一月，米夫以瞿在三中全会首鼠两端及其宗派活动为藉口，公开声言三中全会的决议是错误的，因此将瞿秋白驱逐于中央之外，同时将瞿派的中央委员会加以彻底改组。国际东方部随后对三中全会公开斥责，称三中全会瞿秋白草拟的政治决议是一个糊涂的决议，沙哈洛夫 Sachonof 在东方部说：“秋白在国际很驯服听话，但回国变样，玩弄外交手腕，在三中全会说立三承认错误太过火了，会长右派的志气。”同时马基亚 Maziar 云：“中共政治局内部的把戏国际莫名其妙！”

**五、树倒猢狲散** 东方部对国际执委报告瞿秋白有两面三刀的风格（按：此系上海白相人语），其实瞿秋白主持三中全会确曾说过：“中央并没有什么立三路线，向忠发中央路线就是国际路线。目前主要是反右倾，集中打击何孟雄等。”因此三中全会对立三路线错误造成的根源和责任是没有触及，也没有明辩是非曲直，而只是含糊囫圇下去。在瞿看来什么路线都是一样，只求自己不倒，便是革命胜利！后来瞿既被东方部废除，李立三便不打自倒，其余一伙也就树倒猢狲散了！

李立三本是一个不学无术、装腔作势的滑头流氓，这种流氓上海滩头多如蚯蚓。李立三平日那套政治油腔滑调，也不过用来吹牛拍马，欺骗吓唬小喽罗罢了。所以当他见到瞿秋白黔驴技穷，被东方部百般辱骂，浑身酥软，动弹不得的时候，他知道大势已去，无可挽回，于是立即向东方部屈膝作出沉痛检讨，摇尾乞怜以求自容。当时东方部断定立三路线是半托洛斯基路线，是盲动主义，反马列主义。罪状是李立三主张过：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已充分成熟，决定六月到八月在武汉、南京、北京、天津、奉天、广州、哈尔滨、大连等处实行武装暴动，同时在上海实行总同盟罢工。又主张过：立即消灭富农，建立集体农场与国营农场等等。这些罪状一经公布后，李立三便跨台了，结果他被赶出中央。

至此如同“树倒猢狲散！”李立三首先拜伏在王博脚下甘愿当小

媳妇（引李立三自白文句）。瞿秋白老奸巨滑，也忙着投靠米夫，忍辱含垢，摇尾乞怜，以期死灰复燃。其他残余份子为了苟延残喘起见，也均摇身一变，追随其祖师爷之后，浑浑噩噩度其驯服工具生活。他们且聊以自慰，认为：“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就是这样，这一伙如盲人骑瞎马似地被政治棍徒牵着鼻子走向自我毁灭的泥坑中去了！

### 三十五、四中全会篡党实录

一九三一年国际东方部非法召开六届四中全会，成立临时中央，是超越党章的非法行动。全党同志当时奋起揭露东方部祸党阴谋，予以反击，并纠正其错误。文虎自一九二八年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委员（即第四次连任中央委员）担任中央工委书记与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现就这一段时间亲身阅历有关革命史实，并参证当年党中央档案文献，扼要叙述如次。

#### 东方部祸党阴谋初败露

一九三〇年三、四月间，莫斯科东大一批学生即将毕业回国，分配工作，中央会议要各部负责人预作安排，以便统筹分配云云。五月间，留东大学习班结业，学生先后回到上海，中央将派到全总的名单通知文虎，共十名。其中有王明、博古两人。文虎在全总会上提出此事，并请大家加以讨论。会上有人谈到王明品质有问题，在一九二八年“六大会”做翻译时作风不好，王、博在旅莫支部作无原则的斗争，两人为人缺点很多，最近又发生泄露党机关的严重问题。但是也有人解说他们在莫学习时间很长，此番回国参加工作，正可在斗争中锻炼。讨论结果，叫他们暂留全总工作，以观后效。

过了几天，二人同来全总见面谈工作。初见时二人向文说了些面谀的话。文虎说目前全总南北各线需人很急，欢迎你们来全总工作。工作虽然艰苦些，但比学校生活内容更丰富。王明听了颇感局促不安，立答说身体健康状况不好，请勿派往基层工作。博说自己素无实际工作经验，愿先在全总学习一个时期，做些内部工作。大家见王身体矮小，萎靡不振。博古意志虚弱，畏怯不前，全总商量结果，派二人暂

在宣传部担任干事，并做些文字翻译工作。二人在办公室常主动找文虎谈话，并随时请文和他们谈各项工作问题。文虽然事忙，仍尽量为他们解答各项问题。

[注]：一九三〇年，王明在上海被捕时，供认红旗报编辑部地址，按党章第二十六条规定，泄露党秘密应开除党籍。

一、虹口公园游说 一九三〇年十月间，文虎因接见一位初次从外埠来上海中央接洽工作的工人同志谈话，王明闻讯跟踪而至，当文谈话方毕，正在离开公园的时候，忽见王从水池后面石山出现，匆匆走到文虎跟前，嗫嚅地问：“你们谈完了吗？”文虎漫应道：“谈完了，你有什么事？”他说道：“现在有时间吗？我很久就想向您谈谈，可以吗？”文答：“可以，请谈吧！”王开始谈。从谈话中知道他是有充分准备的，所以谈话条款分明，他一口气谈了一点多钟，归纳起来有如下几点：（1）王首先宣称他这次是负有国际特别使命回国来的。目前世界革命形势与中国革命形势都是非常有利，但是中国党的路线与国际路线并无相同之点，因此中国党的领导必须撤换，从上至下要彻底改组换班才能执行国际路线。（2）王对目前国内外革命形势说右倾是主要危险，目前国际在轰轰烈烈反右倾，中国也应该加强反右倾，向忠发领导的中央是右倾，苏维埃区整个都是右倾，一贯右倾、严重右倾，具体表现是富农路线、枪杆子主义、军阀作风、农民意识等等，是道地地反马克思主义。（3）王明特别着重介绍旅莫支部的英勇斗争事迹，说旅莫支部清除大批异己分子（指方维夏等），同时又说斗倒了校长拉德克、瞿秋白、张国焘、邓中夏等右派份子的详细经过，眉飞色舞，感到自豪，他强调说这是得到国际表扬的重大战果。（4）王说全总是工人干部精华所在，是党的中坚革命阵地，是反对机会主义路线的唯一强大支柱，国际对富有斗争经验和群众基础的全总同志寄以很大的希望，要求全总同志和他们一道完成国际所交付的重大任务。以后全总同志将会获得国际方面的更大信任，在中央政治局也将占有更重要的地位。他要全总写信给国际表明态度，着重说明与王、博双方合作情况。（5）王表示受国际委托回国进行上项工作，国际指定他与国际通讯用特别邮政信箱，外交信使往来便利条件等。他说全总经费可以考虑请准增加，全总报告可以直接寄往国际。（6）王毫不隐讳地炫耀他们已经组成强有力的“小集团”即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并说这是苏共党批准的组织，国际唯一批准的合法小集团。王向文游说很久，并转达国际方面负责人的问候。许愿说，今后文所提一切要求，均可满足。

继王明之后，博古（秦邦宪）多次见文虎请求详谈。博古自称原为苏州工专学生，面黧黑，右额际有瘢痕，以前由侯绍裘介绍与文虎

见过面。他自称爱好理论研究，长于翻译写作。他蔑视润之等生平未出国门一步，不懂任何西文，连共产主义 ABC 都看不懂，他们对马列主义来说是个文盲，怎能让他们领导中国党与革命斗争。他说，国际希望这些人到苏联去学习一段时间，学习总比不学习好，这样才能挽救他们。博古又强调说：“目前中共主要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是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在苏区是富农路线。现在没有真正的红军，没有真正的工农兵代表会议政府。毛泽东等一贯右倾，是红军军阀。”博古谈到青年学生主张消灭中间势力，中间派是中国革命最危险的敌人，他们比反革命阶级更坏。

王、博多次谈话，内容颇杂乱，说话间必称米夫，意思是说他们就是米夫的代言人，一切是奉命而行的。他们强调全盘改组中共各级领导机构，说是再来个“清一色”，问题就解决了。他们甚至透露已掌握了一个名单，哪些是应该打倒，谁该争取。二人直言无讳，毫无顾忌，对文表示坦白。二人向文一致要求对于国际路线（实即米夫的祸党方案）希望在中央工委系统和全总党委系统得到有力的支持。从王、博等人的谈话中，主要内容可概括为下列各点，即：通过召开四中全会实行篡党，成立王博领导的中央；撤换各苏区党、政、军的旧领导，成立王博领导的新机构，设立中央分局；以建立国际路线为名，推行比瞿、李、向等更左的路线，宁左毋右，唯我是真正左派！王又说他们这次回来奉有特殊使命，所谓特殊使命不是回来做一般工作，而是做中央领导工作，乃是自上至下，党、政、军领导机构全部鉴定，全部清洗，全部改造，言外之意，对大家“要吃敬酒，莫吃罚酒”。他们二人再三要求文在全总会议上介绍王、博出面作报告，文未予同意。于是又请文自己在全总会议上提出这个问题报告，作成决议、切实表态，拥护东方部所提出的全部方案，这样他们便可以此为据，回报国际，可以不费力气完成任务。当时文虎因王、博二人所谈问题独断专横，性质严重，拒不作答。

**二、中央工委谴责东方部狂妄** 文虎认为东方部狂妄行动关系不轻，随即在中央工委及全总党团联席会议（通常是联合举行）上作了报告。文把王、博集团的叛乱企图如实反映了，会议出席同志听了文的报告感到非常惊异，认为太荒唐了，确是一个意外的不祥事件。于是大家展开讨论，在慎重研究与详细讨论过程中，全体同志估计王、博此种狂妄言行不是东大支部所敢出此，幕后必然有更重要的主使者，王、博等不过是出面摇旗呐喊的小喽罗罢了。既然如此，王、博必然会有恃无恐，在党内掀起一场大混战，酿成一番大灾难。会议上全体同志激于义愤，表示坚决反抗王、博集团的错误言论和行动，也不赞成国际东方部的意见。立即写信给国际表明态度，坚决维护党章与革

命大业，申斥王、博一切反党言行。（此信直接寄国际，不经王明之手）。信的主要内容说明王、博品质不良，无工作能力，群众反对，不孚人望，万难胜任领导中国党与革命的重任，请国际慎重考虑。会议严重声明，谴责米夫扶植私党，破坏党章。如果他们一意孤行，公开篡党，工委、全总同志为了革命正义，立即奋起组织反击，义无反顾，实行击败米夫集团的叛乱阴谋。

全总的意向，一经表态，当时不胫而走，瞬息传播全党，人心大为振奋！王、博闻讯以后自知不敌，不敢乱动，立即仓皇上告，以待外援。不久米夫得王报告，立即动身来到上海，亲自督战，导演夺权一幕。

米夫（Mif、Puchimof、Marziar）一行到达上海后，召集心腹开会，听取报告，研究对策。向忠发为了讨好起见，献媚道：“全总诸人既然不识抬举，现在只有‘拉硬弓’一个办法，用力一压，他们就服贴了。”米夫乃决定蛮干，采取快速方法召开四中全会，只待“生米煮成熟饭”，那时便是既成事实了。这样米夫一面潜思默运，忙于向各方招降纳叛，组织四中全会班底，以求一逞；一面迫不及待举行四中全会，实行篡党夺权！他的如意算盘是：一声号令，全党乖乖驯伏听命，决不会有人敢吭一声，谁敢反抗，谁就倒霉！但是米夫一伙错误估计形势，他们的祸党阴谋一经暴露，便受到全党一致的反击！结果事与愿违，虽然蒙混一时，但是最后竟至一败涂地，博得全党痛斥，米夫本人亦一蹶不振，身败名裂，请君入瓮，饮恨而死！

#### 四中全会篡党之一幕

一九三一年初，上距中共“六大会”已历三年之久，在此漫长的岁月中，瞿秋白、李立三、向忠发先后所执行的错误路线，对中共与革命造成空前惨重的浩大损失。这样，全党同志是迫切要求召开全国代表大会，解决当前一切重大革命问题的。当时中共中央工委、全总党团及多数“六大”中委通过多次向国际方面申述此项意见，这原来是极合理的建议，但是当时别有用心的人心怀叵测，从中阻挠破坏，致使向李错误路线向前泛滥，江河日下，造成全党的重大灾难！直到一九三一年迫于形势需要，本应召开全国性第七次代表会议，但他们明知故昧，仍加以顽抗。

**一、瞿秋白的心病** 所谓别有用心的人，主要是指东方部的米夫与瞿秋白等宗派集团，他们各怀鬼胎，都感到召开“七大”是对于他们自己不利的，因此瞿秋白等在三中全会结束后，方自庆幸，认为绝

处逢生，临头灾祸总算滑脱过去了，从今以后如果拖延时日，仍可改头换面，重整旗鼓，卷土重来！所以他主张维持现状，不退也不进，反对任何改革建议。这是瞿秋白等人的心病，所以他们为了保全自己的派别利益起见，也不赞成召开广泛性代表会议，而附和米夫所主持的四中全会。

二、米夫的所谓国际路线 至于米夫却另有诡计，他多年以来处心积虑，千方百计想培植王、博一伙为其爪牙，但他们亦深深知道通过群众党大会的途径是决不能把王、博等哄抬出来，所以对紧急会议的主张也是极端反对的。米夫的策略是通过上层勾结，利用少数非中委的宗派讨价还价，虚张声势，才能把王、博等推拥上台。为了实现违反党章，名实不符的中委会议，为了为四中全会开辟道路起见，当时米夫等发动大规模的宣传攻势，力图在党内造成下面种种错觉：其一，将中国革命与东方部联系一致，即认革命只属于国际东方部代表，视二者为不可分离的统一体。其次，将米夫与王、博等视为代表国际路线的化身，由此得出结论：谁反对米夫与王、博即为反对国际路线，即为反革命。与此同时造成另一种错觉，就是说今日以前中国全党领导都无一人懂得马列主义革命理论，所以工作一贯右倾，一贯错误，一贯反国际路线，都是冒牌的马列主义，只有东方部几个人才是真传的马列主义。又由此得出结论，只有撤换党的旧领导代以新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中国革命才有出路，才能成功！

如所周知：关于国际路线问题，瞿、李集团素以左倾（派）自命，并自以为过去已在国际备案获得左派专利权，因此他们每人都贴上一个左派商标，指斥反对他的人一律都是右派。王、博一伙看中这个商标对于党内斗争有意想不到的效力，所以首先是向国际方面把瞿、李集团的专利权一手夺过去，同时采取占据左方高地战术，居高临下，向一切非本宗派的人开火。这种火上加油的左的竞赛，他们奉为国际路线，东方部视为百分之百的马列主义。通过上述宣传攻势取得成效后，于是米夫便进一步策动自上而下改组全党，一举而攫取党、工会、军队等方面的全部权力，采用宗派组织路线建立自己宗派独裁的反革命理论。

三、米夫炮制四中全会方案的过程 米夫考虑到迅即召开御用性质的四中全会，乃是直截了当的有效办法，于是他藉召开“七大会”条件尚未成熟，紧急会议对他本人说来更无把握可操胜算，所以积极筹备四中全会。

当时中央工委与全总党团负责诸中委，估计召开七次大会阻力很大，目前难以实现，于是退一步倡议召开紧急会议以应急需，并可由此击退米夫的诡计，于是向国际提出召开紧急会议，以补救宗派性的

三中全会。并建议紧急会议有广泛性代表，特别是工农代表参加。充分讨论党与革命诸根本路线策略等问题，藉以挽救党与革命的危机。中央工委与全总党团所倡议召开紧急会议对于米夫极为不利，米夫是坚持破坏的。因为如果召开紧急会议，则由于王、博根本未参加过国内革命斗争，在会议上必然全局失败，难逞私图，所以米夫一伙坚决反对紧急会议，不惜采取一切手段破坏紧急会议。向忠发及其一伙自觉以前追随瞿、李犯有严重错误与罪行，在群众中威信破产，所以想向米夫讨好，立功赎罪。乃向米夫进言，主张维持三中全会门面，这就意味着他们不同意召开紧急会议的办法。但米夫此时却不是这样想法，他认为三中全会虽然允许自己势力进入中央，但本派原定计划并未完全实现，因此乘机进一步反对三中全会，认为是调和路线。于是米夫、王、博继续攻击瞿向等，要他们从中央退出，把中央全部权力交出来，用米夫自己的话，就是“一锅端”。当时米夫的主要行动方略是采取分化办法，从瞿李集团内把向忠发、胡均和、徐锡根、◇◇◇等拉到自己方面来，藉以摧毁瞿、李最后阵地，于是瞿秋白原定掩护退却计划遭到挫败。瞿见大势已去，乃改为对王、博逢迎投降。不过瞿深知本人不能有所作为，乃令向忠发、胡均和等出头对王、博递劝进表，藉以保存一部分实力。

四、“六大”多数中委对米夫提出警告，反对召开四中全会 当米夫藉口召开“七大”没有条件，已决定召开四中全会时，“六大”极大多数中央委员又向东方部提出合理建议说：“如果为客观条件所限制而举行四中全会，那么四中全会只能遵守党章行事，即主要由‘六大’中委组成，而不能由非中委参加作主体。再则四中全会既非全国性大会，也就根本无权改选中央委员及中央领导机构，否则便是违反党章，属于篡逆行动了。”这个主张本是合理的，而且是维护党的组织与纪律，人所共喻的办法。但是米夫得信后感到进退为难。他明知道违反党章是全体党员所不容许，如遵守党章办事，他的政变计划便无从实现。最后他利令智昏，不顾一切，硬着头皮、赤膊上阵，甘心与全党为敌了。他乃决定以闪击方式举行御用会议，实行篡党阴谋计划。

五、四中全会违法行为及其破裂 通观四中全会的特点是包办代替，指派代表根本不通过选举，以便操纵一切。米夫在导演四中全会的丑剧中，为了在四中全会撑持门面起见，在会议前他纠合了个别旧中委如向忠发等工贼败类份子作为招牌以资点缀，这是他们施行掩耳盗铃、自欺欺人的手法。其次是把东大“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王明、博古等十余人引进会场，作为临时代表，滥竽充数。这些人既不是“六大”中委，又未参加过革命实践斗争，只不过是东方部的“自

己人”。但是即使这样做，估计还不能“足额”，于是又邀请几个政治掮客如◇◇◇等摇旗呐喊，做跑龙套。四中全会上，米夫、王、博集团方面代表十三人，国际代表三人，有王明、博古、张闻天、王家祥、沈泽民、夏曦、向忠发、瞿秋白、◇◇◇、顾顺章、胡均和等十多名，其中“六大”中委是很少的。米夫布置已定，觉得这样的场面，未免太不像话了，于是在万分不愿意的情况下，在开会前半小时勉强通知“六大”中央委员老史、文虎等二十六人出席会议。这些代表包括中共“六大”中央委员为主，以及中央工委、苏准会、全总中央机构的负责人，其姓名如下：史文彬、罗章龙、何孟雄、林育南、肖道德、张昆弟、袁乃祥、李求实、徐兰芝、沈先定、王凤飞、陈郁、王仲一、张金保等二十六人。（出席四中全会反对王明者有：罗章龙、史文彬、林育南、何孟雄、李求实、肖道德、张昆弟、袁乃祥、徐兰芝、沈先定、王凤飞、陈郁、王仲一、张金保、吴雨铭、徐渭珊、谭寿林、王克全、唐宏锦、余飞等二十六人。）

就上述出席四中全会代表成员加以分析，从出席人数数量与表决权计算，米夫方面均占少数，中央工委与全总方面占绝大多数，而且他们极大多数本身是产业工人或长期从事工会运动的领导者。米夫、王、博方面代表占少数，而且本身都是东大支部份子再加上几个一般机关工作吏员，长期脱离革命实践的游离份子，新型政治骗子等等。正因为这样，米夫明知要在会场通过有利于自己的决议，即通过合法程序取得多数，获取胜利，实现篡党夺权是丝毫无希望了！因此只有采用独裁方式，特务手段，操纵会议。特别是采用闪击式的袭击方式，用特务包围会场，制造恐怖气氛，使会议草草进行。四中全会的议事日程很简单，一是国际代表报告，二是选举中央机构。国际代表米夫出席负责实际领导会场，制定议事日程，起草决议，掌握会场发言，进行选举发决等重要工作，并在会上滥用否决权。主要出席人员，不是中委，但均有表决权。

在四中全会开始时，米夫首先宣布开会，会议按预先所拟定的议事日程进行。首由国际代表作政治报告，着重批判右倾思想，要求执行国际路线，强调彻底改造党的领导机构，成立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央机构。报告完毕，进行讨论。会上大多数代表对米夫报告深感失望，对王、博的篡党计划，代表们发言踊跃，认为违法乱纪，荒谬绝伦，抨击不遗余力，慷慨激昂，全场一片火热！最后由米夫起立宣布进行选举，提名王明、博古等名字，说明国际全力支持他们的决心。座中诸同志不耐，以脚擦地板，会场上一片嘘声四起，登时秩序紊乱。史文彬首先起立，代表今天出席的中委等二十六人声明选举不合手续，会议应即停开，宣告会议决裂。于是代表群起集体退席，走出会场。于是四中全会一幕

滑稽丑戏暂告闭幕，腾笑中外，贻讥全党！

当时出席四中全会绝大多数“六大”中央委员以及中央工委、全总党团主要负责干部，江苏省委代表，全国苏准会代表，北方区委代表，上海总工会、全国铁总、海总领导工作干部一致表示坚决反对四中全会，随同文虎与史文彬等退出会场，以实际行动抗议米夫代表东方便部的一切篡党行为。史文彬在会上讲话，强调指出四中全会是违反党章与党的纪律的。他说：“中共党章曾经明白规定：全国代表大会选出中央执行委员会，为中共最高领导中央机构。全国大会以外任何会议或机构不能产生中央领导机构，否则视为非法，违反党章的行动。中共虽然是共产国际支部，但共产国际应尊重中共党章，不得随意任命本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以外之个人担任中央领导成员，这也是人所共晓的道理。以上是全党党员共同遵守的原则，不得有例外，如果中共全党认为有需要改组中央领导，必须召集全国代表会议以解决之。”史的发言，简单扼要，斩钉截铁，闻者欢呼信服。

四中全会开会自上午八点半到十一点半，由于多数出席人坚决反对，被大伙吵闹散场了。原来米夫采用闪击式开会也只是为了挂出临时中央的牌子，完成一个提名王明等人加入中央的形式，因此会上更没有通过任何决议和文件。如果有什么文件的话，都是后来米、王集团事后编造自欺欺人罢了，实在不值得一提。

[注]：据盛岳著《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284页，注文引云：米夫一个通知全会立即召开，尽早开完散会，这次会只开了四、五个小时，全会只能对一些已执行的事实履行批准手续，使得反对派（文虎）没有机会准备和在会上提出他们的意见。

**六、临时中央的犯罪行为** 在出席四中全会多数中委退出会场以后，米夫事后公布改组“六大”中央委员会，米夫以加强中央领导为名，命令提名加选王明、博古、张闻天、王家祥为中央委员，夏曦、汪盛荻（汪浩）、陈昌浩、沈泽民为候补中央委员，王明、博古等为政治局委员。四中全会临时中央分工如下：书记向忠发，少共书记胡均和，宣传部张闻天，组织部王家祥，妇女部孟庆树，江苏省委书记王明（兼）。四中全会的特色是未经中委及党代表会，由米夫、王、博集团等实行自我选举。四中全会僭组中央初称正式中央，因受非委严厉指责，乃改名临时中央，外间则称假中央。中央之外，各省也仿照中央办法改组，如法炮制，在各地成立临时性的永久组织。

又“六大”时曾成立中央监察委员会，由史文彬任主席。因史为人梗直，瞿、向、李曾横加阻挠，中央监委遂久不集会，形同虚设，四中全会正式取消监察委员会。

临时中央决定给予瞿秋白停止工作处分。向忠发名义上是书记，



实际仍过其傀儡生活。李立三死党若干人分别停止工作。

四中全会临时中央主要干部以东大支部所谓“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为骨干，主要为下列各人：王明、博古、张闻天、王家祥、沈泽民、夏曦、陈昌浩、汪盛荻、王云程、杨尚昆、何子述、孟庆树、殷鉴、张琴秋、陈原道、朱阿根、朱子纯、何克全、肖特甫、李竹声、李元杰、盛忠亮（岳）、孙济民、宋泮民、杜作祥、王保礼、王盛荣、袁家庸、加徐以新半个，合计为二十八个半。上述诸人均分布中央或地方担任重要职务，除王、博、张、王任中央要职以外，如沈泽民派往湖北省委，夏曦任湘鄂西区书记，陈昌浩任四方面军政委，汪盛荻任江苏省委委员兼宣传部长，李亚克任河北省委书记，于芝生任天津市委书记。米夫亲自提出排斥异己的组织路线与干部任用标准，更规定对非宗派人员如“六大”所选中委等一律拒绝分配到重要部门工作。后来更进入苏区同样进行反右倾，反富农路线，排斥苏区革命党的领导地位，杀气腾腾，短兵相接进行残杀同志的斗争。

[注]：当时东大支部还有下列各人：李耿、潘闻宥（问友）、王忆子、于芝生、宋明诗、费侠、王琳英、刘明仙、周曼卿、李亚克、湘农、高其度、李沛泽。还有李剑如、李伯钊（女）、陈铁争（孔原）、傅继荣、孙冶方、郭绍棠、王舟之、章汉夫、陆定一、唐虞、竺廷章、朱盘盟、高文华、王备、杜廷、沈欢满、恽玉堂等，但他们大多数是反对四中全会的。

### 花园会议折冲记

四中全会破裂后，出席会议反对王、博集团的代表廿六人联名写信给米夫，内容是综合会上发言谴责王、博的意见，重申会议为非法，会议一切决议及违法选举应宣布无效。请转达国际，采纳多数中委的意见，重新召开紧急会议或七次代表大会，以解决党内的分歧。

一、花园会议发生的原因 当时由于广大党员群众与干部坚持召开“七大”或紧急会议，反对四中全会决议及其所僭组的中央，所以有人说当时米夫的胜利乃是头重脚轻随时可以垮台的，说到工作更不用说是寸步难移了。

临时中央成为僵局，一筹莫展，王、博感到惴惴不安，米夫为此事感到极大的苦恼，特召集部下商量对付方略。当即决定由米夫亲自出马对非委劝降，同时施展压力迫令就范，于是发生一方为非委，另一方为国际代表的双边会谈。双方会谈是在静安寺路地区一所花园洋房举行，所以称为“花园会议”。（此时非委尚未正式成立，为叙述

便利起见，姑先用此名词。）

二、米夫的策略 原来米夫内定夺权的方略总的说来是拉一派，打一派，联甲制乙，从中得利。他们认为瞿秋白、李立三是正面死敌，必须打倒，方弭后患。至于向忠发、刘少奇、◇◇◇等素来是两面派，二三其德，没有主见，可以加以利用，做猫脚爪，为他们火中取栗。只有中央工委及全总诸同志坚持原则，正气凛然，不可侵犯，又有广大群众基础最难对付。除此以外诸人更为余子碌碌，不足重视。

根据上面的分析，他们的具体办法是对中央工委和全总党委诸负责人要十分忍耐，尽纠缠的能事，企图实现分化瓦解，达到他们的罪恶目的。所以花园原定计划就是对文、史等施行利诱威胁，刚柔兼施，意在尽力拉拢，实行釜底抽薪。如文等仍不入圈套，则设法拉拢史等工人干部使文孤立。如二者均无效，最后便采取蛮干、残斗等毒辣手段对付，虽两败俱伤，在所不惜！

米夫集团计议已定，于是派秘书洪◇◇向文虎征求同意，大意是说：“国际代表米夫对四中全会发生的事件殊感遗憾！但这纯属党内意见分歧，双方原可以设法解释，使大家言归于好，因此建议双方举行一次座谈会，出席者一方为给国际写信联署名的同志参加，另一方为国际代表三人，要求真诚坦率地交换意见，直言无隐，如荷同意，请决定时间，以便回复。”文当即回答说：“可以，你先回去转告国际代表明晨再来听回信。”秘书去后，文虎在开会时即席向大家报告此事，在会上有人赞成，但是也有更多的人表示断然拒绝。不同意的理由是：非委的意见早先用书面送给国际代表，他们既悍然不顾，召开四中全会，似无再举行会议的必要，徒然浪费时间，且米夫诡计多端，其动机何在亦难预测。赞成的人认为国际代表即提议会谈，不管其动机如何，还是可以向他表示最后陈述，以促其觉悟。如能改弦更张固好，否则非委主张也可藉此大白于天下。这样，会上就决定同意与国际代表举行会议。次日，文虎即将此项决定通知国际代表，并经双方同意决定由中央政治保卫科主持布置会场以及警卫等等事务。

三、花园夜宿，一夕未宁 花园会议是在一所花园别墅举行的，所以称为花园会议。会址是在英租界新闻路附近空旷地区洋房楼上举行，由政治保卫局负责布置安全工作。会址有西式洋房一座，上下二层，房二十多间，附近有中式楼房一座，上下二层楼，有走廊，共有房十余间，附设厨房、汽车间，周围茂木繁花，地颇幽静。别墅四周有竹篱围绕，有前后两门分通中、英地界，出进甚便。前门临小巷，装有警铃，后门通大街，另一侧门极窄，通第三条马路。屋内有保卫人员若干人，各门进口设有岗位，装置电铃，高矮窗口设有瞭望哨，屋外亦有巡回哨，由顾顺章负责，各配给短枪，以策安全。顾向文交

代云：“如有警讯，一面抵抗，一面突围，统一指挥，分途脱险，一切听从文的吩咐，不得各自单独行动。”

一月中旬某日黄昏时候，非委中央负责诸人来到花园楼房，与国际代表举行会议。是日晚九时，文虎与其他同志分批来到花园楼房。进屋后，顺章引他到梯侧小室，与育南、孟雄同住，空气闷塞，令人难受。顺章在旁陪坐片刻默无一语，随即外出，有顷复入，神色有异，低声向文虎耳畔说：“请叫大家安静，莫慌……。”语未毕，匆匆而出。文虎往常知顾出入禁区，开枪杀人，面不改色，为何今夜神情不安如此，亦不便再问。孟雄见状，因问顾作何语，文虎便以顾所语告孟，孟略沉吟诧异道：“想此中必有文章……。”文虎急止其往下说，并道：“不必多疑，小心就是。”随即就寝。文虎倦极，倒床便熟睡，半夜醒来，聆孟雄尚转辗反侧，低声与育南小语。因问何以尚未安睡，明天怎样做事。孟说：“我耽心大家安全，实在睡不着。”稍停又道：“我们目前面临着局面正是夜长梦多，伤透脑筋！”文虎怕他不能入睡，影响工作，因劝二人暂且抛却一切，莫想什么事，一定要争取把明天的会开好。文虎临睡前仿佛闻有人声自远而来，开抵门首嘎然而止，大门即启，有几个人脚步声自外走入。从窗中外视，见憧憧往来，微闻有金属互相撞击声，顾往来指挥，以手势代说话。总之，花园之夜，情况暧昧，预料意外之事，随时可以发生。此时孟雄从梦中惊醒，甚觉有异，巡视室内外各地，向史文彬耳语道：“难免无事，我们一定武来武对，给他个有力的反击。”老史笑说：“大家是阶级弟兄，断然不可动武，头脑要十分冷静些！”二人议论一番，久久不能平息。文想到对方不顾大体，只逞意气，加以米夫诡谲多端，难免不出事端。一念及此，转辗反侧不能入睡。李求实见状，也感到不耐烦，于是二人起坐，绕室而行，筹思良策。李抚膺太息道：“目前情况是工人遇流氓，学生遇土匪，难处实在多。”文说：“用不着考虑太多，我们光明磊落，但求问心无愧好了，大家上床去睡吧！”这一夜大家在十分紧张的气氛中度过！

**四、文虎同国际代表对话** 次日清晨，文虎起床后将门悄悄带上，到邻室与育南商量问题（孟雄还在睡觉），商定今日会议由文、史、林三人主持，会场警戒由何孟雄与肖道德等三人负责。过了一会，翻译来见，面称奉米夫命，约文虎上楼谈话。文虎即登楼，进入客厅，米夫已先在，文乃与米夫先行谈话。当时没有翻译在场，双方直接对话。米上前与文握手，貌甚亲切，随即让坐。米坐沙发上抽烟，悠闲地发问：“您好！近日很忙吗？”文答：“Ganzgut！”米说道：“我们今日来此和大家一起交换意见……。今日会谈，本来有许多话要谈，主要方面希望你先了解国际的意向，认真说服同志们，让他们消除误

会，减少分歧，目的在求得对各项问题的共同一致，使全党发挥更大的力量。”言讫继续抽烟。文答：“我只能按自己的意见说话，不能代表别人……。”米夫忙插话：“不是这样说，你是党的老同志，有责任把事情担当起来，向来他们都听你的话，你不能推辞。你同意了，一切事就好办了。今天的会议很重要，大家都希望有很大的收获和决定性的成果！”文答：“我也希望这样。（Wieso!）”

此时另两个国际代表从邻室进入室内，谈话继续进行，其中Ma至郑重开言道：“我们三个人谈话是有关中国革命的关键问题，关系全党与你个人都是极其重要的，我愿意用全副力量来对待这个问题，请你也同样慎重考虑，如果不能实现预期的结果，那么，我们双方对共产国际就会感到失职了。”米夫继续劝说道：“除你以外再无其他适当的人能够完成这个任务了！所以我们今天一定要向国际保证此举，只能成功，不许失败！”语意甚为坚决。国际代表三人轮流发言，滔滔不绝，其目灼灼瞩文，希望文虎口中说出一句肯定的词句。但文虎聆毕，只是淡然答道：“你们的话，我都明白了，我们大家的意见已在致国际信中表明，今日应请米夫同志当众答复，一切问题当可迎刃而解。”米夫说：“此信已转国际，我个人暂不能代为作答，要求你今日把会开好。”文虎道：“（非委）全体的意见自非我个人立谈可以解决，一方面应让大家充分表达意见，同时请你详细考虑。”话尚未完，另一国际代表P从旁窥察，见双方神情谨肃，气氛不甚融洽，乃乘机进言，故意打趣说道：“请允许我来说一句吧，目前问题看来很复杂，其实也很简单，Ja oder Nein！（同意或不同意），你说对吗？”文答：Jawohl！（确系如此）大家勉强一笑而散。

文虎辞出。从短短的谈话中看出来米夫为人老奸巨滑，城府极深，喜愠不形于色，擅长外交词令，是其特征。其余随从P、M、诸人大都是鲁莽无知，唯命是听的打手式人物，不必多表。室内育南、文彬等怀着焦急等待的心情问文虎：“毛子们讲些什么？”文说：“没有什么！大伙到客厅谈谈罢！”大家坐定，文虎把三人对话情况一一向大家讲明白了，大家齐声说：“不要动摇，站稳脚步！”

[注]：Jawohl一词，语意双关，有两可的意思。

**五、政治逻辑，强词夺理** 花园会议是一方为“六大”中委文虎等二十六人，对方为国际代表米夫等三人所举行的双方会谈。当日上午八时会议开始进行，出席者：一方是非常委员会中央全体委员，江苏省常委，苏准会，全总常委文虎、育南、文彬、求实、孟雄等廿六人，另一方是国际代表M、M、P等三人。翻译二人冯乃甫、李梅羹。会场主席文虎，记录育南。国际代表首先发言说：“今日会议是说明性质的会议，但是非常重要的会议。目的在传达国际对四中全会的所

采措施的理由，同时也听取许多中委与监委及中央级省委以上干部的意见，以便传达国际。”他说话时态度温和，语气凝重，目视众人，以观会场气氛。随后语气忽转，继续往下说道：“今日会议是不包括瞿、李分子的重大会议，所以也是行动性质的会议，是推动工作进展的大会。因为徒有决议而不实施，决议亦成空谈。”又说：“四中全会是国际所决定，中国老一辈中央干部有责任贯彻会议决议，同志们应迅速行动起来，努力工作。”其次说到成立临时中央问题，作了冗长的解释，谓中国同志理论水平低，王等为学习较好的马列主义者，应该受到全党的重视。并且此举在中国已有前例（按，指“八七会议”）中国同志怎样能采取前后两种不同态度来对待。继又对于反四中全会同志占党的绝对多数的事实加以解释，说：“形式的多数不能算多数，赞成四中全会的虽占少数，但也不能算少数。”语多强词夺理。最后说到党章问题说：“党章不是天生的，是人工制造的，既然是人工造的，也可以把它宣布作废。国际是有权批准一切的，也就是说可以授权任何人，剥夺其他人的权利的。你们对党章问题，多数与少数问题纠缠不清，这是学究式讨论，有何意义？大家应理解：国际具有无限权力，必要时可发挥否决权的作用。”他在为王明叛党事件辩论时有如下妙论：“王明虽然犯过组织纪律错误，但他们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政治上很正确，革命没有他们是不行的。有些人虽然没有犯过这类错误，但在政治上一贯右倾，我们是一个不容许的。有些人虽然犯过更大的政治错误，但是现在只要拥护新的临时中央，国际一切可以不问，这就是你们的榜样，难道还不明白吗？”

米等三人先后发言，近二小时之久，翻译时间又加了一倍。当他们重复地说上述教义时，大家已不耐烦，为了会场纪律计，仍保持静穆，直到词毕，已届午餐时候，报告才告一段落。这天国际代表三人说话前后经数小时，说话时由翻译分段口译，讲话完毕时并将发言大纲底稿交文虎阅看，同时在座的国际代表又作了若干补充。全部讲话翻译完宣布休息。在休息时间，国际代表约文虎到小屋里，表示下午不要他好好掌握会场讨论，并问他有何意见？当时文虎十分生气，但不要他立即发作出来，只说：“让大家发表意见再说吧！”随即离室。大家见状，上来把文虎团团围住，问东问西。文虎说国际代表要求直接听到每个人说话和你们的真实意见，大家可以自由发表，直言无隐。午餐后继续开会，按报名先后发言，每人限制时间为十五分钟至二十分钟。

六、唇枪舌剑，米夫败下阵来 会议开始，首由史文彬发言说：

“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已经十多年了。我们全体党员热爱列宁手创的第三国际，尤其是热爱中共，热爱中国革命。我们尊重国际

东方部，欢迎他们的正确领导，但不欢迎错误路线！这次四中全会是非常不幸，原因是违反了中国共产党与革命的根本利益，这是国际受了蒙蔽所产生的结果，我们不能盲从，请求国际以中国革命为重，对四中全会决议收回成命，定期召开‘七大’会议，解决党的一切问题。”史又说：“我们素来爱护国际，正由于他领导工人们走正当的革命道路。现在中国革命面临危机，但是只要路线不错，中国革命到底是会成功的，用不着过分担忧。不过四中全会的路线仍然不能称为正确路线，我们已经屡次用书面向国际和全党说明这一点了，我们大伙儿不乐意拥护它。但是国际为私见所蒙蔽，忽视绝大多数党员群众意见，可见国际对中国革命是不够重视，这是不负责任的表现。总归一句话：目前问题中心是革命利益高于一切，千万不要拿革命当玩意儿。国际处理问题要对中国全体劳动人民，对全世界革命群众负起责任，我们始终拥护国际这样去做，而不同意违反这种精神的任何其他的做法。四中全会就是严重违反了这种精神，必须赶快纠正过来，如果不纠正过来，一定要给中国革命带来重大损失，到那时候任何人都不会衷心拥护它了。”史的话义正词严，斩钉截铁，全场肃然叹服。

随后常委唐宏锦继史发言，说明四中全会再次超越中央的做法是违反党章与党纪的。党章、党纪是革命的根本，对于为了方便私人，破坏党章党纪的事，国际有责任出来加以制止。广大党员群众是坚决反对取消“六大”合法中央另以非法的少数人宗派统治去代替它。应立即召开紧急会议纠正四中全会的错误，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消灭宗派循环统治现象，才能端正党的政治路线，才能保证革命迅速成功。

唐说完，王凤飞起立，针对上午国际代表论点一一加以反驳说：“我们为了保卫革命，保持党的尊严和革命传统，不能不向国际进逆耳忠言。国际要保持威信，就应立即停止四中全会临时中央行使职权，撤消向忠发书记，召开‘七大会’或紧急会议，重新树立正确的政治路线。如果不是这样做，那么将来跟随四中全会后中央所发生的一切危害革命的恶果，国际应该负严重责任。”

苏区代表肖道德、陶兰、徐朋云各就非委主张加以解说，并用事实驳斥王、博等对于苏区政策的诽谤谩骂。徐说：“国际一再取消全国大会选出的中央机构，而另换一些与革命不相干的私人组织中央，试问还要党章不要？还要党纪不要？长此下去将引导党走向哪里？”肖说：“我们在城市革帝国主义与资本家的命，在农村革地主的命，王、博则从东大回来革工农的命，这是何道理？国际应作说明。”

还有其余的十多个出席代表根据提纲内容作了专题发言，差不多每人都就一个专题表明了自己的看法，要言不繁，讲明白了。他们对米夫与王、博集团的错误言行，针锋相对，毫不放松，象连珠炮发射

似的一一加以驳斥和谴责，劝他们以革命为重，停止篡党夺权行动，悬崖勒马，知过即改，这样全党方能原谅。否则东方部负责人一定会垮台的。各代表并向国际严正声明，东方部滥用职权，建立宗派统治，违法乱纪，应受纪律处分，并一致要求否决四中全会及其一切决议，定期召开“七大”或有广大革命工农群众基础的紧急会议。国际代表听了上述诸言论，面面相觑，理屈词穷，无言以对。

**七、国际代表踉跄下楼** 国际代表一面听冯口译，一面阅读李梅羹送给他们的在座各人发言译文记录。他们起初故作镇定，抽烟静听，继则表示难耐，离座起立，绕室彷徨，最后竟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气急败坏，要限制大家继续发言。主席佯为不理，让大家继续讲下去，这样，出席的人差不多都表达了他们自己的意见。会议已历时十个小时，时间已近黄昏，随后主席总结一下，随请国际代表说话。他们推出一人讲了一刻钟的话，总的意思是：我们（国际代表自称）对于今日会议完全感到失望，这证明你们是有组织、有纲领地来反对四中全会，已经走向反国际反党的道路。最后几句话语气气促，致无法译达，但口气仍然是很武断的。当他们听到代表们责难国际，指斥东方部处理失当，要求国际严肃处理，竟抑制不住心中怒火，圆瞪双目，面色铁青，愤不可遏，一怒而起，破口大骂：“你们反对四中全会领导就是反革命，叛徒特务，一律开除中央委员和党籍。”词毕，三人相率退席，怒气冲冲，踉跄下楼而去。

此时会场主席宣布会议停止讨论，并即席宣布对国际代表退出会场的错误行为表示抗议，并作成简短决议，作为这次会议的结论。嘱秘书处将决议全文附会场记录一份，送交国际存案，双边会谈至是告一结束。大家觉得这次大家把观点说明白了也是一件好事，而米夫等竟是一无所获，他们预期的分化瓦解工作，只是徒劳梦想罢了。

**八、众志成城，化险为夷** 花园会议结束，当时大家目送国际代表踉跄下楼，然后大家起立，准备有组织有步骤分批离开这座房子，由育南统一指挥，立即行动。不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此时，顾顺章忽然匆匆走进室内，满头大汗，神色有异，冲口而出说道：“外面似有警情，大家不要动弹，不要出门。”文道：“既然有警，准备突围，速行！”顾又改口说：“不必声张，稍等一等。”因问文：“谈话会破裂了吗？”文告他会议已经结束，你应负责送走他们三人，让他们安全离开我们再走。随即闻外间汽车发动声，三人匆匆登车。估计他们已离去远了，此时顾忽传达向忠发有话：“你们今晚留此过夜，以后再走。”原来向忠发有命不放代表出去，藉施武斗。何孟雄洞悉其奸，不待顾词毕，大声喝道：“别胡闹！我们工作十分繁忙，平白耽误了一天，损失已属不小，再留此为何？你们想捣乱吗？太不自量，

要放明白些！”育南发令各小队准备立即出动，顾坚持饭后再走，文虎上前向顾问话：“为何不让大家走？”顾语塞，只见顾身微偏斜，右手握手枪插裤袋内，他后面还有某生跟着，甚有剑拔弩张气氛。大家见状立即上前，以身相蔽文，此时顾面色如铁，急促向文道：“请叫大家今晚勿要走，如果走就难保安全。”仲一不待其辞毕，斥顾道：“我们一定不留！”顾说：“这样我就不负安全责任了。”何说：“不关你事，安全不安全，我们自己负责。”育南即教大家分组排队分三班六小队由前门、后门、侧门分批离开会场！并决定文、史二人先行，自己断后。文说：“史可先行，我愿等待大家安全离去后最后一批走。大家安静些，否则要出乱子。”育南即令第一批出发，走到门口，门已上锁，有人把守，不能出去。回报文虎，文虎即去找顾，但一时没有找到他，想已不愿见面。几个工人冲到门口，叫守门人略一迟疑，一个工人同志上前夺去其手枪，守门人立即启锁开门放行，第一批同志才出去。此时顾匆匆来找文虎解释，说话支吾其词。文虎责以大义，要他不要听向忠发乱命，不要胡思乱想，好好保护同志安全，顾诺诺连声说：“是！是！”夺门一幕遂告结束。

时已深夜，顾又出现在院中。文虎、求实见顾唉声叹气，频频摇头，盖深恐向忠发见罪。文、李二人立在客厅，估计大家已安全脱险，二人乃最后一批自侧门走出，顾临行犹来门口相送，表示歉意。此时街上行人绝迹，文、李二人回顾今日之会，众志成城始告脱险。李对文说：“我们对米夫总算仁至义尽了。”事后克虔告仲一，始知顾原想奉命扣留文等过夜，相机行事，后见事机已露，兼畏群众威力，无法执行，遂尔中止，否则龙华惨案早先在花园演出。

出门后，文虎与伟森及另一青年工人同志走在最后。时已深夜，他们都不便回沪东寓处，三人即往日升楼附近小旅馆投宿。文与伟森共榻，久久不能安睡，回思花园会议诸幕，内心十分痛楚，觉得今日党内反常现象，苦恼万分。伟森说：“我欲辞去一切职务。”文答：“如为你个人早就该辞，何待今日。事到如今，若任米等这群奸人闹下去，结果将同归于尽，更何以对党员大众？”伟森同意一切问题应付诸明日全体大会具体解决。

### 石路宾馆座谈

花园会议以后，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正式成立，并发布庄严声明（反四中全会提纲），号召全党共起救党运动。从此时起，党内大是大非问题已十分明朗化了，大家鼓足勇气共同奋斗，但是还有个别同

志认识模糊，特别是那世故阅历较深的同志仍不免瞻前顾后，不敢挺身向前介入正义斗争。说什么“一朝天子一朝臣，认庙不认神！”当时非委宣传部经常收到各地同志来信，要求解释有关非委纲领或其它当前有关工作实践问题，也有些同志关心非委工作情况，亲自来访提出问题并请求解答。非委一律予以接待，进行解释。

一、蔓伯游谈 非委中央成立不久，一日，文虎忽接夏曦（蔓伯）一信，内称他已回国，盼望有机会和文虎谈话。文随即给他复信，约时与他见面。（夏为新民学会会员，与文虎交谊十余年，北伐时共寓汉口友益街）届时文虎偕刘炎同往石路宾馆（非委中央对外交际处）晤夏（刘与夏同乡，亦识夏）。夏见文虎，略作寒暄，话别后三年来生活。夏曦见文虎时口称“老友”，说：“我是私人拜访性质，并非来作说客的。”文笑答：“只要于革命有利，什么话都可以谈，畅言无阻，何必拘束。”于是夏从东大学习三年事谈起，并及长沙旧友何叔衡等人现状。叹息大革命时机稍纵即逝，岁月催人，中年哀乐，迥异畴昔，不胜今昔之感！随后谈话渐渐转入正题，夏动问非委与米夫等人的分歧可否设法消除。刘说：“你见非委公布的纲领否？”夏云：“见到，已略知梗概。”因问非委这样做不怕冒分裂党的罪名吗？文虎说：“分裂党的工作是米夫设计，王、博执行，授意者当然尚有其人，他们应负分裂党的责任。非常委员会成员大都是六届中委，非委所属的组织都是原来党的组织。反之米夫王博的中央才是从东大支部搬来的，所以王博的临时中央实在是与党无关的野孩子。”夏云：“这自然是非委的正统逻辑，而不是米牌逻辑，一个革命党应该通权达变，难道野孩子不能变成家孩子吗？”文虎道：“蔓伯兄，你是富有官场生活经验的人（夏曾任湖南省工农厅长），非常委员会的人怨无此雅量。他们只辩正谊，为革命打抱不平。”夏自解嘲说：“老兄莫讲笑话！我知道你们是瞧不起王矮子的，老实说，矮子人小，本不值得大家反对，可是他的后台很有份量，难道不值得考虑么？……”刘鄠在侧，插言道：“蔓伯先生，你也是一个星主（按，夏亦二十八宿之一），也是很有份量的人，但是我们革命总不能抹煞是非，专论份量，要知道任何有份量的庞然大物如果违反工农革命利益，也不免会土崩瓦解的，何况……。”夏不等刘语毕，起立近前语文虎道：“文虎老哥，你我老朋友，所以不嫌冒昧，披肝沥胆向老兄进一言，革命道理是有弹性的，可方可圆；权力是现实的，不折不扣。你们的调子实在太高，调子太高就不符合实际，缺少适应性，我奉劝老兄把格调放低一些，要讲点策略。我看清楚米夫已下定最大决心，不把非委问题解决，决不开上海，他们有什么做不出的事……。你们在大革命以后苦学苦干，工作卓有成绩，有群众基础，同样也受到国际重

视。现今国际方面的观点是你们与王、博合作是革命需要，分则两伤，合则两利。目前问题的关键是在你身上，你占举足轻重的地位，只要你一转念，诸事就好办了，你说对吗？”又说：“国际路线如水在盂，可此可彼，是有可塑性的，权力是现实的，不可动摇。国际对王、博成立中央已是一年前久已内定的事，纵有强大阻力，也不会甘心中止。如果同志们不估计到这一点，双方坚持不下，互不肯让，那么将来一定会两败俱伤。如果不幸这样，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历史功罪，关系非同小可，想老兄是完全理解的。”夏上述一番议论所谈诸话，自然是真实情况，也是代表米夫的论点，他是各为其主，原无足异。文虎正容说道：“今日问题关键确在双方，决不在单方面。大家一致说王博不能领导中共中央，如果米夫认识到这点，就是勇于改过的人了。系铃解铃，全在米夫一方，要明白这决不是私人斗气，是历史是非问题，也是个党章问题。”夏说：“原来我见不及此！自己有些主观，但就米夫一方言，要他们认清这一点却是不大容易的事。他们先入为主，不是今天才如此。大水牯行小巷内实在转不过弯来。”双方正谈话间，老史、老林从外面进来，手执非委告全党同志书，致国际信等文件，顺便送交一册，夏重复坐下翻阅一过，向育南说：“提纲中文字对米夫方面批评很深刻，一方面是有胆量，但同时也未免太意气用事了。毛子说，你们的文件说得未免过火，一切话不留余地。”育南正色对夏说：“你要明白这是关系到革命前途成败问题，关系到革命历史上的重大是非问题，关系到千百万党员与工农群众的生死存亡问题。如果你们不从这几个方面去判断，那才真正是意气用事了。”夏面红语塞。育南又云：“我看国际无此勇气正视自己的错误，如坚持错误，什么也是白说，难道要我们告饶不成？烦你回去进言米夫，好好劝说一下，要他们严肃注意自己的错误决策可能发生的一切严重后果，不要拿中国革命开玩笑。这就够了，再没有别的可说的话了！我们是要争百年是非真理，不管一时成败的。”此时夏见林、何、史有些动肝火，态度庄重，知不可撼动其心志，暗自思忖，纵往下说也是无用的了。此时刘炎向夏说道：“蔓伯先生如能提出一个方案，既不损害革命，又可和平息争，那就很理想，否则群众是不能理解也不能接受的，你看怎样？……”夏说：“目前大家火气正高，老兄应该好好说服他们勿趋极端。”文虎答：“你难道不晓得极端不能单方面存在，你应回去向矮子多多开导。”夏又说：“相骂无好言，打架无好拳，对方是很恶毒的，什么事做不出来？矮子在国内名不见经传，无籍籍名，但是很受国际重视，这一点应有认识。”谈到这里，夏起身告辞，临行握手道声再见，旋又站住俄延一会，自言自语地向文虎说了几句珍重治疗胃疾的话，忽说道：“此一去恐后会无期。”言迄自

去。夏旋赴鄂苏区，任书记，在洪湖落水而死，遂成永诀。

二、怪君赠言 夏曦去后，来找非委谈话的人络绎不绝，有赞成非委主张的，也有抱调解态度的。柯庆施（怪君）亦来晤见文虎。柯怪君，安徽歙县人。一九二二年往北京，原是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会员，由北京中共小组派遣参加远东会议的一个代表。他写过参加远东大会经过的通讯，在北京党报上介绍大会情况。一九二三年文虎在上海中央工作时，怪君被派到安庆，是安徽党组织负责人之一，因此，多年以来与文交往相识，很谈得来。

怪君此次访文，自称是第三者。他虽与王明同乡，但与王素昧生平，毫无关系。他说：“这回我是来上海看灯的（意指走马灯）。我阅读非委发布的提纲指名批评米夫及临时中央的主角与配角共有十人之多（配角指附王份子），真是敢于捋虎须、批逆鳞的行为，但是树敌过多，未免太不讲策略了。我个人很为非委同志担心呢！”伟森在旁忍不住答道：“老柯同志，你的话固然有理，但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你应了解非委同志当前任务，主要是要尽力把革命大船抢救出来，因为如果大船被人弄翻沉了，革命全局都要遭受牺牲，自己也莫想得救了，所以决不能从个人利害着眼看问题，否则就没有正确的路可走了。”怪君闻言，笑道：“请同志们不必动气啊！我们是多年知交，我今天披肝沥胆向老朋友进一言，请勿见疑。”他说，大家都认为王博在党内是微不足道的小人，正因为这样，他们才能显出特种作用。在政治上王博一伙原属鼠窃狗盗之辈，其本身属于宦官宫妾寡廉鲜耻之流，但这样便构成他们搞阴谋诡计与宫廷政变的优越条件，舍此以外老爷们是再也无法找到这样一群喽罗的！所以你们不要小觑他们，他们成事不足，败事却是绰绰有余的。由于上述理由，所以在米夫与王博方面说起来不管有理无理，目前国际批准王、博组织中央，同时也有心排除王、博以外的人领导革命。这是千真万确，决不含糊的事。你们虽然有强大的群众基础，但是如果反对他们，他们便会假借国际路线作挡牌，东方部为靠山，狗急跳墙，不顾一切，进行不客气的残酷斗争。就是把整个革命断送了，他们也不在乎。他郑重说：“我这些报导你们不会完全不晓得，既然知道，又偏要在太岁头上动土。我很佩服你们的勇气。俗话说：‘打狗欺主’，你们这样干，未免太不识时务了。老兄岂不闻识时务者为俊杰这句老话么？反党、反革命的大帽子马上就会搬出来给戴上的，你们赶快醒悟过来吧，还不算迟呀！”他又说道：“米夫本身无甚力量，临时中央几个少数份子也不过空头政客，但支持米夫的人却在目前拥有实际权力，立于举足轻重的地位，这是逆流主力。因此目前与米夫等硬碰或者不难可以将其驱逐，但他们必不甘心失败，他们疯狂至极时一定会不择手段，采

取报复，造成对内恐怖。如此我们将处于内外夹攻地位（双重恐怖），革命前途非常危险。”他最后诚恳地向文虎建议“急流勇退”，这是上策！办法是暂时出国休养。他劝文虎把胃病治好要紧，百尺竿头，姑让一步，何必与他们争一日的长短呢？……

文沉思一会，婉言谢道：“这些事我们都知道一些，大家也仔细考虑一番了。我们决心用群众意志回击王、博，扭转米夫一伙的错误做法。我们目前所说的话对某些人来说，不免是沙漠弹琴，我们目前所干的可能一时还办不到，但是锲而不舍，持之以恒，时间总会解决问题的。即令我们今天没有能力完成此项任务，不过大是大非既已公开提示出来，后来的革命同志也会继起奋斗，跟着我们的脚迹前进，我们不会寂寞的，最后一定使是非辨明白的。米夫一伙也一定会遭受历史的嘲笑的。革命大业难道就只顾目前成败和名位吗？难道赤裸裸地信仰‘有奶便是娘’的原则就算心安理得吗？……”怪君不待文辞毕，忙改口说道：“我自知有些失言了，请老兄不必见怪！但是我向你所说的是真话，供你参考罢了。我姑妄言之，你姑妄听之就可以了。”

三、王首道主张息事宁人 非委成立后，从湘赣边区来到上海接谈者有王首道。王通过陈虞卿到非委找文虎谈话。王原与陈虞卿（罗章凤）在广州农运讲习所同班肄业，后二人同参加农暴。王回乡间领导游击战争，开辟湘赣边苏区。王曾参加占领长沙十天战役，王与文在车站界路旅馆共宿一宵，对占领长沙经过报告极详。并说明当时处理苏先骏问题的经过。随即问及王、博临时中央事。文虎将近年党内情况与王细谈，并告非委会对党事的主张。王认为米夫宗派活动是革命当头大灾难，上海如此，苏区恐难幸免，他很同情非委主张。虞卿说：“见蛇不打三分罪。”力促王及时奋起，共同把党从危机中拯救出来，迟恐不及。但王首道明知米夫罪行，却主张息事宁人，静候东方部安置。他又说：“王、博行为，大失全党同情，所谓多行不义的人，决无幸存的道理。”王回湘后碍于事势，隐忍不发。王后回到湖南东区苏区与苏平化、王恩茂等被王、博判为右派分子，同受处分云。

四、王任谈东大支部状况 王任新近自苏学习归国，他在东大时素不直米夫等人所为，回到上海即流落无处栖止，但坚不找临中。虞卿介绍其往某工厂参加生产，王欣然同意前往。刘鄱把身著外衣送王典当暂维生计。一日，王来谈到东大支部生活，史问王、博是何等人，东大支部斗争些什么事？王说：“在米夫导演下的东大支部斗争是很残酷的。当时人人检讨，个个戴帽，闹得天昏地暗。王、博一伙是附和米夫积极为恶的，除他们自己外，别人都是右派。但是大多数同志是向米夫坚持抗争的，不顾诬陷，一律给顶回去。有一个同志名齐冠森，原为下关铁路青年工人，眼见残斗种种不合理惨象，痛斥米夫说：

‘支部作风将来带回中国，他们还能不剥人肉，煎人膏，吃人肉馄饨吗？还能不象军阀一样穷凶极恶去犯滔天罪行吗？’”支部同志龚明在东大时因反对米夫，归国时，支部不为作正确鉴定。龚不理睬。归国后适四中全会斗争发生，龚更耻于依附王、博，要求非委给他工作，他向人说：“用棒打狗才是好法子。我学习三年，体会到这一点，总算没有空过。”又说：“王、博等人原来都是草包，他们是在大腿挟扶下爬上领导地位。演出这场木脑壳戏，不仅是当前中央耻辱，同时也是国际革命史上的怪现象。党事如听米夫蛮干下去，不分青红皂白的大砍大杀就要搬演到中国来，主持革命正义的人将无一人可以逃避。”王任又说：“王、博一伙原来是一群小鬼，但米夫别有用心，却把他们化装成‘布尔什维克’打手，来吓唬胆小人。米夫多次在党内因风纵火，就是利用这些东倒西歪，假充醉汉的喽罗为他呐喊。”他又谈到米夫党内斗争的基本策略是首先诱降全总为中心的中委及工运干部。如果这一着成功，就可以说掌握了全党。至于其他的人只要把右派帽子一扬，他们就会乖乖听命的，用不着费多大气力。最后谈到王明个人人格卑鄙，善窥人颜色，承上司意旨。在东大时期奔走米夫门下，胁肩谄笑，顺口接屁，对米亲昵有逾寻常。王明在“六大”任翻译趋侍上司，日夕不离左右，对出席代表飞长流短，乘机进谗。因此许多代表说极其下流，心怀叵测，鄙其为人。王明在米夫门下受到长期的党内斗争训练，构成一种特坏品质。东大支部曾为王明写了一种群众鉴定，大意是：王、博披马列外衣，打革命旗帜，对党包藏祸心，非破坏到底，誓不甘休。胆大妄为，专好下大赌注，赢则归己，输便抵赖，毁人成己，见好必妒。其拿手好戏为陷害同志，狐假虎威，残酷斗争。综王思想和行动可称为革命队伍中的败类。大家都认为这鉴定与王品质行为完全吻合。

在东大支部中积极从恶的只是少数几个人。他们心目中只有个人私利，所以不惜卑躬屈节，仰面事米。他们甚至说：“天下无不是的领导，领导命令不容怀疑！”但是这些谬论是不值一驳的。后来米夫倒台，更证明他们自称布尔什维克是丑化了布尔什维克，并为中国革命丢脸！

**五、阿郁来去** 阿郁（陈郁）原是海总主任，全总常委。在四中全会上积极反对米夫，认为米夫一帮真是无理取闹，破坏革命，并判断他们犯罪行为一时不会收场，今后还会发展。郁随后参加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工作。由于米夫发动残酷斗争，龙华惨案发生后，在政治上发生动摇，他便不能坚持，表示消极，离开战斗岗位。他向文虎说：“我们非委对米夫总算苦口婆心的了，但是对牛弹琴，牛耳不闻。如果能在它脑门上砍三大斧，说不定才会发生一点动静，但是不能采用

这个手术，所以目前只好避开一着，听其演变下去。因此，我打算仍回海轮工作。”经文向他解释，勉强留下。后来他又向非委中央陈述个人对东方部表示失望，他说：“四中全会就象一场恶梦，以后中国革命灾难重重，更难乐观。”最后他写了一封信给文虎，表示请长假，要离开上海。文虎闻言百般劝告，勉其作海上田横。他说：“回船上去自觅生活，再不问什么事了！”又说：“非常委员会有这样多人，缺了我一个也没有什么关系，看米夫一伙横行到几时，将来自会栽筋斗的。”非委中央后来又派寿林前往挽留，恳切开导，但是已来不及了。寿林归报：“阿郁趋炎附势，未能免俗，他将是官僚队伍中人。”后阿郁仍投靠新主，自称虚与周旋，在“七大”当选中委，于一九七四年病歿。

## 三十六、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

一、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的起源 文虎出席花园会议回家后，由于胃病复发，大家劝他卧床休息。正在这个时候，有几位中委及各省负责同志前来看望，谈到今后工作有关问题。大家认为国际单方面召开四中全会失败以后，随后又举行花园会议，双方谈话由于米夫专横，所以仍然无结果。经过两次群众教育以后，国际代表毫无悔过之心已昭然若揭，显然不是凭口舌可以令其改悔的了。

又自一九三〇年三中全会到四中全会期间，米夫为了策动王、博篡党，实施夺权计划，扰攘了很长时间。在此期间，全党日常工作中断，完全陷于瘫痪状态，而四中全会以后，王、博等怙恶不悛，忙于党内施展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不惶它务，所有革命工作更无法推动。此时大家正感束手无策，乏计可施。由于革命工作旷日废时，迫切需要加强党的领导，基于上述种种客观原因，他们说党内各方面已开始酝酿成立中共全国委员会，以便继续工作。同时主张去函第三国际说明理由，请求迅速派公正大员来中国实际调查，解决纠纷，以利于迅速开展革命工作。

二、对于采取非常措施的辩论 但是建立中央的问题在党是无先例可援的，而客观要求却非常迫切，因此必须征集各方基层，询谋僉同，才能付诸实施。为了慎重处理问题，征求大多数同志意见起见，非委中央负责人决定从下至上，从中央到支部发动对此问题进行充分讨论，完全采用民主方式解决这个问题。在讨论的过程中先后存在着不同的意见，并且发生过很激烈的争论。绝大多数人站在革命正义方面，主张采用明确的组织形式与米夫及其爪牙作斗争。但同时也有些人从另一角度考虑问题，主张等待机会，采取保全实力策略，虚与逶迤，经过相当时期后，等待米夫等政策碰壁后，必遭到党内攻击，那时我们乘机反击，如此则事半功倍，方是上策。其次有人说：当前米夫已抢先成立了一个临时中央，如果再组织一个中央的话，岂不是分裂行为，这是冒天下大不韪的事，作法是不明智的。因此主张逆来顺受，听

其所为，米夫多行不义，自会倒台，那时问题自然也就解决了，何必做费力不讨好的事。还有人认为四中全会临时中央既是东方部米夫所支持的组织，它是正统，所以也是合法的。如果另立组织就是对上级的反叛，一般人对于以下抗上认为是理所不容许的。此外还有其它种种类似的说话。总括一句话，是保守思想，怕牺牲，怕乱，怕冒风险，怕吃眼前亏，主张妥协，主张息事宁人。“以柔克刚，不战而胜”，这是主张保守的另一种说话，骨子里，他们对米夫策划篡党事件怀有深厚的沮丧心情，认为不可抗力，沉默忍受外，更无他途了。

另一方面是主张向米夫作斗争的同志们的意见。他们的人数更多，占有全党绝大多数。他们认为上述各种议论是似是而非的说话，认识糊涂，行为怯懦。要知道：一个政党发生路线斗争原是平常的事，革命事业就首先是对正反是非真伪有个分辨，有个标准，千万不能不分界限含糊了事。下面就各支部讨论发言中批驳前述论点引证作例：如吴淞铁路支部发言记录说：“从目前米夫言行分析，他是支持王、博篡党集团夺权的，不能视为合法。这一方面违背共产国际二十一条规定的精神，同时也破坏了中共六大通过的党章。因此，断定米夫是瞎指挥，完全是无理取闹，我们不能服从。如果对此种乱命不思反抗，并积极纠正其失，反而唯唯喏喏，奉行谨，那就是愚蠢的懦夫行为，没有丝毫革命气息了。”老史（文彬）早已在花园会议当众指斥谴责米夫，驳斥过他这种无理的说法。史说：“中共尊重国际，并愿意接受他的正确领导，但不欢迎他的错误路线。四中全会违反了中国共产党与革命的根本利益，这是胡闹，中共不能盲从。”最后梅根引经据典说：“按目前情况实与一九一九年列宁处境相似，正当党与革命危急存亡之秋，布尔什维克（多数派）与门尔什维克（少数派）双方对抗，无法苟同的时候，列宁代表中央多数毅然与少数派决裂，成立新的中央，此举对于挽救革命危机起了重大作用。”这一启示鼓舞了党员群众的情绪。

随后反对与米夫妥协的意见在各支部占有压倒的多数，主要认为米夫的罪恶真相现已大白。党内同志受其涂毒，吞声引恨，革命危机日益尖锐化，我们不应该从成败出发，以求保全实力。如果与米夫妥协，就必然为虎作伥，先自堕落，结果如同豺狼共事，就必须吞噬羔羊。试问与米沆瀣一气以后，附和他们残害革命同志，双手沾染革命者鲜血，有何面目对同志与革命群众？就算保全了实力又有何意义？当年参加革命为何来？因此断然反对向恶势力投降。他们的意见归纳起来为一句话：“宁居叛逆，不作癞狗！”经过充分讨论后，各党团及支部表示，绝大多数一致赞成成立中枢机构。

当时，这个从下而上的群众要求，促使大多数中委与负责干部，考虑成立一个非常规性的中共中央组织机构，继续领导工作，以代替非法篡夺的王、博临时中央。这样，中央非常委员会便可以正义组织对抗叛乱性的临中组织，名正言顺，壁垒森严，这是挽救全党的最重要的部署，理论与实际一致结合



的必要措施。最后中央会议一致决定采取革命的非常措施，成立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

### 三、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成立大会

1. 大会经过：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以下简称非委）是在一九三一年一月正式成立的。成立大会地点是：上海英租界中共中央工委办公厅。出席者有中共中央六大中委（留沪者）二十六人，北方、顺直、唐山、江苏、苏北、山东、浙江、湖北、江西等省市省委书记及负责干部。其次是中央工委、全总、海总、上总、铁总、与共青团中央及省市委书记。苏准会代表团，各苏区首席代表，全国革命文艺协会党团负责人，共计出席代表五十二人，列席代表若干人。

大会议事日程如下：（1）政治报告，（2）工作报告，（3）讨论（小组与大会结合进行），（4）决议案（各小组委员会起草），（5）大会宣言，告全党同志书，（6）选举中央执行委员会。

大会推选史文彬等五人为主席团轮流执行主席职务，林育南为秘书长，李梅羹、谭寿林为秘书。大会政治保卫负责人：陈虞卿。

有关大会议程各项问题通过全体代表与小组委员会详细研究和群众性讨论，一致决定成立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通过“反对四中全会，力争紧急会议提纲”的重要决议案，共青团工作问题决议案，女工问题决议案，军事问题决议案与文艺工作决议案等。最后选举中共非常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大会宣言，告全党同志书及大会致共产国际信等。

关于“反对四中全会，力争紧急会议提纲”，是由大会推举五人小组起草，即文虎、史文彬、林育南、李求实与何孟雄。由文虎执笔。定稿后交小组讨论通过。由执行主席提交大会讨论，修改文字，三读通过。交秘书处付印，（并译成西文），交代表签名作为正式文件并盖“秘”字，只在党内传阅，不准外传。后来王明诬指非委中央公开散发传单，即影射此文。王明之说纯系捏造，全无事实根据。

大会经过充分发扬民主精神，一致选出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执行委员二十二人，候补委员十五人，组成中央机构，继续领导革命工作。

#### 2. 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成员表（姓名、职务、原任职务、备注）

罗章龙 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主席 中共中央工委书记、全总党团书记 六大中委

史文彬 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常委兼组织部长 中央监委主席、铁总主席、铁总党团书记 六大中委

何孟雄 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常委兼宣传部长 江苏省委书记 六大中委

林育南 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常委兼秘书长 上海总工会常委、苏准会秘书长 六大中委

李求实 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常委兼文联书记 少共中央书记、上海反帝同盟书记 六大中委

唐鸿景 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常委 东北区党委书记 六大中委

李震瀛 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常委 上海总工会主席兼党团书记 六大中委

王仲一 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常委 北方局书记、铁总组织部长 六大中委

张金保 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常委兼女工部长 全总女工部主任 六大中委

袁乃强 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委员 京奉铁路总工会主席 六大中委

沈先定 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委员 上海总工会组织部长 六大中委

于谓珊 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委员 上海纱总主任 六大中委

张昆弟 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委员兼天津非委书记 北方局特派员 六大监委

王凤飞 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委员兼上海非委书记 原九江书记后任上海闸北区书记 六大监委

谭寿林 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委员兼秘书 全总秘书长 六大中委

陈郁 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委员兼海总非委书记 海总党团书记 六大中委

吴汝铭 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委员兼北方非委书记 北方工委党团书记 六大中委

刘峻山 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委员兼沪西区书记 江西省委书记 六大中委

孙秀峰 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委员兼济南非委书记 济南党委书记 六大中委

徐兰芝 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委员 陇海铁路工会委员 六大监委

童昌荣 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委员兼湖北非委书记 湖北省工委书记 六大候补中委

霍锷镛 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委员兼武汉非委书记 湖北省委工委书记 六大候补中委

韩麟符 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委员兼北方军事特派员 北方局农民部部长 六大中委

肖道德 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委员 江西中央苏区代表

罗章凤 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候补委员兼军委书记 武汉政府独立团营政委

陶兰（女） 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候补委员 江西中央苏区代表

徐朋云 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候补委员 豫鄂皖苏区代表

郑芹瑞 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候补委员 豫鄂皖苏区代表  
 陈元昆 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候补委员 洪湖苏区代表  
 王士青 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候补委员 青岛市委书记  
 卢福坦 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候补委员 胶济铁路工会主席 六大候补中委

马人骥 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候补委员 天津海员工会  
 冯 铿(女) 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候补委员 文联秘书  
 姜 英 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候补委员 东北军委书记  
 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候补委员还有下列各人: 李进、刘鄛(女)、李梅羹、徐彬如、伍仲文(女)、王春熙(女)。  
 (陈寿昌(中委)、朱宝廷(中委)、邓发(监委)、刘义(监委)、毛筒青(监委)、刘俊才(监委)、龙大道、胡也频。)

**四、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组织系统及其所属各级机构** 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组织基础是建立在“六大”中委(二十六人)中央工委、少共中委、全党总党团、苏准会党团、革文联盟,江西、江苏、浙江、湖南、湖北、福建、云南、北方、东北党组织(包括山东、河北、河南等省)以及其它各省党与少共组织等。总之,非委组织范围,凡全国中共少共组织全部包括在内。

少共中央非常委员会仍由李求实继续担任书记,少共中央及地方非常委员会人员大部仍旧。李被害后,王、博另立少共临时中央,改任胡均和为书记,胡叛变投敌后,少共临时中央全部瓦解。

1. 中共江苏非常委员会:原中共江苏省委全体同志在反王、博篡党斗争中是站在最坚决的立场,后来在花园会议对米夫等给予彻底批判,仲张正义。随后在原有组织基础上成立了江苏省非常委员会。江苏省本身直辖江苏南部与北部,两个特委,上海市由省委自兼,市内计分闸北、法南(法租界与南市)、沪中(英租界)、沪西、沪东、吴淞等五个区委,均产业工人集中地区。

中共江苏省非常委员会成员:何孟雄,江苏省非常委员会委员兼书记。王凤飞,江苏省非常委员会委员,上海闸北区委书记。王新元,江苏省非常委员会委员,上海法南区委书记。卢涤尘,江苏省非常委员会委员,上海沪东区委书记。张权,江苏省非常委员会上海吴淞区委书记。欧阳立安,江苏省非常委员会委员,少共沪东区书记。林育英,江苏省非常委员会委员,上海沪西区书记。王任,江苏省非常委员会委员,上海沪中区书记。柔石,江苏省非常委员会委员。汤士仁,江苏省非常委员会委员,苏北特委书记。汪德,江苏省非常委员会委员,苏嘉特委书记。冯铿,江苏省非常委员会委员。马骥,江苏省非常委员会委员。

2. 中共上海市各区非常委员会:中共上海闸北区非常委员会:王凤飞、徐大妹、戴小红、陈重文、陈元昆等。中共上海沪中区非常委员会:王任、

张路、朱英、冯铿、朱伦、刘瑞农、金同、左刚、罗湘南。中共上海法南区非常委员会:王新元、吴天鹏、郭妙根、夏采<sup>1</sup>、费琴、龚无唯、刘德承(顾卓新)、徐彬如(文雅)。中共上海沪东区非常委员会:卢涤尘、刘子载、李超时、李易元、熊中和、王德、王平。中共上海沪西区非常委员会:林育英、江文祺、林纪望、蒋涤生、陈谦和。中共上海吴淞区非常委员会:马骥、熊本立、杨月林、漆树平、黄春森。中共江北非常委员会书记王春熙。

3. 中共北方非常委员会:北方区直辖:河北、河南、山西、山东、察哈尔、热河、绥远、陕西、奉天、吉林、黑龙江等省市党组织工作。北方区委兼管北京市工作。天津、唐山各成立市委。

中共北方区非常委员会成员:吴汝铭,北方区非常委员会书记。张昆弟,北方非常委员会委员兼工委书记。唐鸿景,北方非常委员会委员,沈阳非委书记。傅景阳,北方区非委委员,南满洲铁路工委书记。韩麟符,北方区非委委员,察哈尔非委书记。袁乃强(乃祥),北方区非委委员,唐山区委书记。李希逸,北方区非委委员,天津市委委员。李渤海,北方区非委委员。刘德承,东北非委委员,沈阳市委委员。张金刃,北方区非委委员。曹竹之,北方区非委委员,天津市委委员。(袁士青)王士青,北方非委委员,青岛市委书记。李江英,东北非委委员,哈尔滨市委书记,军委书记。张昭德,东北非委委员,哈尔滨市委委员。王昭泉,东北非委委员,哈尔滨市委委员,工委书记。(被遗漏者有王仲一)<sup>2</sup>

中共天津非常委员会:李希逸(书记)、叶玉川、刘蕊、袁静、曹竹之、吴慰名、李竹声、孔原等。

中共唐山非常委员会:袁乃强(袁乃祥)(书记)、龚得元、马老五、彭振纲、邓福金、阮章等。

中共山东非常委员会:刘俊才(书记)、孙秀峰、王国元、李宝成、李青山、卢福坦、韩文玉、王士青等。

中共北满非常委员会:张介夫(书记)、陈方(工委)、江英(军委)、李俭英、张慧贞(女工部)、宋大方(特派员)、张超德(工专支部)等。

中共南满非常委员会:傅景阳(书记)、唐鸿景、徐旭生、顾作新、赵淮山等。

中共湖北省非常委员会:霍馄镛(书记)、吴芳、季陶君、李清、杨共奎、法尚之等。

4. 中共其它各省非常委员会:

中共江西省非常委员会:刘俊山(书记)、刘九峰、方铭达、钟复田等。

中共安徽省非常委员会:江朝海(书记)、施勉予、叶继善、文群之、黄鲁风等。

<sup>1</sup> 夏采<sup>◇</sup>,可能是夏采曦。— 补注

<sup>2</sup> 括号内系罗××补。— 补注

郑芹瑞 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候补委员 豫鄂皖苏区代表  
 陈元昆 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候补委员 洪湖苏区代表  
 王士青 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候补委员 青岛市委书记  
 卢福坦 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候补委员 胶济铁路工会主席 六大候补中委

马人骥 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候补委员 天津海员工会  
 冯铿(女) 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候补委员 文联秘书  
 姜英 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候补委员 东北军委书记  
 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候补委员还有下列各人: 李进、刘鄱(女)、李梅羹、徐彬如、伍仲文(女)、王春熙(女)。

(陈寿昌(中委)、朱宝廷(中委)、邓发(监委)、刘义(监委)、毛筒青(监委)、刘俊才(监委)、龙大道、胡也频。)

**四、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组织系统及其所属各级机构** 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组织基础是建立在“六大”中委(二十六人)中央工委、少共中委、全党总党团、苏准会党团、革文联盟,江西、江苏、浙江、湖南、湖北、福建、云南、北方、东北党组织(包括山东、河北、河南等省)以及其它各省党与少共组织等。总之,非委组织范围,凡全国中共少共组织全部包括在内。

少共中央非常委员会仍由李求实继续担任书记,少共中央及地方非常委员会人员大部仍旧。李被害后,王、博另立少共临时中央,改任胡均和为书记,胡叛变投敌后,少共临时中央全部瓦解。

1. 中共江苏非常委员会:原中共江苏省委全体同志在反王、博篡党斗争中是站在最坚决的立场,后来在花园会议对米夫等给予彻底批判,仲张正义。随后在原有组织基础上成立了江苏省非常委员会。江苏省本身直辖江苏南部与北部,两个特委,上海市由省委自兼,市内计分闸北、法南(法租界与南市)、沪中(英租界)、沪西、沪东、吴淞等五个区委,均产业工人集中地区。

中共江苏省非常委员会成员:何孟雄,江苏省非常委员会委员兼书记。王凤飞,江苏省非常委员会委员,上海闸北区委书记。王新元,江苏省非常委员会委员,上海法南区委书记。卢涤尘,江苏省非常委员会委员,上海沪东区委书记。张权,江苏省非常委员会上海吴淞区委书记。欧阳立安,江苏省非常委员会委员,少共沪东区书记。林育英,江苏省非常委员会委员,上海沪西区书记。王任,江苏省非常委员会委员,上海沪中区书记。柔石,江苏省非常委员会委员。汤士仁,江苏省非常委员会委员,苏北特委书记。汪德,江苏省非常委员会委员,苏嘉特委书记。冯铿,江苏省非常委员会委员。马骥,江苏省非常委员会委员。

2. 中共上海市各区非常委员会:中共上海闸北区非常委员会:王凤飞、徐大妹、戴小红、陈重文、陈元昆等。中共上海沪中区非常委员会:王任、

张路、朱英、冯铿、朱伦、刘瑞农、金同、左刚、罗湘南。中共上海法南区非常委员会:王新元、吴天鹏、郭妙根、夏采◇<sup>1</sup>、费琴、龚无唯、刘德承(顾卓新)、徐彬如(文雅)。中共上海沪东区非常委员会:卢涤尘、刘子载、李超时、李易元、熊中和、王德、王平。中共上海沪西区非常委员会:林育英、江文祺、林纪望、蒋涤生、陈谦和。中共上海吴淞区非常委员会:马骥、熊本立、杨月林、漆树平、黄春森。中共江北非常委员会书记王春熙。

3. 中共北方非常委员会:北方区直辖:河北、河南、山西、山东、察哈尔、热河、绥远、陕西、奉天、吉林、黑龙江等省市党组织工作。北方区委兼管北京市工作。天津、唐山各成立市委。

中共北方区非常委员会成员:吴汝铭,北方区非常委员会书记。张昆弟,北方非常委员会委员兼工委书记。唐鸿景,北方非常委员会委员,沈阳非委书记。傅景阳,北方区非委委员,南满洲铁路工委书记。韩麟符,北方区非委委员,察哈尔非委书记。袁乃强(乃祥),北方区非委委员,唐山区书记。李希逸,北方区非委委员,天津市委委员。李渤海,北方区非委委员。刘德承,东北非委委员,沈阳市委委员。张金刃,北方区非委委员。曹竹之,北方区非委委员,天津市委委员。(袁士青)王士青,北方非委委员,青岛市委书记。李江英,东北非委委员,哈尔滨市委书记,军委书记。张昭德,东北非委委员,哈尔滨市委委员。王昭泉,东北非委委员,哈尔滨市委委员,工委书记。(被遗漏者有王仲一)<sup>2</sup>

中共天津非常委员会:李希逸(书记)、叶玉川、刘蕊、袁静、曹竹之、吴慰名、李竹声、孔原等。

中共唐山非常委员会:袁乃强(袁乃祥)(书记)、龚得元、马老五、彭振纲、邓福金、阮章等。

中共山东非常委员会:刘俊才(书记)、孙秀峰、王国元、李宝成、李青山、卢福坦、韩文玉、王士青等。

中共北满非常委员会:张介夫(书记)、陈方(工委)、江英(军委)、李俭英、张慧贞(女工部)、宋大方(特派员)、张超德(工专支部)等。

中共南满非常委员会:傅景阳(书记)、唐鸿景、徐旭生、顾作新、赵淮山等。

中共湖北省非常委员会:霍馄镛(书记)、吴芳、季陶君、李清、杨共奎、法尚之等。

4. 中共其它各省非常委员会:

中共江西省非常委员会:刘俊山(书记)、刘九峰、方铭达、钟复田等。

中共安徽省非常委员会:江朝海(书记)、施勉予、叶继善、文群之、黄鲁风等。

<sup>1</sup> 夏采◇,可能是夏采曦。— 补注

<sup>2</sup> 括号内系罗××补。— 补注

中共云南省非常委员会：刘少猷（书记）、张至刚、王纪方、王儒廷、张兆怀、李金龙等。

此外，福建、广东、广西、四川、贵州等省均有非委主管各该地区党的工作。

5. 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的群众组织：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所属群众组织是构成当时革命势力的中坚。这些群众组织在非委中央正式成立，继续领导革命工作以后，人心振奋、空前活跃，人人奔走相告，组织学习“提纲”内容。认为党自临中叛乱而后，内外交困，岌岌可危。现在非委既已新建，形势好转，革命形势危而复安，绝而复存。于是发扬蹈厉，勇往直前，为了争取新的成就，到处积极开展各线工作。现将中共非委所属革命群众组织简介如次：

(1) 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华全国总工会（简称全总），由全国各产业工会、各省工会联合组成，为中国革命工人群众的最高组织。全总中央执行委员会设有全总党团，内设书记一人，管理全总中共党员的垂直系统有关事物。全总党团书记通常由中共中央工委书记兼任。中央工委书记通常由中委三人选任组成之，设书记一人，在中央常委工作，书记出席常委会议。

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工委与全总党员成员：文虎（书记）、史文彬、童昌荣、溪石、袁炳辉、谭寿林、金志成等。

非常委员会在全总系统各省组织中特别注重对于过去组织较弱的地方，初步发展了革命工会的组织，如：上海兵工厂、太原兵工厂、沈阳兵工厂的工会，香港产业工会（造船、港务、电车等），厦门工代会，四川自流井工会，云南个旧矿工会，江西景德镇瓷业工会，湖南苏区平浏总工会，福建苏区总工会等，共计有地下组织工会会员五万余人。

(2) 中国铁路总工会：中国铁路总工会（简称铁总），由中国境内全国铁路工会的最高工会联合组织。包括：京汉、京绥、京奉、津浦、道清、正太、粤汉、陇海、胶济、沪宁、沪杭、广三、广九、中东、南满、株萍等约二十条铁路。有组织的铁路工人初期为十万，后发展三十万人。铁总成立于一九二四年，铁总党团书记负责管理全国铁路垂直系统的党委工作。

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铁总党团成员：吴汝铭（书记）、张昆弟（组织）、刘俊才（宣传）、孙秀峰、傅青山、朱盛荣、孙明、李宝成、徐兰芝、傅景阳等。

(3) 中国海员总工会：中国海员总工会（简称海总），由中国沿海、沿江轮船工会组织的联合会。海总有组织的工会会员为十万至十五万人，在上海、汉口、香港、广州等处分设分会，并参加国际运输港务工会的组织。（地址设在德国汉堡。）

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海总党团成员：刘达潮（书记）、朱宝廷、马骥（秘书）、陈郁（组织）、李清（武汉）等。

(4) 上海总工会：上海总工会（简称上总），后又改称上海工会联合会，由上海市各业工会联合组织之。主要是纺织、缫丝、印刷、机器、造船等业工会。

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上总党团成员：沈先定（书记）、李震瀛（组织）、江元清（少共）、沈先元（纱总）、邱泮林（纱总）、黄寄岚、郭洪等。

(5) 中国革命文艺联盟：中国革命文艺联盟（简称革文联）是一九三〇年下期由李伟森同志等组织起来的。王、博篡党事件发生时，革文联全体加入非常委员会，坚决反对王、博，与临中作斗争。当时临中招降左联份子田汉、周扬、夏衍、徐懋庸、阳翰笙、潘汉年、丁玲、胡乔木等。在北京、天津等地非常委员会所属革文联负责人有刘新、一鸿、禹贞、草非等。

李求实曾向非委中央建议改进文艺工作，他草拟了一个革命文艺新工作计划、经非委通过，即付诸实施（亦名播火记）。李求实提出建议，主张立即成立集体写作机构，把真诚革命的文艺爱好者引进工农革命阵地，从事革命文艺创作计划。该计划主要是动手写工农斗争作品，以罢工斗争、农民战争为主要题材，同时进行编写有关一九二一年以来历次伟大工农群众斗争的史诗、小说、剧本等（包括过去铁路、海员、矿山、纱厂等罢工斗争，以及李味农、伦克忠、王中秀与大革命失败后无数牺牲壮烈史事等），并决定创办一个工农文艺期刊，由文联主编。这个计划谭寿林称之为火种计划。

中共革命文艺联盟非常委员会成员：柔石（书记）、胡也频、殷夫、阿虎、伍仲文、舒可、一鸿、草非、刘新等。

结语：以上简单介绍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及其所属党与群众组织的一般情况，略表轮廓。至于王、博集团当时的组织情况除临时中央机关住有几个住机关的“布尔什维克”份子及招降的少数人以外，基本上是没有甚么党员与工会群众组织的，他们只是些空头机关在发号施令罢了。有人问临中头人：“你们既没有党员群众，又没有工农群众组织，能搞出甚么名堂来？”向忠发答：“米夫支持就是党，中国人口几亿男女都是我们的自然群众组织，这就是临中的名堂哩！”其颜厚无耻与无赖，可见一斑！但是他们向国际作工作报告时，却把非常委员会的组织工作与斗争冒名顶替写到临中名下，还自夸成绩，洋洋得意！与此相应，他们更写了不少假材料，以欺人。总之他们是从极左的空头政治理论到空头的组织，这是人所共喻的。

五、中国苏维埃准备会议 于此应特别提到中国苏维埃准备会议及其活动情况，特别是参加非常委员会中央工作的情况。

1. 当时，在全国范围内已有若干地区建立红军与苏维埃政府，一般称为苏维埃区，主要分布如次：

(1) 中央苏区：以井冈山为基地，包括江西、福建、湖南等省组成，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苏区。当时管辖三省的数十个县。

(2) 赣东北与闽浙地区：一九二九年成立信江区工农兵政府，包括弋

阳、横峰、上饶、万年、德兴、贵溪、玉山、余江等，一九三〇年夏，组成红十军。

(3) 湘鄂西北苏区：一九二七年秋收起义后，以洪湖为中心如监利、石首等县，由段德昌领导。湘鄂西部如桑植、鹤峰等县由贺龙领导，建立红军。一九三〇年二军与六军会合，组成红军第二军团，两个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共有十一个县。

(4) 鄂豫皖苏区：一九二七年秋收起义，信阳、罗山、黄岗、黄陂、云梦、孝感、麻城等地进行游击战争。一九三〇年扩建为鄂豫皖苏区。

(5) 闽西：闽西来人谈当地农民斗争发生与发展经过云：一九二八年七月闽西龙岩、上杭、永定三县武装编成三个团，成立闽西暴动总指挥部，进攻龙岩县城未下。八月将队伍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第十九师分途游击。一九二九年闽西六县（岩、永、龙、汀、连、武）农民普遍成立武装队伍，到处开展了武装斗争。[是年三、四月红四军进军闽西。]一九二九年三、四月，红四军两度进军闽西，击溃军阀陈国辉及地主民团，八月在蛟洋第一次召开党代表大会，就闽西各县原有暴动武装改编为红四军第四纵队，以傅伯翠任纵队司令，党代表张鼎丞，政治部主任谭震林，参谋长罗瑞卿。九月攻下上杭，十二月在上杭古田召开第四军九次党代会。一九三〇年春三月，闽西五县苏维埃政府成立，拥有人口百余万，成立工农红军第十二军，共六个团，兵员三千多人，建立闽西根据地。（包括龙岩、上杭、永安、长汀、宁化、陆浪、武平等地）。

(6) 广西左右江地区：一九二七年广州起义失败后，一些参加起义的工人退入广西左江地区，领导农民进行游击战争。一九二九年秋，张云逸等率领广西警备队的一部分，联合当地农民游击队，在右江起义，成立红军第七军。十二月成立右江工农兵政府，占领百色、德保、思林等全部右江地区。一九三〇年，驻在左江的广西警备队也响应起义，成立红军第八军，组织左江工农兵政府，曾一度占领龙州。

(7) 海南岛区：海南岛地区先有游击队活动，一九三〇年成立海南岛工农兵政府，革命势力曾经遍及琼山、文昌、定安、万宁、陵水等地。在广东东江的南山区，曾经建立过普宁、潮阳等地工农政府。

(8) 陕北区：一九二七年刘志丹等先后在陕西各地组织武装起义。一九三一年后游击队不断发展壮大，奠定以后陕甘宁边区的基础。

按：以上内容原文有缺佚处，故内容详略失均，现姑仍其旧，其详俟续考补入。

2. 全国苏维埃区代表大会准备会议：先是一九三〇年二月十七日，中共为召集全国苏维埃区代表大会问题，致函全国总工会，建议五月卅日举全国苏区代表会议。预定开会地点在上海，由全总筹备一切。随后中共与全总为此事发表联合宣言，说明苏代会主要任务是：使农村斗争与城市斗争

配合，保证工农联盟，建立工农政权，扩大红军与农民武装等。

后来湖南、湖北、江西、福建、广东、广西、安徽、河南等省各苏区及城市工会均派代表出席。各省代表先后集中上海，但是由于战时交通困难，全部代表不能如期到达，改期为一九三〇年底在上海召开。当时，江西中央苏区代表为肖道德、陶兰等，豫鄂皖苏区代表为徐朋云、钱伯符等，赣苏区代表为刘畴西、吴先群，鄂西苏区代表为段德昌、张国兰等。此外尚有海南岛苏区代表与广西右江苏区代表等。按照一九三〇年三月十八日全总致中共复信，同意双方共同派专人负责筹各大会工作。先行到达上海的各苏区代表举行筹备会议，会议决定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开始进行苏准会筹备工作，设立常务委员会负责会议经常工作，并公开推林育南为大会秘书长，陈虞卿为政治保卫处长。

在四中全会党内斗争期间，苏准会代表首先在反四中全会提纲文件上签名赞成，并立即加入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作为非委成员之一。嗣后在工作中继续坚持反对米夫、王、博集团破坏革命的罪恶行径，在实际工作中，动员苏区城市工人与农村雇工加入工会，建立工会组织的强固基础，使成为苏区革命柱石。在此同时，苏区工会建立了城市工会与农村工会的联合组织，逐渐扩大为地区工会作为省工会的部门组织。

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苏准会代表团党委：林育南、陈虞卿、肖道德、陶兰、郑行瑞、徐朋云、张汶秋、段德昌、钱伯符、刘畴西、吴先群等。

**六、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的纲领提要** 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成立，在第一次常委会议上讨论工作时，决议发表对党宣言，此即后所称为“反四中全会报告纲领”，当时决定成立宣言起草委员会，推定史文彬、林育南、李求实、文虎等为起草人，旋即由起草人将纲领全文提交非常委员会中央第二次会议讨论通过。纲领内容简述如下：

(1) 向忠发中央政策错误的历史根源，理论方面继承瞿秋白的盲动主义，实质是反动性流氓帮会的宗派统治。

(2) 东方部指导中国革命的错误，包括政治路线与组织路线。政治路线驾空而行，超越实际，组织路线煽动非无产阶级性的宗派斗争，破坏党内民主，广泛实行命令主义与野蛮的惩办制度。

(3) 目前革命形势要求全党艰苦卓绝的奋斗，使工人斗争与农民斗争取得有机配合，克服一切困难，战胜反动统治，为争取中国革命完全胜利而斗争。

(4) 党的任务在继续彻底肃清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等人的非无产阶级的政治路线与组织路线，因为他们的领导已完全破产，使中国革命蒙受重大损害。

(5) 三中全会的中央，其所执行的错误政策变本加厉，重复做着以前的错误，因此必须改弦更张。唯一挽救方法是召开紧急会议或七大会。

(6) 非委坚持召开紧急会议一劳永逸地纠正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王明的

一贯换汤不换药的做法，终止党内宗派斗争。

(7) 紧急会议是保证党领导中国革命胜利的必要步骤，非委慎重考虑结果，对于紧急会议建议以下几点：a. 列席成员废除由国际指定的包办方法，代以符合党章的民主推选。b. 取消三中全会以来的错误决议与选举。c. 彻底肃清宗派主义统治。d. 重新讨论党的总任务，重新制定党的组织、工运、农运、土地问题等方案。e. 根本改造政治局。f. 确定第七次代表大会日期，恢复党内民主及自我批评。g. 执行纪律，维护党纪。

(8) 三中全会（中央）破坏紧急会议，一面佯称同意全总决议召开紧急会议，向忠发、瞿秋白曾对全总声称服从党员群众意志。会前国际代表也声言全总党团决议正确，并声明政治上保证其实现，但他们却暗中布置四中全会，实行篡党。

(9) 纲领中指出绝大多数中委及各级党员均一致主张召开紧急会议，建议紧急会议者包括下列各党员：a. 六大中委的绝大多数中委。b. 全总党团的全部成员。c. 海总党团的全部成员。d. 铁总党团的全部成员。e. 上海工联（上总）党团的全部成员。f. 上海反帝同盟党团的全部成员。g. 苏维埃区代表团全体代表党员。h. 苏区准备会全体工作同志党员。i. 江西省委外县委员会书记及全体党员。j. 北方天津党部全体党员。k. 山东省委全体委员及书记并所属党部全体党团员。l. 青岛市委全体委员及书记。m. 上海市各区全体委员及书记，上海闸北、沪东、沪西、法南、沪中等区全体委员及书记。上述各地多数产业支部、中心支部、中央直属小组全体党员与团员。n. 全国工会党团员干部包括：山东、济南、高密、青岛、四方、福州、厦门、汕头、广州、香港、九龙、上海、南京、杭州、江北、南通、天津、唐山、沈阳、大连、长春、哈尔滨、汉口、长沙、南昌等地。

(10) 纲领中略述紧急会议被破坏经过，指出王明本身即向忠发、李立三路线，他们是站在左倾立场去反对瞿、向的。因为王明在十一月十三日意见书上明白提出：a. 在中央工作人员会议讨论六月十一日决议时，声明完全拥护全国暴动、总同盟罢工策略，说不要对六月十一日决议估量过低。b. 说紧急会议是右倾份子的活动。四中全会指使人是国际代表米夫等。米夫曾经公开地向全总党团、工联党团、海总党团负责人说，要他们离开反方向忠发、李立三路线，服从王明的领导。当时立即遭到各党团负责人严词申斥，断然加以拒绝。米夫乃擅自独断决定召开四中全会以代替全体党员主张的紧急会议。

(11) 纲领中谈到四中全会问题，指出四中全会的非法性。会议成员由米夫指派，米夫在会议上实际拥有否决权，可以操纵一切。会议时间为十五小时，每人发言不过十五分钟。议案事先既没有通知，对于许多干部发言稍持异议者临时辄加以右倾取消者派恶名禁止他们发言。纲领指出米夫所主持的四中全会既不讨论实际工作，解决当前迫切的政治任务，同时对瞿秋白、向忠发等历经事实证明其为错误路线，在行动上继续支持。米夫以全部力量建立王明的新宗派统治，以全体党员为敌。结果指定的新中央主要成员为王明、博古等宗派份子，向忠发仍作傀儡书记，助米夫、王明集团继续为非作恶，无所不为。

(12) 纲领指出米夫站在东方部小组织立场上故意制造宗派，联甲倒乙，藉逞私图，以致酿成党内无休止的互相火并，使革命组织陷于混乱失纪的状况，因此号召全体党员奋起与恶势力奋斗，立即撤去米夫职务，清算米夫自一九二七年来，以及在六大会上先后作出的错误。

(13) 纲领郑重昭告全体党员团结起来，一致以群众力量否认四中全会的非法的一切决议案和命令，停止王博非法所组织的中央的职权，并开除王明等祸首，予以党纪制裁。

在纲领上签名者有九十六人，包括上述第九项各级党组织负责人。纲领由非委中央秘书处负责人铅印五千份，分送党内各支部作为报告讨论之用。同时将纲领转寄各苏区支部。纲领译文送第三国际、赤色职工国际、少共国际以及各国兄弟党。

由上述提要可知：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公布的反四中全会纲领是一个庄严的声明，它以鲜明的政治面貌，堂堂之鼓，正正之旗，公开谴责东方部非法纵容内奸篡党的罪行。这是代表党员群众的正义呼声，捍卫党与革命事业的重要文告！发聋振聩，实大声宏，影响深远！纲领公布以后，如春雷震荡，全党响应，风起云兴，对党奸纷起声罪致讨，米夫一伙闻风丧胆夺魂，无地自容。

溯自中共过去党内斗争包括：瞿秋白、李立三、向忠发、王明等人发动党内斗争一般是站在宗派立场，暗中进行苦得达的阴谋诡计，实行篡党夺权。非常委员会认为这种做法是极坏的作风，因此主张公开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树立鲜明的旗帜，采取光明正大的行动，向篡党份子进行斗争。基于这个要求，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决定发布斗争纲领，这是中央非常委员会对外的政治意见与组织方案。提纲任务是发扬党内民主，杜绝宗派独裁，使全党新陈代谢，永远青春焕发！这是一个划时代的文献！

**七、非常委员会工作新貌** 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成立后的工作是千头万绪的，外埠党与群众组织负责人纷纷来沪向中央非委联系工作，应接不暇。非委首先宣布中国党与革命面临非常危机，一方面是非常委员会的继续领导革命，另一方面是王博等反革命组织背叛党与破坏革命。因此，非委宣布否认王博伪中央及其一切决议与命令一律无效。党的一切问题听候召集临时会议（即紧急会议）成立七大会合理解决。关于组织宣传阶级斗争全面工作，按当时实际情况说，在白区广大地区临中只是王博少数人高高在上，深居简出，凭空发号施令罢了。临中是并无群众基础可说的。所以全党革命斗争都是由非委中央及地方组织全力承担。因此，非常委员会剑及履及，争取时间，戮力加强开展各线阵地的的工作。此时，非委中央乃派人分途出发，前往北方、南方与中部地区布置新任务与新工作。决定文虎赴北京、唐山、辽沈、哈尔滨各地。李伟森到长江上游、李梅羹与谭寿林分赴两广地区指导工作。又决

定苏准会代表迅速回到本苏区开展武装与工农群众工作。全国革命文艺计划按新播火记积极进行(详后)。上述诸部署使非常委员会工作面貌为之一新!

#### 附录一：力争紧急会议反对四中全会报告大纲(一九三一年一月)

为彻底肃清立三路线调和主义坚决执行国际路线而斗争!

正当中国革命新的高涨的生长时期中，中国革命迅速发展的进程是愈加重了我们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不幸，在这个时候党的中央立三路线发生了根本原则上的完全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离开共产国际的路线，造成党中央领导的破产，革命的巨大损失!

全党同志为端正党的领导，保证无产阶级领导中国革命的迅速胜利，站在布尔塞维克的立场上坚决与非无产阶级的立三路线及其拥护者作无情的斗争。在这个长期斗争的经过中，是已遭受了立三路线与调和主义顽强的抵抗，并遭受了他们的种种无耻的欺骗和诬蔑。在紧急会议被破坏四中全会举行之后，立三路线中央的背叛阶级利益的罪恶是愈加显著了，全党同志为国际正确路线而斗争也就是为阶级革命胜利而斗争的责任是更加严重!

因此，每一个布尔塞维克的党员，在今天应该有一种严重的责任，为肃清立三路线及调和主义，团结得象一个人一样，勇敢坚决为着国际路线而进行布尔塞维克的斗争!

(一) 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共产国际的立三路线是完全破产了

中央立三路线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共产国际的路线，立三路线统治着全党已经发生了很严重的结果，使党与革命受到不可计算的损失，这证明中央的立三路线的领导现在是完全破产了(至于立三路线的实质，历史根源及其对于党与中国革命的恶果，参看另发之材料，此处不重述)。

(二) 三中全会的调和主义比立三路线更加危险

中央立三错误路线曾经过共产国际的指斥和党内同志不断的反抗，但是中央始则用顽强的态度敌视共产国际的意见，用家长制度惩罚手段压迫党内同志的自我批评。后来国际一九三〇年七月间中国问题决议案等来到中国之后，中央召集三中全会。在三中全会上中央更狡猾地模糊混淆着两条原则上不同的路线(国际正确路线与中央立三错误路线)，硬说过去中央路线与国际路线完全一致，同时否认立三路线的存在，对于全盘皆错的六月十一日中央决议还认为是正确的；又在三中全会根据立三路线补选新的中央委员与政治局委员。因此三中全会是公开保证立三路线继续执行，是更加有力阻遏党内同志反立三路线的运动。所以三中全会的“调和”主义只是立三路线的变本加厉，只是扩大和延长立三路线的恶果，只是推迟了对于国际正确路线的执行达六个月之久，增加党与革命更浩大的损失，是比过去立三路线还更危险的东西。

(三) 三中全会后有系统地重复做着许多错误，继续执行立三路线反对国

际路线

三中全会闭幕后，共产国际最后寄来一封长信，当时党内同志反立三路线及调和主义的斗争在全党已经到处普遍起来。中央一方面是用压迫手段阻挠党内同志反立三路线的运动，另一方面是用挑拨离间的造谣诬蔑对付一般积极反立三路线的分子，但是结果都归无效。中央受着党员群众的威迫不得不从事修正三中全会决议，做出更无耻的几次补充决议。中央在十一月二十五日补充决议说“三中全会路线是一般的接受了国际路线”，禁止讨论立三路线并限制国际来信及二十五日决议只可达到地方党部，在九号补充决议仍然掩饰调和主义的更大危险性。在九十六号通告仍然是一贯的调和主义，只是表面上承认立三路线的错误，纸上接受国际正确路线，在消极的承认中央政治局的错误的时候根本抹杀了反立三路线与执行国际路线的实际任务，取消了国际来信所指示的各项迫切任务的主要内容(如苏维埃任务、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等)。同时对于立三路线只是片面的认识(认为只是盲动主义的残余)，立三路线与调和路线对于党与革命的损害估量得非常不够与模糊，尤其错误的是认为反立三路线便包含两条战线的斗争的右倾观念，松懈了对于党内主要危险的右倾的攻击。至于三中全会后，党的中央仍然继续立三路线的统治，中央在这期间是自觉的有系统地重复做着许多错误，没有丝毫诚意的接受国际路线。

(四) 紧急会议是执行国际路线建立党的正确的领导保证党领导中国革命胜利的必要步骤

立三路线是完全破产了，调和路线更使党的危机加深，革命受着更大的损害，这证明中央已无领导革命的能力并缺乏对于阶级的忠诚(四中全会政治报告公开承认中央自觉的反抗国际)，中央的威信是丧失得干干净净，中央的领导在政治上组织上是早已完全破产。一般党员群众的呼声不是要修改三中全会决议，而是要根本废除他，废除历次补充决议，一致向国际代表要求立即停止中央政治局行使职权，由国际领导反立三路线与调和主义的中央委员组织临时中央机关，召集党的紧急会议，从根本的解决政治上组织上诸问题。

紧急会议的要求是围绕着广大的党员群众，是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的，是要求改变党的错误的领导使回复到正确的路线，对于紧急会议的建议如下：

(1) 紧急会议列席成分必须以坚决反立三路线与调和主义的党的干部与群众组织中的干部同志为主要成分。

(2) 彻底接受和坚决执行国际路线。

(3) 取消三中全会的决议和选举。

(4) 正确估量立三路线与调和主义彻底予以肃清。

(5) 根据国际七月决议及最近来信，汇合全党各方面工作经验，郑重规定党的总任务，党的组织问题，职工运动问题，农民运动问题，土地问题，苏维埃问题等决议案(关于这些问题的正确意见，散见反立三路线各文件中，不久将另整理意见提出)。

(6)根本改造政治局。

(7)确定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日期（与七次大会密切有关的即目前亟须恢复党内民主，进行布尔塞维克的自我批评，发表反立三路线的决议与文件等）。

(8)执行铁的纪律，处罚有系统的坚决执行立三路线及调和主义的中央主要负责分子。

#### (五)为紧急会议而斗争

围绕在紧急会议周围的是反立三路线和调和主义最坚决的广大党员群众，尤其是党的下层组织与在工会及其他群众组织中工作同志，他们是不约而同的起来作无情的斗争，就现在所知道的一部分说，已经包含有中央委员之一部分，全总党团，海总党部，铁路总工会办事处党团，上海工联党团，上海反帝同盟党团，苏维埃区代表团全体同志，苏准会工作全体同志，江南省委外县委员会书记全体同志，北方天津党部，山东省委，青岛市委，上海各区委（闸北沪东沪西沪南沪中等）及上述各地的所属多数产业支部，中心支部，中央直属小组以及全国积极的工会干部同志等（青岛上海天津武汉海员铁路苏区厦门等地）。中央在党员群众威迫之下，知道简单的高压政策决不足以继续维持其错误的领导，这样便采取了种种非无产阶级的手段，用欺骗的方式向党员群众假借接受紧急会议的要求，以缓和同志们的反抗，例如中央向全总表示决定召集紧急会议并书面通知全总党团负责人起草紧急会议职工运动决议案，忠发在中央工作会议向全国济总党团及苏准会工作同志报告中央已经正式决定召集紧急会议（会议的成分规定立三路线调和主义的中央委员参加者不超过四分之一等等），秋白恩来到闸北区到沪中区做报告时均详示服从区委同志决议，赞成紧急会议，国际代表屡次向全总负责人员表示均言全总党团决议的正确并声明政治上组织上保障其胜利，同时却在暗中秘密布置四中全会。这一切都证明中央所采用的方法是与国民党官僚黄色工会工贼同其性质，另一方面证明紧急会议的召集是急不容缓之举了。

#### (六)立三路线派及投降分子破坏紧急会议

立三路线派是极端仇视紧急会议的，因为他们知道紧急必然是要埋葬立三主义及其统治的，同时还有那些在思想上同样犯有立三主义错误的陈绍禹等自然是怀着同样的恐慌，因为陈绍禹等过去是站在“左”倾的口头上反对立三路线的，他们在中央工作人员会议讨论六月十一日决议案时是完全同意立三路线的总策略的（即布置全国暴动同盟罢工等），他们是用“左”倾的口头禅认为全国已有直接革命形势，而说六月十一日的估量为过低的，他们在三中全会后承认“三中全会有重大的意义”，认为立三主义只剩有“残余”只要中央承认错误“可以避免争论”（引文见陈绍禹十一月十三日意见书）。因此在紧急会议运动迅速发展之中他们是用种种不正确的宣传破坏紧急会议的工作，他们说：“立三主义已不存在”，“反立三主义的理论斗争应该停止”，“国际路线已在党内完全实现”，“中央省委已承认错误同志便不应该再谈改造党的组

织”，“紧急会议是‘左’倾分子的活动”。这些便是证明立三派投降分子等是时时企图破坏反立三路线的运动继续着维持立三路线的领导，并且他们这种企图是受着国际代表米夫不正确的指使，米夫是公开地向着全总党团，工联党团，海总党团负责人用左派的观点估量反立三路线的整个运动，命令他们离开反立三路线运动，服从陈绍禹等领导（自然上述各党团负责人是当面拒绝并指斥他）。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他们便暗中布置合于旧中央及陈绍禹小组织派别的目的的四中全会以代替党员群众需要的紧急会议。

#### (七)四中全会的经过

四中全会的召集，原则上与党员群众们所提议的紧急会议完全两样。第一，参加会议的成分是由中央政治局自由指定的，主要分子是中央政治局本身，三中全会补选中央委员罗迈贺昌等，中央机关工作人员，长江北方南方各局的书记，这些都是立三路线调和主义的积极分子，他们占列席总人数的多数。第二，四中全会的举行，除上述诸分子之外，中央对其他被召列席的坚决反立三路线与调和主义的中央委员及群众的干部同志是全守秘密的，他们在赴会之前是完全不知道会议的性质及会议内容的，因此引起各列会的群众干部同志的愤怒与严重质问，并一致声明保留其对于紧急会议的意见。第三，会议与讨论时间是非常短促的，全部会议以时间规定仅仅十五小时，每人发言不得十五分钟，因此有些同志因时间限制连第一次发言都没有允许，这完全表现是丝毫没有民主化的包办式的会议。

(八)四中全会是没有解决党的政治上组织上的主要任务并且保证立三派的继续领导

四中全会做了些什么呢？第一，中央政治局在四中全会中，拒绝同志们提议在肃清立三路线实行国际路线原则之下讨论党的总任务及诸项重要工作问题，这些不可再迟延的重要议事日程是被调和主义的政治局始终忽略，认为不足轻重的和不需要的。第二，十一月二十五日补充决议明明是用调和主义的观点说“三中全会一般的接受了国际路线”，但是四中全会不敢明白指出，反说“二十五日决议又向国际路线走了一步”（紧急通告已宣布废除三中全会及二十五日决议，四中全会连这一点都不肯承认）。第三，及九十六号通告，中央站在离开领导的立场，只是消极的承认错误，忘却了目前党的迫切的紧急实际任务，同时在分析立三主义来源上，在指出反立三路线的斗争就是两条战线的斗争上，在估量立三路线与调和主义等等地方，都犯着严重的原则上的错误（理由可参阅一月一日全总党团对紧急通告的决议）。这些错误都是从调和主义来的，但是四中全会对于九十六号通告却认为完全站在国际路线的基础上是正确的。第四，正因为上述这些原故，所以四中全会对于三中全会的调和主义及组织路线实际上是赞助的，在决议案中虽然表示过要取消三中全会的补选，但结果三中全会的补选除贺昌罗迈之外其余多数立三路线调和主义的分子更加了一重保证，并且在四中全会上公开拥护立三路线调和主义的积极分子，把最高指



导机关的中央解释成为教育错误同志，试验那些几年来从陈独秀到现在一贯的机会主义分子的地方，因此周恩来向忠发项英任弼时等仍旧继续中央政治局的领导，李立三瞿秋白仍使其隐藏中央委员会之内，对于毫无工作经验同样犯有立三路线错误的陈绍禹等，使其加入政治局负领导重责。第五，在会场上很明显的中央政治局及其从属的上层机关调和主义分子的主张是一方面，坚决反立三路线的中央委员及下层群众干部尤其工人干部的意见是另一方面（几乎没有一个例外）。中央是有计划的指定列席成分造成自己的多数，实际取消会场的民主，垄断选举，并加反对者以种种罪名（如“反国际”“右倾”“取消派”“暗探”“小组织倾向”“无原则的派别纠纷”等等）。

（九）反对四中全会，要求在共产国际正确领导之下召集紧急会议

四中全会的结果，政治上是调和主义的继续，我们认为不是国际路线而是米夫曲解国际路线，并且米夫自己站在派别观念上故意制造派别，造成党的纠纷。这里更明显的是组织上的立三主义一贯组织路线（家长制度命令主义）变本加厉的继续发展，虽然表面上引进了一部分工人同志，但实质上仍继续着小资产阶级书生的领导（如周恩来陈绍禹等）。四中全会是助长立三路线调和主义的发展（如九十七号通告充满了立三路线及调和主义精神），是比三中全会更可耻的会议，实际阻碍了国际路线的正确执行及反立三路线运动的进行。因此我们应站在国际正确路线领导之下立即推翻它的全部决议，向共产国际建议立即撤换负四中全会主要错误责任的米夫，并号召全党同志为召集自下而上的紧急会议而奋斗，要求国际重派正确的代表领导坚决反立三路线调和主义的中央委员，成立临时中央，主持全国紧急会议，解决党的政治上组织上的迫切问题。只有在紧急会议中产生新的中央，由他召集和主持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才能保证第七次大会的真正胜利。我们反对四中全会产出的调和主义的中央的领导，反对他们召集和包办的第七次全国大会。

（十）拥护共产国际，要求撤换负四中全会主要错误责任的米夫

现在立三派及投降分子陈绍禹等小组织是到处继续造谣诬蔑恐吓欺骗那些积极反立三路线反四中全会的同志，他们最主要的借口便是说“四中全会是国际领导的，反四中全会便是反国际”。这种说法正如李立三及其党徒在三中全会时对于当时反对三中全会同志的诬蔑同一口吻。我们知道当时国际代表领导三中全会犯有错误，他曾经反对“把立三路线和国际路线对立”，又说“党的路线与国际路线相适合的，从来没有两条路线”（引语见远东局代表致三中全会的信）。我们是曾经反抗过这种错误的，并且现在已经证明我们这种反抗正是为忠实国际路线而斗争。这次米夫领导的四中全会是本其在六次大会时附和右派布哈林调和主义的立场及其私人派别的成见，完全抹杀党员群众的意见，重复着做出严重错误，显然是违反共产国际的原则，这是毫无疑问的。因此只有坚决的要求国际撤换他的职务，纠正他的错误，才能使肃清立三路线执行国际路线的障碍彻底铲除。

（十一）号召全团的同志为反四中全会召集紧急会议而奋斗

立三主义取消了团的组织，是青年运动的极大障碍，立三主义在团里面还有很深厚的基础，团的中央是顺从着党的中央系统地做着错误。因此在反对四中全会力争紧急会议的运动中，党的同志必须领导团的同志，赞助团的同志在少共国际正确指导之下，从下而上的召集紧急会议，实行向团中央的立三主义调和主义作无情的斗争，解决团的路线问题与组织问题。

（十二）反对斗争中的不正确倾向

我们要在思想上组织上实际工作上坚决反对立三路线调和主义到底，并且要时时注意站稳布尔塞维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坚决的正确的作两条战线的斗争，与一切不正确的倾向奋斗，尤其是反对党内最主要的右倾危险，反对托陈取消派分子乘机混进党内活动的阴谋，反对李立三及陈绍禹等小组织的活动，并且要在不断的以正确的澈底的自我批评来检查立三路线长期统治下全党在各方面工作中及思想上工作方法上所犯的一切错误，同时要在加紧实际工作中去坚决反立三路线调和主义，以完成国际路线所指示给我们的迫切任务。

## 附录二：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文件（四份）

### （1）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致共产国际信

共产国际中央执行委员会：

中国共产党自从瞿李两次执行左倾错误路线以来，中国革命遭受重大损失，党的元气大伤。最近国际来信，加以批评，全体党员深怀感奋，群起纠错，誓把党的长期以来的错误路线纳入正轨，争取在不久的时间迎接新的大革命高潮！

最近米乎奉命来到上海，全党怀有希望，实行改弦更张，把三年以来一错再错的政治路线一举肃清。但是米乎存心践踏党章，以便私图，悍然召集四中全会，非法成立临时中央，实行篡党夺权。临时中央是纠合向忠发等人组成的，它的政治路线是左之由左极端错误的路线，与当前中国实际完全脱节，对中国革命具有严重的危害的路线。临时中央本身是一个宗派集团，米乎到上海后，实行招降纳叛，纠合向忠发等少数人成立篡党的非法中央。临时中央的组织路线是任用匪人，排挤真正革命老干部，自成帮派，在党内实行残酷斗争与无情打击，把一个无产阶级革命队伍，弄得四分五裂。

基于以上临时中央在政治与组织方面所造成的严重错误路线，中共全体党员，纷纷起来抵制，予以严正批评，这是符合党章的正当做法。不料米乎等恼羞成怒，不顾一切，倒行逆施，对党内采取恐怖政策，开除大批六大中委，篡夺全总，自上至下，成立非法御用的党与工会机关。米乎这种种行径，假冒国际路线，其实完全与阶级敌人无异，极端反动！罪大恶极，党史上所罕见。当时六大绝大多数中央委员，齐集上海，眼看临中倒行逆施，党组织遭到摧残，

党员人身自由毫无保障。面临党与革命严重危机，事态非常，义愤填膺，忍无可忍，代表广大党员的意志成立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对临时中央予以有力抵制，实行运用群众力量，自下而上，保卫党的组织，挽救革命危机，以期把中国革命进程重新纳入正确的轨道。

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成立以来，代行六大中央职权。我们的斗争是正义的、神圣的、最高原则的斗争，我们十年以来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坚决与阶级敌人进行不妥协的斗争，我们誓把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进行到底。为了完成上述历史的神圣任务，我们代表中国支部及全体党员向共产国际中央执行委员会公开申述自己的政治观点，并郑重提出以下要求：

1. 国际对东方部在中国革命问题上所犯的必须承担责任。
2. 迅速撤换米孚，收回成命，解散非法成立的临时中央，宣布临时中央一切公布文件无效。
3. 迅速派公正人员查明四中全会事件经过，对肇事人员予以纪律制裁，以肃党纪。
4. 召集紧急会议，解决当前党的政治路线与组织方面的问题。
5. 筹备第七次党的代表大会，根本解决一切有关中国革命政策上的重大问题。

中共是共产国际最大的支部，艰难缔造，牺牲浩大，国际对于中国大革命经验与教训应予以尊重，如果低贬兄弟党的成就，视同草莽，任意加以亵渎，这就不啻违反国际主义原则，违背列宁的遗教，损害革命，这是令人遗憾的事。

我们站在国际主义庄严的立场上，我们提出忠告，希望国际郑重考虑此举失当，悬崖勒马，翻然改图，采取有效措施，制止东方部一切非法行动，则亡羊补牢，犹未为晚，国际共产主义事业光辉日新乃指顾问事。否则中国革命必因此受到严重打击，影响所及国际其它支部纷纷效尤，则国际本身亦失其存在基础而趋于瓦解，自召毁灭，这就为亲者所痛，仇者所快。

以上所云多质语，为世界革命前途起见，我们责任所在不容缄默，敢进忠言，诸希谅解。

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

## (2) 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告全党同志书

中国共产党全体同志：

我们的党自一九二一年成立到现在整整十年了，在这十年期间全体党员为中国劳动人民解放事业、为人类远大理想而斗争，作出过重大贡献，取得了辉煌成就。我们党的历史具有“二七”斗争的光荣传统，是非常伟大与光辉的。

自从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革命事业虽然暂时遭受到挫折，但全体党员万众一心，精诚团结，奋勇前进，所向无前，远景和前途是非常光明的。遥瞻革命新高潮重临，是为期不远的。不料最近党内竟发生了一桩意外不幸的事变！

一九三〇年十二月东方部米孚突然来到上海，自称奉命召开四中全会，他在四中全会上运用一切阴谋诡计与非法手段，实行篡党夺权，成立了一个御用的临时中央。他发号施令推行一条比过去瞿李更左的错误路线。同时在组织方面采取东方大学宗派统治，排斥真正革命同志，纠合工贼、流氓、政治骗子等组成帮派集团，统治全党，发动党内残酷斗争。

综观米孚行为极端卑鄙无耻，临时中央一伙党羽均属革命败类份子，他们互相勾结，互相利用，对全党发起进攻，自称左派，诬人为右，全党人人自危，使革命事业遭受严重破坏。一切革命斗争工作陷于停顿状态，岌岌可危！他们倒行逆施，激起全体党员的义愤，一致奋起申讨，以期力挽狂流，拯救垂危的革命事业。

中共六届中央绝大多数中央委员与监察委员，共同集会于上海，商讨拯救党与革命的对策，以应付非常事变局势，乃一致决定组成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号召全党同志奋起反击，坚决与篡党份子作不妥协的斗争！誓把米孚王明等对党猖狂进攻给以坚决的打击！这场激烈斗争正在开展之中。

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现对全体党员庄严宣告，这是一场保护党章，捍卫六大中央路线与维护中国革命利益的神圣斗争！号召全党同志积极参加，与篡党、分裂党的份子的临时中央作针锋相对的坚决斗争，并把这一斗争，进行到底！

中共中央非委认为这样做是完全必要，是符合党章，顺应全体党员意志的合理决策，特别是从革命长远利益出发，应该这样做，舍此以外再找不出其它合适的办法。中央非常委员会殷切期望全党同志共同奋斗，完成这个历史上的神圣革命任务！

勇敢的斗争，必须建立在明智的革命理智上面，先有革命的理智，然后才发生大无畏的革命行动。于此，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向全体同志倡议：

全党同志应该明白认识反击米孚、王明等奸徒所组成的临时中央，是当前一场大是大非的原则性斗争，是救党与毁党的斗争，是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如果临时中央一切阴谋得逞的话，中共党组织即当面临毁灭的危机，中国革命必招致严重的损害，中国人民的灾难更因此延长岁月，蒙受更多、更深的苦难！我们意识到反击临时中央的斗争如能及早动手，及时完成，那么党与革命的损失程度就可以大形减少，因此全党同志应从革命远处着眼，一致奋起挽救革命危机，一切临难苟安，以期幸免，都是不应该，也是行不通的。

我们深信：坚持真理战胜邪恶是无产阶级革命本色，全党同志对于王、博篡党，除奸纠谬，人人有责，义不容辞，对他们罪恶容忍就是对革命不负责任。现在正是关键时刻，稍纵即逝，如不急起直追，扑灭他们的凶焰，以后他们的

恶势力就要坐大，断送整个革命，那就后悔无及了。

全党同志还应该明白：米乎王明等在党内明目张胆，非法建立党内宗派统治，这就意味着在党内实行独裁专政，唯我独尊、为命令主义、惩办制度、残酷斗争取得合法地位。这是旧社会军阀、官吏、工贼、流氓、恶霸等作风的残余积习，是破坏无产阶级政党的优良传统，导致党走向瓦解的道路，为一切野心家篡党夺权开辟道路。因此反击米、王也就是为未来消除党的隐患。

在反击米乎、王明篡党集团斗争中，每个同志应明辩是非，勇敢参加，对于他们危害党与破坏革命的作用不能过低估计，过低估计就会不堪收拾，酿成全党的空前灾难。因此应该及时肃清那些消极情绪和不健康的思想，如明哲保身、隐忍持重、瞻前顾后、苟且偷安种种懦夫思想，姑息养奸、助长后患，这都是政治认识不足的缘故。

最后，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希望全体党员注意进行下列各项工作：

1. 各支部根据非委“提纲”通告文件内容开展全党讨论，讨论时要结合实际工作，以实际革命行动为表率批判米、王集团，从理论到实践方面的一切反革命罪行，揭露他们假布尔什维克的面具，加强保卫党与工农革命组织的利益和威信。态度要光明，行动要切实。

2. 无数事实证明：米、王一伙原属反动政客、残渣余孽（反动的国民党、国家主义派混合组织），他们本身既不懂革命理论，不知革命为何物，又毫无革命实践，只是作为东方部奸人厮养走卒，纠集败类进行篡党夺权。米、王所羽翼的临时中央所标榜的国际政治路线，是破坏党组织与危害革命的反动路线，应该根据六大路线予以摧陷廓清，勿使谬种流传，并肃清其影响以教育群众。

3. 在任何重大革命斗争中毋庸讳言：一方面有坚持正义的大多数同志，但同时也有少数不明革命大义的人徘徊瞻顾，观望不前。他们在东方部威之下，一时见理不清，盲从附和，非委殷切期待他们参加支部学习讨论，一旦改正错误，醒悟过来，积极参加反击米、王集团，共同奋斗。各支部对他们应耐心劝导，尽力说服，不要轻率采取组织手段。

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  
一九三一年  
签名 文虎 史文彬

(3) 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致中共各苏区信

中共江西中央苏区  
中共赣东北苏区  
中共豫鄂皖苏区

中共湘鄂西苏区

中共陕北苏区

中共东北苏区

全体同志均鉴：

前次送给你们的中央非常委员会公布的反四中全会提纲，告全党同志书等文件谅已收到。

此次国际东方部米乎来到中国，在四中全会上实行弃髦党章，篡党夺权，成立非法的临时中央，乃中共党史上违法乱纪的严重事变，全党同志都应一致奋起予以坚决抵制，实行纠正，这样才能保卫党的生存，保卫中国革命，对无数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艰难缔造的社会主义伟大理想与事业作出贡献。

米乎与王明、博古、向忠发等罪行包天，悍然违背全体党员的意志，践踏党章，实行篡党夺权，成立非法的临时中央，这次事变决不是偶然发生的，乃是东方部长期漠视中国支部与中国革命的罪恶作风所酿成。临时中央的政治路线是继承瞿李路线的左上加左的错误路线。临时中央的组织路线更是荒谬绝伦的，他们公然提出在党内进行残酷斗争与无情打击，实现其毁灭党与破坏中国革命的滔天罪行。

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面临当前我党与中国革命的空前危机，鉴于革命大义所在，旗帜鲜明、挺身而出，号召全党起来坚决与米乎、王、向一伙作不妥协的斗争。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认为目前反临中的斗争是事关党与革命成败的正义的斗争，是神圣的、伟大原则的斗争，凡属中共党员都有义务和权利为党与革命利益义无反顾、奋斗到底！

中共各苏区全体党员长期以来艰苦卓绝，奋勇作战，为中国革命斗争开辟广阔地区，作出了重大贡献。你们过去对瞿、李、向的错误路线身受其害，痛定思痛，记忆犹新，对于危害性更严重的临中错误路线，深恶痛绝，继续抵制，自不待言。

为了向临时中央一切非法行为共同一致采取坚决行动，我们向你们郑重倡议，并公开宣布以下各点：

1. 各苏区全党各支部应自即日起动员起来，对临时中央的非法行动全体一致声讨，彻底揭露他们反马克思主义、冒牌布尔什维克的篡党夺权的罪恶实质，破坏中国革命的巨大危害性。

2. 在共青团、工会、农会、妇联及其他革命群众组织中严厉制止临时中央的一切破坏活动。

3. 全党支部在中央非常委员会继续领导下，对于与反革命政府斗争、与黄色工会斗争、与改良主义斗争的日常工作应密切关注，勇敢进行，争取不断的胜利。

4. 应禁止米、王死党进入苏区，藉口“反右运动”，进行对红军、苏维埃政权实行捣乱破坏。

5. 米孚、王明、向忠发等罪行重大，如派人窜入苏区，对首恶应加以处理制止，以平民愤，其它协从份子可以从宽。对于东大支部所排挤的同志回国后进入苏区应一视同仁，予以保护，对于临时中央所取的残酷斗争办法应立予取缔，以保革命元气。

总之，在各苏区对于篡党夺权的临中反革命份子，一定要本除恶务尽的精神，彻底加以廓清，否则养痍遗患，滋蔓难图，今后一定会为苏区带来更大的灾难。

最后，我们严正声明，殷切希望在湘赣、赣东北、赣南、闽西、湘鄂西、鄂豫皖、左右江、陕西甘肃等苏区党组织，应广泛开展反米孚、王明路线及其御用组织临时中央的斗争。

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

#### (4) 史文彬等给东方部信

东方部诸位同志：

最近米孚指使王明、向忠发等成立了一个临时中央，他们在中国为非作歹，破坏中国革命，已闹了不少日子了。你们装聋作哑，不闻不问，实在大不应该。我们现在特别提醒你们一下，促使你们注意！

临中成立以后，到处与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为敌，他们的反革命行动与过去国民党工贼谏小岑、马超俊等反动行为完全一样，对于中国革命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实在令人恼火，令人痛恨。因此，我们向东方部建议，应立即命令临时中央停止内战，约束米孚、王明、向忠发等改邪归正，停止一切破坏党与革命的活动。组织问题留待七大会解决。

你们如果能照办，还可以取得中共全党同志的谅解，中国人民的宽恕，你们如继续包庇他们，不闻不问的话，有朝一日，中共就会受到灾殃，东方部也会垮台，共产国际便呆不住了。你们更会受到全世界革命阵营的谴责，无以自解！

希望你们好好考虑一番，采取果断行动，迅速改正错误，一好百好，不要替共产国际丢脸！

此致  
共产主义革命的敬礼！

国际中国支部  
史文彬 朱宝廷 陈郁  
唐鸿景 孙云鹏 王仲一

张青山等五十三人

一九三一年

#### 附录三：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通信选（五份）<sup>1</sup>

##### （一）许炳良等给陈郁信<sup>2</sup>

陈郁同志：

来信阅悉，深为遗憾！

此次海总同志全体积极参加抗击米孚、王、博的斗争，你当初在四中全会也能分辨是非，见义勇为，全党同志无不表示赞扬。不料在双方决胜关键时刻，你忽见利忘义，临阵脱走，你信中所谈个人被迫，求谅苦衷，大家认为都是枝节小事，不成理由。难道一个真正革命的共产主义战士，忘掉阶级利害，专为自己打小算盘的肮脏想法能得到同志们的谅解吗？非委中央认为你这种附逆行为是完全不对的。你一念之差不仅丢尽工人阶级的体面，有（没）面见海员同志，并且还遗误自己一生名誉。嘎样多人都为你可惜呵！希望你能接受各支部的善意劝告，好好考虑，排除满脑糊涂思想，迅速回到海总工作。（下略）<sup>3</sup>

许炳良 谭寿林 马骥  
朱宝亭等同启

##### （二）罗章龙致张国焘信

特立兄：

莫京分袂，三易寒暑，良以为怀。其间虽数承赐书，亦甚少报命，此乃由于中央事务丛脞，阿苏、阿湃<sup>4</sup>先后谢世，诸事独立撑持，心力交瘁，所以不常写信，诸祈谅宥。

兄此番生入国门，屈而复伸，公私属望，大慰平生，允宜及时努力为革命多所建树。特别在端正我党政治路线与巩固党的组织方面，多所努力，务能作出更多贡献。俾革命早日完成，中国人民获得彻底解放。

昨夕<sup>5</sup>来晤，谈及近况并出示刊布诸论文，阅览之余，足见“桀犬吠尧”

<sup>1</sup> 前四份根据抄件录入，按初步判定时间顺序排；后一份根据罗章龙遗存手迹整理。— 补注

<sup>2</sup> 当时，陈郁为全总领导成员兼海总负责人，参加了反四中全会的活动，当选非委的中央委员，后经周恩来做工作，转变态度拥护四中全会，向非委和海总“请假”，众人遂有此信。— 补注

<sup>3</sup> 为原抄件所略。— 补注

<sup>4</sup> 阿苏、阿湃，即苏兆征、彭湃。— 补注

<sup>5</sup> 子夕，即杨子烈，张国焘夫人。— 补注

各为其主，“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何足为异？临时中央问题时至今日，是非真伪，真象已经大白，非委所争在为革命正义与真理，苟利于党与革命，个人成败利钝在所不计。于此可知非委反击东方部并非门户之见与意气之争，乃纯为革命正义，千秋是非与共产党员风格，不得不如此做去。

兄本吾党旧人，如果随波逐流，寄人篱下，局促如辕下驹，昔勇今怯，岂不大违初衷，更为同志所耻笑？此间同人希望兄毅然决然，振作一番，踔厉奋发，反戈一击，肃清内奸，以建奇勋，万勿徘徊歧路，因循自误，功魁祸首，在此须臾！望深思熟虑，审慎出处勿稍瞻顾，择善而从，救党所以自救，免遗后人话柄。

忝叨末谊，语出至诚，知我罪我，幸赐明察。附寄各文，请阅后转发。

郑芹瑞、钱伯符、曾中圣、徐朋云诸同志均属革命英才，应加垂青，予以爱护，使各展所长，不宜随便弃置，投诸闲散之地。

此致

敬礼！

文 手泐

一九三一年

### (三) 罗章龙、王仲一致贺龙、贺锦斋信<sup>1</sup>

云卿、锦斋同志：

湘鄂西出席苏维会代表团已会毕返原防驻地，此间近日情况当由他们当面转达，一切请按非委“提纲”施行。

回忆武昌夜话，申江共栖，旧事历历，如在眼前。国事多艰，革命道路上荆棘横生，两兄转战湘鄂西线，生活极度困难，唯赖鼎力撑持，不偏不倚，前途希望大好！迈伯<sup>2</sup>西来，可分任劳苦，希遇事推诚相与携手前进，共摧强敌，持之以恒，锲而勿舍，行见大革命高潮，重临乡土，他日会师江汉，非异人任也。

率布所怀，诸维心照！

文 虎

仲 一泐

### (四) 罗章龙、刘鄩致夏曦信<sup>3</sup>

梦白兄：

1 王仲一在大革命时期曾任贺部党代表。— 补注

2 迈伯，即夏曦。— 补注

3 刘鄩，又作刘炎，罗章龙夫人，与夏曦同乡同学。— 补注

一别四年，石庐见访，倾谈竟日，非委提纲已蒙理解，良慰于怀。闻大旆西行，已达军前，军务倥匆，想指挥若定，诸事咸宜，至以为祝！云卿、锦斋处已专函致意，见面时可与其恺切一谈。德昌<sup>1</sup>为人极为明白通达，智勇兼资，缓急可以相助。

兄本新民旧侣，患难相从，历有年岁。惟在出国学习期间，所友不端，良因一念之差，遂遗白圭之玷。现在矮帮<sup>2</sup>日暮途穷，倒行逆施，流毒全党，祸国殃民，罪恶昭彰，人所共晓，从之者势成骑虎，欲罢不能，度兄处境，亦类于此！

然闻诸古语：识时务者为俊杰，以兄之明，岂见不及此？今日之事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倘能悬崖勒马，挥兵靖难，拨乱反正，亦易如反掌，全党利赖，功垂百世有后望焉。

兹遣芝圃<sup>3</sup>前来，面陈一是，并共商进止，诸祈照察不宣。

文 鄩

### (五) 罗章龙致毛泽东信（残件）<sup>4</sup>

第一件：

报润书<sup>5</sup>

三使刘……陈……萧……<sup>6</sup>

送脚疮药收到否？<sup>7</sup>

……<sup>8</sup>

但以上所云，决非意气用事，只要合理解决，愿束身司败。

润兄批评一切鸡虫得失小节决不预闻个人恩怨门户之私。

瞻之在前，形势有好转，希望大有可为。

弟况一切粗安，毋以为念。

1 德昌，即段德昌。— 补注

2 矮帮，指王明集团（王个子矮小）。— 补注

3 芝圃，即张昆弟，后在夏曦主持的湘鄂西苏区肃反中被杀，罪名为“罗章龙份子”。— 补注

4 在罗章龙遗存件中，有他晚年回忆当年致毛信要点的手迹，录入整理。— 补注

5 润，即润之（毛泽东字）。— 补注

6 三使，为毛泽东从闽赣根据地先后派往上海的三位使者，刘即刘士奇，陈即陈毅，萧即萧道德。罗章龙曾接待他们，听取了当地情况的介绍。萧道德还随罗章龙参加了反四中全会的会议、签名上书等活动，返回毛泽东身边后的情况不详。— 补注

7 毛患足病，参见杨开慧《偶感》诗：“足疾已否痊”。— 补注

8 此处所略内容，可参见“第二件”。— 补注

第二件<sup>1</sup>：

……自明的。

如果说当时作为堂堂之党，正正之旗的中共中央及全党，对此竟万马齐喑，无声，不加评论，不加抨击，不仅宁非咄咄怪事！如果是这样下去，不仅是中国革命蒙上奇耻大辱，而且足以证明全党无人了！这难道是无轻重的小事可以坐视不理吗？！

对革命忠心耿耿，疾恶如仇，是党的中流砥柱。对此小撮坏人篡夺行径，毁党叛革命奸谋，如何对策，消除隐患，兄想已胸中有成竹，妥善之有素，必有妥善方略以继其后。万望剑及履及，奋起反击，树之风声则群小慑服，全体党员闻风响应，王博奸谋必难得逞。

匆率布礼，不尽欲宣。

学弟<sup>2</sup>

1 原件无收信人信息，根据内容判断，可能与毛泽东有关。— 补注

2 原件无署名。— 补注

### 三十七、米夫策动残酷斗争祸延全党， 断送中国革命

米夫及四中全会错误路线经过花园会议严厉批评以后，米夫等恼羞成怒，临时中央立即宣布采用残酷斗争方法消灭非常委员会，并决定用一切比对待敌人更恶毒的方法打击非常委员会的负责人及其各级组织。其结果是祸延全党，并深切危害革命群众组织，断送当前的中国革命。

#### 一、残酷斗争的理论和实践

1. 临中残酷斗争的起源 党内残酷斗争，文献无征，乃从东方部输入的新事物。最先始于瞿秋白，但瞿尚不敢公开提出宣传。向忠发、李立三窃位后，乃明白提出“党内斗争，你死我活”的口号。实际上是在宣传残酷斗争，并且做得很露骨。他们把一些干部排挤出革命队伍，送入监狱，不加营救，听其自毙，同时对其他持异议的同志乱扣帽子，实行“惩办主义”、“一言堂”等工作作风。王明、博古等又把东大支部党内斗争手法继续大规模搬到中国来，明白无忌地提出党内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口号，认为这是毁人成己，出奇制胜的唯一办法。

本节所述临中残酷斗争经历全程，也就是叙述王、博篡党集团先后对党施行空前大破坏与危害中国革命的种种罪行。

当临中成立之初，认为篡党工作即告完成，后来由于客观迫切需要，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成立乃给予临中以有力反击，王博集团大起恐慌。此际临中党员人数寥寥无几，群众组织全无基础，对目前革命工作一筹莫展，自觉难于鬼混下去，于是对非常委员会因嫉生恨，乃计划掀起一个全面毁党的残酷斗争高潮，企图苟延残喘，勉度难关。他们由国际东方部搬来一套残酷斗争经验，加上中国军阀、政客、工

贼、流氓组织的固有传统，凑成了一套古今中外高度结合的火并夺权办法。

2. 残斗理论 在临中一次会议上，大家正愁眉不展，面面相觑的时候，国际代表米夫发言说：“当前所有重要问题是个组织问题，现在可先从理论上加以分析。目前非委组织力量远远超过临中之上，非委组织能力也较强，这是事实，必须承认。在这个事实前面，要面对现实，研究对策，这就首先要按步骤进行考虑。”他认为：“第一步要求敌我双方力量平衡化，然后进一步才能压倒对方。”在实现临中要求敌我双方力量对比变化中，他认为：“首先是削弱对方力量（不管与非委双方力量对比变化中，他认为：“首先是削弱对方力量（不管采取甚么方法都可以，任务是使对方力量逐渐削弱与降低，这就意味着临中力量增大。”因此他主张“用尽一切力量打击对方，然后临中才能站住脚跟，进一步消灭非委。”根据这个理论，他们拟定下一个残酷斗争的作战计划：“原则是大幅度消灭非委力量（党与群众组织的力量）。应该为目的不择手段，越快越好，越彻底越好！这就是目前压倒一切的任务。”

3. 残斗方略 临中认为：如果按照正常工作途径，双方自由竞赛去获得双方力量平衡，这就是绝对办不到的，也是毫无希望的。因此只有通过采取一种特殊方法才能消灭对方的有生力量，这就是掀起大规模的残酷斗争高潮，才能把非委组织给以完全歼灭与彻底歼灭，把他们收拾干净！才是一劳永逸的做法。

关于消灭非委实际措施，临中提出了许多毒辣的办法。首先是利用南京的强大军警特务力量，对党内进行斗争，比较省力。办法是秘密向南京联系，提供情报，借南京敌方力量来消灭党内敌人。这样做，可收事半功倍之效。在蒋介石政权以外的地方，同理也可以运用上述办法向各地方军阀（冯、阎、张、粤、桂等军阀）秘密联系，也可以通过国民党各派系、各工贼、各反省院份子，第三党等，假藉他们之手，实行对非委进行围剿。这个方略，临中称之为“杀人不见血”。于上项办法外，为了扩大战果，临中认为应组织地下武装力量，实行恐怖手段，就是说临中如果认为必要时也可以采取直接行动，消灭非委组织与个人。理由是临中对非委内部比较了解，在行动时也比较便利了。

上述计划已定，便用全力去争取实现计划，限期完成。经过充分设计与筹备以后，临中自书记向忠发起，全体动员，去贯彻工作。首先从上海地区非委组织着手破坏，取得相当经验后，再行在全国推广。其次是在北方非委集中地——北京、天津、青岛、东北、内蒙等处，从事大规模破坏北方非委的组织活动，掀起了一个毁党高潮。临中号召在残斗工作过程中，必须用全力造成强大的宣传攻势，同时采取无

情打击的组织手段。

4. 宣传攻势 在实施残酷斗争计划中，临中规定全力造成强大的宣传攻势，宣传攻势主要内容是一大堆杂乱无章的行动口号，包括：“绝对服从国际路线”，“右倾是主要危险”，“反对严重右倾和一贯右倾”，“反对富农路线”，“反对中间阶层”，“反红军军阀作风”，“反枪杆子主义”，“做驯服工具”，“更加布尔什维克化”（在东大二十八布基础上）等等。临中运用谣言攻势，不惜诬赖栽赃，颠倒历史事实，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旨在把“异己份子”打成“反革命、反党、反苏、反共、反国际”，“特务份子”、“托派”、“日本汉奸”等等（见一九三一年一月二十六日开除中委决议）。

在发动宣传攻势时，临中是在党内刊物上连篇累牍，刊载又长又臭，毫无事实根据的文章，用谣言攻势制造党内舆论。王明为此单独刊行一种小册子在党内党外大量发行。又用各种形式公开党内斗争内幕，在群众中大肆宣扬，不惜把党的机密泄露出去，予敌方以可乘之机。临中同时派人到北方、南方、各省市召开党内斗争宣传会议，刘亲到华北参加北方会议，又到东北召集同样会议，大张旗鼓，大扬声势，大造舆论。

非委成立以后，临中即放出多种毒氛以掩饰他们自己的罪行。用大量空洞无内容的文章说非委是反马列主义、反国际路线。说非委反对临中即反党、分裂党。又随便把叛党、特务、反苏区、反红军、托派等等强加在别人头上。按他们的判断，如果有一于此，便是罪该万死！满门抄斩，家属联坐！临中群丑们深深懂得，谎话多遍变成真理，“众口烁金”、“积非胜是”的官僚哲学，所以认为谣言讹词可以从心所欲，解决一切问题。他们在组织手段处理方面对党内不同己见的人强调“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不讲客气”，“不要手软”，“一不做、二不休”，“彻底肃清”，“肉体消灭”等精神来创造残酷斗争高潮！

5. 无情打击 继此之后，对党员同志就是实行无情打击，主要是采取组织手段，对于六大中央委员，原则上规定凡属参加非委各级组织者，一律开除党籍，不得申诉。临中事先作成黑名单一份，罗列反对四中全会中委及地方干部共三百余人，分批采取组织处理，一律开除党籍（刘建议永远开除），但对外不公开。后因参加非委反对四中全会人数过多，处理不胜其繁，规定凡参加非委中央及地方基层非常委员会人员，一律自动失去党籍，作为“锄奸”对象。

临中又决定对于采取组织手段处理者一律视同敌人，得进一步采取特务手段消灭之。所称特务手段，包括查抄、秘密逮捕、暗杀、向敌告密、狱中派人指证等等方式机动执行。这样，全党在无情打击不断发展中，闹得人人自危，一夕数惊，加上国民党白色恐怖交织起来，于是引起肃反扩大化，特务人员到处兴风作浪，深文周纳，故入人罪。

这样造成屠杀遍地，冤狱充满，暗无天日！

6. 残酷斗争事例与过程 残斗方式可分为隐藏与公开两种方式进行。前者是不出头露面，由特务人员暗中策划，从事政治陷害，栽赃架诬等，其中最有效的方式主要是借刀杀人，如向反动政治官方告密，此种方式诡谲多端，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藉此消灭异己，歼灭他派组织力量。但有时又采取公开与秘密两种方式混合运用。总说一句，就是不拘一式，为目的不择手段！

上次花园会议虽然奸宄落魄，当时不敢公然逞凶，但从石路宾馆对话却机锋毕露。由此并可以见到四中全会临时中央在东方部指使下，其隐藏的杀机是随时可以爆发的。为了对付非常委员会起见，他们经过密室策划，随即付诸实际行动，于是党内残酷斗争在全党范围内开展起来。这个以米夫为领导，发动全国范围党内大规模一系列的残酷斗争延长达五年以上！临时中央残斗过程始于王明告密，中间经过上海龙华惨案，临时中央书记向忠发等倾巢投敌，中共南北方惨案，临时中央推动全国反省高潮等具体事例。这些案件大都由米夫所属临时中央设计导演，幕后策动，其具体执行者主要为王博集团向忠发等。这样上下配合，残酷斗争遂蔓延全党与全国，造成不堪收拾的局面。后来竟使全党白区组织瓦解，丧失百分之百，苏区损兵失地百分之九十五，被迫长征。最后米夫本人亦告败亡！

## 二、一马当先，王明告密

关于王博集团对军警告密渊源颇远，非一朝一夕使然。先是潘闻宥在上海被捕，潘是东大学生，回国后任向忠发秘书，经常代写文章刊在《红旗》发表，向因此自诩为东方革命理论大师，对潘十分重用。潘后即投敌，尽力追捕党内“异己”同志，向忠发暗自得计，深秘其事。随后王明亦被拘，向工部局警长把《红旗》办公处向敌告密，以求宽释。时李求实因住在《红旗》报机关，敌警按地址搜查时，李几被捕，幸机警得脱险，出外暂避，红旗报因此搬迁。当时王向敌方吹嘘自己身份，愿报效自贖，敌方允许，并由王向捕房保证以后继续效劳报答。

王明告密事违反党章第二十六条规定，理应开除党籍。但向忠发奉令严守秘密，禁止传播。后李求实在江苏省委谈到此事，党内传播不脛而走，同志大哗，各支部纷纷提出建议，要求严肃处理，按党章应开除党籍。王明恐慌万状，急电东方部求解救，东方部来电诤称候查明处理，其实是藉此推拖过去。后来米夫亲来上海，坚持国际有令，应从轻处理，问题遂无限期拖延下去，久悬不决，四中全会遂以不了了之。王明志得意满，益肆无忌惮。四中全会前，王明博古二人到中央全总工作，全总亦发生警讯，工作同志对二人均感不安，随后便发生中外震惊的龙华惨案。

## 三十八、上海东方饭店事变：

### 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中央委员

#### 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等二十三人蒙难

上海东方饭店事变（亦称龙华惨案）是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极其重大的历史事件，是三十年代中国革命史乘的壮烈诗篇，气壮山河，彪炳日月，其意义伟大，影响深远，照耀千秋，人所共晓！

一、东方事变的起因 东方事变（龙华惨案）是国民党在上海龙华对于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干部二十三人之大屠杀，是中共成立以来党员牺牲人数最多的重大事变。东方事变发生的原因，主要可以从下列两方面去说明。

首先应该指出，自四中全会成立临时中央以后，米夫等对于全国形势感到万分苦闷。因为各地群众工作及组织均属非委范围，临中几乎没有插手余地，他们自认被群众封锁得水泄不通，所以一切正常对敌斗争完全陷于停顿状况。因此他们感到只有对非委加强残酷斗争才是挽救自己的道路。他们虽然表面上标明中央，但下层既无群众，又无组织。他们认为惟有消灭非委才可以接收非委的群众，同时妄想藉此扩大东方部宗派实力。基于上述米陈策略所要求，于是随后就爆发东方事变，实际上就是米夫、王明打击非委策略的实现。

其次应说明上海龙华惨案是在大规模党内残酷斗争以后直接发生的，由于临中党内残酷斗争政策直接削弱了党的一切组织，同时更鼓舞着东大支部不肖党员肆无忌惮为敌作伥，使非委组织处于内外夹攻地位，此种形势下面，敌人乘虚而入，于是龙华惨案随之发生。

二、东方饭店扩大会议 先是花园会议后，求实曾向文虎谈到，为推动江苏上海工作，应积极召开全苏、沪活动份子大会。随后孟雄正式建议举行全苏沪活动份子大会。孟雄最初提出各方参加会议名单为



五十人。当时文虎向求实、孟雄表示，认为在目前环境下不应召开人数过多的大会，最好分区举行。但是孟雄认为目前工作紧急，如分区举行必然要延长会议的日期，影响工作，因此仍坚持召开扩大会议，并计划尽量把开会时间缩短到一天开完。最后非委正式讨论开大会问题及会议程序等事，同意举行大会，不过指示要特别注意安全问题，开会时间要短，会场布置要严密，以防不测。并决定由文虎出席大会作报告传达“纲领”精神，会场具体布置由孟雄、大汉、育南、虞卿四人负责。大会日期定于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七日晚上。开大会前由孟雄主持开了一个预备会，决定下列事项：大会主席由孟雄担任，文虎代表非常委员会中央作政治报告，并决定约请苏准会代表一人作关于苏区工作报告，孟雄与大会主席作关于工作布置的报告。会场借用原苏准会所租之三马路东方饭店房间举行。同时在泥城桥世界旅社准备一个房间，作为必要时迁往开会或代表临时集合的地方。会场外部设警戒哨两重，虞卿负责指挥。开会前半小时，文虎因接见外地同志，改由育南前往作报告。

一月十七日午后二时，江苏省委、上海工联、非常委员会秘书处分别通知会议出席人分途到八仙桥青年会、恩派亚电影院、日升楼茶楼附近等处集合，临时再派人分途引进会场，预定六时整开会，但实际开会时间比预定时间提早二小时举行。

会场内外共计四十六人，除出席人外，尚有负责会场事务、交通、警卫等八人，其中住在会场邻室者三人，担任室外守望，往来巡视，传递消息等事。

会议按预先规定项目进行，会议将结束时，警卫人员发现饭店附近四周情况有异，急往报告虞卿，虞卿立即以紧急情况通知会场主席，嘱大家火速散会。会场主席何孟雄当即吩咐虞卿布置转移工作。虞卿随即退出会场进入邻室，作应变准备。虞卿自己乃伪装为旅馆茶房，从另一梯口转至楼下，以手势密告警卫人员阻止非委会其他人员继续上楼，并接应会场外出同志。虞卿部署毕，乃到泥城桥准备迎接脱险同志。

当孟雄宣布会议结束，布置从会场撤退时，大队英工部局老闸捕房巡捕及中国政府便衣警探五十余名已登楼据守，随即把住会场房门，入室搜查，遂将在会场的全部出席人逮捕，每人先加弹簧手铐，随即搜身，将个人身上所怀钢笔、手帕、眼镜及其他纸片只字搜索无遗（但因事先作准备，所以并未搜到出席名单、会场记录等文件）。随用大号黑色囚车将捕去的二十九人带回老闸房捕房听审，当晚略加审问，即引渡交南市公安局拘留所收监。

**三、非委中央组织营救** 东方饭店事变发生时，文虎正在闸北某缫丝厂出席小组会议，讨论该厂新近提出斗争纲领（按：文虎接见外

地同志后，来到闸北开会）。史文彬从世界旅社回到非委中央办公室，不见文虎，随即跑到闸北将消息通知文虎。文虎与史文彬见面后，立即召开非委中央紧急会议，商讨对策及营救办法，以及有关处理善后诸问题。当即推举三人小组，进行调查与营救，由陈虞卿负责主持小组工作，同时募集现金、衣物送往狱中慰劳。经过调查，查明此次在东方饭店当场被捕者二十九人，临时脱险者为：陈虞卿、宋大方（非委中央秘书，非委军事工作同志）、纪南勋（警卫，制茶厂工人同志）、徐有珍（交通，南通大生纱厂工人同志）、杜芳（江苏非委秘书处）、姜辰英（湘南之夫，沪东五金厂工人同志）、葛官澄（苏北来沪同志）、谢祺（交通，德士古油厂工人同志）等八人。十七日晚与十八日又在他处捕去十二人。

在东方饭店事变发生后，曾由刘鄜将消息通知被捕各人家属，一面设法调查事件发生原因及真相。第三日清晨，育南夫人林真<sup>1</sup>向刘鄜谈：今有老闸捕房工部局某包探头目（包打听）透露消息说：“东方饭店被捕诸人尚押在南市公安局，如速设法可免解往南京。”某包探自称如馈赠办案人相当现金，他愿尽义务奔走效劳。文虎与史文彬共同研究后认为应迅速进行，并多找门路进行，营救狱中诸人出险。即由林真归报其父引陈虞卿与某包探见面。因林岳父与某包探有金兰之谊，某探一力承担斡旋营救育南，其他诸人不能为力。虞卿问某探需用多少钱，某探自称他本人不沾分毫，筹措一千五百元应酬点缀出力人就是。虞卿立即应允某探所提出现款要求，同时并请他帮忙对全案诸人不分彼此进行援救，如果不能全部释放时，就运动减轻处刑，将来对出力人员一律都有报酬，决不空劳。同时并请某探介绍派人前往南市拘留所探监致送食品衣物，某探同意照办。非委根据虞卿交涉情况，决定责成史文彬、刘鄜、林贞等负责筹措现金、衣物，办理营救事宜。并派人到南市探监致送衣物食品等。刘鄜、林贞等立将个人首饰衣物典质变卖，所得现金一千余元全部交作营救费用，并动员家属继续筹款。

**四、狱中来书** 虞卿收到冯铿、育南、孟雄、求实等自监中寄出明密信件。孟雄自狱中遣专人送一信到梧州路104号楚春酒店交陈虞卿（罗章凤化名）。信云：“虞卿先生大鉴：我与南北平同住，现安，惟布店小伙无理纠缠不止，请留意。周五可来人接见，并告贞嫂勿念，江伯英即晨渤。”信中所云南北平即育南、求实，布店小伙即东大二十八布之一的告讦份子。育南自狱中来信给非委，内有二语云：“心平如水，去易留难。”经过两星期积极营救，大家对在狱中同志案情逐渐了解，据估计其中有部分人毫无证据，可望释放。不料事态忽生

<sup>1</sup> 又作林贞 — 编者注

变化，急转直下！全案人员均被解往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法办，使营救工作忽陷于更大困难。

**五、东方事变与临中阴谋内幕** 东方事变是王博临时中央有组织的阴谋策划。陈虞卿主持营救事宜，通过小组织活动及当地党组织与工会大力协助，了解到东方饭店事变发生系向忠发、王、博集团所策划。根据事实证明，临中曾派遣特务三人专门负责办理此事。当时向忠发、顾顺章与王博等密谋定计，亲身参与其事。他们运用手段，企图把江苏省非常委员会人员全部铲除。这样，上海中国与租界军警遂由眼线临中干部唐虞与丁党等引导军警在东方饭店开会地方逮捕江苏省扩大会议出席代表人员。非委经多方调查获悉临中所派遣的特务姓名即唐虞（禹）、丁党（小丁）、王琳英（女）、汪盛荻等临中工作人员。他们原系东大支部归国，奉王博命令及向忠发指示，事先早已对非常委员会进行严密监视，平日跟踪吊线，提供活动情报，掌握了“黑名单”，积有充分材料，这次与敌方采取联合行动，因此很顺利就做出东方饭店的案子。唐虞与潘闻宥为连襟关系，二人均东大支部成员。唐初回国，在中央秘书处，在工作中负责兑换金饰（苏区送来的黄金），时唐从中贪污黄金情弊，因此，王、博令唐改任特务工作，刺探非委活动情报，已非一日，深为王、博所倚重。开会前，王明、向忠发等侦知江苏省委开会时间与地点，嘱唐报告敌方包探，说东方饭店会议乃中共非委最重要会议，非委中央全部负责人均出席会议，时不可失，速往捉人。所以敌方军警采取迅速行动，全副武装，乘大型警车前往东方饭店包围搜捕。这次唐、丁均立了大功。参与此次告密的王博部属还有王琳英、汪盛荻等人。

东方饭店事变发生后，东大支部“布尔什维克”份子王琳英、唐虞等向敌方提供被捕人名册一份，内载何、李、林等二十余人姓名、籍贯、身份、简历、现在职务、住址、面貌特征等等，甚为详尽，敌方按图索骥，并不费事。随后由军法处派员调查核对，经过侦查手续完毕后，曾提审一次。由于王、唐、汪、丁等在临中工作，所以对何、林、李诸人均认识，伪官吩咐，在提审时王、唐、丁等坐帘后一一指证人名与相片。审讯时，伪法官照例询问口供，被询各同志对伪法官提问相约缄口无言，拒不作答。伪官再三追问中共情况，领袖何人？同党姓名与住址？并交代政策立功可赎罪，违抗加罚，大家一律不作回答，坚贞不屈。伪官最后提着名册说：“我们已经调查清楚，你们说与不说都是一样，反正我们都有了材料。”遂宣布停止审问，并判断全案二十三人为正犯，还有首犯等未获。上海警备部据情详报南京军委会办理，南京方面立即批复，决定判处死刑，就地枪决，其余首犯等人等继续通缉归案务获究办。

结案后，敌方对龙华案有功人员分别给予奖赏，以资鼓励。对于王、唐、丁、汪等认为功劳最大，赏赐特优，除现金外，另拨给苏州城内洋房一所及自卫手枪等，汪后任知县。

关于唐虞等告密问题，王明做贼心虚，妄想抵赖，事后假装不知，以推卸责任。王对外宣称，唐是何孟雄的干儿子，此话极为荒唐！何与唐向不相识，且唐年龄比何还长，可见全系捏造，这是掩耳盗铃的手法，自然不足取信。

在二月中旬龙华大屠杀后，临中幸灾乐祸，无以复加。向忠发忻然色喜，告人说：“我们头一炮就打响了，给他们一个措手不及。大家等着，好戏还在后头哩！”顾顺章事后语李梅羹说：“此事我们当时早已知道。”李问：“你们事先何由知道？”顾笑而不语。再问时，顾答道：“这还待问！我们那边谁个不知！这是苦肉计呢！”言外之意，可以推知。后来临中文件公认何等二十三人为反党，为叛徒，公然宣称他们不是烈士，这更可以证明当时临中与南京的暧昧关系。

当时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军法官黄非，日本留学生，学习法律学。上海沦陷后，黄到后方避难，一九三七年转辗至◇◇大学任教，曾为同事道及审讯东方饭店案经过。据黄云：按照往例，上海被捕政治犯通常应解南京，经过审讯，分别处刑。但是此案由于汪盛荻等东大份子向蒋告密，指证案中重要同志真实姓名，蒋因知捕者多属中央非委重要份子，或南北各省非委书记与著名干部。其中且有苏区来沪代表，并有人指林育南为苏准会秘书长。南京伪军委会对林、何、李等二十三人案非常重视，认为他们是中共“实力派”，既然用尽方法，无法争取投降，就只有斩草除根，免留后患。加上临中暗地煽风点火，必欲置诸死地而后快，因此他们就不免陷于绝死了。从这些报告可悉全案内幕及其真相。又事后判明：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工整会、南京公安局、上海英工部局与龙华警备司令部等机关事先在临中内部获得情报后，会前已密切注意非委行动。上述军警的联合行动又与前次王明告密有关云。

**六、龙华二十三人就义** 在审讯过程中，全案拘获四十二人，其中林、何、李等二十三人，经过特务王、唐、丁、汪等指证，判处死刑。其他诸人系外埠同志，由于特务均不认识，未加指证，通过营救俱获省释。二十三人为众所知名者均党与革命的精华。

行刑前夕，敌警备司令部预先在龙华寺旷地上挖掘长壕一处，深五、六米，长三十米。夜深四点，拂晓前时分派兵一连，提出二十三位同志，（首蒙白布）立在壕沿，兵士用机枪从背后扫射，他们纷纷中弹倒下，有身中十数弹者，一片血肉模糊，惨不忍睹。时为二月七日。

东方饭店事变非委牺牲同志名单：林育南，湖北人，中共非委中央委员。何孟雄，湖南人，中共非委中央委员。李求实，湖北人，中共非委中央委员。龙大道，江西人，江苏省非委委员。汤士仁，江苏人，非委江苏省委委员。汤士德，江苏人，非委江苏省委委员。冯铿（女），广东人，非委妇女部。伍仲文（女），江苏人，非委妇女部。王士青，安徽人，北方非委青岛市书记。欧阳立安（杨国华），湖南人，非委团委。柔石，浙江人，非委革文联。胡也频，福建人，非委革文联。殷夫，浙江人，非委革文联。王春熙（女），江苏人，非委江北特委书记。金瀚，江苏人，非委浙江省委。韩宗海，山东人，山东非委常委。章明◇，江苏人，非委无锡县委。费达扶，江苏人，非委杭州县委。赵选英，浙江人，非委温州县委。蔡博真，湖北人，非委海门县委。王冠青，湖北人，非委江苏淞江县委。恽雨棠，浙江人，非委江苏崇明县委。王冠清，安徽人，非委淮阴县委。

七、结论 从前章石路宾馆诸同志往来谈话所见所闻，透露出米夫帮派在篡党以后的种种苦闷情况，同时也在酝酿着党内更大的残酷斗争。他们秘密策划，暗中进行，果然东方事变便首先爆发了。从上述事变中可以证明四中全会叛党集团确实参加破获机关、逮捕同志、审讯判案等工作，证据确凿，百口莫辩，这是临中诸丑奸人的严重罪行。这种手段首先表现在上海龙华，以后更推广到北方地区及全国各省市，造成党内空前巨大损失，同时革命事业也遭受了铩羽不振的打击！这一切说明米夫的临时中央那种日暮途穷，倒行逆施的破坏革命的行为在全国泛滥了，正方兴未艾哩！紧接着就是临时中央书记向忠发赤膊上阵，公开投入反革命营垒，大砍大杀起来！

（作者写此文时，未看到后来出版的一本有关康生的书，书作者写道：“一个名王云程，原是党的六大中央委员（引者注：实际上是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之一），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三三年初，曾任过江苏省委书记，一九三三年二月被捕叛变，当了国民党特务，他在二月二十四日的自首中写道：‘共产党在派别斗争中，采取暗杀告密手段，如何孟雄二十余人，都死在赵容等所领导的赤色恐怖之中。’赵容即康生的化名。”<sup>1</sup>）

<sup>1</sup> 此段文字系罗××补。有关康生的说法可参见1992年纽约出版的一本康生传记（翰拜伦著），中文译本名《龙爪》。— 补注

### 三十九、中共临时中央书记向忠发等倾巢投敌

上海东方饭店事变发生以后，正当中共全党危疑震撼，悲愤填膺的时候，中共临时中央书记向忠发与其死党多人忽倾巢而出，投奔南京政府，甘做降奴鹰犬，对党进行空前的大破坏活动。

三、“集体立功，破案如山” 向……胡、顾、徐等采取迅速行动，见机关就破，见人就抓，这样先后破获许多机关，拘捕党团工会同志无数，号称“集体立功”。

1. 顾顺章劫夺非委印刷工厂 尤可骇异者，米夫竟下令直接用武装力量进行党内斗争。如临中劫夺非常委员会中央宣传部印刷厂即其显著事例。

非常委员会中央宣传部有印刷厂一处设上海唐山路保定路某里内。厂中有对开印报机二部，铅字及铸字等全套设备，印行非委中央及全国工会的内部报刊，由秘书李梅羹率职工住在印厂管理并守护。临中为破坏非委工作，决计劫夺印厂，据为己有。

李梅羹住在保定路附近某里。先是在劫夺前一日，顾顺章忽至李寓对李说道：“你替非委工作，实在危险得很！我今天来放信，叫你早些离开此地，勿要再做工作，你识相些。”李说：“我做什么或不做什么，用不着你多管。”顾说：“我原是一片好意，你不听话，莫怪我们不讲客气。我警告你们非常委员会工作的人，在上海滩也休想立脚。”李不理，顾遂去。越日遂发生劫夺印厂的事。

劫夺印厂是由临中派政治保卫科负责人顾顺章亲率十余人伪称工部局包探，引便衣武装前往印厂搜查，首先进厂把全体职工禁管。李梅羹时正生病，卧床不起，彼等进屋，不由分说，将印厂机器设备及纸张等全部装上预先准备好的几辆汽车运走。众人临去又将李梅羹被

<sup>1</sup> 此处整理者做了删节。— 编者注

褥衣物洗劫一空。梅羹躺在床上不能动弹，张口结舌，望顾顺章扬长而去。后该屋仍受工部局巡捕搜查封闭，捕去印厂职工十余人，并将李捕去，监禁经年始释出。

印厂被破坏后，敌方军警先后又陆续将非委宣传部、江苏省委沪东、沪西、法南、闸北各处党组织搜查拘捕多人。事后证实这些破坏行动均与临中有关。

2. 共舞台案 一九三三年七月，非委上海市委在法租界共舞台戏院，召开全沪工作会议，由法南区书记刘德成主持开会。因临中实行残斗政策，向法工部局告密，开来警车一辆，捕去工会工作干部及工人十五人，送龙华司令部关押严讯，由于临中份子提供名单及案情材料，引渡后全部牺牲。

3. 天妃宫案 一九三三年五月，上海天妃宫案是由向忠发秘书丁觉做引线，捕去上海非委同志七人，后又继续捕去五人，均向等所指使。

4. 岳州路永兴里案 一九三二年十月，向忠发、胡均和等亲自破案，在永兴里逮捕十四人，“立功”最大，获双份奖金。

5. 太平洋书记处案 向、胡投敌后，一九三二年五月间，太平洋秘书处上海办公处忽被搜查，捕去负责人乔治 George 夫妇（乔治夫妇均英人）。先是一九三〇年二月时，赤色职工国际曾来令调乔治回国工作，乔不愿行，因函全总并向文虎道意：可否继续留中国工作。当时全总讨论此事，认为乔治人地颇宜，结果决定应乔治请求，由全总出名去电向职工国际挽留乔治继续留沪工作。一九三二年五月向忠发投敌事发生，同时乔治秘书陆海防（从东大回国任职）向敌输情，乔治夫妇遂被捕去。

乔治被捕后化名牛兰 New - Land，解到南京。审讯时，他默不作声，再三询问其真实姓名，亦不置答。问官云：“你的犯罪证据已由所获文件与你的秘书全部讲述明白，即将根据这些材料进审判，你本人承认与否并无关系。”乔治仍无言。经过陆海防、余飞等指证后，全案牵连十余人，遂判罪入监，外间称为牛兰案。

牛兰案经报纸披露，赤色职工国际闻乔治被捕，大为震动，恐其在监受虐待，指令江西苏区尽力营救。因此于一九三二年七月，江西瑞金苏区中央政府宣言营救牛兰夫妇，其具体建议愿以释放苏区监禁外国教士作为南京释放牛兰夫妇的交换条件。但蒋介石置之不理，遂无结果。

事后查明直接承办牛兰案者为向忠发部下余飞与陆海防。余飞，宁波人，原为上海西崽工人，向忠发时期任中委及驻国际代表。投敌后屡破案立功，积功任南京市社会局科长，自觉志得意满，尝对人说：

“我原是侍候人的西崽，在中共做上中央委员，才有今日地位，我应该感谢党，感谢领袖！”陆海防，一九二九年自东大归国学生，任太平洋秘书处翻译，一九三二年即投敌。

6. 其他诸案 向忠发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三年间亲自作眼线，先将看守机关女同志徐虔直、高其度等捕获解南京。徐虔直被枪杀于雨花台。（徐虔直，陈潭秋之妻。）一九三三年又在上海法租界逮捕黄励，解往南京判处死刑。同时胡均和设计并亲自带领军警将非委安徽省委书记王步文逮捕解往南京枪毙。

与上述各案发生同时，投敌份子又在上海将陈赓、张际春、陈少石与廖◇◇逮捕解往南京。廖被捕后否认中共党员，觅人担保，廖确属国民党忠实同志，遂蒙蒋释放。同时陈少石被杀。

武汉大破坏诸案：先是一九二八年春间，汉口党组织大破坏，向警予等被捕，旋于四月底即遭杀害。当时办理此案者为武汉政治分会主席程潜，告密者为向忠发秘书宋岳霖。这次汉口党与群众组织破坏极为严重，先后牺牲同志二十余人，其中有烈士陈春和等。于此前后时期，向忠发曾亲至武汉破坏地下革命组织，向啸集码头工会旧部，搜查武圣庙，汉阳郊外五里坡、归元寺、罗汉寺等处中共与少共组织多处，逮捕夏文法、韩骏、法和尚、杨奠奎、廖乾五等五十名。

#### 四十、临中北方书记宋明诗、于芝生联翩投敌 (非常委员会北方惨案)

龙华惨案给予米夫、王、博等以极大鼓舞。在此以前，自米夫以下感到对非委束手无策，今忽见非委遭受惨重牺牲，“反右胜利”出于意外，兴高采烈，有逾寻常。此时临中等继续采取步骤，就是在全国范围内，特别是在北方发动更残酷的斗争，造成新的破坏高潮。口号是：“残酷、干脆、彻底歼灭党内反对派。”派廖国云到北方召集北方会议。当时临中斗争矛头主要是指向非常委员会。

一、于芝生破坏北方非委 于芝生到天津不久即投靠天津市长张学铭，破获非委机关及工会多处，逮捕天津非常委员会负责人及干部，严刑拷讯，非委干部先后被判处死刑十余人，余均投入监狱。

天津破坏成功后，张学铭又令于芝生等赴北京，伙同潘闻宥等破获非常委员会北方党委、团委、顺直、铁总等机关多处，逮捕王仲一、李渤海等二十四人。于与潘等曾向张学良等告讦，说王仲一为二七祸首，北方非委主持人。王仲一被刑讯后，即惨死狱中，是为著名的北京大狱。

当时在敌人监狱中非委被拘禁人虽极多，临中命互济会对非委政治犯进行狱中斗争，禁止对非委难友施行救济，并千方百计破坏非委难友的团结。用诬告、陷害方式使非委难友加重处刑，对非委狱中干部的家属施以侮辱，迫使夫妇一方离异。如遇非委党员牺牲，彼等毫无同情，反幸灾乐祸，无所不至。

二、于芝生破坏山东省委 于芝生后被张学良派往山东韩复榘处继续破获济南、青岛、高密等处非常委员会组织十多起，捕去三十八人。韩复榘任于芝生为政警处科长，以酬其功。于乃设计破坏益都、日照等处组织。

于芝生在山东曾设法逮捕非委青岛市委工作人员郭龙君。郭，直隶大名人，天津第一女师学生。二七后在铁总工作，往来京津道上运送工会大量刊物。郭被捕后即被处死。一九三三年二月，于芝生又于旅馆捕去从上海到山东工作之任作民（湖南湘阴人），送往济南判刑四年，任受磨难，出狱后因病逝。

临中在四中全会后，对于各地党组织强迫命令，不断出动暴动，藉以考验党员是否拥护临时中央的暴动政策。自山东省委书记与青岛市委书记王士青等到上海参加非常委员会以后，当地组织已有基础。临中对山东全部党组织恨入骨髓，时思消灭之以泄愤。韩复榘曾令于芝生拟定消灭山东全省非常委员会的计划，与此同时，临中下令要山东发动大规模武装暴动。

三、临中宋明诗罪行 一九三三年八月，山东益都暴动因力量单薄，准备未完成，两天内即被镇压失败，被捕三十余人，负责人郑心亭、冀虎臣被杀。（郑临刑告人云：吾当化作旋风归去。）益都暴动失败后，不过一月，临中又强迫日照县暴动，立被韩复榘军队杀死农民一百五十余人。党负责人郑天九、安哲等牺牲。事后临中对郑、安等大肆攻击，斥为右倾，不服从命令。

一九三三年临中再派亲信宋明诗赴山东，指挥暴动。宋到济南任山东省委书记，旋于芝生合流投降韩复榘，大捕共产党员，死者、囚者不计其数，至是山东党与群众组织遂完全瓦解。

## 四十一、苏区反右，“你死我活！”

自四中全会实行篡党成立临时中央以来，为时不过两年，在米夫、王、博领导下的中共白区革命势力分崩离析，组织瓦解，精锐销磨！当时米夫、王、博内心犹感未足，乃另辟战场，进入各苏区，大规模进行“反右”，实行“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当时王明发表了流毒全党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以反对所谓右倾，提出了一个比“左”的立三路线还要“左”的新的国际路线。他们在政治上提出苏区路线是“一贯右倾、严重右倾”的口号，主张加强“反右倾”，“反富农路线！攻打大城市，肃清非常委员会势力”等。在组织上，他们以“改造党”、“改造红军”为名，到处派代表，在各苏区安插亲信，网罗私党，排挤和打击正确路线的革命干部。对抵制他们错误领导的同志滥用组织处分，采取无情的打击。王明、博古等从一九三一年起，用六届四中全会临时中央的名义先后连续派代表多人到各苏区去夺军权和党权，这就是派张国焘、陈昌浩到豫鄂皖苏区，派夏曦到鄂西苏区，派沈泽民到鄂东苏区，同时又派张闻天、杨尚昆到中央苏区推行王明路线，策动反右工作。

一、**洪湖** 一九三一年三月，夏曦到湘鄂西组织中央分局，自任书记，实行集中党、政、军大权。十月，夏将红三军改编为五个师、团，由夏直接指挥。夏曦强调国际路线，主张立即行动，攻取大城市宜昌、岳州，会师武汉。在党内，把肃反扩大化，乱杀干部，把湘鄂西全部苏区毁完。一九三三年主力军被迫退出洪湖，经豫南、陕南、川东转移至鹤峰，武装由二万五千人减到一万多人。一九三四年十月，夏曦在黔江身亡，王明乃派关向应代夏。据当时目击残酷斗争及身受无情打击的人三十年后申诉王、博罪恶行径时说道：“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四年秋间，夏曦任湘鄂西分局书记，把湘鄂整个苏区搞完。”又说：“洪湖地区由夏曦执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党组织受到了很大

的摧残。”（《红旗飘飘》十四期，贺炳炎：回忆洪湖斗争）。一九三四年九月肖克乃率部离开湘西。

在反右高潮中，夏曦认为当地工作一贯右倾，指名周逸群、段德昌、张昆弟、柳直荀等为右派，他们先后均被枪杀或陷敌而死。

由此可见临中一群奸蠹进入洪湖苏区，盲目反右，消灭异己，造成党组织瓦解。

二、**金家寨** 一九三一年五月，张国焘等到达豫鄂皖苏区后，立即发动大规模反右运动，排除异己，施行残酷斗争，杀戮所谓右派的大批同志。白菜店清党之役，肃反扩大化，被害同志有郑芹瑞等数十人。

他们诬蔑出席全国苏维埃准备委员会委员一律为右派，由于他们全体参加非常委员会的工作，所以他们又被诬为反党、反革命，这些代表返回苏区后全部被肃反了。

### 三、云岭<sup>1</sup>

<sup>1</sup> 本节“云岭”写项英与新四军，与“苏区反右”无关，删去846字。——补注

## 四十二、中国工农革命文艺阵地全线崩溃

一、政治黑暗与文化荒伦：一九二七年前中共在文化革命战线方面取得重大成就，中共党在武汉政府时代在国内外文化革命事业中树立有极高威信。但是自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八七会议以来，党内开始进行分裂，内讧不息，外侮纷乘，不少中共知名党员彷徨，动摇，最后走到投降蒋介石的道路。此风既开，遂一发不堪收拾。陵夷至一九三一年前后，李立三、向忠发、王明、博古等集团在◇◇领导之下继起在中共内部发动大规模残酷斗争。与此同时，国民党各派军阀蒋介石、冯玉祥、李济深、阎锡山、张学良等对中共苏区与地下工人运动施行严厉的屠杀。与党内外斗争相应而起为各苏维埃区清党反右，屠杀无辜党员。此时全国文化人，特别是上海文化人与国民党军阀相呼应，同时即以中共为假想敌，成立各项暗昧文艺团体，假藉革命招牌，实行向中共呐喊示威。他们树帮派，立码头，设文化摊子，一方面向南京声明不作反革命，一方面向中共争取文化革命正统，这样造成当时政治黑暗与文化荒伦的最暗淡时代。

二、工农革命文艺联盟：中共非常委员会有见及此，为了整饬革命文艺阵容，依照李求实、谭寿林、冯铿、林育南等同志建议，在上海成立工农革命文艺联盟，指定由李求实及江苏省委负责领导。求实在工农革命文艺联盟（简称文联）所作报告，对于当前革命文艺战线作了详细的分析与批评。他说：“中共自大革命失败后放弃对于建立工农革命文艺战线的领导。现在政治黑暗已极，文化荒伦尤甚，多数‘革命文人’徘徊于斗争线外，互争领导。”

三、火种计划：求实报告后一部分提出建议，主张立即成立集体写作机构，把真诚革命的文艺爱好者引进工农革命阵地，从事革命文艺新创作计划。该计划主要是动手写工农斗争作品，以罢工斗争、农民战争为主要题材，同时进行编写有关一九二一年以来历次伟大工农

群众斗争的史诗、小说、剧本等（包括过去铁路、海员、矿山、纱厂等罢工斗争，以及李慰农、伦克忠、王中秀与大革命失败后无数牺牲壮烈史事等）并决定创办一个工农文艺期刊由文联主编。这个计划谭寿林称之为火种计划。求实的报告与写作计划被工农革命文联所通过。文联成立以后，积极开展实施计划方案，后因龙华惨案发生，求实、育南、冯铿、胡也频等被难，随后谭寿林等多数参加文盟的同志几乎全部牺牲。在文联精华损耗殆尽，受到打击以后，于是文化革命遂益趋荒落！当时所谓：“汉奸流亚，右派鼓乎”<sup>1</sup>，流氓作家，形形色色，限于篇幅，未遑悉举。

<sup>1</sup> 原文无引号，补于此。— 补注

# 罗章龙回忆录

## 下编

(《亢斋散记》存稿)



## 一、浏水先行事略

引言：我于一八九六年十一月卅日出生在湖南浏阳县浏水北岸、地名化龙桥的村庄。学名罗璈阶，字章龙，号文虎。祖辈以来家世务农。（佃农）父出外做工，为江南造船厂工人。我自一九一〇年起进“广学书塾”读书，乡居八载，在青年求学时代所受当年长辈师友熏陶的影响，至深且远。因此，我先应将幼年时期乡贤长辈，革命先行人物言行略志其要，以明个人思想、做人处世思想渊源之所自，这也是“木本水源，先河后海”，理所当然的事。

### 一、广学书塾

我童年学习的广学书塾，位于浏水北岸，紧靠着我祖辈所居的化龙桥。初为颜氏家塾，后渐扩充为乡塾，负藉来学者络绎相属。广学书塾原为宗祠房屋，罗氏于明中叶从江西庐陵迁浏阳，其世系远祖为宋罗泌，即著《路史》者。数十传而至敬身。敬身之子上含，上含之子凤楼，凤楼之子葛荪，世代勤耕苦读。广学书塾即上含公所建，其祖训八字云：勤俭苦学，礼义廉耻。广学书塾主讲为罗孟融。孟融，清代秀才，绝意仕进，以讲学树人为务，前后凡二十年。自撰书塾联云：躬耕陶性趣，岳海宽心胸。孟融讲学不立崖岸，不守宗派，耻攀附，以觉世牖民为主旨，兼重实学。邑人与广学书塾往还者先后有李鹤皋、周频卿、邱湘舟、刘正觚等诸人，均醉心人本主义，以济世安民为志，居恒为学者讲习名理而以躬行实践为归宿。因此从学者振奋有为，自强不息！邻邑学生有负藉担粮从数百里外步行来塾读书者。广学书塾课业以经史诸子为主，科学时务为辅，发挥自由思想，往复辩论不加限制。当时讲演辩论互相参商以决疑端。而对于学术革新，政治改革，历史评价，正人心与厚风俗诸问题，尤为反复致意。

又广学书塾西轩颜回天麓堂，为师生平日集议之所，其所议论举凡天人之际，性命之理，体国经野，旁及书数射艺，无不涉及。虽事

久迹沉，流传未广，但吉光片羽，弥足珍视！惜已佚沉无存。

## 二、丙午战役

广学书屋，位于浏水北岸，南对天岩山，地势平衍，水如碧带，峰似翠簪，水车竹林掩映田野，为乡邑胜地。不意丙午义师起时，该地沦为战场。

先是一八六七年浏阳东乡姜罗墩人民罗崧山等曾起兵反清，师溃三十年后丙午义师乃崛起。一九〇六年五月浏阳大旱，饥民抢米，民心动乱。邑人龚春台为姜守旦等潜谋起兵反清，参与密谋者有广学书塾师生二、三人。十月初发动起义，起事时指挥军事者为姜守旦、蔡绍南、马福益、龚春台、罗良初与李黄轶等。姜守旦世居姜罗墩（别称万飞鹏），少读书，长务农。后离乡远游，结壮士开山立会。龚春台，本姓谢，名再兴，浏阳东乡三口墩人，原为王姓爆竹坊工人，与姜守旦共为洪会二大首领，龚称洪红会，姜称洪福会。是年十月，姜与龚联合在浏阳东乡大光洞、九鸡洞、姜罗墩一带，聚众万余人起事，率众首先攻据三口大地主王姓城堡，焚其屋宇，进占沿溪桥及永和市，杀当地团绅数人，劫取枪炮武器甚多。随即分兵越天岩寨，占领高坪小溪等处市镇及乡村。起义时众推龚为大都督，揭“扫清归汉”大纛，龚以中华国民军南军革命先锋队都督名义发布讨满清檄文，年号改用黄帝纪元四千六百〇四年。檄文即广学书屋秀才所草，开宗明义称以驱除鞑虏，收回主权，建立民国为目的，历数清廷十大罪状（[注]：檄文云：“起义宗旨为：破千年之专制政体，不使君主一人独享幸福，对社会问题尤当研究新法，使地权与民平均，不致富者愈富，成不平等之社会。”）。同时在浏阳南乡有陈春甫于十月十九日在南乡金刚头起义，二十一日攻占萍乡上栗市，二十二日占南乡文家市，二十三日并进占江西宜春、慈化，加入义军者以安源矿工、醴陵防营士兵及浏阳农民为主，共约万人。有新旧枪支三千支，及土炮数百门。

清廷见义军势大，乃动员苏、鄂、赣、湘四省大军约五万人兼程前进“会剿”，双方主力接战在离广学书塾五里之永和镇郊外进行。十月二十七日凌晨，敌军乘雾向永和进攻，并派奇兵绕道火树巷袭其后，义军据水泮庙阵地，以大型土炮数十门轰敌，敌军稍却，旋敌弹击中其火药库，延烧炽烈，义军大溃，死千余人。全军瓦解，马福益死难。

[注]：辛亥革命前，当时清军分新旧两部，新军为第二十五混成协，下分四十九与五十两个标，每标三营，共六营，计四千人，驻长沙。旧军为巡防营，下分左、右、前、后、中五路，五十一队，共计一万五千名。中路驻长沙，由黄忠浩统率。在浏阳与起义军作战者为中路巡防营。

## 三、湖南光复及焦陈被害

丙午义师桡败，龚、姜、陈等出走，广学书塾解体，师生星散。孟融、频卿等流亡湘汉数年不归，又与焦达峰、陈作新等密谋再举。焦达峰原名大鹏，字鞠孙，浏北焦溪乡人。在乡倡导心正、身正、名正、旗正，组织四正社。在浏邑及湖南新军内发展社员。辛亥九月，焦与陈作新策动长沙起义。事成，焦达峰出任湖南都督，陈作新任副都督。孟融、频卿等亦分任都督府秘书、参谋。葛荪因在沪参加工潮，被解雇返乡，偕堂兄璿阶入招贤馆任职。旋焦陈被谭延闿谋杀，谭自为都督，向袁世凯输诚，革命党人被逐，新兴官僚与财团打起统治湖南。袁世凯叛国时，一九一三年七月湖南宣布对北廷独立。八月十三日谭延闿通电取消独立，旋亲自进京向袁世凯请罪，判处徒刑，特赦，谭遂落职。袁乃派其爪牙汤芑铭督湘。

一九一六年焦达峰之友，湖南湘乡人杨王鹏与龚铁铮、殷之辂等于一月十日到长沙与湘军混成旅联络，决定二月二十八日合攻汤芑铭。二月二十日因谋泄，提前于二十一日下午四时单独率敢死队百余人分途猛攻汤所驻之将军府及西长街警察署。两路均战败，死伤百余人，伤亡殆尽，杨龚等均牺牲。焦、陈被怨杀后，孟融不能立足，乃出走。一九一六年四月，孟融同居正等赴山东半岛组织讨袁军，号称中华革命军东北军。五月攻克潍县周村，共事者有许崇智、廖仲恺、朱霁青（任第一师师长）、吕子人（任第二师师长）。孟融曾参加十五日夜袭济南之役，坠马受伤。一九一七年袁死黎继，山东民军改编，孟遂解职往北京。孟融在北京居留时，因与中共革命人士往还，后孟融归湘组织农民协会被逮，经营救出狱，后赴汉口。一九二七年春至汉口，任武汉政府农政部秘书。同期间葛荪任国共合作武汉政府财政委员会委员。大革命失败后，二人均离职流亡沪上数年未返里。

## 四、浏阳独立运动

广学书塾在丙午事变后解散，又经约十五年，（长郡）联中学生萧盛礼（乐天）、贺天健等复有策动浏阳独立事。先是广学书塾同学见辛亥革命有名无实，民困水火，因有人主张组织武装以救国。如李让泉考入湖南陆军讲武堂，彭光闾考入湖南陆军中学，萧盛礼直接组织农民武装。但是后来李因病早歿，彭任桂军军官无法展布，萧盛礼乃参加警官学校，思于革命有所建树，同时并联络地方军队以谋大举。

一九一五年北廷以张敬尧督湘，张率北军二师驻守长沙，施政暴虐，全湘人民陷入水深火热，惶然不可终日。盛礼乃与天放、天健等计议驱逐北军事。一九二〇年春三月，乐天遂起兵驱张，占领浏阳，宣布对北廷独立。北军战败西遁，乐天乃自草檄文申讨北洋军阀政出私人，法纪紊乱，在财政方面搜刮横兴，取之尽辘珠，耗之如泥土，

令全湘之人枵腹以饱人，露体以衣人，生无以养，死无以葬。檄令既布，远近来归者甚众！遂编成一师二团，布新政于民更始。未几，北军援军大集，乐天挥军奋起与数倍于己之北军鏖战。战局初胜后败，乐天自陷重围，自知不敌，乃召其部下勉以大义，封县印，◇财物付于县民，率众突围而出。敌军追击不及，北军校官某入城见所封财物堆积成阜。乐天突围后将其众交部将潘某率领就地游击，自离军欲转湘西策动援军。途中不慎为巡逻者所获，槛送长沙，遂遇害，时一九二〇年五月。未逾月，即一九二〇年六月，张敬尧受湘人强烈攻击，终无法立足，率队离湘北遁。乐天策动浏阳独立同时，请求葛荪派专使至保靖与湘西某部营长孙雄飞联络，共同行动。葛荪与孙为异姓兄弟，立允其请，但因当时通讯迟误，孙发动时东路浏阳已失败，北军另派兵袭孙，孙亦被包围，全军覆灭，孙雄飞本人亦牺牲，时年四十二岁。孙军既败，葛荪因同谋涉嫌被捕，囚长沙县狱，后经易柯僧设法营救，六月后始获释。出狱后离湘避难经年始返。

浏阳诸子，鉴于过去若干次军事运动失败，于是废然思通，认为今后革命道路有改弦易辙的必要。尔后，遂与中共取得联系，一致行动，参加工农革命运动。

### 五、萧贺诸人事略

前述广学书塾师生行谊均足为革命表率，现就萧、贺、李、周、罗璠阶诸人事略简述如次。

1. 萧盛礼 萧盛礼，字乐天，浏阳北乡焦溪岭人，与焦达峰同里，深受其游侠思想影响。后入长郡（联中）肄业。乐天少时思想激进，先天下之忧而忧，其◇父坤逸以书诫之云：“小人好尽，君子守中，政治改革亦不宜为天下先，更不必起步过早，如此易为人所乘。远如项羽，近如焦达峰与谭延闿之事，均可证明急进者易败，而伺机持两端者反获成功。”并引证云：“项羽年二十四，率先起兵击秦，进锐退速，刘邦年四十八，于项羽为后进，终以权谋获胜。鼎革之际，历史人物升沉，大都是后来居上。”乐天复书抗辩，谓“侄愿为陈涉、张角，决堤纵火，不愿因人成事，安富尊荣。否则梦梦一生，怎能过得去。”坤逸不能难，只得任其所为。乐天感时悯世，尝发愤云：“时势如大锅煮粥，揭盖则稀烂一团，加盖则暗无天日，不施大手术无法苟延。”乐天与天健相约要救国须从组织武装入手。因此，天健入烟台海军学校，让泉进湖南陆军学校，乐天入警官学校。乐天毕业后，任桃源县警察所长，与当地驻军深相结纳，日夕练兵。尝因久骑，尻部生茧，不能仰卧，露宿野外与士兵共甘苦。旋调任浏阳警察所长，遂起兵抗北廷。乐天遇害时年二十四岁，虽生命光辉一闪即逝，但求

仁得仁，于心已安。天健为词以吊之，有句云：“百丈洪炉内热凝，长空浩荡激雷霆，千秋万岁浏水畔，应知堕泪有碑文。”

2. 贺天健 天健，浏阳人，力学向上，自强不息，泛滥诸家，博赅群众，文采尤美。后与成皋、文虎、天放、盛礼等共肄业于南台小学。校长刘人熙，字艮生[注]，尝以志伊尹之所志，学颜渊之所学，勉励全校师生，故人人发扬蹈励，以天下为己任。天健实其中翘楚，人熙尝称：“贺生文采若明珠编贝，槃槃大器，若函牛之鼎<sup>1</sup>，前途未可限量。”天健与虞卿同为周氏外甥，周氏乃三口周国虞后裔。周于一八四二年组织忠义堂（亦称徵义堂）起兵抗清，一八五二年率兵西进，围攻县城，猝遇强敌，遂跃阵而死。其曾孙周在田与天健同学于狮山，誓为家国雪仇，天健后遂投考烟台海军学校，思于此有所建树。毕业后被派至琼州见习，旋因母病请假归里，假满赴秦皇岛任职，因与上司意见齟齬辞职。天健返里后，在北军驻湘期间与萧乐天、宋天放等策动浏阳独立，事败，乐天被杀，天健出走。与天健同班之胡九思，于一九二七年参加革命，在浏阳小学被逮，夫妇同死难。一九一〇年冬文虎偕贺天健步行浏水两岸高山深谷中，当岁暮踏雪登鲤峰，信宿阳明馆，互以张骞、班超自期许。

万途一轨：贺天真于浏阳独立之战役失败后，随其兄天健遁逃至北京时亦寄住冰窖胡同，与伯英共同参与书记部工作，相处甚为相得，因此伯英欲留她在京工作。但天真却因不惯北方生活，勉留数月，坚请南归。伯英诘问其故，天真初不肯遽告，但云母命。伯英答：“我当代向伯母请命。”天真笑道：“昨日家妹来信云：江南春光大好。故乡紫苏菜鲟鱼豆腐等我回去，使我竟夕梦绕家山，你看我还能革命吗？”伯英后以此事转询天健，天健道要加入革命行列，非有大勇不济事。天真自承无此勇气，她认为人们的生命极可珍贵！吾人不愿以庄严的生命，博取虚伪的共和。个人在没有看清楚事情时，决不愿草率从事。伯英闻语后，知不可强，乃听其自行南归，并约同学饯送于西车站。临行祝天健与天真前途保重！伯英并叮咛天真：“回里后自求前进，天下事万途一轨，革命不分南北，各处雷鸣一样闻。”天真闻语颇感奋，欣然登车而去！

[注]：刘人熙，字蔚庐，号艮生，谭嗣同、唐才常当均出其门下，亲为学生，讲经义修身等课。尝云：“要做好人须得好友，引醋作醇，哪得甜酒。”经常勉励同学志伊尹之所志，学颜渊之所学，又主张陶冶东西，化一家天下之私，为万民共治之公。一九一九年刘曾一度任湖南都督。

3. 李鹤皋 李鹤皋字九铭，清代秀才，狮山书院教师。丙午之役，

1 “函”字下注有“？”——补注



## 二、新民学会

(前略)<sup>1</sup>

### 七、勤工俭学运动

勤工俭学运动初为新民学会所推动的会务之一部，其起源与经过简述如下：

1. 惠民公司 第一次欧洲大战的时候，法国壮丁大部分入伍参加战争，农业、手工缺少生产劳动力，法国政府向西班牙、意大利和其它国家输进大批工人，同时也向中国招募几十万华工。招募公司名惠民公司，张孤出名办理。张等乘机谋利，前后送了三十多万工人到法国去，担任非技术性工作。李石曾、吴玉章等见张暴获大利眼红，因此他们也向法国政府取得了一个招募华工的代理权，也想从中谋利。但是不久欧战结束，法国军人复员，劳工仍不缺乏。李等仍不放手，就转而向中国学生宣传，鼓动学生通过华法教育会到法国去勤工俭学。他自己在法国办了一个巴黎豆腐公司发了大财，他就以此宣传勤工俭学是大有前途的。同时他勾结法国政府利用勤工俭学的名义，要法国政府退还庚子赔款，办理华法教育，并借此向中国青年吹嘘，号召中国学生参加勤工俭学。当时蔡元培、汪精卫、吴敬恒等都是中国教育界的上层人物，他们为了扩大自己的影响和力量，独立门户，自树一帜，乘此机会大肆宣传勤工俭学运动。他们在巴黎办了一个杂志做机关报，他们自号清流，借此机会取得青年学生的信仰。学生们就纷纷起来响应他们的号召，参加勤工俭学运动，这是这个运动的起源。

李计划已定，乃于一九一七年四月间开始宣传留法勤工俭学运动

1 因本章与“上编·新民学会”一章同名，凡文字虽稍不同但内容相重的小节，不再编入。删去的小节有：“一、定王台毛罗会见”、“二、定王台对话”、“三、岳麓山周家台成立大会”、“四、新民学会会务进展”、“五、东游返施”、“六、新民学会北征”，保留七至十小节。保留文字与“上编·新民学会”中文字虽有相同处，但内容更为丰富。

(在《新青年》二卷◇期刊登广告)，不久，湖南新民学会首先响应，第一批十◇人于一九一八年九月间来到北京，李石曾表示欢迎，曾在香山别墅招待子昇、和森、文虎诸人聚餐。当时李对在京各省学生作报告时宣传留法勤工俭学好处云：既能获致高额工资，将来又可以取得学位。当时为淘金梦与镀金主义所迷惑者不乏其人，湖南、四川等省中等学校学生纷纷来到北京准备赴法。(分别集中在北京西什库法文专修馆、保定布里村、长辛店法文工读班等处。)

2. 李石曾与华法教育会 李石曾，直隶高阳人，清代巨宦李鸿藻后裔。在欧战(一九一四至一八)期间赴法留学(学生物)，同时兼经营商业，在巴黎办豆腐公司，制造食品，以追逐利润。为推销豆腐起见，李乃提倡素食，以清流自许，貌为崖岸。一九一八年冬李石曾邀约萧子昇、文虎到西山寓所商谈赴法留学问题。李石曾在席上谈话自称平日信仰世界主义，反对强权，强调无政府思想；在学术上研究生物学，奉拉马克(La-mark)为师，兼以工学救世。李并宣称自己不茹荤酒数十年间，长期吃素，平生自奉俭约等，藉以取信于青年。文后数次与李接谈，结果了解到李石曾尚有一樁心事，便是想继美国退还庚款之后，向法国政府请求法国政府沿例退还庚子赔款几百万法郎，李便可以从申上下其手，取得赔款支配权。由此可见，李对勤工俭学运动真正意图已昭然若揭，不待繁言而知，其设计是很周密的。

3. 湖南出国筹款经过 湖南学生麇集北京等待放洋急于星火，华法教育会徒托空言，无补实惠，于是湖南同学被迫自筹旅费。关于湖南学生筹措赴法旅费方面颇多曲折。先是在满清末年铁路风潮中，湖南省为商办粤汉铁路曾收集民股二百万元(自由募集)，米盐公股一百二十八万元(由湖南出口米捐与盐附加税累积而成)，长沙房捐四万元。以上共三百三十二万元，存放北京银行，均为湘官绅把持中饱。辛亥以后从未理落。此事渐为外间所知，旅京学生声言查帐。经手人熊秉三、范源濂等为和缓舆论攻击计，乃声言愿从此款中提出数万元，作为津贴湘籍赴法学生费用。后来考虑结果由范、熊二人即范源濂、熊希龄出面在湖南善后协款中拨出一万六千元作为湖南学生赴法路费贷款，每人四百元，第一批接受贷款学生共四十名，其中法人专修馆二十名，保定留法预备班十六名，其它四名。第一批放洋赴法有蔡和森、陈绍麻、熊光楚、萧植蕃、郭名忠、欧阳泽、成湘、黄昆吾、何长工、李蕃、刘明俨、孙发力、罗学瓚、萧拔、王守素、陈毅、罗汉、侯昌国、王人达、龙协群、陈炎、张增益、陈闻纳、穆青、姜绍丞、贺果、李富春、骆维汉等。同时，蔡和森以个人名义向上海纱厂资本家聂云台(湘乡人)请求帮助，聂允其请，捐三千元作蔡全家赴法费用，始得成行。聂为蔡同乡，除经营纱厂企业外，在湖南洞庭湖畔有

湖田数万亩。

4. 勤工俭学失败及其教训 一九二〇年间，中国留法学生集中巴黎者数以千计，其中湖南学生四百人，（有一部分是自费赴法，如徐懋恂（特立）、曾琦等），因觅工不易，初由华法教育会每人每日补助五法朗至一九二一年一月止。华法教育会宣称：自是年二月份起与学生断绝经济关系。学生群往蔡元培处申诉，蔡置之不理。李石曾对学生亦表示决绝，于是勤工俭学运动至是宣告失败。

溯自新民学会会员三年前以勤工俭学名义赴法者十九人，其中十三人在蒙达尼，余在巴黎。十九人中进工厂不及十人，进工厂者不久亦大部退出。蔡和森初坚持勤工俭学，但到巴黎后态度忽变，宣称不愿作工，依靠华法教育会津贴过活，后津贴停止，乃回国。其他诸人亦相率归国，见人不复再提前事。

旭东一九二〇年三月二十日自巴黎致文虎信，受北方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影响，表示勤工俭学毫无成功希望，本人想离开巴黎。子异既无意留法（一九二〇年八月），乃主张赴俄，何叔衡亦表示愿去，但李维汉不赞成俄国式革命（一九二〇年八月信）。直到一九二二年大批勤工留法学生先后赴苏联，其它学生家资富裕者继续留法或进里昂大学，大多数则被遣送回国。至是轰动一时的勤工俭学运动完全归于失败。

但是李石曾等却为此事欺世盗名，声誉大增。他与法国政客赫里欧勾结取得法国政府退还的庚款，筹办里昂大学，扩张已派势力，后又回国勾结军阀冯玉祥、政容易培基等盗卖北京故宫古物，立成巨富。并设立投资银行进行政治投机，取得特殊地位。得鱼忘筌，不复再谈往事。

李石曾等刊行旅欧杂志为文，素好唱高调，尤工于揣摩时势及青年心理，遇事投机，藉以自抬声望。其提倡勤工俭学亦不外此种动机，殆欲设阱以罗致青年，使为己用。至于当时响应李等号召的青年学生，其动机亦颇复杂，大部分人是盲从，不明前景，误以为勤工俭学可以解决个人生活与读书问题，因此如水赴壑，不能自止。浏阳有中学生朱子奇为筹措赴法旅费，嫁妻卖屋所得当不够船费，乃掘其祖墓得金饰数两，勉强成行。（朱到法后贫困不堪，病死。）长沙师范学生杨某尽其家室之所有变卖一空，将款汇华法教育会以作旅费。家人加以劝阻，杨语其妻云：“不到巴黎死有恨！”遂行。登轮时向人说：“人见李等诱骗青年一时获得成功，见猎心喜，亦思混水摸鱼。如曾琦、左舜生等到法后，自立山堂，组成政治集团，以为日后回国活动张本。

新民学会在长沙时，初计议全体赴法，但到北京以后审度情势与长沙所闻不同，文虎鉴于国事日非，大变将临，忽然去国，良非本怀，曾以此意函告瞻崧，瞻崧复函以为然。润之亦中途易辙，停止赴法，但和森则坚持赴法，谓势成骑虎，舍此无二。陈绍麻初犹豫未起程，其弟绍常坚请行，绍麻遂护送其弟出国，后竟客死巴黎，诚非始料所及！杨楚亦病歿于巴黎。

#### 八、留守北方

在勤工俭学运动告一段落以后，文与润之共留北京从事学习与工作，期望在北方开辟一个新的革命阵地。如所周知：北京是中国政治、军事、文化中心，是全国铁路枢纽地带，兼为国际通衢，居高屋建瓴之势。先是文虎自东游返旆后，便拟投考北京大学。当时瞻崧首表赞成。他说：“师范同学受限制，非服务期满，不能投考国立大学。”所以特别希望文虎能进入北大学习，为新民学会在北方工作开辟先路。当时主要会员中同此主张文投考北大者有和森与芝圃等。蔡在七年七月致子异信中所云：“详细与章、赞、芝四兄讨论。”意即指此。又云：“罗君到省未？北京大学报名在本月二十五日截止，请电知速定行止，盖罗于此必须另辟佳处，则后来者，愈有地步也。”（七月致子异函）信中所谈均涉及文虎投考北大问题。

润之原则上同意上项意见，但更具体指出说：“我们同志不应该堆积在一起，最好是一个人或几个担任去开辟一个方面。各方面的阵地都要开辟，各方面都应该决定打先锋的人。”（通讯集一）但是远在欧洲的子异认为：当代德国科学文化最为发达，因此希望文虎先到柏林大学留学，先行力攻德文，并留心德事，看德文报。旭东后向文虎劝告速行。但文虎时已在北大，不能擅离，所以文虎向叔衡去信声明关于出国延期理由。

当时全国国立综合大学只有一个北京大学（清末称京师大学）其招生范围为全国二十一个省，各省各有一定名额。北京大学大概北方诸省占名额多，南方各省名额较少，录取颇受限制。文既考入北大，与此同时，润之亦通过守常介绍进入北大图书馆担任馆员。他的具体工作是在报纸杂志阅览室，（每月工饷八元）。二人同在北大时期积极参加北大学术及青年种种活动，成立新闻学会、哲学学会等学会组织。

自新民学会北征后在一九一九年前后，北方革命形势有如春云渐展，在各方面均有进步。文虎乃作长期坚持的决心打算与计划。但是此时润之忽怀念乡国，浩然有归志，遂决定辞去现职，于一九一九年夏季出京南行，专返长沙。行前二人连日在沙滩红楼聚谈，往往深夜始散，商定去留大计。当初文殷切挽留润之继续留京工作，因向润之说：“北京方面不宜削弱力量，你去后学会力量不免单薄，何以为继？”

润之回答说：“学生身份比职员胜得多，那时你自会有办法的，莫急就好！”于是双方商定三年为期，南北分途努力，必能有所成就！于是他乃辞去北大职务，于一九一九年夏季，离京南行，遍返长沙。润之南归后，北方新民学会工作由文虎独当一面（后来芝圃回国），自尔以还，彼此天各一方，南北分道扬镳，共着祖鞭，奋勇前进。直到四年以后，两人才在上海中央会合。

### 九、关于“国是”问题辩论

在一九二〇年间，新民学会主要成员分布在北京、长沙与巴黎等处。此时国际与国内政治动态瞬息万变，对于“国是”主张，众说纷纭，见仁见智，各有不同。如北京主要新民学会会员主张社会革命总纲的解决，长沙同人提出湖南省建国问题。巴黎方面对于改造中国采取的革命方式意见分歧，莫衷一是。上述情况，一部分意见可以从学会会员通讯中见到。（按：现存通讯虽然为数不多，但亦可见一斑。此外还有很多会员信函未及时刊出。）

文虎在北大时，对当前中国革命提出社会革命，主张走苏联十月革命的道路。与此同时酝酿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实践方面主张与产业工人群众结合一致，进行社会革命，期望实行中国彻底改造与总解决。

在北洋军阀统治时代，全国黑漆一团。当时湖南会员方面鉴于国事势如乱丝，无下手理落处，他们憧憬历史上斯巴达、普鲁士小国寡民，各掸其胫的史事，因此提出“湖南建国”之说应运产生。一九二〇年三月间长沙方面公布“湖南建设问题条件宣言”，实行鼓吹一省建国主张。润之一九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致文虎信，他强调“主张湖南自立为国，湖南人不预闻外事，专把湖南一省弄好。理由是中国太大，民智不齐。二是湖南的地理民性均很有为，全国各省可因此激烈进化，并与世界有觉悟的民族直接携手。同意文虎来信所主张‘造成善良有势力的士气确是重要。’”（引自新民学会通信集（二））一九二〇年十一月廿五日润之致警予信又明确提出：“主张湖南自立为国，务与不进化之北方各省及情势不同之南方各省离异，打破空洞无组织的大国。”意思是说当前的中国是一个大而无当的大国，宜行分治。但是文虎主张自北方来信却表示异议，提出北方同仁的主张，因此发生争论。此项辩论在一九二〇年间，文虎与润之几次往来通信均明白表现出来。当时北方去信风趣地说道：“我们在北方难道搞一个‘北朝’，或成立卢森堡小公国或佛罗伦斯小城国一样的组织吗？这当然是行不通的。”好在这个问题到一九二一年南北渐归一致，湖南建国问题就不存在了。

说到巴黎方面会员的情况又有所不同。他们虽然离开本土，远适

异国，对中国当局政情变化不甚了了，但是对于中国的政治改造也提出过他们各自的看法。从蒙达尔尼会议记录中可以窥其大旨。当时萧旭东曾来信说对于学会政策与方针提出：“改造中国与世界，赞成马克思式的革命。”但当时北京已正式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大力开展社会主义革命宣传与组织工作，并深入产业工人阶级基层推动工会斗争。

### 附记：北京请愿经过——驱张运动在北京

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中旬湖南新民学会联合各界人士发起驱逐湘督张敬尧运动，润之率领一个代表团来到北京请愿。他初进城即到北京大学西斋文虎寓处，会商进行。（后住北长街九十九号（福佑寺））。他出示代表名单约三十人，加上北京新民学会会员及加入的各界人士共数百人，声势颇盛。十二月二十八日即在湖南会馆举行群众大会，会毕游行到新华门北京政府请愿。润之于一九二〇年夏离开北京绕道上海回湘。[注]驱张运动结果，张敬尧离职出湘，傅良佐继任，以暴易暴，湘政鲜所改进。

据新民学会通信集润之致玉生信称：“一九二〇年七月从上海回湘。”据此推定离京当在七月以前（即五月或六月）。

附：驱张敬尧运动湖南各界代表名单

毛泽东、文虎、熊梦飞、匡日休、罗汉、夏曦、陈书农、彭黄、熊瑾珍、何叔衡、蒋竹如、罗宗翰、李思安、陶斯咏、周世钊、劳启荣、魏璧。（以上为新民学会会员。）任寿鹏、李云杭、萧青野、唐耀章、陈纯粹、钟国陶、喻恒、易克熏、彭光阁、邹付光、易克崑、刘克佳、黄胜白、钟秀、张怀、周敦祥、贺延祐。（余略）<sup>1</sup>

### 十、新民学会的分合及其会员的离心倾向

新民学会成立初期，大家一致，精诚团结，去私存公，力争上游，会务蒸蒸日上，会员自十余人发展至十数倍，会员分布南北，隐然为中国革命重镇！

1. 新民学会停止工作，中共代兴 在中共成立以后，文虎、润之分别分负北方与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责任，实际指导当地革命斗争。“二七”大罢工后，在一九二三年六月中共三大会上选举结果，二人联袂参加中枢领导！同时并引进蔡和森、向警予等参加三届中央工作。由是南北壁垒，殊途同归。

回溯新民学会于一九一八年四月十七日<sup>2</sup>在岳麓山周家台召开成立

<sup>1</sup> 原文所略。— 补注

<sup>2</sup> 作者记得成立大会在星期日，经查为4月14日。— 补注

会时，出席创立会者有萧旭东、毛泽东、罗章龙等十三人，其中后来参加共产党者有八人。当时新民学会会员分别在各方从事革命工作，独当一面。一九二三年中共第三届中央局常委由仲甫、文虎、润之、荷波等所组成，罗、毛、蔡、向四人均湖南新民学会会员。他们自四年前北京分散后，现又从各方齐集来到上海中共中央共事。当时代英戏称之为新民学会大团圆。某日代英和中夏在中共中央开会时闲谈中又向文虎提及此事。中夏说：“几年来新民学会主要成员由分而合，看似偶然，其实也是必然。”中夏所谓“分”是指一九二〇年文虎留京，子异赴法，润之返长沙。“合”是指当前四人又合在一起共事而言。

由于中共成立，新民学会即对外停止活动，过去新民学会会员即以个人资格加入中共组织。外间种种传说，均属警说。

2. 新民学会会员相互关系的变动 新民学会会员相互关系十年间亦发生变动。先是新民学会由于发展太快，后期成份未免不纯，三年后渐渐产生离心倾向。此倾向至一九二一年后乃形成表面化。新民学会通信集第三集于一九二一年一月二日曾刊布紧要启事，略称：“对于某些会员虽曾列为会友，实无互助与互勉之可能。为保持本会精神起见，不再认其为会员。”当时共有会友七十多人，经此一番甄别，大约减员三分之一。

与此前后，新民学会核心领导内部又发生分歧，并由分歧而趋于决裂，其中最著事例为萧子异。当时萧为新民学会总干事，号称干练，富有才华，为众望所归。但自二次出国后即与和森、芝圃等割席绝交，更出人意外的是他们彼此均以恶声相加。大姐说：“他们相骂无好言，未免有失君子之风。”此语可谓道出当时实况，其经过真象可得而言。

和森与萧原是互相依存，关系素密。但居巴黎时二人忽告反目，势同冰炭，且彼此怀恨，互相攻讦。某次在上大开会，和森谈到子异近况，慨叹道：“我们当初都是贫贱之交，现在子异奔走权门，已向富贵道路迈进，今日只剩下他一个人仍没有回来。”中夏因主张由文虎用个人名义写信给萧，劝其回头合作。文虎尚未同意，但警予却说：“信是可以写，只怕无用。”中夏忙问何故，向亦未置答。事后向私语文虎，萧蔡在法久已闹翻，萧对蔡已出恶声。文虎遂置之不问，萧遂一往不返。

芝圃为人温良谦让，与萧素称莫逆，无话不谈。自萧在华法教育会任职，停止每日五个法朗接济同学，以后两人互相水火，在会场上尹邢避面，绝不交谈。先是昆弟在新民学会向负有知人之鉴，平日月旦新民人物，语多中肯，众人皆以为然。自旭东绝席后，昆弟忽叹息道：“知人诚不易，吾人过去以言貌取子异，可谓子羽、冉有两俱失之！”又欧阳玉生于九年五月出国，航行途中曾以书面提出过对学会下列意见：“对

于学会不要一心一意地专事服从，更不要挟甚么野心来利用它，把它当个傀儡玩。”此时学会会员不过数十人，却不免混入个别野心家，故玉生此语，或有所指。因此后竟与彬疏远并与其妹离婚，对学会不再往来。至于其他成员间相互关系亦属变化无端，不可方物，未遑缕举。总之诸情况观察：新民学会中坚人物，当其结盟之初，信誓旦旦，似乎不相信人间有“范雎须贾”之怨，及其行径骤改，面临张耳陈馥、凶终隙末局面，亦觉不以为异！



### 三、非宗教同盟<sup>1</sup>

宗教是迷信愚昧的同义词，其派生为专制、恶毒，宗教是与科学及民主相对抗的事物，因此应给予批评并肃清其有害影响。

#### 一、宗教产生的思想根源

原始人类对于水、火、电、风雷等自然界现象认为是神力，是万物的生命，这便是宗教产生的根源。后来民智渐启，对于更多的自然现象与人文现象仍然感到不得其解。如：物质与力的原始，宇宙的形成为，生命的发生，运动的开端等。又如人类感觉、语言、意识的起源，纯理性与意志自由诸问题。其中有先验的，也有后天实践的，当问题不能明确认识的时候，遂发生神与天帝的信念，久之渐渐形成各种各式的宗教。

#### 二、宗教的政治背景

环宇以内，东西各国，几千年来实行长期的奴役制度。严酷的政治压迫、经济剥削与思想控制，交互为用。实行以贵役贱，以富役贫，以强凌弱，以智役愚。由是人民涂炭、水深火热，视当前为地狱，憧憬世外的天堂。狡黠者流乘机蛊惑其间，遂生宗教。且宗教历久流毒未衰，时至今日，欧美诸邦号称文明民族，现代科学家，还有些人重视宗教课程，信仰创世纪，上帝万能三位一体说，玛利亚圣灵感孕，基督复治与升天等，都是彰明较著迷信说法。其它宗教如伊斯兰教、佛教、摩西教、婆罗门教等诸多教条，可谓大同小异。（一丘之貉！）宗教既已形成，各国统治阶级复加以提倡宣扬利用之，以麻醉人民，愚诬万众，影响所及，其毒焰更张。如中国自汉以来即输入佛教，至南北朝而大盛。唐宋以还释道二教并行不悖，均为专制政体所尊宠。元朝皇帝忽必烈尝宣称：“予对各位先知圣人，一律顶礼。”其

<sup>1</sup> 本章与“上编·‘亢斋义斋’及其活动·非宗教同盟”同题，但所述内容殊异。  
— 补注

意盖谓：各种宗教来自各邦，均翼赞帝政，对百姓起驯顺作用，是万不可少的愚民工具。（儒教虽无宗教形式，但其定于一尊。愚民自自恣，亦属变相宗教。）对此诸种宗教，上自执政阶级，下至百姓平民，上行下效，如饮狂药，把一切传统迷信作为个人安慰与群体义务而加以颂扬，并表示最高崇敬与虔忱。

#### 三、宗教问题的重要性

宗教问题之所以重要，便是由于它对于广大人民生活具有重大影响。近世基督教号称有教徒四亿三千万，其中百分之五十属罗马教，百分之二十五属耶苏教，希腊天主正教约占七千万人。在中国信仰基督教教徒，近百年间，随年代时有增加，清朝以还外国牧师泛滥南北，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为侵略者作伥。

佛教徒主要分布在亚洲地区次大陆各邦与印度支那诸国，有教民五亿人。另有婆罗门教徒一亿几千万人，与愚昧贫弱结不解之缘。

伊斯兰教教民分布在亚洲西部，欧洲东部、非洲北部及东非、西非内陆地区，拥有教徒一亿五千万左右。

根据上述粗略统计，可知各主要宗教信仰徒达十二亿人。由此可见宗教思想与影响是十分广泛与深入的。面对此项现实，岂能熟视无睹。

#### 四、基督教问题应优先提出

全部宗教问题内容复杂，涉及极广，吾人今日匆率之间，未能全面论究，或在短期内提出一个完整方案，对全部宗教问题予以圆满解决。盱衡世局，相度缓急，先就占比重三分之一的基督教问题优先提出，加以探讨。

就当前宗教界状况考察，自印度输入中土的佛教，经过千多年间的转辗变化，已成强弩之末。在青年学生生活中，非宗教矛头为什么指向基督教而放松批评佛老，这是因为中国原有的佛老等教（儒家思想另文批评）既已式微，基督教遂起而代之。基督教自十七世纪以还，自西方随重商主义、资本主义传入中国，结合中国专制主义，乃形成一种不良信仰，为非作恶，变本加厉，造成新的社会灾难，至近世纪而益盛。因此对基督教应追本穷源，从思想领域加以澄清，方能拯溺扶颠，祛除痼习。基于上述理由，所以当时反宗教思想与运动便集中火力于基督教。

#### 五、基督教思想及其后果综述

在西方原始基督教占有最初三个世纪，罗马天主教自四至十五世纪，宗教改革自十六至十八世纪，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则号称近代基督教时期。综合前后观察，基督教的基本思想大体是前后相承的。

在许多宗教典籍与文献中，在旧约与新约全书中，诸如摩西创世纪、灵魂不灭、地狱天堂、末日审判诸般说教，一切都由前定。凡宗

教徒所称“真理”全属捏造，纯是颠倒历史狂妄怪诞的童话。由是更可知：宗教充满神秘思想，倡言认识来自内省，重视直觉、预感与圣灵启示或顿悟，主张神不灭论（精神不死），认为世界是上帝凭空一次创造出来的。

中古欧洲宗教黑暗世纪，从尤士坦丁大帝到路德宗教改革，整个世界陷于疯狂！在散漫无组织的贫困群氓中，天主教组成一个教会集团。由于采取绝对的极权组织与专制体统，所以否定一切，对个人肉体、自然、文化、妇女、家庭等实行歧视。如所周知，宗教是犯罪渊薮，例如天主教的神父利用入教时免罪符与忏悔等方式，对教民进行强暴侮辱，同时他们假借上帝名义把极少数亲近的富贵寿考的人引进天堂，把更多的异己分子贫苦人民迫堕地狱，永世不得超度。自尔以后，基督宗派复杂，入主出奴，用火与剑对待异端（实为同教之人）。当罗马天主教盛行期间欧洲到处建立异端裁判所惩治制度下，约有一千万人死于烈火与严刑。西班牙被焚死有册籍可稽者凡六千余人。科学家被迫害者尤多，考之远代如笛卡儿对于统治者迫害，为避免烈火焚身之祸，明知故昧，隐忍自诬，是其显例。天主教迫害残杀异教徒，长期宗教战争，罹战祸而死者更不止千万人数。十九世纪下季，即一八六四年十二月，罗马教皇公布教皇上谕与教会禁书目录，凡属书及内容应绝对服从“永无谬误”的教皇上谕（教皇永无谬误说是一八七〇年七月梵蒂冈宗教会议决定发布的文献）。

[按]四世纪以后Komstaintim自称大帝，从此以后在罗马天主教压制下科学研究被埋没达十二世纪之久。

天主教盛行一种“办神功”运动，号召教徒们应向神甫悔罪，交代自己一生的罪行，本着坦白从宽原则，罪可邀赦免，死后不下地狱。教徒向神甫自述坦白交代，神甫即利用机会进行讹诈勒索强奸等非法行为。

从德意志学者著作中了解到欧洲宗教在中世纪黑暗时代所造成的诸般滔天罪恶是无与伦比的。当时宗教主要是统治教徒的灵魂，毒化人民的思想，影响所及，毒痛世界。

### 六、各国非宗教思想的发展

基督教思想是违反科学的，因此在近代科学发达的西方国家，很早就有不少学者对宗教提出批评与抗议。（如古天文学家伽里略、笛卡儿等）如所周知，近代科学昭示：人是顺应自然进化而来，同理宇宙也是顺应自然进化而来。人与宇宙的起源均非自然力量（如上帝或神）所能致力，因此宗教经典种种创世说（如摩西创世说）均属幼稚可笑的非科学思想。

自从十六世纪下期（一五七一年十月底），自路德在Wetinborg

发布宗教改革大纲九十五条以后，旧教威信逐渐衰落。德国神学家施特劳夫斯 D. F. Schtnavss 提出捍卫理性与反对迷信的口号以后，西方大陆宗教迷信前景已日趋暗淡。

德国文化界如 A. Faik (1827 - 1900) (普鲁士教育大臣)、康德 I. Kant、Goethe、Haikel 等均属非宗教宣传者。康德哲学举世瞩目，他曾经是无神论者，他对宗教从一元论观点出发，认为上帝存在与灵魂不死均无法证明，宗教信仰纯属虚构，人们必须放弃宗教信仰，崇奉真理。这就是说宗教明目张胆提倡迷信，要求人类理性盲目服从信仰，同时否认科学真理与历史事实。因此对宗教必须全盘加以否定，当代德国新文学家反对宗教尤为显著。

席勒 Schiller，公开刊布其诗云：“若问我信奉那种宗教？我不信任何宗教！为什么一种宗教也不信？——由于宗教的原因！”

德国学者布伦达洛 Leo Brentano (1844 - ) 提倡科学与非议宗教更属不遗余力。尝宣称：“科学研究的唯一目的乃认识现实，于此可云，真理是最神圣的，真理深入一切，不当畏惧考验与分析，真理本身是决不顾艰险、不惜毁誉而我行我素的。”

上述反基督教思想在各国酝酿既久，渐渐弥漫各国，成为一种时代潮流，中国学术思想自然亦受到启发，对宗教由迷惘而生觉悟。后来深知宗教是迷信，科学是智慧，二者方向背离，宗教与科学不两立，她们既不并存，也不可折衷调和。

### 七、北京非宗教同盟及其活动

在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以还，科学与民主思潮同时也是否定宗教迷信的。当时北大校长蔡子民公开倡言以美育代宗教，这是一个含有建设性的主张。

在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二一年间，在巴黎的萧旭东与文虎通信频繁，大都是讨论北方新民学会工作与新文化及学术建设问题，同时亦涉及宗教与科学关系问题。双方强调在思想领域内，当前不应回避宗教问题。一九二〇年十二月萧子昇归国到北京后访问文虎（见新民学会通讯集第二集十二月一日信），二人共同商定组织非宗教同盟事，并定期邀约北大师生组织讲演会，主持者多为北大哲学会学员及北大马克思学会会员，气氛热烈，随后由文虎与蔡子民商量进行办法。蔡在思想上反对各种宗教，主张以美育代宗教，所以力赞此议。商量结果，大家决定组织非宗教同盟 (Un Religion Bunde)，由北大师生联合国立八校师生共同发起。

非宗教同盟成立后，公布非宗教同盟纲领（墨耕与文虎共同起草），举办学术讲演及座谈会，出版非宗教论文集。当时有少数不明事理的青年学生，起初以为尘世纷扰，怀有出世思想，认为信仰宗教可心境

宁静解脱。读了非宗教论文集后，纷纷表示他们恍然大悟，毅然放弃出世思想，参加非宗教同盟。

一九二〇年二月间，北方区决定先成立非宗教同盟，继成立非基督教同盟。同年三月，以北京大学为中心的非宗教大同盟运动渐次开展，使国内宗教迷信者大感不安。于是北大教授钱玄同、周作人、沈兼士、沈士运、马叙伦等于三月三十一日发表宣言，反对非宗教同盟及其发起人，另一些人则暗中破坏。梁启超于四月十六日在哲学社公开讲演，题目是“评非宗教同盟”，斥责反宗教运动，是违反约法与宪章，对北大主持非宗教运动者大肆攻击，但大势所趋，已不可违抗。

一九二〇年十一月，萧旭东回到北京，即到西斋来访文虎倾谈，后同往前门珠市口浴室进浴。二人在浴室凭几对坐，畅谈别后双方生活及学习与工作等问题。二人正谈话间，忽见炕凳上茶杯互触，发出响声，电灯摇曳，头感晕眩，浴客一群，惊呼地震，夺门奔出。二人整衣出外，立在院中，众浴客仓皇出走。旋地震中止，二人横躺炕上谈宗教问题，子昇表示愿助一臂之力，组织生力军向梁等反攻。翌日子昇复至西斋告文虎云：李石曾有意出刊反宗教论文丛书，愿意彼此合作。因商定目录、性质，分别向各方（主要是北大教师及部分同学）约写文章。经过二星期后，陆续收到蔡子民、王星拱等论文，凡十余万字，临发刊时并将近代欧洲学术界名人图片、格言集译，其有关反宗教资料若干幅，刊于书首，题为非宗教论（文集），是年六月书成，交子昇负责发行。综合反对宗教论要点为：（1）宗教迷信神权及祭司，与科学对立；（2）宗教定于一尊，与民主不相容；（3）宗教派生之变象宗教（教条主义）褻渎人类尊严，祸害与宗教无异。（4）铲除宗教与变相宗教后，人类始获真正自由与平等。（5）政治应与宗教及变相宗教分离，否则便成为专制独裁与暴政。论文集对梁等颇发挥反击力量，由是反宗教运动更加广泛与深入。

[注] 一九二一年六月出版非宗教一书<sup>1</sup>，初印本现存北京马恩列斯编译室，内有罗章龙所著“宗教与科学”，萧旭东所作“宗教与自由平等博爱”，及蔡子民等人所写文章多篇。当时收集非宗教论文集来自各方，为数颇多，因此，原稿预定出两集，后因事迁延，未及继续印行，只出一集。当时京沪各大学图书馆均有◇藏，可供参考。

1 《非宗教论》已由巴蜀书社于1992年重印。—补注

#### 四、中共在北京的先行组织——《新青年》

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是在一九二〇年春成立的，为了说明北京小组的起源，更须前溯到一九一八年的北大社会主义宣传与组织各项活动，特别是《新青年》的活动。

##### 一、《新青年》纲领

《新青年》原名“青年”杂志，一九一五年九月创刊（上海群益书店发行）。创刊号社论云：国势凌夷，道衰学弊，后来责任，端在青年。本志之作盖欲与青年诸君商榷将来所以修身治国之道。其具体主张见第一卷“警告青年”，内容：（1）自主而非奴隶，（2）进步而非保守，（3）进取而非退隐，（4）世界而非锁国，（5）实利而非虚文，（6）科学而非想象。在同卷所撰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一文中标示：近代文明的特征有三：（1）人权说，（2）生物进化论，（3）社会主义。当时执笔者为陈独秀、刘叔雅、彭德尊、高一涵、易白沙、陈赅、高语罕、汪叔潜等。第二卷改称《新青年》，一九一七年陈仲甫入北大任文科学长（相当于后之文学院院长），始于《新青年》二卷六号（1917年2月1日）刊布“文学革命论”，手订北大中国文学课程表。他自任文科学长后，北大教授李守常及校外人士张继、马君武等先后加入《新青年》社为撰稿人。

当时仲甫以文科学长地位与李守常一道开始团结北大内部的激进同学于其周围，其中如理科学学生张国焘、文科学学生罗章龙、邓中夏、刘仁静、高尚德、谭鸣谦（平山），法科学学生谭植棠等十余人，均为当时热烈宣传社会主义的先行者，后来渐渐从事有组织的革命活动，先后成立共产主义小组，社会主义青年团，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与劳动组合书记部等革命组织。

##### 二、青年思想界的水泊梁山

《新青年》同时辟“读者通讯栏”并征集社外文稿。当时参加投

稿与通讯者有：高语罕、恽代英、二十八划生、杨明斋、李震瀛、周佛海、陈公博、叶希夷、沈玄庐、李达、沈泽民、李季、李汉俊、戴季陶、沈雁冰、高君宇、纵宇一郎、张崧年与柯庆施等廿余人。上述诸人后均参加中共组织。因此有人称《新青年》当时已成为中国革命青年思想界的水泊梁山，反抗旧社会叛徒的逋逃藪。又叶希夷（叶挺）（1896—1946）时为湖北陆军预备学校学生，致“新青年”主编陈仲甫信，全文颇长，中有句云：“愿向圣贤道路鞭策。”云云。此外尚有读者多人向《新青年》投函。仲甫后因反抗北洋军阀，主张市民权利，于一九一九年六月被捕入狱，由于北大师生奔走请愿及北京各界营救，旋获释出狱，出狱后不久便赴广州，到达广州后对于革命事业信心更趋坚定。回溯数年以前他尝有一种思想苦闷，感到救国无方（见其所著“自觉心与爱国心”），现在他对人生问题上已有明确的判断，在其近作感怀诗中意境非常明晰。诗云：“在永续不断的时间中，永续常往的空间中，一点一点画上创造的痕迹……为了光明去求真神，见了光明心更不宁，辞别真神，回到故处。爱我的，我爱的姊妹兄弟们，还背着太阳那黑暗的方面受苦，他们不能和我同来，我便到那里和他们同住！”（《新青年》七卷二号）守常说：“此诗全篇意旨在热爱众生，修己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全非自性涅槃可比。”同年十二月，他在《新青年》七卷一号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一日刊布本志宣言，简明扼要标明民主革命主张：反对军国主义和金钱主义。打破旧观念，树立新观念。建立新社会。主张民众运动和社会改造，与各派政党断绝关系。建立真正的民主政府。创造新时代所需要的文学，道德。尊重科学，尊重妇女人格权利。

## 五、京师大学与蔡子民

中共策源地是以北京大学为基地，但《新青年》分裂并非事出偶然！一方面表现出坚持革命的北大青年凌励无前，同时也反映出保守文化势力无比顽固。为了了解双方冲突，特别是中共艰苦奋斗历程起见，这里必须就当时北大内部情况略作说明。

北京大学的前身是满清京师大学堂，原以造就官僚为主的学府（译学馆则专培养翻译人员）。当蔡元培被任为校长后（原任校长为张百熙），即屡次谈到北京大学腐败污习。如学生以求学为猎官之阶，教师以风雅相尚（指玩妓纳妾等），从此可见北大所继承的旧染污习是非常浓厚的。因此蔡履任后组织进德会，号召不做官、不纳妾、不嫖赌等，以冀收移风易俗之效。不过蔡所指陈诸弊尚非北大全部面貌，实际上当有更甚于蔡所云者，即蔡本人亦多言行相违，名不符实，其他诸人更不足论，从以下无数事实中足以说明。总之，五四以后，北大师生中对革命有远见、有抱负的只是极少数出类拔萃的“北大人”，其余大都属于洋迷、官迷、财迷或兼而有之的世故派，等而下之则为酒色征逐一流。由此可见北大教师中的实际情况是流品不齐、杂处其间。以所抱人生观加以分析：“温饱之夫”（宣传温饱主义）与“乡愿之徒”（附从大盗的乡愿），实居多数。从其历史出身说，更可以发现：帝制余孽、封建官僚、市侩洋奴各种人物，形形色色，未遑悉数！

### 一、蔡子民简介

蔡元培，字鹤卿，号子民，满清探花，民元任教育部长，后任北京大学校长。蔡治校标榜兼容并蓄，故北大人杂沓，鱼龙混杂，贤愚互分，蔡之一生，亦受其影响。

蔡长北大时年已五十岁（蔡一八六六年生），阅世极深，对于当前政治问题一面重视现实，同时却巧于依附社会新兴的思潮力量。如

在五一节宣讲劳工神圣，对北大中共活动与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表示支持。在苏联大使越飞欢迎会上，蔡元培率先颂扬十月革命，说道：愿以中国居于俄国革命弟子之列。当时舆论认为蔡惊世骇俗，一鸣惊人。

北大江浙集团对北大革命新兴力量心存歧视，但蔡别有用心，独排众议予以赞助，从二十年代北大校刊纪载可以窥知一二。按实说来，蔡在北大校长任内前期，确曾做过一些有意义的事，北大亢慕义斋流风余韵至今不息！

“二七”罢工后，国内革命低潮，蔡乃远扬旅行欧洲以避难。一九二六年吴稚晖劝蔡返国参加南京政府，蔡乃在比国公开讲演三民主义为中国所必需，中国不宜阶级斗争，无共产可能。一九二七年一月蔡回国以后，受蒋介石命任浙江政治会议委员，四月任上海政治委员会委员与吴敬恒等发表护党救国通电，反对武汉政府及中共与苏联。后来南京政府成立，蔡参加清党运动，历任教育部长、中央监察院长及中央研究院院长等要职。一九三三年一月，蔡在南京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时忽与该院总干事杨铨（杏佛，江西人）及林语堂组织民权保障同盟。时文虎被逮，陷南京狱中，蔡以师生之谊营救救出狱（一九三三年五月）。此事为奸人所深忌，乃派人将杨铨暗杀，是年六月十八日杨铨被刺身死，蔡惧祸及己，停止活动。（杨十八日上午八时被刺，二十日葬上海万国公墓）一九三三年中共党内大规模残酷斗争后，革命实力损耗无余，中共临时中央迁闽赣，是年三月，蔡见中共式微，乃领衔与叶恭绰、李石曾等发起马克思逝世五十周年纪念会。在抗日战争时期，蔡隐居香港，以寿考终。一九三四年一月，蔡作自传：“我在北京大学经历甚详，但对北大中共活动诸事则讳莫如深，（原文见宇宙风五〇至五六期），对李守常亦佯作不识。北大同学有人箴蔡反复无常，蔡门人某以“五就汤、五就桀”为蔡解嘲，其一生善变，出人意表，往往如此！”

## 二、新学阀

北京大学人事复杂，薰莸共器已如前论，教师中洁身自好，学有专长，诲人不倦者固不乏其人，但居全校统治地位者，实为江浙派人物。自民自民元以来，历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与教育部长多年，其同乡攀援依附左右者渐渐形成江浙派。即：蒋梦麟、周作人、周树人、马叙伦、马夷初、沈兼士、沈伊默等，其中多绍兴同乡，且为蔡之门生故旧。如蒋梦麟即为绍兴中西学堂学生，蔡时任该校监督。周树人为蔡长教育部时该部科员，其他诸人均属蔡所提拔，彼等以北大为巢穴，平日对于任何不利于自己派系之变革均在反对之列，遽论革命。在蔡领导的江浙派人物中，当时在北大掌握实权者为绍兴师爷蒋梦麟，

遂依附蔡进入北大，任总务长兼为蔡私人秘书及账房。蒋为人多权谋，人称为绍兴师爷的智囊。蒋、蔡深相结纳，把持校政，后依附南京助桀为虐，自身亦臻显位。

在北大教授阵营中，社会革命主流以《新青年》为代表，已见另文，逆流思潮中则有胡适与陶履恭等人狼狈为奸。胡适留美，归国任教，适依托杜威，宣扬杜威哲学，有如小庙庸僧，何能有为，后乃整理国故，考证旧闻，蛊惑青年，世所共喻。陶履恭不学无术，曾一度留学英国，媚外最甚！他常宣扬英国道德意识，说：“中国如果亡国，最好亡给英国。”又说：“英国政治清明、生活富裕，百年以外中国当不能及。”其丧失民族自信如此。因此对一切革命行动均表示憎恶，不愿触及。此外追随胡、陶同流合污者尚有钱玄同、刘半依等。这一伙人盘据学府，成为学阀，均属社鼠城狐之流。以北大为窟宅，巧伪自饰，欺世盗名，流毒学府，污秽红楼，人所共知，毋俟烦言！由上所述，可见北大思想界分野是十分显明的，有如泾渭分明，清浊互见。从长期观察，激浊扬清亦属历史演进，势所必然！

## 六、北京大学新闻学会

一九一八年以还，北大学术研究与活动盛极一时，其中以哲学研究会与新闻研究会会员人数最多，均公开活动。其活动情况由当时北大校刊（三日刊）择要公布，时至今日犹斑斑可以考见，毋待重陈。其中新闻学会除于课堂研究外，兼重实践，会员中参加当时革命行动者不乏其人。如邵振青、徐宝璜、二十八划生、纵宇一郎、胡信之、王力、林白水、谭祖培、陈公博、谭直常、宋克钦与廖含英（女）等二十余人。学会定每周讲习二次，在文科三十六教室举行，经过五个月结业，由蔡校长亲临举行毕业典礼，由北大新闻学会发给文凭（详情见北京大学校刊）。这是中国新闻学创建的良好开端。下面转介文虎对于北大新闻学会回忆录片段，以供参考。

远在民国八年时，我方在北京大学预科读书，当时北京报业颇为发达，大小数十家报纸，像晨报、京报销路相当多。个人因为爱好新闻的缘故，所以颇想对报学作一番研究。可是当时学校课程并无所谓报学，北京的各大学中，更未设有新闻系。

一天，我与几个同学在北河沿散步，途中谈到此事，大家觉得何不集合几个人，来共同研究这一门学问，谈后一齐便去向徐宝璜教授请教。徐教授江西人，新从美国回来，会谈之下，十分热心。自说：他在美国时已学习过几种有关新闻学的课程，他很愿意指导我们修习。同时我们又将这个意思告诉常向我们拉稿的邵飘萍氏。邵氏是京报社社长，江苏人，三十余岁，为人聪慧活泼，一表非凡。他为京报写社论，做采访，编新闻，并经理发行广告等事，十分干练，每天工作极忙。听了我们的来意，立即表示愿意赞助，并约定下周开始讲习，一切讲义、印刷、实习等事，由京报免费负责供应。回校后，将此意转陈校长蔡子民，他迟疑了一下，问，你们功课正忙，是否因此荒旷学业。我们再三请求，子民方答应了，并鼓励大家应为建立理想的报学

而努力。我们益觉兴奋，遂与徐宝璜教授商量妥当，设立新闻研究会，招募会员，推子民为会长，徐先生为总干事，每周星期三与星期六晚间七时，各讲授一次，地点在一院二楼三十六教室。工役茶水等事，由北大庶务处供应。开学起首的日子大概在十二月杪，小室内水汀甚热，窗外朔风如虎，路上来往颇觉寒冷。

宝璜教授讲授新闻史，编有讲义，前后约百余页，源源本本，内容精彩可观。徐先生诲人不倦，心地诚实，很有心做中国新闻学的开山祖师。高兴时，滔滔不绝，一讲就是两三个小时，毫无倦容。讲到一段落时，发问责答，十分认真。有时发给卷纸，令大家作题实习，如发现错误，立即援笔改正，我们着实获益。短期讲用，一生受用不少。

邵飘萍讲授新闻实务，他自承学问根底不佳，其实他的文字写得很通达而且很敏捷，真是下笔千言，顷刻交卷，就在这两点上给我们的训练很大。他最能干的是采访新闻的手段，他自诩守如处女，动若脱兔，有鬼神莫测之机。例如当时刺宋渔父要犯洪述祖正在北京就逮，他运用方法从洪妾之手中获取洪氏亲笔日记露布京报，幽燕人士无不惊其采访绝技。

邵氏为人做事极切实，且机警肆应，故京报销路首屈一指。其个人私生活虽不守程规，但追求新闻自由却极热烈，他终因此遭北洋军阀戕杀，有此烈绩，其他一切都可原谅。他留给新闻研究会同学的印象大体是不坏的。

后来新闻学会举办了一次临时实习性的小型报纸，仿佛是为应北京全市运动会开幕而出版，但随即停刊。五个月讲习期满，举行了一次结业仪式，每人发给毕业证书一纸，上有会长子民师与总干事徐宝璜先生的签署，大家什袭珍藏，认为无价之宝，所印发的讲义数厚册，亦极有参考价值，可惜这些东西都留在北大第三院储藏室，迄今尚不知下落。

大学六年修业期满（预科二年，本科四年），新闻学会的会员风流云散，有的游学海外，有的橐笔四方，徐先生亦不知在天址间何处。当时共事的同学，有为国立功勋者，革命被戕杀者，有以文学自显者，有以治学著书终生者，其存其歿，不能悉举。我出校后浪迹欧洲，常好彼邦新闻事业接触，间写通讯，专栏论文，归国后初亦曾自办报纸，终无所成。某年筹备一个英汉版大型报纸亦遭停刊，从此以后即放手不再办报，决心治学。

（下略）<sup>1</sup>

<sup>1</sup> 此行原文如此。— 补注

## 七、燕都横议

一九二〇年前后，北京大专学校参加社会革命者以共产党与共青团为中心，其对外活动则为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其革命活动活动范围以产业工人群众为主，其次为北京各大学与专科院校学生。当时北京学生中信仰激进社会主义者有安那其主义（即无政府主义）与工团主义份子，人数虽不甚多，但多属纯洁无瑕青年，各树一帜，从事独立的宣传与组织。北方中共组织对他们特别重视，并与密切联系，因此，双方往来频繁。亢慕义斋谈话会时彼等参加，中共经常以争取他们共同革命为务。

安那其主义者大都分住在斗鸡坑及西什库等处，其重要人物为何孟雄、罗汉、张树荣、李树彝、贾纾青、王诤、吴容沧等。安那其主义者自号清流，俯视社会主义各流派，其根本思想是反对政治、泛劳动，去战争（自称不吃人肉馒头），对共产主义格格不入，但他们承认马克思学会及书记部的人革命动机纯正，可引与为友，所以亢斋与斗鸡坑双方往来无间，且经常辩论共同感兴趣的问题。现在仅就安那其对于若干重要问题意见摘述如此，可见双方由分歧到合作过程之一斑！（下述诸论点是根据安那其主义者座谈言论及书刊综述。）

安那其诸论点包括：（1）无治思想；（2）泛劳动；（3）反思想奴役；（4）政治动物论；（5）战争与和平；（6）社会主义各派；（7）悲观史观等，这些论点都与亢斋诸人所抱观点互不一致。当时围绕上述论点所发生的辩论，记载已佚，遂成阙文。

从以上所述各点，略可窥见当时北大安那其主义者的思想与言论一斑。他们的思想言论虽然与亢斋诸人异趣，但双方接触频繁，互相辩论，往来竟无虚日。当时中共方面自仲甫以下诸人先后刊布与安那其辩论文章多篇，其中一部分文字分别在《新青年》、《共产党》月刊、《工人周刊》及《向导》发表。同时中共与安那其双方政治关系亦渐成为北方区委书记部经常研究与讨论的问题。

当时中共方面认为斗鸡坑诸人虽然怀有“不完全则宁无”的理念，怀有若干消极虚无情绪，从而对旧政治有严厉的谴责，对共产主义者有深刻的批评。但他们却律己甚严，遇事勇猛精进，见义勇为，因此认定他们的人生观究竟与“山河幻象、四大皆空”的虚无寂灭思想完全不同。至于安那其主义者从历史见地，对于现实政治表示深恶痛绝，这是有其根据的。对于革命党派表示怀疑亦未可厚非，因为过去绝大多数信誓旦旦的革命党人，在取得政权以后就摇身一变而为反革命者。要使革命者永远不变为反革命者究竟凭甚么去保证呢？除政治观点外，他们在思想上是激进的、民主的与反专制的，行为是坦率无邪的。如在“五四”时亢斋诸人多参加北京学生会组织及活动，并有多人在“五四”与“六三”运动中被捕，均与无政府主义者携手并进。赵家楼之役，罗汉等率先踏肩翻窗进入曹宅纵火，旋见烈焰腾空，推开铁门仓皇退出，后至者易克崑等八人乃被警察捕去。六月三日文虎与罗汉同时被捕。此后中共初期许多工作均与安那其主义者采取联合行动。

北方区委决定先后派文虎、君宇、中夏与缪伯英[注]等用座谈会形式，多次与安那其分子解释中共党与团的政策与书记部策略，表示愿与他们为友，共同赴敌。经过多次磋商后，安那其分子共同表示愿以个人身份分别加入中共党团与马学会及书记部工作。犹忆在某次斗鸡坑举行的座谈会上，对方有人向中共方面提出许多质问，当经天放等作详细说明，始释然。树荣后因病回南方，临行到亢慕义斋话别，谆谆以双方团结共同革命互相勉励，并向文虎表示党内民主应有保证，应尊重不同意见。中共北方区在采取团结社会主义革命各派战士政策的结果，使北方党与工农运动获得迅速发展。在组织马克思研究会时，双方互相尊重，一致合作，同时北方书记部容纳了更多的无政府主义者，他们在许多次罢工中，都遵守纪律，站在斗争最前线。

关于共、安双方合作问题，当时缪伯英曾说过下面一段话：“由于书记部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对各派革命采取兼容并蓄的政策，于是党内有人耽心革命阵营将不免互相牵制，但事后表明，双方却遵循共同前进的道路，有如蜂群运动，内部虽然群动不息，但总体却是朝着一个方向奋勇前进！”

[注]：缪伯英为中共北方区第一个女党员，湖南长沙人，高师史地系毕业学生。身材适度，面如满月，双目浑圆若点漆，秉性诚笃，机智雄辩。她从事工人运动，不幸于一九二七年患肠炎病逝于北京德国医院，年三十岁。先是伯英尝语孟雄云：“世俗追求富贵寿考，此种生活极无意义。以前童话作家格林早已说及，我们要做永久革命者，就应该永远站在统治阶级的敌对立场，做一个永远叛逆的勇士。”

## 八、京华尘影

文虎在北京居留期间先后参观过三海、故宫及其它名胜古迹，如长城、居庸关、古北口、十三陵、燕山、白沟、邯郸、督亢等地，车尘马迹不及备载。

### 一、三海游园会

徐世昌选任总统就职时，曾举行游园会，开放三海，任市民自由参观。三海紫光阁南薰殿中悬有历代帝王画像，其中如李渊、李世民、赵匡胤、成吉思汗、努尔哈赤等，颇具艺术性，人物须眉栩栩如生。朱元璋二像同列，一丑一美，迥若两人。清帝同治、咸丰、慈禧诸帝后形状各异，过往游人，徘徊观赏，叹为观止。由于数千年崇拜帝王偶像的传统，被奴役的中国人民久丧失了人类尊严，因此对历代帝王不免把大盗与骗子及圣君哲佐等同起来，对于猕猴轩冕，鲜所动心，视为故常。共往游者均嵩祝寺、吉安所七、八号同仁，回到寓中，灯下座谈，共抒观感，彼此坦率交谈，各陈所见。大家从四千年中国历史总动向观察，一致认为通观廿四史，不过一部相砍史，无数“帝王与盗贼”，旋起旋落，如同弈棋一般，只是体现着“成王败寇”罢了。观于整个民生国计进展，却是很迂回缓慢的，所付出的代价是极其惊人的。坤吾说：“中国改朝换代如同演戏一般，远古无可稽考，三代以后，历史舞台的主角均属游闲堕民而非生产人民。所谓‘出将入相’不用说是助桀为虐的鹰犬爪牙与丧心病狂的市侩屠夫。赞周说：“政洽如奕棋”，“一险胜三奇”，以战争为游戏，视厮杀为娱乐，逐鹿广阔的中原便是历代政治冒险家的乐园，也是他们投机失败的坟墓。

更有人从画像外貌立论，因此谈到历代酋主外貌，认为创业者较刚强，守成者多羸弱，塞北箕裘与江南文采各自异趣，所以朝代兴亡，并非全关“气数”。也有人从地理分析历代君主中定都西北者则尚开边与黠武，立国东南者则失之苟延偏安。雄桀之夫则重税强征，残民以逞，孱弱之主则豪强兼并，但悉索敞赋，国耗民困，其致一也。最

后彦生发表感想云：“紫观阁画像多属后人临摹，大率非其真貌，无庸细究。唯其精神以敬天法祖，教忠教孝为主旨，但结果适得其反。历代帝后宫廷政变不息，一部二十四史联篇累牍，‘犯上作乱’，君臣相杀，父子兄弟尚且不免（如玄武门、甘露寺），至于臣下更多失节，虽然盛传‘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不独妇人女子为然，文死谏、武死战，今日人人以此为恩荣。昔列子不受郑子阳之惠，故不死郑子阳之难，不死无道人之难，是自守其节。中国历代帝王多属无道之人，故臣下无不失节。”这番话可谓深中肯綮。

### 二、海王村元宵灯会

在一九一九年二月间旧历春节期间元宵节晚上，文虎、润之同往琉璃厂甸观赏灯节。全城张灯结彩，火树银花，盛况空前。如此繁华夜景，在家乡长沙确未曾见。二人从前门经过大栅栏、珠市口，步行十余里，并折向西行经琉璃厂甸、海王村等地，兴尽而归。在厂甸附近见有北大教员师生数十人围聚在几个大型红纱宫灯下正猜灯谜，大约有几十个纸书谜条缀在宫灯下面，征求过往赏灯者竞猜，猜中获胜者奖赏物品为纪念章、文具、字帖、书籍、锦旗等。当二人游观至海王村时，各巨型宫灯上所缀灯谜几乎都被游人猜出领奖携去，仅余一个灯谜，上书：“自耕稼陶鱼以至为帝”（按，此语出孟子），谜底下书为北京一地名。润之首先发现此灯谜，徘徊宫灯下沉思片刻，不得其解，乃轻声语文虎，共解此谜。文略加思索笑答，这地名就在我们脚下，因以是点地说，琉璃厂甸海王村便是。因此此谜文耕稼影射村，陶影射琉璃厂甸，渔影射海，帝影射王。润之听罢狂喜，大呼妙文妙地，二人乃踏月而归，只见沿街夜深人静，皓月当空，银河泻影，到达吉安所寓时，已近三更，乃推门而入。以经过告同人，绍麻抚掌称善不置！

### 三、清代故宫

北京故宫在紫禁城内，在浦仪出宫以后乃开始改作博物馆。考故宫建筑始于十五世纪（一四二〇年），自明朝永乐到清康熙时始全告完成，有宫室阁宇近一万间，占地七十二万平方公尺。世人谓：克里姆、凡尔赛、白金汉诸宫殿方之于此，不逮远甚，良非虚语！（如文虎所游览的Potsdam、Sansasi王宫，乃建于一七四五至一七五七年十年间即建成，可谓小巫见大巫！）纵观清宫建筑繁复，但格式平凡，体现出封建专制的全貌。如天安门与地安门，天坛、地坛与日月坛等，其外形与精神是互相表里，凝滞无生气。想见当年其强迫劳动强度与劳民伤财程度却是极为惊人的。

清代故宫开放较迟，在参观历史工艺馆时，其中有一“授时馆”，将古代原始计时器、沙漏、铜壶滴漏以及中世纪意大利佛罗伦斯所作



巨钟和近代瑞士所产精装马表，一一陈列出来。在兵器博物馆有清代铁甲，重数十斤，能御刀箭。又有在抚顺起兵时八旗骑兵马甲。明代倭寇在沿海登岸时所用的步兵作冲锋的大长砍刀，刀长五尺，刃含秋水，锋利无比。这次参观给大家很深刻的印象。

## 九、怀冰庐语

怀冰庐为西什库同学集居所在，与亢斋同人常相往还，声气互通，但却自成风气。其中如韩守一、刘伯琴、汪桐、吴蛩窗、廖含英诸人，孤怀独往，均有抱负，高自期许。

### 一、韩守一财务建议：

韩守一，太谷人。北方区委与书记部本身经常穷困，但有时经手代募罢工经费却有相当数目，事过即罄。长期经管财务者为史文彬、邓培、王瑞俊、谭寿林、陶永立、张昆弟等。史等对开支分文不准乱用，王、张对帐目检查极严，号称铁面无私，人皆畏惮，不敢侵占分毫。当时工人称书记部高山泉水，清澈见底。北方党与书记部经常处困境，因此有人建议采用特别方法筹款，以期打开经济方面（劫取银行库款即其方案之一），但均为区委与书记部所否决。后仍有韩守一建议，韩向北方区委建言，革命事业需要财力支持，党应在此方面多方筹划，以利革命发展。韩自言其外祖父李某为李刚主后裔，与山西太谷金融界颇有交往。太谷自清代初叶得李自成所遗金银甚多，所以票号遍南北，党应设法派人前往暗中联络其通识大义者，并自愿担任使者，请党会同派人前往该县，当可收臂助之效。守常聆悉，颇趣其言，决定试行，但旋因韩离京出国，事遂搁置。后事为仲甫所闻，仲甫笑道：“断不可行，莫作此想。”遂作罢论。

[注] 传言李自成自北京退出，路过太谷，委弃金银珠宝辎重车数百辆，太谷人暴富，遂经营票号遍布中国南北云。

### 二、刘伯琴谈片

刘伯琴，四川人，曾在四川顺庆任教，对川中政治颇熟悉，谓四川中层阶级反共积极，但军阀官僚中想向苏俄拉线者却大有人在。袁世凯心腹四川嘉陵道尹张澜、宦囊充裕，各方拉拢即曾向中共暗送秋波。又袁氏帝制筹安会会长杨哲子，失败后央人介绍向北方区委表示

请求加入 C.P.，守常拒而不纳，并语同志云：“对旧式军阀官僚政客联甲倒乙策略，本与社会革命型范毫无关涉。”盖当时中共北方政策是愿意联合动机纯正的社会主义革命各派别青年学生，但拒绝与假民主的官僚名流政客合作，因为后者混进革命阵营，便如同投鼠矢于粥锅，结果会因小失大，以假乱真，使革命走样、变质，且助长军事独裁，政客寄生。当时大家认为革命纵遇困难，但决不宜用饮鸩止渴的办法。因此对他们投机革命一律饷以闭门羹。

### 三、汪桐爱人以德

中共诸人在北大期间以身率教，同学间翕然景从，他们生活清操自励，献身革命，人所共喻。守常生活率真，守身如玉，不慕声色货利，少与同县赵纫兰女士童婚情好至笃。北京为歌舞纷陈地，无聊文士人多求宦达，以风雅相尚，狎妓捧角，酒筵征逐无虚日。守常生平未常〈尝〉涉足韩家潭、广和楼一步，并诫同志切勿沾染旧习，不得阅看“清闲录”。故北方区同人均能以革命为先，谨其操守，不慕荣利，自成风气，视庸俗爱好如污，避之若俯。书记部曾立公约，限制个人谈恋爱，俾集其全力于革命事业。

一九二二年五月，某路工会秘书汪桐自外埠来，寓北方区宿舍，同时有小史（女）亦从汉口来京，邻室相处，男女慕悦，相见恨晚。事为鸿劫所闻，立告瑞俊使二人隔离，瑞俊直造汪室，向汪婉言劝阻。汪初似漠然，瑞俊正色道：“应遵守书记部公约，爱人以德，有过必改，今日还不算迟。”汪悚然动容，问书记部负责人知此事否？瑞俊答：“难免不知！”汪立刻感悟，请求迁出，并誓从即日起与女方避而不见，以示决绝。鸿劫闻此告文虎道：“汪年事轻而改过迁善极勇，可嘉！”瑞俊笑云：“汪桐算是过了一关，小史尘缘未净，却还有问题。”史婚后仍不改旧习，遂离党而去。

### 四、春英惊梦

廖含英思想激进，尝谓中国女学生多怀有洁癖，防意如城，守口如瓶，言行不敢放胆，遂不免坐井观天，听人摆布愚弄。她曾经写过一妇女与青年纲领，包含下列主要几点：即妇女教育、工作机会均等，就业自由、罢工言论自由、男女同工同酬、妇女禁止参加重体力劳动、婚姻从旧制度解放，同时反对性的放纵制度等等。对未成年青年反对政治宗教各种迷信邪恶教义，确定自由基础，因此被某些新旧卫道者称为叛徒。含英旋被任为远东日报筹委会工作。后因某事涉嫌，为忌者所乘，虚耕情节、刊布新闻。含英乃请假休学回籍。好事文人尽情渲染，写成传奇小说，附会其事，竟流传沙滩红楼一带，尽人皆知“春莺惊梦”一幕，所谓“魂消雪窖，泪洒冰天”词，其实均子虚乌有，不足置信。

### 五、一意孤行，萤窗陷狱

吴萤窗（容沧），浙江温州人，杭州中学毕业赴京投考北京大学，未被录取，流寓不归，参加工读互助团组织，信仰安那其（无政府）主义。萤窗性如烈火，与人说话喜抬杠。经孟雄介绍加入书记部。他在工作中强调个人先锋作用，随被派往长辛店，吃苦向前，遇困难不后退，于工贼作斗争时奋不顾身，勇往前扑，与工会群众一道，率将工贼邓长荣打倒，工会中人无不赞其勇敢。在山西铁总筹备会上，萤窗发表几点意见：（1）组织工会秘密武装与敌周旋。（2）用非常方法筹集大宗款项，加强工会实力。（3）用恐怖手段对待敌人，造成革命广大声势，轰轰烈烈大干一番。会上大多数人不同意他的意见，因此萤窗心怀抑郁，认为己意莫伸，工作难望迅奏功。隐怀去志，并以其心事向文虎吐露。文虎劝其坚守书记部政策，一俟条件成熟时，革命是必然会以武装斗争取得最后胜利的。萤窗口虽允诺，心仍不以为然，愿试行己意，以求在工作上开展一个新的局面。会议结束后，各路代表均回本路，萤窗独留。是夕，萤窗约文虎同出外行猎，归途迷径，天黑云昏，投宿皇姑寺（明代吕姓女尼修行于此）。萤窗向文虎道：“我的心事已向大会表白，大会却不采纳，使我无法在这里呆下去了。”文虎解释说：“这是革命老问题，以前大家已讨论过，认为不可，为什么今日又忽然提出，如何行得通？”萤窗说：“我并无别意，老兄既不赞成，我只有孤行己意了。”文虎一夕未睡，继续向萤窗进言，劝解勿走极端。彼阳允诺，乘其不备，离京赴鲁。去时携去勃朗宁手枪一支，子弹廿五发（该枪系法国同学从巴黎带来）。萤窗到济南后，设计去抢劫商埠二马路某储蓄银行，亲持手枪跃入柜台，强迫银行营业人员打开保险柜，取得大宗现金钞票外逸。出门时即与闻警驰至的军警队相遇，遂被逮捕，送济南地方法院拘审，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书记部派人往鲁，经营救出狱后，只身远遁，不知所终。

### 六、刘季平

刘季平，北大国文教员，江苏人，原日本成城学校骑兵科学生。归国后无所施展，乃弃武就文，讳言曩参加清末革命事，谓革命党互相吞噬，谄事北洋军阀。对北大学生革命运动，目为“南方之强，守善意中立”，对执政诸人说成是“两条〈头〉蛇南阳卧龙，三脚猫渭水飞熊”，“貌若恺悌为仁，行同蛇蝎”。刘素富于正义感，故同情马克思学会，遇有争执，仗义执言。当马学会发启时，启事刊在北大日刊中，有“皓首穹经”一语。北大某教员阅后殊不谓然，向人说：用皓首穹经一语称马克思著作，有类信口开河。夏华因请执笔者文虎加以解释，文虎适他往，天放往问教师季平，季平因告天放云：“中国五经不过卅来万字，十三经约六十余万字，均出多人所作。”天放

喜道：“果然如此，马克思本人所著书当超过三十万字，若合计恩格斯及其他人所著，远在十三经之上。启事此语，自亦有处，岂是信口开河？”某闻言默然。

刘住苏州会馆，生活清苦，陋室一间，自行炊爨，嗜酒苦吟，自号不醉翁。刘好阅野史，擅填词作曲，熟习宫廷掌故，尝编一种戏曲题为“西苑记”以示伯英。剧情内容是：明嘉靖壬寅西苑宁嫔王氏主谋，率宫人杨金英、杨莲香、苏川药、姚淑翠、刑翠莲、黄玉莲、尹翠香、王槐香、张金莲、徐秋花、张春景、邓金香、陈菊花等十六人组织宫廷革命，她们乘明世宗宿曹端妃所，一拥入宫，用绳勒世宗咽喉，以抹布塞其口，数人踞腹绞之，垂绝，为皇后所闻，率众入救，世宗出险，十六人皆被戮。刘既编剧，并自度曲，教伯英、含英等演唱。刘旋南归，剧未出演，遂成“广陵散”。纵观刘之为人，实“北大人”中之皎皎者！

## 十、译事余论（亢斋自学记）

马学会成立英、德、法、日语文翻译室，计划编译丛书，并为《向导》及劳动通讯社供应稿件。译书计划是《向导》编委会讨论后作出决定的。当时马林来京，携来上海、广州方面的翻译工作方案。马林在会议上把北京马学会的译述意见书合并讨论，遂产生一个新计划，各组主持译事同志经常在亢斋集议，讨论有关编译问题。最先被提出的是翻译方向与方法问题。对于方向问题决定丛书偏重政治理论，采取集体决定，刊物稿件则范围更广，由译者自由决定。对于方法问题，经过若干次座谈后，才逐渐取得明确意见。当时集中讨论的有：可译性与不可译性，如何保证译文忠实，通顺与条理明畅。长短句译法研究、译述韵文方法、语言与翻译的关系等问题。

首先关于可译性的问题，有人认为两种语言结构互异，且风韵各别（如西班牙语庄严、法语流畅、德语强劲、英语含混等是），其思想反映不可能在双方语言中恰如其份地表达出来。如威廉·孔柏特 Wilhelm Gunfoldt 所云：或者过于严格地遵守原文，结果损害了原著，两者以外无中间道路。（见威·孔柏特一七六九年致友人书语）。由于有些人过分地强调不可译性，遂产生不必要的顾虑，甚至◇翻译大可不为，勉强为之，无异含哺哺人。这是全盘否定论，已被大量翻译界实践所证明其不合理。因此大家一致认为译述工作固然有若干困难存在，但是如果熟谙有关语文与业务，并具有高深的科学、文学、哲学、社会生活经验等方面的修养，则凡属在各个单独要素中不能翻译的东西，在复合全元中却可以翻译。根据各个要素在全元中的意义上的联系，就能克服不可译的困难。其次为了保证译文忠实通顺与条理明畅起见，应努力研究原作思想内容与语言分析，反复进行翻译，尤应彼此互相观摩切磋，才能将原文真意确切表达出来。在译述过程中特别应对于繁复语句，简略语句及独特习惯语等逐一攻破。

关于翻译文学、诗歌，特别是具有音韵、声律、骈偶以及隐语等文学著作，原应比译述散文加倍困难，但这并不是说一切有韵文学都不能译。过去如歌德所译东西方抒情诗集（一八一七年出版），仍是优秀译品，只要译者具有高度文学修养，对原作有正确与深刻的理解，抓住原作特点兼会通全文意思，亦可融会贯通，选用适当语式将原作表达出来。文虎在执行计划时（一九二〇年秋至一九二一年冬），曾与北大德文系同学商章孙（学名承祖，其父商愈縻系前清探花，章孙毕业后任南京大学教授）合作试译卡尔·费尔伦德 Kan Vollander 所著英马鲁埃尔·康德传 Immanuel Kants Leben。该书译成后于一九二二年二月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哲学丛书）。同时还译有德国文学家歌德、雷新、斯笃姆等人著作。在泛滥康德所著“纯粹理性批评”等书时，感到康德思侔造化，文若悬河，益人神智。文虎所译约翰里德著“震荡世界十日记”曾在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廿四日《中国青年》第六期刊出，其中一章题为“俄国农村之一幕”，其余部分稿件因原稿被租界巡捕抄去，未续完而罢。

中共中央局诸人多擅长外语（英、俄、德、法、日语），仲甫与守常对英、日文书刊均能阅读。仲甫所编模范英文教本颇具匠心，又其所译赫克尔“宇宙之谜”一文，词义信达，但仲甫口语发言却不甚纯正，听力亦欠佳，因此在与国际代表会谈涉及长篇讨论时，必须藉助于他人翻译。《向导》编辑室订阅多种外文书报，均由编委会分任译述，国际代表所撰文章亦须经过编委会译成中文，然后刊布。C.Y 中央有关外语文件亦由《向导》编委室代译。有一个时期大家热衷学习希腊文，以期阅读欧洲古典文学。墨耕进度较快，博闻强记，为侪辈冠。他每遇困难问题发生，往往脱口而出，连呼“英特雷希”Enteche！（希腊文意译，意为完成），闻者启齿！

## 十一、冰窖胡同政闻

中共北方区委因工作扩展，曾租赁南池子冰窖胡同某号作为宣传部机关。在筹备《远东日报》（英文版）时即以该处作为《远东日报》编辑部。在冰窖胡同期间，北方区委曾成立中外政治经济资料室，收集有关方面文字图片等，分门别类加以整理，作成卡片及索引。从这些资料中，对于近代中国政治、军事、工业、交通、财政、金融、科学技术以及文化教育、宗教组织、政党分合各方面发展与动态均有所了解。这些资料对于当前从事革命实践、敌我情况分析具有重大启示。这对于后来北方区委与书记部工作发生过良好的参考作用。

冰窖胡同《远东日报》馆是一所结构曲折的旧式平房，大小廿余间，每月房租五十元。房东裴某时在总统府仪仗队任职，军服佩剑，颇具威仪，但极胆小畏事，因系范鸿劼出面，彼此藉同乡介绍，双方遂订立租约。鸿劼、孟雄、伯英、王铮及其他报馆执事约十余人，均住在报馆内。裴某自言本人乃将门子弟，湖北蕲春人，服务军界，历时甚长，对北洋海陆建制如数家珍。

### 一、北洋军阀形成与演变

中国自辛亥革命后，中央政权即落于北洋军阀之手。北洋军阀之形成以袁世凯为创建人。袁死后，北洋军阀继续执政前后历三十年之久<sup>1</sup>。先是李鸿章所练陆军直隶淮军练勇计：盛军十八营，九千人；铭军十二营，四千人；毅军十营，四千人；芦防淮勇四营，二千人；仁字虎勇五营，二千五百人。合计四十九营，二万一千五百人。（袁世凯小站练兵更在其后。）裴又谈一八九四年袁世凯在小站练兵时招募定武军十营，共三千七百五十名，其中步兵一千名，炮兵一千名，骑兵二百五十名，工程营五百名。一八九五年扩充到七千人。北洋军阀基础由斯建立。后来扩大到第六镇，清末北洋军共有三军，即袁世凯

<sup>1</sup> 原文如此，三十年不确，疑为“十三年”。— 补注

新军、聂士成武毅军与董福祥甘军。三军均受直隶总督节制，总督荣禄乃慈禧亲信。义和团八国联军之役聂士成作战死，董福祥去职，唯袁独存，领导北洋军阀。袁死以段祺瑞为代表，继起执北洋军阀牛耳。清末建设后分裂为奉直两系，内部继续分化至一九二七年趋于灭亡。清末建设新式军备，号称北洋海陆军者不足十万人。当一八八八年间，北洋海新式军备，主力舰有定远、镇远、经远、来远四艘。铁甲巡洋舰有致远、靖远、济远、平远、超勇、扬威六艘，吨数自一三五〇至七三三五吨，马力自一五〇〇至六〇〇〇匹。炮船镇东、镇西、镇南三艘，吨位各四四〇吨，马力三五〇匹。又防守舰队有镇北、镇中、镇边炮船三艘，各四四〇吨。练习舰有康济、威远炮船二艘，各一三〇〇吨。补助舰有安方、镇海、操江、湄云炮船四艘，各九五〇吨。以上共计二二艘，四一二四六吨，船员二九五〇人，大小炮七五九门。

[按]：当时全国海军分为三区：中区自环台至三都澳，司令处设于崇明岛；南区自三都澳至澳门，司令处设于琼州；北区自鸭绿江至环台，司令处设于秦皇岛；内部派系斗争颇烈。

清末的北洋陆海军曾经在中日战役全部消灭，情形是：北洋陆军自一八九〇年七月开始在牙山溃败，九月平壤失守，十月自九连城退，大连、旅顺、牛庄、营口相继失守，全师大败。北洋海军自七月在牙山海面济远、广乙二舰受损，随后大东沟海战结果，致远、经远被敌鱼雷击沉，超勇被大炮击沉，扬威舰被撞沉，余舰逃威海刘公岛海面。次年二月，日舰来攻，定远被大炮击沉，来远、威远被鱼雷击沉，残余军舰十一艘向敌舰投降，至是北洋海舰全军覆没。继袁世凯以后，段祺瑞建立参战军，张作霖建立奉军，此外南北各省军阀均自建省军此兴彼落，战争不息。

## 二、北洋军阀的财政基础

北洋军阀的财政经济植基于外债上面。辛亥年上半年，满清政府向英、德、法四国财团订主币制，借款一千万镑（三月十七日），又向四国银行团订借川汉粤铁道借款六百万镑，又向日订铁道公债一千万元，以上合计二亿元。以后袁世凯举行善后大借款，段祺瑞的西原借款，均其巨擘。当代主持经济财政政策者为交通系。交通系主要人物为梁士诒、叶恭绰、郑洪年等。彼等初附袁世凯，后附段祺瑞。后曹汝霖成立新交通系，均属北洋军阀走狗。该系人物先后为北洋军阀及其后孙中山等政府所重用。此乃由于交通系以国际资本金融集团为后援的缘故。当时国际帝国主义活动的大本营即近在咫尺的东交民巷使馆区，号称中国政府的太上皇。时东交民巷城垣上有强大的国际无线电台，国际海底电线亦在天津登陆，各国国际通讯社、报馆与新闻记者亦麇集京津地区，帝国主义国家即据此发号施令，称霸远东。

## 三、北方区委与国会议员接触二、三事

高君宇与晋籍国会议员焦易堂、王用宾等时相往还，曾向北方区委进言，其中有些旧隶同盟会议员愿与中共合作。经北方区提出讨论，当时多数同志认为与议员官僚往来，影响党誉，所以延未作出决定，后来区委讨论决定准许与议员采取联合行动，但仅限于劳动立法事项及院内行动，当推定君宇出面接洽。自此以后，君宇与议员继续接触。

时有鄂籍议员胡鄂公（范鸿劫同乡），经人介绍向书记部献策组织军事，以为社会革命运动之助。胡自称出身木匠，辛亥前曾在湖北组织共和会，后加入共进会。现同情社会革命，愿在军事方面尽力相助。此事遂由文虎提出北方区委讨论，区委转向中央会议提出讨论。当时中央书记仲甫，殊不以此为然。他说军事路线是行不得的，何况舍本逐末，恐将画虎不成反类犬。守常亦说，胡等平日为人太乱，决不可与为友。君宇意殊怏怏，当众说：“人家既愿意参加革命，我们为何拒而不纳？”文彬道：“官僚议员们不好相交，他们棋布闲子，注押冷门，未必真心参加革命！何必与他们周旋。如果要搞军事，我们可以独立行动武装工人，不理他们为是。”议遂定。后来北方书记部正式向北方会议建议组织秘密工会武装纠察队，并由北工区军事工作人员张隐韬起草方案送往中央。该方案主要内容分三部分：（1）建立社会主义革命武装的理由。（2）建立矿山、铁路及大城市工会秘密工人武装纠察队计划。（3）分期实施计划方案。但是当时中央格于军事投机的顾虑，并未慎重讨论，因此亦未作出积极决议，遂成悬案。

## 四、联吴问题

一九二二年夏，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到北京出席北方区委会议，在会议谈到孙中山表示愿意与吴佩孚联合反奉事。时守常有同学二人在吴方任职，一为白坚武，任关巡阅使署参谋长，一为孙丹林，任北京政府内务部长。

1. 马林赴洛阳 马林通过白、孙二人向吴先容，遂于九月间赴洛阳会见吴佩孚，向吴谈苏联对远东及中国政策。时京汉铁路大罢工胜利<sup>1</sup>，吴认识到北方中共的力量，因此对马林极重视。马林又向吴提出孙中山与吴佩孚合作问题，吴亦满口赞成。一九二二年九月下旬，孙丹林公开宣称：吴佩孚赞成孙中山的兵工政策与反对联省自治的割据，但本人不愿抛弃实力，听人摆布。

大金刀真了不起：马林返北京后报告与吴佩孚谈话经过，北方区委以转达上海中央，中央复电同意。后吴来电请守常到洛阳面谈，守常赴洛阳时仍申前议，劝吴与孙中山合作。吴请守常草一电致孙中山，欢迎孙北上，守常即席代吴草电，内有三薰三沐以表欢迎语。吴略一

<sup>1</sup> 原文如此，京汉铁路疑为陇海铁路或京奉铁路之误。——补注

寓目后即令秘书发出。事后吴对白坚武说：“李大钊代表劳工势力，我看他确像一把大金刀，真了不起。”盖吴本秀才，失意时曾在北京宣外摆设测字摊，后投小站从戎，官至巡阅使，仍好拆字以决疑难。他析钊字为金刀二字，故云。因此有人判断吴对守常兼怀敬畏之心，且含有很深的猜忌！

2. 四督察员 当时孙丹林奉吴佩孚命向守常表示：交通部部长高恩洪（吴佩孚系）颇思整顿交通行政，彻查交通系叶恭绰、郑洪年等积年弊窦及其结党营私情况，苦于无从下手。因闻书记部对铁路内幕颇为熟习，可否帮忙派人相助一臂之力。守常随即将此项意见提交北方区委讨论，经过会议研究，认为此事对军阀吴佩孚态度有关，可以试办。（北方区委有人极端反对此举，谓同军阀联合，与孙中山“乱抓乱拉”作风无异。）决定后遂将此意报告中央作最后决定，旋中央来电表示同意，北方区遂决定由书记部派出四人，内北方铁路区域三人，南方铁路区一人。（指京汉南段及粤汉路）。北方三人指定安体诚、陈为人、张昆弟，南方一人请中央转向湖北省委提名，后来湖北省委指定包惠僧，由中央来电知照。北方区湖北同志提出包为人不太可靠，建议另行指定他人。守常说：“既是中央来电，我们照办就是，品质较差也希望可以改善。”是年七月交通部正式委任四人为督察员。督察员主要是出差到各路调查，所得材料分别送给交通部及书记部各一份。由于交通系封锁严密，四人对铁路本身业务不熟悉，所起作用不如预期之大，但对交通系在工人中各项组织如职工联谊会，精益求精研究所、天津同乡会等活动也增加了解，足为决策参考。惟包惠僧表现极坏，勾结高恩洪营谋个人职位，后来遂受到纪律制裁。

## 十二、亢慕义斋载记

“亢慕义”初本文虎笔名，后北方区委同志即就文虎所居西斋室命名为“亢慕义斋”，其原委如次：

当时北京大学学生宿舍分为二处，第一舍位于北河沿第三院（法学院），亦称东斋，第二舍位于马神庙第二院内（理学院公主府右侧），亦称西斋。中共北方区委开会经常在红楼东楼下图书馆办公室邻近小室内举行，有时则在西城石驸马大街迤南后闸三十五号，人数较多时则在马神庙西斋，即文虎住处之亢慕义斋。区委常委会一切行动工作及内部联络处亦指定在亢慕义斋进行。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驻京办事处则设在东斋，党团书刊发行部设在中老胡同三号，由中夏、王铮等住在该处。当时北方区委负责人经常到亢慕义斋集会，座谈或接洽工作。这章所记大都属于中共北方党及工人运动发轫与其先行人物或轶事。

[按]：亢慕义斋原为（Das Kammunistisches Zimmer），意为“共产主义者居室”。最初译名“康慕义斋”，后改为“亢慕义斋”。当时文虎书籍盖有篆文方印“亢慕义斋藏书”铃记，流播在外，北大图书馆尚有度藏云。

### 一、工人运动发轫经过

中共北方组织自始即植基于产业工人运动方面，首先集中全力注意开辟这方面工作，特别强调大学生参加工人革命的实践活动。守常在一九一九年一月间刊布一文，公开箴贬为统治阶级服务的读书人。他说：“中国一部历史是乡愿与大盗结合的记录，大盗不结合乡愿，作不成皇帝，乡愿不结合大盗，作不成圣人！”（见一九一九年一月二十六日《每周评论》第六号）一九一九年三月十四日守常刊布“现代青年活动的方向”一文指出：“现代青年应在寂寞的方面活动，不要在热闹的方面活动；应在痛苦的方面活动，不要在欢乐的方面活动；

应在黑暗的方面活动，不要在光明的方面活动。”针砭时弊，一针见血。一九一九年八月十七日，他又在《每日评论》（三十五期）提出：“一个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靠着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运动。”他强调“工人联合的实际运动”。随后大学生到工厂与矿山去的口号便成为亢慕义斋谈论的主题。通过大家辩论结果，上述口号渐渐由言论见诸实践！但在实行中仍然遇到重重困难：首先是北方党团基层原先大部分是属于北大学生（广义说为国立八校等校学生），他们一般都是功课繁重，无充分时间兼顾革命活动，而且当时工运方告发轫，阻力重大，艰巨非凡，因此北大一部分党员认为，革命重于读书，只有抱定决心牺牲学业，才能以全付精力参加工人革命运动。当时在北方区党组织会议上首先表示放弃学籍者为文虎、特立与汝铭等。他们一致认为：进大学在取得学位，区区学位，对工人革命事业来说，实在渺小无足道。他们决心停止课堂学业，以全部的时间参加工作。因此其他同学有继起停学者，但仍有不少同学发生实际困难，如依靠地方政府公费及家庭经济来源者，则不能自由退学。直到经过一段时间以后，此问题才逐渐解决。如中夏于一九二一年毕业即赴保定任教，随后赴上大（上海大学）教书，直到省港罢工才脱离教学工作专做工人运动。孟雄等放弃学校全力参加工会工作，亦在一九二二年以后。

自书记部成立后便陆续有大多数大学生参加工会活动，守常在区委虽然因地位关系，不常外出参加实际活动。可是一九二一年间亦曾偕文虎与存斋到南口工会。当时住南口饭店会见当地工人领袖谈话。工人张汉清原为书生，任职车务领班，见守常大布衣衫，不识其为何人。会毕询存真，存真乃以实告，张大感动说：“我们到处访贤，今日始遇真人！”文虎当向张解释，张道：“老兄不要见怪，我这是实话！”

## 二、书记部人工作初遇险

一九二二年夏，文虎因赴京汉南段、粤汉北段株萍铁路考查工人生活与组织工会，兼到武汉、长沙与当地中共小组商谈地区工作联系问题。时长沙群众工作在学生方面已开始发动，准备成立自修大学（后改湘江学校）。次年八月由何叔衡出面接收船山学社正式开办，由于经费拮据，乃由何出面发帖请长沙教育界仕绅赞助，设宴二席招待，但届时被请者相约不到，结果无一人赴宴，何不以为意，决意独立支持，直到一九二三年八月该校被封闭。文虎当建议湖南应以全力发展工人运动，俾全国工运平衡发展。中共湖南小组自一代会后，遂以全力从事组织工会。文虎事毕离长沙乘火车北返，由工人陪同共往岳州、蒲圻连络。时夏末秋初，余热犹厉，已过岳州，车行经荣家湾站，正值深夜，车忽在两山夹道中出轨停下，忽见大队士兵操北音，一面鸣枪示威，蜂拥进入各车厢。时文虎坐在车门口，只见士兵咆哮而前，

一兵端枪在手向路警射击，另一兵连续发枪数响，向车后门首警士射击，警士亦当还击。当时旅客仓皇乱窜，夺门越窗逃奔，妇孺惊啼，秩序大乱。霎时，大队变兵踵至，向旅客搜查箱匣，搜毕，随后复有几队士兵轮番搜劫，如此约经三小时，始闻集合号音。变兵在站上清点劫掠物品，堆成小丘。据说有某银行解款银元十余箱，旅客金饰现款及贵重衣物全被劫去。事后确知该变兵一团因欠饷数月，迫而出此。在战斗中击毙路警二名，旅客二名，伤五名。旅客中一妇人被斩去一指，劫其金饰而去。变兵去后，车厢死伤枕籍。此次经历为文虎从事工人运动初次遇到虚惊，随身衣物旅费全被劫去。车抵鲇鱼套时，工人闻讯群集问讯，并募资护送文虎渡江向京汉路渡黄河北去。

## 三、北方工人党员阵营

初期中共北方区党员大多数为大学生，其次为工人，还有少数教授秀才。北方区委第一个工人党员为唐山车辆厂（南厂）广东镟工邓培。邓培，字少山，广东三水石湖村人，一八八四年生，一九〇六年为唐山铁路车辆厂南厂技术镟工。一九一九年春，文虎初至唐山经甘达（邓培表兄）介绍与邓见面，邓向文虎谈辛亥革命后（一九一一年间），粤籍工人曾在唐山成立工党，有工人七百名加入。是年九月又有人另组华民工党，两党互相攻击，工人不直其所为，纷纷退出，两党均告解体。于是粤籍工人自组广东会馆以资联络。开滦五矿技术工人则自组矿局同人联合会，邓被选为广东会馆值年。

当文虎第一次提出介绍邓培入党时，北京党小组即加以郑重讨论，但未作出决定，主要原因是为对于邓的家庭问题（或系叶秀珠事）不完全明了。会毕守常语文虎可到唐山找邓多谈谈。过了些时，文虎再度把邓培问题提出，并将邓致党的信交会上阅。守常说：“中国产业工人历史很短，邓培两辈作机器工人，这是难能可贵的条件。”由是众无异议。邓在会上讲话，自述生平及愿望，自称：“四十年来光阴空过，自今以后，一切当从头作起。”

继邓培之后，书记部先后介绍史文彬、王荷波、孙云鹏、张汉清、郭恒祥、李青山、沈干城、姚佐唐、伦克忠、孙津川、葛树贵、郝英、曾玉良、康景星、袁乃祥等入党。中国产业工会以铁总规模最大（有会员十万人），而创建最早，它是中共在工人阵地最强大的力量，因此铁总党团也是拥有产业工人人数最多的支部。铁总工人支部的斗争史绩是集中以千计的党团员力量体现出来的，而邓、史、王实为其中出类拔萃的人物。邓入党后于一九二二年一月出席莫斯科远东大会，在莫斯科郊外别墅会见列宁，会后参加北方书记部工作，为唐山特派员。京奉机务正处长英人詹姆生 Jameson 对少山极畏服，在京奉路罢工及五矿同盟罢工时，邓均为罢工委员会负责人兼党团成员之一。全

国铁路总工会成立后，并推邓为常委。（邓工资九十元，入党后缴党费三十元）。一九二五年邓辞职离唐山，专做铁总工作。一九二六年回广州任广州办事处主任。一九二七年广东清党时，李济琛于四月十五日派兵捕邓，拘于戏院，夜间李下令将邓培、李森等杀死，沉尸海中，时年四十三岁。邓身后遗妻叶秀珠、长女国英、次女国芬。

### 十三、长辛店目营八表

长辛店为北方工会产业工会重镇，虽地处芦沟丰台偏隅之地，但实际上是当时北方工人斗争大本营。目营八表，故其行动影响及于国内外。当时京汉铁路总工会党团书记为史文彬，长辛店党支部书记吴汝铭，均书记部重要成员。

#### 一、史文彬

史文彬，山东历城人，一八九〇年生，原德州兵工厂锻冶工人，好阅读书报，通达事理，为人刚强疾恶，急公好义，最先加入劳动组合书记部，为京汉路第一个加入中共党员。平日注全力于革命，见难不避，见利不争，掌工会会计，经手巨万，一介不苟，被选为京汉铁路全路工会会长。吴春熙、陈励茂、陶善琮等均醉心革命，并具长才，与史和衷共济，相得益彰。

#### 二、吴汝铭

吴原本北大法律系学生，长沙金井人，平日在校专心治学，不问外事，后为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发起人之一。当长辛店教师张纯、李实因事返湘，贾祝年返赣后，教员杨人杞乘机闹薪，弃职而去。汝铭闻讯说：“不要紧，留下的课都由我包下来教。”全校几班课程，日夜分班上课，下课后自行炊爨，艰难撑持下去，度过学校危机，长辛店工人称吴见义勇为，赞扬不置。

京南诸镇循长辛店南行乃至大名、保定、石家庄、彰德、郑州、信阳以达江岸，石家庄党组织成员主要为张昆弟、袁子贞、高克谦、张兆丰、马尚德等。

#### 三、袁子贞

袁子贞，直隶霸县人，一九一七年应募赴法国战地做勤务工作，在法组织华工成立华工会，被选为工会负责人。一九二四年经苏联回国，与守常同车到北京。子贞年富力强，诚笃有才干，为守常所器重，



归国后向书记部申请做工会工作。时正太路为借法国资本有债务关系，通用法文，因派子贞到石家庄工作，成绩颇著。袁一九三一年在党内斗争中失踪。

#### 四、张兆丰

张兆丰，直隶磁县人，育德中学毕业后考入陕西陆军讲武堂，旋在陕西国民军任下级军官。一九二四年入党，任国民三军混成旅参谋长，驻正定，兼任军事工作，一九二九年牺牲。

#### 五、马尚德

马尚德，河南确山人，开封工业专门学校学生，一九二四年在京汉南段工作。一九二七年初在开封加入中州大学 C. Y. 支部后，派往京汉路信阳工作。一九二七年四月在确山领导农运，一九二九年全总派马赴东北工作，易名杨靖宇，领导抗日联军，一九四〇年二月，在蒙江被日寇杀害。

## 十四、天津诸彦

北方东南地区包括山东、淮海、长江北部，为津浦、陇海（东段）、胶济三路交错地带。中共党团与工会组织重镇分布在天津、济南、青岛、徐州、江浦等处。天津为京奉、京浦二铁路枢纽兼城市轻工业集中地区。中共书记部海河北地纬路设立工人子弟学校及夜校，在天津工作者主要有韩麟符、于方舟、辛朴田、安幸生、安体诚与陈振国、孙过廷（二人均铁路工人）等，其中以韩麟符、于方舟、安体诚与辛璞田宣勤最多，号称四杰。

### 一、韩麟符、于方舟、辛璞田

韩麟符，直隶人，原南开大学学生，后转学北大，入党后担任组织北方及内蒙方面农民武装工作。于方舟，字兰渚，直隶宁河县人，南开大学学生。辛璞田字绍卿，直隶安新县人，直隶省立一师学生。于方舟、安幸生、辛璞田三人均在指挥工农斗争中牺牲。安在一九一九年六月天桥案发生后，时南陈北李微服出京，安幸生乔装赶大车车夫，挥鞭策马，出彰仪门，护送二人脱险，安抵津门。

### 二、安体诚

安体诚，（一八九六—一九二七）字存斋，亦名存真，直隶省丰润县人。一九一七年在直隶省立法政专门学校（原称北洋法政学校）法律本科毕业，一九一八年入日本京都帝国大学，一九二一年回国任法政教员，后加入北京马学会及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一九二二年被派至天津宇纬路创立天津工余补习学校，参加铁路工人运动，兼任交通部督员。一九二三年体诚赴杭州法政专门学校任教，同时担任浙江省中共省委及沪杭铁路工作。一九二六年四月十五日，李济琛下令大肆屠杀共产党员，体诚变服从广州赴上海，在法租界和平旅馆，被上海国民党邮政工会朱学范等派人捕拿送市党部，囚于龙华监狱，是年五月被杨虎所杀。

1 原文如此，年份疑为1927年。—补注

## 十五、羽檄纷驰在山东

“五卅”以后，文虎与焜梅、味农有事于山东半岛，时偕东晓、熙春等往来青岛、济南间，羽书檄驰，目不暇给。时寓东流水王兰英宅，出门不远即临趵突泉，朝夕徜徉其间，遥望千佛山，历历如绘，尘襟尽洗。当时经历诸事，略举其要，以志勿忘。

### 一、山东革命壁垒

济南中共党团员大部参加山东工人运动，在大槐树设立工人子弟学校，主任刘俊才、教员王崇伍、庄春晓（女）、孙秀峰等。山东同志精诚协作，大都智勇深沉，内无私斗，外无全敌，蔚为风气，号称革命堡垒！从济南党委可见当时王姓党员最多，时人戏称“琅琊诸王”。革命堡垒！从济南党委可见当时王姓党员最多，时人戏称“琅琊诸王”。又益都魏福中家祖孙数辈同时参加革命并入党。山东党委重要人物为王瑞俊、王翔千、杨明斋、邓恩铭等。其中死事最烈者为李慰农、伦克忠、胡信之等。

邓恩铭，原籍云南昆明，随父宦历城，父死贫不能归，遂侨居山东历城，学生时代好学问，有权谋，壮思文采，以帝师王佐自期许，入党后投身工人运动，刻苦自励，履险如夷，至是旧名士习气，一扫而空！后因被于芝生告密被捕，陷济南狱中而死。

### 二、津浦铁路真假两书记

津浦铁路沿线党委书记为李保成、姚佐唐、王泽生、徐鸿儒、王荷波等五人。该路党委均强有力，能战斗，颇多可歌可泣事迹。

自陇海路罢工胜利后，敌人对书记部非常怀恨，路局交通系军警机关经常设计阻挠书记部与工人接近，挑拨工学间感情和关系。皇姑屯工人赵焕臣曾得到一本小册子转送书记部，内容针对《工人周刊》社论新闻逐一驳斥，说书记部是一群危害国家，无良心之叛徒。书记部派往各站工作人员往往因为不能接近工人而被挡回。他们经常布置圈套破坏书记部信誉，如一九二二年四月，文虎巡视津浦路来到济南

大槐树，被交通系侦悉，乃派其鹰犬假冒文虎名义到迤南各站招摇撞骗，索取酒食旅费，造成工人对书记部的不良印象。当文虎行至兖州站，该站工人甚表惊愕，拒不接纳，幸经同行李宝臣证明，工人始悟前日受交通系所派某某欺骗。

### 三、浦镇工会伟大斗争一幕

文虎巡视津浦线工作时，到达长江北岸浦镇时，该路交通系设谋划策，动员全部力量，采用武力绑架方式将书记部主任及其随行人员予以拘禁，并欲暗中残害。事被浦镇工会党团负责人王仲一闻悉，乃会商王荷波立即号召工人群众紧急集合，举行群众大会，当众宣布事变经过，率领工会群众与纠察队实行包围路局办公处，强迫厂方释放文虎二人。工人群众见到北方书记部负责人时，一片欢呼响彻云霄。乃推荷波为主席，当场宣布浦镇工会公开成立，并通知全路诸站。在群众大会上，大会主席王荷波向会众宣布说：“在今天大会上，破坏分子原想把书记部主任拘送官厅治罪，所以我们不得不分辨是非邪正，我们不得不把坏人们逐出会场，从今天起，我们浦镇工人就有开会的自由了，有罢工的自由了。”工人群众一片鼓掌欢呼，这样，浦镇大厂工会就宣告成立。工会成立后不久，经过一次罢工，实现了经济条件，工会更加巩固。王荷波斗争勇敢卓著功勋，一九二三年被选为中共三大常委。

### 四、重义气狱中争服刑

津浦一路工人斗争极为激烈。徐州党委书记姚佐唐在工人群众中有极高的威信。一九二三年四月间，正在“二七”流血案后，姚亲到南段工作。在某站开会时被军警围住，将姚及工会会员姜姓、陈姓二工人捕去。当时军警尚不识姚，三人禁锢在一室候审，姜乃向姚佐唐说：“你目标大，可能判重刑，全案可由我出头一人承担责任，等你释放后我再设法脱身。”姚不肯同意，三人正推让间，外间忽传提堂，姜应声先出。审讯官问话时姜自承为工会主持人，愿负全案责任，他们二人来会闲坐，不要牵扯二人。问毕返室，加上镣铐。姜乃以审讯经过告姚，叫他坚不承认罪名。次提姚，再提陈，略问几句，令觅保释放。姚、陈二人出狱后，姜即翻供，遭受苦打。后姚设法将姜营救出来，姜已遍体刑伤，奄奄一息，经过一年医治后，才康复工作。

## 十六、大西北革命复兴

西北各省经济较东南落后，自陇海铁路修至陕西境内，中共及工农组织先后进入陕甘边陲一带。首先是陇海沿线建立中共党团组织，并以洛阳为据点，向关中西安及陕北发展。当时洛阳中共党团建立，负责人为游泳、白南薰、王符圣、王中秀、戴元培等。当时北方区派人分循陇海、京绥两路进入陕西西安及陕北建立党与团的组织。刘志丹、马文彦、魏野畴、高岗、刘志丹等均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会员。回陕西后，先后分别在关中及绥德、榆林成立党与团的组织，政治榛莽地区渐辟蹊径。关于西北党委主要负责人为王中秀与戴元培。

### 一、游泳

游泳，字天洋，福建闽侯人。原是唐山交通大学毕业生，一九一九年任武昌鲇鱼套车站副站长。是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时张敬尧督湘，从奉天运来鸦片烟种子四十五袋，每袋重一百斤，即将运往湖南西部强迫农民种烟，每亩收捐二百元。天洋激于义愤，拒绝拨车，与押运官兵发生冲突。天洋乃将此事通知湖北旅鄂湖南同乡会前往协同阻止，将全部烟种当场焚毁，见者无不称快。（见一九二二年二月湖南学生驱张代表团刊物《天问》周刊。）湘督军张敬尧乃咨湖北督军王占元捉拿天洋，路局遂调天洋到洛阳大厂任工程师。其间游曾来北京加入过当时尚未公开的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为会员。天洋到洛阳后与当地工人交往甚密，并领导工人组织洛阳陇海工会，于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十七日发动陇海全路罢工，随即天洋将全路工会交由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领导。随后由守常与文虎介绍加入共产党。入党后天洋意气昂扬，告人说：“我亦革命一分子，能以参加毁坏旧世界的工作为荣。”天洋为书记部事亲赴唐山交通大学联络。后来唐山交通大学学生会开滦五矿罢工中组织当地学生、市民实行同情罢课，与此有关。一九二三年陇海路局以重金贿赂洛阳驻军吴佩孚第三师军官用武

力威迫工会秘书兼党团书记游天洋出境，天洋于中途被迫害而死，时年二十九岁。天洋独身不婚，为革命奋斗而牺牲。中共北方区委及劳动组合书记部联合举行盛大追悼会，到会者数千人。劳动组合书记部挽联云：“是琦瑰磊落之生，生当媲诸禹墨；为劳动运动而死，死有重于泰山。”天洋生平事迹见一九二六年全国铁路总工会出版的《革命战士集》第二篇。

### 二、王忠秀

在洛阳方面继游天洋而起者有河北王忠秀。忠秀为北大哲学系同学，因醉心工人革命，投身陇海铁路工作，长期与军阀周旋，一九二五年终为吴佩孚所害，其事迹见文虎所写王忠秀烈士传一文，在《向导》和《革命战士集》刊布。

### 三、白眉珊

白眉珊，字南薰，河南汝阳人，满清秀才，年五十余岁，执教二十余年，古典诗文均佳，家贫如洗。他向文虎表示：“古今革命不同名，其为吊民伐罪则无二致。书记部所为，即吊民伐罪事业，但又不至以暴易暴，所以可贵。我虽年老，但执鞭亦愿为之。”因请加入书记部为一员。罢工结束翌日，白曾导文虎游龙门西山石窟伊阙，二人共登邙山，白指伊、洛、瀍、涧等水语文虎云：“此古代驰名四水，在南方不过沟渠而已，何足道哉。”又行伊水上，白为述吕蒙正饴瓜亭事，人惊其赅博。文虎归京将白加入书记部事告同志，天放说：“书记部竟有老秀才加盟，可谓异数。”“二七”后白闻变忧愤，终被构陷而歿！

## 十七、劳动文艺

引言：中共北方区委机关报《工人周刊》、《劳动新闻》等刊物曾辟“劳动文艺”专栏刊布革命诗歌，现选辑数首示例。（真君辑）

### 一、北方书记部进行曲序（江囚）：

劳动组合天高地阔！废除剥削，废除压迫！加入产业工会，大家齐同欢乐！

### 二、铁匠营战歌（天放）：

加入工会人都有份，咱扛大旗你掌印。妇女大队走向前，纠察健儿打头阵！

### 三、长辛店机车厂工会（金争）：

罢工！罢工！工会显威风！资本家，吓破胆，工人个个向前冲。看！好样的！打先锋！

### 四、八月斗争曲（树夷）：

天不怕！地不怕！只怕资本家说软话！大家牢记十六条，不达目的誓不休！

### 五、赞书记部（天洋）：

书记部，人人夸！南北工人是一家。立工会，提条件，万事有他站前线！同心合力为工人，一心为公火样红！

### 六、铁总歌（雨铭）：

长辛店、山海关，十八条铁路都一般。条条工会向铁总，一人有事众人抗，一路罢工各路上。“二七”京汉大斗争，千秋万载好榜样！

### 七、十赞词（震异）：

一唱书记部，英雄数不清！人人闹革命，个个先行兵。二唱史文彬，辛店立大营。保定斗军阀，四海显义声！三唱邓少山，老家在香山。开滦大罢工，立功在唐山。四唱王瑞俊，豪杰出济南。献身书记部，威震山海关。五唱葛树贵，京汉领雄兵。手撑大会旗，扫荡娘娘宫。六唱高碑店，大哥康景星。平生

不怕死，为工会牺牲。七唱王荷波，浦镇扬洪波，军阀资本家，莫可奈他何！八唱伦克忠，胶澳起雄风！北海工会起，红焰满山东。九唱王忠秀，河北钟灵秀。“五四”驱国贼，洛阳铲工蠢。十唱施、林、曾（施洋、林祥谦、曾玉良），纷纷掷头颅！为了干革命，拼将身命酬。（十唱书记部）

### 八、北方书记部：

书记部，真不赖！领导我们立工会，八月罢工涨工钱，年节包饺子，闺女有花戴，你看赖不赖！（北方红星）

## 十八、金陵聚散

文虎在三大中央政治局工作时初寓闸北路三曾里一号，中央宣传部与妇委亦在同号二楼办公。王春熙、向警予与王亚璋均同住。春熙，扬州邗沟人，原在宣传部工作，能力颇强。她对女工部时出主意赞助，遇有缓急事，伊必挺身独任其难，不稍瞻顾。王常语阿贞云：“上海滩流品不齐，人事诡变，钟英（中央代号）诸人全神贯注工作，周旋酬应却非所长，以后如有本地交往，我可代劳，庶免为人所乘，因小误大。”荷波深以为然，自后遇有对外交涉事务，辄托春熙出面交涉，伊对各事料理齐楚，效果极佳，并教女同志学上海闲话，讲解工作方法等事。伊尝说：“革命事体，一方面是大刀阔斧，一齐砍过去，同时也要些细致功夫，如缙丝绣彩一样细致，不能粗心大意。”因此，在这时期，中央机关得以安全无恙，春熙出力独多。

一九二四年文虎曾有事于苏北，召集浦镇会议，江浦会毕乃偕孙津川渡江南至金陵，就地邀集南京全体同志在莫愁湖舟中报告会议情形。谈话结束，各自散去，文虎正待进城，忽遇王春熙于蓼屿荻洲水榭。王原在上海瑞兴里居住，后因母病回返江都省亲，经时不得其消息，至是邂逅湖上。文虎问春熙何以至此，伊泫然道：吾母已逝世，姑母携我来江宁同住，现寓水西门陈家。因约文虎往憩。二人遂相偕至其姑母家。姑丈陈先生时任常州某中学教员，有女廉思，原在沪爱国女学教英文，现因病休假家居，从廉思谈话中知席咏怀为伊至友。会日暮，春熙强留文虎宿陈家作一夕谈，至深夜始寝。翌日，姑母全家与客共载一车同游燕子矶，乃至三台洞，登阁道，远眺长江，水净沙明，澄澈如练。游览毕，下木阁，遂临燕子矶。但见悬崖峭壁间，万户千窗，苔花若绣，乳燕纷飞，蔚为奇景！顷之，行径一处，导者云，为李太白夜饮捉月堕江处。廉思谓当年太白穹途无依，“世人皆欲杀之”，显寓环境险恶，被迫沉江致然，所谓船头捉月乃属后人托

词。语未毕，忽闻柳外轻雷，风雨蔽江，闪电划空，霹雳震惊，游人相率避雨肖寺中，门外车辙如乱麻，寸步难行。廉思慨然语文虎道：

“宇宙气象，瞬息万变，人事亦然，君仆仆风尘，几易寒暑，迄无休止。尝闻咏怀言，北大红楼书记部诸人，从君犯危难，冒白刃，前仆后继，牺牲累累，可以成丘。‘我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他日苟念及此能无废然！”因劝文虎早些撒手。文虎略加辩解，廉思切言道：“干戈蛮触，海宇流血，屈子沉湘，仲连蹈海，均政治作俑，迟悔不如早退。”春熙见状，急乱以他语。时雨停风静，遂登车返城。文虎与春熙直到下关，乘车赴沪，二人在沪宁路车厢中商量今后工作问题，春熙表示愿意离开家乡，旋又谈到廉思家事。春熙语文虎：“吾姑母是女居士，经常长斋绣佛，因此廉思近来也就渐渐变成政治槛外人了。你看今天她不是向你说不一大堆疯话么？”文虎沉思片晌，惘然回答道：“人各有思，未能强同，今日之是，他日却又成非，到底谁在说疯话，也难断定呢！”春熙闻此大不谓然。我们与廉思金陵聚会分手后，形迹渐疏，三五年后始获重见于汴梁，人事沧桑，又阅十载。

## 十九、钱塘江行

江北会议后，全浙江工作会议接续在杭州召开。时于秀松、贺威圣、沈仲九与文虎共寓湖滨旅馆，商谈全浙江会议有关各事，深夜未散，越朝泛舟游湖，经岳坟步行登山至南高峰而返。舟中并分别起草会议文件，交互参阅，事毕续谈。于等三人均健谈，于人生宇宙，上下古今，滔滔不绝。于云：“四度空间，心灵活动不在内，其义未免不周。”沈云：“心灵活动，亦不限于地球人类，其它星界又不可知，如何才能周？”贺云：“古人有天问与天对之作，究其所问与所对，亦多瞽说。”其它类此，不尽记忆。仲九所谈多涉及文艺，评论《新青年》、《向导》文风奇情壮采，笔阵轰严，各擅其胜，颇有独到见解。并说：“仲甫废诗未免矫枉过正，我弃人取，当造成他日损失。”秀松云：“书记部人多属莽夫，宜其我党斯文变虎。”玄庐聆语纵声大笑。众谈笑间，诙谐杂作，贺忽戏呼仲九为“沈大官人”。沈云：“一足踏进官门，九牛难以拉出，此话不啻为我写照，所以我只有向劳农悔罪求救。”（仲九曾任云南沾益县知事，沉于声色货利，为大地主，有沙田几千亩，后乃变产业，领导衙前农民运动，带头退租。）秀松说：“沈仲九颇有文思，其所作浣沙女诗有句云：‘古衣道貌富心机，文绣膏粱藏诈气’，深含忏悔意。”

杭州会谈以后，众人相伴赴浙西，登会稽访禹陵。大家导文虎出诸暨南门望苕萝山，泛舟浣江，登浣纱石，访西施故里（即施夷光所住西村）。但见孤帆谡谡，江水明鲜。咏怀说：“一代政治姑娘，造成千秋话柄，可谓人杰地灵。”有人提议再去桐庐览“七里滩头，秋风钓叟”之胜，因时间匆促，未多留连而返。

席咏怀原在上海女校习英文，后赴北京升学进北京大学英文系，与缪伯英友善，参加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并任译事。其父闻讯，函令返家结婚，咏怀不遵命，其父大窘，然亦无如女何，遂允解除其女婚约，

并不干涉其自由。咏怀乃返浙省亲，但未及仍只身离家北行。一九二七年乃至武汉中共中央担任鲍罗廷夫人翻译，后鲍夫人乘兵舰回国，过南京为山东督军张宗昌所拘留，解往北京入狱，咏怀乃赴京营救鲍夫人出狱。

## 二十、黛茜

当文虎孑然一身回到离开久别的北京大学，此时此地北大人事变发生不少变化。中夏、特立等已远走高飞，北大同学云南三王已毕业离校，天放、王铮等均已会南方，马学会已升华为伟大的党的战斗集团了。仍住在马神庙西斋宿舍，虽然室小人阔，但人事殷繁，生活时有失衡之意。正在此际，于茫茫人海，仕女如云的北方名都中，偶然从南方来的谢怀龙到北大上学。

谢原名黛茜，Daisy（译意“勿忘侬花”，为兰色花朵），杭州西兴人，其父为丝绸商人，怀龙是独生女，父视若掌上明珠。十五岁入上海伊莫麦女学肄业，学习中文和英文，成绩优异。幼年家庭代订婚事，见男家富有而品质平庸，黛茜对婚约不满，婚前乃逃婚他适。二〇年独往北京求学，进入北京大学英文系听课，参加班会活动时结识石评梅、缪伯英等同学。伯英经常送书报与黛茜阅读，黛思想渐左倾，尝写北京文学界消息投稿密勒评论，上海英文大晚报，并将浙江故乡丝厂女工消息投函《工人周刊》，她便中了解北方书记部一些内幕情况。旋父母来信促其南归完婚，黛惶恐不自安。后乃回信拒绝，申明婚事问题如不解约，誓不返家。伯英见状问何故拒婚，黛以实情告伯英，伯英十分同情她，戏问：“那么你今后打算同谁结婚？”黛茜戏答：“我愿意同舒奇铺（即书记部）结婚。”伯英大笑，转告文虎，文漫应之，未深询其事。

陇海路罢工斗争既起，文子身往洛阳指挥，孟雄留守北京，循伯英之请，请黛茜任书记部秘书，黛遂加入共青团，时年十八岁，自后伊工作十分努力。文虎回京后与Sliufnied◇◇商量筹办远东日报于北京，由文虎主编中文版，评梅与黛茜共编英文版（该报旋停办）。

一日，黛茜、评梅到马神庙西斋北大宿舍访文，商谈远东日报西文版出刊问题。谈毕，伯英从外入说：“我今天请你们到第一春（北大

附近小餐馆）便餐，我有很重要的问题向你们提出。”评梅因事先走，于是英、黛、文三人同往第一春。座中文专心致志看随身带来的信和文件。黛、英二人谈锋极健，热烈辩论。正谈话间，伯英忽转向文云：“你为什么老不说话呢？难道是专等着吃才来这里吗？”黛云：“他对我们所谈的事怕不感兴趣，你莫勉强他。”英云：“他工作以外素不关心他事，这固然是优点，但未免过犹不及，也应受批评。”伯英忽把话题一转，谈到黛家信中愿与书记部结婚的问题，大家围绕这个问题说了一阵闲话。饭后，由伯英建议放假半天，先到陶然亭一游，游毕再回到孟公府黛茜处休息。

三人到南城远足一遍，然后返回北城，归途过孟公府时，御河桥畔柳外浓云渐起，天忽下起雨来。伯英说：“我先借黛茜的伞回去，等一会我再送伞来接你吧。”黛说：“你不必送伞了，雨停后，他自雇车回宿舍去。”等伯英去后，黛拿出她所写的作品（发表的文章锦集本）请文虎过目，文浏览一遍，见其中英文小说、小品文译作颇富，且有不少佳作，颇作到信、达、雅的标准。因细心阅览，欣赏不已。黛茜在一旁正襟危坐，沉吟不发一语。阅毕，黛忽然向文虎说：“近年书记部总算有些成绩，今后最迫切的事是应多方延纳四方才俊加入书记部共图进展。”文聆语心颇折服，谈话继续深入，越谈越远，像游骑奔驰，漫无止境。

天色已近黄昏，雨仍不止，远处柳岸轻雷，渐近渐大，隆隆如滚车。未几，迅雷烈风挟倾盆大雨而至，院内远近沟壑皆盈，不能出门一步。黛茜笑云：“雨势飘忽，不必急去，今宵坐待，点烛长谈，等明朝雨过天晴，再走不迟。”文无可奈何，只得暂留。这样二人对坐，直谈到天明始散。第二天清晨，伯英因接上海急电，送伞来把文接走开会去了。

从此以后，文虎在北方一方面过着惊涛骇浪的斗争生活，同时也在日常生活方面得到黛茜照顾。黛茜协同北方区委对当时为革命牺牲的李味农、矛延贞、伦克忠等二十余位革命同志善后及家属抚恤、子女就学就业等事作了妥善安置，然后遵循中央来信意旨，安排进一步的工作。

1926年9月初，文虎借黛茜离开了北京苏联大使馆，乘车赴天津时，车中怀龙提议到沪下车时先往见仲甫，然后再回杭州。文虎欣然同意，但两人下车伊始，即遇仲甫临时失踪之事。事出意外，伊只得宁静心静以待极缘。仲甫即脱险，两人乃重商会见仲甫问题，结果决定次日中常会后，二人同往见仲甫。

翌日，文子身先到中央开会，仲甫精神已完全恢复，主持全会经过良好。中央会毕已正午十二时许，荣盛请仲甫回家吃午饭。文见仲

甫左右无人，向仲甫提出怀龙的请求，并将她的简历介绍给仲甫。当时仲甫显示亲切说：“你同他一道到我家进便餐吧！”文立即出门到附近咖啡座找到怀龙，同去见仲甫。怀喜出望外，嫣然一笑，立即动身前往。三人见面时，仲甫目灼灼注视怀笑道：“你家是在西子湖边住吧？”怀顿时满颊泛红，只答一个是字。随后她立即鼓起勇气把长时问准备好的一套，不卑不亢、情文并妙的向仲甫倾诉。仲甫聆毕，连连点头，口说：“对！对！我赞成你今后好好帮助文虎，也就是革命工作呢！”怀此时笑逐颜开，称谢不止。顷之，四人共餐，席间仲甫倾谈他在北大文科学长任内时代的生活，容光焕发，语若悬河！荣盛在各人前满斟绍酒一小杯，仲说自己有慢性阑尾炎，不能陪饮，但盛会难逢，你们各畅饮一杯。怀起立端杯说：“今日得见先生尊颜，是我平生最大的幸福。”言迄一饮而尽。餐后又谈片刻，大家起身告辞。

二人回寓后，怀引文到三马路丝绸行同去见她老年的父亲，并发电告她的母亲及其寡嫂。随后由她草拟一个启事，登在上海新闻报，一切事情办理妥当，婚事始告完成。

当时杭州省委突然发生内部争执，请中央去人解决！清晨，荣盛通知文虎：老头子有事找你。文偕怀往见仲甫，仲甫悠闲地说：“你们可同到杭州见见家里人，同时解决杭州省委问题。”次日他们即赴杭州暂住湖滨宿舍，地点在城站旗下。此次首先是解决楚伯洛夫（即陈为人）所犯桃色罪过问题，这个问题引起当地党和团的重大争吵，结果给陈处分降职离省了案。

次日，二人步行过钱塘大桥到西兴，到怀加共省其老母和寡嫂，并同她们共游西湖天竺、龙井、九溪、十八涧等处，盘桓数日，尽兴而归。

在萧山时，他们见到沈仲九、于秀松。沈在谈话间微笑睨怀说：“小妮子，侬跑得格快啊！”怀低头不语，心嫌其人。归语文：“此人极不可靠，应注意。”后来在“四·一二”中，沈主持杀害中共数十人，果不如怀言。怀二七年亦在白色恐怖中牺牲（可能与沈有关）。杜渐防微不力，亦颇有责任。

与怀自杭州返上海后，准备行李匆匆中，文再往见仲甫一次，仲甫嘱文即日动身到武汉去，并随带去中央干部多人，作为中共中央迁武汉前站人马。

文等遂于九月下旬乘轮上溯长江经安庆、九江转辗到达武汉。

## 二十一、三暴见闻

一九二六年间，文虎在北京负责北方区委工作，但因工作需要，经常往来南北，数度至上海。在上海中央工作时，对上海三次暴动亲历其境，耳闻目见，印象极为深刻。

一九二六年秋末冬初，文虎在参加中共中央常会工作期间，在中央会议上经常研究正在部署的上海武装暴动问题，并多次偕汪寿华、罗亦农等亲到上海市吴淞、闸北、江湾、浦东各区委部署纠察战线的战斗行动。

一九二六年六月北伐期间，当时孙传芳占据东南半壁江浙地盘，与豪绅章太炎等组织反共反北伐运动，大张旗鼓通电讨赤，于是中共中央会议决定在上海发动工人暴动，驱逐孙军，以迎接北伐军。首次暴动由中央江浙区委负责人仲甫、寿华等会同上海总工会党团同志全力以赴参加行动，从一九二六年九月间即着手开始从事部署地下军事活动。

正当此际，十月十六日浙江警察厅夏超宣布独立，率所部向上海进军，策应北伐。时上海孙军防守力弱，仅有步兵一旅与警察二千人。中共乃动员上总纠察队武装一百五十人，徒手纠察约二千人，于二十三日深夜袭击浦东与南市警署，不意是时夏超军在嘉兴战败，孙传芳上海驻军立即反击，将纠察队镇压下去。

是役二十四日晨，浦东码头工会行动队领队陶静轩等十余人牺牲。

[按]：第一次暴动在夏超战败后采取行动，乃由于时机紧迫，遂致急不暇择，且市内各工会行动复不一致，决定孤军独战，可谓失策。

又在三暴进行中，中共与上海国民党方面原有协定采取联合行动，对方派钮永建为联络员，但钮在行动中袖手旁观，无所施为，毫末起何积极作用，贻误军机，在咎无可辞。（钮为柏文蔚部下，柏介绍给中共中央书记。）



第一次暴动，孙传芳向山东调来奉鲁张宗昌军队进驻上海，加强守备力量。经过三个月以后，一九二七年二月十七日北伐军东路进抵嘉兴，中共中央乃决定采取新行动，于十九日由上总宣布全市同盟罢工，二十二日决定举行第二次暴动。此次行动以高昌庙江面兵舰水兵工，二十二日决定举行第二次暴动。此次行动以高昌庙江面兵舰水兵工，开炮为信号，届时乃下令各区纠察队行动。于是在南市闸北地区接火，双方发生冲突，时敌军李宝章部出动大刀队，冲入工厂地区屠杀工人，死伤颇重。此时远在嘉兴的北伐军奉蒋介石命令停止前进，上海孤军无援，第二次大罢工于二十四日下午被迫停止，暴动亦告结束。又经过两个星期，上海政治经济斗争再接再厉，中共中央决定重图再举，给直鲁军以最后打击，并成立上海市新政权。

三月下旬，北伐军第一师与第二师从嘉兴出动达到上海近郊龙华，上海市区防守方面为奉鲁军阀毕庶澄军队，约三千人，军心动摇，士无斗志。中共中央乃发布命令，宣告于三月二十一日晨八时，上海开始举行第三次暴动。正当下午一点全市罢工开始，接连在上海市七个区同时采取军事行动，向北火车站、湖州会馆、各区警署施行袭击。经过一昼夜战斗，敌军警纷纷溃逃，二十三日临时市民政府宣告成立，第三次暴动胜利结束，伤亡很少！

#### 结论：

上海三暴前后经过半载，由中央主持大计，自总书记以下由中央工委、军委等直接领导，党和共青团、上海铁路总工会、上海海总、上海纱总等群众革命组织，组成暴动委员会，上自中央委员会，下至各级党群组织，一律参加行动。当时主要负责人有仲甫、文虎、汪寿华、余立亚、顾顺章、赵世炎、陶静轩、项英、黄文壁、罗亦农等。同时外滩白渡桥苏联领事馆负责人亦暗地参加起义工作。如领事Konocin，副领事Wild威尔德等均出力宣勤，功不可没。当时武装供应站在法租界拉菲德路某号，武器包括长枪、短枪、炸弹等，大都是购当地军火商人（洋行）或由海员工会设法购入。战斗中心在闸北、浦东、吴淞、南市等地。在起义过程中，国民党方面表现得软弱无力，钮永建所供应情报极不准确，贻误军情。至于海军开炮轰击市内军事目标，亦属纸上空谈，所谓陆军别动队只是八面旗帜在虚张声势，并未接火。总之作为国民党方面来说，是毫无战果可言，偃旗息鼓而退。反之，中共方面则用全部党组织力量，发动了吴淞、浦东、沪东、沪西地区纱厂大罢工，铁路工人大罢工及破坏交通军事运输为声援，同时还组织了铁路、海员、纱厂、印刷工会武装纠察等攻打警察所，发起战斗，缴获一些武器。在激烈的战斗中，中共党员，浦东武装部长等在作战中牺牲不少。

总之，在三暴过程中，苏浙区全体党团员与工会群众上下一致，

戮力同心，共同奋斗，发挥屡败屡战的坚韧精神，初虽顿挫，终获成功，就其本身事态而言，无可非议，但在决策与行动过程中亦曾发生种种错误。当时上海政治环境复杂，帝国主义兵舰充满黄浦江面，租界戒备森严，上海工商业者畏首畏尾，深恐战火波及影响市场，态度消极。中共对帝国主义不敢启衅，告诫工人队伍不得冲入租界，对工商业资产阶级也亦小心翼翼不敢冒犯。在这两条警戒线前面，进行一切大胆革命行动遂无法施展。关于资产阶级联合战线问题，中共在国共合作指示的大前提下，一向是奉命唯谨，视若神明，过分重视资产阶级的地位，而失去独立自主发挥大党作用的气量与风度。

当时计划组织的上海市政府本着统战政策，拉进上海大亨虞洽卿、陈光甫等加入市府，但是他们对中共貌合神离，于是联合行动变成空谈。

上海暴动成功后，新成立的市民政府由于蒋介石横加阻挠，始终未能正式办公。此时大资产阶级对中共政策阳奉阴违，起着帮倒忙的作用，随后演变发生“四·一二”事变，全功竟废。

在四月五日汪、陈联合宣言后，上海政治情况日益恶化，终至不可收拾。在新市民政府组成的关键时刻，发生了严重的事态，这就是上海总工会领袖汪寿华被刺事件。汪寿华被害事件表明是上海大革命高潮的转折点！汪为人富有谋略，勇敢善战，有群众工作经验，为上海八十万工人领袖，他经常负责与上海青红帮人物折冲且为他们所信服。四月十一日忽由张啸林出名请汪赴宴，上总同志心疑有诈，劝其勿往，汪坦然置之，遂前往杜美路一号杜月笙宅赴会，登楼时被埋伏梯下的狙击手射击，身中五弹，立即毙命。汪被刺后上海全市震动，以后在“四·一二”事变继续牺牲者有余立亚、赵世炎、郭伯和、陈延年、张佐臣等，都是中共工会运动健将，因此，当时上海党与工人阶级的精锐损失极为浩大！

#### 附录：中央书记误触禁纲

一九二六年北京印刷厂案发生后，中央电北方区委转文虎，嘱文虎迅速离京来沪，接受紧急任务。文离开东交民巷，乘京津火车出京，同行者有谢怀龙及其女同学沈君沉，三人结伴同行。抵上海后，沈君沉即回杭州原籍，文与怀龙留在上海，暂寓天通庵路六三花园附近余立亚夫妇处。翌日清晨七时，文独往中央办公处，坐定，秘书任卓民出见文虎曰，仲每日八点半必来上班，现可在此稍候，言迄，取来中共中央所印文件一叠，嘱文先行阅览，以便开会前作些准备。文一面阅览文件，一面静待，如此坐候至九时许尚未见至，文颇焦急，因询

任云：“他素来是严守时刻的，今日上班误点，或有意外？”正谈间，通讯员荣盛匆匆自外至，文因询荣盛：“老头子今早出外何往？”荣盛答：“八点即离家，不知他何以未来上班？”文闻言沉思，因向荣盛说：“我们一同去找他吧。”二人遂出外朝闸北大经路一带东方图书馆附近寻访。行至商务印书馆工会门首，远远望见何今亮（字松龄，即汪寿华，上海总工会委员长）珊珊前行。荣盛急趋前问讯到：“松龄，你看见老头子吗？”何茫茫然答道：“勿晓得，阿拉也要去看伊呢。”何一眼猛见文在旁，暗自吃惊说：“依几时来上海的，一定有紧急事情吧。”文答：“我们歇一会再谈，现在赶快先把老头子找到要紧！”于是三人顺步来到印刷工会纠察队部，打算派出几个得力的同志分头去找。他们进入工会武装部时，远远见到客厅有一簇人包围住一个穿黄色雨衣的人，那人头部面部被雨衣宽大的帽沿遮住，瞧不清他的面貌，只见二个纠察队员正在向他盘问：“你到工会附近窥伺，究竟是干什么的？”那人答话声音很低，顷之，一个纠察班长排众而入，亲加审问。正在这个时候，那人忽然看见松龄立在他身边，因发话道：“我认识他（指松龄）。”纠察班长见状，颇为惶惑，心想此必松龄熟人，立即搬过一张太师椅来让那人坐下从容讲话。那人不是别人，就是中共中央书记仲甫。原来他今晨出外，因思考问题，急于而行，不知不觉走入工会纠察岗哨警戒线，因此涉嫌被捕，带往队部。此时松龄乃趋前解释道：“此人原来是我的娘舅，今日从杭州来沪探亲，人地生疏，误入罢工纠察队警戒线，你们查问是很应该的，他是我的朋友，现在由我担保可以把他释放。”班长连忙道歉，送出门外，这样三人便离开武装部回到中共中央办公处开会，时已近正午十二点了。此次会议主要是决定上海武装起义的问题（第三次武装起义）。从此上海广大群众到处传开汪寿华娘舅被捕的一段故事，有些好事的人把它故事化，说成象晁盖搭救刘唐一样。

## 二十二、愚园路地下生活

自一九二三年至三二年间，文虎居上海中央前后约十年，地下生活惊险多奇，不可悉纪！初至沪时赁居百老汇路汇山码头附近德邻里某号房，房东格林，荷兰芬逊人，在耶松造船厂为工长，妇为奥国维恩人，环境颇幽静。格林夫妇不问外事，均健谈，偶然亦涉及租界工部局内幕琐闻。

### 一、探长几温斯

警务处探长有名叫几温斯 C. Patrick Givens 最凶悍，其手下有不少受过严格训练的外籍亡命（包括白俄）作警探，酗酒残暴最为可怖。开始租界以全力缉捕绑票盗匪，办案人员获奖赏颇多，后来渐渐注意租界内反帝反国民党政治活动。当时关于执行逮捕政治犯有不同的情形：一是经过搜查发现“罪证”即行逮捕；二是经过搜查，不问有无罪证一律逮捕；三是不经过搜查先行逮捕，事后再作搜查。至于中国军警在租界执行逮捕政治犯，原则上须通过公共租界巡捕房签发逮捕令，事后再行引渡。但事实上警备司令部可以直接派人到租界住户抓人押解回部，免除引渡手续。不过经过租界不得显出武装，因此中国军警常隐避（蔽）车内，不令租界巡捕发现，暗将政治犯载往南市。

### 二、印捕柏兰辛

一九二九年文虎从百老汇路迁到下海庙附近某里，房东为印度人柏兰辛 Balansing（印度西北部邦遮卜省人），在工部局当巡捕，其妻陈凤英，江北盐城人，纱厂女工。柏兰辛为人颇通达，对其妻参加女工会活动不加制止。某晚自外归，饮酒大醉，出手枪自戕，伤重身死，其原因不明。陈凤英谓柏兰辛逝世，失去掩蔽，力劝文虎迁居。自此以后文数易寓处，数月一迁或一月再迁，迄无宁处，最后赁居霞飞路某美容院后院。房东为法国妇人，同住为一朝鲜女人，彼此言语隔阂，相安无事。约半年始迁徐家汇教堂附近某里一家花边作坊楼上居住。

房东东北人，不久因邻居发生政治谋杀案，不能安居，只得再迁。至于中央其它机关情况大抵相类似。特别是对外联络机关因接触方面较多，有时一月数迁，不遑宁处。

### 三、中央机关生活

当时中央机关在愚园路一带，住守人大都选定对于当地生活熟习的女同志担任。有时虽数遭军警破获，如应付得当仍可安全度过。中央机关工作人员一般无事不外出，不涉足戏院及娱乐场所，个人不到照相馆摄影，不写日记，以防万一。有时外出时随时警戒如临大敌。出门前自己必加以检查，如信封地址、电话号码、人名、记事簿一律不得携带，此外凡不合身份的物品也在禁止之列。但应随身携带一点零用钱及水笔拍纸簿邮票等等，以备万一被禁时应用。出门时应与同居人约定晋门时的暗号以及在住宅发生搜查事件后会见的街道或旅馆、被捕后拟用的代名及口供及失去联络时登报寻找广告等等。

### 四、内交与外交

关于交通，全总利用铁路、轮船、邮电等产业工会系统建立全国性交通网，一般可以输送内部书籍报刊畅通无阻。对于苏区交通大部在苏区与白区毗连地区设置特种交通站。如对闽赣苏区交通是经过福建汀州、上杭县才溪乡附近进入小苏区（四面均白区）。如武装运军用物资通道，然后转达瑞金。凡属军用物资如：西药、电池、汽油、电线、文件、书报等均由此通道进入苏区，派往苏区干部亦由此道出入往来。此外可由浏阳经赣边进入苏区，湘南湘赣边县有时亦可通行。至于由其它豫皖湘鄂各苏区均经附近边界出入比较便利。

中央内部交通负责人为周顺昌，对外交通负责人为杨尚昆、王警东。交通站接头处在上海法租界洞延春酒店。全总及非常委员会交通站在闸北桥堍楚春酒店及李宽平命相馆内。内地交通站随时随地设置，一般为饭馆、伙铺、杂货铺、旅馆等。关于直接电报通讯，一九三〇年间有无线电台三部，直接与各苏区通讯。又当时上海地下机关时遭破坏，交通机关变动频繁，对外联络发生极大困难，刘鄯乃建议向邮局租用信箱作为永久通讯处。但按邮局章程，租用信箱须有公司企业证明才获得允准，刘鄯乃组设中华实业年报社，公开对外办理刊登广告征求订户，搜集实业资料等，经过一个时期后乃向邮局申请登记租用 474 号信箱。信箱间每日开放十二小时，随时可以取出信件，从此以后对外通讯大感便利。

各苏区来人到沪均可按照事先约定密号通过信箱取得联络。平时书信往来均用密写，秘密通讯方式多端：有用密码书写于字里行间或册页背面，反面叠折，装订成书发寄。有用拼音字母拼写土语乡音，除受书人外他人不识，又凡含盐酸溶液、硝酸银液、牛奶、柠檬酸等

物均可作密写用，但其显影剂各有不同。

### 五、铭德里案

一九二二年夏季，上海法租界巡捕房派警车搜查法租界铭德里仲甫寓所，将仲甫逮捕押解于嵩山路巡捕房特室。中共中央大为震动，乃设法进行营救。时马林在沪建议托人向法巡捕房交涉，乃转辗设法央请租界“闻人”褚慧僧出面营救。褚平日慕朱家郭解为人，慨然允诺，遂向官方交涉。巡捕房索贿美金万元，当经褚疏解云：陈先生乃穷教授，生活清贫不足自给，安有财力缴此巨款。后经多次斡旋，言定具五千元保金结案了事，付款后即释出。

仲甫出狱后乃离沪北行，先往北京暂住休息，距上次天桥案狱约经三年。一九三二年岳州路永兴坊发生案判刑八年。

## 二十三、邓安石轶事

安石原名隆顺，后改名隆渤，入北大后易名邓康，至上大更改名安石，号重远或大整，笔名闾汀与新劳等。安石在钟英时期负 C. Y. 中央重任，对青年运动贡献极大，本文仅就其在上大前后轶事略纪数则如次：

### 一、粉笔生涯开始

安石在北大时期锐志于文学，能诗文，但自谓非大手笔，欲在政界有自见，故改号安石，且渐倾向革命运动。他在北京大学毕业时年二十六岁，一九二一年春赴保定师范学校任专职教员，是为从事粉笔生涯之始。他在保定师范自编三个月教程，题为“讲授新文学、新文化普遍概念”，其中所选教材十余篇，内有胡适文章六篇，（并特请胡适到保定讲演，胡已应允，临时因故未去。）周作人三篇，蔡元培、陈独秀、李守常等各一篇。（原讲义所载时间为一九二一年六月七日编。）

安石教书经年后乃弃职南行，漫游江苏、上海、浙江、杭州与四川重庆等地，最后仍执教于上海大学。

(1) 上海大学 先是一九二二年夏国民党酝酿改组，国共负责人在上海集议，决定双方合作在上海创办一个高级学校作为政治革命教育宣传阵地。旋即进行筹备并决定人事等问题。起初定名为远东大学，后改称上海大学。国民党推亲共派于右任出任校长，中共派邓安石担任总务长。邓于一九二二年七月间即负责筹备，布置上大具体事务，经过几个月后，于一九二三年一月开始办公，四月开学。上大开办集五万元作为租房建校设备及前三个月维持费用，校址初在庆云路，继迁摩西路。教员由中共选派，学生多数由中共党团与工会三方选送，其余公开招募。因物质设备简陋，当时被外间称为野鸡大学。于右任为逊清举人，擅诗辞书法，风流倜傥自赏，颇合野鸡大学

校长身份。在政治上极其左倾，与张继格调齐同。某次仲甫与文虎同访于右任，适张继亦在座，主客闲谈中，于云近年北方革命多由南方革命党策动，此乃“运会”使然！张以指击桌太息道：“中共革命生长力量发展很快，我们却成老大，不易振作起来，即如‘二七’就比三月十九规模浩阔几十倍，且震惊世界，可见新兴的组织能干非当年同盟会所可企及，苏联援助革命更比华侨杯水车薪来得广远。”于右任续言道：“过去国民党内部政见不一，争权夺位，各行己意，遂肇衰落。中共今日改弦易辙，另有一番兴国现象……。”二人所说，均似不假思索脱口而出，其实亦言不由衷，彼等日后行动可以证明。

于右任在上大时对 C. P. 极亲近，尝谓 C. P. 人才众多，邓安石可比宋遁初，罗◇可比黄克强。上大教员中有王陆一、沈玄庐、张秋人、瞿秋白、沈泽民等。学生有何秉彝、黄仁、刘剑华、沈剑华、林钧、杨之华、瞿景白等。

自上大桃色案发生后，安石即屡向钟英请求另调职。事为于右任所闻，竭力挽留。于语安石道：“圣人有言，‘食色性也，动物本能’。”因道白云：“我曾为牛马，见草豆欢喜，又曾为女子，欢喜见男子。”安石聆语，知于有意讽上大桃色风波事，十分难堪，后坚决辞职赴广州，从此放弃粉笔生涯，正式投身工人运动，这是他一生革命的重大步骤。

[注]：何秉彝、黄仁、刘剑华等均在一九二五年牺牲。景白乃秋白之弟，夙患先天性梅毒，鼻梁溃陷。景白格于语音不清，不能接近群众，乃肆志于英文，欲在译述中有所贡献。景白中年追求一女友，女友嫌其不洁，常远避之，景白大感痛苦，旋自杀。

### 二、生活谐趣

安石在任教时工作认真，生活严肃，但有时谈吐幽默，流露无限谐趣。如某次团中央会议，但一闲谈南平（求实），两次婚姻均不如意，现又与怡真勃◇。楚女云：“李郎貌似莲花，夫人何故尚不知足？”北平（育南）解释道：“想必是好看中吃。”安石在旁说：“夫人不言，言必有中。”合座闻语大笑。

上大同事刘某生意委琐，气质平庸，曾央安石作书，安石书词以贻之云：“世上儿曹都蓄缩，冻芋旁堆秋颍。”刘见字，怀惭而退。

东大支部学生某平日好酒，耽于恋爱，不努力学习，精神表现十分委顿，安石作诗嘲之，诗云：“糊涂庙里糊涂爷，竟日醺醺过酒家，道白不离春梦姥，作书字字缩秋蛇。”又尝称彭述之所为文章活似党八股，依样葫芦全无生气，许多地方如同讲梦话一般。更谓阿秋为文艺书词，乱敲梆板，有如民间所传呆女婿装扮，形象累赘，音调仿佛罐头筒，一片嘈杂！凡此足证明安石文词锋利，不同流俗。

### 三、义愤挥毫

安石一生自惜羽毛，一切生活谨守革命党人纪律，因此对友人失德亦不轻易宽假。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后，他亲见不肖分子改宗国民党，纷纷向南京请求收容改编，并弹冠相庆，曾屡著文以斥之。他在《中国工人》第六期以笔名新劳发表“从纪念二七说到中国工人奋斗的前途”一文中指出：“国民党军阀怕中国革命不断的大爆发以致其生命于死地，故他尽九牛二虎的力量对付中国的革命。现在他一方面用法西斯蒂的政策镇压中国革命势力，另一方面雇买一般反革命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如陈公博、施存统、李达等），大鼓吹什么三民主义、劳资合作、劳工立法，以为欺骗革命民众以掩饰其狰狞恶兽的面目。”当时安石为革命激于义愤，鸣鼓而攻，发为此文，不肖者为之气慑云。

### 四、金陵蒙难

安石初婚于同邑杨氏，杨氏未尝离家乡。继婚于丁郁（上大学生），未五月离异，到广州与李华同居。李华，江华人，原名瑞华，即李启汉之妹。（启汉一九二二年六月入上海西牢，一九二四年十月十三日出狱，出狱后随安石赴广东省港罢工委员会工作。）先是安石在六大出狱，出狱后随安石赴广东省港罢工委员会工作。七月到上海晤文虎，会前一度在香港被捕，因无人指证，月余释出，七月到上海晤文虎，提出纠正党的路线意见，无结果。六大会后表示愿意留苏学习，其夫妇旅居莫都时曾育一子，后李华归国时因不便携小孩，寄养莫都某托儿所，归国后儿子竟无下落。安石归国依违于左派角逐之间，彼明知其误，而不敢自作主张，对王博亦顺应大势，委曲求全。王博知安石与北方书记部渊源，深恶之，必欲诛锄之而后快，一九三一年派安石到沪中区委互济会工作，住法租界麦琪路某理发店楼上写油印，送文件。安石益自韬晦，终日戚戚不语。一九三三年五月十五日夜九时，安石在新迁寓所（法租界环龙路骏德里）被法国巡捕房逮捕，（化名施义）当被拘留法捕房凡五十二日，旋即被东大支部回国学生，曾在临时中央互济会担任救济部部长的王琳英指证，引渡南市警察署，八月二十七日转解南京宪兵司令部，经由东大支部回国工作学生王云程、李竹声、孙际明等作证检举，于九月十四日押往雨花台被害。安石被捕后，李华亦被逮入狱，为东大支部同志某（萧光夫人已先在南京）指证，陷狱二年始释出。据李语文虎：在延安时，王明为陷害安石事，见李华辄低头走避，不敢正视云。

另讯：关于安石就义事，因邓系北大马学会会员兼书记部成员，不为临中所重视。又临时中央疑邓与非委通声气，自洪湖撤职后即停止工作，后派他到互济会做下层工作，为王琳英告发，在上海公共租界被捕。

中夏被捕后，化名施义，因无佐证，拟释放，后经同案人（东大

支部回国女生，萧之妻）指证，解往上海（南京政府）拘留所监禁，一月后转解南京宪兵司令部。初未判刑，中夏自知短时无出狱希望，在狱中壁端题“十年养晦”四字以自勉。随有同狱某将中夏在洪湖工作情况报告，事为湖北省地方官绅所闻，遂由张难先等呈请南京政府将中夏判处死刑，十月被杀。

[注]：关于邓康在北方学习期间情况，考诸文献记载，一九二〇年九月在北大中文系毕业，赴保定育德中学任教。一九二二年七月赴上海出席少年中国学会，九月返京，十月赴上海，任 C.Y. 工作，筹办上海大学，上大成立后任总务长。一九二五年赴广州参加省港罢工，是为中夏全力从事实际斗争之始。因此一九二二年八月京汉路罢工，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开滦罢工及一九二三年“二七”事变，中夏均不在北京。另据《“二七”运动》一书曾有如下的记载：“一九二二年的一个傍晚，在长辛店街上，两个下班的铁路工人边走边说：张大哥，邓老师离开我们这里已经一年多了，这一年多，长辛店的变化可真大呀！”青年工人说：“可不是，去年工人俱乐部成立，路局方面还不把我们放在眼里，今年夏天罢了那次工，他们就不敢明目张胆欺压咱们了。”中年工人回答。（《二七运动》中华书局一九五九年二月出版，第十一页）由此页记载可证邓是一九二一年离开北京。

### 附录：《中国职工运动简史》评议

中共六代会结束后，中共部分代表曾与德共负责人台尔曼等举行座谈，在谈话时德共代表提到关于中国工人运动史料欧洲各国均感缺乏，希望中共方面能编写些资料，译成西文，以供参考。座谈会后中共中央委员数人共同商谈结果，决定编译中国工人运动史丛书以应需要。旋即着手收集资料，随向第三国际东方部及职工国际取来该部门所保存的北京《工人周刊》、《中国工人》、《京汉工人流血记》、《上海劳动周刊》、《湖南苦力》、《工人之路》、《先驱》等刊物交给特立与中夏为编写该书的第一手资料。此事后来由于编者提前回国，亦未完成原定计划，草草写成简史。据他说：“该稿由于时间匆促，急就成篇，来不及把原材料加以消化，……”事实确属如此。

该书主要观点，在叙述中共创建以来，在工人运动方面一贯存在着机会主义（包括政治路线与组织路线）。如书中叙述五四运动时说道：“五四运动发动的虽然是青年学生，领导的无疑是民族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大学教授。”（原书八页，一九四二年解放社再版，下同）说到五四运动中的罢工，书中称“此次罢工据说有些简直是资本家命令罢的。”（九页）书中说五四运动中国知识阶级的思想斗争概况，并未从斗争过程本质加以分析，只是囿于结论为“经过一场激烈斗争后，结果在形式上算是主义派取得了胜利。”

(原书二十页。按：主义派三字是胡适之讥笑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会员的话。)书中接着又说社会主义各派别的内哄，在此次混战中，马克思主义派形式上曾将各派各个击破。这里所谓“内哄”，所谓“混战”，所谓“形式上”均系自第三者立场出发，编者好像是置身事外一样。因此，他对于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与工人运动在实践上联系的重大意义，完全无视，这不能认为是偶然的错觉。

书中在叙述党的机会主义倾向时接着写道：“北京方面李守常同志确是同意此种主张的。”(二七页)这几句话给予读者暗示，仿佛说当时中国党是在受机会主义影响，这种深文周纳的笔法，是一眼可以看穿的。由此出发，书中说到工会与党时便闭目胡诌起来道：“自然当时工会中的党的组织普遍是没有，只有共产党员个人，也就因为如此，对于工会的领导只是个人式的英雄领导而不是党的组织领导。”(二二至二三页)，这样便完全否认党组织对当时职工运动的领导作用。不仅如此，书中对一九二二年北方六路罢工、开滦五矿大罢工真实过程，编者似均盲无所知，只是浮光掠影胡说一通。如对陇海铁路罢工事只寥寥数语，说：“北京党部闻讯驰往参加则已解决。”(一九页)按：此事详细经过北京《工人周刊》及劳动通讯社发稿记载甚备，编者断无不知之理，其所以故逞妄说者，殆欲藉此以彰北方党的过失。

以上可见编者旨在把轰轰烈烈延续十天之久，经过北方书记部组织并取得胜利的陇海铁路全路伟大罢工，竟说成无声无嗅，与中共全无关涉。职工运动简史曾辟专章(第六章)记叙开滦五矿罢工问题，但该书作者既未亲历此事，又未详细参考有关资料，写作态度又不严肃。文中说罢工“组织太糟糕”、“领袖非人”或准备“太不充分”、“甚至罢工总领袖卷款潜逃，因此罢工失其领导。”(原书九四至九五页)等等，完全与事实不符。这种有意歪曲史实，诬蔑党与工会的手法，好象当时没有党组织领导，纯属别有用心。这种说不是由于隔岸观火发生误解，便是有意歪曲史实，企图把震惊中国及世界，支持二十五天的开滦五矿同盟罢工与流血斗争，说成一团死寂[注一]，仿佛北方党组织临事束手无所作为一样，这不是凭空妄语是甚么？至于编者对二七罢工不敢公然妄逞谤讟，但书中对于北方党领导二七大罢工却说成若有若无，对京汉路中共党团的一切决策与活动似乎完全隔阂，最后他竟凭空说：“二七失败，工会被封，我们党在工人群众中除政治影响外什么也没有了！”(一三页)试问倘若如编者所云，那么次年(一九二四年二月七日)北方全国铁路总工会又在郑州恢复，北方工人运动高潮复兴，北方党组织空前大发展，这些事实又怎样解释呢？这一切不过证明编者对于当时北方诸伟大斗争的无知，同时也表明篡改者伎俩拙劣和居心卑鄙罢了。

综观该书编者意图，一方面是把一九二七年前党的路线说成一贯机会主义化，把工人革命组织说成瘫痪无力，把许多重大罢工斗争说成自发散漫与党的领导关系薄弱。但在另一方面编者个人却倒妄自吹嘘，不顾事实，任意抬高

自己，贬抑党组织集体威信。如说：“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成立与筹划开办的”(一五页)所记与事实不符。又说“一九二二年第一次劳动大会后，书记部由上海迁到北京改为总部(三十八页)。”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时原设在上海，一九二二年被封闭后即停止工作，各省工运由北方、济南、武汉、广东、湖南等地方劳动组合书记部分部主持，此后并无总部名义，亦无总部主任存在，只有在发起召开全国第一次劳动大会时才借用过“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名义，但只用一次，以后就未再用过，更谈不到有所谓总部了。

总之，该书本身对中国工运史实既属不实不尽，且多歪曲事实，议论尤多恣谬。一般读书观感大都认为全书编述体制简陋，取材极不完备，特别是对于若干重大事件，记载失实，内容空虚，或详略失当，处处表现粗心大意，态度更欠严肃。尤为可议处是此稿出版时又经临时中央王、博加以利用，按照小宗派利益任意涂饰篡改，遂丧失成为信史的条件。他们此种作法是别有用心，其目的与企图在降低一九二七年以还中共存在期间对于中国工人运动党领导方面有组织的作用，或者以伪乱真手法抹杀历史事实而故意抬高编者个人的“功劳”，以达到对读者造成一种错误的印象，从而颠倒黑白与是非，以快私图。只要去考查下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三一年间中共至现在尚保存的有关党与工人运动报刊，便可证明上述判断的正确性。这里应该特别指出的是该书原稿固多失误，但是印行时有人复乘机利用，擅自增删篡改多处，遂使全书更呈混乱，面貌益非，此又与原编者无涉，其错误应由篡改者负责。不过就全书来说，究竟哪些是原编者的错误，哪些是涂改者的曲笔，因事涉暧昧，读者已难以加以分辩了。

[注1]：在罢工结束前夕，一度发生过收支人员渎职情事，但于全局并无大影响。外间乘机散布流言，显属不当。据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二十日文虎与邓培为开滦罢工财经问题致中共说帖内称：“五矿罢工委员会选任三人组成财务委员小组，分任其事。其中一人负责财务行政、签发收支文件，一个为司账(会计)，一个为出纳，三人均为在业工人，会计独立，书记部人不经手金钱，只监督用途。”关于工会捐款收入支出账簿，后经军警查封摄影公布，解放后尚保留一部分档案留在唐山、天津有关机关，可以参考。

[注2]：本书一九三〇年六月十九日脱稿，即交由共产国际东方部米孚审阅。一九三一年王、博临时中央付印，书中有些地方增加文字是属于四中全会临时中央成立后所发生的事，如刘文松在大革命失败后与向忠发一道，已成为南京政府捕共最力的工贼，该书却为他开脱(一七五页)可证。

## 二十四、但一言行录

但一原名代英（1895-1931），原籍湖州，自称画家恽兰田后裔，自号夫里曼（Freeman），弟代贤均中共党员。但一原系武昌师范学生，参加湖北省委工作，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先后参加南昌与广州暴动，参加湖北省委工作，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先后参加南昌与广州暴动，均告失败，因此对秋白、忠发与立三等提出异议说：“你们以暴动为均告失败，因此对秋白、忠发与立三等提出异议说：“你们以暴动为儿戏，是冤枉斗争。”复不为向忠发等所喜，向、李等遂加以右倾机会主义罪名，禁止他发表文字，并下放代英到区委做交通工作，命令他担任每日送文件、报刊工作。由于代英双目深度近视，对面不能辨行人，一九三〇年四月十九日遇租界巡捕抄把子（搜身），在身上搜出大宗宣传品，因拒捕被殴伤，眼镜打破，划破头部，血流满面，人亦不识其真实面貌。因审讯时代英化名王作霖，解送中国军警机关转南京审讯，结果判处徒刑三年，即送苏州监狱执行。坐狱已满一年，无人知情，向忠发、顾顺章到南京投蒋后，乃向敌方据实报告代英在狱真象，蒋对向大为嘉奖，命提代英往南京中央军人监狱加刑。于一九三一年四月二十九日被害，时年三十六岁。但一为人守正不阿，兼识大体，反对党内无原则的斗争。先是一九二四年时代英写纪念吊施伯皋文，刊在民国日报附刊，倡议革命同志应互相信任，而不应互相疑议，语重心长，瞿、李深嫉之！乃对他决心施行陷害。

转录但一所作“纪念施伯高兄”文内容如次：

我不能不纪念施伯高兄，因为我们对于施伯高兄，不能不表示我一年来深深留在心上的一种歉忱。我在京汉大罢工的时候，还远隔在四川，仅仅从报纸中得着一些东鳞西爪的传闻。我在那时候，曾经听得些谣言，说是某某诸友，都遭了惨杀，经了好久，我才知道这都是谣言，只有工人林祥谦君等与伯高兄的遭惨杀，却竟是不幸的事实了。我回想我认识伯高兄，是在五四运动以后，在那时候，我只知道他是热心奔走的人，我亦曾怀疑他是爱出风头；我亦曾讥

笑他是专门开会家；我因为他是一个法政毕业生，而且比较活跃而规模宏大一点，我总觉得他象一个政客；我在初不相信他有什么诚心，我在初不相信他真能为社会上做出什么切实事情。

我在最近两年间，才有些半信半疑地赞美他的为人了，我因为看见他热烈而勇敢的胆气，与那种坚定而不移易的精神，我实在没有法子用恶意猜度他；但是我那时候还是这样想：我说，他的头脑怕不是很明晰罢！他的气性怕不是很纯正罢！因为我的逻辑，凡外貌似乎是一个政客的，他终少不了有一些政客们的缺点。然而伯高兄竟因为援助工友，为被剥夺的劳动阶级的利益而奋斗，这样的遭惨杀了，我听见他被杀的确实消息，我不但感觉是一件可惜的事，我的良心还受着很痛苦的责罚呢。我疑议人家，我不满意人家；但是世界上只有象我这样的人，真做得成什么事么？伯高兄的一死，可以为他证明了一切，可以使一切疑议不满意他的人，再不能说一句话，然而到人家死了才相信人家是一个真诚的有志的人，这样的相信有什么用处呢？人对于一切生活性格与他自己不同的人，每每会发生些无根的理解，譬如我们说，伯高兄是一个政客，便是一个明显的例证。我亦并不因为伯高兄是已经死了，因而说他是一个全无缺点的人。他的有缺点，正如我们的有缺点一样，我们所有的缺点固然不相同，然而大家免不了有许多缺点，这终是一样的。到现在想，我们何必希冀去找全无缺点的人呢？我们但能集合各种缺点不同的朋友，以我所长补人之短，亦以人所长互补其短，这亦便很可以做事了。我们若能得真诚热烈如伯高兄的，纵有许多缺点，亦应与他努力提携，为甚么我们从前只知疑议，不满意他呢？我们若知道自己是有点缺点的人，我们应当欢迎能补正我的缺点的人才是。我们偏于冷静了，正需要活跃的朋友，我们偏于拘谨了，正需要规模宏大的朋友，然而因为我的狭隘而不肖的见解，我偏要说，这样的朋友，怕不免是政客罢，因此我对伯高兄始终不曾十分的信任。但是现在呢？我应当如何对伯高兄惭怍？我应当如何追悔我以前错误的待朋友的方法？我应当如何的承认，我是狭隘而不肖的人啊！凡不肯离弃一切危险运动的朋友，都许是早些或迟些要遭惨杀的朋友，我们不要待到人家遭惨杀了，再去崇拜追悼他；却在他的生前，只是疑议或不满意于他啊！我们所确实认识的热烈真诚的同志，死了的已经死了；我们应当必须待到人家死了，才这样确实认识他，才悔恨以前不曾信任他，不曾与他努力提携么？我回忆起伯高兄夹着一个皮包，在后花楼汗淋淋地跑过去的时候了！我回忆起伯高兄捶胸顿足地在国民大会演说台上演说的状况了；我亦想象伯高兄在刑场上最后的一分钟！我想伯高兄总还记念着：有许多未曾做完的事情，不知道是哪一些后来的兄弟们要接着办呢？亦有不少后来的兄弟们，准备继续着伯高兄所做的事情了，亦有不少后来的兄弟们，准备继续着伯高兄所遭的惨祸了，唯愿后来的兄弟们，大家信任着，大家努力提携着！我们如何善于与活着的朋友相处，比起我们如何崇拜追悼已经死了的伯高兄，还一百倍的重要呢！

(原题“纪念施伯高兄”载一九二四年二月上海民国日报副刊)

文虎与但一友谊素笃，二人在中央前后共事十年，同心协力，如谊同金石，但一被难后经年，文虎过苏州阊门，赋诗以吊之，诗如次：

其一

破碎上河近若何，危邦力战此经过，  
十年道谊兼铮友，试剑石前泪洒沱。  
(一九二四年与但一共游虎丘)

其二

春深夜雨伴湖居，望海亭前共读书，  
永夜角声开会后，松江楼上脍鲈鱼。

其三

南湖烟雨忆同舟，国士双双暮草秋，  
怅望石头城下路，死生契阔不胜愁。  
(一九二四年，文虎、侯绍裘与代英共泛南湖，二人已先后蒙难)

## 二十五、云岭兴亡

德隆，湖北汉川人。家本小康，中落后，投身林家布厂为店员，后被接纳作为湖北劳动组合书记部成员。一九二二年参加工作，曾丧失立场，勾结杨德甫、谌小岑等工贼组织“二七工仇”社，暗受军阀命令，进行反共活动。出版“二七工仇”小册子，散播毁谤二七罢工文章，后经过育南劝阻始重返部工作。一九二七年在鄂省总工会工作期间，他又为个人利益加入向忠发帮会集团，贪污盗窃，助向为恶。一九二八年调上海全总工作，乃摇身一变甘附临中。德隆在上海全总工作时，临时中央瞿秋白运用纵横捭阖手段挑拨中央工委及全总党团内部领导同志间关系，他一方面阿谀文虎与阿苏（兆征），另一方面耸恿别人反对文虎与阿苏。德隆对临中行为推波助澜。先是瞿对德隆说：“目前斗争形势，内重于外，你应该认识这一点。”当时德隆深为所动，向人说：“秋白为人好转念头，对敌一筹莫展，对内很有一套，见人说人话，见东方部便说神话，你们不是他的对手。”在上海电话工潮中，临中曾诬构事实，说有人公开勾结黄色工会陆京士、朱学范等工贼向国民党告密云云，此种作法后经查明并非事实。德隆本已知情，但当对方询问德隆时，他不加可否，支吾其词以对，并说：“打架无好拳，他不这样，就要垮台，所以不得不然。”因此有人说他是头脑懵懵不清、是非不明的人。后来德隆乃离开上海脱身到江西而去。一九三七年德隆依附王、博居云岭时，一切唯王明之令是从，推行投降路线，不遗余力！一九四一年一月四日，敌方调军队十余师约八万人结集于茂林地区，对新四军进行围剿，德隆奉命让防，敌军合围，事先耳目失灵，茫无所知，仓卒间已陷重围，结果战败，精锐损失殆尽，本人为部下张某所杀，主将被俘，仅傅秋涛率队渡江北去。同时被俘杀害者有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秘书长黄诚、战地服务团长朱克靖等，余送上饶集中营禁锢。



总结德隆半生，革命意志薄弱，不明大是大非，他明知向忠发、王明等一伙对革命失其忠诚，也亲眼见到他们祸党危害革命的种种罪行，理该奋起抵抗，但是由于他顾虑多端，患得患失，革命意志消沉，不敢揭发，更不敢有所作为。因此他对待阶级敌人表现出动摇软弱，唯唯诺诺也就不足为异。

## 二十六、关于赵世炎二、三事

赵世炎在中共为知名党员，当时在党内毁誉参半，但公正地说起来，他是东大支部学生中在中国工人运动里颇有能干，而且有过作为的党员。他艰苦工作，投身于上海工人运动，时间虽短，成就却非常可观。他所写的关于革命工人运动的论文，大都富有参考价值。世炎，四川人，原在北京师范学院附中读书，后参加勤工俭学，无所成就乃自法国转苏东方大学居二年始返国。

一九二四年暑假后，文虎从上海到北京出席北方党委和铁路矿山会议，在北京首次见到世炎。散会后，世炎到文虎寓所晤谈。他原是几年前北京留法预备班同学，但没有见过面，因此，这次他来到宿舍头一句便道：“我们还是没有见过面的老朋友呢！”这样就不拘形迹漫谈起来。世炎谈锋很健，谈到巴黎支部在小戏院开会与意大利区（拉丁区）中国贫困学生生活的情形，犹有余味。随后见文虎书桌放置一些外文书报，很感兴趣，问道：“听说北大外文书报很多，是吗？”文虎说：“是有一些，却是很杂。”他说：“不怕杂，应该有选择地去阅读，好好把它们翻译出来。”文虎说：“我们现在正缺人力和时间，希望你多抽些工夫译写一些东西。”世炎说：“我很爱好这工作，一定尽力去做。”后来他认真实践诺言，写过不少的文章，同时还为党的报刊译述了不少的资料。他的中外交文修养都是比较好的。

第三次劳动大会召开的时候，世炎被选为北方出席代表之一，文虎率领中央代表及上海代表团因事延迟船期一班，所以没有与他同行，后开的轮船在台湾海峡遇到台风，几遭倾覆，及轮船抵广州时，大家都感到十分疲倦，由世炎帮助，把一切应办的事都代为料理妥当。大会结束后，他约文虎一道乘轮北返，并笑道：“这次如果一道走，再也不会遇到台风了！”当时大家问他对广州的感想，他说：“这次大会开得很痛快，产业工人空前团结，工贼伎俩已穷，工人阶级大是大

非已明白。”最后他还说：“饱啖岭南鲜红荔枝，也是平生快意的事。”

世炎平日在中共报刊写文颇多，遂为反对者所嫉视，上海“四·一二”清党时，由于世炎为上海总工会主持人，上海工贼集团陆京士、朱◇◇等恨之入骨，设计搜捕，七月十九日被杀。行刑时，头颈及腰背各砍数刀，血溅远近，世炎再起再仆，良久始气绝，故死事为最烈！

## 二十七、螻生文评

[按]：语云：“尺螻之屈以求伸也！潜龙之藏以护身也！”螻生之名取义于此，其人生哲学既与此相伴，故其平生言行亦以此为矩矱准绳。

八七会议成立临时中央，推行盲动主义路线，实行惩办制度。在这期间，临时中央于一九二八年发表螻生所写文章。综观全文，主要是自我吹嘘并阿谀临时中央路线领导正确，同时否定中共自成立直到大革命长期间的政治路线彻头彻尾全盘都是机会主义。按照上述精神，文中造谣诬蔑，捏造事实，无所不用其极！由此所下的结论，自然也是错误百出。现就文中重要论点加以阐明。

首先应行指出的，作者于一九二五年被派到东方大学学习，在此以前他并未实际参加革命工人运动或农民革命运动，也没有担任过实际斗争或基层革命工作。他于一九二七年五月回国，在大革命重要时期他一直不在中国，他在回国后也没有参加中央与省委工作，他既非中委，也非省委，更谈不到担任中央重要工作。对于中央与省委重大决策，也当然无法知道，不能理解。到七月十五日武汉政变止，他即行离开汉口私行赴沪，在他留住武汉二个月时间，他仍是一个并无实际工作的革命闲人。

又在武汉大革命危机时期，五届中央有计划采取措施，派张特立等领导叶、贺军队开赴南昌、九江，公推毛泽东、文虎二人到湖南组织武装反抗，另派王荷波赴北方，陈延年到江苏，但是此时瞿秋白、向忠发等卷去公款巨万，相率携眷逃遁，住庐山避难。

在这些历史事实前面，本文作者就不免虚构情节，抬高自己，同时并厚诬革命同志，打击他人。现在就作者文章内容举例加以说明：

该文首在捏造事实哄抬秋白、立三、向忠发、顾顺章、彭公达等，

表扬自己的正确意见和他当时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重要地位。就其全文观察，当时中央政治局只有和森、立三等少数几个人，也没有工委、农委的负责人，这难道是真实情况吗？最突出的是该文歌颂刘激烈行动是正确的，不是偶然的，同时却诅咒：“纠察弃枪弃职逃走一空。”这些信口开河说法可谓完全与事实相反！真是白日梦呓。

作者在文中自我吹嘘，所谓“湖南、湖北的决议案”，实际是事后虚造的，当时并无此议案，中央也无人知情。至于他说的湖北省委其他情况，根本上并不存在。当时湖北省委曾提议：“就武汉地区实行武装暴动，反击汪唐政府。”但这个决定与该文作者毫无关联。作者有意移花接木，张冠李戴，只显出别有用心！文中又说到“一些职工运动的重要同志都不赞成罢工反抗国民政府”更是无中生有，凭空杜撰栽诬的乱说。文中更称夏斗寅叛变时，作者与立三向中央提议进攻湖南、广东。当时绝无此项提议。又说和森暂代秘书长，当时既无其事，亦无文献可征！至于文中所说老鲍的“西北路线”，其措辞无头无尾，更空泛无内容，含糊彷徨，令阅者莫名其妙。该文作者既自认在中央政治局负责，为甚么对于当时新来的国际代表不能举其姓名，只是说它背毛子，可见他根本上没有接触过 Nominatz（洛米那兹）、Neveman（洛埃曼）等人。文中在评价党的工作时，根本没有提到中国工人阶级在大革命运动中的领导作用，甚至如二七大罢工、唐山开滦大罢工、海员罢工与省港大罢工等一系列重大革命史迹都一字未提，均视同为机会主义，其荒谬不经，可见一斑！

总观全文充满自吹自擂，歌颂临时中央的语调，全文主旨是在妄图树立自己“左派”山头，并热望加入瞿等宗派集团而当其走卒，所以不惜凭空伪造事实，颠倒历史，企图一逞，但事后证明亦属徒劳。

据了解，该文抄写公布时，先后经过临时中央分子多次篡改，所以就该文中所述，只是阿其所好，诬其所恶，全文字里行间，均属模糊影响，主观片面，夸诞不合史实，其目的不外开脱自己和临时中央分子的罪责，并炫耀作者自己一贯正确，博取个人在党内的权位。该文公布后还又被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推波助澜，采用以毒攻毒，实行借刀杀人，代为宣扬，于是以讹传讹，造成是非不明与黑白混淆的结果。

附本文作者简历：作者原名蠖生（前略），一九二五年派赴东方大学学习，一九二七年四月回国，五月到汉口，时当大革命动荡时期，未参加工作。七月十五日政变后，中共中委大部分分赴湖南、江西等省组织工农武装暴动，他内怯不敢露面，又认为湖南是火线太危险了，乃离汉赴沪。他居住武汉期间前后旅居不过二月，实际并未参加任何革命工作。后来他怀着避难心情来到北方，他到北方后，藉口南方人

不懂北方语言，终日闭门不出，北方同志见其畏缩不前，又无工作能力，深表不满。他遂潜行离开天津独自回上海。之后，久无工作，时思再起，乃写此文。他写文用意，企图讨好临时中央并开脱自己责任。但当时临时中央派统治对他仍不重视，未加录用，赋闲日久，以后乃决定派他到广东工作。时白色恐怖盛行，他畏缩不前，迟迟不行，企图苟免，促之再三，始离沪，但一去杳无消息。外间传说他投海自杀，也有人说他被捕，亦无事实证明，遂成疑案。本文作者平时城府深隐，主张不择手段。尝云：“清高不好，爱惜羽毛无用，要向鸡鸭争食，不耻与猪狗为伍。”因此他倡为“伪恶之论，以蔡锷仕清为例，并云大智不方。”一九一八年有政客薛大可（筹安会巨子）在北京主办亚细亚报，薛欲与北大教师某合作办报，某顾虑舆情不许，辞谢未往，他却大事赞扬薛为“元勋”。（见一九一九年六月三十日函）人称其“急不择路，暑不择荫”。其行径率类此云。

## 二十八、南海风云

文虎生平数度自北遵海而南，寄寓番禺、梧州与香港，时过境迁，风流云散，转瞬已成陈迹，兹就往事印象补记一、二。

### 一、番禺尘影

番禺地处岭南，华夷杂居，文虎于役羊城时寓居东山春园，怀宁陈仲甫父子先后寓广州太平沙看云楼。当时往来番禺与桂林的中外同志与国际友人，会谈筵宴，车水马龙，川流不息！

某次管东渠主人设宴西园招待外宾，同时文虎、中夏、兆征等均被邀参加，席设蕉间，繁花掩映，觥筹交错，剧饮畅谈，流连竟日。主客间兴之所至，即席赋诗，互相酬答，实为空前盛会。文虎对此会印象最深，历久难忘。文虎当时曾写“广州一周记”以纪其事。

[注]：延年酬文虎诗云：“江淮河汉向珠崖，拂晓军城沸万笳，击水图南九万里，喜君巨笔起龙蛇！”又文虎所写“广州一周记”刊在广州出版一九二六年七月四日《中国青年》一二四期（即六卷三期）。

关于延年事业以任广州书记为发轫时期，并为世人所推重。延年当时以全力注重建立中共武装部队的工作，曾函向北方区委要求调配军事干部到广州协助黄埔建校工作，同时选送工农干部进入黄埔学习军事。当时文虎在北方先后派遣郭增寿、张隐韬、茅延贞、张兆丰、金佛庄、郭寿生、李之龙、安存斋、杨其纲、刘志丹、宣侠父等即日南行到广东区委工作。

[注]：郭增昌，山西人。张隐韬、张兆丰，河北人。茅延贞，安徽人。金佛庄，浙江人。以上均保定军官学校毕业。郭寿生、李之龙均烟台海军学校毕业。宣侠父，浙江诸暨人。杨其纲与安存斋均河北人。诸人事迹另见本文。宣侠父曾任抗日联军二师师长，一九三八年八月在西安被害。

延年对于北方区的支援，表示极为重视，曾亲笔致文虎一信报导

黄埔筹备建校经过。书云：“此地原为海军学校旧址，面对珠江，海陆军事训练均宜，目前建校工作已初步告竣，各方员生已经到达，代英、语罕、楚女、熊雄均先后到校工作。现此间已任安体诚为该校宣传科长，并负责党组织工作，其余军事同志分别担任有关专业及政治课程教学工作。”又说：“招生方面工作业已告一段落，所有南北各省介绍来粤同志，一般素质均好，符合原定要求条件，但报考军校由于体格检查未及格录取者，此间决定一律就地进入农运所或工运班方面学习。农所同学组织由虞卿负责，工会由启汉与少山负责。”云云。由上述报导可见初期黄埔建校的轮廓一斑！一九二七年五月春间，延年到达武汉重晤文虎，二人共留武汉多日，朝夕过从无虚日。旋文虎西赴长沙，延年东去上海，二人从此风波失所，天各一隅，即成永诀。是年十一月文虎再临上海犹及见到阿湃，他向文虎转告延年被难经过，文虎聆悉悲不自胜，数月后阿湃与乔年亦告牺牲。当年羊城盛会遂成风流云散！

考延年、昆仲三人，长松年在家务农，次延年，又次乔年，均高君曼所出。延、乔先后蒙难后唯长兄独存。一门双烈均为远大目的而流血牺牲，殊属难能可贵！犹忆在广州时，延年亲书数语于座右云：“为天地立心，为生命立命，为万世开太平！”于此足见其胸怀与抱负。延年风度如光风霁月，气韵沉雄！其工作风格，大刀阔斧，平日不尚文饰，坦白率真，故人称为“政治黑旋风”，可谓旷代一人，不可多得！

### 二、苍梧特使

两广地区原属一区所辖，当时广西多山，产业不甚发达，又因地处边隅，中共中央鞭长莫及，所以建党工作较为后时。先是广西青年学生在北京学习者有谭寿林、黄日葵、陈勉树与区辰白等，先后加入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为会员，随后又在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工作。一九二四年文虎任中共中央秘书时，乃向北方书记部调谭寿林、黄日葵、胡福庆、陈勉树回广西梧州开始建党工作。谭在梧州兼任当地日报编辑，另有西江运输工人周济从梧穗水上运输，负责发展工人运动，陈兼任桂省委工作。

大革命时期，中共中央自上海迁往武汉后，决定调寿林到全国总工会担任秘书长，文虎曾亲电谭催促其到中央工作，并在武汉国民日报公开启事要谭到职。当时谭因桂省事忙，无法离开，后又遭逢广州四·一二李济深举行反共大屠杀，谭被通缉，间关赴沪，遂到全总担任全总秘书长。六大会时广西方面曾派代表多人参加，其中庞大恩系西江轮船运输工会负责人，与文虎同行到达莫斯科出席六大会。

右江军事初期由韦拔群所发动，后加派中夏前往任政治指导委员。

韦拔群，广西贵平人，青年时到四川熊克武部当兵，因犯营规被熊亲责军棍革斥，回乡后参加农民斗争。一九二六年在广州农运讲习所学习后，回乡组织右江农民武装，成立第七军，进军攻占龙州，一时声势浩大，震动右江诸县地区。一九二九年◇◇◇叶◇壮、李谦（◇◇之弟）、邓小平前往右江工作，后在赣粤边界被余汉谋军拦击败绩。右江军事失败后，寿林亦遭受向忠发陷害，于一九三一年六月在南京入狱。寿林富有文采，意境高远，其在金陵狱中题壁，有云：“赤虹雨外飞双影，白鹤云中唳一声！”盖临刑前自挽语，以示狱友者。按“赤虹双影”指伍仲文夫妻，“云中白鹤”乃寿林自喻。寿林生前著有“俘虏生还”一书，一九二八年由上海泰东书局出版，其他遗著亦多，分见《中国工人》等革命报刊，笔名曼殊、祝封与树林，身后遗有二子，在原籍。

### 三、海丰彭湃

文虎久闻海丰彭湃名，常思会见其人，南来经月，乃因事务繁多，不得其会，“惆怅无因见范蠡”（杜牧诗句），心益向往！后来阿湃到广州，乃偕兆征见访。文初遇阿湃在陈延年家，延年介绍词云：“我介绍你俩南北弟兄会面，谈谈工农联盟问题。”阿湃踟躇不安说：“我身处海滨边沿地带，见闻狭隘，实在高攀！”延年笑道：“你们一定很身谈得来，彼此不必客气吧！”于是二人天上地下漫谈起来。从阿湃谈吐中，了解到他是一个不平凡的异人！他见解独特，勇猛精进，赴事如飘风迅雷，而又坚强不挠，品质非常可贵！他对人谦虚，对事认真，具有高尚的革命世界观！真是“庸中佼佼，铁中铮铮，大有作为人物”。更可异者，阿湃写文迅笔直书，富有幽默感，其所作“送郎飘海去过番”（民歌体裁）：“咚咚咚！田仔打田公！”（打倒地主豪绅曲）等，文艺独飘一格，其风格大类唐人刘禹锡所作竹枝词。又其亲书海陆丰苏区政府春节对联云：“欠债欠租，将刀还尽；有枪有炮，快乐过年！”出语惊人，见者悚然！

阿湃并谈到海陆丰战斗人物杨劳工诸人事迹，令人神往！从此以后文虎与阿湃遂成莫逆之交。

一九二七年夏，阿湃到武汉与文共事于中共中央，后又任上海中央担任农委书记，同住兆丰路工作。他后于颜昌颐、杨殷同时遇难，致令党失长城，革命所受损失极为重大！

### 四、安南志士

文虎在广州惠州会馆会见安南复国志士阮爱国（胡志明）等同志，他们正在广州参加学习与工作。惠州会馆曾举行中国革命干部与安南革命小组同志座谈会，约文虎讲话。他们都是些刻苦自厉，奋发有为的青年，能说法语，兼学汉文。也有人在中国参加地下革命工作，被

投入监狱，出狱后又转到莫斯科学习。小组负责人阮爱国（后易名胡志明）致力于革命，笃行不懈，为众所推重！

### 五、商团戡兵

从管东渠（广东省委代号）同志处了解到一九二四年商团事变的真实情况。当时孙以大元帅名义主持省政，财政支绌，捐税◇多，是年五月底，广州商团代表集会反对政府的铺底捐，成立广东商团联防总部，推陈廉伯为首领，企图以武力推翻现政府，建立商人政府。（陈为香港汇丰银行买办。）陈廉伯筹款百万元，向德商顺全隆洋行订购79步枪4,850支，驳壳枪4,310支，手枪660支，枪弹430万发，运抵广州，孙中山下令扣留，陈令全市罢市，要求发还。孙从前线调集军队回广州镇压，由于范石生、廖行超军队庇护商团，孙乃于九月十二日率所部离开广州到韶关（以北伐为名）。十月十日，广州政府发还商团枪3,149支，驳壳枪1,851支，子弹124,555发，商团乃着着进行武力反抗。十月十三日，孙中山由韶关回师，驻石井兵工厂指挥平乱，十四日明令解散商团武装，双方在太平门普汉桥一带发生激战，范、廖部队回头助战，此时工农武装，黄埔学生军奋勇冲击，卒将商团击溃。陈廉伯等落港，战事始告平定。这次事变中共以全力支持广东政府，商团方面枪多兵少，且素无训练，缺乏作战经验，黄埔军队如刀剑初发于砺，对此乌合之众，小试锋芒，敌即呈瓦解云。

### 六、九龙会议

文虎在香港寓居跑马地林荫道姜秀珠家。姜世居香岛，时肄业广州大学，奉母家居，环境幽静，贺其颖、聂荣臻寓所亦在附近。溯自广州暴动以还，穗州残破，地下工作中心暂移香港，从事休整。此地距广州只隔一衣带水，姜往返省港，朝发夕至，习以为常。文虎莅港以来，协同当地区委（粤桂两省委）、海总与粤总，将各方工作彻底加一番整理，经过多方努力，查明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与症结，对症下药，经过一段时间后，两广革命形势渐呈好转，一般工作大有起色。为了加速工作进度起见，乃决定举行全区干部工作会议，以利推动和开展。经过邓发、邱玖等同志周密布置会议，在九龙郊区文庙大成殿内举行。该处庙宇宽广，邻近多为菜圃。出席会议者有文虎、贺昌、陈郁、邓发、翟汉奇、刘达潮及其他干部五十余人，一时发扬蹈厉，人心振奋，实为广暴以来的空前盛会。

此次会议任务首为讨论两广地区工作新方案，动员全区党与工会加强战斗，重整阵容！次为检阅并发扬光大全区革命力量。会议开始首由文虎报告国内外形势与目前党的任务，接着讨论新工作计划与方案。到会同志在报告与讨论进行中，一致踊跃发言，表示决心要剑及履及，奋勇向前，争取革命胜利，同时也认真进行互相批评，纠正缺

点和错误，发扬从头起步，日新又新，凌厉无前的精神！九龙会议经过是在秘密条件下进行，由于事前准备工作充分，经过良好！会后，到会同志对于革命前景充满希望和信心。

文虎此次驻粤港经时颇长，按原定计划必须各方面具体部署安排妥当就绪后，方行返沪。

[注]：九龙会议按原定计划完成，但是从九龙会议经过中发现不少有关问题。溯自一九二五年以还，广东中共区委以全力开展工人运动，先后成立产业工会与地区工会，由邓培、中夏、启汉等总其成，苏兆征、林伟民、翟汉奇、陈炳生均海总工会负责人。当时苏兆征、陆常告、翟汉奇、卢俊文为海员工会派往香港谈判四代表，陈炳生原为海员总工会会长，后因它案被捕，改推苏兆征继任。与此同时，广州工会有不少投机分子利用革命以达私人企图，如烂风炉、罗登贤等均是。烂风炉身为广东书记，乘党之危卷款潜逃。罗白称为广州某厂工徒，为人猥琐龌龊，贪财自私，酒色征逐无虚日，兆征称之为“濫仔”。

### 七、宋王石野餐

在文虎动身前，秀珠向文虎说：“全体同志半月以来，大家劳累过度，要求休息一日，以资苏息，我建议你在北航前也休息一日。”文虎当予同意，经决定于次日乃联袂渡海作郊游一次。届时天气晴朗，海不扬波，于是文虎、秀珠与贺昌三人联袂出行。此次出行由秀珠导游，登山临海，径行几数十里，沿途先登打旗山，自来水厂，潜龙台等地游观，俯览全岛，壤地虽少，但守备甚严。随后渡海驱车到九龙市郊游览，最后到宋王石海岸憩息。此时秀珠手持望远镜，指点远处零丁洋及上下海门，乃当年宋帝炳舟师沉没之所，历历如绘。此时贺其颖攀登宋王石向同人说：“此石为南宋君臣宋帝昞、陆秀夫、张世杰等被元师张宏范穷追渡海殉国的地方，宋遗民乃于其地建庙宇以资纪念，称此为宋王石！”（亦称伤心石。）当时三人共坐高阜上，远眺海天一色，天际渔舟出没，一望无涯，心旷神怡！于时，其颖坐宋王石上披襟当风，遥瞩海疆朦朧巨舰，烟尘蔽空。（时香港海面帝国主义军舰云集，港督金文泰与军阀李济深互相访问，联合反共，腥风血雨弥漫两港！故其颖怀古伤今，感慨万端，乃朗诵郑所南诗以遣怀。

[注]：郑所南诗云：“山木萧萧风更吹，二陵风雨至今悲，一声杜宇啼荒殿，十载愁人拜古祠。海水有门分上下，江山无地界华夷。同舟我亦艰难甚，愧向苍苔读泪碑！”

三人游毕宋王石，大家就海滨席地而坐，共进野餐。秀珠出罐头、土司（Toss）饱餐一顿，兴尽而归。不料归途忽见埠头高悬“台风”警报红球，顷刻间天宇昏暗，浊浪排空，海水泛滥进入市区，邮局一带，顿成泽国。当时但见海风强劲，高楼房瓦沿街飘散，市民亦多伤

亡，满目疮痍！据本地居民称，今番台风实为三十年来空前大灾。文等乃匆匆归寓以避其锋。台风过去，翌日即告天霁，文乃登英国皇后号（即兆征生时工作所在轮船）北航，香岛之行，始告结束。返沪后不久，得秀珠信已往广州工作，自此以后，一去不返，杳无消息。

[注]：贺昌，字其颖，山西离石县人，北大史学系学生，原系马学会成员，在北方书记部工作。贺年少气盛，目无全牛，现正主编“政治论坛”，他熟习历史掌故，平日生活任性，不拘小节，好饮酒后挥毫作诗，鲜所顾忌。尝戏称：“自身是唐代贺知章后裔！有其祖必头其孙，浪漫传统不是偶然来的。”贺一九三四年突围时，于江西玉山蒙难而死。

## 二十九、潇湘简牍

文虎少读潭州，壮游四方，故里情深，雪泥鸿爪，往事历历恒萦梦寐！偶一忆及，聊书所怀！

### 一、“无生父母，空亡家乡”

一九二五年钟英将有事于长江上游，文虎衔命溯江西驶，经江西、湖北以至湖南，主要任务是出席鄂湘等地党组织会议与规划工会工作，时间规定为六星期。先是文虎于一九二四年秋出国时，家中连遭三丧（曾祖父、母及祖父之丧），文虎之父寄函钟英，转致文虎，嘱其回家奔丧，及文虎归国，仲甫便以家信交文虎，并嘱文虎于到长沙时顺道返里一行。文虎因事在武汉及长沙耽搁，时间过久，事毕匆匆返浏阳，方抵家门，坐甫定，文虎之父即出钟英致文虎一函一电。文虎见信，知系仲甫手笔，阅信云：“虎兄：近日此间诸事待理，不可久候。语云：匈奴未灭，何以家为！望速返沪。”再阅电文，其语气尤急切！文虎妹湘南在旁见信说道：“这真是无生父母，空亡家乡，革命党人就是不讲人情。”文虎之父笑道：“这也难怪，少住几天便回去吧，否则仲甫先生又要动火了。”文虎亦觉此行逾期已久，不宜久待，在乡留住两日便辞家返沪。自此以后，四十年间，文虎即未重履乡土。一九二七年六月四日，许克祥派兵一营，略地浏阳，沿途烧杀亘数百家，文虎全家相率逃亡，流落他乡。文虎之祖母及姑母絮霞均客死汉皋，妹湘南远走春申，数年不归。文虎之父时在汉口亲遭胡陶之难，自詹大悲被杀，即脱◇走，匿武昌东郊卓刀泉民家。时湘鄂政务委员会严令追缉，悬重赏索购，乃只身逃往上海，久羁不返。

一九二九年罗亦农在上海被杀害，道路传闻，误认亦农即文虎，湖南军阀藉此搜查文虎家屋，逮捕家属姻亲，表妹胡里英被杀，文虎之父惊悸成疾，旋即逝世。自后家族被害多人，房屋被强占做兵营厩舍，覆巢之下，全家均破云。

### 二、湖南革命阵营与方略

当时，湖南革命阵营声势颇壮，湖南工会组织约廿多个。工会干部：长沙：郭亮、刘汉之，安源：李隆郅、袁大时、刘少奇，水口山：蒋先云、刘东生，锡矿山：周健武、萧石月，粤汉路：李涤生、朱少莲、朱锦堂等，纱厂易震环、萧◇◇均一时之选。长沙农民协会：柳直荀、滕代远，浏阳农会：王德吾、聂永辉等，已发动组织市郊农民。

在一次会议上，由于谈到“二七”运动，因而讨论到湖湘革命方略问题时，不少人认为湖南非工业区，产业工人不过几万，而以安源矿区为较著，就全湘言，地处中国内地，山多平原少，交通不便，故工人运动对外影响不如北京、上海之广远。因此今后湖南革命应引向农民运动方向发展，但仍不应削弱工人运动的主要地位。

### 三、兵工厂会议

文虎与静箴均为长郡联中校友，到长沙后即寓静箴处，与静箴日夕计议湖南区工人运动行动策略等问题。静箴语文虎应在长沙至少留驻两星期，否则不放行。文虎见当地党与工会组织一般均极活跃，惟兵工厂与铁路、轮船工会组织困难尚多，遂偕静箴等到株萍、粤汉沿途视察，并就地解决若干问题。二人返长沙后，静箴说现在应集中力量与时间来解决兵工厂工会组织。当静箴介绍兵工厂情况时，强调指出问题关键在该厂厂长萧开桢身上，并云：听说萧与兄家有姻亲之谊，可否直接向萧说服？文虎当表同意。原来萧开桢为湘南的公公，是上海高昌庙兵工厂老技工，曾用手工方法制造新式三八步枪，为兵工界创奇迹，因劳绩晋级升任湘兵工厂厂长。当文虎以静箴所谈告知湘南时，湘南说“阿翁豪强慷慨，不为力屈，但可以动以革命大义，我当试往一说。”翌日，湘南来言道：“萧为工人出身厂长，其意已为动，今日可往一见。”遂偕文虎、静箴访萧于厂长办公室。萧一见笑道：“我萧某世代工人，断无与书记部为敌之意，一切可以敞开谈。”三人倾谈革命亘二小时，尽欢而散。自是以后，兵工厂工会遂与中共合作无间。

### 四、湘江中学

湖南革命中坚脱型于新民学会，而其气质则胎息于船山学社。船山之学流布三湘，影响亘百年之久，湖南中共小组推“宿儒”何叔衡出面，就船山学社原址设立湘江中学。何主办湘江中学初曾邀长沙教育界绅耆等协助并设宴招待，但彼等届时一律拒不赴宴，何不以为意，笑道：“他们不来也罢，我们自己有能力把学校办好的。”于此可见何勇于负责的精神。

文虎与叔衡为旧友，故抵湘时应叔衡之约，往湘江中学讲演[注1]，并留住作数夕之谈。叔衡在侪辈中年事最长，但不喜人称其老，尝云：

夏周时臣靡年八十籍有鬲氏兵佐少康中兴，姜尚年九十，为文王师，引军灭商，此所谓“老而不老”！但何为人直道而行，不计个人利害，故不肖者恒中伤之，直到晚年在旅莫支部及江西苏区仍不能免，遂及于难[注2]。叔衡曾语文虎，从事政治者，一方面应有韩彭陷阵，但同时也缺少不了叔孙通，我不能责人以难能，正如人不能责我稳居中流一样。谈及王夫之时，他说此老著书盈数竹篓，听其虫蛀鼠啮，不料竟有媚事夷狄者如曾涤生其人，为其雕板印行，曾一生恶行，以此为善，实不可设想云。

[注1]：关于文虎在湘江中学讲演事，湖南文物馆出版之革命文献曾纪其事，该文引贺尔康日记云：一九二五年三月十四日即旧历二月十九日，文虎到湘江学校演讲，内容为阐述革命人生观云云。

[注2]：谢觉哉悼何叔衡文挽联有句云：“名之所至，谤亦随之。”并称此语直到何死仍属如此，足见何死前所受谤渎之一斑。

### 三十、云梦丛谈

江汉居长江上游，为中南政治经济奥区，文化摇篮，人物荟萃，代有英哲，大革命期间，武汉实为革命枢纽地带，贤豪毕集，舄履交错，交游极一时之盛！

#### 一、郎官湖会议

郎官湖集会为武汉工人斗争重大关键。当时武汉工会运动中以育南、施洋、白昊为其翹楚。文虎到汉口时，育南约施洋、白昊、代英等十余人共会于汉阳郎官湖，商讨武汉三镇书记部工作方案，包括汉阳兵工厂、硚口纱工、江岸与徐家棚铁路工会与海员工会工作方案。白昊初从事组织汉阳兵工厂工会时，因官厅关防严密，不能入手，白昊乃约数人自设测字摊于汉阳归元寺，为工人写信，以接近工人，久乃设立秘密工会组织。武汉三镇工会先后成立，自一九二四年起白昊即负全省工运总责。一九二六年十月，湖北省工团联合会改组为湖北省总工会，该会主席原为许白昊，但许谦让为怀，自动推荐轮驳码头工人向忠发任省总主席，许任省总组织部长，李昌荣任宣传部长。向出身流氓，极谄权术，遂收揽省总大权，胡作非为。郎官湖会议，伯皋被延为工会法律顾问，代英为工会义务秘书，育英为教员，楚女为通讯员，潭秋为政治指导员，人才众多，号称盛会。

#### 二、代英与施洋

施洋，字伯皋，湖北竹山人，湖北法政专门学校毕业，时开律师事务所于汉口花楼街皮业巷六号，为汉口人力车工会义务法律顾问，仗义执言，蜚声三镇。施器宇轩昂，议论纵横，尝向文虎谈：“南北各路铁路工会全路贯通后，便可驰骋南北，吞吐江汉，大干一场。”故育南称伯皋为“大开大阖人物”。二七之役，乃以身殉，观其狱中日记，从容赴义，可谓求仁得仁。代英与伯皋间平日互存芥蒂，至是大悔，乃为文以自讼云。



恽代英于一九二二年任武昌中华大学附中教导主任，开始组织互助社，在学生中组织读书会，后组织利群书社。代英初见文虎时，自言先世居江苏武进，为恽南田后人。少尝慕贾谊、司马长卿，刻苦学为文章辞赋，尝与仲甫通讯，尽弃其旧业，投稿《新青年》，其所著如物质实在论（据 Fullerton 之说论他心存在问题），论信仰（去迷信、归于智信）均有见解。代英体弱贫血，但精气内蕴，谈吐不凡，观其为文，条理明畅而易近人。又代英自号“自由人”（Freeman），湘浦曾谓代英：“马翁曾卑视‘自由人’（按原为 Gutz-Kow 机关报名称），兄何以有此称？”代英自此以后，便不复用此号，改称但一云。

### 三、萧楚女

萧楚女，鹦鹉洲木排工之子。其父湖南湘西人，木排浪沉溺死，家贫如洗。生时面目黧黑，后患天花，痘痕满面，故乳名丑女，后乃易名楚女。丑女幼年浪迹云梦泽间，少长流寓武昌，进某皮鞋作坊为学徒，利用业余时间苦学，遂通晓书算，辗转入利群书店，加入 C. Y.，渐学习政治，试作论文，为代英所器重，遂任《中国青年》编辑。一九二五年楚女被派往广州任农民运动讲习所兼黄埔政治教官，经常住在番禺学官，即广州东皋大道二号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协助润之主编《政治周刊》，并以大部分时间在农运讲习所工作。时周以粟任教编，农运所主要人员为彭公达、王首道、罗章凤与张斧等。楚女同许多草茅力耕的青年农民一起睡在临时搭盖的席棚内刊行犁头报，宣传侮圣非法的反叛经。（犁头报为广东省农协刊行，一九二六年三月创刊。）楚女生性孤愤，思想激越，尝谓：“经传典籍，圣言皆巫，真语皆咒。”又云：“善讼善祷，无异人首畜鸣。”又尝称独裁者蒋介石为大虫，曰“此公大类朱粲，好吃人肉。”（按，朱粲，唐初封楚王，谓世间美味无过人肉，曾亲烹食段确。）楚女文笔犀利，出语务以惊人为快。尝云：“为政之道，不过忘人敬神，自欺欺人而已！所以阿猫阿狗，白日升天，独余刘安，反成俗子。”又尝讥政治人物处世之道，“虽千变万态，但总其窍要，不外虚实相生，正奇相济，主奴相伴，黑白相用，逐渐上升，达到务虚去实，反正为奇，易主为奴，纯黑混白的境界，那就左右逢源，从心所欲，贵不可言了！”其他如：“瘫的灵魂”、“肉的行李”，脍炙人口，不一而足。

楚女生活率真，不拘小节，时发俊语滑稽哭涕，俨若东方曼倩，如云：“南朝金粉红楼梦，北地胭脂金瓶梅，小市民捧作金科玉律，劳动者却终身吃辣椒苦瓜！”某次开会，楚女后至，入室连呼晦气不已。人问他因何迟到？楚女说：“阿嫂下去，妹妹上来，一路吊膀子而来。”起初大家不知所云为何，后经解释，才明白原来他搭车时，乘客拥挤，他用手高攀车上藤圈，每到一站，售票员操上海话，不断

呼喊：“阿速下去，慢慢上来。”在楚女听来就成为阿嫂下去，妹妹上来了。闻者无不绝倒。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事变，楚女写印小册子抨击其事，知名于时。

楚女亦好谈诗，尝谓湖北革命先辈多能诗，如《大江报》编辑天门胡石庵，长江晚眺诗有句云：“名利舟中客，英雄浪里花！”极为悲凉可诵。又某次过汉阳鹦鹉洲，楚女与同行者论诗云：“温飞卿本长于传达闺情，但感于弥正平事，诗格忽变，于此足见古人重意气处。”

### 四、陈潭秋

陈潭秋，原武昌中华大学学生，后任女师教员，时年三十许，热衷革命事业，处事有远见，不骄不躁，为众所信服。自中共一代会起至四代会止，长期担任湖北省委书记之职，多历风尘，故面容苍老。二七之役，潭秋初持重，不主张与吴翻脸，后既决定大举，陈立即放弃己见。武汉分共时，潭秋连夜自九江乘快轮返鄂，参加应变措施，数夕不寐。一九二七年秋间自偕徐虔直从鄂潜行赴上海，幽居虬江路附近，对大革命失败事深致感叹。潭秋恒言：“革命大业必需文武兼备，二者缺一不能有成，辛亥革命与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教训可为殷鉴。”又云：“当武汉分共时中共在军事指挥方面，叶、朱、贺等虽颇习战阵，但均无大军团作战经验，因谓孙文不文，尚有汪、胡为其捉刀，仲甫无武，却无韩、彭为辅，胜负之数，实系于此。”

### 五、林育英

林育南有堂兄名育英，字仲丹，一八九六年生，黄冈回龙山人，长于育南二岁，少失学为织布工人，后赴安源工会工作。安源工会被封，育英化装为僧，易名张浩，只身逃出，经赣西北返武汉，途中化缘为活，白云：“钵千家饭，孤身万里游。”一九二七年在湖北省委工作，负责职工教育，亲在某工人子弟学校担任教员，但学童贪玩，不专心学习，所以成绩平常。仲丹欲辞职另易工作，往告育南，自述困难。育南说：“你教不好，谁又能去教好。”仲丹默然，遂返校。归途中偶然遇一驯猴老人，在校园隙地休息，因问老人：“猴子怎能学成把戏。”老人说：“只要耐心教，就可以学好。”老人随将夜深人静在灯光下教猴子演戏的经过说给仲丹听，仲丹听后大受感动说：“难道小学生比猴子还难管教么？”遂立即返校寻求切合实际的讲解方法，百折不回，全力以赴，久之成效大著，人人称为好老师。七月十五日以后，仲丹仍留武汉工作，后因不满意罗亦农做法离开汉阳，仍回上海全总工作，后在非非常委员会工作，龙华惨案时几及于难。育南被害后，遂遁迹隐沦，后病歿于肤施云，遗子黑皮。

[注]：郎官湖在汉阳风皇山畔，唐尚书郎张谓出使夏口，王泽宴李、张于湖上，湖因此得名。李白曾赋诗以纪其事云。

## 六、蒋先云

一九二七年五月，国共合作的武汉政府决定出师中原，举行第二次北伐，预料中原争夺，将是遭逢一场恶战。当时中央部署是：叶希夷全军守卫武汉，张发奎、唐生智率部主力出武胜关，张发奎军担任正面进攻，主力约二十万人。中共方面派蒋先云团长担任前锋。先云自江西归来，任工人武装训练部长。先云在东江战役惠州扑城时，亲临前线，身负重伤后，久未参加前阵作战。蒋先云奉到出师命令后，不期而然流露出来一种见猎心喜的心情。出发前夕，先云御戎装，跨骏马，腰怀全新左轮一支，来到武昌胭脂山嘯楼巷湖北省委办公处，出席最近一次例会。他报告北伐出师准备动员情况十分详细。他说河南敌军三面受敌，只要几个冲锋就会把他们打垮，情绪十分乐观。

省委会后，文虎留先云共同进餐，席中先云英气勃勃，谈笑风生。他慷慨陈词说：第二次北伐条件很好，此次轻装上阵，战役很快可以获胜解决，只是后方东西二面受敌，东面指蒋介石、朱培德，西面指川军刘湘、夏斗寅，应加强防御，采取以攻为守战略。又说蒋介石固属革命心腹之患，但其他军阀朝三暮四，反复无常，亦多非善类，我们应严格戒备，谨防变生肘腋。座中诸同志闻言，深以为然。谈至深夜，先云起立告辞，探怀出最近摄影戎装小照赠给文虎以留纪念。

先云师次武胜关后，托师部交通带给省委信一封，报告一路行军作战经过。文虎作复书时曾鼓励他勇敢前进，克敌制果！但又囑先云道：“上兵伐谋，不宜轻敌。”过了些时，忽接前方来电，报告先云同志已于临颖攻坚战役中壮烈牺牲。武汉方面大为震惊，中共全体同志无不悲恸万分，即日举行武汉三镇追悼大会以志哀思。文虎赋悼诗一首以抒悲怀，诗云：“胭脂山畔嘯楼中，剑气凌云敌垒空，武胜关前临颖路，天荒地老显雄风！”事后延年语文虎云：武汉出师北伐，先云冲锋陷阵，遂克临颖，奉军败北，先云亦阵亡，付出代价可谓极大，后果反促成冯玉祥出关反共，可谓人谋不臧，实堪浩叹！关于冯玉祥到苏联请求接济，获得大批步枪、大炮、机关枪及弹药等，从蒙古边圉用大队骆驼队运载回西北。冯本人于是年九月十五日由苏联返国，十七日在五原宣布就国民军联军总司令职，加入国民党，十二月止完全控制陕西全省，戍卫潼关。此时冯东向戒备，窥伺中原。他尝告诫部下勿轻进，要师学卞庄子刺虎，不费一弹，取得河南。次年郑州会议，汪唐将血战攻取得来的河南，拱手让冯，冯遂宣布反共，为时不过年余。说者称冯饥附饱扬，翻云覆雨！政治缺德！

## 三十一、莫京春秋

二十年代文虎多次出国参加国际会议并驻在国外工作，留居莫斯科颇久。文旅居苏联，初寓莫斯科京城市内，后迁往郊区，后又赴南俄旅行，前后经时颇长，与外邦人士晋接频繁，观感所及珍闻轶事，往往而有，爰略纪所历，以志鸿爪。

### 一、芦克思大厦

Lux Hotel 为莫斯科国际饭店，富丽堂皇，名实相符，寓居芦克思大厦大抵均世界各国来苏联访问贵宾，多为各国共产党中央与革命工会领导人。大厦通用语言，首为德意志语，次为法兰西语，末为英语，一切通告则用俄文与德文，电话亦然。进餐凭票证，出入凭汽车红色通行证，参观访问沿途优先方行。芦克思面对克里米宫，往来出席康民特尔 Kamintel 会议与晋洛芬特尔 Provitel 会议均经过红场及列宁墓，宫门警卫森严，检查出入证极其周密，进宫以后则行动无甚拘束。文虎居 Lux 有暇则参加大厦文娱体育活动，与各国同志交游，结识不少来自波兰、里加、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国的朋友。又在大厦中遇见一个中国籍红军军官，文与谈话，据称：王姓，山东胶澳人，幼随父下关东，转往海参崴、伯力佣工。在十月革命期间欧俄及远东战场战斗激烈，中国旅俄华工亦多参军助战，当时成立中国工人联队，在 Perm Ural 参战，对革命建立战功者不乏其人。近将退伍转业。又见其母，自远东来探望儿子于莫斯科。伊自言，丈夫为赤塔工人，其子参军后，多年无信息，伊乃沿铁路西行，沿站步行寻访其子下落，行径万里，最后母子始得相见，悲欢离合，终得团聚云。

### 二、鸱林别墅

鸱林别墅位于莫斯科郊外，为中共六大会议会址所在地。当时与文虎同住一室者有特立、江英、维它、兆征等。当时中共派赴苏联高级军事院校学习同志有刘伯承（陆大）、罗章凤（炮校）、朱瑞（炮

校)、曾钟圣、熊受喧(步校)、常坤(航空)等均被邀列席六大会议。东大中国支部一部分学生则参加大会专门问题小组委员会工作。代表报告与政治决议案讨论时间最长,前后经历四个星期,辩论亦最热烈!在讨论报告时,有湖南代表发言,报告醴陵农民武装斗争地主情形,说到某次斗杀地主,同时用梭标杀死地主的女儿二人。并坐中有某女同志不觉呜咽流泪说:“投生地主家女儿真太不幸!”并引起其他女同志的共鸣。有一北方工人代表见状,忽起立发喊道:“女同志们应该清醒些!我们同志与工人农民在长辛店、丹水池、唐山、浏阳、平江等地不是成千成万在阵前牺牲,流血成河吗!我们是进行阶级斗争,你们为什么难过!”正在流泪的女同志连忙偷偷拭干眼泪,默默不响了。

六大会后一中全会决定过去在工作中犯有错误的某些同志留莫学习。(尚有十余人因长期在国内工作身体弱或患病,留苏休养。)但当时东大支部认为他们犯右倾错误,大施攻击。文行前特立、中夏来寓话别,大家互相勉励一番,说:“留莫的把代表工作做好,归国的把国内工作做好。”临别时记得中夏说了两句笑话:“止谤莫如坐监狱,犯错误才当代表。”

### 三、海滨漫话

在留莫期间,代表们集中住在鸥林别墅,会毕后一部分中委分别到各地旅游参观访问,在这一段时间,文虎、项英、虞卿等曾在列宁山休假二星期,随后到列宁格勒访问参观市内 Malinsky 宫与 Bavlovsk 夏宫。看到沙皇穷奢极欲,残民以逞的种种行径,令人发指!后来又,到热海旅行。在海滨休养地区有欧、美、非、亚各国同志集合居住,其中东欧诸国国籍人数更多。他们皮肤异色,语言异声,衣服异制,文字异形,生活异俗,但彼此友好无间,相互倾谈极为融洽。在大家坦率漫谈中,互相启发,彼此得益不少。据非洲同志介绍:在非洲有世界最古老专制帝国,君主政体朝代绵延二千年,皇帝传统可谓“万世一系”,这是过去黑暗非洲的象征,也是未来革命的火山。另一些非洲同志来自非洲中部扎伊尔,是非洲盛产金刚石矿区的地方,与盛产黄金钻石的南非同是西方资本主义冒险乐园。当地剥削骇人听闻,也将是构成非洲革命爆发的火药库!至于非洲北部的埃及,人民处于黑暗时代最长,号称“压迫愈大,反抗力亦越大”的国度,它将是非洲最先见到光明的国度。

海滨风物明秀,嚣尘不染,生活宁静,仿佛世外桃源。某次周末,有当地女校师生特为远方客人举行游艺晚会。在精湛的音乐与舞蹈表演过程中,她们以无限的热情倾泻在观众同志身上,友好的深情厚谊,使人们万分感动!隆情盛谊,令人难忘。临别大家互出纪念册题字,

中国客人想到本国灾难重重,感怀尤多。当时文挥笔题四句:“阿山(阿尔泰)有积雪,热海夏生寒,人间正炎暑,未许桃源看!”以后,文即冒着西北利亚风雪东行返国工作。

### 四、莫斯科河游艇失事

莫斯科河流经市区,同巴黎塞纳河、上海苏州河广度相当,为游人打桨泛舟之所。东大学生课后常到莫河游玩,习以为常,但当年暑假却因游艇失事造成四人溺水死亡的事故。

先是东方大学中国班有湖南女生占多,她们努力学习,成绩优异,平日极少外出。校长拉狄克尝劝他们要出外运动,锻炼身体,因此她们开始划船活动。莫斯科小艇◇◇如梭,才容数人,人坐舟中不能回旋,长桡如剑,操作不便,前进时,艇身摇曳,状极不稳。这次参加划船者四人,平日不习荡舟,更不谙游泳,登舟后心怀惴惴,舟偶失均衡,艇稍倾侧,她们便惊惶失措。时值日暮,忽起大风,艇旋转失灵,遂告倾覆。当时水深浪阔,四人落水后,瞬息间悉告灭顶下堕,捞起后虽多方急救,无法回生,同学闻之,大为震动。是役死者全系湖南周南女校学生,事后送往郊外火葬场焚化,刹那之间化为一缕青烟直上太空。亦农悼词说:“梦魂夜夜湘江水,世事长怀革命忧!”临场者均表悲恸云。

### 五、T. M. 行猎

曩文寓鸥林别墅附近松柏茂林,清泉怪石,湖水澄澈可以见底,林间古木参天,上有巢鸟构巢树杪,为游人行猎之处。某日天气晴朗,台尔曼 Tellman、◇书翁 Buchman 二人来寓访文虎,茶会后相率出外行猎,闻林间高处有鸣泉,咕咕鸣声,书翁循声而往,屏息举枪瞄准,但闻枪声一响,鸣鸟应声落地。随后又前行,复猎获大鸟,但不识其名称,兴尽而归。阿双见之,亦称不识其名,乃往查禽鸟辞典,仍不得其解。台尔曼笑云:“鸟类辞书所未见者岂止此鸟?”乃携归,拟解剖剥制,陈列以资研究观览,其闲情逸致,有非他人所可及处。归国后人事倥偬,回忆前影如同梦境!

### 六、刘伯承将军

中国同志当时在莫京学习陆海空军事者有刘伯承、朱瑞、罗章凤等均列席六大会议。刘,四川人,时在陆大学习,博览群书,生活阅历丰富,最为健谈。时年三十七岁,身材高大,肤色黝黑,眇一目,辩才无碍,议论风生,能诗文,不类武夫。自云家世贫穷,父为吹鼓手,少历行伍,长入讲武堂,出入战阵,入浴时见其浑身弹痕历历犹在。“他带着眼镜,有很多可敬的伤痕!”(Engel: Kan Schorlemmers Leben)刘在一九二三年春曾任四川军第二混成旅旅长(受赖心辉节制),在资中对杨森作战,屡立战功,后熊克武全军退出四川,刘因

负伤休假遂离军，一九二七年取得中共党籍。刘长期亲历战阵，故用兵自有法度，与古代兵书暗合。常云：“五行若定，克敌制胜，五行不定，输个干净。”所谓五行系指掌握任务、敌情、我情、地点与时间等因素而言。又言兵凶战危，可弭则弭，故以止戈为武，在陆大学习，专心致志钻研近代战术及俄文，后译著有合围战术、步兵战术概要等书。回国后，担任方面军领导，钻隙行军，运算如神。

### 三十二、六届四中全会侧记

东方部米夫泡制六届四中全会，篡夺党中央大权，扶植王明为傀儡，成立临时中央，王坐镇东方部内发号施令，遥制临中，罪大恶极，人所共喻。关于四中全会经过，外间传说不一其词，兹据亲身参加四中全会者文、林如谈话所记要点转介如下：<sup>1</sup>

四中全会是违反党章非法召集的，因此引起全体党员的愤慨与反抗。当时六届四中全会出席人员中，反对米夫、王明篡党集团的有：文虎（中委兼中央工委书记兼全总主席）、何孟雄（江苏省委委员兼书记）、李求实（共青团中央委员兼书记）、林育南（中央苏维埃准备会议秘书长）、史文彬（六大监委主席，京汉铁路总工会主席）、吴雨铭（中国铁路总工会秘书长兼北顺直书记）、张昆弟（铁总北方办事处主任）、袁乃祥（唐山市委书记）、萧道德（全国苏准会主席）、徐兰芝（陇海铁路总工会主席）、沈先定（上海总工会主席）、徐渭珊（上总纱总主席）、张金保（上海纱总女工部长）、谭寿林（全总秘书长）、王可前（少共江苏省委书记）、文、林如（满洲铁路特派员）、唐宏锦（南满书记）、陈郁（海总主任）、于菲等共计二十七人，均属当时党与工会负责领导人，大部系六大中央委员。四中全会召开时，米在会上冒称：奉国际命令召开四中全会，支持王明、博古另立中央。当时出席会议工会、农会党员同志绝大部分表示反对。

四中全会前，文虎曾写一文，题为“我们对十九号文件的意见”，内有云“立三路线彻底破产，威信扫地，应该撤职，按照党章召集党的紧急会议，合理合法处理党内争议问题。”但米夫固执己见，叫王明组织中央。

在四中全会上，米夫下令非法撤换中委四人，即秋白、立三、罗迈、贺昌，同时补选王明、博古、沈泽民为中委，刘少奇为候补中委，

<sup>1</sup> 文、林如，即罗章龙、徐彬如。— 补注

并以向忠发为书记。（向后投降南京，出卖组织，被处死。）

四中全会上王明集团与非常委员会对立，非委旗帜鲜明与王博针锋相对斗争下去。王明、博古、沈泽民、刘少奇原是非法塞进中委会的，他们根本无表决权，故中委多数实际属于非委方面。

在四中全会上，工农代表绝对多数反对四中全会。工人代表袁乃祥拍案申斥米夫与王明，声色俱厉。袁对米夫说：“你所策划的四中全会，是充满欺骗、诡诈、奸谋的丑恶把戏，你们背叛党章，违反全体党员的意志。”他说：“王明初回国要求全总分给工作，被派到一个卷烟厂工作，但不能胜任，被退回。博古在全总也做过技术工作，胆小怕死，怠工逃避。”

当时非委机关对外交通在东方旅馆，被顾、向等人告密，致使何、李、林等二十三人在东方旅馆被捕，被送回龙华加以杀害。

北方非常委员会设于北京，◇◇◇负责，设立紧急会议筹备处。天津非常委员会曹药任书记，北方其他城市亦设有紧急会议筹备处。◇◇◇在东方旅馆与文虎谈话，被派到满洲当特派员。

四中全会成立临时中央后，米夫令对于反王明的人严肃处理，又王明派陈◇到北京召集北方会议，响应者寥寥无几，临中大窘，乃用特务手段将令夫暗害，又暗害金人等，后更使史文彬全家遇害。又四中全会后上海临时中央王明在莫斯科报上写文章，对非委进行诬蔑、造谣、歪曲事实的报导。北方非委曾函该报说明真象，请其更正。

[按]：余所谈四中全会内容尚多，如：<sup>1</sup>

<sup>1</sup> 原文至此止。— 补注

### 三十三、三渡剑门

昔人有言：“三峡天下险，剑门天下壮！”文虎生平好远游，再渡三峡，三过剑门，可称“壮游”！回忆在抗日战争期间，交通十分困难，蜀道难行，人所共喻。一九三九年受国立西北大学之聘，首次自成都乘专车离川赴陕。一九四五年应华西大学聘，乘汽车自褒斜栈道经宁羌过七盘石，再度入剑门关。在成都华西大学讲学一年，明年期满又乘邮车出川，越嘉陵江，三次渡剑阁天险，直趋凤翔（宝鸡），渡渭水，到咸阳，前后九年间三渡剑门，备历险阻。追忆前情，分述如次：

第一次川陕之行，系携全家三人同行，乘坐国际顾问团专车自重庆出发，沿成渝路先到成都，行经合川、隆昌等县，两日到达成都，一路◇◇，行车十分顺利！

自重庆上清寺出发，车行二日到达成都，住沙利文饭店休息三天，刘鄱来话别后，自成都出发，经过广元、宁羌、褒城、沔县始达汉中（南郑），时已深夜。但因中秋节近，是夜月明如昼，车行如飞，抵南郑时城门紧闭，守门军队询明原委后，立即开门延入，是夕寓上海旅社，大家休息三日，游览汉中古迹战场后，文乃沿江北岸东行，即雇滑杆（一种轻便凉轿）三乘于翌晨清早向城固进发。是日天朗气清，惠风和畅，汉中平原风物优美，眼界为之一新！行过十八里铺抵宗营镇午餐，遥见城固雉堞环绕，钟楼尖塔，划破蓝天，耸立江滨，景象鲜明。近城郭，人民熙来攘往，十分热闹！半月以来旅途风尘，至此告一段落！

第二次自城固出发，先至汉中寓罗云峰家，伊兄妹二人均西大同学（满洲正黄旗人，母为公主格格），由二人陪同护送，亲驾车至沔县。乘坐私人汽车经过大安驿，以至广元，停留一星期，通过张凤阁（北大同学，河北人）介绍，乘西北盐务署专车自广元入川。

一九四六年秋在华西大学讲学期满，原定由成都东行，取道川湘公路回长沙，但因道路行旅阻梗，觅车未便，乃决定绕道西安东行出陕，经陇海线铁路回湘。于是仍循川陕公路出川。此为第三次渡过剑门，邮车系昼夜飞驶，乘月色前进，风驰电掣，速度颇快。邮车过大庙山忽遇盗警，过嘉陵江渡口，汽车轮被漂失，在沙河铁索桥畔发生车祸，夜宿柳沟（剑阁附近），次日山洪暴发，旅店被大水冲毁，沿途经过十分惊险！极难忘怀！

附：国际专车有乘客及翻译警卫人员共五十余人，共有大型交通车（法国制大型卡车）三辆，坐车设备华丽，沿途加油及食宿招待均由各县政府专设外事机构办理，招待十分隆重。顾问团车辆持有特殊通行证，沿途优先放行，遇有重要关津渡口，不必排队等候。

此次长途行车途中有多数外国朋友同行，彼此交谈，度峻岭，涉巨川，备历险阻。外籍友人中有潘伯夫 Panbuf 最近回国述职。潘自称南欧人，五十多岁，曾在德国学习军事，回国后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担任高级军职。潘博学多能，擅长外语，能操德语与法语，谈吐文雅兼富幽默感，终日手不释卷。潘与文交谈，态度坦率，谦虚好问，路上对文优礼有加，偕文并坐前排，观赏沿途景物，询问地理风俗，每问必称：“Porfesor”，行抵南郑，互道珍重，握手告别！Anf Wieder Sehen！

## 罗章龙回忆录

### 续编

## 一、生死战友简忆<sup>1</sup>

### 一、史文彬

史文彬，山东人，原长辛店京汉铁路总工会主席，一九二三年“二七”罢工领导者之一。一九二八年中共六届监察委员会主席。一九三一年非常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

史文彬，山东人，一九二〇年中共首批入党的产业工人。史少年时，家极贫苦，随其父进入德州兵工厂为学徒，出师后转入京汉铁路长辛店机车厂工作。辛勤学习，对革命有深刻理解。史品德纯正，不知声色货利为何物。赴事魄力雄伟，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有担当大事见识和能力。在全国铁路工会组织发展中，史为北方书记部最先发起人之一，也是北方铁路第一个中共党支部的建立者。

在创立铁路工会过程中，史不畏强暴，不为利诱，为革命正义直道而行，对革命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在一九二三年“二七”大罢工中，他与文虎并肩战斗，当史等被捕入狱时，文虎亲率纠察队冲进火神庙，进行抢救史等出狱，并因此负伤。牺牲虽重，但气壮山河，全国人民同怀感奋！由于中国工人努力奋战，一年后军阀曹吴旋告崩溃，史等遂胜利出狱，得庆生还。史出狱后，大革命期间任武汉政府劳工司司长，在任内多所建树。史在劳工部任职经年，兼管部中财务行政，身任繁剧，任劳任怨，平日一尘不染，离职时两袖清风。中共对他倍极尊重，公开表扬认为史为模范党员，可谓独立特行，号召全党向他学习。史文彬在党的三大至六大被选为中央委员。

王明集团篡党事起，史出于维护党与革命事业的热诚，义愤填膺，挺身而出。他不顾个人利害，生命安危，在四中全会上申斥米夫等道：“上梁不正下梁歪，国际行动世界各支部观瞻所系，如处置不当，遗害很大，现又变本加厉，不知是何居心！你们不为中国革命着想，也

<sup>1</sup> 根据罗章龙后人提供的抄件录入，标题另拟。文中“注”为原文。— 补注

应该为自身的利害着想，如果中国革命遭受破坏，你们以后还有脸见各国工人阶级吗？”米夫等面红耳赤，窘态毕露。但因此史更受到王明集团的嫉视与攻击。

一九三一年他当选为非常委员会中央委员兼组织部长。在花园会议上，他对米夫等犯颜直谏，慷慨陈词。

一九三二年，非常委员会决定史赴北方工作。

## 二、林育南

林育南，字南平，号湘浦，湖北黄冈人。他是一个勤学苦干，正直，具有强烈革命正义感的人。一九二一年他在北京山亢慕义斋介绍参加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并作为该会的永久通讯会员。他回到南方后，在湖北开展了革命的宣传和组织活动。一九二二年，他代表武汉党小组来到上海出席党中央会议，住在上海英租界新闸路。这次开会的主要目的是开展中国工人运动，在上海、北京、武汉、济南、广州各地成立劳动组合书记部，他被推为武汉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书记部成员还有许白昊、李求实、唐济胜等同志。随后武汉工人运动就轰轰烈烈发展起来了。在发展过程中，育南领导书记部同志首先开展武汉市纱厂、码头、海员、人力车、兵工厂等工人运动，后来成立了湖北工会联合会，领导了多次的工人斗争。

一九二三年一月，京汉铁路总工会在郑州成立，他率领湖北代表团到达郑州，参加了郑州全塘里普乐园伟大斗争。随后举行京汉全路政治大罢工，京汉铁路总工会党团派育南同志担任武汉地区罢工指挥，把武汉市几十万工人都组织起来，以支援铁路大罢工。当时武汉工人斗争形势非常紧张，育南同志不顾危险，不辞辛苦，领导湖北劳动组合书记部坚守阵地，把局势稳定下来。事后调到上海工作。他在上海深入基层，在沪西区领导工人运动，组织纱厂工会数千人，确定了上海工人运动的基础。他在上海工作一年多，取得很大的成绩。

一九二六年，北伐军来到武汉，育南同志回到汉口，担任湖北总工会宣传部长，他亲自参加组织和宣传教育工会群众，创办了数以百计的工人革命学校，亲自编教本讲课，朝夕工作，使武汉广大工人群众革命觉悟大大提高，增加了工会的战斗力量。

他同时又担任汉口党委的组织与宣传工作。一九二七年育南同志参加五大会，并当选了中央委员。

一九二八年他担任上海总工会宣传部长。策划全上海的工人运动。他身临前线，到沪东、沪西、吴淞等地区组织工人斗争。他参加当时上海出版的“斗争导报”的编辑工作。这个报纸是文虎主编，在工人群众中发行很广。育南同志写了很多文章，同时又在“上海报”与李

求实同志一道参加编辑工作。

一九二八年六大会国际内定向忠发为中央书记，育南闻讯大感惊异。他告人说向为石码头流氓，混进革命阵营，本不应接受向入党。况向在大革命中卷款潜逃，脱离党组织，怎能担任领导工作。又说：革命干部不能单凭口头说话，应从言论、品质、道德等全面作鉴定。如果按照政治条件，向做一个普通干部尚且不够，如果勉强决定，便要发生错误，必然造成未来的革命灾难，将貽后悔不迭。

一九三〇年他出席四中全会和花园会议，有系统地驳斥米夫、王明等人的荒谬言论，义正词严，毫不宽假，呼吁全党同志速起匡救，以挽救革命危机。他谴责米夫刚愎自用，敢于犯众怒，自己将自食恶果。一九三一年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成立，育南当选为中央委员兼常委秘书长，参加起草非委“提纲”工作。

东方饭店非委扩大会议时，中央指定育南出席作报告，在会议进行中，由于临中叛徒告密，他乃被捕入狱。他在狱中，临危不乱，镇静肆应，使敌方所施威胁利诱种种阴谋悉归徒劳，敌方乃深恨之，对其加害之心益切。

湘浦自狱中寄书给虞卿，信中四语云：“西望有山，东归无计。心平如水，去易留难！”

育南就义时年三十四岁。

[注1]：“西望有山，东归无计”二语出自徐霞客诗。徐霞客为清代地理学家，步行全国，著有徐霞客游记，有名于时。先是徐拟步行中国，考察山水地形，乃约其好友某出游，行至中国西部，途中友忽病死，徐护柩还乡，葬毕，仍独身出游，完成全国旅行计划。徐与其友逝世时，作诗悼之，中有句云：“西望有山生死共，东归无计去留难。”

[注2]：“去易留难”一语，语本左传伍尚告其兄伍员云：“我为其易，子为其难。”意思是说：“死的事很容易，一死便了。活着的人们，报仇雪耻，任务却是很难呢！”

## 三、何孟雄

何孟雄，字楚王，号江囚，湖南郴州江华县人。一九二〇年暑期投考北京大学，刻苦自学，博览群书，实行泛劳动主义。邀集同学张树荣、贾纾青等组织工读互助团于北京斗鸡坑。女高师同学缪伯英、易群先等闻风响应，慨往助之，愿作义务劳动。从者既多，声动京师，《新青年》曾介绍工读互助食堂成立经过，号召社会人士捐款救助之，各方参加青年愈多！何、缪等往来于北大亢慕义斋，遂与文虎接近，互相砥砺，力争上游。何旋加入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为发起人



一。后参加北方工人运动书记部，深入革命，斗争在最前线，在京绥路领导罢工胜利，卓著功绩，向中共北方区委取得中共党籍。

一九二二年孟雄被选任为出席远东各民族大会代表，与王铮等出国赴俄，号称北路代表。北路代表路过哈尔滨（龙江）时一部被当地军警逮捕，何亦在内，陷龙江狱中。文虎闻讯乃请蔡子民（元培）出面，用北京大学名义向黑龙江督军孟恩远请求省释，何、王等十余人遂恢复自由。自是以后，何在京绥铁路总工会任秘书，后又调任总任秘书，文虎出国时由何代理文虎职务，在铁总工作。五大、六大均被选为中委。

一九三〇年，何孟雄担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对于李立三、向忠发的错误路线，由于何久在工人运动基层工作，深悉其奸，独排众议，多次向国际写信指斥其错误路线，同时又在会议上公开揭露，口诛笔伐，不遗余力。因此对方感到非常恐惧，大施讨伐，诬何为右倾，为反党，为分裂，誓与不共戴天。他们公然宣称：“有了何孟雄，我们的戏就没有人看了。”可见何立场坚定，义声远震，不是偶然的了。

一九三一年，王明回国进行篡党，召开四中全会。何本耿耿为党，为革命一片忠心，即起仗义执言，申斥王博，对米夫力加抨击，冀其悔悟。在花园会议上何与育南等不顾情面，针锋相对，申讨其罪行。王博对何等恨入骨髓，日夜设谋必思置之死地而后快，于是便发生了龙华惨案。这次不幸的事变，完全是王、博、向忠发诸人一手造成的。

在龙华案审讯时，王明党徒，东大支部回国夺权学生唐虞与王琳英、小丁（丁默村？）等当场向敌方检举何、林、李等二十三人的姓名及其在中共非委中央党组织所担任的职务与过去参加革命事迹。敌方据此材料，得以定案，何遂遇害。

先是，一九二二年何与师大同学缪伯英结婚。缪先入党，曾任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女工委员，劳动通讯社主编。伯英在何被害前一年因积劳患疾，医治无效，在北京病逝。

#### 四、李求实

李求实，字伟森，号北平，湖北武昌人。少就学于湖北外语专修学校，初加入利群学社，与育南友善。毕业后在河南中州艺术学校任教。一九二五年文虎在开封组织河南总工会发动焦作矿山大罢工，李往郑州参加书记部工作，负责领导河南青年革命运动，被选任当地少共书记，协助河南工人运动工作。一九二六年后转广州少共任书记兼《中国青年》主编。一九二七年大革命时代，调任武汉少共书记，湖北省委委员兼宣传部党报编辑委员会主任（时文虎任宣传部长），一九二八年转上海，任《上海报》主编，负责江苏少共省委书记。五大、

六大均被选为中委。

一九二九年，求实与文虎、育南同寓上海虬江庐，合办《斗争导报》与《上海日报》，该报抨击时政，发扬革命正义，风行南北。求实并在此时组织革命文艺译作会，刊印文艺书籍多种。（Dostovsky传记，即于此时出版。）

一九三〇年，求实出席四中全会，反对米夫、王明篡党言行，退出四中全会。参加非常委员会，当选为中央委员兼中共非委少共书记。并于此时亲自组织革命文艺联合会被选为主任，与左联对抗。一九三一年一月为王、博、向忠发告密遂陷龙华狱中。

求实既入狱，亲见王博叛徒深入敌方活动，卖党求荣，无恶不作，自知不可幸免，乃勉同志以革命大义，朗诵张巡旧文语曰：“男儿死耳，不可为不义屈”（语见韩愈引张巡语）。闻者感奋，愈益坚强不屈，通过虞卿派人探监，他从狱中寄书文虎，附五言诗一绝云：“革命危言在，成仁取义时。新春人日好[注1]，虬江寸心知！[注2]”

[注1]：何、李、林等二十三人就义时间即旧历春节元旦，号称人日，故诗中称“新春人日”。

[注2]：虬江即虬江庐，在上海，文虎、南平（育南）、北平（求实）三人所寓。

#### 五、王震异

王震异，字仲一，山西榆次人，一九二一年太原学联会主席。与高君宇等进行反军阀活动。一九二二年进北大旁听，同时加入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为会员。一九二三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旋被任为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秘书。仲一奉令到浦镇组织津浦铁路工会，在南方号称英勇善战，多次罢工屡获胜利，被选为津浦铁路总工会委员及秘书。在“二七”大罢工中，仲一响应长辛店通电声援，并亲赴各路组织同盟罢工。

一九二五年河南总工会成立时，开封、郑州、洛阳、安阳与焦作一带，工农齐起，声势浩大，中原鼎沸，工农群众运动如海门潮涌，汹涌澎湃，局势空前。仲一对组织群众工作贡献独多，在河南总工会成立大会上，他写了一副对联，悬在大门口，联云：“世运突变，六代豪华灰尽；历史重光，工农群众登台！”

仲一在中国大革命时期负有盛誉，全国知名。他代表北方出席中共三大会议，在一九二八年中共六大会上当选中央委员。仲一当时与向忠发、李立三等进行了一系列的路线斗争，所以很不为向李所喜，仲一屹立不动。仲一对工作恒怀大无畏精神，奋勇前进，尝自书：“挽狂澜于既倒，障百川使东流。”二语于座右铭，以自勉励！

一九三一年，王、博危害革命，仲一出席四中全会，大声疾呼，谴责米夫罪行。仲一正告出席代表不要放过王、博罪行，做好好先生。大家应明白自己的神圣义务，要认识“一日纵敌，数世之患”，王、博因此恨他深入骨髓。

仲一仪表威猛，气韵沉雄，笔有文采，富正义感，一诺千金，疾恶如仇！有古并州游侠气派。

仲一在狱中备受酷刑，牺牲于北京狱中。

### 六、张昆弟

张昆弟，字芝圃，湖南益阳人，一九一七年湖南长沙第一师范毕业，新民学会会员，一九一八年赴法留学，三年后归国，到北京北方书记部工作，受命担任正太铁路总工会秘书。一九二八年六大上当选中央委员。一九二九年任铁路总工会东北特派员。一九三〇年参加反对王明集团的斗争，出席非常委员会会议，当选为非委中央委员。他坚决反对王、博、向集团破坏中国革命的罪恶行为，他与夏曦为同学同乡，但对夏曦的行径极为不满。他认为应该按照革命原则办事，勇往直前，有进无退。

昆弟为人朴实，不追求名利权位，朴实沈毅，熟思而后行，行而不挠，信心益坚。向忠发、王、博屡施分化政策，欲收买昆弟为己用，昆弟深恶痛绝之。又申斥米夫为老奸巨恶，怙恶不悛，及革命败类，害群之马。因此王、博集团衔之之骨，遂终为所害，死于湘鄂西苏区洪湖地区。

有遗诗一首，其诗云：“前犬后狼，中国不祥。孰令致之，祸起宫墙。愿以热血，遍洒北荒。志士仁人，永矢勿忘！”

### 七、韩麟符

韩麟符，字令夫，河北天津人，南开大学学生。五四运动时，任天津学生会主席。后加入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为会员。一九二三年加入中共，卓著勋勤。一九二五年起先后任北方区委委员兼天津市委书记。一九二八年六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一九三一年当选为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委员兼北方区委委员。前此守常倚为左右手，尝云令夫北方之强的代表人物，意气飞扬，大才警警，今日国士，当之无愧。

一九三一年令夫对中央非委多所建树，龙华惨案后，令夫专程来沪，请求非委中央北迁，以避王、博集团迫害。当时因文虎往东北未返，未果行。令夫乃独自北返，主持北方工作，往来北京、天津间，后又在察哈尔、张家口、多伦等地区组织群众武装斗争，成就卓越，

人所共晓。他说：“我们为远大目标奋斗，决不计较一时的得失成败，也不管个人的利害，公道自在人心，历史当作鉴定，唯有时间可以公平合理解决问题！”由此可见他的光风霁月、磊落不群的胸怀。

### 八、罗章凤（即陈虞卿）<sup>1</sup>

罗章凤，湖南浏阳人，他是龙华惨案后牺牲烈士之一。一九二四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参加革命时年十七岁。

一九二六年入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加入中共为正式党员。同年毕业后派往湖南安乡主持农运工作，担任农民协会主席兼武装部长，冲锋陷阵，卓著成绩。一九二七年调任武汉中央工作，任警卫营政委（时陈赓为营长），整军经武，少年有为。一九二七年秋送莫斯科学习，分配在炮兵学校深造，参加中共六大会议与刘伯承同为军校支部代表。一九三〇年毕业回国，任苏维埃准备会议保卫科长。为该会组织委员会委员。深得各苏区代表的爱护，团结一致，共同反对王、博集团的篡权行动。向忠发等深忌其能，多方加以非难，格于群众力护，无可如何！

上海龙华惨案发生，虞卿担任营救工作，深入监狱，冒险营救被难人员，在极端困难条件下，终于解救六同志出狱，并且对牺牲同志吊死唁生，抚恤家属，作了充分工作。临中书记向忠发投敌后，多方设法将虞卿逮捕，牺牲于狱中，时年二十四岁。

### 九、金人

金人，字和尚，陕西关中人，北京马克思学会组织干事，一九二五年加入北方共青团为西安团委书记。工作作风，大开大阖，能起能落！以“雄才大略”自期。众惊其勇。自是以后往来北京西安间，宣传组织革命群众，为北方区委所倚重。一九二八年出席中共六大会议当选为少共中委，在大会上斥责李立三向忠发的严重错误思想与行径，怀有先见之明，同志无限信服。

一九三一年他在上海出席中央非常委员会，回北方区委任职。后被王明集团所害。

### 十、李墨耕

李墨耕，原名梅羹，湖南浏阳人，北京大学德文系毕业，为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发起人之一。一九二二年被任为北方书记部委员兼秘书，党报《工人周刊》编辑。多次参加领导北方铁路矿山罢工斗争，贡献极多。墨耕精通德国语文，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九年留学苏联，

<sup>1</sup> 罗章凤为罗章龙胞弟。— 补注

深知东大支部内幕，对米夫深鄙其为人，拒不为米工作，米深忌之。一九三一年任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西文秘书，主持中央印刷出版事宜。一九三一年，顾顺章前往实行武装夺取印厂，李脱险出走，后在南方牺牲。

### 十一、谭寿林

谭寿林，广西贵县人，一九一八年北京大学文学院学生，五四运动中与文虎主持该学院学生会工作，参与火烧赵家楼运动，“六三”风潮中与文虎、君宇等同学共入狱。北大校长蔡元培向政府抗议、营救，以去就力争，他们终于被释出，继续参加群众斗争。寿林一九二一年加入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为基本会员之一，开展革命宣传活动。

大革命失败后，他到上海，在严重白色恐怖下进行工人斗争，任劳任怨，百折不回。一九三〇年他参加四中全会。坚决反对米夫、王明的篡党行径。他面斥米夫所倡议的残酷斗争与无情打击，说：“你们的行径酷似落后部落‘打冤家’！无丝毫近代革命政党的气息，此风一开，冤冤相报，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如鼠斗穴中，成何体统？岂不令亲痛仇快！我号召全党同志坚决与你们讲理，直到你们认识错误才止。”因此王明集团用告密手段把他推入监狱，一九三一年五月三十日牺牲于雨花台，年三十七岁。

### 十二、宋天放

宋天放原名克钦，湖南浏阳人，少年时就读于南台小学、长郡中学，均与文虎同学同班，二人深相友善，常相约出游，登山临水，赋诗自励。天放所居与谭嗣同旧里相邻，谭氏莽苍斋所藏图书极富，二人恒同往借阅，因此对谭氏所写仁学手稿及诗词观摩机会颇多。前言往行，耳濡目染，所受影响极深。

天放美风仪，处世待人，风度泱泱，人称其有叔度之风。幼时诵习古典文学，精通英、德文，博及群书，下笔千言，所著诗文传颂一时！一九一八年天放北行，入北京大学文学院肄业。北京大学创建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天放为发起人之一（发起人北大同学文虎等十九人）。自此以后，他先后任长辛店学校教务主任，北方书记部秘书，北方中共党报《工人周刊》发行部长，劳动通讯社社长，为北京共产主义青年团部委员等繁剧工作，为文虎重要助手。

天放能文章，擅演讲，宣扬革命学说，雄辩滔滔，言论风彩，四座倾服。他热情对待一切革命工作，助人为乐，因此北京与长辛店工人对天放倍极敬重，昵称之为“我们的博士”，凡有疑难问题时，均向其请教益，天放谆谆告语，诲人不倦，工人群众视为良师益友，称

为书记部优秀教师。天放加入中共后，先后参加长辛店八月全路大罢工，开滦五矿大罢工，“二七”大罢工，仆仆风尘，席不暇暖，竭其全力，争取工人群众的政治自由与经济条件。每遇到成功则欣然色喜，感同身受，遇挫折则忧心如焚，再接再厉。全体同志，毋不敬佩其革命作风。

“二七”罢工失利，北方书记部负责人成为众矢之的，纷起攻击文虎，说他“躁进”，有些别有用心的人甚至怀疑罢工意义与北方书记部决策。纷纷毁谤罢工，以恶语相加，飞短流长，恶意中伤文虎。当时天放扬言此等宣教均敌方谰言，非革命词典中所应有，乃多方解释，文力斥其谬。反对者毋从施展其技，其风始息。罢工大义，遂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成为家喻户晓。

一九二六年，天放在工作中积劳成疾，南归养病，后来武汉政变，大革命失败后，天放隐居天马山麓。他看到北京大学亢慕义斋时期旧雨飘零，书记部同学存者无几，感怀前事，忧愤益殷，终于身抱沈疴，赍志以没。身后萧条，平生所著诗文积存颇多，由于国步方艰，未加董理行世，闻者无不惋惜。

[注]：天放所写文章散见北京党报者颇多，其所作诗词独见风格，惜均散佚。他在少年时曾写过一首国耻纪念小词，词云：“五月七日，正是去年今日！断肠时，南关铜箭冷，金马泪如丝！个里兴亡感，更谁知？”吉光片羽，足见一斑！

### 十三、刘炎

刘炎字青萍，湖南安化烟溪人。长沙周南女中高材生，一九二六年任本校共青团书记，后调任新化锡矿山党支部书记，兼武装部长。一九二七年马日事变，矿山骚乱斗争爆发。刘炎率武装部队反击，战败被围，据险死守，经夏到秋，未决，突围至湘乡，入长沙，参加秋收起义。事毕，同文调往上海中共中央工作，与金淑共事。抗日事起，组织妇女队赴前线劳军。一九三三年与陈廉思等参加蔡元培所组织的民权保障同盟会工作，亲往南京积极营救政治犯沧海等出狱，杨铨被刺后移居汴梁，会同魏郁等组织新笔会。中原沦陷于日寇乃播迁入四川，寓成都花溪，与石瑞予、季醒等共办报刊。

此外与刘炎同时代战友尚有上海女中同学王春熙（江苏维扬人），席咏怀（浙江海宁人），陈廉思（江苏盐城人）与贺士媛（湖南湘乡人）等人，其事略另见。

### 十四、谢怀龙

谢怀龙字黛茜，浙江杭州人，上海伊默氏 Emers 女子高级英文学

校毕业，一九二五年北京大学英语系肄业，在北大加入中共，任北大共青团支部书记，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西文秘书，中共远东日报外文版记者（后停刊），北京印刷厂案发生后，伊寓被军警查抄，谢子身往天津，旋被通缉，由海道南下，一九二七年到武汉任湖北省委宣传部秘书长兼 Borodin（鲍罗廷）夫人秘书，B 夫人陷北京狱中，被派北上营救伊出狱，护送归国。大革命失败后，调任上海市委委员兼妇女部主任，一九二七年在浙江被捕入狱，与陈焦琴等共同牺牲，年二十四岁，临终前有遗书长五千言，诗若干首，转辗欲致文虎，时文虎远居欧洲，书未达，文归后其同狱女友为诵其诗一首云：“百年世事难如愿，沧海尘身◇再现。昆仑东倒海西移，双龙头角何时见。”余时均忘，不悉其内容云。

### 十五、金淑

金淑字至诚，浙江镇海人，一九二五年浙江女师毕业。加入共青团，在岱山一带渔村从事组织渔民工作，后又回宁波做妇女运动。一九二六年与王亚璋在上海组织丝厂女工会并领导女工罢工与穆志英争夺领导权，屡获胜利。一九三〇年任中共中央工委书记并积极参加非委斗争后被临中所忌，自戕而死，年二十六岁，遗孤◇◇托刘◇抚养。

同时浙江宁绍方面又发生傅阿堂与陈焦琴被害事，傅为浙江宣绍工会主任，陈焦琴（女），年二十五岁，为镇海县委书记，均在残斗中被逮，入狱，旋均被杀害，同案唯徐◇坤入杭州反省院保释出，转任◇◇事。

### 上海非委烈士追悼会

以上非委诸英烈均属一九三一年临中篡党以后全国牺牲的烈士之一部分，非委中央曾先后公告烈士名单，并于上海沪中区某中学隆重举行追悼会，到会有当地工会、农会、学生会、妇女会等团体及群众数千人，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江苏省，上海市内六个区委负责同志均临会参加追悼会，宣读诗词，中央及省市非委等送花圈、挽联甚多。

一九三一年三月非委中央挽联云：血泪堕申江，百万工农齐首俯；龙华横剑影，吾党精锐恸销磨。江苏省非委挽联云：人杰地灵，鏖战大江南北；千秋景仰，热血飘洒龙华。北方区非常委员会：劳动组合，齐心协力；亢慕义斋，与子同仇！铁路总工会：是琦瑰磊落之生，生当媲诸禹墨；为中国革命而死，死有重于泰山。上海总工会：碧血瘞江郊，一代兴亡宣正气；雄魂归天上，九霄日月失重光。

按追悼大会于公布上述诸人事迹外，尚有下列诸死难同志事略，数十人大都属于北方与南方书记部工作人员，因限于篇幅，不及备载。（按一九二五年中共北方区党委出版《劳动英烈传》可以参考。）

各英烈姓名如下：

李大钊（河北乐亭） 范鸿哲（湖北武昌） 高君宇（山西静乐）  
恽代英（湖北武昌） 邓中夏（湖南益章） 蔡和森（湖南湘阴） 王  
瑞俊（山东济南） 邓培（广东香山） 王荷波（福建闽候） 姚佐  
唐（安徽桐城） 马净尘（河北大兴） 安庆生（河北天津）

附文虎悼仲甫：

半生革命，半生著述，血幻昙花，终有令名垂宇宙；  
辞尊居卑，辞富居贫，尘生沧海，更无同国觅宗师。

## 二、党史上的向忠发及其集团<sup>1</sup>

向忠发为恶名昭著的“大人物”之一，此人作恶多端，厮养走卒，出降事敌，毁坏党与革命组织，破坏中国革命，种种罪行，指不胜屈，死亡山积，血染成川。受害群众，事隔多载尚谈虎色变，余悸犹存。中国不敢提其名字，更不敢道其经历，万马齐喑，竟沉默无声。究其何因，笔者掇拾旧闻，略志其概，以供参考。

向忠发，湖北汉川人，汉口石码头装卸驳船上抬煤的装卸工头，同时也是石码头帮会的小头目。为人性格粗暴，又奸又狡，外号“奸狡佬”。（鄂谚：奸黄陂，狡孝感，又奸又狡是汉川。）

向手下带徒弟多人专门坐茶馆，摆抬子，敲诈勒索找外快，酗酒骂街打群架，白刀子进，红刀子出，是他的日常工作，因此负伤多次，右手食指残废，膂有伤痕。他结识一些无赖、泼皮自组成帮，好勇斗狠，平日不务正业。好赌博，进出赌场，师法赵匡胤，输赖赢要，仗势欺人，独霸一方，人人说他是汉口的一个大流氓，望而避之。

一九二四年，向看到工人运动渐渐抬头，他摇身一变，想加入革命队伍。某动向搞码头工会工作，藉图发迹，向大喜，加入码头工会，乱斗乱闯，渐露头角。他找许白昊，白昊认为他品质太坏，不大理他，后来项英认为他有些能力，并且代表一个帮会的力量，力主吸收入党（项与向为同乡）。当提出在支部会议讨论时，码头工会多数党员一致抵制，说：“向是个流氓，怎能让他入党，如果要他入党，我们就全体退出。”

向第一次入党未成，他怀恨在心，没有发作，从此以后，他伪装

<sup>1</sup> 根据罗章龙后人提供的抄件录入。原为数份未整理件，文字较散乱，约成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录入后依内容归并整理，以便于阅读，段落词句多调整移动，重复文字删除，标点校订，题目重拟。全篇无新增文字。另有“向忠发纳妾”一篇收入附录。一补注

积极，自誓痛改前非，戒烟戒酒，处处表现老实。过了一个时候，他请林育南替他说话，育南不理。他有一个熟人同乡包惠僧，是斗级营一带地区的“报痞”，平日藉记者身份，对民众进行敲诈勒索，外号“包老爷”，时已混入党组织。向又请包惠僧替他说话，包从多方运动支部，最后勉强通过。作候补党员。向入党转正后态度突变，原形毕露，自称进了门槛。以后有了靠山，便自高自大起来，对人说：老子今天已经跳到圈子里来了，今后谁敢惹我，老子跟他拼命。事后陈潭秋到上海中央报告此事，对文虎说向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文虎告诉仲甫，仲甫说，不必关门太紧，今后看他的表现吧。此事遂铸成大错，后来使革命蒙受重大损失。

北伐军到武汉后，武汉工人运动蓬蓬勃勃发展起来，向忠发开始是汉口驳船工会会长，在革命中他做了一些组织工作，渐渐被选为湖北总工会的委员。向对刘××吹拍有方，连升三级，成为刘××的左右手。许白昊，一九二六年原任湖北省总工会主席，是学生出身。当时向忠发自以为是码头工头出身，思夺其位，乃施布流言蜚语，中伤白昊，说白昊非工人。白昊为顾全全局，消除内讧起见，乃辞职，让位与向，向遂任湖北省总工会主席。从此以后，向就放肆起来，违反纪律，贪图贿赂，私做买卖，甚至无恶不作。

一九二七年，向忠发勾结湖北省总工会刘、李，组成一个集团，进行贪污勒索，违法乱纪一系列活动，把湖北省总工会闹得乌烟瘴气。省委乃派林育南、许白昊对他们进行调查，查明后内定撤销职务，改组湖北省总工会。但向等利用七月反革命危机，抵抗省委决议，旋即爆发汪唐反水，他们乘机自由行动，逃避责任。

在七月十五日国民党反革命叛变开始后，武汉革命形势急转直下，当时中共中央正式决定对反革命进行反击，并提出应变新方案与全面战略部署时（中共军事主动撤离武汉，进行两湖农民暴动，中共中央迁回上海，“五大”中央委员深入工农兵组织基层加强领导），全线紧张。七月底，武汉政府国共分裂，群众组织陷于混乱。刘、瞿首先携带老婆孩子自由行动到庐山避难去了。向忠发利用职权，伙同少数委员，私将湖北省总工会所有公款十万余元分赃卷逃，向拐走一万五千元。鄂总工会干部大部分跟着刘、李、向逃跑了。

向忠发携眷不告而去，到湖南长沙躲藏起来了，私自开设湘鄂轮船驳运公司，进行走私贸易，过资本家老板剥削生活，自乐其乐，花天酒地，醉生梦死，逍遥度日。后被轮运工人发觉，劝向回头。向佯允诺，但不见改悟。长沙当地党组织派人找他谈话，他避不见面。后来计划未成，中途生意折阅，又离湘卷逃上海。在长沙时，文虎在路上偶然碰到他，他对文虎所提诸问题支支吾吾。刘隐匿庐山，游离半

年以上。向乃到上海找组织关系。

向忠发对人说：“你们这些人，平日脑筋不灵，人缘不好，无钱无势，怪不得无路可走。现在不顾一切，还硬着头皮干下去，我看你有甚么下场。”

向忠发由李立三牵线，引见瞿秋白，对瞿表示竭诚拥护，愿作马前卒。瞿身边素无工人往来，向忠发有工人招牌，认为奇货可居。又经李立三撮合，向忠发正式投拜瞿门下，奉瞿为老头子，遂结成一伙。此时，瞿已负责，瞿表示过去的事（指鄂总工会自由逃亡等事）既往不咎，不必再提了，给他们分别安插在中央部门工作。

先是瞿登台，一切是秉承于二洛（洛米那则、洛埃曼）行事。自一九二七年秋间到广州暴动与十一月决议期间，瞿的左倾面貌登峰造极，大有不顾一切，忘其所以的样子。这样经过了一年多，中共积年硝药，几数耗尽，全局为之瘫痪。自从一九二七年冬季以后，不断强迫命令暴动，到处碰壁，到处行不通。结果国际亦感有换骑之必要，乃见风转舵，开始批评瞿的错误路线。国际五、六月间通知上海中央筹备“六大”工作，当时指定地点是在莫斯科。理由是安全，但同时还有更重要的理由是便于领导与利用控制，万事可以一言而定。当时也有人指出多数代表，几千里往来两国境之间，其间发生不安全事故，也是很难避免的。但最后找不到更好的地方，所以仍得按国际来信办理。

中央决定按照南方、北方、湖南、广东等地区兼产业系统，选定党组织的出席代表，并确定全体代表人数为一百五十人，分三十个小组出发，平均每组五人。

“六大”代表有工农运动前列的群众领袖，五届中央委员，共青团中央的一些负责人，各省掌握情况的负责人，全总、铁总、海总、上总都有代表参加。大约一百多人。北方代表团团长王仲一，湖南代表团团长文虎，广东代表团团长苏兆征、袁炳辉，湖北代表团团长项英，上海代表团团长余飞。文虎作为湖南代表去参加“六大”，是让他把湖南秋收起义的情况，向“六大”作专题发言。湖南代表团是个大代表团，有二十人，浏阳、平江、醴陵都有代表，是农民运动中涌现出来的群众领袖。毋庸讳言，“六大”代表来自各省，以工会为中坚，铁路、海员、矿山，各大城市总工会所占代表名额占绝对优势。

向离开长沙后转展到沪，上海方面无人知道他逃走的经过。“六大”通知到沪，乃把向忠发塞入代表名册，派向赴苏，<sup>1</sup>以增高身价。他到会场后，乃逢人卑词取悦，伪装左倾，拥护国际路线，检讨自己

<sup>1</sup> 另据史料，向忠发于一九二七年秋受派前往苏联，参加苏联“十月革命”庆典后又滞留欧洲，“六大”前未回国，直接成为代表参加“六大”。——补注

对革命无贡献，请求帮助改正错误。大家不识其底蕴，平淡然置之。有人虽知其罪恶，爰本与人为善的态度。向遂与李立三晋谒米夫，百般献媚勾结，王明建议米夫身边无人，可以收容向为己助，米夫亦以为然。

一九二八年六月，代表人数已经到齐，会议在六月十八日举行，会议时间定四至五星期。大会于六月十八日开幕，在大客厅举行，出席、列席二三百人。首先由布哈林作报告，一星期始完，讨论一星期。在讨论时特立第一个登台发言，布坐在旁边作笔记。聆毕，细语批评特立云：“你不是小孩，为何对瞿的错误不早指出？”特立无言以对。继特立发言者为瞿秋白。文虎第三发言，与瞿针锋相对，使瞿大感伤神。（在“六大”上，文虎作工运报告四小时，文又作湖南秋收暴动报告六小时。）在讨论时，众代表间发生激烈争辩，多数代表一致认为中国目前无革命高潮，瞿却坚持己见，当时辩论的焦点为盲动路线与革命高潮的问题。布报告称革命高潮目前不存在，不要主观臆断，众以为然。瞿内心不服，怕承认错误后名誉地位将一扫而空！还有瞿集团的人在旁打气哄抬，因此瞿总不肯服输。瞿发言时吞吞吐吐说：“中国革命高潮忽高忽低。”某代表忍俊不禁，直率质问瞿：“你简单回答一句，到底目前有没有高潮？”瞿勉强答：“没有高潮。”那代表再逼问一句：“有没有象征？”瞿大窘，不知所措，忽大声道：“确实连影子也没有！”众人笑说：“这样以后不准再说谎了！”瞿报以苦笑，下台而去！

大会在政治报告讨论结束后，进入起草各项决议的过程中，在这方面由主席团（主席团由文虎、特立、项英、苏兆征、史文彬等十二人组成）决定大会成立了几个决议案小组委员会，南北各地代表负责人分别参加组成，计分政治决议案、苏维埃问题决议案、职工运动决议案、土地问题决议案、农民问题决议案等五个起草委员会。政治问题决议案委员会的成员是文虎、仲一、特立，职工运动决议案委员会是文虎、项英等，农民问题决议案委员会是毛简青等。苏维埃问题决议案委员会是来自苏区的几个代表。会外各国兄弟党负责人台尔曼、季米特洛夫、白劳德等分别参加小组委员会。台尔曼为工人，朴实诚毅，乃日尔曼典型人物。白劳德，美国大学生，温文而雅，有教授风度。

各项决议案通过后，大会选举中央执行委员会与监察委员会。首由米夫提出一个比较复杂的记名投票初选与复选的选举方式，经过选举委员会通过，继就主席团提出的执监委员名单印发，各代表加以采用不记名投票方式。事实上米夫控制选举。米夫提出选举方案颇为复杂，大致从欧洲各国政党选举办法脱胎而出。先由各代表团提出中委

候选人名单，交给主席团研究，主席团召集各代表团负责人交换意见，按一定人数决定名额，再酝酿全部候选人名单，印成选票，召集全体代表大会，每人发给选票一张，各人就全部名单圈选所欲选的人，选毕，将票送给主席团，经过整理当众宣布中委名单。这个方案是为照顾那些在没有群众基础而又没有革命经历旧中央人员（瞿、李、向集团）。因为如果按直接选举方法，他们就无法获得选票，工会代表为了顾全大局起见，也就勉强同意了这种做法，上了米夫的当！

选举名单中初无润之，唯北方与湖南代表团提出增加始列入名单。选举揭晓计中央委员为文虎、苏兆征、特立、瞿秋白、李立三、项英、向忠发、唐宏锦、张金保、吴汝铭、王仲一、毛简青、罗迈等。监察委员为史文彬等。在选中委时各代表团均无向名，米夫乃暗地里将向列入中委候选名单，并逢人便说向的才干，百般包庇，这样向遂蒙混过关，获选中委，大得宠用。

大会对本届中委人选会内会外酝酿多时，由各代表团一致联名提出就史文彬与苏兆征二人选出书记一名，并解说史资历长，苏在南方海员中有威信。大家认为史品质最优，而苏则有才干，而史、苏二人均工人出身，最后大家同意建议选史文彬为书记，米夫亦首肯。

当时瞿秋白、李立三等认为史文彬为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的人，史为人正直无私，如史领导中央，对他们不利，乃连夜纠集一部分旧中央人员往见米夫。史为人傲，不如向忠发驯顺听话，瞿李请求以向代史，此种说法深中米夫私衷。米佯称到时再说。

大会后三日，一届中委会，在克林宫（克里姆林宫）举行，斯大林出席指导。斯大林坐左端主位，文虎坐其右，苏、史坐其左，灯光之下，斯眼际有鱼尾纹。他双目平视，说话声音低沉。讲话内容：中国革命形势目前没有革命高潮，处于两大高潮之间，以食指比划一个马鞍形式。最后鼓励代表们回国后好好工作，争取革命高潮早日来临。语毕退席。米夫就位，宣布国际决定任命向忠发为中共书记。

米夫推向为书记，全体愕然。经过米夫说明这是斯大林的意思，大家只好勉强同意。米夫等人见状，带头鼓掌，鼓掌者寥寥无几。米夫即起立提议史文彬为本届监察委员会书记，散会。由于国际方面认为向奴性充分，可以利用；史、苏为全总系统，不好指挥，所以坚持以向忠发为书记。项英在这个问题上不敢自作主张，一不敢揭发向忠发平时的恶劣品性和错误，还可能因为向是湖北汉川人，是项同乡，其次怕人怀疑自己想当书记等。

书记产生后，按程序应选举政治局委员，米夫站起来说今天没时间，以后再说罢。但是以后并没有召开全会，中央分工均由米夫暗中布置，外间无由知悉。由向忠发、李立三几个先回国的中委，抢先凑

了一个政治局，造成事实。有人质问向忠发，他拍胸膛说，这事由我负责，以后再也没有改动了。这种偷窃行为都是米夫一手造成的。

向忠发穷途末路，已届绝望，忽登书记宝座，大出本人意料之外，情不自禁，逢人便诉：“时来运来，讨个老婆带财来！”从此他对瞿、李等感恩图报，言听计从。事后瞿得意忘形对人说：“我们导演的是‘指鹿为马’的喜剧，党内可以太平几年了。”向利用职权包庇左右一群小丑，死心踏地结成一个死党，乱说乱动，违法乱纪，任意横行。向忠发曾对米夫吹拍带骗，发誓赌咒表示忠心诚意。他自己说，对上司就是要象哄孩子一样，哄过去就算了，事过境迁，就成一笔烂帐，谁还会理落呢！把好好一个党弄得七零八落，毫无生气。为祸于党，永无宁日。

“六大会”竣事，向忠发回上海后，伙同李立三组织新中央。一朝大权在握，越发趾高气扬起来。

向为人既无理论修养，又无斗争经验，品质、道德更是恶劣，因此工作能力非常缺乏，不称其职。但是他也懂得一套流氓帮会组织生活。（上海就职会上）向忠发忸怩说话——我是大老粗，斗大字不认得一箩斗，党龄也短，对当家事有些尴尬，实在办不下来。×首先起立，大声说：“今天是开天辟地以来的大喜日子，你在中国是当代东方马列大师，能文能武，又红又专，我们对你拥护到底……。”××立响应，一个箭步走向前去与向拥抱起来，连呼：“大喜事，大喜事。”

第二天常委开始工作，向旨：昨天就职典礼，不够隆重，有些为难。×：目前大家心里有些嘀咕，理应振肃一番，左右开弓，来个下马威，每人给上套笼头嚼子，以后才能办得开。立三乃从口袋里拿出一张名单，主张先进退一批干部，以树立威信。李说：“我们先把这些破铜烂铁打扫得一干二净，然后软硬兼施，组成一个新班子，局面自然会开展起来。锣鼓调子由我们决定，你只挥棒吆喝扬鞭就行了。反正不让你烦恼就是了。”向旨：“这还使得，一切听你们摆弄！”由此开端，一台封神大轴，连环大轴戏就开锣了。

他侥幸做了地下王国的头目，他也就安之若素，以大革命家自居，说自己是一贯正确的老子！与此同时，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想利用他作偶像，上欺下压。这样一来，他就过着不折不扣的木脑壳生涯。是该集团的木脑壳，天字第一号，一张王牌。他们日常工作就是召集会议当主席，吹吹拍拍，必要时就骂小同志，会议开完万事皆忘。某些人利用他签名盖章，发布文告，他也是糊里糊涂，唯命是听。他们天天哄抬他，照顾他，使他过着腐朽糜烂的生活。

过去向的生活，对待手下人们就是一手拿号筒，一手拿鞭子，习惯久了，要改也改不过来，所以下级同志们见了他就敬而远之走开去，

怕拢边。向对下级同志如对徒弟一般，吓唬，吆喝，谩骂，装腔作势，大言壮语，恬不知羞。向认为他们是一群打不知痛，骂不知羞的家伙，只有这样才能立威。他们居高临下，抢占“左方”高地，捧上压下，排斥异己，打击报复，专整新旧干部，骂倒一切，不容分辩！

向说：“我当这书记也不简单，是前世修积得来的，你们给我跑龙套，总算瞧得起我，我决不会亏待你们。”“你们识相些，一切都好办，如果要顶牛……”他尝说，×××是老实坨子，我的话他不敢违拗，不敢哼一声，不顺我不行。

向忠发以码头流氓出身，一步登天，骤登“大室”，起初还有些不自安，后来散漫逍遥，渐渐志得意满，作了一个地下朝廷的富贵闲人，他当时把正常事务交给左丞右相们去办，自己梦想第一发财，其次享乐。他纠合亲信，把贪污的钱偷偷开设一所出租汽车行，每天只关心汽车房生意，其它的事无所用心了。

向未进过正式学校，自称斗大的字认不到几箩筐。升任书记后，除聘黄为秘书，黄去后，改为潘闻宥为秘书。遇到必要时，左右叫他出来讲话压台，由于他不识字，所以不能念，讲稿只好先给他讲一番大意，要他照讲。他不耐烦，说你们的讲词我记不清楚，左边耳朵进，右边耳朵出去了，还是我讲我的，你们记录，这样两便些。因此他讲了些什么内容事后便忘得干净。秘书问时，他说这有甚么问的，你们看怎么写就怎么写下来吧，只朝好里说去。登刊后我也不必问，更不必知道内容。第二天，报上发表了讲话，潘闻宥还推崇向忠发是“东方革命理论大师”！

向在中央开会时，总是精神不振，春盹。遇表决时，旁人叫醒他，他不耐，说：“你们表决就算了，何必闹醒我瞌睡。”中央文件由潘闻宥以向名写文章很多，起初念给向听，有一次向不愿听，说反正不过是那些话，念不念都没关系。

向虽不通文词，却秘书之助，大做报告，滥写文章，所写文似通非通，装腔作势，连篇累纸，大部抄袭，又长又臭，不堪卒读。潘代向操刀作文，登在党报上，每期或数期一篇，都是用向的名字登在首位，提高他的威信。这些文章大半是抄袭国内外报刊而成。有许多不知内情的人也恭维他是优秀的理论专家。有一次，上海闸北某工人同志要同他讨论他所写文章的内容，他竟然说：“我也找不到。”（意我也不知道。）这些文章有的还翻译成外文，登在“康民”（《布尔什维克》）杂志上，久而久之，向就以“东方理论大师”自命。

向忠发生活堕落，思想混乱，语无伦次，文不成章。他最大的本领就是吹牛说海话，自封为一贯正确，从来不认错。向时常说，时运来了，连门板也挡不住呢！公然说：“老子是正确的老子，你们莫敢

批评。”

由于向长期过着偶像生活，而且自高自大起来，目中无人，瞧不起群众，也瞧不起知识分子，而且自己觉得中央政策是完全正确的。这样就养成一种个人的优越感，认为一切工作都在顺利发展，就是遭到失败，他也说是胜利。在一次会议上，同志们向他提意见，批评中央的政策，他听不进耳，大发脾气说：“中国革命归老子负责，用不着你们多嘴。”后王仲一说：“老向近来越搞越不象话了，这样下去非常危险。”

向说：“工人由工头管，庄稼汉由保甲长管，一行服一行管是正道理。你们调皮捣蛋，敢同老子作对！野杂种，没好样！”说时拍着胸膛自指鼻梁，高声道：“你们睁开狗眼看看，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老子是正确的老子，硬帮帮的，响当当的，你们不服我管，就是不守纪律，老子决不饶你们，入你祖宗八代！……”同志互相告语：“奸黄陂，狡孝感，又奸又狡是汉川！”相诫勿与他打交道！向忠发闻此说，不以为忤，反自傲说：“大家怕我，正好，老子就无人敢惹了！”

一次他在沪东区训话，一板一眼地宣讲道：“天上有玉皇，地下有阎王，山上有山神，海里有龙王，万事万物没个管行吗？中国天下分为两面，地面上的划为蒋老总管，这地面下就归我管，我老子是硬梆梆、响当当的正确，你们不遵守纪律，不服我管，他妈的祖宗八代！”以下胡说八道，拍桌助快，大家纷纷退席，一哄而散。

向对待向他提出批评的同志是极端粗暴的，他尝说：“×××专同我顶牛，妈的！我入他祖宗三代！看他有好下场？！”××被捕入狱，他大笑云：“现世现报！活该！”

对于向他进行忠告的全总工委同志，他怀恨在心，凭白诬他们有右倾倾向，口口声声说：“要送他们去莫斯科学习，不去不行，老子不答应。老子拼着书记不做，决不放过这些小子！”“臭知识分子，不识抬举，可恶，可恶，这种自由主义应按纪律给以制裁！”

领导是“左”，群众是右，他常常说：“我是左派，与我意见不同的人就是右派，‘康民’是左派，反‘康民’的就是右派，就是这个板眼。”右派就是国民党，反对他们的集团的人都是右派。对右派分子就是要残酷斗争，不择手段，不计情面。（反右板眼从斯大林那里学来。）

（三中全会后，他们对江苏省委、全总、北方区委来了一个大反攻，并把何孟雄、林育南打成右派。）

向对女同志态度作风极其卑劣，满口下流话，有一次竟把一个女同志大骂，使她掩面大哭，出门投江。当同志严肃批评他时，向忠发



大声吼道：“老子就是这样，不爱听的，快给我滚。”

他的秘书在旁解释说，骂也应该，是阶级斗争的艺术。

人称向忠发与立三是老搭档，天配地配，天生一对，一个是东方特爾曼，一个是中国拉沙尔，一唱一和，可谓无独有偶。向李飞扬跋扈统治全党的时候，向起了喇叭筒的作用。一次会上，向说话，搬指点名骂右派，忽然记不起应点哪些人，大声问旁坐的立三，还有哪些人是右派，我搞不清，还是你来说吧！立三大窘。向离席而去，哼了一声，连骂“狗杂种”不置。立三一次作报告，指名骂求实右倾，伟森（求实）起来质问，请他举事实。立三答，你不听老向的话就是反工人阶级，这就是右倾。向云：他的报告和文章不管对与不对，我一律同意。“你们反立三就是反我，反我即反国际，李一切言论都代表我，我一切行动都依靠他，他比我还正确些。”

中央下令进攻武汉，有些同志提出疑问，李立三歇斯底里地狂呼：扩大，扩大，猛扩大！进攻，进攻，再进攻！向忠发大发雷霆，骂了一通，酒气熏人大喊：“打到武汉吃粽子！打到南京吃月饼！”他吹牛说大话：“我请你们到武汉去吃月饼，到南京吃大菜去！”

忠发和立三臭味相投，狼狈为奸，平日很少冲突，但遇争夺权位时，却互不相让，大事争吵起来。如一九二〇年，井冈山军队进攻长沙时，立三预先私自印了一张布告，打算军队进城时张贴。布告印有湖南省苏维埃主席立三的名字。此事向忠发知道后怒不可遏，说：这是么板眼！和他争吵：“你自封主席，老子决不与你干休！”几乎要动武起来！立三连忙低声下气解释说：“不久打下武汉，一定让你主席！”向忠发转愠为喜，笑道：“这样才是正理！有饭大家吃！”高呼说：“我请客，到武汉吃桂花鱼，到南京吃月饼板鸭，都算我的帐。”由此可见这伙家伙遇事主观武断，狂妄胡行，自矜“了不得”，其实“不得了”。

李找人给向写文章，在《红旗》刊出，让全党学习向的文章。其实向自己在会上对人说过：“我斗大的字认识不了一筐。”但李捧向是“东方的活马克思”（李自称英格司）。建立××路线，俨然革命理论大家，遗祸中共，危害革命，造成灾难，实源于此。

向忠发任书记前后三、四年间，骂大街有他（向自称“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我是不好惹的”），出打手有他（他亲自打过工人），诬蔑陷害同志有他，投敌作引线查抄革命机关有他，逮捕出卖革命同志有他，真是无恶不作，耳闻目见，有口皆碑！

向忠发为非作恶不只是个人行为，而是纠合一伙无赖，组成集团，从事集体活动。这个集团的成员主要有：向忠发、瞿、立三、孔、万，

所谓政治连襟“五通神”<sup>1</sup>，“二十八布儿”，贺、关、胡均和、赵容等<sup>2</sup>。自一九二七年以来，他们结成一个宗派集团，对内互相包庇，对外攻守同盟，同进退共患难，以个人利益为重，把宗派视同高于一切，形成党中有党，外人称“政治连襟”。反映旧社会江湖帮派恶习，破坏党的纯洁组织。该集团中特别应该提出的还有最大阴谋家隐居中军，主谋划策，实行政治挂帅，他们同恶相济，罪大恶极，擢发难数，下面分别加以简介。

瞿秋白，学生伢子，脱离实际，工运、农运、兵运不沾边。幼名阿双（头上双旋），因号双目临空居士。好治印，秋之白华，西门之家。瞿“八七会议”当上书记原因是瞿长期为翻译，与国际代表关系密切，国际代表视瞿为己亲信，为了便于控制中国党，国际代表洛米那则指定瞿为临时中央书记。

瞿看破“红尘”，认为国民革命与共产革命都是逢场作戏，没有甚么根本差别，是非真伪也是一样。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谁能说个明白，使双方满意心服。真正的是非真伪就是唯我主义。我觉得这样就对，那样就不对，这个人对，那人不对，信不信由你，我掌握了杀人刀，大笔一挥，还怕你不划诺？！这几句真言做了“五通神”的最高指导原则。

瞿，向集团的道士<sup>3</sup>。瞿、孔都是自诩为熟读《阴符经》的人物，他们设计定谋，自觉高人一等。孔语录，一套咒语真经：

◇◇◇演戏，红白顷刻异  
政治如弈棋，一险胜三奇  
政治如赌博，全靠会冲壳  
不怕输脱裤，只怕输断脚

迈，镜松，庸懦无力。工委、农委、军委都走了，“六大”前上海停止工作，迈看守，饱食无事。政治失败后投奔向忠发门下，中年浪荡，生活失常，成为向、李集团帮闲者。

立三，少年佻达，不农不工，学无所长，当时是一个碌碌无能、无所取材的纨绔恶少。如果说他有甚么特长的话，只不过是夸夸其谈，大言不惭的空头大少罢了，所以大家都瞧不起他。但是向忠发对他极为赏识，因此李构成该集团的一个重要分子。向说：立三是个人才，

1 向忠发以下分别是：瞿秋白、李立三、周恩来、罗迈，以及王明、博古为首的“28个半布尔什维克”。— 补注

2 贺指贺昌，关指关向应，赵容即康生。— 补注

3 称瞿秋白为道士，系借用其父入了道家，瞿本人言行亦常流露道家思想。— 补注

很会冲壳子，革命如赌博，全靠会冲壳子，你们看不起他，你们冲得上去吗？不冲壳子行得通吗？

立三在集团中是搞贪污腐化，生活糜烂的有力分子。众所周知，他在安源时，他曾向工会勒索巨款，被工会揭发。立三同县杨东×曾作证，说李在安源以赃款寄回家置田产，邻里皆知其事。立三犯贪脏强奸，品质不耻于众，新申报唯以吃油饼，吃豆腐，浪荡徵逐声色货利，林◇提出证◇，要求按党纪制裁。仲甫以其人干柴烈火，欺人欺疾，更属难免，其事何足为怪，由他去吧。仲甫云：我为此人背黑锅多次，他屡犯不悛，他日必然祸害全体，欲令其返乡赋闲，撤职送回湖南安置。立三痛哭流泪陈词，誓痛改前非。仲甫无法，心慈手软，无可奈何，遂允其请。立三感恩不尽，说仲甫为重生父母，再造爹娘。事后立三对××说，不怕输脱裤，只怕输断脚。只要能保留党籍，不愁将来无出路。为孔赏识，挤入上层。此举所谓养痍遗患。

一九二五年，上海总工会原为何今亮（汪寿华）负责，立三乘汪不在，自封为总工会会长，汪素不与计较。立三在上总时与刘××共同盗用公款。他在上海总工会帐目不清，狂嫖阔赌，动用公款，为工会检举，上海报刊宣传，党组织纯以纪律，撤销其职。

立三在上海“四·一二”惨案发生后，武汉中央曾派他到上海工作，并携去现金作抚恤善后用。他到上海外滩登岸，见白色恐怖厉害，住在外国大旅馆，花天酒地，不敢露面。后被发觉时诘问其故，他见势头不好，匆匆溜走，所携现金全部耗散。回到武汉乘七月间混乱局面东躲西逃，无法追究，遂成一笔糊涂账。在武汉工会，三人（李、向、刘）互相勾结，收受资方贿赂，破坏工会财会制度，证据确凿。新白报揭露他在鄂总伙同刘贯之贪污数万元。

一九二七年，◇◇文恬武嬉，面临瓦解。有些人早已向各方联系，自觅生活，有了充分准备，写好了“悲痛中的自白”，只等时机一到，便纷纷登报，购买船票，离开赤都武汉，“投奔光明”，“弃暗投明。”

首先失踪——瞿、刘上庐山。向忠发拐走一万五千元，逃长沙开设驳轮公司。七月八日，刘拐走公款五千元，古瓷若干件。刘贯之拐走三千元，回上海家里。施存统骗三千元，吴玉章◇◇元。

一九二七年投降分子哲学语录：人民革命虽然失败，个人革命却成功了。这意味着人民虽受痛苦，个人都升官为宦，有权有势了。三朝元老式人物，以前对方接线，四通八达，路子很多，一朝摇身一变，由红衫变白袍。白刀子进，红刀子出。投降，做顺民。他们自鸣得意说：人民是老杆，个人却不当傻瓜。谭平山、邵力子、郭沫若诸人都是些具体的政治人。邵，平日宦囊丰裕，外国银行早有户头，腰缠万贯，远走高飞，以香港、巴黎为避风港，自称政治清流，在海外伺机

卷土重来。周佛海、施存统投南京。章伯钧、郭沫若去日本。李鹤鸣（李达）在湖南，董锄平去南洋。吴玉章去法国，其侄携巨款。邓泽生、陈友仁出国。

他们的基本思想是：小人之德草，风来两边倒，有奶便是娘。策略是平日神通广大，四面接线，一朝风吹草动，处处左右逢源。理想是终生富贵寿考，永远不入囹圄，官运亨通。这一群政治动物，活象封建卅年前十里洋场的“九尾龟”（吴妍人小说名）。

某对仲甫说：“时居今日，总得弄个一官半职才是正当路子，无官是不能存活的。你那些清高思想会害得你无米下锅，应该束之高阁吧。”仲甫答道：“你知其一，不知其二。我不是这么设想的，既然失败，不全宁无，何必营忧不休，自讨苦吃呢？”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前后，向、李、刘等分别从各地来到上海中央汇合。立三经香港转上海，赋闲经年，求助于瞿，大言炎炎，能说会道，略谙权谋，二人往来甚密，深相结纳。瞿令立三参与密谋，遂成至交。时瞿已负责，对向、李、刘等来到表示十分欢迎。会谈后表示过去的事（指鄂总工会及自由逃亡等事）既往不咎，不必再提了，给他们分别安插在中央部门工作。向、李、刘集团死灰复燃，不久气焰又嚣张起来，后来他们又暗自开设出租汽车行，一面经商，一边过着大老板生活，一边作为瞿秋白的参谋团参与临时中央的机要工作。又，立三与蔡和森有先后连襟之谊（立三婚后别有所恋，因让妻与蔡<sup>1</sup>），蔡感其意，多方从旁赞助，把立三列为出席“六大”代表。立三遂先行动身，代瞿参加筹备“六大”会议工作，并乘机结识米夫。

“六大”后，立三怀着做上主席的心情，在愚园路寓所大摆筵宴，庆功祝捷。正当酒酣耳热的时候，立三得意忘形，即席狂言，大谈“革命哲学”，他说：“革命不是别的，就是夺权与夺产。所谓‘权’即指军权、政权与党权，也就是生杀予夺的大权；所谓‘产’就是你的就是我的。哈哈哈哈哈！”

他反复念下面一些语调：目前形势是全国性高潮，直接革命形势号称全国范围内进攻路线，包围武汉，速战速决。又说：目前南京为一国首都，只要一鼓作气来个暴动，拿下南京捉住蒋光头，就是打蛇砍头，万事解决。其它的战斗可以不要了。强迫孙津川，命令他到南京暴动，结果牺牲惨重，完全失败。随后，他们又先后发布命令，强迫河北玉田、山东益都多数地区武装暴动，均同样遭到严重损失。

所谓“布儿”、“二十八布”，是卅年代由东大支部移植来到中国的革命落后组织，加入向忠发反革命集团的一部分坏分子。后来又

<sup>1</sup> 蔡和森与向警予分手后，李立三妻李一纯又与蔡结合，李立三即与李一纯妹正式结合。— 补注

吸收了一些牛鬼蛇神加以扩大。广义地说，凡属三十年代回国参加王、博组织者均包括在内，其中不少人回国后即参加向忠发、胡均和等出降南京的特工行动队。

王、博集团当时是反革命阵营，一伙大杂烩，但大都属于大革命失败的残渣沉滓。但是孔×却称他们是“不可一世的人物”，这是阿其所好的奉承话，不足为据。按实说来，王博本人不学无术，胆小如鼠，而且没有革命实践经验，其所网罗的学习分子大都是大革命的逃兵败将。事实证明是无能之辈，其所以重要是因为他们得到东方部偏宠，对他们给予无条件大力的支持。由此可见所谓“不可一世”不过是像煞有介事吹哄一番罢了，实在是一孔之见的瞥说。

米夫被处死，王博一伙骤失后台，冰山既倒，如汤沃雪，布儿集团全部遂告瓦解。“银样蜡枪头”并没有显出甚么反攻力量，因此这一伙以向为首的集团中都不是真正具有决定性能力的人物，只是几个无赖小丑罢了。这一伙在政治上昙花一现，类似在旧社会宫廷中，这些家伙不过是十常侍，宦官妾嬖佞幸臣。王明本人与米夫的关系来说，也象红解儿、郑樱桃一流人，实在无耻之尤，缺德极了！王明自称该派头目，刊印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两条路线”（一九三一年二月印），在那篇文章中，一片胡言乱语，“左上加左”，语无伦次，真是发昏。第十一章说甚么：“中国资本主义已经带着激剧的势力和畸形的方式进入经济生活。”“现在阶段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只有在坚决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才能得到彻底的胜利。”（革命性质），强调“全国性的革命高潮，全国范围内的进攻路线。”（革命形势与任务）又说教道：“当前党内主要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是富农路线，当前没有真正的红军和工农兵会议政府。”这些句子不过是重复米夫来信的陈词烂调，但是在王、博集团号称它为经典著作，风行一时。与后来的若干决议的精神实质，后先辉映。真是无独有偶。

王、博、张、王<sup>1</sup>不过如此，自邻以下余子碌碌，因人成事，更不足道！布儿榜上有名者，如夏曦，字迈伯，大革命时代曾任湖南省工农厅长，马日事变，仓皇出走，被停止工作处分，事后赴东大学习。

政治连襟就是合穿一条裤子，不分彼此，有福同享，有官同做，地下小王国，实力、军队、政保、财政，干部调遣，宣传刊物。

他们组织的路线策略是青交、工交、◇交，学攻、老攻、外攻。他们交的对象一是共青团，以胡均和、贺昌等为首的小集团。二是工人以顾顺章、余飞等为首的小集团。三是瞿集团，翻译人员，以瞿为首。对于上述这些人无原则地迁就重用包庇他们，把他们视同心腹。他们攻击的对象一是知识分子，二是老干部（全总、北方局），三是

<sup>1</sup> 张、王，可能是指张闻天和王稼祥。— 补注

反对本集团的。排挤，下放充军，组织处分。无原则地不择手段。比如对恽代英、邓中夏、蔡和森等，致使他们担任危险工作，牺牲。

该集团的共同信条与行动是：做人不可一日无权，处世不可手中无钱，有了权位与金钱便可以为所欲为，百事顺意，横冲直撞了。他们都是：“见权就夺，见同志就斗，见钱就抓！”号称三句真言。

向忠发等人的信条是：做人不可一日无权，处世不可手中无钱。“左左调”主要是下面几句话：占领“左方”高地，“左”了还要“左”，“左”上超“左”，老子一家独“左”，并无分店。同时大唱其反右板眼：“反右！反右！！再反右！！！”反富农路线，反红军军阀，反他个祖宗十八代。三番满贯！！

到了一九二八年，瞿秋白的临时中央倒台了，他们在“六大会”上经过精密布置，采取偷梁换柱手段，由向忠发出名，夺得了“六大”中央的书记职务。瞿道士失败，就推出王牌向忠发。向曾对人说：“我们大家都是站在一条正确路线上，我们合穿一条裤子，合坐一条板凳，从来不分彼此。我们都是代表国际路线的。如果有人反对别个人，那就是反对国际，就是反对我这个总书记，他就一定是反革命。我的正确主张都由他们代表，不管他们说的对或不对，一切行动都归我负责到底。我们是两位一体、三位一体。”所谓立三路线，就是脱胎于此。

当时在向李宗派统治下还有些随声附和错误路线，贯彻执行盲动主义的向李死党。他们大肆污蔑中央工委、全总、铁总、上总等负责领导同志为右派。李立三、向忠发等的错误路线不断遭到中央工委、全总、大多数中央委员及全国各省级负责同志的抵抗并给予严厉批评，但李向等悍然不顾，一意孤行，倡言全国革命高潮已经来到眼前，主张全党立即采取行动。

三中全会瘪三（立三）<sup>1</sup>见大势已去，乃运用偷梁换柱的策略，瘪三赴京请罪，由王牌出头担承一切，又把瞿请回幕后主持一切。仍由向对外负责。他们这样做的主要是意图迷惑群众，其实是掩耳盗铃。三中全会在政治上由瞿道士画符念咒一通，作成决议，欺骗大家，在组织上原封未动，只是增加了王明、博古等几个人凑成改组。在工作路线上仍然是率由旧章的老一套。他们仅在文字上弄玄虚，口头上作诡释，不仅是没有解决当前的革命问题，而且引起党内的极大反感。因此大家说这个会议换汤不换药。会后他们对江苏省委、全总、北方区委来了一个大反攻，并且把何孟雄、林育南打成右派。

三中全会结束后，瞿、孔等松了一口气，认为大难已过，从今以后，他们又可以转入好运道，开始在各方面重新布置局面，希望等待机会。瞿对文虎说：“一切让时间解决问题，我们是不会失败的。”

<sup>1</sup> 讥称李立三为瘪三，出于当时党内对他的普遍不满。— 补注

但是远在东方部的米夫接到王明的报告，大为不满，他指示王说这次不能对他们妥协，要拿就全部拿下，王明遵命大事宣传瞿集团罪恶，揭露他们的诡计，全盘否定三中全会，主张召开四中全会。米、陈等新攻势十分猛烈，使瞿集团无法抵挡。他们详加考虑的结果，认为屈服才不会吃眼前亏。他们的决定是派项三赴京请罪，但是仍有一个想法，希望在未来的会议上，他们能够敷衍门面，滑头过去。这样该集团的大部分人都向米、陈投降，立功自赎。（立三等入将中央档案私自篡改，以逞私图。这是他们的拿手好戏。）

在反四中全会会议上，当时老史向项英进忠告<sup>1</sup>，劝他悬崖勒马，说王博不忠于革命，下面更无群众。德隆说：“他们的确没有群众拥护，但是却有一个大后台老板。有了后台，甚么戏都可以上演了，还愁没有人看！”史文彬插话道：“干革命可不能那样说！我们一定要戳破他们的鬼把戏！”德隆说：“老兄要看风使舵，莫吃眼前亏。”史大哥瞪眼望他，他低头无语，大家也没有再说下去了。散会后，史背后指着说，老项越活越滑，将来定会误了大事，真是可惜得很！

向忠发自一九二八年任中共书记至一九三一年前后历时三年。向投敌以后，全党组织破坏殆尽。王明集团为掩饰他们的丑行，巩固本派统治起见，王明、李立三、刘××等深秘其事。孔当献计：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严杜向外泄露，保密不宣，以全体面。他们声称如有询问向忠发事经过者，则以纪律制裁。

向本人虽然由于罪恶贯盈而消失，但其所遗留下来的同党却历久仍在，没有丧失其本性。他们内部谬种流传，遗祸革命，追源祸始是人所共见的。

向忠发、李立三结论：这些人从头到脚，从灵魂到躯壳，千疮百孔，无一丝人气。他们那副丑恶形象，实在是奇耻大辱。说了污口，听了浚耳，写记下来浪费笔墨，恕不多说。

这个集团的绝大多数是一群革命的败类分子，他们既不好读革命理论书籍，又缺少革命实际斗争经验，也没有政治上必要的修养。他们对革命工作既不从事客观研究，又无实践经验。因此大多数人品质不纯。他们经常注意的是勾心斗角，纵横捭阖，所以有人说这群人是缺德、小滑头。他们经常欺压同志，打击下层干部，把人家当作垫脚石，自己爬上高位，一旦得志，就骄横放肆起来。他们生活逐渐腐化、堕落。洋房、汽车，日本料理，饱食暖衣，热衷于内部斗争，自相残杀，自称是小聪明，把革命当儿戏。一方面利用职权，从事贪污盗窃，同时生活方面，追求享乐腐化和庸俗低级趣味。他们在上海时沉沦在

<sup>1</sup> 该会前后，史文彬与项英（德隆）分别在上海和江西，并未会面。此处所记时间有误。—补注

纸醉金迷的荒唐生活中，造成风气，自甘堕落，不以为耻！

向忠发集团纲领与行动：争夺权位，贪污盗窃，违法乱纪，生活腐化。共同贪污盗窃，不可一日无权，有了权势和金钱，便可以为所欲为。他们生活腐化，思想贫乏，利禄熏心，醉心于洋房汽车，娇妻美妾，有奶便是娘。在地下王国时期，又骄奢淫佚，寻欢作乐，是地下生活中的“混混儿”，他们是革命清流中的一股浊水，人数虽占少数，但因盘踞要津，风行草偃，其影响却不小，且后果非常严重，使中国革命遇到了极大的挫折与损失。

他们把国际援助大部消耗在机关干部生活费用方面，对一般同志痛苦漠不关心。其中还有些人竟走上了贪污。如上海周××卷款数万元（一说四万元）潜逃无踪，广州烂风炉<sup>1</sup>卷款一万数千元离职逃走，总负责人装聋作哑，坐视不管。互济会长期以来不履行职务，自己生活豪华，对于牺牲入狱的干部不理不睬，对他们的遗孤不加抚恤安置，致先烈遗族流离失所。

向忠发以码头流氓出身，一步登天骤登“大宝”，起初还有些不自安，后来散漫逍遥，渐渐志得意满，作了一个地下朝廷的富贵闲人，饱暖思淫欲，越发不安分起来。他当时梦想把正常事务交给左丞右相们去办，自己梦想第一发财，其次享乐。他自己出资，并纠合亲信，开设一所出租车行（Texico，股东是向忠发、李立三、刘××、顾顺章等）。四大功曹都是经手财会贪污分子。还有他们的家属岳母、姨娘车夫等人，人均股金多少不等。推向忠发为经理。向设法向租界润公馆买进半新旧廉价汽车，有时派人到港澳购进旧汽车，有时向还亲自驾车到福熙路霞飞路交通要道招揽顾客抢生意。偶被阿容撞见回来报告，江匀<sup>2</sup>说，实在太不像样子，太丢脸。匀说病已入骨髓，实在不可救药了！彼此叹息不止。

汽车行营业蒸蒸日上，收入颇有可观，顺章建议买一套西洋杂耍道具到新新花园打包场。××在旁加以讥讽说：“倒不如去开堂子。”立三说：“这又有甚么不可，你不知道巴黎的镜宫高级妓院等，还有不少社会体面人物参加组织呢！”

向为人酗酒好色，平日每日不离酒，每喝必醉，醉后胡言乱语骂街，又酷好嫖赌（汉口石码头的花花太岁）。小时因与人打架，食指受伤，不能弯曲，身上也有伤痕。他往往假称伤痕是在罢工斗争中受伤的。他当选中委后，利用职权，调戏女秘书黄木兰，黄不从，向纠缠不休，黄不堪其扰。黄本是共青团员，向团中央控告他。中央负责

<sup>1</sup> 烂风炉，真名陈发，又名赖发，原为九龙船厂工人，曾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补注

<sup>2</sup> 江匀，可能是江钧，项英的化名。—补注

人碍于情面，劝黄忍耐，黄大哭闹，痛骂不已。向受此刺激，装疯作傻，每日无精打采，不办公，孔等出一主意，为他纳妾。其妾名周秀娟，据说是同乡，原属妓女，患有性病，不数月后，向身染病，浑身溃烂，几经医疗，疮稍愈合。

向、李一伙生活荒淫无耻，地下小朝廷，过着贪污腐化，养尊处优的生活。向、李同流合污，素来贪财好货，冶游放荡，生活豪华，众群众切齿。向用五百金卢布在西北利亚雅库特购买钻石矿出产的钻石戒指，送给其妻女作订婚用。

向忠发的生活从上述略可窥见一斑。苏北特委书记老陈<sup>1</sup>看到向忠发的生活实在闹得太不像个样子，好意劝他收敛一下，免得影响不好，他背着对方嚷道：“天要下雨，娘要偷人，老子的事，谁管得着？！”

向忠发贪污盗窃行为得到当时临中的纵容，造成了歪风邪气，特别是经手财金的局中人，近水楼台，更是人人湿脚，个个污手，一时号称“喝神仙汤”。这种时髦作风，上行下效，谁也难免，可谓畅行无阻，贪污成风。向忠发、李立三、刘××都是贪污累累，不必说了，上行下效，唐虞盗窃金饰，陈发、周纯金，还有其他小手小脚，不可计算。

向、李一群厮豪都是浑虫，糊涂庙里糊涂爷，东倒西歪过生活，昏天黑地。他们勾心斗角，争权夺位以外，群居终日言不及义，生活厌烦了，便到处追求吃喝玩乐，出入舞场。他们共同消遣的无非是海淫小说，上海滩电影，自逞风流。只见妻妾姨娘群雌粥粥，笑语喧哗，不成体统，讲究时髦，进出美容院，为求永驻青春，以牛奶洗浴，注射青春激素。上有好者，下必更甚。瘪三率诸人进绕，向左右组成一个荒淫无耻的俱乐部。

生活腐化已成为该集团风气，立三更是其中肉欲纵横，灵魂特别丑类一分子。他公开宣传张竞生哲学，实行狗肉将军的享乐主义，追逐物质刺激，平日最喜阅读《肉蒲团》、《品花宝鉴》春宫画。对于许多下流生活津津乐道，不堪入耳。立三为人庸碌下流，无所取材，更不知革命为何物，自从加入向忠发集团后，他口头上附和革命，献谄钦差，附草附木，载浮载沉，实际上毫无能力，只是因利乘便，篡夺权力，营私舞弊，贪污腐化，绳营狗苟，度其低级肉欲、寡廉鲜耻的生活罢了。他在政治方面固然不值得一提，但是在该集团所产生的诸般罪恶中，却成为不可忽视的因素。立三贪污仅次于向，安源亏公款几千元，买田三十亩。立三在地下宫廷中，主要是带头从事生活腐化，把过去现在贪污盗窃得来的金钱恣意挥霍，用在骄奢淫佚，吃喝玩乐方面。提起瘪三是人人皆知他是个突出的“色情狂”分子，平日

1 老陈，可能是陈资平。— 补注

浪荡闲游，徵歌选色，自逞风流，在“猎美”中骗拐了孀妇的儿媳妇<sup>1</sup>，后来又把她转让给别人，其品质卑鄙，实在“不够格”，所以被称为半个的“半个人”。

阿双是上大<sup>2</sup>桃色案主角，追慕西门庆，私淑弟子。

他们暗地里组织了一个秘密俱乐部，讲求并实行荒淫无耻的生活方式，他们群居终日闲暇，无所事事，平时生活糜烂，好冶游。他们左右围绕一群品质恶劣不堪的清客相公，酒色徵逐，浪荡娼优，淫逼女工，无所不为。在地下王国的官员中，如刘××鼓吹走马灯式婚姻，朝欢暮乐的人生观。这个俱乐部的成员除向、李等为首外，还有王度（即王矮虎），楚伯洛夫（陈为人）向子等人追随其左右自逞风流，作恶多端。王度，立三的密友，李实行拐妻让妻，王在小沙渡女流氓中鬼混过日子闻名，自称“吃豆腐”师兄。抢老婆运动由他发动，远近驰名。陈奸污妇女等狭邪行径，更是人所周知。此外还有一部分家属同声相应，从风而靡，过着同型的堕落生活，简直不知人间有羞耻事！毫无人气的一群狗男女！

抢老婆运动前后发生多起，首为◇干事欧阳钦发起。欧年长独居，庸碌无能，婚事难谐，乃利用地下机关条件，强奸军委机关曹谷耘之妻。曹孔久不理。曹愤而投黄浦江自杀。次为关向应掠夺秦纁云。

陈涛外号UvdenoB，号称半吊子革命家，他附会革命，自逞风流，为西湖旅馆桃色案中主角，号称淫棍，曾誉阿双、瘪三为当代风流人物。他向瘪三津津乐道同乡舒某赠妓联语（联云：百人曰豪，千人曰杰，既到妆台，甘为牛马；一顾倾国，再顾倾城，愿藏金屋，当产龙蛇）。瘪三、阿双大加称赏，说此人才华绝世，可引为同志。

立三连襟胡均和，上海浦东某商店小开（少老板），道地的白相人。平日过着流氓生活，讲究吃喝，好冶游。冒充工人，由小关介绍混入团内。为吹牛拍马，哄骗能手。由于善装门面，被认为积极分子，选任团中央委员。他与向忠发称莫逆之交，营缘入党，经向提拔，选为团中央书记。胡与刘、◇、贺昌、关向应等勾结一道，共称政治连襟，彼此以裙带关系。胡一切模仿向、李作风，向上巴结，取得米夫信任，在团内横行霸道，无恶不作，秽声远扬。彼等藉革命以逞私欲，贪污好货，挥金如土。对于女同志，视为下女，往往横施非礼，各极侮辱之能事。她们不能忍受，多自动退团。胡、向、刘、李一伙，简直是一群衣冠禽兽。他们彼此间实行抢妻易妻，年年结婚，户户蜜月，号召“吃豆腐脑”、“喝人参汤”，度其淫佚无耻生活！这样便使CY整个组织战斗力全失，完全瘫痪，陷于不可收拾的境地。

1 指李立三占杨开智（杨昌济子，杨开慧兄）之妻。— 补注

2 上大，即上海大学。— 补注

胡品质极为恶劣，生活充满低级趣味，任意穷奢极欲，多次侮辱女同志，强逼为妾，半年内三换老婆，到处寻花问柳，自称风流公子。身边有小公馆四处，平日陪同李等在四马路妓馆，一道冶游。后携全家妻妾婢女多人，到南京投敌，加入“锄奸队”，立见重用。破获机关，绑捉同志，奋勇向前，特别起劲。率领侦缉特务队进出上海、天津、武汉、广州等处，横冲直撞，抄家捕人，昼夜不休，担任清扫地下工作。胡一手包办“肃反工作”，经时不久，破案如山，一时狱中为满。同时，向、胡等又深入监中，参加审讯，指认人犯。他每次破案必获现金奖赏，多次“立功”，连获奖赏，私获赃物，无可数计，积久遂成巨富，在京沪广置地产，又成上层人物，得荐任职。

“五通庙”群丑喽罗中有名胡维者，外号 Zubrenof，胆大妄为，品质恶劣，与胡均和、向忠发一流，号称“花太岁”。胡维被派往东北工作，利用职权，仗势欺人，侮辱盲妇之女，共青女生，为群众所驱逐。临中百般包庇，说是“以毒攻毒”。后为向忠发所卖陷狱，不知所终。

营救工作一般是通过互济会进行，但互济会实权为向忠发、李立三所掌握。在一九三〇年间，互济会发生过几次的贪污案和卷款潜逃事。向忠发等本身是贪污腐化分子，影响所及，上行下效。如上海互济会干事一次拐款××元，后经追查，退还一部分。广东烂风炉贪污×千元，全部失落。至于其它小宗贪污事件不胜枚举。该会负责人大都把捐来款项，假公济私，养尊处优，生活腐化。

在宗派主义发动派系斗争期间，互济会本着门户成见，任意拒绝他派政治犯的救济抚恤，视成敌人，正项救济需要反而坐视不理。如◇◇的子女<sup>1</sup>，听其流落街头。十年间未殓一棺，未恤一户。

济难会秘书处现金出纳即以所掌管金钱，经营投机买卖，买标金外汇，进出跑狗场、赛马会，甚至放债押当，坐得利息，实行内部朋分。家属太太、岳母、小舅娘等藉口生活掩护为名，奢侈成风，讲究穿着，竞购金饰、项链，炫耀钻石克拉。连奶娘、小姨出门时都是满头珠翠，高跟皮鞋，狐狸围脖，巴黎香水。她们是高级美容院的座上客。

这些地下朝廷的官员们根本不识革命为何物，思想贫乏，精神萎靡，利禄薰心。醉心于洋房汽车，娇妻美妾，有奶便是娘，此外别无理想。在地下王国时期，又骄奢淫佚，寻欢作乐，抢妻换妻，丑恶可耻的作风，都是李与向、刘等共同作俑造成的。他们言行半人半鬼，全凭本能活动，是地下生活中的“混混儿”。他们是革命清流中的一股浊水，人数虽占少数，但因盘踞要津，风行草偃，其影响却不小，

1 可能指毛泽东子女。— 补注

且后果非常严重！使中国革命遇到了极大的挫折与损失。

总括说：这伙人说话行事三分不像人，七分倒像鬼。他们的行为说来秽口，闻者掩耳，用不着再浪费笔墨了。但是豢养利用这一伙奸徒却大有人在。

向忠发被捕投敌后，云：“我虽是中共中央书记，但是我是没有实权的，也没有责任。东大那帮知识分子在耍猴把戏，我是个跳圈的猴子，算得了甚么！”言迄要求会见蒋介石，自称“我有本钱，谁也休想为难我。”“少说废话，莫耽误我的大事。”“老子冒了火，发誓要把那伙狗日的杂种们（指中共）全部扫除干净，一个不留。说干就干，用不着问东问西了。”问话的人，大喜过望。次日即带军警来机关绑捉同志，被事先布置在机关四周中共特工人员亲眼看见。但该集团为掩饰他们的丑行，巩固本派利益起见，乃深秘其事，严禁向外泄露，保密不宣，以全体面。他们声称如有询问向忠发事经过者，则施以纪律制裁。

向忠发伙同胡均和、顾顺章这一群，南北奔走，到处带头作引线，做特务，查抄机关，逮捕同志，造成监狱人满，流血满地。他们立功受奖，升官发财。自成一队进行搜捕，向等亲作眼线，穿着防弹背心，手拿弹簧铐，领着一班特务，雄纠纠地横冲直撞。◇身任队长后，对人说：“过去你们把老子当猴子玩，现在我真的要给你们看看颜色哩！老子一不做，二不休，没有甚么玩笑可开的了！”

他们伙同丁默村等，亲到曹家渡、龙华、江宁等处监狱，对中共政治犯劝降。劝降无效时，便指定写作专人大肆编写材料，并假冒在狱重要政治犯个人名义，发表拥护三民主义与反共的政治宣言。这些文章内容要点，不外是强调三民主义为中共所必需，歌颂孙中山的人格如何伟大和南京政府的德政等等，千篇一律，大同小异。这些文章先后在丁默村所办的《社会新闻》刊物发表，后来又汇集成专题“转变”，大事宣扬当局的宽大政策。当时在狱政治犯事先既不知道，事后又无法更正，听其诬蔑，也无可奈何。如同哑子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来。但丁等一伙却自诩此举十分高明，逢人便夸这是政治攻心战术的成功。

向忠发带头作眼线，胡均和联袂走南京，王矮子（王明）甘心作降奴，米夫毁党显神通。孔老二瞞上欺下，米夫丧胆宵遁。大多数人不识不知，浑浑噩噩，只要有一官半职，上海，南京反正都是一样。纵有个别人不以为然，但久而久之也就入狼群，学狼嚎，渐渐同化，往而不返！

千百万同志与革命群众惨重牺牲。把一个长期战斗力强大的党完

全搞垮，只剩少数人孑身逃往苏区继续为虐。竟为向忠发举行追悼会<sup>1</sup>，欺骗毛泽东和广大红军干部，长期保密达数十年之久。追原祸始，均四中全会临时中央。

#### 附录：向忠发纳妾

向既做上官儿，家资富裕，左右以上海大亨目之，呼仆使婢，饱暖之余被思淫欲，对地下生活感到拘束，居常对亲信说：“近来生活表面看来还算过得去，前呼后诺，颇象个场面，但从内心讲实在太不如意，比过去码头差远了。我过不惯这种牢笼生活，你们看怎么办？”

初说一两次，大家还不以为意，后来当真闹起情绪来，连日不上班，声称：“我不干这份差使，你们另找人来干吧，反正没有我别人也一样干！”他装病不出门，口口声声嚷着：“就此拉倒吧！”不久在外又发生酗酒斗殴事端。大家一看，情况很是不妙！店小二们这才着起慌来，认为这样下去会影响大家安全，因商议对策，以期纠正。

在会上，首先杂毛发言：“孟夫子说过：食色性也，谁能不讲？老向的脾气我深知道，我们不能拗过他的，应该好好想个法子，才能弥患于未然。”大家围绕此事，你言我语议论开了。孔献计道，既然如此，何不给他调配一个合适的专管私生活的事务秘书，这样当可使他安静下来！别三拍腿说：“这个意见很好，公私两便，比较全面，我完全同意。”原来别三内心有个计较，认为河水分流，两岸受益。存个分润的念头，所以内心很是赞成。大伙讨论一番，原则既决定了，这样就只有进一步研究人选问题。随后决定交人事部门办。经过多次研究结果，大家一致同意把妇委工作的黄木兰调派给老向当一名机要秘书。事先由孔、别等人老婆向黄做一番动员工作，勉励她把这项工作作为政治任务去完成！黄最初不知是计，贸然承诺，即日到办公室工作，后见无事可做，又见向心术不端，神色有异，举止有些失常，渐生厌恶。过了些时，向竟对黄欲施非礼，行为粗野，黄当面斥为“衣冠禽兽，猪狗不如”，遂不辞而去。

当下孔等夫妇劝黄顺从，黄怒不可遏说：“我宁可不要党籍，决不与此败类为伍。”随后来了几个家属纷纷责小黄幼稚不晓事，不知好歹！说：“你家大神不见小怪，大官肚里可撑船，莫同小伢一般见识，她不久定回心转意的了……”一席话把老头儿火气消下去了。一场风波暂告平息。

向受到教训，无脸见人，加上老婆在侧冷语讥讽，实在无地自容，

<sup>1</sup> 关于为向忠发举行悼念活动，在瑞金时期的已从档案中查见，确有此类活动，在延安时期的尚未见真实资料。— 补注

想离家出外暂避。事被左右发觉，力予劝告说：“这千万使不得。你是总书记，一举一动，关系全局……”向不理说：“我走我的，你们用不着阻拦！”大家见状，又慌了手脚，一群蛤蟆又乱吵开了。在一次会议上，有人慎重提出“心病”问题，说这虽然是思想病，却不是靠思想本身可以解决的，所以仍需对症下药。大家对此重大问题，好象群鼠聚议系铃猫颈一样，久之仍无进展。

◇◇打开会场沉闷气氛说：“一计不成，还有二计可用哩！”竖起右手两个指头在空中晃了几下，从容正色说道：“依我的看法，此事一计不成，还有二计可用。我说出来供大家参考一下。”会上诸人迫不及待，促他快讲。他慢条斯理，不慌不忙说：“我看当代政治伟人停妻再娶本属正常，老向年事已高，太太尚无生育，他屡思侧室，道理上更说得过去。目前形势发展急转直下，一日千里，为大局着想，组织上不如索性为他娶一个小老婆，你们看咋样。”言未毕，别三起立附议，大声道：“此计大妙，比生活秘书更名正言顺了。”

座中有人怀疑提出异议，说这样做如果传出去，政治影响不好，太不像话了。孔说不然，这是生活小节，与政治无关。革命嘛，顾这忌那，成何作法。会上的人大都怀有心病，也就无人坚持。

纳妾那天，在静安寺住宅中居然大办喜筵，宾朋满座，设摆牌桌，打天九，抽头钱。该宅姨娘、车夫等捞取小费很多，与其妾朋分，阖家大小，喜气洋洋。刘××在南京路五金行楼上做三十大寿，宾客齐来，男女成队，群雌粥粥，兴高采烈。也曾设置麻雀牌几桌，通宵达旦，热闹非常。

向妾进门的第一天，阖家笑逐颜开，只有向妻一个独自向暗壁发闷。怕她精神失常，立即派◇把她牵出去，以免盛典被扰乱。老婆子至此却不去，忽然大哭大闹起来，坐在地板上，披头散发，手持一把旧剪刀，声声要向老鬼拼命。此时新人已进屋来了，宾客们面面相觑，也没有止闹的办法。最后还是孔的女人说尽好话，哄骗她，许她买料子，才渐渐安静下去。

向见妾面是乐不可支，连称小五办事能干，小公馆家具、陈设、地毯均小五亲自设计，样样合意称心，从此宠以专房，同车兜风上海洋场，诸事不管，一切听摆布，并不过问。每日签名盖橡皮图章，有时把图章交付立三、小五，万事不管，过着高枕无忧的傀儡生活，逢人自称富贵到，革命成功，万事如意！

向妾进门时，身已怀孕，向心不快，乃向介绍人诘责。×答：“古人前胎儿子（未过门身怀六甲），不少长大后便成为贵人，这是贵兆啊！有何不美？”（并引证一些实例作证）向听后转愠为喜，因问：“此话果然当真？”×答：“那是没有错的，骗你是狗！一切由我打

包票！”向心释然，由是妾宠不衰。从此以后，越加信任，言听计从。他自个儿只管养尊处优，颐养精神。由于诸事怕费脑筋，所以一切均听左右包围摆布，遇有重大事件，他不过署名划诺罢了。至于一般关于人事金钱等不很重要等事，通过内线，他的小老婆也能直接解决问题，因此，有人当面恭维她是女丈夫，了不起！确实发挥半边天的作用。向妾得意地说：“老头儿不过是木脑壳，理他呢！”左右只得听其胡为，取得一团和气，这样大家都可沾光，各得其便！

### 三、上海东方饭店会议前后<sup>1</sup>

一九三三年二月七—八日，伟大的文学家鲁迅写了著名的《为了忘却的纪念》一文，纪念殷夫、柔石、李伟森、胡也频、冯铿等五位青年作家遇难两周年。这五位青年作家是在一次党的会议上被国民党反动当局逮捕的，同时被捕的还有出席这次会议的何孟雄等同志。

这次党内会议于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七日夜在上海东方饭店举行。关于这次会议，著名的美国记者伊罗生在《〈草鞋脚〉序言》<sup>2</sup>中曾提及过。

这次党内会议是在怎样的情况下召开的？对于这个问题，大家非常希望得到一个确切的答案。为了把这个问题解释清楚，我现在就从莫斯科东方大学说起。

第三国际东方部部长米夫是这所大学的第三任校长，他是接替拉狄克担任这个职务的。米夫长校以后，对东大中国留学生支部进行大清洗；名义是清除“托派”，事实上是米夫有着不可告人的企图。这次清洗运动在莫斯科持续了很长的时间，除了所谓的“二十八个半”外，很多人都被戴上了“托派”、“右派”……等等的大帽子，被开除党籍，在精神上肉体上受尽折磨。这次清洗的结果：王明当上了党支部书记，米夫由此控制了中国留学生的党组织。但这不是米夫的最终目的。虽然米夫认为，控制了中国留学生党支部，就是控制了中国党的中层干部，然而他的最终目的是要控制中国党的中央，由他来领导中国的党。这样，米夫就想把东大的王明支部转移到中国国内，夺六大中央以后的权，由他的心腹王明等人另组新的中央，一九三一年一月七日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就是他们一伙篡党夺权的具体表现。

<sup>1</sup> 曾载《新文学史料》1981年第1期，原注明“罗章龙口述，丘权政记录整理，经罗章龙同志审阅定稿”，实为罗自撰。—补注

<sup>2</sup> 本文“附录”节录了该序言。—补注



王明是米夫的忠实走狗。一九三〇年下半年王明回到国内。回国后他先是住在中央宣传部机关，其时李立三是宣传部长，王明此时没有具体的工作。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不久王明被工部局逮捕，当时王明非常害怕和惊慌，他乞求工部局的一个巡捕送信给宣传部，并对这个巡捕说将来会得到酬谢。王明的信送到李求实手里，信中说：我已被捕，请设法营救。收到这封信，李求实大吃一惊，党内的同志哗然，都对王明为保命而不惜暴露党的机关的做法不满，结果党的机关被迫全部搬家。由于当时王明年轻，工部局不明他的身份，米夫知道这件事，认为非极力营救不可，便拿了几千元钱，通过关系把王明保释出来。后来米夫又为王明的这次被捕事件庇护。王明的这次被捕事件发生在一九三〇年下半年，三中全会之后，四中全会之前。我是最早知道这件事的，其时我与李求实一道工作，在办党的地下报纸《上海日报》，李求实将王明被捕事件的详细经过最先告诉了我。

王明获释后，要李立三给他一个具体工作。李立三认为，王明是第三国际派来的人，有米夫做后台，来头不小，野心很大，而且是反他李立三本人的急先锋，因此他不便给王明安排工作。这时向忠发是党的总书记，李立三是政治局委员，我是党的工委书记。在一次会议上，李立三对我说：“王明要求工作，你们给他安顿一下吧！”我当时心中有数，便对李立三说：“好吧！我们安排他罢！”我按照组织的决定，安排王明、博古两人在全总宣传部工作。我们在一起办公。王明到全总宣传部后，一直不好好工作，认为他是被大才小用了。在一个偶然的场合，王明对我说：“想与你谈谈。”我们如约作了一次长时间的谈话。王明说：“我们的斗争在东方大学取得了彻底的胜利。东方部派我们回国不是做普通工作，而是要做领导工作的。”他对我反复强调：“我们是国际直接派来的，你要认识这一点。”他还对我说：“中国的党自建立以来一贯幼稚，不懂马列。苏区的人更不懂，他们什么也不晓得，一贯右倾，搞富农路线。……我们要把党从上到下加以改造。”我问王明：“你究竟要我做什么？”他回答说：“要你支持我。如果你支持我，什么都好办；否则，我们是会有办法来对付你的。”我在莫斯科参加党的六大筹备工作时，王明当翻译，那时他的野心已从言谈话语中流露出来了，曾引起我极大的反感。这时我听了王明上述的一番话更加反感和生气，心想你王明究竟狂妄到何等程度！我当即严厉地批评了他。王明强辩说，“我说这些话是代表国际而不是个人”，并要我回去“向大家传达”。我义正辞严地拒绝，并对王明声明：“我不赞成你的说法。”但王明还是执意要我在全总会上提一下。我要王明打消这些念头，并再一次提醒他注意：“你的这些想法很危险。”我回到全总机关，同志们都来问我王明找我说些

什么，我把王明说的话与大家转述了，同志们听了之后都十分气愤，纷纷要求把王明打发回去。在这种情况下，王明很苦闷，认为在中国想达到他的目的希望渺茫，要得到各方面的支持也极困难，因之他一度非常消极，不工作，而且也因大家不理他那一套使他无事可做。不久，米夫从莫斯科来到中国，王明也因他的“救世主”的到来而精神振作，飞扬跋扈，时来运转。

本来李立三在党的六届三中全会上已经承认和检查了过去所犯的错误的，但米夫到中国后，又以反“调和主义”为名，主持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在这次全会上，米夫只用了几个钟头的时间便成立起由他控制的临时中央。在选举过程中，米夫耍阴谋诡计，宣布凡是从莫斯科东方大学回来的党员（指“二十八个半”）都有表决权，还说：他代表国际，反对米夫就是反对国际。出席四中全会的老干部、工人和其他各方面的代表都一致反对他这种违反党章规定的做法，并集体退场表示抗议。米夫—王明集团炮制的文件说，他们是多数，在表决中以“一票之差”获得通过。这真是弥天大谎。事实是根本没有进行表决，更谈不上有所谓“一票之差”了。我们不同意米夫、王明等少数人以不合法的手段改组党的中央，当然也不承认由米夫操纵的“临时中央委员会”。我们按原来的中央组织系统照常开展工作，王明诬蔑我们“另立中央”，其实我们不是另立中央，而是根据原来六大中央的组织工作着。

米夫后来多次找我谈话。他说反对王明的症结就在我的身上。我反驳他这不是我个人、而是大多数同志的意见。米夫提出，希望给他一个解释四中全会问题的机会，我们就在上海英租界静安寺路一所房子（中央一个重要机关的所在地）的花园里召开了一次有五、六十人参加的会议，后来就把这次会议通称为“花园会议”。在这次会议上，米夫杀气腾腾地作了一通长篇讲话，他说根据中国目前的革命形势和党的状况，我们只能采用“非常”的方式、紧急的措施，超越六届中央的组织系统。他还说，由于六届中央系机会主义的领导，并因此造成中国革命失败，所以现在只有王明才适宜于担任党中央的领导。他又对我们说，你们虽然是多数，但你们错了，这样也不能算多数，你们如果服从四中全会产生的临时中央的领导，就会得到好处，否则，将你们统统开除出党。我们反对米夫以“老子党”自居的独断专横作风，认为米夫一笔勾销中国革命的成绩是错误的。我们一致反驳米夫污蔑毛泽东领导的苏区“一贯右倾”、“富农路线”、“军阀倾向”……等等的不实之词。我们认为党在白区工作成绩也是主要的。我们尖锐地指出，王明根本不能领导中国的革命，他不懂马列主义，他既不会打仗，又不会搞工人运动，他们要老老实实在地到基层锻炼，不能平步

青云直上中央。我们郑重声明：米夫要把我们统统开除是不合法的。辩论在激烈地进行，会议开了一天一夜结果破裂了，米夫蛮横地宣布将我们统统开除出党。这次会议是在四中全会之后、上海东方饭店会议之前召开的。鉴于米夫-王明集团开除了我们的党籍，我们便起草了一个文件，在这份文件上签名的有一百余人，其中有我和何孟雄、史文彬、林育南，李求实、陈郁等同志以及各省的省委书记、工会负责人、各组织系统的代表。毛主席派来的一个苏区代表团、方志敏派来的一个赣东北根据地代表团和鄂豫皖根据地的几个代表也在文件上签了名。这份文件是由我亲手交给米夫的，并要求米夫转送给第三国际。我们起草这份文件并有那么多人签名的意图，是在于向第三国际表明我们的态度，说明我们不隐瞒自己的观点，要求第三国际召回米夫，收回六届四中全会的成命，解决米夫给中国的党造成的严重困难，如果不及时采取措施，后果不堪设想。我们的意图，还在于向第三国际表明我们不是居于少数而是多数。当时我们还出版了一个内部刊物叫《国际路线》，由李求实等同志负责主编。刊物的宗旨和内容是反对米夫-王明集团的。我们在请米夫转送给第三国际的文件中，有特别注明这是绝密文件、不得公开的字样，但是，米夫把这份文件给了王明，并在他们一伙中公开了。

为了商讨党的领导突然被米夫、王明一伙撤换及我们的党籍被开除，我们对此应该作出怎样的反应，为了反对王明的机会主义路线，为了使党的工作不停留于内部辩论的阶段而将革命继续向前推进，便由史文彬、何孟雄、李求实、林育南和我及其他一些同志共同筹备、召开了上海东方饭店的党内会议，会议由何孟雄、李求实、林育南等同志主持，参加会议的有全总、铁总、海总、上总、上海、江苏及苏区等各方面的代表。当时李求实负责文化方面的工作，他来问我：是否请柔石等人来参加，我同意了。这次会议是一次党的会议，它讨论全国的工作，坚持党的六大路线，反对王明集团。所以这次会议不是“左联”的会议，“左联”五烈士是后人的提法。当时在文化工作方面，我们曾建立了一个叫“文化革命联合会”（简称“文革联”）的组织，它的纲领是李求实写的，其内容是如何发动文化战线的工作者对内反对王明集团及其错误路线、对外反对蒋介石国民党。“文革联”的负责人系李求实和谭寿林。李求实翻译过杜斯退亦夫斯基的传，二十余万字。谭寿林是我在北京大学的同学，全总的秘书长，他写过一部小说，由泰东书局印行，这部小说的题材是反映广西农村状况的，解放后重印了，董老有题词。在全总搞文艺工作的还有一个叫董长荣的同志，他在花园会议前由全总派到东北去组织抗日联军，后在盘山战役中阵亡了。马尚德（杨靖宇）也是在花园会议前由全总派到东北

去的。

我本来要去东方饭店会上作报告，但其时因有一个外省同志来找我谈话，我去迟了。当时还有许多人因有各种原因未及时到会。史文彬也去出席了会议，但因事提前离开了会场。当会议开到一半时，工部局就突然包围会场把所有与会者逮捕了。除了在东方饭店一地外，搜捕还在其他几个地方同时进行。当时被捕的有党、团、工会、文化小组系统、外省市、苏区……等七、八个组织系统的三十五位同志，后来有的获释了，有的被判处死刑，被国民党反动当局在龙华秘密枪杀的有其中的二十三位同志。

显然，国民党的这次大逮捕是有叛徒告密的。我个人认为叛徒的告密档案是有的，问题还是不难搞清楚的，国民党反动当局的判案也是有档可查的。

王明一伙曾谣传，说出卖何孟雄的不是别人，正是何孟雄自己的干儿子。据我知道，何孟雄很年轻，他根本没有什么干儿子。

那么，究竟是谁向国民党反动当局告密的呢？对此一般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顾顺章打电话向工部局告密；另一种说法是一个从莫斯科东方大学回国的学生与龙华惨案有关。此人叫唐虞，他与王明很好。他是与潘闻宥一起从莫斯科回国的。潘又名文玉，是向忠发的秘书，与唐虞是连襟。唐虞回国后在中央宣传部工作，有过贪污行为，是他通情报给蒋介石的特务的。但是，不管怎样，这一点是确凿无疑的：当国民党反动当局审讯何孟雄、李求实等人时，有一个从莫斯科东方大学回国的女生隐蔽在法官的后面，一一指认何孟雄、李求实等人系中国共产党的重要人物。

必须着重指出：王明一伙干这种罪恶勾当决不是孤立的、偶然的。为了镇压他们的反对派，维护其一小撮人在党内的独裁统治，他们以两种卑鄙的手段杀害我们的许多同志。一种手段是如派夏曦到洪湖、派张国焘到鄂豫皖、派曾洪易到赣东北、派另外一些打手到其他苏区，以抓所谓“AB团”、“改组派”及“审干”为名，残杀了许多无辜的革命战士，这种惨无人道的残杀在苏联中国留学生中亦同样进行。另一种手段是向国民党反动当局告密，指认党的负责同志，借敌人之手来残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的同情者。把这些触目惊心的事件联系起来，就可以看出东方饭店党内会议的遭到破坏和龙华惨案的发生决非孤立的、偶然的，它是王明一伙破坏中国革命和党的事业的一连串反革命事件之一。

对于在东方饭店和其他几个地方被捕的同志，王明一伙并没有设法营救，也不作任何表态。事件发生后，上海沪东的一个负责人（王明系统）在路上遇到全总的一个工作人员说：“我们要你们不要反王

明，你们不听，今天不是吃了亏吗！”此时，王明还派顾顺章搜查我们同志的住地，顾顺章对被搜查的同志说：“你们快离开上海罢！否则，我们对你也不客气了！”凡此都是有关同志亲口对我说的。

从上所述，究竟谁向国民党反动当局告密，以鲜血染红自己的顶子，不是昭然若揭了吗！

何孟雄、李求实、林育南等三十五位同志被捕后，我们曾专门成立了营救委员会设法营救他们。参加营救委员会的有我、史文彬及其爱人、陈虞卿（原名罗章凤，中央军委、苏维埃准备委员会副主任兼保卫科长，后来牺牲）和济难会的同志。李求实、何孟雄、林育南等同志的亲属也参加了营救委员会的工作。我们派家属给被捕的同志送东西，在送去的食物中夹有给他们的信，信上详述了我们的营救计划。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等同志很快就联名用代号回信给我们，信中说他们彼此之间相处极好，他们已经感到他们之所以被捕是由于叛徒的出卖，因此他们叮嘱我们要当心那些“伙友”（指王明一伙）。当时，我们还募捐了一笔营救的款项。林育南的父亲得到我们的通知，很快就派人前来，并领了一些钱。但是，在何孟雄等同志被叛徒在敌人面前指认为重要人物之后，营救便成为不可能了。我们每每忆及此事，内心就对王明一伙叛卖革命的罪恶行径无比憎恨，悼念为革命壮烈牺牲的二十三位烈士的悲痛心情不能自己。

曾经有人把何孟雄反对王明的斗争说成是个人之争，这是错误的，因为这种说法没有触及斗争的实质。斗争的实质是一次党内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以何孟雄等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以王明为代表的反动的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

#### 附录：《草鞋脚》序言（节录）

Hazold Lmacc 伊罗生·艾萨克斯著

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七日在上海举行的那次会议，是残酷的派别斗争的一个插曲，这种斗争在共产党领导阶层内部刚刚达到了顶点。在李立三领导下的冒险主义政策已经走向失败，到了一九三〇年中期，这种情况甚至在第三国际看来也是明显的了。环绕党的政策问题和新的领导权问题，一场重大的派别和人物之间的斗争已经进行了几个月。我想再提一下，当时人们心目中的领导权是以国民党中国的城市作为基地，而不是以内地作为基地，在那里毛泽东正在把农民武装起来，集聚在他的周围，朝着最终亲自统率整个运动的道路前进，党的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依然设在上海，至少依然能够在那里存在和开会。

一九三一年一月七日，在第三国际的俄国代表巴维尔·米夫的亲临监督下，在上海举行了中央委员会第四届全体会议。在李立三领导下的旧领导人被粗暴

地撤了职，由米夫自己的门徒，从莫斯科回来的学生陈绍禹——后来在第三国际的刊物上叫作“王明”——代替李立三担任领导。陈绍禹和他的一伙新来的人曾经在莫斯科度过骚乱的革命年代，最近刚刚回国。当时他们把由何孟雄领导的反对他们的一批党的老战士排挤到一边去，而何孟雄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历史是从党的早期就开始了。四中全会的决议在共产党组织中和在上海的各种附属团体及委员会中遭到愤怒的反对。一月十七日夜里在那个旅馆开会的，就是何孟雄和他的一群同志们以及拥护者们，包括那五位作家在内。和五位作家一起被押到龙华去枪决的，就是那“另外十九人”，当时在第三国际为那五位被杀害而发起的国际抗议运动期间，一直提到十九人，但是从来没有提出他们的姓名。

那天夜里出席会议的那些人中间，多数从此再没有被验明过。在那五位作家中，只有李伟森是党的重要人物，他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历史和何孟雄一样长，地位也不亚于何孟雄，他显然是以他的地位而不是以“作家”的身份参加会议的。其他四个人在党内资历方面比他浅的多。他们都是各小组、各团体的成员，都是突然被四中全会撤职的旧的党的领导的拥护者。如今没有确切的证据足以说明那天夜里开会的人们的真实意图，也没有确切的证据证明这次会议是怎样被泄露给警察当局的，是谁出卖的。有的只是在这以前的情况以及共产党后来处理这个问题的令人难以理解的富于讽刺意味的方式。

已故的夏志安在一九六二年初版的他的研究著作《五烈士之谜》（The zigma of The Five mntyw）中对这一事件进行了新近最周密的调查。他查对了每一件可以找到的原始材料，缜密地缜练地审度了一切证据。虽然还没有最后的证明，但是这种证据有力地支持了下面的推断：（一）举行这次会议，是为了考虑对于党的领导突然被撤换应该作出怎样的反应，是服从还是分裂；（二）为了一举清除它的反对派，新的党的领导把这次会议向上海警察当局告密了。

#### 四、回忆陈郁同志<sup>1</sup>

一九二五年，在震惊世界的省港大罢工期间，我在党中央负责人运动工作。我到广州开会时，在广东区委见到了苏兆征，车川西和陈郁同志，当时陈郁同志是最活跃的罢工领导人之一，是罢工运动的主力——海员工会的负责人。我们经常一起到广州文明路罢工领导机关开会、交谈，并和他一起乘船去珠江口的封锁线，缉拿走私船，防止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分子破坏罢工运动。在我和他一起工作时，我发现他的阶级觉悟高，对党的方针政策理解深刻，很有组织才干，且富有实干精神。他对海员工人运动的情况十分了解，在工人中有深厚的群众基础。但他本人忠厚朴实、沉静自若，从不张扬自己，一心一意从事党分配的工作。我同陈郁同志初次共事，他就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一九二七年，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在广州进行了“四·一五”大屠杀，白色恐怖笼罩着珠江两岸，党和工会组织遭到很大破坏，许多负责同志惨遭捕杀。当我在上海出席党中央十一月扩大会议时，见到了从广州到上海参加会议的苏兆征同志。我问阿苏：“你来了之后，广州工会谁负责呢？”他说：“陈郁同志在那里！”我听了很高兴，一是知道了阿郁还活着，未遭敌人毒手，二是认为苏兆征同志委托得人，阿郁一定能够在艰险的环境中搞好工作。当时，陈郁同志已经担任省委常委、工委负责人，实际上接替了苏兆征同志在工运方面的领导工作。

陈郁同志是广州暴动领导人之一。起义前，他曾组织了一系列政治罢工、同盟罢工，揭露蒋介石等人叛变革命、屠杀工农的罪行，恢复和巩固被国民党右派破坏了的工会组织，提高了工人的斗争觉悟，组织了秘密的工人赤卫队，为广州起义准备了条件。

<sup>1</sup> 原载《回忆陈郁同志》，工人出版社1982年版，第20—25页。—补注

起义开始后，陈郁同志和周文雍以及广州工会的其他负责同志指挥着工人武装，配合教导团攻打广州市公安局，经过一场激烈的战斗，攻克了这个反动堡垒，广州苏维埃在这里诞生了，陈郁同志出任司法人民委员，这个红色政权虽然仅仅存在了三天，但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陈郁同志的历史功绩是不可泯没的。

陈郁同志具有革命的坚定性，他身处逆境，坚持斗争，为广东革命工作向前发展，积极出谋划策，做出了贡献。

广州暴动失败后，党和工会组织受到严重破坏，起义者遭到残酷镇压，一时尸陈街头，血染珠江，敌人疯狂搜捕，白色恐怖下幸存的起义领导人陆续撤离广州，陈郁同志在海员工人的掩护下，安全撤到香港。

党中央得知广州起义失败后，一九二八年初，派李立三同志到香港召开了广东省委扩大会议，追究起义失败的责任，撤销了所有起义领导人的职务，并把他们派到最危险的地方去“考验”，并责令他们再次组织起义。陈郁同志被派到汕头，周文雍等同志被派回广州，因而又牺牲了一大批党的领导人和工会领导骨干，使广东党组织遭到进一步的破坏，几乎陷于瘫痪状态。

一九二九年春，党中央特派我去香港与广东省委商谈工作，与我接头的人就是陈郁同志。他这时已恢复了省委领导职务，刚从东江特委巡视工作回来。我和他住在一起，通过他同省委其他同志接触。陈郁同志对我说：“广州起义失败后，党和工会组织遭到很大破坏，广州市民受到很厉害的镇压，工人的情绪波动很大，很难开展工作。但是，我们还是基础的，只要把组织恢复起来，敌人就不能打败我们。”他建议我召开一个活动分子大会，鼓舞士气，恢复组织，开展工作。我完全同意他的建议，认为他在广东党处于危难时刻，勇挑重担的精神很是难能可贵。经过广州起义失败的严重挫折，广东党的处境非常困难，国民党特务到处搜捕共产党人和左翼工人积极分子。省委其他领导人有的牺牲了，有的转移了，有的消沉了，在这种情况下，陈郁同志坚持斗争，力挽危局，团结同志，继续战斗，起了顶梁柱的作用。

经过陈郁同志的串连、筹备，广东党活动分子大会在九龙郊区文庙召开了，出席会议的有四十多位负责干部和著名活动分子，包括陈郁、邓发等。陈郁同志代表省委对恢复各地组织、继续开展斗争，发展工人运动等问题讲了话。我代表中央讲了话。经过讨论，一致认为陈郁同志的讲话是符合省、港斗争实际的，提出的任务和完成任务的方针是正确的，一致通过为会议文件。这个会议虽然只开了一个上午，但对恢复各地党和工会组织，开展地下斗争，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个会议叫做《九龙会议》。多年来，我想起《九龙会议》时，陈郁同志

不畏艰险，不怕牺牲的英勇形象就会浮现在我的眼前。他在那样短的时间内、在那样危机四伏的环境中，妥善地筹备和组织了这次关系到广东党和职工运动前进方向的重要会议，的确令人敬佩。他是会议的组织者，并且担任会议的主席。他在讲话中提出的正确总结广州起义失败教训，迅速恢复各地党的组织，坚持地下斗争，克服左倾盲动情绪，最广泛地团结工人群众等等正确主张，表现了他在乌云密布，风向难辨的形势下的敏锐的政治嗅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果敢而实际的行动。

经过这次会议，广东党和工会的工作有了新的发展。陈郁同志这时虽然在省委和香港市委工作，但海员总工会的许多事情仍然要他处理。在香港的海员总工会，是全国海员工会的领导机关。后来党中央决定把全国海员总工会由香港迁往上海。一九三〇年党中央决定调陈郁同志到上海担任全国海员工会党团书记。“海总”与“铁总”是当时我党领导下的最强大的、最有战斗力的工会。我当时在党中央任工委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经常和陈郁同志在一起工作。陈郁同志认真负责，非常艰苦深入，工作极其繁忙。全国海员总工会，下属上海、广州、天津、长江、北方支会，其余各省亦有支会。“海总”的机关在上海平凉路，由秘书陈修良同志（女）坐机关，陈郁同志除了掌握全国海员工运情况，指导开展斗争、出席党中央和“全总”重要会议外，还为《赤海报》写文章（笔名：有邑），他的工作干得很出色，很有成绩。

一九三〇年底，共产国际代表东方部主任米夫，来到中国，他想让李立三同志离职，由他的学生、刚从莫斯科留学回国的王明主持党中央工作，以篡夺党中央的领导。但是，王明对国内革命情况并不了解，斗争实践经验太少，又不是中央委员，无论从政治上或从组织原则而论，要王明主持中央工作都是错误的。因此，党员群众许多人表示异议。这样，米夫要改造中国党的想法和要王明主持中央工作的愿望，就遇到了极大的困难。为了排除障碍，米夫开始酝酿召开六届四中全会，企图通过四中全会来实现他的计划。

一九三〇年十二月中旬，“全总”党团召开会议，与会者有陈郁、史文彬、李震瀛，林育南等，在会上大家都主张召开紧急会议，反对召开四中全会，更不同意由王明主持中央工作。陈郁同志发言说：“根据当前中央存在的问题和当前革命斗争情况，我认为，召开一个有更多做实际工作的基层干部参加的会议，解决一些实际问题为好。”

参加苏维埃准备会议的代表，也对召开四中全会提出了异议。林育南同志在给吴化之（当时任北京市委秘书长）的信中，尖锐地指出，中国革命如果让他们这伙挂羊头卖狗肉的人领导，前途将不堪设想。

中央苏区派了代表团来上海，也不同意召开四中全会。

米夫亲自出马，于一九三一年一月初，召集“全总”负责干部开会，宣传召开四中全会的意义、目的，要大家支持会议的召开。我同史文彬、何孟雄、李求实、林育南与陈郁同志等多人，主张召开紧急会议，不同意召开四中全会。但米夫一意孤行，强行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在时间极短促的情况下，四中全会会场上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出席会议的大多数中央委员和工农干部，谴责米夫等人，并请求共产国际撤换米夫，收回成命。当时米夫老羞成怒，进一步倒行逆施，在党内实行残酷斗争，终于被王明篡夺了党中央的领导权，造成对党对革命事业的严重危害，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陈郁同志在四中全会上的主张是正确的，反对王明的态度是坚决的，他虽在这次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但并没有改变对王明的看法。

六届四中全会后，我和陈郁同志再也没有见面的机会了。后来，他被送到莫斯科学习，由于继续同王明唱反调，又遭到了王明的长期迫害，几乎身死异国。

六届四中全会后，我虽然同陈郁同志分开了，但他坚持真理，申张正义的品质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现在我将旧作咏九龙会议的诗二首录在篇末，表示对当年诸英烈的怀念。

#### 咏九龙会议（二首）

##### 其一

三十年前板荡秋，  
中华儿女赋同仇！  
宋王石畔齐扬炬，  
一代风云撼神州。

##### 其二

（白饰）当年笼海疆，  
（九龙会议）令名扬！  
岭南人物多才俊，  
万众一心同慨慷！

[注]：宋王石在九龙地区海边，开会时，作者与会代表曾登临休息。

附录:

反立三路线中我的错误经过<sup>1</sup>

—— 陈郁同志在延安中央党校时的思想总结的第三部分

## (一) 当时情形

1) 四中全会前时候, 在上海工会和不少部份地方党干部, 对立三路线的领导是极端痛恨, 因在它领导下使工作受了很大损失, 干部牺牲; 入狱也不少, 所以他们对李立三领导的中央, 是坚决反抗的态度, 当时我也站在同样立场之一。

2) 四中全会前夜, 在上海工作许多干部, 当时是聚精会神注意国际来信后, 当时的中央领导的认识错误的程度等方面我是其中之一, 上述情形和正在中央要召集四中全会前夜, 我正经广东回抵上海时, 当时自己态度和作了些什么呢?

①到上海后参加一次全总党团会议, 当时我的发言是不主张开四中全会(这会议大多数对这个问题一致主张)而是要求开能较吸收更多下层干部参加会议性质的会议(我个人意见如此的)

②由于上海很不少干部反对召开四中全会, 所以当时国际代表米夫<sup>2</sup>找几个工会较负责干部, (当时余飞、徐锡根等我也参加了)他们是反对开四中全会份子, 这次会议的目的, 是要使上述那些人同意召开四中全会, 我当时并没有同意他主张, 仍是继续过去自己的意见。

③上面这个会议后, 不几天米夫和当时中央不管下面很不少干部反对, 然而他们毅然的决定开会, 有一天晚上通知交通员领着我到一个地方, 第二天开会时才正式的通知开四中全会, 其实那天晚上我想了是开大会, 因此当时我深刻考虑和分析了当时情形, 当时我想若我还继续反对中央立场, 显然是违背党利益, 所以自己决定不反对, 主张开会, 另一方面我仍是希望四中全会可能会解决目前党一些需要的任务, 所以自己转变了过去反对立场, 并在会议上的言论行动都进行与不同意开四中全会的人(韩、罗<sup>3</sup>等人)作坚决斗争, 结果会议开成功。

④四中全会改造中央时, 我是被选政治局委员之一, 但我对中央新成分那些人, 他们过去没有做过什么工作, 又没有受过革命斗争中锻炼, 那时我对那些人是没有一点信仰的情绪, 另一方面我对四中全会, 没有讨论立三路线和具体工作等问题, 当时我很不满意的, 我在会议上提出要求大会讨论, 在我发言中

1 据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工人运动史研究室所存《陈郁同志在延安中央党校时的思想总结》第三部分的抄件节录, 原件注明著作为时间为 1943 年, 录入时未作文字更改。原件无注释。— 补注

2 下划线为原文所有。下同。— 补注

3 韩、罗指韩连会、罗章龙。— 补注

也严格批评了, 然而我的意见是被拒绝了, 四中全会结束后, 我对这次会议的估计开始是站在反对立场, 四中全会后, 在全总党团会议上, 自己的发言是坚决反对这个会议, 主要内容是这次会议没有解决问题, (全总会议未经中央允许传达四中全会问题, 当时由于自己思想反对四中全会, 自己是不懂组织手续, 就了解我也不在乎这套的)

⑤四中全会后, 在全总反对四中全会是站大多数的, 仅有关向应同志一个拥护四中全会, 上海党及其他机关也有部分干部, 他们同样是站在反对四中全会的立场, 因此, 当时国际代表(德国人)召集了在上海反对四中全会干部会议<sup>1</sup>, 在会议中对我很厉害对我们批评, 并大骂反对四中全会就是反党行动, 等锐利词句, (当时他是缺少说服精神)结果会议没有使他们接受国际代表意见, 他们仍是保持反对立场, (这次会议后我是有点考虑自己主张, 就是说会议给自己有点影响, 自然对我不大的,)这次会议后, 全总党团又开了一次会议, 当时出席人有很大部分非全总党团的干部(上海党和各机关干部)这次会议<sup>2</sup>集中在上海各重要单位负责干部(反四中全会)当时他们间有两个问题相互交换意见。

(一)反对四中全会的人, 全总党团各 包括不了现在怎样办呢?<sup>3</sup>

(二)怎样给上海以外党的组织和国际方面知道我们反四中全会的是什么理由? 反对四中全会主张, 当时到会人意见一致, 非委会和宣言<sup>4</sup>(当时仅提出但没有具体名单和宣言内容等工作)仅原则上通过这两件事情举办而已。

我是委员之一<sup>5</sup>, 是因我的单位是海总, 但宣言我仅同意发, 内容我是不知道的, 现在我还没有看着(因我很快与他们没有关系)。

⑥这次会议后, 在上海反四中全会斗争性质更严重化, 当时罗、徐、王、何<sup>6</sup>等人利用上海部分干部开始作分裂党、工会行动。

我当时开始反对四中全会时, 自己是没有估计到罗章龙等人, 把个非委会去分裂和建立第二党, 工会系统等行动, 当时发生前我是知道了这个问题, 那时我的态度如此的。

A. 当时我花了很大力量, 阻止罗等人这些行动, 我们专门谈了一次, 他们是反对我的意见, 由此也了解自己是犯了错误, 并坚决与他们分离(此行去掉

1 此会议在罗章龙 1979 年 10 月给中央政治局常委信中称为“花园会议”, 时间约在 1931 年 1 月 11 日。国际代表为米夫, 他在隔壁房间操纵会议, 他的助手(德国人)在会场上。— 补注

2 因此会最后研究决定成立“非常委员会”, 故是日当为“非委”成立之日, 时间约在 1931 年 1 月 12 日左右。— 补注

3 此句空格为原文所有。— 补注

4 宣言即《力争紧急会议, 反对四中全会报告大纲》, 由罗章龙执笔, 林育南、何孟雄、李求实、吴雨铭等参与起草。— 补注

5 陈郁承认自己是“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的中央委员, 罗章龙 1979 年 10 月给中央政治局常委信中谈到“非委”领导成员, 确有陈郁, 常委中另有史文彬、林育南、何孟雄等。— 补注

6 罗、徐、王、何即指罗章龙、徐锡根、王克全、何孟雄。— 补注

约十五、六字)<sup>1</sup>。

B.继续在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四中全会后几天)在会议上提出这个问题时候,我是承认自己所作的行动是错误,声言放弃自己反对四中全会立场,(事实是如此作了)但政治局委员徐锡根、王克全两人在会议上仍坚持他们原来反对四中全会立场,并声明他们行动是对的。(自此以后我与他们就没有任何关系)

C.经过上述情况后,我在海总和全总本身工作是坚决站在反对自己错误立场,恩来同志在海总传达四中全会时,和当时在海总工作朱宝庭同志也较清楚我当时的具体行动的。

D.分裂党,工会等行动,始终我没有同意过的,他们这些行动我是坚决反对的,因此,直接在我领导下的上海和广东党、工会,始终没有发生过那些分裂等行为。

①我犯错误的时间,仅几天就改正了,错误性质及当时具体情况:

(一)的确我这次犯了错误是严重的,政治和组织原则的错误。然而我这次反对四中全会动机,我个人主观上不是要破坏党和工会的,主要的是自己在思想上犯了幼稚错误,因此错误达到直接损害党的行动时候,自己马上就觉悟了。

(二)当时反对立三路线自己不懂得自己的错误从思想方法等根源去分析错误,而是仅在部分和自己眼前看到了危害党行动的感性现象的方法而已,自己反对四中全会问题上也没有从思想根源上去了解错误的,所以在承认错误之后也没有深刻反省自己,和没有把错误根子完全的拔掉,所以在后来工作新情况下党内斗争又作了一些错(虽然性质不同,和产生的环境条件也不同的)

(三)当时自己没有起码的马列主义理论知识的,如当时反对立三路线错误斗争时,我仅仅看在工作上,尤其自己直接有关部分工作但在思想根源上等问题是不懂的,加上在四中全会前后,关于国际文件又没有看过,当时中央也没有找我谈过任何问题,因此对自己思想上启发作用也得不到任何负责的同志帮助,在当时很复杂党内斗争中,自己过去也没有党内斗争实际经验,这样情形自己就没有抓住正确党立场,而犯了严重错误。

(四)这次错误性质是严重的,然而我是没有和罗章龙等人有目的和事先有任何派别方式商量去反对四中全会,我对四中全会采取对立反抗是自觉的行动,的确当时我认识到这次会议没有解决什么问题,所以就起来反对它的,因此我有以下情况说明:

A.我对罗章龙是在一九二八年下半年,他代表全总到广东巡视工作而认识他,个人关系是没有的,徐锡根、王克全、何孟雄那些人仅在四中全会前才认识他们,除了全总工作关系,没有任何个人或工作关系,我在全总工作时比较好些,密切工作的人是余飞,个人也谈得来,(反四中全会时,他给我好多帮助,如非委会他首先指出我犯组织错误)他们这些人的历史和对党各种情况,

<sup>1</sup> 此括号与其中文字为原抄件所有。— 补注

可以说自己一概不知道的。

其次对王明那些人,都是在四中全会时才知道,我对他们更无从知道,只知他们是莫斯科的学生,没有做过负责工作,其他也没有人告诉,四中全会后较知道一点但对我没有什么反映的。

B.罗章龙那些人在他们未分裂党之前,我个人对他们信仰当然比较好,主要是我知道他是工运工作很长历史,在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干部,但对新选中央那些人,自己对他们是没有任何信仰的可言,当时我思想上认识对中国革命重要性主要是工人运动,自己的重视党内干部也是从工人运动中有锻炼的干部是较相信的,的确我有些偏向是过分看重工人运动和不够认识革命其他部分的倾向的毛病。其次我个人虽然参加反对陈独秀机会主义斗争,但当时党内斗争仅限于上层的部分干部,(在广东)所以对自己不仅谈不上什么经验,实际上对自己的影响也是很少的,因此谈不上什么经验。

C.我在四中全会前虽然是一个中委,然而我对中央负责同志除了个别外(恩来立三等)其他简直认识都没有机会,比较同过短期工作的仅有李立三一个,可是我对他是有很深的成见,因他的广州暴动失败到广东当省委当中央代表时,发号施令和无原则打击广暴时犯过错误的负责干部,他的工作方式是送死干部方法,强派工作等等。我对他是十分不满的,因此反对立三路线时,我对他领导下中央是更加紧我对他极端痛恨的。

D.自然上述说过,自己缺少马列主义起码知识,因此在政治上远见和分析中国革命的原则是不大懂的。但我对工作问题,(主要是工人运动)的确有和王明等人在思想上是有些意见分歧的,在四中全会后我与王明等人讨论工人运动时,王明骂我右倾的机会主义,在莫斯科时也是一样,但是自己的确是缺少理论,因此不能把自己意见提高到原则性和系统发挥它的作用,这是过去自己工作极大错误的地方。

综上所述情况,自己总括有下列几点意见:

①今天反省过去,自己在四中全会本身所提出问题本身在基本上是没有有什么错误的,然而在四中全会后,自己确是犯了严重错误:a.由于自己不懂怎样正确在党内斗争坚持自己意见,同时又没有在思想上和组织上搞通,因此执行这些基本原则又有错误。

b.自己在党内斗争不了解干部历史和对党各种情况,事后又不去调查,在反对四中全会开始时,这次党内斗争如当时罗章龙等人在历史上对党是一贯很多不对头然而我是失掉了阶级警惕性,在他们未分裂党、工会时,还相信他是有锻炼高级干部等错误。

## 五、关于东北建党的回忆<sup>1</sup>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我是中共北方区委和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的主要负责人之一。由于工作的关系，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三年之间，我曾参与了筹建中共东北党的工作。并受北方区委派遣先行东北考察工运，宣传革命，建立联系，筹备建党。我回北方区委后由于“二七”工潮兴起，我不能再去东北，所以北方区委和书记部派李振瀛、陈为人等去东北具体进行建党工作。不过，我对东北的建党工作是一直关心的。并从我们全国总工会系统，接连派出一些同志去东北加强党的工作。我还曾经几次到过东北，了解东北党的发展和建设。今天，正值中共建党六十周年之际，我把我所知道的关于东北建党的一些情况写出来，以示纪念。

在东北建立党的组织问题，是中共“一大”确定的在全国发展扩大自己的组织这个总的工作的一部分。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它一建立就把发动工人运动和发展自己的组织作为中心工作。中共党的“一大”通过的决议明确指出：“本党基本任务是成立工会。”为了加强工运，党的“一大”后不久就建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我当时担任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部的主任。我们还创办了《工人周刊》，这个名称是按欧洲工人党的习惯起的，我负责编辑，这个刊物实际上是中共北方区委的党刊。

为了切实加强工人运动，迅速扩大党的队伍及其政治影响，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党中央局总书记陈独秀以 T. S. CHEN 的名义发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副标题是：“关于建立与发展党、团、工会组织及宣传工作等”。《通告》指出：“各区必须有直接管理的工会一个以上，其余的工会必须有切实的联络。”

<sup>1</sup> 原载《北方论丛》1981年第4期第9-14页，篇末注“张军民记录整理”。发表之后，罗章龙本人重阅了全文，作了四处技术性订正，此根据订正件录入。—补注

中共北方区委在李大钊等同志的集体领导下，积极开展了工人运动，并且很快就在北京、唐山、南口、长辛店等地组织起了铁路工会，并建立和发展党、团组织。组织东北工人运动和筹建东北党的问题，就是在这个时候提出来的。我记得，北方区委和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曾多次讨论研究，去东北发动工运和建党问题。主要之点如下：

第一、东北是我们去共产国际，来往苏俄的重要通道。党中央很关心东北工作的开展，同时我们北方区委在工作上也需要打通这条国际路线。

第二、东北的大产业比较发达，是我国产业工人的重要基地之一。因此，到东北开展党的工作也是有基础的。

北方区委在酝酿去东北建党的问题时，曾得到了共产国际代表和苏俄同志的关心与指导。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优林使团曾向我们建议，应重视东北的工作。因为那时白俄的残余势力还盘踞在北满，日本控制着南满，这不仅是对苏维埃政权的威胁，也是阻碍中国革命的反动势力。他们还提出他们在中东铁路的地下组织将帮助我们开展工作。

总之，在上海党中央的指示下和国际代表的建议下，也是由于我们北方区委在实际工作中的需要，北方区委和书记部决定着着手进行东北工运和建党工作。

但是，到东北建党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当时东北不仅有北洋军阀的势力，而且北满和南满还有白俄和日本的势力。正是由于这几种反动势力的统治，所以东北革命运动迟迟不能发展；尤其是北方区委对东北的工运状况和复杂的斗争形势还都缺乏了解，与东北工人也没有建立联系。因此，决定派我先去东北考察联络，作为去东北建党的先行——作为筹建东北党的第一步工作。派我先行的原因有二：

其一、我是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书记，因此我在北京各校都认识很多同学，也结识了许多朋友，其中有许多是东北籍的。那时东北没有大学，北京大学的牌子又很亮，所以东北有很多高层人士、军阀、官僚之子弟都来北京上学，同时也有些平民子女考入北大的。他们毕业后许多都回到东北各地，我去东北可以直接找这些同学、朋友们帮助开展工作，这自然方便得多。

其二、我是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的主任，那时我们在铁路沿线已经有些基础了，长辛店、南口、唐山、山海关等地都成立了铁路工会。我与这些工会的主要负责人都很熟悉，这就可以通过他们顺利出关，也便于了解和开展铁路工人运动。

北方区委给我的主要任务是：到东北考察工人运动发展状况，同时宣传革命，筹备建党。要尽可能地和一些重要地点，组织起革命工会的组织。我的行动路线是两条：一是南满，以大连和沈阳为重点；



另一是北满，以哈尔滨为中心。

我记得，那是在一九二一年的秋冬之交<sup>1</sup>，我踏上了东去的征程。那时京奉路是中国的，中东铁路长春以南是日本的，长春以北各线是苏俄的。我在唐山和山海关铁路工会的帮助下顺利地出关了。先到沟帮子，在那里办了一个工人补习学校。之后进入沈阳。在沟帮子和沈阳，经过走访、座谈和组织工人补习学校，我初步了解到一些工人的情况。经过京奉路革命工会的协助，我又前往大连、旅顺，进一步考察工运，宣传革命，组织工会，物色党、团对象和工运领袖。我到大连认识了一个小学教员石三一，其爱人是一家报社的记者，叫刘建功，我就住在他们的小学校里。我现在还记得，他们家有一个双目失明的老母亲。我去大连主要是付景阳协助我工作，他是大连工人运动的著名领袖，他曾陪同我走访了许多工厂、铁路车站、码头等，也到过旅大军港。在大连期间我还到过南满的“关东厅”，这是日本人的企业。在大连为开展工作的方便我还学习了日语，我的日语基础就是那时打下的。

我在沈阳和大连工作了一段时间以后，就在铁路工会的帮助下，北上哈尔滨。到哈尔滨我临时住了几天旅馆，随后就找到了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会员张昭德。他那时正在哈尔滨工业专科学校（即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前身），他也是南方人，他在工专住校。通过张昭德的关系我以学生的身份寄住到了哈工专学生宿舍，在这以后，我就以哈工专为据点，在张昭德的协助下开展工作，主要是走访调查，考察工运。

那时的哈尔滨是个典型的殖民地式的城市。除了中东铁路这个俄国的大企业外，还有日、美、英、法等帝国主义开设的工厂、银行、商店等。十月革命以后白俄纷纷逃集在这里，勾结帝国主义联军进行反对新生苏维埃政权的罪恶活动，哈尔滨是他们反苏的大本营。我到这里的时候虽然白匪和帝国主义干涉军早已被红军打败了，但是他们的残余势力仍盘踞在这里。我一到哈尔滨大有到了“异国他邦”之感，各式洋楼林立，大圆屋顶的教堂到处都有，哈尔滨真不虚传为“东方的莫斯科”。

我最先是到了三十六棚，这是中东铁路所属的铁路总工厂。有中国工人和俄国工人。中国工人多，而且基本都是力工，被俄国老板称为“黄色苦力”，他们的生活极端贫困。三十六棚的工人中有来自东三省特别是铁路沿线破产的农民，还有来自直隶和山东等省破了产来闯关东的农民和手工业者。我一到工厂所见工人都是衣衫褴褛，满身满脸的油污，简直就是奴隶一般。他们的劳动条件极差，多半都是繁

<sup>1</sup> 此处记忆可能有误，罗章龙此行东北，约在一九二二年秋冬季节。— 补注

重的体力劳动，有些工活就在外边大工棚子里做。工人的住区就在总厂的东北边，那里挤满了一排排的“人”字形大马架子，马架子周围拥挤着一个个的小土坯房子，这里是哈尔滨的一个最大的贫民窟。工人同志告诉我说：“三十六棚，就是根据我们住的这些大棚子叫起来的。”工人们的工资非常之低，每天只有二十戈比，可是工人的劳动时间则长达十一小时，有时活忙，得干到十三、四个小时。他们受着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因此他们有很强的革命性。我了解到，他们曾和俄国工人一起举行过许多次的罢工。我向工人宣传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活动情况和关内工人斗争的情况。我说：我们中国工人应该组织起来，要有自己的组织，为自己阶级的利益而奋斗。

我还到了哈尔滨“戊通轮船公司”，这是一个南方资本家经营的船厂。这个公司很大，主要是经营松花江到黑龙江和乌苏里江的航运。这个公司里的工人南方人很多，我到这里通过一个同乡认识了很多南方工人，其中有一些是技术工人。我与一个浙江来的姓俞的工人相处甚密，他告诉我，他是闯了祸才到东北来的。他家乡有一个罪大恶极的姓沈的官僚，横行乡里，鱼肉百姓，他出于一时的义愤乘其不防将其打死。于是逃来关东，在哈尔滨隐姓埋名进工厂工作。后来我在上海的一家报纸上还确实看到这个案子的事。他还告诉我：“这里的人多数都是在家乡没法生活才下关东来的。”我就是通过他，在轮船公司开展了工会的工作。那时我还到过秋林洋行，这是俄国人开办的大洋行。

我每天都忙得很，到处奔跑。什么地方工人多，我就到什么地方去。晚上回到工专就在张昭德的帮助下学习俄语。我在实际的工作中感受到了学习俄语的必要。哈尔滨俄国工人多，尤其是中东铁路及其所属各站各厂，同时我还要与苏俄在哈尔滨的地下组织联系，因此学习俄语更是急需。

我记得，那时有个名叫怀特（White）的俄国同志，就住在南岗中东路办事处附近，他公开的身份是办事处的工作人员，通过他，我了解了一些俄国布尔什维克地下组织与俄国“老白党”在东北斗争的一些情况，以及中东铁路的俄国工人和中国工人的组织和觉悟的情况。我记得那时我们送往俄国学习的学生和工人很多都是通过这个人具体安排办理的。我为了学好俄语，还和一个俄国工人交了朋友，他的名子叫伊万契柯（Ivanzinko），他经常到我的住处用俄语同我讲话。因此我的俄语学习进展也很快，这就使我在中东铁路沿线的活动方便多了。

为了广泛了解情况，我还沿着中东铁路去过东北的许多地方，最

远到过绥芬河，那时叫“五站”，后来我参加中共六大会时由俄回国也是经绥芬河回来的。我在绥芬河还曾赋诗留念：

紫霞垂野暮山焚，皂帽桦鞋夕进军。  
午夜星繁风正急，衔枚疾走渡绥芬。

在哈尔滨工作局面打开以后，我就由哈工专搬到了道外贫民区。皮通船厂的工人多数住在这里，居住这里的也有许多小商小贩，在那里我学会了很多工人的话，那时我常与工人同志们说“我是闯关东来闹革命的”。

我这次东北之行总计有几个月的时间。对东北工人的组织状况和觉悟程度及工运的情况，都有了较全面的具体的了解。于是我决定返回北方区委汇报，并进一步筹划下一步的工作。当时我根据走访考察的记录，写了一份“关于东北工人运动的状况和在东北建党的具体意见”的书面报告。遗憾的是我当年记录的笔记都散失了，只残存几篇诗稿。更遗憾的是，我交北方区委的报告也找不到了，本来似乎在北洋军阀时代出的《苏联阴谋文证汇编》中应该有此件或有有关的记录，可惜，因“原件被俄人用煤油引火焚毁，以致一部分残缺”（这是《文证汇编》序中讲的）所以未能找到。

我经过艰难的行程回到了北京。北方区委的同志们在北京大学校区某楼开会，听取了我的详细汇报。我汇报的主要之点如下：

第一、东北是全国工业特别发展的地区之一，工人多而集中，有很强的革命性。东北的工业分为两个中心区，南满和北满。北满以俄国人的中东铁路及所属的工厂为主，南满以日本的满铁会社为主，此外许多帝国主义在南满和北满都开办了一些较大的企业，也有一些中国官办和民办的企业。中国工人都集中在这些企业当中，是一支伟大的革命力量。东北的工人是来自本地和全国各地破产逃荒的农民，他们直接受着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因此有很强的革命性，他们一直在进行着各种方式的斗争。

第二，东北工人觉悟程度比较高，他们较早地接受了十月革命和马列主义的影响。由于中东铁路这个特殊的条件，所以东北工人在十月革命数年前就受到布尔什维克的影响。早在一九〇八年中东铁路的中国工人就和俄国工人一道庆祝了“五一”国际劳动节。此外，一九一八年以后，曾有数以万计的华工陆续从俄国经哈尔滨回国，其中一部分人就留在哈尔滨谋生。他们带回了許多振奋人心的“工人国”的真实消息，还带回了許多苏俄的报刊，这些都使中国工人阶级受到了很深的影响。他们向往十月革命，向往“工人国”。在“五四”爱国

运动中，东北工人曾以实际行动表现了自己的政治觉悟。在一九一九年五月和七月为了援助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他们接连进行了两次大罢工，以新的姿态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

第三，东北的工人运动已有一定基础。据我了解，从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〇年中东铁路的中俄工人共同举行了许多次罢工，其中有几次是全路性的大罢工，这些罢工沉重地打击了白匪高尔察克之流和帝国主义干涉军及沙俄残余势力。为捍卫十月革命的成果，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世界工人运动史上留下了光辉的篇章。

第四、东北工人得知中国工人阶级已经有了自己的政党和劳动组合书记部，倍受鼓舞。我的东北之行开展了许多工作，尤其是对工人中的先进分子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组织了自己的学校和工会。因此，东北建党的下一步工作已经有了实际的基础。

总之，东北工人阶级的基础雄厚，觉悟较高，有很强的革命性，并不断地进行着斗争，这是它的优点。但是，从东北工人运动的状况看，也有明显的弱点，那就是他们的斗争发展得不平衡，缺乏统一性，与全国的工运还没有连为一体，工人的斗争还没有明确的纲领和坚强的组织领导。因此，急需建立党的组织，切实加强工人运动的主观领导力量，提高斗争水平，并与党所领导的全国的工人运动连为一体，南北呼应，推进革命。

基于上述基本情况，我向区委提议，应立即派人去东北发动工运，并正式着手建党。区委几经讨论，同意了我的建议，决定派人去东北正式进行建党工作。

第一批派赴东北的有：李振瀛（李大汉）、陈为人、王德三、王复生、王懋廷等人。这些人由于各种原因，不是一起出发的。首先出发的是李振瀛、陈为人，一九二三年春他们即身负重任开赴东北。李、陈都是全国铁路工会的干部。李振瀛原是天津南开中学的学生，他英文很好，也能讲点俄文，派他到东北可以在中俄两国工人中活动，开展工作。陈为人是湖南人，是我的同乡，又是同学，他曾到过俄国学习，懂得俄文。

我回北方区委后不久，“二七”工潮兴起，所以我不能与他们同去东北。我把东北建党工作就交待给这些同志了。我把南满和北满的情况及联络地点和联系人都告诉了他们，并规定了他们的行动路线。当时北方区委和书记部交给他们的具体任务就是：在东北建立赤色工会，在先进的工人中物色党员、团员，建立党团组织。

王德三、王复生、王懋廷原都是北大的学生，是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成员。他们都在北方书记部工作。王德三是北京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十九个发起人之一，他是云南彝族人。王复生是马克思学说研究

会的法文翻译组组长，后来到书记部工作，他在哈尔滨工作时的公开身份是报社记者、中学教员，他工作能力很强。这“三王”在东北工作的时间都很长，搞学生运动、工会运动都很有贡献。现在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还珍藏着一本王复生的日记，记载着当年的活动情况。

首批派到东北的同志，先到哈尔滨同各方面接上了关系。经过艰苦的工作很快就在哈尔滨建立起了党、团组织。一九二四年夏，大连党、团组织也建立起来了。在南满活动的主要有付景阳，杨志云等。陈为人、李振瀛等也曾到过南满。

一九二四年党派吴丽石到哈尔滨做党的工作。在吴丽石等同志的努力下，一九二五年冬建立了中共哈尔滨特支，一九二六年哈尔滨成立了中共北满特委，下属有二十个支部。此时南满的工作也有很大发展，一九二六年成立了大连地委，有十一个支部，一九二七年党的“八七”会议后，东北党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了满洲省委。

东北党建立后，我还曾几次到过东北，同时还因为东北党许多同志是我们全总系统派去的，所以我对东北党以后的发展情况还是比较了解的。一九二四年我与李大钊、王荷波等，还有几位工人同志一起赴苏出席共产国际五次大会时，路经哈尔滨曾停留了一段时间，同李大钊一起了解了地方党的工作。一九二八年我赴苏参加中共六大后也曾去哈尔滨住过一段时间，并在哈尔滨南岗一个中学向文教界的党的组织报告了六大的情况。参加六大会时满洲省委曾派张任光、潘廷德、朱秀春、于治训、王传壁、唐宏经六人出席。我们是先后回来的。这时期我所看到的东北党已有了相当的发展了。

当然，中共东北党的发展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九一八”事变以后，东北党的工作受到王明左倾路线的严重干扰，他们不顾中日矛盾上升，而要求东北也与关内一样搞苏维埃革命。红军长征以后，满洲省委与党中央关系中断了，在苏联的王明、康生这时插手东北党的工作，撤销了满洲省委，东北党失去了统一的领导，使东北党所领导的抗日力量遭受了很大的损失。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以后，迎来了全国抗战的新高潮，党中央与东北党恢复了联系，东北党领导的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在东北党的建立和建设过程中，有许多建立了不朽功绩的同志是我比较熟悉的，有些同志当时我还有诗文相赠。值此纪念之日，我写录出来以示怀念（前面谈过的不重复）。

吴丽石，江苏人，曾在北京俄文专科学校学习，一九二三年入党，后去苏俄学习，一九二四年回国后即被派到哈尔滨做党的工作。一九二七年离开哈尔滨后曾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一九三〇年被捕，一九三一年被国民党杀害。

郭隆真，回族，河北人。早在“五四”运动时是天津学生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是“觉悟社”的成员。她曾赴法国勤工俭学，一九二二年在法国入党，大革命时期回国工作。一九二九年被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派到哈尔滨。一九三一年调往山东，同年牺牲。当时上海全总党团曾举行追悼会，我还在追悼会上致词，表彰了她的革命功绩。

赵一曼，原名李坤泰，又名李振坤，是四川宜宾人。早在大革命时期的武汉军校当过女兵。我那时是武汉政府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负责人，兼中共汉口市委书记，我与她很熟，因为她是一个积极宣传革命的热血青年。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她离开了军校。九月，党派她去苏学习，她临时时我曾赋诗送别：

渝州李振坤，巾帼显奇英。  
李寄名乡国，木兰作女兵。  
纸坊曾拒敌，武汉战东门。  
惜别吴淞口，秋风满榭林！

一九二八年冬回国，曾在宜昌工作，一九二九年在上海党中央机关工作，后调江西，“九一八”后调往东北。后来成了抗日联军的将领，我们中华民族著名的女英雄。

童长荣，一九二四年入党。曾留学日本，一九二八年回国。先后担任中共上海沪中区委宣传委员、区委书记等职，一九三一年三月调到东北，担任大连中共市委书记，十一月到东满任特委书记，他赴东北时我也曾作诗送别：

工农有闯将，竟说童长荣。  
上马能驱敌，挥毫草檄文。  
虬江留战绩，征戍向辽宁。  
万里关东去，白山显义声。

马尚德（到东北后改名杨靖宇），河南确山人，一九二二年曾任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京汉路豫南特派员、中共豫南特委书记。参加了“二七”大罢工。一九二八年调上海中央工委工作，一九二九年中共中央派他到东北。曾任哈尔滨市委书记、满洲省委军委书记，全国抗战爆发后，他曾任东北抗联第一路军总司令。我当年也曾作诗话别：

尚德好男子，豪怀敌百城。

信阳曾领众，焦作树功勋。  
“二七”冲头阵，“五四”有令名。  
关东形势壮，万里奋风云。

一九四〇年马尚德在吉林濛江与日军战斗中壮烈殉国，得此噩耗我曾写诗悼念：

赫赫威名震豫南，擎天北柱辉河湾。  
濛江战役安危系，亘古男儿马确山！

杨志云，是大连中华青年会的秘书，一九二四年在上海由李振瀛介绍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后到大连任青年团大连特别支部书记，后任党的特支书记、市委组织部长。

张炽，一九二五年五月被北方区委派到大连地委任宣传部长，一九三二年在上海被捕，于南京雨花台殉难。

邓和泉（邓洁），一九二六年七月由北方区委派到大连，任地委书记。一九二七年五月出席了党的五大，同年八月大连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被捕入狱，在旅顺坐牢十年。

唐宏经，工人出身，中央工委委员，是南满铁路工会的负责人。

## 六、东北行纪<sup>1</sup>

临中<sup>2</sup>倒行逆施，对非委所属组织积极进行破坏，并动员锄奸队对非委各负责人实行暗害。一天非委常委开会，忽接北方非委王仲一来信，要求非委中央迅速派得力人员前往北方加强当地工作。史<sup>3</sup>向文虎说：当年书记部<sup>4</sup>炉灶是三块石头架起来的（指大钊、国焘、文虎），现在守常已牺牲，国焘远在国外<sup>5</sup>，他们要求你回去重整阵营，再干一番，全局仍可望好转。文虎说：“你的意思很好，我们一道回北方去，但是目前我先须到东北，东北工作安排定妥，才能到北京去，你看怎样？”史说：这样也行。文虎告史，现在你可以先去告诉大家努力工作，“我多则三月，少则两月，就会从关外到北京的。”史同意他先回北方。常委会上就决定先给北方非委一信，说明意向。文虎随即准备动身赴东北去。

文虎正准备北行间，一日有同志某，风闻文已被敌所害，因急往访刘鄢<sup>6</sup>问讯，鄢即转告文虎，并云彼等或将见诸行动。因为平日奸人在布置暗害前，必先放出蜚言，云某某已被捕，或已被杀，然后行刺或绑架加害，如此可以迷惑视听，推卸责任。所以刘鄢劝文虎立即动身，免遭暗算，同时东北非委迭次来信敦促非委中央早日派人去。

一九三一年◇月，文虎遂赴东北，宋大方同行。

一九三一年上期在非委中央领导下，东北党与群众组织力量，经过东北非委齐心戮力，大致仍在旧有基础上向前平稳发展。当时沈阳、

1 根据罗章龙后人提供的誊抄复印件录入，原件写作时间不详，大约在70年代前后。

— 补注

2 临中，即六届四中全会成立的临时中央。— 补注

3 史，即史文彬。— 补注

4 书记部，即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 补注

5 张国焘于1931年1月下旬回到国内，因党内斗争形势，未与罗、史等面晤，故此处言其在国外。— 补注

6 刘鄢时为罗章龙夫人，1939年后分手。— 补注

大连、长春、哈尔滨等城市的油坊、面粉、酿造、丝织等工厂，均有工厂小组。东北各铁路沿线东至绥芬、西至海拉尔、南至大连、西至沟帮子等重要车站及东西各矿山，如抚顺、鞍山等处，均有组织或线索可以联络通气，至于东北农村，则有通化、密山等处，可以开辟工作。据报告：一九二八年一月五日奉天、通化、临江各地农民为反对军阀横征暴敛曾组织大刀会进行过武装斗争。同年一月十六日，奉天通化大刀会受省军压迫向朝鲜边境发展，倡议联村自治。二月三日张学良派军袭击通化大刀会根据地的村庄，将十二岁以上男子悉行杀死。因此，武装农民被迫逃迁外县。此事激起当地农民的深仇大恨，曾秘密派人向东北非委请求派人协助恢复组织，扩大武装。非委已与他们取得联系。至于东北军队虽尚无强有力中心组织，但当地非委已在哈尔滨丁超部队建立组织，有下级军官及士兵成立地下组织。可望逐渐加强影响，扩大组织。

文虎与宋大方二人自上海乘轮到达大连，住约一星期，二人从大连到沈阳，宋大方留驻沈阳。约定二人以南北满为界，分头工作。自后文虎独赴哈尔滨。哈尔滨党群组织原为王永叔<sup>1</sup>兄弟在哈时所建立，现王永叔兄弟已回滇，但原有组织与群众关系颇好。文虎所住南岗，南岗一带是俄侨住宅区，户口管理不严，租房不用保人，有家具连房屋出租。由于中俄语文各别，邻居互不来往，行动比较自由，但对于联络群众工作却不相宜。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军队占领沈阳，向北进攻，续占长春，旋进占哈尔滨。时丁为哈尔滨警备司令，接受日本顾问监督军队行动，全军上下均不满丁所为，酝酿反丁超运动。非委哈尔滨党组织集中全力做兵变工作，希望拖出一部分队伍到密山、虎林等县从事抗日武装斗争。主持其事者为一个军事小组，以姜英为领导，同时参加小组者，有刘长林（原戊通公司船坞工人）、王焕章（油坊工会负责人）、杨重民（哈工专学生）等，利用丁军心不稳，警备队（渐渐扩大对下级军官及士兵影响）成立党的地下兵士委员会。

姜英，虎林人，原为大黑沟伐木工人，曾在吉林夹皮沟金矿工作，说矿内取砂小溜每二十人为一帮，清溜三千车，可得纯金三十两四六分金。姜同乡在关外，韩边外（清光绪时山东人出关经营金矿）作业的矿工多至五万余人。矿场上纵横亘百里，游侠众多，姜乃为其中魁杰。矿工们杀人越货，打抱不平，生活甚为散漫。文虎在与姜英共同工作中，从姜学习“胡匪”流行切口（隐语），包括从日常生活到行军作战，非常繁琐的会话和各种手式。姜后弃工入伍，为军中神枪手，经常入山伐木射猎，长在野外生活，锻炼出钢筋铁骨身手。文虎常借

1 王永叔兄弟，即云南籍王复生、王德三和王有德三人。— 补注

姜英到外县工作。着靰鞡草制皮靴，乘爬犁行原始森林中，偶有迷失，姜英辄能自导引而出。严冬外宿，夜不成眠，姜便焚火烤地，扫去灰烬，藉以干草，人卧其上可御寒。遇有温泉处，虽大雪天，一浴可抗寒竟日。野行无锅灶，姜掘灶筑土令坚，上覆以布片，布米其上，浇之以水，自下燃薪，久即成饭。凡此经历，可见姜生活习性渐与当地人民同化。

文虎与当地非委在哈尔滨军事策划布置已有头绪，但事为罗登贤所侦知，便极力从中加以破坏，罗登贤是奉命来东北破坏非委组织，他常对人说：“有我罗登贤在东北，便不能让非常委员会有活动机会。”因此当丁超得知部下有异图时，便采用严厉镇压手段，将军中地下党组织主持人捕去，更利用哈尔滨投敌的中共党员作眼线，继续破坏非委的组织，最后并将姜英、陈永善、郭新之、◇◇◇、◇◇◇等逮捕。党在南岗机关最先被搜查。继续破获的机关为道里二道街福聚永、四道街德胜居等处。这样党内残酷斗争已在满洲各地区全面展开。

宋大方自南满来哈报告临中对南满沿线非委斗争亦异常激烈。在情势万分紧张下，得当地群众组织协助，文虎一方面转移地方，重建机关，继续工作，同时进行营救被捕同志工作。新建机关为本地同志张汉声所设文理补习学校。张原籍山东日照人，为老学究，以设馆授徒为业，其长女云涛在轮船公司任会计，时已失业家居，次女雪涛在秋林洋行工作，张有姊与白俄人可夫曼结婚，生子名伊万全科，常往来张家，在补习学校担任俄文教员。伊万全科之父在警务处工作，管理街道行政事务。文虎即住在张处，对外称为张长兄之子，称汉声为叔父，近自山东原籍来哈探亲。

一日，文虎忽接姜英自狱中着专人送来一信，报告在监平安无事，内云每星期二下午可派人送食物去接见。经大家商量，乃决定请李建芬（女同志）伪装姜家属前往探监。但李连往二次未获见姜面，又因李怀孕已久，行将分娩，以后恐不能再往，寻思无计。张云：事已到此，不宜再缓，因决定下次亲去探监，并送食物与姜。张赴监时，文虎随其后同往。只见探监人列队监门口听候唤名，文虎远远坐在院中石级等候。有顷，见一军服狱吏模样的人从外进来，走近石级前略一驻足侧目俯视文虎，若有所思，随即进内。顷之，复出，向文虎身上下打量，片时忽问：您是关内人吗？文虎略点头，又问道：您记得郑州棺材店的大兵郭某吗？文虎忽然心动，猛忆前事正思作答，郭面露笑容，连称别后数年，消息阻隔，不料今日来到这地，不容分说，挽文虎进内。文虎见其意出于至诚，谅无恶意，因随入办公室，坐定。郭递烟茶，谈别后生活及出关经过，因留在办公处便餐，相谈至为欢洽。从郭谈吐中知郭近任此间监狱官职，并引妻儿出见，对其妻口称

“恩人”不置。饭后，文虎率直告以来意，并将姜案情告郭。郭云：案属军情，急切间难以置答，但一定尽力帮忙，总要对付得住朋友。要文虎回家静候。文虎遂欣然辞出，郭亲送至大门外才转身进院。一会张送东西出来，把会见姜的经过相告，大意说姜案口供甚好，无疵可指，只是嫌疑，并无证据，有人转圜可望宽释。回去后，二人商议决定央郭相助，以期从速把姜救出。

文虎与郭相识，事在六年以前。先是一九二五年五月文虎在郑州居住时，由于兵荒马乱，市内房屋奇缺，文虎住在郑州偏西隅小街上一家棺材店里，外间放置各种式样的大小棺材数十具，出入必通过棺材甬道。一天傍晚，外间敲门甚急，出视见一背枪兵士携一老妪立在门外，状似患病，气喘不已。经询问才知兵士名郭希忠，是刚从洛阳开差到郑，部队就驻扎街尾关帝庙，老妪为郭母亲，家极贫苦，平日因无地安置母亲，经常随郭开差到处流浪，这次队伍开赴徐州，路过郑州，要求让一房子给他母亲暂住疗病。文虎觉得此兵外貌虽凶悍，但在战阵中不忘老母，非同等闲，遂允让郭母暂住外间，郭立即叫来几位弟兄把棺材靠墙堆叠起来，空出一席地，开个行铺，把老母安顿下来。郭在部队搭伙，每日将冷馍残饭捎些回来供母度日。有时饥渴，怀西<sup>1</sup>便送茶水菜饭给郭母，并代觅医生诊视，但究因久病体弱，医治无效身死。怀西为此当去几件衣服才助其成殓安葬。后来郭开到前方去，来过一信，自后音讯寂然。文虎亦因事过境迁，久已淡然忘怀，今补叙于此。

次日文虎赴监访郭，坐定，郭说道：您来得正好，姜案本身并无大干系，如无新证发生，可从速结案。郭解释道：“上头正在寻求姜以外的事证，（他附耳轻言道）为了免生枝节，最好您回去关照朋友们，暂到外埠避一避，风声一过，一切好办，这样姜本人很快就可以保释，姜事完全在我身上，你看怎样？”文虎颌首同意。郭道：“事不宜迟，即断即行！”文虎归寓后，与大伙计议决定，张仍留哈工作并照拂姜出狱事，文虎偕李建芬赴吉林长春，察看当地党组织被破坏情况，加以整理。二星期后接张姜二人信，姜已无罪释出，同案被捕的陈郭等各判刑有差。姜英出狱后改赴密山工作，后来姜仍在外县被逮捕，解往长春，经附敌份子指证，在长春牺牲。

文虎到南满时，宋大方等七人亦被捕牺牲于沈阳。宋大方字秀石，浙江杭州人，怀西异母弟，原之江大学生，因学潮开除即废读，与沈干城参加工人运动，任沪甬铁路工会党团书记。一九二七年国民党清共，离杭赴沪，复入圣约翰大学学习法文，担任上海法租界工厂支部书记，旋辍学。一九三一年任非常委员会中央秘书，随文虎赴东北，至是遇难

1 怀西，即谢黛茜（怀龙），时为罗章龙夫人，1927年以后分手。—补注

牺牲，时年二十六岁。宋中西文称优，尝有译述，因在革命激流中度生活，存稿未集，尝自谓：“不为荷马，便有丹敦！”果如所言。宋时有译作，在革命激流中多归散失，其姊怀西为大方作传记，并收集遗文，惜竟未刊。

南满牺牲七同志中除宋大方外，其余六人为：鲁祥梓，沈阳铁路工人；杨国全，大连油坊技工；吉光英，营口港运工人；邵森，抚顺老虎台矿工；翟树封，大连印刷工人；常厚田，皇姑屯铁路工人。以上六同志均南满地区非常委员会所属当地党或工会系统工作同志。

文虎后自东北返上海，向非常委员会中央作报告，内容主要指出九一八事变表现日本野心不戢，现在吞并满洲，以后将继续侵略中国，唇亡齿寒，苏联亦将受影响。该报告旋被临中分子盗去，即据此，大肆攻击非常委员会，说文虎报告对九一八事变估计错误。临中认为九一八事变并非侵略中国，乃是进攻苏联，因此对非常委员会中央号召全党宣传组织发动中国工农及各阶层组织广泛抗日阵线、进行收复失地等项措施，均认为右倾。其荒谬无知如此。过了几年，他们才转到拥蒋抗日方面去。

## 七、大革命时期中共军运工作纪略<sup>1</sup>

### 一、序言

二十世纪初期中国政治经济特征是国际资本主义与本国军阀专政互相交织在一起，统治着中国。面临这种环境，中国的革命任务是双重性的，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但中国的革命主动力量又是以工农领先的。这种情况说明中共处境既不同于过去历史上农民革命形态，又与现代并世界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形势有别。

基于上述政治经济革命特征，中共所采取的革命政策与方略按理论与事实需要，一方面应进行武装斗争，同时又要进行非武装斗争。二者适当结合起来，便可以完成中国革命的双重历史任务。

这种特殊的政治环境简明地说便是：二次革命，一手完成。一方面打倒当前的军阀专政，同时消除未来资产阶级专政的隐患，具体的口号是争取非资本主义的前途。

武装斗争与非武装斗争，在中国革命进程中是交互进行而非一举完成的，按实际情况说二者之间彼此是互为先后交相补充的。

### 二、中共北方区扩大会议关于武装工农问题的决议

一九二三年北方区委召开全区（包括直、鲁、豫、晋、陕、察、热、绥与东三省等）代表扩大会议，在那次会议上曾讨论有关军事方面诸重大问题。

回溯中共成立初期，坚决与军阀官僚等旧势力决裂，断绝一切关系，把主力放在组织工农群众斗争方面。当时中共憧憬十月革命的前景，因此，对于军事方面的工作（军事运动）无暇旁骛，暂取守势，按照先后主次，原是可以理解的。

<sup>1</sup> 根据罗氏后人提供的抄件录入。原文约写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 补注

先是在民国元年间，北方政府成立参众两议院，各有议员数百名群集北京，从事各党派政治活动。议员中有些是同盟会会员，过去藉军事活动发踪，现在仍与各派军阀发生联系。同时他们也想与政治上的新兴势力接触往来，以抬高自己的政治地位。因此，常有议员奔走于沙滩北大红楼，通过私人关系，与中共北方区委联系，并有所建议。

南方议员胡木功<sup>1</sup>与区委委员范鸿颀旧识，由范介绍访问北方书记部负责人谈话。胡侃侃陈词云：“二千年来中国历史朝代更迭或割据偏安，无不藉助武力，力征以经营天下，当时成败兴亡，大都由战争决定。近代史乘直到北洋军阀，仍属如此。十九世纪以还民主运动漫延东西各国，先后建立议会政治，由是各国政治变动大都遵循议会斗争途径进行，但国际争端最后仍须诉诸武力。史迹昭彰，人所共喻。由是可知夺取政权，武力实占相当重要地位。”最后他割切提出希望，并建议培养武装力量，以为革命后盾。他自称：本人出身行伍，原为木工，参加辛亥后宰门工兵营起义，与军界素有往来，愿在这方面出些力量，对革命重新做点事业。最后他谈到，如中共需要，他可以弄到一批枪支交工会备用。

文虎旋将谈话情形与守常商量，守常认为人家一片热忱，未可峻拒，但他们是政客，其动机如何还待研究。且此举关系我党大政方针，不知中央意向如何？文虎后将此事面告仲甫，仲甫微哂道：“此亦军人政客常套，何足重视，我看可以不理。你还是莫分心，走我们的路，做我们自己的事吧！”从仲甫平时的主张和谈话，知道他是认为党的中心工作应是组织工农斗争，等候将来时机成熟，接着便是武装暴动，革命就如水到渠成，自然成功。他还着意说道：“‘揭竿斩木’时至今日已过时了！”于是这个问题遂悬而未决。

此议虽被搁置，但在日常实际斗争中，武装问题仍感到十分迫切，思想矛盾，仍然存在，因此多数同志研究结果，最后酝酿成熟，乃在北方区扩大会议上正式把武装工会问题提出，要求通过讨论，作成决议，用文字写定下来作为以后工作准则。

北方扩大会议对于非武装斗争与武装斗争从理论与实践各方面进行广泛与深入的辩论，前者是指采取发动群众的革命号召行动而言，后者是实行暴力的夺取政权的斗争。通过辩论在主要问题方面取得了共同一致的认识：

a. 非武装斗争与武装斗争都是取得政权与巩固政权的重要手段，二者不可偏废。知其一不知其二，更是不对。

b. 武装斗争与非武装斗争应互相为用，缺一不可，并应平衡发

<sup>1</sup> 胡木功，即胡鄂公。— 补注

展，先后并用，互相补充，并行不悖，勿调失调，如此则事半功倍，收效显著，成功迅速！否则差之毫厘，缪以千里，不可不慎。

c. 依据上述原则应立即确定工作方案，成立专门机构，开展军运工作，并建议中央在全党推行，定为制度。

由此可见北方区委扩大会议对于军运工作的决议，是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与实践结合的一个重大步骤。

### 三、军运工作行动纲领

北方区会议解除了军事运动的思想束缚，并通过决议解决了有关重大原则问题，于是便进入行动实践阶段。

首先须提出第一期工作纲领与计划付诸实施，当时称为行动纲领，期于二年小成，三年大成。

行动纲领规定工作要点：

1. 中共建立军事运动委员会，各级党部设立相应组织机构，领导全党军运工作。

2. 培养一般军事人材，特别是军事优秀干部。

3. 建立各种形式的铁路、矿山、城市等工会的工人武装纠察队与农民自卫队。

4. 建制中共直属军队。

5. 从各渠道取得武器供应。

6. 组织兵变，瓦解旧式军队，建立革命新军队。

7. 最后配合全国性革命高潮，组织大规模的全国城市和农村的武装暴动。一举推翻中国军阀和帝国主义的反动统治，完成中国工农革命。

这个军运纲领是适应初期革命的基本要求。

### 四、中央军委及其基层组织

武装工农原则与纲领确定后，进一步就是建立专业机构及决定具体方案，按步骤付诸实施。现在扼要说明中共建立军运机构及其工作要领与轮廓。

中共自一九二三年成立新中央后，开始注意军运工作，酝酿培养军事人才，开展兵士运动，建立工会农会武装队伍，进行武装训练和斗争，南北各地区工会纠察队先后成立。于是工农武装斗争序幕次第展开。

建立专业机构就是从中央到地方建立一个军运工作网，各工作单位按照工作纲要推动工作。中央设立军事运动委员会（军委），在地方则设立分支机构。中央军委组织内容初期较为简单，后来随工

作发展需要，组织渐臻繁密，有组织、宣传、训练、参谋、作战、通讯、保卫、后勤、军医、情报、肃反等科组，内部人事亦日趋殷繁。

军委基层领导工作组织分布全国各地党委所在地，特别应该指出北方是极为重要的地区。因为北洋军阀统治全国，所以军事据点偏在北方。当时谚语流传：“北洋陆军多，保定军官多，河南、山东大兵多，烟台、福建海军多。”

北方区又是北洋军阀军事教育集中的所在，有清河陆军大学，保定军官学校，烟台海军学校等。此外在各省会则设有陆军预备学校、陆军小学、武备学校、讲武堂，随营学校与学生军组织等。因此北方区所属党支部中颇有不少受过正式军事教育的人员。北方区自一九二三年起曾在上述各校成立支部或小组，其负责人如下：

a. 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支部负责人张隐韬。

b. 烟台海军军官学校支部负责人郭守森。

c. 清河陆军大学支部负责人张维庸。

d. 湖北陆军预备学校支部负责人罗维坤。

各地区中共军委负责人：北方区，保定：张兆丰。张家口：韩麟符。天津：安幸生。唐山秦皇岛：王煜梅。广东：杨殷、周文雍。广西：谭寿林。江西南昌：赵醒侬。南京：陈寿昌。徐州：程协平。杭州：金佛庄。上海：顾顺章、陶静轩。武汉：许白昊。安庆：柯庆施。长沙：李子骥。济南：刘俊才。青岛：伦克忠。太原：郭增昌。洛阳：王中秀。西安：张和上（金刃）。黑龙江：李江英、赵坤太（女）。沈阳：马尚德。延边：童昌荣。重庆：杨谱公。昆明：张至刚。

军队方面、工人纠察队与农会自卫队各方面均有特派军事工作人员负责执行有关任务。

### 五、征用干部

在开展军运工作期间，必需征用多数干部，但军运工作本身具有不少困难。从事兵运工作正同过去开展工人运动一样，是有种种阻力存在的，首先是思想界的阻力。在长期专制政体下，中国旧思想界流行佛老哲学，惩愤窒欲，戒杀戒斗，知止不殆，知足不辱！人所习知。又历史上向来流行一种重文轻武的思想，儒家鄙薄军旅，善战者服上刑，墨家非攻寝兵，和平思想遂成时尚。因此，一般人民在旧社会日常生活情况下受专制政治麻醉宣传的影响大都倾向于和平生活，完粮纳税，安分守纪，逆来顺受，以徒苟安，非到忍无可忍的时候，决不铤而走险，犯上作乱，走向斩竿揭木的道路！



在上述种种否定人生，制止反抗的思想支配下，自然对于武装斗争是不感兴趣的，甚至认为是军阀思想，是意识形态落后。于此，还须着重指出当时北方广大知识分子阶层的特殊情况，藉以说明他们初期对军事工作所采取的态度。

如所周知：过去知识阶层分子要进入政治舞台，由于时代环境政体不同，而走向不同的道路。政治清明，社会秩序安定，政治更迭通常遵循和平途径；反之，政尚专制，军事高于一切，社会动乱，则通过武装夺权的道路。因此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以屈求伸，其所采取的方式是不一而足的。如伊尹吕尚号称帝师王佐，苏秦张仪则逞游说，曹操、黄巢仗剑起兵，以践高位，后代文人经过科举考试取得卿相地位，比比皆是。至于近代西方民主国家通过议会制度，执掌政权者，多属豪商巨富，情况又自不同。

中共成立初期，对于武装夺取政权思想还不很明确，直到一九二三年才有转变。在加强政治教育和宣传，长期耐心工作以后，知识界经过理论学习和实践，终于对军运工作获得正确认识，因此参加这项工作的人员数量不断增加。在大革命高潮，中共党员十余万，加这项工作的人员数量不断增加。在大革命高潮，中共党员十余万，加这项工作的人员数量不断增加。在大革命高潮，中共党员十余万，加这项工作的人员数量不断增加。在大革命高潮，中共党员十余万，加这项工作的人员数量不断增加。

## 六、武器供应诸渠道

干部问题解决以后，继踵而起的厥为武器供应。过去旧中国是专制国家，对武器控制与检查极其严密，但武器对于工农革命战线是须臾不可离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党委、书记部、工会、农会千方百计从各种渠道取得武器以应急需，其经过是很艰辛的。

一九二一年间，北方书记部多方设法从国外走私运来少量武器。最初托留法同学黄建中从巴黎邮寄来北京勃朗宁二支，其方法是将其藏匿巨型字典凹穴中，挂号邮寄北大图书馆王有德收。王收到后由文虎交付辛店使用，在痛惩工贼邓某搏斗中发生一定作用。

由于邮寄道远费昂，深感未便，后乃向海员总工会香港分会接洽，由当地过往香港的皇后号轮与总统号轮水手同志从英、美、法、西各港口买到的手枪带到广州，再由粤沪线海员工会负责人递送上海、天津交当地港口工会接收。

后来分别由伦敦 Livorpo、纽约、马赛、汉堡、马德里、横滨等地购进各型短射程武器弹药等分批带到中国。大致路线是先运到香港，然后再转内地。即由天津海轮水手均安会会员带到紫竹林

转致丰台车站交接，其中有白木柄手枪，轻巧灵便，每支附子弹百发。造价虽廉，但其有效射程与纯钢造者无别。分次交由唐山铁路矿工纠察队使用，由阮章经手。此项武器在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开滦矿山同盟罢工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后来张兆丰又从军队中购进手枪数支交书记部分发南口、石家庄工会纠察队使用，并送给守常一支自卫用手枪。后又设法从天津、大连、上海洋行方面分批购进效率较高的驳壳与左轮多支。虽价格高昂，但运取较便，不须求远。

北伐军到达武汉后，占领汉阳，湖北省委和兵工厂工会控制了汉阳兵工厂。当时该工厂生产武器能力颇高，所造枪支一部分由四军与八军分配，另一部分，由于中共湖北省委对该厂所生产的武器具有相当的分配实权，中共乃从该厂定期取得武器，用以武装工农会及军队。武汉工会、农会纠察队、自卫队枪支均由该厂取给，为数共达几万支。

又北伐军攻克武昌、汉阳，先后缴枪甚多，吴佩孚西逃时所遗武器亦多，后击溃夏斗寅师又缴枪二千余支。这些枪支均由湖北省委决定拨给叶、贺扩军之用。

## 七、革命新型武装工人纠察队与农民自卫队

在大革命时代，产生了革命的新型武装，这便是工人纠察队与农民自卫队，是一种崭新的创造性的革命武装。它是生产人民保卫自己的武装组织，是从革命群众中间生长出来的，所以他的性质与旧式雇佣军完全不同。它是保卫工会、农会切身利益的先锋战斗武装，是生产人民自己组织起来的，所以具有极其强劲的战斗力量。

### 1. 工人纠察队

工农武装肇始于一九二二年八月长辛店铁匠营。当时京汉铁路工会纠察队，其中以长辛店为最强大，郑州、江岸、石家庄等次之。在二七大罢工中，长辛店工会纠察队在文虎与葛树贵率领下，开进火神庙，与敌军展开浴血战斗。江岸铁路工会纠察队长曾玉良率领全体纠察队在福建街冲锋陷阵，与敌周旋。这些伟大斗争震动中外，人所共知。京汉沿路十六站均成立工人纠察队，英勇善战，如康景星、王忠秀等均作为工人革命献身，为工会做出重大贡献。

浦镇津浦铁路工会纠察队开始由王荷波、王仲一组织训练，战斗力极强，与当地铁路警察、保安队作长期斗争，对于保卫工会发挥着很大作用。曾用武力从敌人手中把被捕的书记部重要人员，抢救出险。济南大槐树武装工纠队由李宝成领队，四方工人纠察队由伦克忠统率，均英勇善战，驰名南北。

在全国各大城市总工会所组织的工人纠察队，其中以广州一九二五年六月省港大罢工为最著。当时省港罢工委员会在李森、何全、中夏、周文雍等领导下，成立了武装纠察队，坚持省港罢工，保卫工人权利，发挥了先锋作用，前后经过十六个月战斗。后来在广州暴动中，工人武装出击占领了敌军重要阵地。

武汉武装纠察队在蒋先云、许白昊领导下，是训练有素、武器精良、战斗力强大的一个联队。一九二七年一月冲破英兵防线，冒重大牺牲与英国海军登陆联队展开争夺租界的血战；终于击退英帝联队，收回汉口与九江的英国租界，雪除国耻，伸张中华民族正气。

上海总工会与吴淞铁路工会的武装纠察队是上海暴动的推动力量，由余立亚、陶静轩领导，占领闸北吴淞警署，俘降敌队，夺取枪支，勋劳卓著。

此外如河南总工会一九二五年在彰德、卫辉、郑州、洛阳等处组织工会，建立工人纠察队，战绩辉煌，遐尔共知。

唐山、焦作乃北方矿山工会最强大的工会，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唐山工会纠察队在长期同盟罢工期间与英帝国主义驻防联队、开滦保安队五千人长期对垒，保卫工会，牺牲浩大，有进无退，开矿工斗争新纪元。

焦作矿工纠察队于一九二五年在北方书记部领导下占领矿山办公大楼，由工会宣布管理全矿区行政，坚持五个月罢工，迫使英国资本家董事会完全瘫痪。

萍乡安源武装工人纠察队在战胜资本家后，参加湖南秋收暴动，破坏长沙、株州铁路，一九二七年九月由王先亚领导响应工农暴动，攻占老关、醴陵，进军浏阳，战绩辉煌，成为秋收暴动主力。

湖南新化锡矿工会纠察队为湘西地区工人武装中心力量，在一九二七年由刘炎与邹剑武为队长，率队出击，威震湘西。

全国南北各省工人纠察队合计人数约二万人。

## 2. 农民自卫队

大革命时期，在广东、湖南、湖北、江西、河南、安徽等省先后成立农民协会，其所组织的武装农民自卫队总计达十万人。

一九二六年五月广东海陆丰农民协会有会员十二万人，在彭湃、杨劳工、周其鉴领导下，组成农民自卫军五千人，与当地地主民团开展斗争，非常激烈，并将区、乡、县反动政府权力全部推翻，成立苏维埃政府。过新年时，农民政府门口有大幅标语：“欠债欠租，将刀还尽。有枪有炮，快乐过年！”

一九二七年，湖南省各县普遍成立农民协会，代替乡县政府执行行政权，各县农民协会十万余人，由滕代远、陈虞卿等领导。

湖北省农民协会在全省范围内，组织了农民武装，由陈荫林、陆春山领导。

此外，安徽西部与河南东部亦有强大农民武装队伍，由郑芹瑞、钱伯符等领导。为鄂豫皖农民起义主力。

## 八、政治与军事训练

练兵方法首重树立革命思想，次为建立铁的纪律，高度提高军事战斗水平。旧式军队雇佣思想浓厚，以官统兵，层层隶属，盲目服从，其缺点甚多，易召瓦解。革新方法主要在军中连、营、团、师建立各级党的组织，建立党支部，作为全军领导，实行党指挥军，藉以巩固军队组织与纪律，提高战斗效能。在基层设立士兵委员会，实行民主，生活平等，军官与士兵同甘苦，共患难，藉以提高士气，巩固团结，共同赴敌。

军队组织其核心为党支部，群众组织为士兵委员会，二者辅车相依，并肩前进，才能把军队建成一支强有力的战斗集体。支部组织原则，要求实现政治坚定，组织巩固，军事技术高标准等条件。

号称铁军的独立团（原第四军三十四团），其练兵方法即循此原则进行。独立团党员数量与质量有相当基础，排连营团党组织严密，政治生活浓厚，纪律性特佳。由于平日训练有素，故北伐以来各次战役中冲锋陷阵，无坚不摧，迭克名城，奠定了武汉政府的基础。独立团攻克武昌苦战月余，牺牲官兵七十余人，绝大部分为党员与团员。独立团在保卫武汉战斗中，歼灭强敌的光辉范例，这些成就并非偶然，乃几年来进行艰苦政治与军事训练的丰硕成果。

武汉政府时代，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党与共青团支部组织足与独立团媲美，最初直属武汉中央分局管辖。军分校支部委员为：李鸣柯、俞庸、陈庚、陈毅安、赵坤泰（女）、罗章凤等。

当时武汉政府范围内，军队营团以上均建立中共党支部。如二十军支部委员为周逸群、段德昌。警卫团支部委员为卢德铭，三十三军支部委员为耿伯钊等。

关于常规军事训练，一九二七年间，中央曾在各大城市设立工会训练班，学习军事技术，令工会纠察队干部轮流参加。后又设立临时性军事学校培训工农武装干部。此外各工会纠察队就地设立军事训练班练习射击、掷弹等技术。当时广泛设立工农训练专科学校，其中武汉创办规模较大的工人运动讲习所（汉口黄陂路）与农民运动讲习所（武昌都府堤，从广州迁来），均发给汉阳造快枪，进行常规训练。

为了培养高级军事专才起见，又分批派遣军事干部出国深造。

一九二七年奉派出国赴苏学习的学生八人，决定步兵学校二人：刘伯承、◇◇◇；炮兵学校二人：罗章凤与朱瑞；空军学校二人：常乾坤、◇◇◇；军事工程二人：王弼（江西永修人，一九二五年经赵醒侬介绍入党，后任空军副司令）。

海军方面初无基础可言，南方广东政府原有少数舰艇，一九二五年成立海军局，以苏联海军顾问任海军局长，李之龙任中山舰长。中山舰为当时最大军舰，大炮多门，火力极强，其它次要舰艇亦有中共党员任领导职务，兼负军政训练事宜责任。

由前所述可见，大革命时期中共建成的军队是自建党以来长期间艰难缔造的成果，并非一手一足之烈所造成。中共建成的军队，虽尚在初期，存在若干缺点，但确与军阀旧式军队迥然有别。毫无疑问，它是当代工农革命的中坚力量，至于后来运用如何，另是一个问题。

### 九、兵变纪要

近世纪来，兵变频仍，其规模较大而且有实际政治意义的兵变往往为朝代兴亡、政权更迭的推动因素。如辛亥武昌工兵营兵变，蔡锷率滇军在云南兵变，可为显例。

中共军委致力于兵运，其主要任务之一即在策动兵变，藉以推翻旧统治，建立新政权。在长期的军运工作中爆发过大小不同的兵变，分记如下：

1. 平江兵变：一九二八年五月，湘鄂赣边区特委书记滕代远（湖南麻阳人，原湖南长沙农民协会主席）到上海中央报告当地政治军事情况，会见文虎，请求加派干部到湖南工作，当商定回湘策动兵变方案。

一九二八年七月，滕到平江晤黄公略，七月二十二日发动平江兵变。先是湘军第五师第一团，原属三十五军第一师师长周盘，有士兵一千余人，另有随营学校学兵二百余人。一九二八年五月底开赴平江剿匪，六月到达平江，驻天岳书院。时平江县狱有政治犯八百人。彭见每日处决青年学生甚多，愤不能平。彭本人思想既左倾，平日对黄公略言听计从，湖南中共省委乃于七月间派滕代远前往该团担任政治委员，负责组织士兵暴动。当时平江县委如张警吾、胡筠、张斧等，当介绍滕代远与彭德怀接谈，结果，决定藉索饷为名（时军中已欠饷达十四个月）于七月二十二日下午一时发动暴动。同时黄公略在平江嘉义市率领第三团第三营全体官兵响应兵变，开进平江城内。会合彭团成立工农红军第五军第十三师，共编一、四、七三个团。长沙敌方闻讯，急派军六个团前往平江进攻，彭因寡不

敌众，乃率军向黄金洞撤退。十二月彭率军退出湖南，到达井冈山，红五军乃扩充为红第三军团。一九二九年红五军主力由井冈山回到平江浏阳，攻占平江县城，成立全县苏维埃政府，其经过见滕代远致文虎、虞卿信。信全文如次：

文虎、虞卿二兄：

七月四号我军攻克岳州，击溃王逆东原一旅，缴获步枪四百余杆，子弹百余担，水机关枪六架，子弹五十余担，迫击炮弹百多担，其它军用品很多。计此次在岳实筹得现款三万余，对粤汉铁路工人，人力车工人，码头工人、店员、剃头工人，缝纫工人，泥木工人均有很好的组织，并将樵运局所存之官盐，一律没收，散发给群众。帝国主义兵舰三艘，飞机数架，与我军激战两日夜，均被击退，增加我军无限的勇气与对帝国主义残杀我工农更有深刻的认识。我第三军团军近在湘鄂赣边境征集志愿兵五千，加紧训练，拟在本月夺取长沙，以完成夺取武汉的任务。现在已与独立师集中，与我三六军取待联络，并配合湘省的千万的劳苦工农群众，夺取长沙的任务，不日可以到达，因为张桂军阀闻我军攻下岳州，积极反攻，有已到湘乡永丰一带云，长沙驻的白军不过三团，株州、醴陵也不过二团白军，浏阳仅残敌二营。平江诸县的地主武装已日益溃散，每日有十余枪兵来投红军，难匪豪绅走往长岳者，因找不到饭吃，每日饿死数十人，真自寻死路了。附告完

滕代远七月十二日下午七时于平江紫云公馆  
回信请寄平江紫云公馆龙兆收（一九二九年）

[注]：一九二八年五月，滕代远到上海中央，回湘后发动平江起义，一九二九年率红五军主力回到平江，此信系由平江发寄上海邮政信箱四十四号。

### 2. 西京兵变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西安发生兵变事件，中外震惊，视为重大新闻，其经过曲折多变，波诡云谲，极为复杂，因此外间传说纷纭，真相反被掩盖，兹纪其源起演变于次。

先是中共北方非常委员会于一九三三年后迭次发生破坏案件，“北方会议”后，由于党内残酷斗争，内奸告密，曾遭到华北反动政府重大摧残，北方区委因此先后入狱者为数极众，如王荷波案十一同志被害，王仲一等先后牺牲外，尚有一部分政治犯刑期满后获释，留北方及东北继续工作，更有一部分同志，转辗进入东北军内建立地下支部进行革命工作。当时东北军主帅为张学良。张自九一八事变东北地区沦陷后，率所部三十余万军队退入关内，驱防西北。

张驻军西北，寄人篱下，时感不安，历时既久，军心怨望，其非委同志向张建议，发奋图强，自力更生，张甚为感动，但隐忍待时，以期策出万全。

在东北军非委地下工作者惨淡经营地从事组织工作，直到一九三六年才获得进展，进入具体部署阶段。

一九三五年夏<sup>1</sup>，文虎在河南大学任教，暑假期间往青岛避暑，寓汇泉山东大学，北大旧同学李爱夫妇来访<sup>2</sup>，原来李爱此番来青访文主要是报导东北军方面同志工作情况。她说：北方同志前后到达西安工作者已有数十人，张汉卿对天安、汝铭、希夷等<sup>3</sup>均十分器重，并向他们学习革命理论，商讨政治问题，天安现任机要科长，铭任秘书，其它诸均各尽其才。她说：“汉卿曾询伊您在何处？伊以实告。汉卿旋即语伊希望见面，谈谈诸般问题，以解所惑。”三人商议结果决定推李爱出关一行，这就是她们来青岛的使命。李爱继续说道：汉卿为人通达事理，近来倾向革命，主张打破现状，亟思冲决网罗，为革命出力。察其为人，可与共事。他现有精兵三十万，武器精良，训练良好，久戍思归，梦寐不忘北大营，但不知计将安出？西北军数万人情况相同，现在杨处工作亦极顺利。文虎沉吟一会，正容答道：“汉卿身居西北，举足轻重，关系全局，极能有为，宜从政治思想、组织宣传各方面下一番功夫，方能水到渠成。”李爱道：“诚然如此，但我们的力量却提掣不起来，不免有些着急哩！”文虎说：“事宜迅速以赴事机，同时应计策万全以防内奸，你回去代我致意同志们，选定好一个大题目，定能做出一篇好文章来……”谈毕李爱即启程回陕覆命，文旋亦离青岛返汴。

一九三六年春，汉卿忽来河大见访<sup>4</sup>。张来时轻车简从，见面略事寒暄，互致问候，随即开始谈话。

他开门见山说道：“我此来系专程拜访，希望彼此谈谈关于打开目前政治僵局的问题，并为今后双方合作奠定基础。”这次彼此对话范围涉及很广泛，他坦率地申述了个人对目前政治的抱负与企图，毫不含糊。

1 整理者认为罗章龙有意将密晤东北军有关人员的时间写错。——编者注

2 李爱夫妇，即李渤海（又名黎天才，时为张学良心腹，主管张部机要，并任东北军政训处副处长，少将军衔）孙善缘夫妇。经查，罗章龙去青岛密晤黎天才在1936年夏。

黎于1949年8月写成“黎天才自传”（香港银河出版社2000年版《西京兵变与前共产党人》一书已刊载），详言在张学良处策动兵变之内情，并言曾推荐罗章龙参与东北军政治工作。——补注

3 天安，即李渤海（黎天才）；汝铭，即吴雨铭，又记作蔚茗、雨名、汝明；希夷，即李希逸（秋生），又记作琦逸。——补注

4 经查史料，张学良往开封密晤罗章龙在1935年4月23日。——补注

从这次谈话以后，西安与开封双方信使往还络绎相属，最后初步决定两项计划，其一为兵变方案：动员全体官兵自上而下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实行兵变，拒绝独夫一切命令视同非法，并以武力逮捕元凶，迫其就范。兵变完成后，即通电全国讨贼，联合全国各界民众力量成立全国民主政府，对内实行民主政治。对外联合各省军政实力，出兵抗日，收复东北失地。

第二步为建设方案，主要以重兵分据陕甘四川地区，利用关中、汉中、河西、成都殷庶人力物力，实行改革内政，发展经济文化，达成富国强兵，经济自给自足，争取成为全国政治经济模范重要地区，如此进可以战，退可以守。并根据此项原则作出具体详细方案，以便分期付诸实施。此项计划系由琦逸、汝明等往返磋商拟定。

一次，文虎自开封与蔚茗同车赴华清池，经风陵渡口占诗云：晓行原野警经过，驰骤风烟渡大河。东望潼关西太散，商鞅前事感人多。诗中意旨即与此项设计有关。

十二月上旬，普爱密筒报道：“众意已决，立即付诸行动！”越二日而兵变爆发！官兵三十万人全体参加。在兵变爆发前一日，黎天才曾带领西安工农学生群众队伍到临潼示威，当面申斥蒋介石独裁误国<sup>1</sup>，违反民意。十二日，两名曾随军到骊山拘捕蒋介石，推入囚车，押解回西安。（蒋部警卫团全部缴械投降。）

骊山兵变发动，元凶就缚，万众腾欢，象征中国革命的新生，民众命运的再造，确属中国近代史上的空前伟大的壮举！

西安兵变如按原定步骤，按两项计划顺利推行，则中国革命任务可望提前十年完成。（待续）<sup>2</sup>

### 3. 其它兵变：

上述兵变之外又如：一九三二年九月，哈尔滨镇守使丁超部队有三十余个中共党员士兵的支部，书记江英与支部委员纪南等组织兵变，深夜拉出一部分队伍入大兴安岭游击。当时江英有报告给非委中央报告兵变经过。后来与马尚德、童昌荣、赵振泰联合组织抗日联军。

在大革命期间，中共北方区党员彭泽湘、徐鸿铭、郭名忠在广东军队中工作，一九三五年实行兵变，在漳州成立反对南京的人民政府，旋失败。

一九三一年在江西方面通过北方区通过师大支部同志在赵博生等部队中建立党小组，并进行组织宣传工作，后来改编为第二十六路军开到南方作战。一九三一年十二月该军三个师，一万七千人在

1 经查史料，黎天才与蒋介石对话在12月11日晚。——补注

2 原文如此，“待续”的整篇文字未见，零散札记见本篇“附录”。——补注

宁都发生兵变。

此外尚有河北阜城兵变，山东益都兵变，南京下关兵变与江苏宜兴兵变等大都由中共北方区所属军委领导党员发动，其中成败互见，影响不等，未遑悉纪。

附录：罗章龙谈西京兵变（资料综合）<sup>1</sup>  
（《大革命时期中共军运工作纪略》（摘录）、《罗章龙自传》（摘录）<sup>2</sup>）

### 一、“回忆片断——西安事变前与张学良的接触”<sup>3</sup>

1936年

汉卿来汴，“代表东北大学，请您讲学。”说罢，秘书面交东大聘函而退。按当时习惯，接受聘函，即表示同意，文虎当即允诺！

双方谈话开始，他介绍东北大学情况，同时又涉及大学学制改革问题，渐渐转到国内外政治问题，从开发西北问题到国际旅行问题均极感兴趣（他从国外旅行考察回国不久），等等，对方着重申述个人抱负与胸怀。这次会谈增进双方理解，为进一步合作奠定了基础。

临行握手道别，并盼早日启程，以孚众友人期望。

张去后，西安方面旧友闻讯来汴者络绎相属，多年书斋生活，顿成一片繁忙景象。

文虎考虑到礼尚往来，应当到西安回访一次，以观究竟。

西安本文旧游之地。一九二二年陇海铁路罢工胜利同和棣来到观音堂，随后进入西安。当时主要工作在于解决关中渭南绥德等建党问题。今日重来，已是山颓梁朽，今昔异势。

文虎抵西京时，会见旧友诸人。由李同志<sup>4</sup>夫妇作东道，约往玉楼东聚餐，赴宴者二十多人，判袂十载，劫后重逢，另有一番快慰情景，难以言宣。饭后驾车出游，参观下马陵、杜曲、灞陵、沉香亭、大小雁塔，并游骊山、临潼诸胜。旋吴李陪同往见汉卿于其私邸，张降阶迎入，屏退左右，开始谈话，军人风度，态度诚恳，对提问似均有所准备，彼此畅所欲言，毫无拘束，但语句却有斩断，毫无官场积习，最后他说：“千言万语，最后必须付诸实行。我意已决，以后希望随时聆教……”

文虎应约在东北大学礼堂作了一次讲演，听众约五千人，座不虚

<sup>1</sup> 根据罗章龙后人提供的资料汇编，其中有罗自撰的成篇文稿，有未完的遗稿手迹，还有其后人的补充文字。— 补注

<sup>2</sup> 作者在本章第九节《兵变纪要》和《罗章龙自传》另有关于西安事变（西京兵变）的文字记载，此处不再摘录。— 编者注

<sup>3</sup> 根据罗章龙遗存资料（编号BE1-017）录入，标题后加。— 补注

<sup>4</sup> 李同志，可能是李渤海。— 补注

席，室外无隙地。讲毕摄影留念，并设宴款待，作陪者均总部及东大行政教务人员。翌日，老吴<sup>1</sup>来谈，副帅约往游华山，文以道远跋涉为念，吴答“此去不需步行。”文问：“将取何道？”吴云：“不烦多问，到时便知！”乃随往见汉卿，他笑道：“我们一道乘座机去吧。”

是日天气晴朗，微风淡荡，视线极佳，汉卿亲自驾飞机，起飞半小时后，即出潼关，乃绕华岳低飞数匝。但见东西北三峰参差起伏，如儿童玩具积木，错落其间，远眺黄河如带，自北而南，飘然一线，苍龙岭、千尺幢、老君犁沟一瞥而逝！崤函伏牛诸山，状如蚁垤，偃蹇无息，叹为观止！

三人同游览，半日方归，时已西风夕照，暮云重重，秦岭巴山，渭桥王曲，咸阳历历在望，瞬息间消失，阿房未央，建章长陵，均已渺不知其所在！

座机在西郊机场降落，驱车进城，晚宿东北大学校园。当年文虎逗留西安十余日，乃辞别东归，旧友新知纷纷到车站送行，珍重道别。此时王珊<sup>2</sup>同志用老朋友口气向文虎进言：学术贡献，口有将来，挽救时局，迫于眉睫，孰轻孰重，应加权衡。文虎不便多言，颌之而已，遂登车东返。

文虎返汴后，西安方面先后派遣使者数辈，来河大接触，一般均系晚临早归。在十月十日前夕，最后见到尉名<sup>3</sup>，亲临水车胡同<sup>4</sup>。她辞出西归，越二日而兵变暴发。（从此以后，又经过十年文虎始重临西安。）

### 二、《关于“西京兵变”之补充》<sup>5</sup>

罗章龙是西安事变的幕后者。北方非常委员会李渤海（黎天才）、吴汝铭（雨铭）、李希逸、孙菩缘等二十多人是张学良的智囊团。

1931年，中共非常委员会成立。北方非常委员会李渤海等人被捕入狱<sup>6</sup>。在狱中，李给张学良写万言书<sup>7</sup>，张阅后大为赏识，将这些中共党员释放并安排重要工作。李以后多年担任张学良政治秘书。张学良被这些青年的爱国热情和革命理想所感动，他想成为一名革命者，改造中国社会。他请中共党员吴汝铭担任他的马列主义教师。吴汝铭1921

<sup>1</sup> 老吴，即吴雨铭。— 补注

<sup>2</sup> 王珊，待查。— 补注

<sup>3</sup> 尉名，即吴雨铭。— 补注

<sup>4</sup> 水车胡同，罗章龙开封寓所地点。— 补注

<sup>5</sup> 罗章龙先生生前从未对外人流露过自己与西安事变的关系，仅晚年时同家人谈过。他的后人根据其口述回忆，作了“关于‘西京兵变’之补充”一文，写于90年代中期，当时罗章龙仍健在。此为修改稿。— 补注

<sup>6</sup> 李渤海被捕在1927年秋。— 补注

<sup>7</sup> 李渤海曾主动向张作霖上书，后向张学良上书为应询而答。— 补注

年在长辛店办工人夜校，1927年曾任中共汉口市委要职，是罗章龙的忠实助手。此外还有李希逸、孙菩缘等二十多人。

罗章龙于1934年通过原北大老师、时任河南大学的杨丙辰进入河南大学经济系任教授。他的老部下李渤海、吴汝铭、李希逸等人请他到西安东北大学任教，以共谋大事。

1935年<sup>1</sup>，张学良专程去开封河南大学拜访了罗章龙，谈论了当时的时局，听取了罗的建议。

1936年，罗带学生去西安实习，再次见到张学良。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这与张学良的智囊团李渤海（黎天才）等二十多人有很大关系。

国民党代表张冲原系中共党员，知此内情，专程去河南大学找罗，要罗作为领导下放蒋手令。<sup>2</sup>罗不想写，迫于在蒋统治区域，只好写下“解铃系铃”四个字，张冲满意而去。

以后的情况由于交通阻断，罗与张智囊团的二十多人联系中断，罗后来去了陕西汉中城固西北联合大学执教，从此不问政治。

李渤海、吴汝铭简历可参考《战斗在北大的共产党人》<sup>3</sup>一书。

（李渤海、吴汝铭解放后去世。李希逸任香港时报社社长，退休后退居美国十余年。）

### 三、罗章龙遗稿片断（十三件）

#### 第一件：<sup>4</sup>

徐老<sup>5</sup>谈在西安时得到勃海<sup>6</sup>协助，才进行东北军内部工作。西安事变幕后人物，外间知者极渺。

#### 第二件：<sup>7</sup>

一九〇〇年十月，西安事变发，汝明<sup>8</sup>实预其谋。先是张汉卿为返复东北，整军经武，访求贤达，闻汝明深博通革命政治学，并有革命

1 据报载，张学良1935年4月23日午前因公务到开封，当晚曾去河南大学。—补注

2 据记载，张冲于西安事变中也是被扣大员，放蒋之后才获释，于1937年1月上旬以后到过开封，详情待查。—补注

3 王效挺、黄文一主编《战斗在北大的共产党人（1920.10—1949.2北大地下党概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6月版。—补注

4 手迹件（整理编号NAN-1067），80年代以后。—补注

5 徐老，即徐彬如（文雅），西安事变前在西安，为中共西北特别支部成员，建国后长期担任中国革命博物馆馆长。罗章龙晚年任该馆顾问。—补注

6 勃海，即李渤海。—补注

7 手迹复印件（整理编号BEI-001），80年代以后。—补注

8 汝明，即吴汝铭（雨铭）。—补注

实践经验，聘其为本部秘书，日夕过从，密谋兵谏，并派遣吴为密使，赴汴、郑等地联络。后并亲自偕陈辞修<sup>1</sup>……

#### 第三件：<sup>2</sup>

1936年，暑，汉卿经扶<sup>3</sup>同来访问河大，一周后慰名<sup>4</sup>来开封，携来东北大学聘书，同车往西安报聘，事毕返校。

#### 第四件：<sup>5</sup>

大事记 1935年 河大 Tilenz事件<sup>6</sup> 魏郁被逮<sup>7</sup> 云特来晤 迪恭来晤<sup>8</sup> 汉卿晤 青岛饭店谈话 西安行<sup>9</sup> 希逸置宴玉楼东<sup>10</sup> 华山谈座

#### 第五件：<sup>11</sup>

西望普瑗<sup>12</sup>，想华岳之俊秀；

北怀益曼<sup>13</sup>，见长白之精英。

肝胆郁其轮困，同舟共济；

雷霆走其英锐，白水盟心。

盖纪实也。（见天放<sup>14</sup>书语。）西京军事受挫，影响全局，当时天放致文虎书，深怀感慨。

1 陈辞修，即陈诚，所述史事不详，待考。—补注

2 罗后人电脑打印件（整理编号BEI-002），80年代以后。—补注

3 经扶，即刘峙（经扶），时任河南省军政长官。—补注

4 慰名，即吴雨铭。—补注

5 手迹复印件（整理编号BEI-004），80年代以后。—补注

6 Tilenz，即狄伦子，河南大学德籍教授，1936年5月31日晚被暗杀，案由不明，详见是年6月《中央日报》、《河南民国日报》之报道。—补注

7 魏郁，即何文，河南大学经济系女学生，曾随罗章龙往青岛。—补注

8 云特，即邓拓，当时为河南大学经济系学生。迪恭，即吴迪恭，“五四”前后与罗章龙同为“辅仁学社”成员，1921年前后曾在长辛店工人夜校，与吴雨铭（慎恭）之关系待查。—补注

9 青岛谈话指1936年夏在青岛与黎天才、孙菩缘的谈话，黎、孙时住青岛饭店。西安行指1936年去西安。—补注

10 希逸，即李希逸。—补注

11 手迹复印件（整理编号BEI-007），80年代以后。—补注

12 普瑗，即孙菩缘，黎天才夫人。—补注

13 益曼，即赵一曼，曾与罗章龙共事，由罗所领导的全总派往东北从事武装斗争，后牺牲。—补注

14 天放，即宋天放，湖南浏阳人，罗章龙少年时好友，乡塾至大学时同学，20年代参加中共。—补注

第六件：<sup>1</sup>

一夕，忽有客临水车胡同来访，女仆应门通报，知系张冲<sup>2</sup>。令延入，见张披皮大氅，御长马靴，满面风尘。入座不及作寒暄语，即直陈来意。文聆张所提要求，颇觉为难，半晌不声。时刘鄜在场旁听，因述二人对话，主要如次：

文冲对话时，冲白文云：“不辞千里访公，请求一言解纷。”文迟不作答。冲坚自陈：“程婴杵臼<sup>3</sup>，愿力任之。”文答：“纵虎归山，汉卿不利。狐埋狐掘，吴李难堪<sup>4</sup>。”

冲坚请作书给海<sup>5</sup>，文勉书一语付之：“解铃系铃，凭君自主。”

……

冲乃辞出。

第七件：<sup>6</sup>

李园<sup>7</sup>说，当年自荷波<sup>8</sup>北来，北方形势急转直下，廖乾五、刘少奇投乱于前，傅茂公<sup>9</sup>继踵于后，于是“非委”干部仲一、汝名、李园<sup>10</sup>诸人全部陷狱。在长久监狱生活中，前仆后继，死伤山积，王仲一死于狱中，李园、汝名、希以等均无生还希望。由于当时张汉卿本于人道精神，后来释放了一批政治犯，李园、汝名、希逸等在内。张并约他们个别谈话，奋发有为，以礼相遇。思引为臂助。吴与李均北大同学，张另眼相待。李<sup>11</sup>擅长文学书法摹北魏，文宗盛唐，下笔千言颇擅文采。曾任北方书记部秘书，《工人周刊》编辑，兼相貌出众，能干有为，张极……

第八件：<sup>12</sup>

一夕话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黎天才以政训处副处长身份到了南京活动，

1 手迹复印件（整理编号BE1-008），60年代以后。—补注

2 原手稿为“章中”，系张冲之谐音，前后共八处，整理者恢复其真名。张冲时任职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中统），为国民党与共产党谈判代表。—补注

3 杵臼，即公孙杵臼，与程婴同为春秋时晋人，为救赵氏孤儿，杵臼死，程婴隐居。—补注

4 吴李，即吴雨铭、李渤海、李希逸等。—补注

5 海，即李渤海。—补注

6 手迹复印件（整理编号BE1-009），70年代以后。—补注

7 李园，即李渤海、孙善缘。—补注

8 荷波，即王荷波。—补注

9 傅茂公，即彭真。—补注

10 仲一，即王仲一。—补注

11 李，即李渤海。—补注

12 手迹复印件（整理编号BE1-012），80年代以后。—补注

通过董霖为张汉卿竞选国民党中央委员，获得成功，张从此进入中央委员会。在四届六中全会上，张汉卿与张继二人当场擒获了行刺汪精卫的刺客，名振一时。

第九件：<sup>1</sup>

在西安兵变中，把宪兵二团团长刘镇亚、三团团长蒋孝先、西安电报局黄念堂（通敌）三人，立即问罪枪决，扣留南京战斗机◇◇架，南京重要文武官员◇◇人。

第十件：<sup>2</sup>

蒋住临潼，当地为一〇五师刘多荃防地，旅长唐君尧、营长王玉璜均在附近驻扎，行动负责人为卫队二营营长孙铭九，同往者有白凤翔。事先商定向全国通电提出“八点主张”，电文由黎天才执笔，修改文字后发出。

第十一件：<sup>3</sup>

中共党员张金刃为首领导，在十七路军工作的主要有徐维烈、张子奇等十余人。一九三一年张金刃在北平组织过“非委北方办事处”。在张学良政训处的中共党员，有黎天才、李希逸、吴雨铭、叶善之、曹竹东及安律师等二十余人。

第十二件：<sup>4</sup>

商定方案，善缘回家报告汉卿，由汉卿亲临开封相晤，面谈下期开学即赴东大讲学，并与大家见面即长期留东大任教。

文回汴后，吴洽子<sup>5</sup>即被派到开封，报告东大详细情况，并称下周×日汉卿即当亲至开封。

到期校长室秘书虎辰通知：省府电话，今日上午刘经扶<sup>6</sup>偕副帅来校参观，校方设席招待贵宾，请文出席作陪。文乃前往见面，刘郑重介绍后二人邻座，谈话内容多为大学教育问题，语不及他。

宴毕，汉卿轻车简从，作深谈，因请往东大任教。文原则上同意，但需要商得河大同意。临行约一月以后在西京见面。

从吴处了解到东北内幕……

1 手迹复印件（整理编号BE1-013），80年代以后。—补注

2 手迹复印件（整理编号BE1-014），80年代以后。—补注

3 手迹复印件（整理编号BE1-015），80年代以后。—补注

4 手迹复印件（整理编号BE1-016），80年代以后。—补注

5 吴洽子，即吴瞎子，吴雨铭绰号。—补注

6 刘经扶，即刘峙。—补注

炎<sup>1</sup>云：“此事大体可行，但杂有沙砾眯目，视线不清。”  
筑室道谋，事权不一，所以可虑。

第十三件：<sup>2</sup>

文学院学生 曹子建流亚人物 擅长古典文诗词 书法宗北魏 易名黎天才 年二十四 时称北大英才 非委砥柱 与韩令夫齐名 当代十才子

西装革履 仪表非凡 北大英才 北方言语流利 非委科长 书法北魏碑 得其神似 诚非委奇才

九人：渤海 善缘 迪恭 慎恭 希逸 峭寒 石珍 刘炎 梅根  
此君品质恶劣 索工卖友求荣不可与谋大事 更不可与共患难

原定我计划 发表宣言 问鼎中原 卅三万貔貅 师向沈阳 问鼎金陵 三分鼎立 安内攘外

四、谈话记录一则

1981年12月22日谈<sup>3</sup>

西京

李渤海（黎天才）——机要科长，吴汝明——秘书，李希夷——老师。希夷有肺病，49年出国，生死未知。吴瞎子（汝铭）解放后在狱中去世。

五、李希逸先生名片<sup>4</sup>

李秋生

香港时报社社长（退休）

社址：香港高士打道六四一六六号华夏大厦

电话：五一二七九三二一一四

Mr C S Lee

59 Macnb Ave

Cedar Knolls NJ 07927-1564 (U. S. A.)

1 炎，即刘鄂。——补注

2 手迹影印件，90年代初。——补注

3 在北京与家人所谈。见于罗××记录本。——补注

4 李将此名片上的香港地址、电话划去，手书美国通讯地址，并在“香港时报社社长”后加“（退休）”二字。——补注 / 编者注

同时名片两面分别有李先生亲笔附言：

敬候

文虎兄起居

弟李秋生拜上

（希逸）一九九二、一、廿九、

1936年西安一别，已近一甲子，每忆故人，不胜怅惘。尊况偶由报章获悉。旧日同侣，殆仅存兄与弟二人。弟栖迟美邦，已逾十载。幸儿女贤孝，衣食无虞，过着半隐居生活。谨以张君<sup>1</sup>之便，顺致拳拳，尚希垂馨！

弟秋又

<sup>1</sup> 张君，据罗章龙家人言是张魁堂先生（原全国政协西安事变组组长，1994年12月病故）。张先生拜访罗章龙时曾留下便条：张魁堂 府右街135号（100031）电话655141（晚上一股在家）——补注



## 八、回忆国立湖南大学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会<sup>1</sup>

解放战争后期，在当时的湖南大学曾经建立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会”，学会在团结湖南大学的上层知识分子，研讨、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等方面，都有着明显的作用。我当时正在湖南大学任教，始终参与其事，现就回忆所及，对当年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会的建立、成员、活动及历史作用等方面情况做一简单介绍，脱漏、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求正于广大读者。

### (一) 学会成立的缘起

我于一九三五年起在开封河南大学经济系任教，讲授的课程是经济学类，其中有一门叫做“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未几，日寇进犯中原，河大南迁，先到豫南鸡公山，为时一学期。后北平各高校亦部分南迁，遂转抵陕西城固，成立了西北联合大学。一九三九年我应西北联合大学之聘，一度担任经济系主任。城固地处偏僻，对外联系与交通均阻塞，加之日本侵略者实行经济封锁，致使物质生活十分艰难，但师生仍在困苦环境中坚持教学活动。

我在西北大学十年，教学而外，主要工作为从事建立中国经济科学的学习活动，略有成效。一九四五年日寇投降之后，我应湖南大学校长胡庶华之邀，由西北大学回到湖南长沙，亦执教于经济系。

湖南大学的前身是岳麓书院，如上溯到古代之岳麓书院则至今日

<sup>1</sup> 根据罗氏后人提供的抄件录入。原稿写于一九八五三月。抄件另附八页初拟手稿，文字虽散乱，但仍有价值，参照抄件内容后做补录：凡抄件已存相关内容则不再复录，凡抄件未录部分，则置于相关文字之后，采用仿宋体以示区别，并以括号标明。一补注

有一千年历史了，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一座学府，科系众多，组织完善，教师阵容亦颇强大。经济系又是一个大系，师生人数很多，教课人员队伍比较充实。到一九四八年夏季，解放战争已近尾声，长沙城内革命与反革命势力的斗争格外激烈；国民党反动派面临覆灭，图最后的挣扎；我地下党组织活动更加活跃，和平解放正在酝酿之中。此时，岳麓山下的湖大校园里的政治形势亦有变化。一些思想比较开明的老教授及中年教授，常常暗中聚集一处，互相交换对于时局的想法，交流从多种渠道得来的解放战争胜利消息，更三三五五在一起预测将来解放以后的情景，自然也就涉及对我党的理论基础——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的探讨。这一切虽是自发进行的，却萌动着一种新的政治倾向与要求。这些，都使我们深深感到有引导和提高这些认识的迫切需要。于是，以我所在经济系全体教师为主，发起了组织湖南大学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会的活动。这一行动获得了校内许多方面的支持，随即广泛地联合了全校十几个系的教师，大家共同努力，建立起一个规模很大的学会，全名即是“湖南大学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会”。这个学会旨在提高会员的思想，宣传、普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说。在这些方面，它都是与一九二〇年建立的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一脉相承的。

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一九二一年公开活动之时，是由十九名同学发起的。当时曾发表启事并在校园内张贴，启事的内容略为：

马克思学说在近代学术思想界底价值，用不着这里多说了。但是我们愿意研究他的同志，现在大家都觉得有两层缺憾：（一）关于这类著作博大精深，便是他们德意志人，对此尚且有“皓首穷经”的感想。何况我们研究的时候，更加上一重或二重文字上的障碍，不消说，单独研究是件比较不甚容易完成的事业了。（二）（略）

我们根据这两个要求，所以各人都觉得应有一个分工互助的共学组织，祛除事实上的困难。上年三月间便发起了这一个研究会。现在我们已有同志十九人了。……我们的意思在凭着这个单纯的组织，渐次完成我们理想中应有的希望。

现在谨致意校内外的同志们，盼望你们热心的赞助，并欢迎你们加入共同研究。今将我们暂拟的几行规约写在下面：

- 一、本会叫做“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以研究关于马克思派的著述为目的。
- 二、对于马克思派学说研究有兴味的和愿意研究马氏学说的人，都可以做本会底会员。入会手续，由会员介绍或自己请愿，但须经会中认可。
- 三、研究的方法分四项：

- 一、搜集马氏学说底德、英、法、日、中文各种图书；

- 一、讨论会；
  - 一、讲演会；
  - 一、编译、刊印《马克思全集》和其它有关的论文。
- (余从略)

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全国范围内有深而广的影响。后来会员发展到几百人，分布在全国各地，其中很多都成为工农革命运动的先行与领袖，对中国革命起了相当大的作用。虽然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自从一九二六年九月起，我离京南下往沪、汉等地工作以后逐渐停止活动，但后来在学术界、思想界与全社会均受到许多人的深切怀念。这次湖南大学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会中，也有一些昔年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会员。

## (二) 湖大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会的成员

湖南大学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会的组成以教师为主体。学会发展很快，开始有五、六十位教授参加，半年余即扩大到一百余会员。成员当中除了一些中、外闻名的专家、学者如杨卓新、杨树达、易鼎新等人之外，尚有许多在科学、思想、教育、经济建设等方面虽名不显而贡献却很大的知识分子。学会的发起人是罗仲言、潘源来、杨树达、谭戒甫、侯哲荈等五人。现在我将主要成员的大致情况逐一介绍如下：

易鼎新 湖南醴陵人。经济系教授兼湖南大学副校长。易本是清末时的秀才，后赴美留学，成绩优异，学成归国后曾在安源煤矿任工程师，英文写作及口语均佳。安源大罢工中，他站在工人方面，思想感情上同共产党很早即有某些相通。罢工结束后，易亦离矿，后到湖南大学任教。易鼎新生性沉默寡言，少交游。我到湖南大学之后，他极表欢迎，知道我曾亲自参加秋收起义，很是感动，对当年斗争种种情况极有兴趣，一再要我细谈。易居至善村，与我住处望衡对宇，课余之暇，常相过谈。易夫人王氏亦好客，恒云：“易先生不好应酬，独乐与罗先生对坐倾谈，乐而忘倦。”易先生博学强记，少时所读经史子集多能背诵，某次学校招考新生，我二人同室阅卷，易朗诵《货殖传》，不遗一字。平日生活刻苦，每去长沙市内开会、办公，均坚持步行不乘车，常常手持雨伞，经返渡河，无论阴晴雨雪。若归家过晏，则由家人到河畔迎候。建国初期，一次易先生到北京开会，邂逅刘少奇、李维汉等，多年阔别，叙旧移时，谈话中对方偶询及我的状况，易乃告之：仲言即为予之好友。李维汉则云“很久未知罗之详情”。

因请易先生回湘捎带口讯，嘱我将历年撰述整理送中央一阅，易一一照办。中央对易先生德才均很重视，曾要他独力承办电力学院并任院长，易谦虚、逊谢，辞以“条件不够”，后未果。易鼎新对湖南大学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会是全力赞助的。

侯哲荈 湖南长沙人，合作系教授兼系主任。一九二六年曾受党的教育，曾赴日本考察农村经济及合作，并曾在上海各大学及重庆大学教授。侯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会发起人之一，并草拟马列主义学习提纲，自任主讲。并曾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会的成立发表一篇专论，多次出版著作廿余种，皆独立运思，面向未来，成一家之言。

(长期研究民族学，善思考，颇有独特见解，是马列主义学会发起人之一。曾对马列主义学会成立发表一篇民族学专论，后出版了这方面的著作。)

李达 湖南零陵人，曾留日，经济系教授。李达生于一八九〇年，我到湖南大学时他已近六十岁。早年，他在书斋里埋头学问，主要是译日文著作。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脱离革命，后又回到革命阵营，曾任湖南大学、武汉大学校长。李对建立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会很重视，当我邀他出席成立会时，他说：“这件事只有我们能做，你有这方面的条件，别人恐怕号召不起来。我支持你，成立会我一定来参加。”他果然参加了成立会，并在会上做了发言。

(关于李达还想赘言几句，李在湖大，所用之人良莠不齐，其中有些人想通过他获得利益便包围他；另一些人出于嫉妒认为他没有贡献，没有革命斗争经验，又无实权，不应当校长。因有些纷争，导致了后来湖大的解散。李达出身中小地主家庭，本人授业多年，生活安定，小有积蓄，十年动乱开始以地主头衔被斗致死。据云当时润之在东湖，李曾写字条求救，因消息迟到未获解脱。)

潘源来 湖南浏阳人，曾留英，经济系教授，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会发起人之一。潘著有《政治经济学》，由湖南大学出版。

李祖荫 湖南零陵人，曾留日，湖南大学法学院院长。曾任湖南省教育厅厅长，任期内并请我到省教育厅讲学。后离湘去北京。(祁阳人，留学日本庆应大学。)

罗仲言(章龙) 湖南浏阳人，经济系教授，后期兼任系主任。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会发起人及主要负责人。

谭戒甫 湖南湘乡人，文学系教授。著作不辍，对中国学术界有突出贡献。谭系将门之后，少年英俊，风流倜傥，自言曾任湘军某师团长，合弃武习文，折节读书，并自修德文，在湖南省第一届留学生考试中名列前茅，但因辛亥兴起、政治变革而终止出国留学。遂转入教育界，前任长沙第一师范教员，毛润之、萧子昇等皆出其门下。后

辞职出游，往大西北，任西北大学教授，再应聘来湖南大学。戒甫博学多能，且精通诸子百家，其所考订之墨子、老子的文章，为士林传诵，从学者甚众，每一登坛讲演，座无虚席。谭戒甫教授亦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会发起人。

杨树达（遇夫）湖南长沙人，曾留日，文学院教授。遇夫先生学识渊博，著作等身（参见《杨树达先生年表》），平生致力于文字学，年高德劭，海内外知名。先生在湖南大学曾倡议并组织“知新学会”，本“温故而知新”之意研讨中外各项新学，成为在湖南大学颇有影响的一个学术性团体。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会的成立，杨先生参与发起，全力支持，并带领知新学会全体成员加入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会。先生对于所有有利于建立新中国、新风尚的活动均极力赞助。曾记得某次雷雨之夜，岳麓山自卑亭附近有天外飞来之大块陨石伴大声坠地。杨先生曾对我说：“这是一次人生奇遇，难得碰到，定是天外飞来，可惜我于此道很少研究。不过，据此看来，难道岳麓宫下的飞来石就不是真的吗？难道都是荒唐无稽的吗？”我们一同观看陨石后，先生又说：“大家都以为陨石不过是顽冥之石，我想，有可能是星外的使者，但我们还不认识它。安知其中不包含着知识、消息之类？只不过我们暂时看不出来罢了。”先生对于这一自然现象的评论在今日固然并不罕见，但四十年前一位中国文字学者能有此大胆的、新颖的见解，已是很不平常的了。特别要指出的是，解放全中国时，先生已年近花甲，但他的思想仍能跟上时代步伐，产生了很大的变化。如在一九五一年十月一日长沙市举行国庆游行之时，杨先生曾往观，归来作诗一首，题为：

一九五一年十月一日长沙市观国庆游行行列，喜赋。

热泪纵横不自休，暮年喜见此年头。  
夜门兀自无人闭，谷粒都归种者收！  
淮水安澜赓大禹，夷人授首洗前羞。  
平生梦想今都现，笑口嫣然待首丘。

诗句中，可以感觉到一位老学者对新中国的无限热爱与自豪感。近日我曾见到杨先生的后人，据云先生遗著已将大量重印，我亦为之庆幸。

（杨先生博学能文，著述等身，驰誉海内外，其治学精神、道德风尚……我们之间，交心若同金石，谊兼师友，析疑问难，深受教益。先生轶事，制礼在乐，代有新人。同座熊知白、戒甫教授深颺其旨。一九四一年当时以杨先生为主导的中文系老师组织有“知新学会”，会员均属

一代学人，知名当世。）

马恒儒 湖南长沙人，矿冶系教授，湖南大学副秘书长。曾任太阳学社主任。

阎金铎 山东人，文学院教授。青年文学家。

雷 敢 湖南浏阳人，历史系教授。著作甚多，对中国史学界有很大影响。

涂西畴 湖南澧县人，经济系教授，中共湖南大学党委副书记。

文 斗 湖南宁乡人，机械系教授。曾留英。

江之泳 湖北汉阳人，政治系教授。

康辛元 湖南衡阳人，湖南大学教务长。

向郁阶 湖南长沙人，经济系教授。

汪诒荪 安徽怀宁人，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湖南大学大课委员。

何之泰 安徽人，水利系教授兼系主任，攻水利桥梁专业。新中国成立后，修建武汉长江大桥时他任总工程师。

唐炳亮 广东中山人，曾留英，经济系教授。著有《统计学》。

陈绶荪 湖南澧县人，曾留日，经济系教授。编有《社会科学辞典》，流传很广。是学术界知名人士。

杨丙炎 湖南长沙人，曾留法，经济系教授。

秦佩珩 山东济南人，经济系教授。

刘光华 湖南长沙人，曾留日，经济系教授，兼教务长。

姜运开 湖南宁乡人，文学院教授。著有甲骨文、金文、竹文等专门著作。

曾昭权 湖南湘乡人，电机系教授。文学方面亦有专长。

刘克俊 湖南浏阳人，曾留德，法律系教授，对民法有很高的造诣。

王 颢 湖南浏阳人，法律系教授，有名的刑法专家。

彭师勤 湖南衡阳人，合作系教授，合作金库主任。

皮名振 湖南长沙人，曾留美，历史系教授。

皮名举 湖南长沙人，曾留美，历史系教授兼秘书长。

魏文梯 湖南长沙人，曾留英，化学系教授，曾任总务长。

杨卓新 湖南新化人，曾在湖南长沙实业学堂机械科毕业，执教于某县中学。一九一三年应湖南留学生考试，数千考生中仅取留西洋学生二十四名，先生列为第一。留美计六年，获数学博士学位。继赴欧洲深造，曾先后就读于英、法、德之有名学府。一九二三年得与爱因斯坦会晤深究讨论“相对论”之观点。一九二四年回国，一九二五年省立湖南大学筹建时为理学院院长兼数学系主任。同时从事哲学研究，发展了“相对论”，学术方面有不少创见。曾代理湖南大学校长，

深受师生爱戴。

- 戴桂蕊 湖南长沙人，机械系教授。  
戴耀本 湖南长沙人，水利系教授。  
柳士英 湖南长沙人，土木系教授兼系主任。  
黄建平 湖南萍乡人，合作系教授。  
周传璧 湖南平江人，矿冶系教授。  
萧伊莘 湖南长沙人，数学系教授。  
周林 湖南平江人，经济系教授。  
胡代光 湖南长沙人，经济系教授。  
陶继侃 湖南长沙人，经济系教授。  
陈则民 湖南长沙人，中文系讲师。  
姚豚元 湖南衡阳人，水利系教授。

以上四十余人，是我记忆所及印象较深者，其余则因岁月流逝，文件散失，沧海遗珠，未能全记。

（王舒 公共课程德语教师，王壬秋（王湘绮）之孙，杨度（哲子）之外甥，与罗仲言、江之泳往来甚密，交谊素笃，共同在至善村小组学习。）

### （三）湖南大学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会的组织机构

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会成立之后，经过大家选举，产生了一个领导小组。领导小组由九人组成，成员是：

李达、易鼎新、侯哲莽、李祖荫、谭戒甫、马恒儒、阎金镗、江之泳、罗仲言。

学会并选举书记一人，由罗仲言担任。

### （四）湖南大学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会的活动

湖南大学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会的学习活动大致上仍遵循当年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方式与内容。有如下几项：

1. 按系分为学习小组，做为学会展开学习讨论的基层单位。
2. 定期举行各小组的联系会议。会议除研讨学会事务之外，也组织共同的学习。
3. 参加大课委员会，听取各类报告、讲话。曾请到刘咏世同志讲当前形势。同时开展讲演活动以交流学习成果。如一九五〇年二月

二十五日在学会第三次小组联合讲习会上，李达即以《如何研究马列主义》为题作了讲演，讲演全文刊载在一九五〇年五月十七日（星期三）《人民湖大》报第三版《大课堂》栏内。请参见附件二。罗仲言亦作了《论社会主义经济计划的本质》报告，见附件三。

4. 翻译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及有关传记等，由罗仲言、潘源来、唐炳亮、江之泳等教授负责主编。

5. 开展辩证法的学习。曾由侯哲莽执笔编写了《辩证唯物论表解》，侯并担任主讲。（《辩证唯物论表解》见附件一）

6. 加强时事学习。主要内容为收听新华社广播及中共中央发表的重要文献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政纲、政策等。

7. 自一九四九年起，学会经常组织会员讨论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建设问题。会员们以本专业本单位为基点，广泛地研究探讨中国的政治、经济、法律、文化、艺术与教育等方面的实务问题，并纷纷著书立说，以申述本人的见解，希望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祖国略尽微薄的力量。

在此，我将一次很有意义的学习会的情况介绍给大家：

在一次座谈当中（当时大约是湖南大学接近于解散前不久），考虑到新中国不久即将完全统一，以后更多的新问题还会发生，座谈中心便集中在“中国的昨日和明天”这一点上，更有会员认为，古往今来，以“明日”最为重要，且如果对明日的中国问题漫不经心，将来定会陷于被动地位。正如过去旧社会对中国的历史缺乏知识所造成的后来种种的错误一样。于是座谈便以此为题在半山亭进行。

出御书楼北门，绕行而东，渡枫经峡，拾级而登，行约百米，便达半山亭。半山亭，四面环山，小溪流水淙淙有声，愈觉幽静，令人难忘。更可怀者，几人围石凳而坐，自由自在，围绕着若干大大小小的话题，各抒己见，自鸣天籁，颇有兴味。时某教授自告奋勇为座谈会作记录，可惜当时日记后被散失，未能详述。

（略述，马列人物著述。胡庶华、李祖荫、鹤鸣介绍丛书，《史学原论》。潘书。建学任务。朗诵二诗。毛青年少有为，健学笃行兼而有之。此并非雕虫小技。）

（吾人所企望明日的新中国应具有独特的思想和理论。予虽觉藻饰过，当分逾恒。愧不敢当，但觉受到无限启发，鞭策之意可感。）

8. 为巩固学习的成果，会员的科学著作可以公开出版。如笔者即在此时期出版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理论》（编入湖南大学丛书），《中国国民经济史》（收入大学丛书）等。这项工作还取得了更多方面的支持。如毛岸英即由北京亲笔来信提供资料。说：“苏联国民经济领导研究提纲是苏联共产党中央最高党校学习提纲之一，因此没有

这么一本‘原书’，而仅有好几十种讲授‘原文’，尚文有中译、英译，德译我想也没有。”并说“研究苏联经济各项问题，不懂俄文是颇困难的，因为丰富的好材料都是俄文。译文有一些，但还少，且不够及时的，热望下最大的决心把俄文学好。”还表示“等到能自由看书的时候，我可以介绍一些俄文材料。”（引文摘自毛岸英就学习问题给笔者女儿罗梦平的亲笔信，原件存中国革命博物馆。）

9. 参加社会调查研究和大型政治活动，以促进理论与实践的进一步结合。

这当中，意义深远、规模较大的活动即是湖南大学师生参加土改工作。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会成员更是主动争取投入土改。我曾亲身参加实际的土地改革斗争，在此可以做一较为详细的记述。

土改开始之后，湖南本省分为几个区，如常德、湘西、零陵、郴州等区。在一九五二年一月，湖南大学约两千多名师生组成工作队，先后下到各区参加土改运动。

当时我带领经济系等师生二百余人去郴州地区。我去郴州有两个想法：一是当初一九二七年秋收起义时，中央决定我去湘南行动委员会，负责组织武装斗争。正欲动身，中央又通知我速往上海出席扩大会议，国际代表亦有信促行，我因而未能到湘南。后湘南的局势发生于我方不利的变化，又乏人指导与主持工作，以失败终。我拟趁此土改时机顺便考察秋收起义的文物、遗迹，访问有关人物，对当年斗争再作一全面回顾。二因土改是中国一项伟大运动，我也极愿亲自参加。那时我身体本不好，又逢胃病发作，家人亦不同意我去。最后在有关人员鼓励之下，实现了我的愿望，于是克服了步行几百里的巨大困难，到了郴州地区的宜章等县。

我在郴州地区共三个月（约一九五二年一月至四月间），后因公事返回长沙。在宜章参加土改，遇到不少险情，但也结识了不少朋友，颇有可记之事。

郴州地区，组织基础薄弱，有些封建势力的武装尚未消灭，仍在作威作福，极端仇视土改运动，计划把土改人员全部消灭以达到其破坏目的。此事酝酿已久，原拟在阴历春节时候发动，由于偶然机会被我们侦知——当地一女教师与我谈话中无意间提及此事——即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捕捉了该伙匪帮的头子，反革命暴动未能成功。倘若这一阴谋付诸实现，则土改队员就要无一幸免了。

又一次，我居住在某乡乡政府，有巨匪原逃亡在外，某夜忽归家，为邻人察知，该匪乃怀枪闯入乡政府，双方开枪互射，流弹横飞。双方格斗中，我亦从旁相助，卒将该匪击伤擒获。时远近农民闻讯齐集来援，幸好我方无伤亡，未受大的损失，算是一场虚惊吧。

另一次，在四区塘湾乡政府与地主武装发生激战。乡政府有城堡及壕沟，堡内有快枪十支、手枪二支、左轮一支。残余的反动武装来围时，我因昔年曾组织过武装斗争，当即率民兵及学生共同登陴守城，双方互击，敌前哨伤亡三人。战斗一日夜，城堡赖以保全。第三天，援兵到达复内外夹击，敌始溃退。此次作战，妇女在后助阵，出力不小。这是土改中一次实际的“武装斗争”。

在肃清残匪的斗争中，我们也牺牲了不少人，斗争十分激烈，但是终于完成了土改的任务，广大师生也从中得到一次实际的锻炼。

郴州地区也有不少古代文化与遗迹。当年楚项羽放逐义帝，即追杀义帝于此，遗留高冢于荒烟蔓草中。女教师萧淑媛曾导游至此，见坟前烧化冥纸者颇众，纸灰飞扬，引人遐思。我二人流连移时，不忍离去。乃赋诗二首而别。诗云：

## (一)

斩木揭竿起义军，咸阳一炬漫天焚；  
鸿门和战真儿戏，万里南荒此奠君。

## (二)

一代兴亡两牧童，墟秦兴楚与谁同？  
睨墙自古倾城国，何处彭城觅鲁公。

诗中“两牧童”指楚怀王孙心（即义帝）与刘盆子。

至北宋时，秦观（少游）曾到此留寓多日，临行填词一阙，题为“驿寄梅花，鱼传尺素”，为苏东坡所见，二人因此颇有争论。词中有句云“郴江幸自绕郴州，为何流下潇湘去”，涉及之事与物楚楚可见，如闻其声，堪称绝唱。

当地有苏仙岭，高约五百米，其高阜上有苏仙祠，庙祝年已九十，殷勤献茶，打卦布筮，说吉道凶，嘤嘤不休。其间译陈道经义，穷乡僻壤，竟有老聃高徒，殊足为异！庙祝并言邓大壑（仲鼐）曾随父住庙中读书避暑，壁间原有联语，因时间匆促，未及细阅而返。

深山有人若此，我居工作队亦见到奇人。一个是老常，河北人，行伍出身，肩背马枪，枪法很准，飞鸟、游鱼，一弹出膛应声而毙，远近皆知，传为“神枪手”。我与他联床共语，十分相投，结成好伙伴，外出则同行，给我印象很深。

另一人亦值得一记。我前曾说过，我在土改队三个月后因公需返长沙，乃独自束装离郴北上。乡政府派一人送我。此人名邓瑛，原系湘南巨匪，杀人越货，闻其名者无不震恐。三年前，他聚徒众千余，

长短火枪五百杆，四出行劫不下三百次，并曾在界岭抢劫外国旅客汽车，俘三十余人，号称“临城劫案重犯”。后来经过谈判，招安改编为独立队，但人们犹惧于他的恐怖行径，每每谈虎色变。乡长对他极不放心，再三叮嘱。邓瑛言：“我当年也是替穷人争饭吃，争衣穿，侠义行为名震五岭各县。改编以后，部下分了田地，从此洗手不干了，要干也干不起来了。这都是实话。我是真汉子，不做假事。沿途我保证教授先生安全，如惊恐大驾，我以全家六口生命担保。”乡长乃同意他护送我。邓瑛更向我说道：“‘强中自有强中手’，先生并非等闲之人，邓某何人，有眼当识泰山。岂敢说谎，自坏名声！”一路上，他小心作伴，将我送到坪石，办了签证，才欣然回去交差。

10. 湖大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会会员应邀外出讲学。

接受此项邀请的会员颇有几人，我也是其中一个。

我应邀赴山西大学讲学一事，见于一九五一年一月十五日山西大学《学习报》第七期第二版，有报道题为“湖南大学教授罗仲言来校讲学，讲课计划经济的理论与应用”。正文略云：

“湖南大学国民经济计划原理教授罗仲言先生应铭贤学院与本大学之邀，来晋讲学。一月九日为本大学财经学院及会计统计班全体同学报告。题目为：计划经济的理论与应用。首先讲述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几个法则，其次讲苏联实施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过程及经验。最后讲中国如何接受苏联经验，结合本国的实际情形，从事新民主主义的建设，逐渐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

这次赴晋讲学系由山西大学将邀请我的要求向湖南大学提出，获得湖大允准后我始北上。在太原时得晤赵宗复（山西大学副校长，赵戴文之子），赵设筵为我洗尘。向我谈及中国革命后应兴应革诸项问题。我说，此课题甚新，现在还没有这方面的行家。国家大政，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大炮固然可以攻城略地，但主持教育不会如此简单。要解决问题必须虚心学习，不激不弛，才能奠定国家如磐石之安。两人交谈甚洽。宗复为人，抱负非凡，又年富力强，极有远见。平时上下班均以自行车代步，衣履朴素，生活简约如平民。而好学不倦，所提问题均有远见。曾劝我留居太原，不必南返云云。

在山西又会晤了田子方教授。田教授为我在巴黎时旧相识，主持铭贤学院教务，对我优礼有加，极尽东道主之谊。其夫人赵女士文化水平甚高，伉俪极笃。我作客虽久而礼貌不衰。时可南屡来电催我南返，彼夫妇亦再三强留，盘桓多日。

我留太原月余，除讲学外，便与师生座谈时政，漫话个人学习生

活。记得讲课时有一女生，每课必到，坐在前排，用心听讲认真记录。课毕时，她通过某夫人自言愿随我南归，转到湖南大学学习，其同班同学亦多提出同样要求，但限于规章制度，未能一一照办，学生均表示遗憾。

## （五）结语

在湖南大学组织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会的时期，生活内容丰富，个人的学识与阅历亦大有提高。前后七年的湖大生活占我一生中极为重要之位置，故当时所见所闻所为均历历如绘，一时实难尽述，以后当陆续整理刊布以飨读者。惟此处不能不对湖南大学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会作一肯定的小结。

综观我以上述及之极不全面、不系统的情况，可以断言，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会在其短短几年的存在当中，是有着巨大的影响的。它所处的时代正是新中国取代旧中国、国家与人民的命运由黑暗转向光明的关键时刻。面对促成这一转变，提高人们的思想觉悟，调动广大人民群众（主要是高等院校上层知识分子）的积极因素，直接、间接地参加新中国的思想建设与经济建设等方面，均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尤其是团结、提高从旧中国过来的高等知识界人士方面，成绩显著。因此，我们认为，湖南大学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会是时代的产物，并反过来促进了时代的进程。

其次，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会是一个在中国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进一步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指导中国革命与建设，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组织。如果说，距此三十年前的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具体以马克思主义指引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话，那么，湖南大学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会就是具体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用于指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良好范例。它的历史作用更是人所皆知的。

我撰写本文的过程中，因材料很多，不可能全部整理出来，匆匆写成更难免挂一漏万，且年深日久，记忆亦多有不周之处，敬请各方面的读者不吝指教，更希望健在的当年会友批评指正。

附文献<sup>1</sup>

按：湖大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会虽存在时间不长，但其间先后发布

<sup>1</sup> 所附文献均未见。— 补注

的学习文献颇多。其重要者均未在文中摘引，现一并附后，计文献三种（共计 25 页）。

附件一：侯哲菴执笔拟定的《马列主义及新民主主义研究计划及进度表》及《唯物史观表解》（1-8 页）；

附件二：李达一九五〇年二月二十五日在马列主义学会第三次小组联合讲习会上的讲演稿，题为《如何研究马列主义》（1-10 页）；

附件三：罗仲言一九五〇年七月二十日发表于《人民湖大》报《大课堂》栏之文章《论社会主义经济计划的本质》（1-8 页）。

## 九、致中共中央政治局润之主席函<sup>1</sup> （一九四九年八月二十二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  
润之主席学长尊鉴：

八月四日长沙解放，反动政治，一举廓清，二十二年前的今天，正是中国工农红军开始建军的时候。当“八七会议”后，弟承党之命参加湖南省委与滕代远诸同志参予秋收武装起义，向反动政府作殊死战，全体同志屡败屡战，再接再厉。在这一战斗中，我党精锐如：郭静茹、夏明翰、龚际飞等相继战死，直到秋收武装起义战事结束，弟乃奉中央命令撤退，仍回上海中央从事地下工作。

党的六次大会召开时，弟代表湖南省委赴苏联莫斯科出席大会，大会结束后，即专程返国，积极参加工作。当时个人意见认为全党应该加紧团结，不偏不怠，切实执行六次大会决议，艰苦奋斗，争取革命高潮。不料未几却发生四中全会的党内宗派主义问题。

在米夫、王明回国领导中央工作时，上海全体参加实际工作的同志与六大中委多数，依据六大政治路线和党的组织路线，在四中全会上提出过批评的意见。这些意见大都是以党的六次大会决议为根据，且为当时大多数同志所赞成，却不料引起对方的不满，以“右倾机会主义”罪名惩办了许多同志，弟亦因此受到开除中央委员和党籍的处分。

当时国民党反动势力十分猖獗，党的环境非常困难，弟见宗派主义牢不可破，遂抱定牺牲个人成全党的决心，劝告同志顾全大局，一切听命于党，自己却默然离开了党。事后证明当时米、王宗派主义及其政治路线确实使党的工作受到了挫折，同时使革命发展受到了严重损失，而当时所称“右倾机会主义”危害党与革命之说，则不免成为夸张诬陷失实之谈。

<sup>1</sup> 根据罗章龙后人提供的打印件输入。— 补注

自党的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起至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弟迭蒙全党信任，当选中央委员（五次联任中委）效忠于党，参加实际工作凡十二年。“二七”、“五卅”、“北伐”、“土地革命”诸役均置身最前线，不稍瞻顾，平日在工作上虽然犯过错失，总是依照党的自我批评纪律，彻底改正错误，从来不敢因小失大，自误误党，所以十二年间并未受过党的任何处分，此次忽被严谴且申诉无由，是以当时党内同志均感意外，并代为叫屈不置。

自被开除后约经年余，弟复遭人告密被捕入狱，此时党籍已失，救济无人，然落井下石尚有人在。居狱时备受折磨，几死狱中，后得中央研究院蔡子民奔走营救，禁锢经年，始获释放。时宗派主义同志对弟个人出处颇多谤议，好在这些传说，随后即完全为事实所否定，这些事实便是：

（一）弟自从离开党到现在，没有加入过反动的国民党或三民主义青年团。

（二）没有做过国民党的官吏。

（三）没有加入过其他的反动党派（包括中青、民社、托派和右派等）。

（四）没有加入过假革命的政治党派团体（包括一切官僚、军阀、政客的政治投机集团）这样终于保持了共产党员的操守和清白。

在此悠长岁月时期中，反动派对弟迫害从未放松，个人处境虽极苦楚，但一念及吾党建立以来所号召的阶级革命大义和个人十二年为革命工作牺牲的历史，匹夫之志益觉坚不可夺，惟当时所最痛心者，便是今后已被迫离党的有组织的强大队伍，成为个人单元的软弱无力的奋斗，结果是脱离政治，但仍向往为人类远大目的的奋斗，刻苦治学与诲人不倦的精神。

当考虑个人今后工作方向时，最初是拟潜赴赣南苏区加入工农红军，亲履行阵，杀敌自效，但因关河隔绝，国境对垒，星旗在望，飞越无由，最后乃决定重新读书，继续研究革命理论及与中国革命有关的各种实际问题，希望为将来的党与人民祖国储备一些广泛应用的专门学识。

一九三四年冬季为生计及图书便利计，弟乃应河南大学之聘，赴河大担任教职。抗战发生，迁校鸡公山，在河大任教二年。抗战期内，武汉撤守，复应西北联合大学之聘，在西大任教十年。（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七年）。抗战结束后返湖南大学任教，到现在止任教二年（一九四七年至一九四九年）总计前后在三校连续任教时间合计十五年。十五年来“磨血”著书，授徒自给，备受反动派排挤，然犹不顾一切，早作夜思，锲而不舍，先后成书十种，约二百五十万言。拙著宗旨归纳起来大概根据四个原则：

（一）使中国学术思想脱离封建主义及西洋资本主义的奴役地位。

（二）不附和一切反革命理论。

（三）根据革命的民主主义衡量一切学术思想。

（四）融合东西，陶铸今古，尊显真理，发挥自我创作，使中国优秀学术统一起来。

拙著各种书共二百五十万字，其中已印行五种约一百五十万字，待刊者二种约一百万字。

十七年讲学著书生活至此告一段落，但因个人处境艰难，孤陋寡闻，致履过的机会多而闻过的机会少，抚躬自讼，负咎尤深，惟平生行谊不慕势利，不事剥削，不肯阶级，不卖同志，不残害人民，不投机取巧，尽心竭力，为祖国为人民服务，则有事实可验，差堪告慰。今后更愿时时警惕，使研究与实践合一。

间读近代史时，尝见革命党人身世遇合，恒多变易，惟是非之辩，屈伸之会，则久而愈明。如马克思革命之圣，然一八五〇年为同志所不谅，被迫离开共产主义者同盟而自遁于伦敦博物院图书馆垂十七年。弟才学不逮前哲，但所遭厄运，则远过之。隐遁经年，怀宝迷邦，读孟德诗云：“契阔谈宴心念旧恩”，又云：“老骥伏枥，志在千里”郁结之思诚不能自己，且久而弥殷。用特将十七年来离开政治后的生活经历，据实略陈以明本志，今后为人民革命的胜利与建设新世界继续奋斗，自当竭其鲁钝，尽瘁不辞，此平生愿望，度亦大仁睿智之所颌许也，书不宣意，伫候

明教 顺致

敬礼

学弟

罗璪阶 拜上

一九四九年八月廿二日



## 十、致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函<sup>1</sup> (一九七九年十月)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

我自去年八月奉召来京，参加政协与革命博物馆举行的党史座谈会。在这期间，欣逢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京举行。会议公报一经传达，簿海欢腾，个人深受启发。

今年我奉调来京，又逢五届人大和五届政协两个大会的召开，得以聆听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要报告。国庆前夕，又聆听了叶副主席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年，谈取得的伟大成就和建国以来丰富的经验教训。目前我党民主作风、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又得到进一步发扬光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益发深入人心，举国上下，一致奔向“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个人心情感到无比振奋。因此，我把个人参加“非常委员会”和在南京被捕入狱的经过详实报告中央，请中央审议。

此致  
崇高的敬礼！

罗章龙  
一九七九年十月

### (一) 关于六届四中全会问题

溯自中共建党以来，与共产国际关系是很密切的。初期双方相处，

<sup>1</sup> 根据罗氏后人提供的打印件录入，个别处有技术性订正。原文附录“个人简历”和“家庭情况”，均略。—补注

互相信任，精诚团结，合作无间。自从大革命失败后，东方部由米夫主持，政治上屡犯错误；组织方面践踏党章，并无党内民主。此种倾向发展到四中全会，可谓登峰造极。米夫在四中全会上，抛出王明路线：滥用职权，违法乱纪。因此引起党员群众的极大愤慨，于是爆发了反四中全会的问题。

先是王明回国被派到全总工作时，他就开始了夺权的准备，曾对一些同志进行拉拢、煽动。如：一次他在虹口公园对我谈话，内容要点是：

在政治路线上，他认为中国的党向来没有革命的理论，因此也谈不上革命的行动。只有像他们这样具有“高度理论修养”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掌握了中国党的命运，才会有真正的中国革命。他认为：历届中央工作成绩甚小，一贯右倾。他说：立三路线不是“左”，而是右。他认为：苏维埃区全都右倾，“一贯右倾，严重右倾”。

在组织上，他特别强调旅莫斯科支部清洗斗争的重大意义；他自称奉东方部命令回国，说东方部给他的任务是改组中央，并领导新中央的工作；中国的党要至上至下彻底改组，才能执行国际路线。

他为了拉拢全总，又向我说：全总是工人、干部精华所在，是党的中坚革命阵地，是反对机会主义路线的唯一强大支柱；等等。他希望我把他的意见向工委和全总同志们反映，支持他们的工作。

以后王明等又多次找我谈话，中心内容仍是：“目前中共主要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是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在苏区是富农路线”；“现在没有真正的工农兵会议政府”。他们强调全盘改组中共各级领导机构，认为这样中国革命的问题才能得到解决。他们甚至透露已准备了一个名单，哪些该打倒，哪些该争取，采取了“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手段。

他们要我表态支持他们的计划，当时我认为他们所谈问题独断专横，性质严重，拒不作答。

在中央工委和全总党团联席会议上，我报告了米夫意向和王明等的谈话内容。与会同志激于义愤，表示坚决反对米夫、王明的错误言论。并立即写信给国际（也曾给苏区毛主席）表明态度，决心维护党与革命大业，申斥王明的错误言行。

六届四中全会的召开是米夫践踏党章、无视党内民主、包办代替的产物。由他选定出席人员，虽不是中委，但均有表决权；而我和一些中委则是在会前二十分钟才接到开会通知的。

米夫宣称四中全会是超越六大中央的方式召开的会议。首先由国际代表作政治报告，着重批判全党右倾思想，强调彻底改造党，成立“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央机构”，提出了比立三路线更左的路线（即以

后的王明路线)。报告完毕,讨论中,大多数代表对米夫的报告深感失望;而对于米、王的篡党计划激烈反对。发言踊跃。中共六大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史文彬在会上发言,指出四中全会是违反党章与党的组织原则的,他说:“中共党章明白规定,全国代表大会选出中央执行委员会,为中共最高领导机构;全国大会以外任何会议或机构不能产生中央领导机构,否则视为违反党章的非法行动。如果全党认为有需要改组中央领导机构,必须召集全国代表会议来解决。”米夫对此置之不理,仍坚持进行选举,提名王明等人为中央委员,会场上一片喧哗,嘘声四起。史文彬首先起立,代表今天出席的中委等声明选举不合手续,会议应立即停开。于是代表们群起集体退席,离开会场。据记载,出席四中全会有三十七人。其中有二十多人声明反对四中全会、集体退席,他们是:史文彬、罗章龙、何孟雄、张金保、肖道德、陈郁、王凤飞、徐兰芝、袁乃祥、邱洋林、沈先定、张昆弟、徐朋云、唐宏锦等。

四中全会后,米夫派他的翻译来找我,要我到在四中全会上表示异议的同志找来开会。这个会议是在上海沪西区一个花园别墅里开的,不同意王明路线的六大中委及各部门负责干部共去了二、三十人。会前米夫找我谈话,说:“这次会议很关键,开得好,问题就解决了;开不好,后果很严重……”。话中带有威吓的意思。总的说是让我表态支持王明,并要说服其他同志也表态支持。我说:“要让我说服他们,我感到无能为力。明天的会要开好,还是请国际代表直接掌握。”

这天,米夫主持会议,同来的还有两个国际代表。米夫首先发言,说王明是最优秀的布尔什维克,马列主义理论水平高,你们不要反对王明。接着国际代表轮流发言,作了长篇讲话,态度极为强硬。综合他们的谈话,内容如下:

1. 当前中共党内主要问题是右倾(特别提到中央苏区一贯右倾、严重右倾);国际指示王明等组织临时中央是改造中国党的必需手段。
2. 对国际应绝对服从,国际指示是绝对正确的,四中全会是体现国际正确路线的。
3. 王明虽然犯过组织纪律错误,但他们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政治上很正确,中国革命离开他们是不行的。
4. 虽然反对四中全会的同志占多数,但形式的多数不能算多数;赞成四中全会的虽占少数,但也不能算少数。

国际代表发言后,在坐的中委、干部都积极发言,也讲了几个钟点。综合他们的讲话,主要是批评四中全会和王明路线,有以下几点:

1. 四中全会的政治路线是违反了中国共产党与革命的根本利益,不能体现共产国际路线,会议本身也是破坏党章党纪,是破坏中国党组织

危害中国革命的。

2. 王明本人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而他主张的是比立三路线更“左”的路线,将来在城市和苏区都是行不通的,如果现在不加制止,将会严重地损害中国革命事业。

3. 反对四中全会的斗争是辨别党内大是大非的原则性斗争,我们要求国际代表以中国革命为重,对四中全会决议收回成命,定期召开七大会议或紧急会议,重新树立正确的政治路线,解决党的一切问题。

4. 坚持不同意王明当选中央委员。

最后,国际代表宣布:“今天会议到此为止,你们反对国际路线,反对四中全会就是反党、反国际,应受严重处分,一律开除。”

花园会议后,临时中央就正式决定开除了我们的党籍。“决议”是后来才用文字公布的。以后又处分了几批同志,有的公布了,有的没公布。当时大家为了继续革命工作起见,在中央工委机关开会研究今后工作问题,决定一面写信给国际,希望另派代表重新召集会议解决问题,我们听候国际处理;一面仍继续照常工作。为便于领导日常工作的进行,并决定暂行成立一个临时性的机构——“非常委员会”。

在四中全会后,我们写了一个文件:《力争紧急会议、反对四中全会报告大纲》。大家都在上面签了名。这个文件是送交国际和临时中央的对内文件,对外保密,在基层只有口头传达。后来王明却造谣说,这个“报告大纲”是以散发传单的方式向敌人告密。这是王明强加给我们的诬陷不实之词。

王明对同志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采取非法手段。自此以后,更是有增无已,打击陷害以至冤枉杀害了许多好的同志。

关于“非常委员会”

“非常委员会”是在花园会议以后成立的。也就是国际代表和临时中央宣布开除许多同志的中委、党籍,并停止他们的工作以后,才被迫成立的;也就是以六届中央原有机构(中央工委、全总等原有人员)坚持继续工作,并没有另外成立新的中央机构;工作所遵行的仍是六届中央决议,并非如王明所诬陷的有其他什么路线。

关于参加“非常委员会”的组织成员,主要是中共六大中委、全总、铁总、海总、上总以及北方、东北区、江苏、山东和全国苏维埃准备会议委员等在上海的老干部。其主要成员有:

- |     |                              |
|-----|------------------------------|
| 罗章龙 | 原六大中委、中共中央工委书记,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    |
| 史文彬 | 原六大中委、六大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铁总主席兼党团书记; |
| 何孟雄 | 原江苏省委委员,沪东区委书记;              |
| 林育南 | 原上海总工会常委,苏维埃准备会议秘书长;         |

李求实 原共青团中央委员，上海反帝同盟书记；  
 王仲一 原六大候补中委，北方局书记；  
 唐宏锦 原六大候补中委，东北区书记；  
 袁乃祥 原京奉铁路总工会主席；  
 沈先定 原上海总工会组织部长；  
 张昆弟 原北方局特派员；  
 王凤飞 原九江书记，后任上海闸北区书记；  
 谭寿林 原全国总工会秘书长；  
 陈郁 原海员总工会党团书记；  
 徐兰芝 原六大候补中委，陇海铁路总工会主席；  
 童昌荣 原东北南满特派员；  
 霍锬镛 原湖北省工委书记；  
 王士青 原青岛市委书记。

(余略)

当时出席全国苏维埃准备会议的各苏区代表，如中央苏区代表团、豫鄂皖苏区代表团、湘鄂西苏区代表团、赣东北苏区代表团等苏区全体代表，均在反四中全会“提纲”上签名，并同时参加“非常委员会”工作。

“非常委员会”成立后，经过讨论，通过《力争紧急会议，反对四中全会提纲》。“提纲”要点如下：

1. 四中全会临时中央助长“左”倾路线，比原来的“左”倾路线更加变本加厉。
2. 四中全会丝毫没有党内民主，是由米夫一手包办的。
3. 建议召开紧急会议或七大会议解决全党各项问题。
4. 向共产国际建议立即撤换负四中全会主要责任的米夫。

(引自“提纲”)

后来米夫却反唇相稽说：

1. 力争紧急会议，主张在紧急会议上选举临时中央，这是分裂党的行为。
2. 国际代表是百分之百的执行国际路线来指导中国党的，所以反国际代表实际上就是反国际；提名反对米夫等于向敌人公开告密。
3. “提纲”是“取消中国革命”。
4. 四中全会临时中央是加速党布尔什维克化的正确路线。

(引自临时中央“决议”)

以上就是当时双方争论的焦点所在。

“非常委员会”活动主要是在原有组织基础上，继续进行对南京反动政府的斗争；组织工会发动反黄色工会的斗争；同时出版名为《国

际路线》的刊物；写信给国际，要求速派代表来中国解决党的问题；也写信给中央苏区毛主席，报告情况、请求资助。

因为“非委”是个临时性工作组织，所以它的活动时间很短。“东方旅社事件”发生后，党的精华遭到了严重损失，上海的工作陷于停顿，外地亦因交通困难，无法进行工作。此时“非委”实际上等于自动解体，不复存在。自“龙华惨案”后，我亦因病离开“非委”，直至一九三三年入狱，这段期间我都未参与活动。至于上海以外以及北方地区的反四中全会活动，我更未予闻其事。

我们当时的处境是十分困难的：那时如果服从米夫的命令，那就一定要违反党与革命的利益；如果坚决保卫党与革命的利益，那就要与米夫、王明决裂，受到惨酷的斗争和无情的打击。

由于当时事态的急剧变化，大家感到智尽能索，面对党内“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情势，而束手无策。急切之间，竟难于找到一条政治上既反对米夫、王明，而组织上又能相容的两全道路。

“非委”的存在，虽然时间很短，却引起党内极大的分歧。尽管当时我们是寄全部希望于国际，认为“非委”只是临时组织，我们和米夫、王明的争议属于党内问题，只要通过国际合理解决，这一组织也就自然不存在了。但事与愿违，我们的期望都落空了。东方部坚持己见，一意孤行，终于使革命事业造成不可弥补的浩大损失。追源祸始，造成这种严重后果是应由米夫承担责任的。我个人也有责任。这也是我长期以来寝馈不安，深以为疚的。

总之，关于四中全会问题，时至今日，真象渐白，是非已明：米夫、王明的错误路线推行全党，使中国党与革命事业濒于绝境；无数同志在其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下沉冤莫白。综其所为，足使亲者所痛，仇者所快！在反四中全会问题上，我犯有严重错误，愿获严谴。但对于参加反四中全会的多数同志因而蒙受牵连，包括白区、苏区的同志，以及以后去苏联的一些同志，被王明所强加的不实之词，并由此而造成的许多冤、假、错案，请求中央查明，予以落实政策，平反昭雪。

我个人今后决心以余生之力，在中央领导下，努力工作，以赎前愆。

## (二) 南京被捕入狱问题

我被六届四中全会临时中央开除中央委员及党籍两年以后，党内残酷斗争仍在继续扩大。我于一九三三年在上海，由于叛徒告密被捕，解往南京禁锢入狱。

我在狱中备受刑讯与折磨，始终据理力争，毫不屈服。既没有供认任何组织与机关，也没有出卖同志和朋友。后来，我在狱中身患重病，王薪元（上海区委工作）、李梅羹（全总宣传部工作）等同志知道后，乃设法营救，通过蔡元培保释出外就医。

当时蔡元培是国民党监察委员会主席兼中央研究院院长，在社会上威望很高；蒋介石对蔡也很敬畏，遇事不太忤蔡意。蔡向国民党当局说：“人病到这个样子了，还关押不放，这是什么做法？”蒋听后，心虽不满，但仍勉徇其情。在蔡的特权庇护和筹划下，此案未经裁判，我即离开南京。接着经过一段治病疗养，以后我易名仲言，赴河南大学任教。当时河大校长杨震文，原是北京大学教授兼德文系主任，在北大时与我有师生之谊，北大同学在该校很有势力。又我的北大同学商承祖，当时在南京大学任教，商是蔡元培和杨震文的得意门生，商建议我去河南大学教书的。

自此以后，我曾相继在西北大学、湖南大学教书，直至全国解放。多年来，我埋首书斋，教学为生；既未加入过国民党、三青团，也没有担任过国民党政府官吏，也没有参加过任何反动政治派别团体。

关于我在河南大学任教情况可询问何文（原名魏郁）；我在西北大学任教情况可询问刘淑端（现在西北财经学院任教）；解放前后，我在湖南大学任教情况可询问涂西畴（现在湖南大学任教）。

在这期间，敌方特务人员丧心病狂，对我百般诬蔑迫害，不遗余力。后闻敌方中央社和反共宣传刊物竟盗用我的名义刊登《罗章龙自首声明》，桀犬吠尧，令人发指。查此项声明纯属捏造，乃反动派和投敌分子强加于我者。我当时既不知情，也无处申诉。隐忍多年，只有私衷自誓：以行动证明永不与敌伪分子同流合污；耿耿此心，可质天日。

关于南京国民党中央社发布的《罗章龙自首声明》的几点说明

1. 该项“声明”，是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特派驻沪调查员马绍武所伪制，并代行宣布的。当时我并未在场，亦不知情。国民党反动派当局，既然将此作为重要新闻，事后又多处转载和散发，为何要在当事人缺席的情况下，匆匆宣布？当时南京特务分子声势烜赫，何求不得，竟做出此等“缺席裁判”！这一事件本身，适足以证明国民党反动派黔驴技穷；为了颠倒事实真相而自演一幕丑剧，以图混淆视听。

2. 至于伪造的“声明”，我当时根本不知道。就其内容，满篇都是国民党特务走狗惯用的恶毒烂言。这类语言在当时国民党刊物和伪造文件中，亦属司空见惯，屡见不鲜。千篇一律，不值一驳。就其涉及到本人历史情况时，也是一派胡言，今摘其中几点驳斥如下：

一、“声明”中提到：“……随后经李守常的介绍，在北京加入中国共产党……”。事实是一九二〇年五月国际代表威金斯基来到北京，在他离京去沪时，曾在一次会上，代表共产国际承认李大钊和我等五位与会者为共产党员。这事在党正式成立之前，当时就不存在经某人介绍的问题。显然诬陷者对这段历史并不了解。

二、一九二七年六月，中央决定我到湖南与毛泽东同志共同组织秋收起义；十一月，我参加中共中央扩大会议，报告起义情况，继而留在上海中央工作。并不存在受到批判问题。由此直到一九三一年我一直在中央工作。所谓“被共党中央予以种种诬辱”、“遭受他们的打击”等词，均属捏造，与事实不符。

三、再者，一九三一年四中全会上，米夫、王明非法开除了我们的党籍后，我们为了继续进行革命工作，才成立了一个暂时性的机构——“非常委员会”，而并非如“声明”所述“我与徐锡根、王克全、孙正一诸人起而反对，组织非常委员会，因反抗失败，被共党开除党籍”。史实的颠倒，说明伪造者并不了解内情。而且，“非常委员会”主要成员是史文彬、陈郁、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诸同志，而徐锡根、王克全并非主要成员，他们很快就叛变投敌，作了反动派的官吏。

四、伪中央社报导中说：“并由孙正一、彭正阶担保。”孙、彭二人我根本不认识，又为何为我担保呢？

这是伪中央社故弄玄虚，藉此攻击蔡元培公开营救活动，企图混淆事实真相，欺骗社会舆论。[罗注]

仅就以上数点，足见“声明”的伪造者，信口开河，捏造事实。通篇之中，漏洞尚多，无需一一赘述。明眼人不难看出，这一“声明”系出自国民党宣传机关的御制品，而妄图强加于我。国民党特务机关假造声明企图蒙混社会耳目的事，当时是司空见惯，层出不穷的。诸如《伍豪启事》也是如此（这一时期的伪作）。

自一九三一年龙华惨案后，中共中央、省、市机关大遭破坏。先后被捕人员中，有不少人变节投敌，出卖同志，破坏机关，并在南京伪国民政府中担任特务要职。如丁默村、马绍武等，原来都是中共党员，他们对我党内部人事、工作情况十分熟悉。这些人在上海、南京配合伪中央社进行反共宣传，出版《社会新闻》等反动杂志，十分卖力。他们对中共党员有计划地大量地进行造谣诬蔑，挑拨离间，混淆是非；妄图以伪乱真，造成事实真相的完全颠倒，使局外人为其所惑，以讹传讹；使党内造成混乱，自相戕害。可说是罪恶累累。

（马绍武在这次代宣《声明》后不久，即被我党锄奸队在上海处决了。）

以上所述，还可以说明，“南京入狱事件”是在白色恐怖与党内

残酷斗争的双重逼迫下，党内外敌人互相勾结、狼狈为奸所造成的许多事件中的一例，是国民党特务与顾顺章等叛党分子所导演的。当时在白区反对米夫的同志处于腹背受敌的境遇，而苏区反王明路线的同志也是处于内外夹攻的情势，白区与苏区成千成百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阶级弟兄就这样英勇地而又错误地被杀害了。这是党的历史上空前的浩劫！今日痛定思痛，又怎能无动于衷呢？

[注]：先是南京政府将我逮捕，谓已获元凶，起初计议封锁消息，拟采取非法手段对我施行杀害。旋被捕消息经上海外国报纸透露，随后蔡元培、杨杏佛出面营救，南京行政院为此发表谈话，京沪各报亦发表消息，南京政府极感尴尬，对蔡等深致怀恨。乃有中央社代发“声明”的一幕，妄图混淆视听，否定蔡元培的正义行动；后又派特务刺杀杨杏佛实行对蔡威胁。事实昭彰，可以覆按。

附录：《前共党中委罗章龙宣言》及当事人的说明

#### 《前共党中委罗章龙宣言》<sup>1</sup>

中国革命现在正遭遇历史的严重难关。自前岁九一八事变以来，整个民族的生死问题，便提出到每个国民面前。最近日本帝国主义在北方的残酷进攻，更促进全国朝野一致的愤慨。就目前形势而言，挽救中华民族垂危的命运，系于整个民族的精诚团结，及有计划的反抗帝国主义，而中国的国民革命亦必由此而彻底完成，这是无可争辩的原则。但是正值抗日战争的发展中，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恰恰与此相反，使政府受着重大的牵制。基于这一现实的重大事件，加以我在长时间深刻考虑的结果，我深信第三国际现所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绝对不能负担中国革命的任务，反而成为中国革命的障碍，中国革命的完成，只有依赖三民主义的指示及中国国民党的领导才能实现。因此我现在毅然决然宣布脱离中国共产党，抛去我以前的政治偏见承认过去我所做的一切错误，并且勇敢的转变到三民主义旗帜之下，作一个反共抗日完成国民革命的战斗员，现在将我转变的过程简单叙述如次：

当社会主义输入中国的初期，我即开始研究社会主义，随后经李守常的介绍，在北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先后参加学生与工人间活动，数年之间，历经担任支部、区委省委、中央等部的工作。这个时候，我凭着单纯的信念及世界革命热烈的期待，努力为共产主义工作，经常是站在斗争的最前线。国民党

<sup>1</sup> 原载 1933 年 4 月 30 日上海《申报》第 3 张第 11 版。同版同时登有“自首共党罗章龙发表宣言陈述过去错误”消息，全文录于此“宣言”之后，并附罗章龙本人于事后的“说明”一篇。—补注

容共问题发生，中国共产党内部发生了剧烈的争执，此时我一度参加国民党工作，对于“共产革命和国民革命”间的理论，发生过很大的动摇。一九二七年中国共产党失败后采用无政府主义的暴动政策，杀人放火，儿戏革命，造成滔天的罪恶，我当时即认为中国共产党路线（其实也就是第三国际路线）已完全离开中国的实际要求与民众利益背道而驰，因严厉批评这种荒谬政策的结果，被党中央予以种种诬辱。在共党六次大会后共产党的暴动政策又假立三路线的形式，复活起来，我因继续反抗而遭受他们的打击，一九三〇年共产党举行四中全会，我与徐锡根、王克全、孙正一诸人起而反对，组织非常委员会，因反抗失败，被共党开除党籍。自是以后，我对于政治，遂由失望而消积。但是，我仍保留万一的希望。希望共产党更能发现正确的路线，解决中国革命问题，随后此希望亦渐归消失。当非常委员会解散及其后再图恢复之时，我在政治上是万分的悲观与苦闷，政治生活限于停顿，但却因此开始思考种种革命根本问题。就现在看来，我历年来在政治上与组织上既然窥破第三国际及其所领导的中国共产党行动完全与中国革命不相适应，既然明白了目前中国外侮内忧纷至沓来，民众水深火热，中国共产党负有重大的责任。当此之时，我不能根本与之决绝，仍然想在错误影响下面谋图补救，这不仅是个人的主观错误，而且昧于客观的真理，这一错误，我现在是勇敢承认的，并且愿意把他最重要的数点揭发出来：

第一、中国是次殖民地的国家，中国经济长期在国际资本主义控制之下，没有形成有力的民族资本，根本上没有构成共产主义的集体生产条件。因此，中国革命的性质，主要是对内肃清封建残余，对外驱逐帝国主义在华的势力，才能发展经济，安定民生，同时中国革命的动力，应该是联合各阶级的力量，共同奋斗，才能排除强敌，完成任务。但是共产党却根据第三国际错误的估计，抹煞一切客观事实，武断的作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号召，否认无产阶级以外革命势力的存在，这样搬演外来的所超事实的理论，结果所谓“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只是造成农村中广大的屠杀、死亡、灾荒与破产，城市区域罢工斗争，武装暴动的发动，更陷劳苦群众于同样的悲运，这种基本错误，自然是造成其他罪恶的张本，而形成国内的反动的主要潮流。

第二、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一切直接出于第三国际，但就过去事实观察，第三国际对于中国革命问题的谬误，已如前述，而其在策略上朝三暮四，前后矛盾，尤属指不胜屈。中国共产党几次“机会主义”的表演，均以第三国际的派别为背景，而彼吏每次卸其责任于中国共产党个人，助长共党内部纷争，以资其操纵。同时，第三国际自一九一八年以来等候西欧无产阶级革命的援助失望后，一切对外政策，转以拥护苏联为中心，因是而勾结法日，进兵中东路，其所谓援助弱小民族，进行世界革命，不过成为一个好听的名词，中国革命在第三国际指示与欺骗之下，遂简单的成为拥护苏联的牺牲品。

第三、中国共产党的愚昧的理论，及其所秉承第三国际的自私狂妄的政

策，经十余年来事实重复证明，是断定其决不能成为“无产阶级的政党”的，因此共产党经常好象建设在沙滩上一样，他的基础是完全空虚流荡的，既没有多数民众的拥戴，更根本上说不上是革命的先锋队，相反的，真正革命分子现在日益敌视他离开他，只有少数党官之徒，还在虚设机关，希图在这个废墟上建立什么基础，这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最后是只有归于毁灭的。

第四、中国共产党，狂妄的理论与畸形的组织，不用说在正确革命的道路发展中是必然要被埋没的，但是在今天仍然却积极尽其反革命的能事，在全国经济恐慌中，在困难重重包围中，他们最卖力的就是在匪区中东西驰突，牵制政府抗日的全力，以遂其狭隘的私图，在一切的农村中酿成变乱，趁火打劫，在生产界造成骚扰，妨害生产，增加失业：凡此一切，在今日均可解释为仇视民族反帝战线的媚外行为，但是铁却用种种借口，把这一切媚外行为转以诬蔑执政的中国国民党。

根据上述数点，我认为第三国际与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史客观上是反动的集团，我过去参加一集团的言论与行动，严格的批评起来，自然是我的罪戾。我更痛惜多数青年近年来因迷失了政治方向，在错误百出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受了同样的待遇而造成巨大的牺牲。这样经过深长的考虑与国民党当局恺切的说明，我今日是完全从共产党的污泥中振拔出来。

我正确了解三民主义有切合今日中国实际政治的行动政纲，更有崇高伟大的目标与理论。执政的国民党在中国革命中有光荣的历史，现为广大群众所拥护。今日中国紧要的政治问题，就是在国民党政治领导之下，坚决的抗日剿共，开辟民族的新路，调和阶级矛盾代替暴乱与恐怖，实施计划经济，改良农村生活，建立民治民享民有的新国家。

四月二十八日

#### 自首共党罗章龙发表宣言陈述过去错误

中央社云新近在上海自首之共产党罗章龙，即罗漱阶，原定昨晨，在市政府情报处报告罗氏本人自首经过，嗣因前日赴京，未及赶回，故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特派驻沪调查员马绍武代为陈述，罗氏本人并发表自首宣言，兹分录于后。

马绍武：代罗陈述罗章龙，原名漱阶，年三十二岁，湖南浏阳县东乡人，曾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于一九二三年（民国十二年）国共两党合作时，加入共产党，旋因反对共产党之暴动政策，为干部派所开除，罗即自立一派另行组织非常委员会，与陈独秀之托洛斯基派，亦格不相关，罗在上海秘密工作已数载，前因于天后宫桥商业图书馆，被市公安局拘捕，并向渠说明中国共产党之错误后，罗即自首，并由孙正一、彭玉阶担保，乃由市公安局派员护送到京，现在中央党部招待处暂住已恢复自由，蔡元培先生，前曾以民权保障大同盟之

名义，向中央呈请保释，盖不知罗早已得到自由，罗氏本人，且自发宣言，表示其过去之错误，及今后努力之方针，罗氏对政治经济，颇有研究，亦多著作发表，嗣后能为党国宣劳，当亦为吾人所乐闻者。

#### 关于中央社公布马绍武发言的说明<sup>1</sup>

一九三三年上海《申报》，……

此项“发言”与“声明”互为表里，均系南京特务人员一手泡制文件，其作虚摘事实作贼心虚，处处可见，不攻自破。兹说明数点如次：

- (1)由国民党特务马绍武代作声明，本人并不在场，更不知情；
- (2)马绍武原系中共叛徒，投敌后任上海公安局侦缉特务；
- (3)马绍武罪恶贯盈，被打狗队派人刺死于上海；
- (4)蔡元培营救罗的工作始终贯彻到底，没有受马绍武伪造宣言及“公报”所蒙蔽；
- (5)“声明”与“公报”，全系敌特一手作成，可以互相印证；
- (6)罗陷狱期中失去自由，当时既不知道特工行径一切经过情况，营救出狱后离开南京，改易名字，也无法出面声明本人被逮经过，查阅时间、地点均与“声明”、“公报”不符；
- (7)中共过去文件（解放前后）从来未提及“声明”及“公报”，其他书刊亦无此项记载，足证“声明”及“公报”均属诬妄不实之词，全非事实；
- (8)此文不足为据，无参考价值；

罗氏在狱时，既无供出同党机关、出卖战友事迹，出狱后亦未参加国民党组织、担任国民政府官吏，离开南京改变名字，隐沦外埠，授徒自给。仅此一切足证罗氏行动光明磊落，与中共其他投敌份子完全异趣。

又，罗氏入狱之经过，上海西文报曾据实记载。此项记载与国民党中央社记载完全不同。民权保障同盟文献亦曾作正义，特别是蔡子民先生对于罗氏一案挺身而出，仗义执言，排除万难，直到罗氏安全恢复自由脱离虎口为止，义声独著，为各方舆论所称颂。

罗氏出狱，本系由蔡氏保释才获得自由。马绍武发言亦知无法否认故，但却巧为设词，说蔡氏营救在罗出狱以后，此种说法显系张冠李戴，蒙混舆论耳目，其荒谬不经，不值一驳。明眼人自能洞烛其奸。

子民师见报后曾语新元云，此项记载极为奇离，如同结婚大典，并无亲当事新郎新娘在场，显属掩耳盗铃，欲盖弥彰，你何必理他呢。

<sup>1</sup> 见于罗章龙遗存手稿，约写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前。— 补注

策，经十余年来事实重复证明，是断定其决不能成为“无产阶级的政党”的，因此共产党经常好象建设在沙滩上一样，他的基础是完全空虚流荡的，既没有多数民众的拥护，更根本上说不上是革命的先锋队队伍，相反的，真正革命分子现在日益敌视他离开他，只有少数党官之徒，还在虚设机关，希图在这个废墟上建立什么基础，这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最后是只有归于毁灭的。

第四，中国共产党，狂妄的理论与畸形的组织，不用说在正确革命的道路发展中是必然要被埋没的，但是在今天仍然却积极尽其反革命的能事，在全国经济恐慌中，在困难重重包围中，他们最卖力的就是在匪区中东西驰突，牵制政府抗日的全力，以遂其狭隘的私图，在一切的农村中酿成变乱，趁火打劫，在生产界造成骚扰，妨害生产，增加失业：凡此一切，在今日均可解释为仇视民族反帝战线的媚外行为，但是铁却用种种借口，把这一切媚外行为转以诬蔑执政的中国国民党。

根据上述数点，我认为第三国际与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史客观上是反动的集团，我过去参加一集团的言论与行动，严格的批评起来，自然是我的罪戾。我更痛惜多数青年近年来因迷失了政治方向，在错误百出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受了同样的待遇而造成巨大的牺牲。这样经过深长的考虑与国民党当局恺切的说明，我今日是完全从共产党的污泥中振拔出来。

我正确了解三民主义有切合今日中国实际政治的行动政纲，更有崇高伟大的目标与理论。执政的国民党在中国革命中有光荣的历史，现为广大群众所拥护。今日中国紧要的政治问题，就是在国民党政治领导之下，坚决的抗日剿共，开辟民族的新路，调和阶级矛盾代替暴乱与恐怖，实施计划经济，改良农村生活，建立民治民享民有的新国家。

四月二十八日

#### 自首共党罗章龙发表宣言陈述过去错误

中央社云新近在上海自首之共产党罗章龙，即罗墩阶，原定昨晨，在市政府情报处报告罗氏本人自首经过，嗣因前日赴京，未及赶回，故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特派驻沪调查员马绍武代为陈述，罗氏本人并发表自首宣言，兹分录于后。

马绍武：代罗陈述罗章龙，原名墩阶，年三十二岁，湖南浏阳县东乡人，曾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于一九二三年（民国十二年）国共两党合作时，加入共产党，旋因反对共产党之暴动政策，为干部派所开除，罗即自立一派另行组织非常委员会，与陈独秀之托洛斯基派，亦格不相关，罗在上海秘密工作已数载，前因于天后宫桥商业图书馆，被市公安局拘捕，并向渠说明中国共产党之错误后，罗即自首，并由孙正一、彭玉阶担保，乃由市公安局派员护送到京，现在中央党部招待处暂住已恢复自由，蔡元培先生，前曾以民权保障大同盟之

名义，向中央呈请保释，盖不知罗早已得到自由，罗氏本人，且自发宣言，表示其过去之错误，及今后努力之方针，罗氏对政治经济，颇有研究，亦多著作发表，嗣后能为党国宣劳，当亦为吾人所乐闻者。

#### 关于中央社公布马绍武发言的说明<sup>1</sup>

一九三三年上海《申报》，……

此项“发言”与“声明”互为表里，均系南京特务人员一手泡制文件，其作虚摘事实作贼心虚，处处可见，不攻自破。兹说明数点如次：

- (1)由国民党特务马绍武代作声明，本人并不在场，更不知情；
- (2)马绍武原系中共叛徒，投敌后任上海公安局侦缉特务；
- (3)马绍武罪恶盈盈，被打狗队派人刺死于上海；
- (4)蔡元培营救罗的工作始终贯彻到底，没有受马绍武伪造宣言及“公报”所蒙蔽；
- (5)“声明”与“公报”，全系敌特一手作成，可以互相印证；
- (6)罗陷狱期中失去自由，当时既不知道特工行径一切经过情况，营救出狱后离开南京，改易名字，也无法出面声明本人被逮经过，查阅时间、地点均与“声明”、“公报”不符；
- (7)中共过去文件（解放前后）从来未提及“声明”及“公报”，其他书刊亦无此项记载，足证“声明”及“公报”均属诬妄不实之词，全非事实；
- (8)此文不足为据，无参考价值；

罗氏在狱时，既无供出同党机关、出卖战友事迹，出狱后亦未参加国民党组织、担任国民政府官吏，离开南京改变名字，隐沦外埠，授徒自给。仅此一切足证罗氏行动光明磊落，与中共其他投敌份子完全异趣。

又，罗氏入狱之经过，上海西文报曾据实记载。此项记载与国民党中央社记载完全不同。民权保障同盟文献亦曾作正义，特别是蔡子民先生对于罗氏一案挺身而出，仗义执言，排除万难，直到罗氏安全恢复自由脱离虎口为止，义声独著，为各方舆论所称颂。

罗氏出狱，本系由蔡氏保释才获得自由。马绍武发言亦知无法否认故，但却巧为设词，说蔡氏营救在罗出狱以后，此种说法显系张冠李戴，蒙混舆论耳目，其荒谬不经，不值一驳。明眼人自能洞烛其奸。

子民师见报后曾语新元云，此项记载极为奇离，如同结婚大典，并无亲当事新郎新娘在场，显属掩耳盗铃，欲盖弥彰，你何必理他呢。

<sup>1</sup> 见于罗章龙遗存手稿，约写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前。— 补注

中央社新闻证明，这是在与所谓……声明，一并扮演双簧。但在新闻中反面证明罗氏既不在场，也没有回答官方所提出的任何问题。

（为“中央社新闻”按语，按：中央社乃南京政府官方唯一的通讯社，该社新闻一贯反共最力，平日造谣诬蔑、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是其天职，人所共晓，所以从人民革命观点考察该新闻，全无参考价值。）

事实上，罗氏此时尚在禁锢，自由何来？声明何来？更谈不到发布新闻了。罗氏没有参加，此举正说明特务黔驴技穷，故弄虚玄，足见捕风捉影，其掩耳盗铃欲盖弥彰，不值一驳。

如所周知，三十年代南京政府公布共党“自首条例”，反省高潮弥漫全国，投敌份子担任公职络绎相属，不乏其人。

考查当时反省高潮弥漫南北，中共要员如周佛海、陈公博、谭平山、邵力子、施△△等进入国府，高官厚禄认贼作父，多如过江之鲫。反观罗氏却断然离开南京，隐沦草野，授徒自给，事实俱在，岂容厚诬！？

蔡元培给汪精卫信，保释文虎出狱，刊上海《申报》。<sup>1</sup>

<sup>1</sup> 蔡致函汪，保释罗章龙一事，又见《蔡元培年谱》。— 补注

## 十一、罗章龙自传<sup>1</sup>

我于一八九六年十一月三十日晚十二点即旧历丙申年十月二十六日亥时出生，“八字”即为丙申己亥丁亥辛亥。周岁时命名璈阶，字章龙。（弟名舞阶，字章凤。）命名之意取自吴均诗“凤舞龙璈奏太平”句。进大学任教授后，易名仲言，号沧海。笔名文虎、张真、真君等<sup>2</sup>。

我出生在湖南浏阳东乡沔江村。村前有一条小河叫沔江，不能通船，是一个美丽的农村。曾祖父罗尚含（可贞）是个农民，活到九十三岁，勤劳智慧，略有文化，对待儿孙是很严格的。祖父凤楼也是农民。父亲泰钧（葛荪），我少年时代他是在上海高昌庙造船厂做工人，几年以后，船厂营业不振，大批裁减工人，他就回乡生产。

一九一一年辛亥起义，我父到长沙协同同乡人焦达峰进行起义，推翻满清政府，驱逐清廷文武官吏。是年九月，湖南起义成功，焦被推为湖南都督，成立军政府，我父在军政府任职，建议设立学生军，招收青年学生入伍，组织学生军一旅。同时建议开办招贤馆，焦命我父主持招贤馆事，延揽各界革命志士，训练革命军政人材，以为政府臂助。不久，湖南革命内部谭延闿等发生火并，将正都督焦达峰、副都督陈作新（均浏阳人）刺死而夺其权位，我父被迫往外埠逃难，久离乡里。他到湖南水口山铅锌矿山工作了两年，因事被陷于长沙监狱，诬他亏欠公款。

<sup>1</sup> 根据罗章龙后人提供的三种文本（手抄本、油印本、电子本）汇校。原题为“罗章龙自传”或“自传 罗仲言述”，油印本、电子本均以手抄本为底本，主体部分文字相近。手抄本注有“一九六九年记录，此份系一九八一年三月份抄写”字，记录抄写均由罗星原承担；油印本注“第一册”，扉页有“亢斋义斋图书”篆文印，上世纪八十年代前期刻印，有周春玲参与；电子本由罗平海操作，本世纪初成稿。此次汇校收入“亢斋忆旧·续编”，仍以“自传”为题，原附“年表片断”、“年表”等均略。— 补注

<sup>2</sup> 笔名：纵宇一郎、征宇、亢斋、景、沧海、慕敢、真君、真、君、之等。— 罗星原补



先是，文虎在第一联中读书时有历史教员姜济寰，他虽身为县长，但每星期自愿来第一联合中学教学三点钟。文虎历史成绩全班最佳，一次老师提问，文虎回答极好，超出了书本知识，是直接看了王船山的文章所致。下课后，姜老师让文虎去谈谈，并说送一本史学以资奖励。文虎欲将父亲陷狱事告诉老师，又不敢讲。第二次课后，姜老师又让文虎去，并将带来的书给文虎。文虎乃将同乡易科生所写的辩诉书交给姜老师。姜老师看后说：“你家很穷啊，为了几十块钱吃官司。你明天再来。”次日文虎去姜老师处，姜老师对文虎说，你的父亲可以释放。并称自己认识他，不用保，第二天立即释放出来。

姜济寰后来参加中共，一九二七年参加南昌起义，任工农委员会委员，在一次战斗中，为乱兵所杀。他身材高大，很胖，仪容出众。

我父亲出狱后在湖南一铤矿公司的工厂做工人，几年后，一九二六年湖南农民运动风起云涌，他回到农村组织农民协会，斗争豪绅地主，为农民所热爱和信任，被推选为铁山乡农民协会会长。一九二七年来到武汉，在武汉政府工作。他和董用威（必武）、詹大悲（质存）等参加湖北财政委员会，任财政厅工农厅专员、省政府专员。大革命失败后，詹大悲被害，反动派通缉他，他逃到武昌卓刀泉一个农民家里，后流亡长江下游。一九二八年，罗亦农在上海被害，误传为我被杀，反动军队藉此到文虎家搜查，逮捕多人，表妹胡里英被杀。我父亲惊骇成疾，旋即逝世，全家均破。

我的母亲姓夏，外人叫夏太夫人，善良温和，坚韧朴素，略识文字便自学，能看古典文学、历史，能背诵四书、史记中很多段落。外婆只有此一独女，没有亲儿子，对我非常钟爱。我在外婆家住得很久，一去就住几个月。故曾云：“我亦凄凉托外家，如今橐笔走天涯。”外婆很早就守寡。母亲共养育子女四人，我、弟弟章凤，大妹章勋，二妹章箴。我童年时代依母课读，所受教诲甚深。母亲对我说：“一个青年人第一多读书，求知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广交朋友，求‘名师’”。

弟弟章凤原名舞阶，一九〇六年生。幼时因家里无钱读书而失学。一九二五年他考入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与王首道、韦拔群、王恩茂、张平化等同学。一九二五年在广州入党（陈延年介绍）。毕业后被派到湖南安乡县工作，他在安乡组织农民协会，被选为农民协会政治委员，并组织领导农民协会武装。湘西农民运动迅猛发展中，他领导打倒土豪运动，与当地土豪地主武装发生激烈斗争。在一次战斗中，他被敌人围困，双方战斗激烈，援尽粮绝，他突围后又领兵返回，将敌人武装击溃。一九二七年四月因湖南农民协会工作需要调往省城。随后又派他到武汉军委接洽工作，中共中央武汉方面当时省委军事人材

很少，即留他在武汉中央军校学习了一个时期后，派往蒋先云处担任营指导员，时陈赓为该营营长，章凤屡立战功。大革命失败后，一九二七年八月派往苏联学习，与朱瑞、黄火青、常乾坤等同在莫斯科炮兵学校学习。一九三〇年回国，在中央军委工作。同年派往中央苏区，行至福建上杭，因交通阻塞，折回上海，任苏维埃准备委员会副主任兼保卫科长。一九三一年四中全会后，他参加“非委”，担任“非委”军事委员会主任。他曾在东方旅社被捕，旋即脱险（化装为厨工）。一九三二年又被敌人捕去，因患重病被送到虹口同仁医院，与外界隔绝，断绝联系，临危时才通知他的家属，俟家属到时已被迫害致死。死后见他身上伤痕累累，青紫遍身，家属把他葬在上海闵行公墓，立有墓碑，遗子一人。（他原住楚春酒楼一“非委”交通站内，被敌人发现。）

大妹章勋（湘南），一九二七年躲避白色恐怖逃至上海，展转流亡，曾在纱厂工作，任杨树浦区书记，后被迫害致死。

二妹章箴，十八岁时因受牵连及婚姻失意种种，被迫害死。

一九〇五年我九岁时，读私塾（广学书塾）。次年（丙午年）发生平浏起义，战场距私塾广学书屋五里路，起义兵与清兵血战一个多星期，起义军有一万人左右，都是农民，萍乡的工人，手工业工人，领导人是姜守旦。双方炮火十分猛烈。我曾看到一个烧得通红的炮弹飘到学校的墙上。起义军用的是旧式武器，弓箭枪炮，清兵用的是毛瑟枪。结果起义军战败，死亡五千多。这对于我一生是很大的教育。老师诗中有句云：“白骨萦蔓草，碧血染黄沙。”正是彼时写照。

一九〇七年，我十一岁，进狮山小学，这是一个公费学校，衣食住都解决了，安心读了三年书。到一九一〇年，十四岁时<sup>1</sup>初小毕业，考入县立南台高等小学。学校一届有四班，每班五十人，也是公费待遇，对学生施以严格的德育、智育、体育训练。我在这个学校得到许多好的老师的指导，学习有所进步。其中有一位教师刘人熙，学问很好，书法也好，才气纵横。他在清朝是一名进士，后做过广西梧州道台。辛亥以后，他又做过湖南的都督。他曾亲自在我的作文本批过两句话：“志伊尹之所志，学颜渊之所学。”又批道：“要做好人，须得好友，引醋作醇，哪得甜酒。”他还每日早晨起身教学生军训、舞剑、学诗。三年之中我受到他极大的鼓舞与亲切教导。刘曾托一个姓彭的老师问我，说刘校长要和你开亲，后因为我的父亲是个工人，门户不对而作罢。

我在学校曾做了两篇文章，一篇题为“我的家乡”，把平浏起义

<sup>1</sup> 原件之二在“一九一〇年十四岁”处加下划线，并批注“有误× 1911年”。  
—补注

的事写了一遍，老师认为很有魄力。另一篇是“我的学校”，把学校的老师都刻画、描绘了一番，这两篇文章都得到了奖励。

在这个学校第二年时，我母亲突然发生意外，在一次劳动中把脚扭伤了。当地没有好的医药治疗，渐渐溃烂不治。母亲害病的半年里我就休学。后母亲逝世了，这是我终身的恨事。母亲逝世前，我对母亲说，如果你的病治不好的话，我就不读书了，读书不过是为了改善父母及家庭的生活，母亲不在了，还有什么可读的？没有目的了。母亲说：天下像我这样境遇不好的人不止我一个，你读书是救世救人，又不是为了我一个人。你应该继续读书。她遵照老规矩，在临终前将我的手咬了两个牙齿印，意思是要我记住她的话。

母亲的逝世，是我一生中最大的打击。我意志消沉，不愿去上学。后来彭老师派同学送信来叫我复学，最终我复了学。

我在南台小学毕业前的那一年发生了辛亥革命。在辛亥革命前三个月，南台小学发生第一次罢课，反对学监，这是我青年时代第一次参加反抗运动。当时，学生队伍出校游行示威，一直冲进县政府，把那个压迫学生的学监赶走了。领头的学生是杨桓，毕业后他投笔从戎，投考陆军学校，后任旅长，战死沙场。

在小学时代，我就结识了宋天放、李让泉、萧盛礼。

宋天放是个名父之子，家中富有，他是谭嗣同的表弟，并保存有很多谭嗣同文章原稿，他常常带我到他家参观他收藏的谭嗣同的遗物和像片，还有谭嗣同的剑。剑非常锋利，一抽出鞘，满室生光。

李让泉是全校出名的运动健将，能文能武，能背诵《昭明文选》数十篇。他是农民的儿子，绰号“小周瑜”。毕业后同我一道进联合中学，最后投笔从戎，意图在军事上做一番建树，遂考入湖南陆军讲武堂。不幸因过分用功，患肺病而死。

萧盛礼（乐天），浏阳北乡人，少习武，好兵书，是位纠纠武夫，但书法很佳。他口口声声要做英雄豪杰，不愿做一个庸碌的书生。他自己写了一副对联挂在书房里：“柳营（林）春试马，虎帐夜谈兵”。毕业后投考警官学堂，后由警官学校分配他当浏阳县警察所所长。他联络一些失业军人、农民、学生，在浏阳组织了一支起义军，驱逐北洋军阀派来的县长，宣告成立浏阳县独立政府，聚众五千多人，聘请宋天放为军师。他亲自到我家报告起义的事，要我家转告我回家帮他主持军事政治。他把县政府的印交宋天放保管。后敌人派出几倍于他的军队，包围了浏阳，激战七八天，城被攻下，萧带队冲出去，又被北洋军阀张敬尧的骑兵包围，不幸被俘。在狱中，大家问他，他说军家胜败也是常事，我是个播种子的人，不一定能亲自收获，但是我已经尽了我的责任。遂慷慨就义。

狮山小学不交学费，不交伙食费，一年发两套衣服。辛亥革命以后，废除科举，兴办学校，便将狮山书院养秀才的钱作为经费，南台小学也是如此。又因为封建势力，秀才们反对学校，造谣说，进了学校就要当兵。而穷孩子则看见有饭吃、有书读，不仅不怕还争着去。因此报考的人很多。一年级收三十人。我入学后，学校做制服，裁缝是个好人，看我是个穷学生，知道我没有棉衣穿，就叫我回家拿点旧布和棉花来，为我做了一件棉衣。棉衣做好后，还在衣领上绣上“狮山小学”四个字。我穿上制服，心中非常高兴，读完三年以后，又要考高级公立小学，公立南台小学设在县城。

萧盛礼牺牲之后，辛亥革命发生，招学生军，我就报名到省里当学生军。后检查身体不合格，没有考上，就考取了第一联合中学。

第一联合中学是全省最好的一个中学，公费待遇，免收学费。第一天开学收八百人，一年级六百人，共有五千多人参加入学考试。（“联中”不收学费，是由十二个县合资来办。）那时我想恐怕难以录取，如不录取，便无钱读书了。我住在旅社，患得患失，心情非常不安。发榜是一天夜晚，十二点贴出的，听到消息我就去看榜。在榜下徘徊了几次，未能看到自己的名字，不禁十分失望，心潮起伏难平，但无意中我的名字被旁的同学发现，于是我入学了。

第一联合中学校长订了一套极为严厉的的制度管理学生，而老师缺一点钟课，迟到十分钟也要扣薪。在第一联合中学中，我得了两次奖学金（每班前三名可获奖），奖学金有十多块钱。校长是个有作为的人，他的座右铭是两句话：“坚韧不拔，奋发有为。”他用全副精力要办好这所学校。他首先是慎选师资，所聘教师俱为上选人材。如，语文教师黄琴台（铭功），德文教师海里威（Hailyway），英文教员潘伯士，自然科学教员李国钦（李后留美，为百万富翁）等，都是有名的教师。

黄铭功老先生对我的影响极大，他指导同学读周秦诸子，二十四史及唐诗宋词，并以身示教，发挥了极高的教学效能。我一心不乱，在教师的指导下进行学习，把老师所指导的参考书大部分都读过。黄先生本人书法极佳，驰名海内，他的诗词也是第一流手笔。他曾写过一首有名的联合中学校歌，其词如下：“雄杰古潭州，襟带江湖据上游，旧是人材渊薮，汉家光复，共道湘人新造就。四海尽同胞，况吾甕甕同郡，情联意属相研究，一班班作状猷，一行行步伐道……”

那时候湖南有个诗人程颂才的（宁乡人），在岳麓山风景以后，写了两首五言律诗，描写麓山风物，极为神似，诗曰：

（一）岳雨洗新霁，潇湘流碧波。树痕穿不断，峰势乱愈多。斜日枫林晚，天风帝子歌。回看祝融顶，高峰郁嵯峨。

(二)凭栏不知晓，烟霭堕空漠。一雨连江隔，孤城拍岸青。寻碑遗北海，濯剑想东瀛。叹息不能寐，天风吹客醒。

黄先生常在秋高气爽的时节带领班上学生经朱张渡到岳麓山去欣赏红叶，登高赋诗。黄先生自己写了不少游山诗。(同学宋天放、李让泉二人对于古典诗词都有造诣，记得宋天放的诗十分豪放。)黄老师曾将自己没有印行的著作五十余卷交同学阅看，并提建议，我们得到很多人格教育和启发。

我在联中时，黄先生对我的影响和教育极深。他为人正直，思想前进，教导有方，全班学生都很拥戴他。他对于我尤其重视，鼓励我上进，启发我思想自由解放。他说：我们将来一定要到月球上去游历，到其它星球上去探索有无人迹。我的作文多次被作为全校的范文张贴在学校公共布告栏，其中有一篇，他给我的评语是：“天马行空阔，雷霆走精锐。”

我班有一个同学王宸(醴陵人)，他在班上学习考试时，常常和我争高下，有一次学年考试，我八门功课有五门是一百分，名列第一，他名列第二，心中非常不愉快，对我很嫉妒，甚至在言语、行动上表现出来。有一次，他在黄先生面前攻击我，黄先生教导他说，文虎是英杰人物。王宸听了大为沮丧，在宿舍睡了一天不上课。事后他主动找我，把黄先生对他说的话告诉了我，表示愿同我做好朋友，互相团结，共同前进，从此以后，两人的芥蒂完全消除，班上的事也就和衷共济了。

在联中的时候，有几桩事可以引起我的回忆。

联中宿舍旁边有地名司禁湾，是专门禁锢政治犯的地方，院子里有个法场，常常有政治犯在那里牺牲就义。我们曾经多次看到年轻的反对北洋军阀的革命党人，骈首就诛，血染黄沙，使我们十分激动。气愤之余，我们常常讨论投笔从戎问题。其中，彭光闾年纪较大，毕业后被大家推举去北京投考保定军官学校。他的父亲也是个军人。彭被录取后，学习四年，担任桂军见习连长，后因战功逐步升为团长。不幸在北伐时率军到唐山，中道兵变遇难。赍志没地，长怀不已！

我在这时候结识了湘西辰州的一个学生，名叫孙雄飞。他中途退学，回家组织农民武装，扩充了三千多人，占领了几个县城，后被北洋军阀派兵围剿，孙战败出走，逃来长沙，就住在司禁湾附近。他租了一间小房，打算重振旗鼓，再起义师。他常到学校来找我，我也常到他家去，商谈一切有关问题。有一天，他准备就绪，就要回到湘西去，船票已经买好，因临时装货延开，他的行迹被敌人发现，当晚把他夫妇俩人一同捉去，关在司禁湾，严刑拷打，体无完肤。十天后，双双被杀在刑场。

从孙雄飞事件发生后，同学们对于搞武装斗争的事渐渐冷下来了，我们大家想法子把他夫妇的尸首棺殓，并聚集了一些人开了一个追悼会。

言及此，不由忆起孙结婚时，我曾去祝贺，孙一时高兴，敬酒一大盞。我饮尽之后，回宿舍时醉倒在大门外……

我在二年级时，联合联中的各级优秀同学，组织了一个“辅仁社”，其主要成员有熊晖、戴则佃、张孝寿、周邦武、萧成、萧延煦等，郭亮后来也加入其中。“辅仁社”的宗旨：敦品励学，志在治国平天下。极为当时所重。这些成员后来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起了一定的作用。

联中毕业后，连续两年失学，我心情非常沉闷。这期间发生了两件事。

一、当时我的二叔罗孟融因革命失败，流亡在外，他曾邀同几个秀才(他本人也是秀才)在山东潍县组织讨袁起义军，起义军有二千多支枪，四百多匹马，头领是一个湖南革命党叫朱觉仙。这支军队占领了潍县和附近几个县的县城。他们枪支弹药的补充来源是驻防在青岛的日本军队，双方战事进行了一年多，后来袁世凯看到不能消灭他们，打下去亦无结果，于是派议和代表到青岛同他们谈判，谈判结果，把他们军队改编为一个师，保持独立番号，给他们一块驻防的地盘，这样我的叔父就辞职解甲归田。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暂告结束。

当孟融在青岛的时候，他写信给我，想回到湖南找一个自由职业律师做，但他没有适当的资历证明，我就代他考入法政学校，进入当地的达才法政专科学校。我进入法政专科学校后从日本方面买了一大批书籍，一面学习，一面上课。我是这一班年龄最小的学生，班上大的学生有五十多岁，学生大半是前清的秀才、举人。学习期满，考试结果，我在班上一百多人中成绩列在第一名，班上人人惊异，都说罗孟融就是这个小孩子！孟融叔听了这个消息，起初还不相信，后来得到学校的正式通知单才相信且惊讶不止。这事传遍了全城。孟融叔回长沙后，执行律师职务，他成为一个有名的律师。

二、二十八划生征友。

一九一五年秋天，我偶然在湖南第一中学传达室走廊看到二十八划生“征友启事”，大意是征求有志于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志同道合的青年做朋友，里面有两句话：“嘤其鸣矣，求其友声”(语出《诗经》)，全文约几百字，字体为王右军帖意，系油印件，标明通信住址。我看后回了他一封信，签名为“纵字一郎”。几天后，得到回信，信内说：接到尊函，奉读再至，空谷足音，霁然色喜。信末并约定本星期日到定王台图书馆阅览室见面，对方手持报纸为记，签名仍是二十八划生。我接信后，惊疑不定。同学陈圣皋(浏阳人)说，届时我亲自陪你去，

以防不测。

星期日，我们两人步行到定王台图书馆。陈圣皋在院子里等候，远远地监护我，我独自一人到阅览室去，在阅览室外面走廊上，我看见一个学生模样的人，手持报纸，正要向他问话，对方就先开口了。他微笑向我说，你是纵字一郎吗？我颌首作答。于是我领头前行走到院子里假山侧边坐下，两人开始交谈。

我们首先互道姓名、籍贯、学校、班级，随后慢慢谈到学问上去了。他说：“我久已知道你的名字（我的同乡、小学同学陈绍麻是他的同班同学），你近来有些什么写作？”我便将大致情况告诉了他。从谈话中知道他曾参过军。两人谈话又涉及到黄兴革命和黄在日本的情况以及他的现状；又谈了一些当时政治、北洋军阀的问题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问题。谈话继续有两小时左右。他又引我到阅览室，介绍他所喜欢的报刊、杂志、书籍和彭、刘、杨烈士的相片。随后又谈了一些学习周秦诸子著作的问题。他的话连续不断，总也说不完。最后，将近中午饭时，阅览室铃声已响，我们才离开定王台。临别时，他告诉我，以后我们做个好朋友，常常见面，讨论各项双方均感兴趣的问题，并说，“我下个星期日上午一定来拜望你，请你在家里候我。”我和圣皋一道回到学校，圣皋说此人孤高自赏，目空无物，不居人下，是个非常的人，看来没有什么问题，你以后可以常常和他来往。

星期天上午，二十八划生来到山府坪联合中学，见面时索我的日记与诗文阅看。我那时写了一首论法国大革命的诗（路易十六王朝崩溃的事），他看了，非常感动和欣赏，要求带回到他学校去细看，并把我的日记也拿走了。从此以后，他经常到联中来找我，一道出去，游天心阁，凭吊太平天国围攻长沙的战场遗迹。战场上有古时遗留下来的大炮五十多尊，我们就坐在炮身上，看书、谈话。有时两人同渡湘江，游岳麓山。我们两人还互相介绍朋友，我把彭道良（黄铭功的侄儿）等介绍给二十八划生，他把萧瑜（子昇）、何叔衡、傅昌钰、陈昌（章甫）、萧三（子璋）等介绍给我，我们真正成了好朋友，绍麻说我俩是“管鲍之交，后无来者”！

一九一七年冬，润之和我们共同发起组织“新民学会”。第一次开会的时候是在岳麓山周家台沔痴寄庐，基本会员十一人，润之、文虎、萧瑜、何叔衡、萧三、陈绍麻、蔡和森等，以后会员发展到几百人，是湖南革命的中心组织（开会情况待续）。

新民学会成立大会，基本会员十二人。开会年月是戊午年（即一九一八年）农历四月十四（或十七）<sup>1</sup>，星期日。

参加成立大会者：

<sup>1</sup> 新民学会成立于1918年4月14日，星期日，农历三月初四。— 补注

1. 润之，湖南湘潭人，一师；
2. 文虎，湖南浏阳人，联中；
3. 萧旭东（子昇），湖南湘乡人，修业中学教员，原一师学生；
4. 萧三（子璋），湖南◇◇人，一师附小教员；
5. 何叔衡（瞻帖），湖南宁乡人，楚怡中学教员；
6. 陈昌（章甫），湖南浏阳人，一师附小教员；
7. 邹彝鼎（◇珍），湖南湘阴人，一师；
8. 蔡林彬（和森），湖南湘乡人，师院二部学生；
9. 熊光楚，湖南湘乡人，一师二部学生；
10. 周士弟（明谿），一师；
11. 陈绍麻（赞周），湖南浏阳人，一师；
12. 陈书农（启民），湖南长沙人，一师。

其中，陈昌于一九二〇年被派去贺◇根据地，路过常德，知道县长唐某是自己的学生，就去找他，并告诉他自己准备去贺那里，唐将他解往长沙何健处，牺牲<sup>1</sup>。后派柳直荀去。

新民学会在一九一七年冬季对会员升学问题加以详细研究。当时有人主张就地升学或就业。瞻帖率先提出会员留学东瀛路线，经过讨论，群谋佥同，决定由我先行，其他人俟得我回讯后，再继续出发。瞻帖向我说：“目前不急于就业，再读十年书，然后定事业方向，大器晚成，水到渠流。”并在平浪宫设宴，为我饯行。大家热情洋溢，并赋诗赠别。我遂乘华盛轮船东行赴沪。启梗前，润之到码头送行，当面交给我一个信封，说内有诗一首相赠。启封一看，系题为“送纵字一郎东游”的七言古风，诗云：

云开衡岳积阴止，天马凤凰春树里。  
年少峥嵘屈贾才，山川可气曾钟此。  
君行吾为发浩歌，鲲鹏击浪从兹始。  
洞庭湘水涨连天，艤艫巨舰直东指。  
无端散出一天愁，幸被东风吹万里。  
丈夫何事足萦怀，要将宇宙看稊米。  
沧海横流安足虑，世事纷纭何足理<sup>2</sup>。  
管却自家身与心，中心日月常新美。  
名世于今五百年，诸公碌碌皆馀子。  
平浪宫前友谊多，崇明对马衣带水。

<sup>1</sup> 陈昌，史载一九三〇年二月在长沙就义。— 补注

<sup>2</sup> 罗章龙写“自传”时，毛赠诗中此句被改动，后罗又恢复原句“世事纷纭从君理”。— 补注

东瀛濯剑有书还，我返白崖君去矣。

何叔衡、萧子昇、陈绍麻、彭道良诸君亦到码头送行。

华盛轮船从长沙起碇，它是一艘旧式轮船，推进机装在船尾水面上，声音很大，马力很小，每小时不过十四公里，这样走了一天一晚才到武汉。这是我第一次出省到武汉。

我同船上的旅伴登黄鹤楼，游览武汉风景，我印象最深的是李白曾写了四个字“天下壮观”，真正道出了黄鹤楼的雄胜。人们认为他的题字把唐人崔颢的黄鹤楼诗都压倒了。

我在船上遇到了一个中学同学欧阳昆，矮矮胖胖的，是个足球健将。他是湘阴白水人，毕业后也失了学，这次他是到上海去游历的，随身带了一个彪形大汉黄道，他带了几匹夏布，沿途将布卖掉做旅费，生活颇为豪华。我们三个在船上颇不寂寞，如此抵达上海。沿途在九江、安庆、南京、镇江等地都登岸游览（并留有诗篇），船到上海码头是一天的黄昏。

当时，上海码头是一个流氓成堆的地方，情况非常复杂，青红帮很活跃，欺侮旅客，敲诈勒索，抢夺行李，且不许自己挑行李。我们被一个旅馆的流氓欺骗，接去他的旅馆，把我们安排在楼上一间住房。结账时，他要我们一天出十块钱，我们不愿意，他们便纠集一伙流氓想要上楼行凶，欧阳的朋友是个农民武师，他拿一条板凳站在楼梯口，三下两下就打倒了几个流氓，后来惊动了街上的警察，出来调解。因为我们是外地人，又只有三人，流氓人多势众，还要继续欺负我们，武师就揪住他们的头子走到工部局，同他打官司。欧阳说得一口流利的英语，得到法官的同情，关押了旅馆的老板，并保护我们离开旅馆。按照公平的价格付给旅馆每天一元二角。离开这个旅馆后，我们搬到三洋径桥湘益公寓，生活非常舒适，便一面候船，一面游览。在此期间，我与欧阳昆、黄道三人共乘马车游览邑庙公园、吴淞炮台、六三公园、虹口公园、兆丰公园等处。

两星期后，我在大阪公司买好到日本神户的船票，正准备动身，突然报纸登载消息说，日本东京中国留学生因反对日本政府虐待中国华侨和留学生，发生罢课风潮，其中有一部分学生回国请愿。这个消息使我对动身赴日的事情犹豫起来。等了几天，果然有一些留日学生从日本回到上海，其中有一个叫黄日葵（广西桂林人）的和我住在一处，他详细向我介绍了这次风潮，他自己说，不打算回日本去了，愿意到北京大学转学。我听了这番话，决定打消赴日的念头，仍返长沙。

将离上海时，黄日葵约我到望平街群益书店访一个同学，我在该书店买了几本陈仲甫（独秀）编的自学英语的书，又买了几本《新青

年》。我在归途的船上阅读，大为感动，很想到北京去读书，但还不了解北京的情况。《新青年》上还刊载了留法勤工俭学会的启事和章程。

一九一八年三月，我回到了长沙。回长沙后，我把《新青年》送给何叔衡和润之阅读，他们也受到极大的感动与启发。我见到何叔衡后，他问我今后打算如何，我说想到北京升学。何说，《新青年》所载勤工俭学是一种新的运动。我看，到日本留学还不如到法国留学，水平还要高一些。从此以后，新民学会会员间经常互相讨论到北京去的问题。其中蔡和森最为积极。蔡是湘阴人，在岳麓山师范二部毕业，现在失学，听到法国留学问题，十分激动，愿意先到北京探索情况，大家便推他先行赴京。他从长沙乘坐一条木船，从洞庭湖到达汉口，转车北上。蔡抵京后即来一信，对勤工俭学大事渲染，估计前途十分乐观。据他的说法可以使中国青年根本解决失业和失学问题。于是，新民学会开了一个会，经过讨论，决定派会员十余人连同非会员学生共二十二人，第一批先行赴京。

一九一八年阴历七月初，一行人自长沙坐轮船到汉口，转乘火车北上，十一日到达河南省郾城县，停留一天，因当地沙河秋汛，铁路桥梁被大水冲断，大家在郾城县停住一天后，自郾城县步行至大石桥，又行三十里至许昌，再由许昌搭车于十三日到北京。

第一批赴北京的有润之、文虎、罗学瓚、陈绍麻、熊光楚、萧子昇、萧子璋、欧阳泽、邹鼎承、成湘、杨楚、王人达、黄建中、傅伦等。

初到北京，我与陈绍麻一道住在北半截胡同浏阳会馆东屋。会馆的北屋是浏阳有名的学者谭嗣同曾住过的地方，北屋中还有他的遗像和床榻、书桌等。大家参观以后肃然起敬。会馆里老工人向我们介绍谭嗣同生平的事迹和就义时的情况，滔滔不绝。他是谭嗣同在北京时代生活的见证人。

会馆长班（老工人）介绍：谭的父亲任湖北巡抚，母亲早年去世，父亲续娶一位后母，故而父子之间很是生疏。其父在保定做官时为他包办了婚姻，谭不满，于是经常在外游历，无牵无挂。他常带着两个仆人，其中一人叫做罗升，与他有很好的友谊，谭在诗句中曾提到他。谭就义后，二人将他棺殓运回浏阳。谭曾着青衣，手舞大刀照了一张像，象个侠客。老工人解释青衣是侠客们着的夜行服。

当时我一个同学的哥哥名叫罗晋阶（绍白），是前清秀才，很有学问，也是我的老师。他也住在浏阳会馆，同时在北京司法部任见习推事。他对我来北京表示极大的欢迎，并给予许多精神上的帮助。

后来，我们七个新民学会会员在北京后门（景山东街）崇祝寺后

身三眼井一条小胡同名叫吉安所夹道的七号租了两间小房，共同学习与生活，同时策划留法勤工俭学的运动。

吉安所东夹道七号二间房出租，每月租金五元，租房事宜我们推萧子昇出面办理。女房东见萧衣冠齐楚，彬彬有礼，立谈之间即决定出租。后见搬入居住人数较多，且大多形容憔悴，衣服褴褛。女房东大感不快，颇有悔意。但看到房客大都是学生模样，行止不俗，也就安之若素，久而久之，双方渐渐厮混相熟，借针线，洗衣服，往来无间。

某日，女房东与绍麻闲谈，她说：“你们象是落难的孩子，来京干嘛呢？找好差使没有？北京生活昂贵，不宜住居。”绍麻回答说：“我们同学中有人已考上北京大学，还有的打算赴法国做工兼读书。”她说：“是勤工俭学么？法国战后失业严重，这怎么能成，还是打听清楚再去，以免……”绍麻返室以女房东的话转告大家，众人漫应之，因为木已成舟，无再考虑余地。

#### 关于萧子昇（瑜）二三事

萧瑜，字子昇，湖南湘乡人，东山小学毕业进入长沙第一师范，毕业后被聘为湖南修业小学教员。子昇在第一师范与润之同班，二人友谊颇佳。一九一七年新民学会成立，子昇被选为总干事，润之任副干事。一九一八年子昇辞去小学教员职务，同新民学会会员一起到北京学习与工作。到京后，通过湘绅某介绍结识保定高阳人李石曾（李祖父称高阳李相国），经李推荐担任华法教育会秘书。萧从此一帆风顺，大富大贵，中年以后，辞官外遁，作海外富翁。

子昇居北京时，与润之、文虎等七人僦居吉安所夹道陋室二间，仅堪容膝，数人挤卧土炕，越秋度冬，自行做饭，无煤缺水，生活苦不堪言，有时竟吃面糊以疗饥。同居数人只有外套一件，乃文虎叔父所赠军用外套。平时挂在壁上，由大家轮流穿着外出，以利工作。

子昇美丰仪，貌若处子，润之尝戏谓子昇生本为女儿，竟不知怎样化为男孩。子昇善词令，语若笙簧，且能文章，擅书法，能作瘦金体，有翰苑风度，因此李石曾一见钦赏，推心置腹，予以重任。

李在北京香山筑有别墅，某日用电话邀请子昇至西山会谈，子昇转约文虎同行。二人至碧云寺，李石曾设宴款待，席间山珍海味，名酒佳肴，应有尽有，李即在宴中谈约委萧子昇以华法教育会书记全权。数星期后，萧子昇遂以赴法代表名义率第一批留法学生陈绍麻等赴沪放洋，直航马赛。

子昇离京时，吉安所同人送行至天津，便道至大沽口茅亭野餐，临行各赋诗为赠。文虎诗云：“雪月映西山，冰封渤海湾；围炉忻笑

语，别意动燕关。徒倚双轮动，踟蹰落日闲；车书观万国，海上有书还。”子昇乘法国邮船途经苏伊士运河，作“夕阳渡红海”诗以酬答。

一九一九年李石曾开始转入政治活动，子昇回国协助，子昇乃由马赛回北京。子昇至北京大学西斋访文虎，并邀文虎赴宴，二人同车至前门外某浴室休息，适有地震发生，居民纷纷惊避，秩序大乱，二人幸免于难。后子昇乃为李游说，由文虎、蔡、李、萧等出头组织“中国非宗教大同盟”，其组织成员主要为北大哲学系、燕京、清华、高师等校的同学，刊行非宗教丛书，印行五万多册，执笔者为萧、文虎、蔡等。一时北京基督教、宗教界颇为震动。萧不久第二次赴法，以后即与新民学会分道扬镳了。

#### 中南海

一九一八年在欧战结束后，北京政府为了庆祝协约国作战胜利起见，特通令举行全市庆祝大会。主持此庆祝大会的北京政府规定开放中南海，允许市民自由参观。这是空前盛典，陈绍麻建议到三海游览参观，并打算到大液池（南海瀛台附近）边垂钓。因此，住吉安所同人四五人，同到三海和故宫参观了三天，当时最引起大家注意的是参观紫光阁的历代……<sup>1</sup>

#### 海王村元宵灯会

在一九一九年二月间，旧历春节期间元宵节晚上，文虎、润之同往琉璃厂甸观赏灯节。全城张灯结彩，火树银花，盛况空前。如此繁华夜景，在家乡长沙确未曾见。二人从前门经过珠市口，大栅栏，步行十余里，并折向西行经琉璃厂甸，海王村等地，兴尽而归。在厂甸附近见有北大教员师生数十人围聚在几个大型红灯宫灯下正猜灯谜，大约有几十个纸书谜彩条缀在宫灯下面，征求过往赏灯者竞猜，猜中获胜者奖赏物品为纪念章、文具、字帖、书籍、锦旗等。当二人游至海王村时，各巨型宫灯上所缀灯谜几乎都被游人猜出领奖携去，仅余一个灯谜，上书：“自耕稼陶鱼以至为帝。”（按，此语出孟子），谜底下为北京一地名。润之首先发现此灯谜，徘徊宫灯下沉思片刻，不得其解，乃轻声语文虎，共解此谜。文略加思索笑答，这地名就在我们脚下，因以足点地说，琉璃厂甸海王村便是。因为此谜文耕稼影射村，陶影射琉璃厂甸，渔影射海，帝影射王。润之听罢狂喜，大呼妙文妙地，二人乃踏月而归，只见沿街夜深人静，皓月当空，银河泻影，到达吉安所寓所，已近三更，乃推门而入。以经过告同人，绍麻抚掌称善不置！

<sup>1</sup> 罗星原曾注：（缺18页、19页。）—补注

新民学会会员由萧瑜率领第一批同学离开北京到天津，大家把他们送到大沽口，就在大沽口一个小饭馆里开送别会，同时看海景，赋诗送别。

第一批同学赴法前后，新民学会留京同学开了一个会，讨论结果决定两个人留在北京，一是润之，通过蔡元培在北京大学找到个工作，一是文虎考入北大预科。我到北京大学后开始上课，学习主要是自学，大部分时间到图书馆看书，阅览中西典籍。北大藏书很富，是全国有名的图书馆，当时有书近百万册，都是有名的版本，最好的书籍。我埋首在图书馆看书，如泛沧瀛，意境极为广阔。

我在长沙时，在学问上有些自高自大的想法，但是进入北大以后，这是文人荟萃之地，能人之上复有能人，因此我有些自卑起来，茫然不知安身立命之所在。此期间，在教师中最我先认识刘三、李大钊、陈仲甫等，同学中我最先认识特立、中夏、“夜郎三王”等。

仲甫白云：仲甫父亲以科名任清朝皖南守备之职，教子甚严。仲甫十四岁中秀才（第一名），考举人未中，遂绝意仕迹，赴日本。一九一二年归国与柏文蔚共谋起义，推翻满清后任安徽教育厅长。袁世凯专政后遁逃日本，过流亡生活。一九一七年归沪后办青年杂志后改为《新青年》，“五四”后，提倡新文化，推倒古文，遂任北京大学教授兼文科学长。我在预科偶被推为代表向仲甫交涉某事，仲甫赋性急躁，师生间于是口角冲突，双方不欢而散。事后，仲甫认为文虎有胆识，乃命人请我去解释，以后二人渐成莫逆，过从无间。仲甫在文科学长期间多次邀我参加他与蔡子民（元培）的谈话。

蔡元培在清末少年科举（中探花），一帆风顺，青云直上，直到翰苑。但蔡思想行动极为瑰奇飘忽，他弃官东游，吸收新知，译有“妖怪学”出版，士林阅读，无不愕然。他任北大校长后，标榜思想解放，自由放任，延揽师资兼收并蓄，自辜鸿铭到张兢生，一视同仁；对北大激进派青年学生极表推重，对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加以赞助。他介绍我参加“北大哲学会”、“道德学会”和“新闻学会”。一九二〇年当仲甫被京师步统领逮捕时，蔡以己之去就向政府力保，终得释放。后来我先后在北京、南京陷狱，蔡亦不顾个人利害，将我营救出险。

李大钊字守常，号孤松，河北乐亭人，少孤，依祖父抚养成人。祖父为私塾教师，教守常学习古文、词章、诗赋。守常十八岁考入直隶法政专修学校，毕业后自费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能文章，慕革命。归国后任北京大学教授兼图书馆馆长。一九一八年秋，我进入北京大学预科德文班学习，课余之暇应教务处之召往本校图书馆清理外文书籍并编号。当时我因工作繁重，央请王懋廷、王儒廷（均通法文）、

王友德、李墨耕（均通英文和德文）等共同担任清理工作。历时几个月才算完成。守常对我们的工作非常满意。同时，我在预科学习成绩优异，李极赏识，又将我介绍给仲甫。

守常同我谈话时，问我的籍贯后说道：“你知道谭嗣同的家世否？”我说我与谭同乡，在小学读书时常到谭家去访问，因将谭的家世，治学师承，诗文著述与友好往来等情况详告。李聆言大为感动，对我说，“湖南青年艰苦卓绝，被褐（穿粗衣服）怀玉，奋发有为，不可多得，实乃南方之强。”他对谭浏阳的向往如此！

每至周日，李常电话约同学到石驸马大街后闸住宅谈话和聚餐，主客漫谈无拘无碍，兴尽始散。一次我在他家，他入内请夫人和姑母入客厅同席就餐，座中有吴夫人新从东京归国，询之，亦湖南人，后来知道往来于李先生家中南方朋友确不乏人。

刘三，苏州人，原同盟会员，革命与政治失意，沦为教师，便努力读书、著述。刘能诗文，善唱昆曲，刘住苏州胡同自行做饭洗衣。我到刘处，他上下古今，无所不谈，刘对我甚器重，但不谈政治，有如惊弓之鸟，以明哲保身为尚。刘后任国民党监察委员终身。

#### 北大同学

特立，理学院数学系高材生，身材魁伟，善思考问题，有谋略，遇急事，雍容坐镇，有谢安石之风。

邓中夏，原名仲翬，字安石，湖南宜章人，父为京师地方法院法官。邓在中国文学系本科肄业，思想激进。中夏天资不高，但勤学苦读，勇敢有为，好大言，人称“邓大炮”，是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中坚分子。

“夜郎三王”均云南省人。

当时北大的学风不是很好，师生多摹仿贵族官僚的生活，好看戏，品花，风流自赏，自号风雅，相习成风。但也有些教员与同学风格清高，努力向上，不慕势利，不谈爱情。这两派人的生活如天上地下，迥然不同。

我除正式选课以外，还到外系听了几门功课，如从辜鸿铭学翻译，刚和太（意大利人）学拉丁文，向黄季侃学词章等。

#### 曦园

北大三年级的时候，我们邀集了一些志同道合的同学共同过生活，组织了一个团体叫“曦园”。曦园地点在北京大学附近皇城根达教胡同四号。成员共二十余人，其中最重要成员有文虎、特立、陈介石、刘克俊等。（陈后当专员市长，刘当立法委员、教授。）

在曦园里，大家挑水、做饭、扫地、洗衣服，互相帮助。伙食费一律七元，交不起的同学可以少交，由大家互助，又组织了共同的学习班，由有专长的同学领导学习外语、语文、物理、化学等，互为师生。还共同在某报办了一个副刊，从事翻译写作。从副刊所取得的稿费大家用，买书，补助伙食，医药互助，每月七、八十元。

我在这个时期写了很多文章，翻译和写作了一些文学作品，如《茵梦湖》、《红外套》就是这个时候翻译的。与此同时，我和同班同学商承祖交往很密，他是商衍鏊（满清探花，曾任清廷驻德国公使）的儿子。自幼随其父在柏林学德语，造诣很深且品学兼优，我和他共同翻译了一本哲学著作，书名《康德传》，由中华书局出版。同时我又翻译了德国文学著作，如斯托姆的《茵梦湖》等名著。

《康德传》是叙述德国近代最大哲学家康德生平的思想、言论和行动的综合论著，全书二十五万字，其中纯粹理性部分尤为深邃，文和商章孙（承祖字）教授<sup>1</sup>合译此书，二年始竣事，交由上海中华书局哲学丛书出版，风行于全国，前后重版多次。

《绮梦思》Immen see（《茵梦湖》）是德国文豪斯托姆 Teodor storn 著名文学作品，以作者少年时代与伊莉莎的初恋故事为题材。故事发生在蜜蜂湖畔，叙事清新，诗文并妙，其中民歌诗韵均称佳构。我以极大精力译完此书。德文系教授杨丙辰对此评价很高，称为“青出于蓝”云。后来杨任河南大学校长，聘我为教授，实由于此。诗中有句云：“窗前有棵白桦树，黄金的流光飞渡。”杨老师建议文将此译本出版，我即向一个书店交涉，书版商勒索费用，因而出版未成。便先在报上发表。后有某投机分子套用伊稿，改头换面，自行出书，大获其利。

大约过了一个学期，有些同学毕业离校，曦园组织解散，我就搬到马神庙北京大学西斋宿舍宇宇号居住。宇宇号是一独立小院落，有三间房，住有六七个同学，同住的有一个理学院姓于的学生，他那时正创作成功一种仪器。另外几个广东同学是学法律的，与谭平山、陈公博同乡，他们互相有往来。

住进西斋以后，我正式从事各种校内外的革命活动，除上述同学以外，往来密切的还有商承祖、宋天放、王净、黄日葵、范鸿劫、张树荣、何孟雄、缪伯英、李墨耕等。他们都是学有专长，且风格高尚，同情革命，因此大家同心同德，开展了很多方面的工作。

#### 曦园诸子与“五四运动”

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了，

<sup>1</sup> 商先生后为教授，此处罗章龙以其后来身份尊称。— 补注

这个运动以北京大学学生会为中心，而曦园诸子大半是北大学生会的上层和中层领导人物。

五月四日那天早上，北京八个国立院校数万人在天安门集会，会后举行游行。当游行队伍行至王府井时，北大学生会负责人易庚虎、文虎和法文专修学校罗汉等秘密协商把队伍引向赵家楼曹汝霖家示威。群众队伍到达赵家楼后，见军警防守甚严，铁门封锁，不能进内。罗汉首先登在另一同学肩上翻窗进内，随他进去的有十多人，他们随即将大门打开，放进队伍，群众一拥而入，冲入客厅。当时驻日本公使章宗祥正在曹汝霖家中，群众就把章宗祥推倒在地，饱以老拳，打得他头破血流，受了重伤。随后起火，满屋烟雾冲天，哗啦啦就烧起来了。这时有妇女从室内走出，披头散发，大呼救命，原来她就是曹汝霖的妾苏佩秋。由文虎和罗汉上前将她引出火场。

至六月三日，“五四”运动第二个高潮再起。三日那天，文虎和罗汉、中夏、孟雄等一百多人被捕入狱，关押在北河沿北京大学第三院十五个教室内，北京卫戍方面负责人派兵五营包围了北京大学，并在景山高处安装大炮，声言要炮轰北大，借以镇压北京的学生运动。此事震动京内外，于是罢工、罢市、罢课广泛开展起来，外面的市民派来很多代表到第三院赠送食物、日用品、衣服、被盖等，如此经过了十多天，由于舆论的谴责，群众的强大压力，北洋军阀才允许蔡元培出面将他们保释出来。

#### 辛店十人团

“五四”运动告一段落后，北京各院校开始复课，同学们对于几个月来大噪大闹的生活感到疲倦，动极思静。红楼图书馆阅览室，人数又渐渐地拥挤起来，只有一部分学生仍有余勇可鼓。这时出现了一个新的政治动向，即是向工人运动进军的一幕。

这个新的动向的开辟者是以文虎、特立、守常等几个北大师生为核心的小组。

先是在“五四”期间，长辛店车站电报房有少数学生响应北京爱国运动，曾组织“十人团”参加反对卖国外交，抵制日货运动。在运动中，辛店“十人团”经常到北大西斋找特立、文虎等联系工作，交流经验，为礼尚往来，北京方面决定回访他们。

长辛店位于太行山东麓，永定（桑乾）河中游，是历史有名的形胜之地。战国时候，燕国的都城就在附近。昔燕太子丹遣荆轲刺秦王时，使荆轲持督院地图送给秦国，督院就是长辛店附近一个土地肥沃，出产丰富的农业地区。现长辛店是属宛平县。文虎、特立到达辛店时，“十人团”同学们热情招待。为我们导游芦沟、辛店，并到大厂照相，



参观清代慈禧太后的花车，最后到机车厂参观。见到了史文彬、陈历茂、陶善宗、王俊等师傅。这些人都是后来北方铁路工人斗争的风云人物。

#### 会见邓少山

文虎、特立二人自辛店回北京，在五人小组座谈会上做了一个简单报告，守常喜形于色，说此次宛平之行可谓不虚，可喜可赞，今后应继续向京津地区寻找战场，征兵积粮，以求发展。大家商谈结果，决定由文虎、特立赴京东一行。两人下车后茫无头绪，于是先到唐山路矿专门学院——唐山大学访同学许君，他是“五四”风潮中唐山大学学生会负责人。在会谈中，许偶然提到他在唐山机车制造厂实习时，认识一位广东工人名叫邓培，字少山，他是当地广东会馆的理事，在工人群众中颇有威信，但许未能说出关于邓培的更详细的情况。我们辞别许君，回到旅社，研究结果决心去寻访邓培，但苦于不知邓的地址。不意在饭馆吃饭时遇一广东人，攀谈之下知道他姓陈，广东香山人，是机车厂木工，耳有些聋。陈自称与邓培同乡，所住宿舍相邻不远，我们因请陈师傅领去访邓，这样在邓家中见到了邓少山。

邓培当时约五十多岁，有三十年工龄，三代（其父、本人、其子）均是工人，本人是镗工，每月收入九十多元。邓有中学文化程度，好阅书报，能说英语，看英文图纸操作（车间主任是英国人）。与邓谈话中知道，一九一四年唐山曾有过工党组织，邓曾参加过这个组织，但未久，邓停止活动。我们有意和他漫谈十月革命的新闻和消息。经过多次接谈，我们约定请邓担任劳动通讯社记者，互相交换所知的政治新闻、工厂情况，临行，邓为文虎、特立送行，彼此珍重道别。

#### 夜宿碣石山中

我们到唐山会见邓少山是一个大收获，我们内心很感谢那个耳聋的木匠。离唐山后，顺便到秦皇岛、马家沟、王家宅等地煤窑游历，通过铁路工人的介绍，我们认识了几个当地贫苦矿工，并由他们指引，下矿井参观，深入地下千尺以上。这里有一个矿井在前不久因瓦斯爆炸，死伤四、五百人，造成极大伤亡。此行结果，结识了十多个矿工，他们后来都成为开滦五矿大罢工的领袖人物。

在秦皇岛参观了几天，应该进行的事务办理完毕，我顺便去到碣石山看望李守常。守常住在半山中的一所别墅内，对不速之客到来，突然扣门感到意外，但见面后十分喜悦，亲自做饭招待我。饭后并引我登山越险，跨独木桥，观海涛与日落奇景。我们坐在一棵大松树下自由漫谈，直到黄昏以后才回到别墅下榻。谈话当中，守常对于我们

近来的活动感到很大的兴趣，他说：你们的辛勤劳动将来便是震动历史的震源地。他又说：像邓少山乃历史戏剧人物，不可多得！

文虎从碣石山回到北京，过了些时，通过秦皇岛路矿工人的介绍，又独自一人到南口建立一个“点”，负责人是张清太、张济海、王洪文、陈再兴等。张济海是一个列车长，天津人，颇有文化，略懂外文，为人颇有风趣。他向文虎说：我们劳动工人是要求革命成功的，我为此不断求贤访友，今天见到你，感到极大的愉快，以后我做事就更大胆了。果然，张在后来独当一面，取得了很大成就。

#### 列宁使者东来

当时，苏联被帝国主义包围，国际间交通断绝，那时在远东方面组织了一个共和国，是半独立性性质，与苏维埃本部联系不密切。白俄军队在赤塔邻近中国东北处非常猖狂，中国的俄国大使馆、各地领事馆、中东铁路的实权都掌握在白俄手里，还有一部分白俄舰队逃来中国。因此，在这期间，中国与苏维埃俄国之间没有发生直接外交关系，后来远东共和国撤销，但中国境内的白俄势力，还挣扎了一个时期，直到一九二一年左右，苏联的外交人员才正式来到中国。

北京大学当时有一位俄文教员叫柏烈卫的，他在过渡时期内长期留在中国，同北京大学革命学生发生联系。又有一位山东的教员旅居北京，名杨明斋，他是苏联的共产党员，也与北大学生发生联系，但这些都是个人的关系，不过互相交换宣传刊物与革命情况而已。

苏联方面由列宁正式派遣代表到东方的活动是一九二〇年春季，这批代表主要是马林，伍廷康和夫人等。马林原在印度尼西亚做革命工作，对东方情况颇为了解。伍廷康是一个留美的学生，他们最先到日本，从日本方面对北京大学有所了解，通过日本共产党人佐野的关系来到中国北京大学。他们来北京的目的，主要是找仲甫，其次是李守常。当时仲甫已因《市民宣言》的问题入狱，出狱后即离开北京，所以马林、伍廷康等就去访问李守常。

马林等到北大后即见到守常，双方倾谈甚欢，因马林等首次访问时请求约有代表性的学生参加谈话。守常即用电话通知文虎、特立、君宇（高尚德）、杨明斋、刘宇<sup>1</sup>在北大图书馆开座谈会接待他们。在座谈会上，大家各自用各人所谙的外语和他们交谈。所谈问题大致分两方面，一方面是国际代表报告革命以后苏联方面的政治经济情况与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等。当场国际代表将带来的苏联十月革命后出版的书籍、宣传品等，包括大量的马、恩、列的著作以及国际通讯等（分别英、德、法、俄四种文字出版）交给我们。双方谈话记录也于整理

<sup>1</sup> 刘宇，即刘仁静，又名亦宇。— 补注

后交国际代表阅看，在谈话会上，国际代表表示，他们以第三国际的身份批准参加会谈的七个人为共产党员。会议结束后，国际代表启程去上海会晤仲甫去了。

柏烈卫在七人小组成立前后曾经捐款帮助北京附近的工人运动，他又曾介绍从苏联来中国的文学艺术家与小组成员往来。

文虎等一次在柏烈卫家中会见埃罗新哥（Elosink，亦译为爱罗先珂），盲人，年三十多岁，凭自学成为作家，所写童话、诗歌蜚声国际文坛。苏联十月革命后他流浪远东，最近自日本来到中国，北大聘埃为文学讲座，寓居柏家。他是一个有非凡毅力和观察力的作家，他询问文虎游泰山的情况，文虎以所见告之，说到摩崖无字碑时，埃说：这是泰山返老还童的迹象，构思与众不同。

（以下原文脱落。）

一九三三年四月十日发生之文虎被捕入狱事件始末：

先是一九三一年春季，文虎因事出走，离开上海赴东北，在东北住了两年，由于东北镇守使丁超发觉，在哈尔滨立足不住，与王儒廷商议决定文虎暂回关内。文虎亦自念离沪多年，敌人可能疏于戒备，便同意回沪。

文虎回到上海，暂寓公共租界杨浦路李梅羹处。李当时在德国礼和洋行任德文秘书，李向文虎建议在沪住些时候，一面检查身体，治疗疾病，一面托北大同学在外埠物色工作机会。不料，一星期后突然发生一件惊人事变。

四月十日下午，文虎因事到公共租界天飞宫总商会图书馆，甫进馆门即遇一穿洋服者跟踪而至，操上海口音轻对文虎说：请到那面说话，文虎感觉不妙，欲急步离开图书馆，但四面一望，已有许多便衣特务围拢，将文虎架至大门外一辆预先停放在那里的一黑色小汽车内，随即开足马力，向南疾驰而去。文虎发现车中六人各有轻便武器，顶风待发。所乘汽车前后各有武装汽车一辆，带有手提式机枪押运，风驰电掣，向苏州河以南疾驰。不多时候，汽车开抵中国地界，宪兵机关将文虎看押起来。

护车的人旁人称他为某秘书，西装笔挺，皮鞋闪亮，似大学生模样。汽车经过英租界时，他口操流利英语和英国巡捕交谈。

文虎到宪兵兵营后，已是下午七点多钟，满城灯火，已过黄昏。几天后，审讯一次，问姓名、年龄、籍贯，文虎不语。问：居住何处，同住何人，文虎默然不答。再问：你要把你的住所说出来！文虎答：我从外埠来，上海无住所。问：你鼓动工潮，危害民国，知罪吗？答：这是国共合作时代反军阀的旧事。

文虎被捕事，当局极力保守秘密，不使外间知道，但是过了两星期后，偶然有一外国报纸的记者从英国巡捕房探得消息，立即在上海英文晚报透露出来，其它报纸也就相互转载，一时流传开来。

此时，李梅羹看到消息，立即组织营救工作，他亲自通知刘炎，刘又转告王新元<sup>1</sup>，商谈结果派李梅羹到南京去找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蔡听得后，答应全力设法营救。

当时，蔡元培和中央研究院干事杨铨（杏佛）等组织了一个民权运动同盟，设法营救南京方面落网的政治犯。于是该同盟便动员舆论向南京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将文虎与当时还有几个其它被拘者放出。彼时，行政院长汪精卫为此事向外界公开发表了一个谈话，大意是，“文案”证据上不充分，应依法秉公办理云云。这个谈话发生极大震动。就在这时，上海方面奉命把文虎立即押往南京听候处理。

文虎解到南京，被押在北城军警督察处，文虎患病狱中，久治不愈，北大同学王迪云等请蔡元培出面保文虎出外就医。蔡即派人到监狱要求具保，并请律师担任辩护。律师说：“文案”不适应《危害民国治罪条例》，为人道主义起见，应准予具保出外治病。但当局一味拖延，久不同意。

文虎入狱时，有些别有用心者要虚报功劳，多领奖金。而那些直接办案的人唯恐文虎保释出狱对他们不利。先是他们在几个月前为逮捕仲甫，获取了巨额奖金，据说有十万之多。这次亦希望从“文案”中获得巨额奖金。当他们见外面舆论压力很大，有无条件释放的可能。这班走狗遂大起恐慌，即于文虎在狱中失去自由之际，假冒文虎名义发表了一篇文字。文虎在狱中一直蒙在鼓里，全然不知，出狱后亦未能见到。

一九三四年下半年，蔡元培的保释书才被批准，实行无条件保释出狱。文虎在狱中时，汪精卫曾派中央社记者萧某向文虎致意，出狱后愿送文虎出国游历，被文虎拒绝。后蔡元培又亲自语文虎，希望留中央大学中央研究院工作，文虎亦未同意。后来文虎到河南开封河南大学担任教授。

“文案”告密者据说是向忠发之妾的表弟小丁（默村之弟）与一姓熊的人。

杨杏佛先生被国民党行刺暗害：

杨杏佛，名铨，留美学生，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民权同盟”的实际负责人，杨原在北京时一度与文虎相识，为蔡校长门下高材生。杨阅报得知文虎被捕消息，曾亲到上海访问刘炎，并请律师为文虎辩

<sup>1</sup>王新元（一九〇四—一九六九），湖南长沙人，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共，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曾任国家轻工业部副部长等职。—补注

护，理由是文虎在三年前已失党籍，不能采用《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杨铨从刘炎处取去文虎近年所写研究史稿七卷近一百万字，藉此证明文虎近年从事学术研究。提出文虎现患病狱中，为人道主义起见，应准予保释出外就医。同时，杨铨、刘炎、李墨耕与律师张某对当时案情加以研究，结果大致决策如下：

1、避免采取直接军事处理，主要对策是大造舆论，请求司法干预，以免军事暗害。

2、避免用 C.P. 党员身份起诉，宁可接受“鼓动工潮”，并将工潮问题推为历史问题。

3、绝对避免采用自首法，争取无条件出狱。

经过舆论压力，行政院长公开发表谈话（准予保释），文虎最后始获自由出狱。

杨铨因营救政治犯张、陈等出狱，深受反动派所忌恨，决心置之死地，乃于事后派遣刺客数人，乘杨外出不备，包围袭击，地点在法租界中央研究院附近。杨身中数弹，其幼子亦负伤。杨因伤势过重死于医院。杨被害后，“民权运动同盟”解散，林语堂等匿迹销声，遁世以歿。杨铨以身殉仁，有汉代朱家、郭解之风，为当时社会所景仰。

据另一种说法：蒋闻文虎被拘，曾自南昌行营电沪龙华司令部令“就地处决”，但当时熊式辉不在上海，其军法官黄某得讯。黄原武汉大革命时代在湖北任法官，与文虎有旧，在此千钧一发之际，一面藉口长官不在，迟延不执行命令；一面将此事通知其同乡杨铨，杨乃出面请求保障人权，至将“文案”移交司法机关处理。蒋后虽知此事，然木已成舟，后悔不迭，亦无可奈何！

杨杏佛被刺后，曾在吴淞地下工作（余立亚所领导）的张越兄弟等曾决定组织淞沪地区铁路罢工，以示抗议，不幸事机不密，为“临中”伙徒所卖，所谋未成，张等被捕。

文虎在狱中，心平如水，赋诗一首，自讼云：“心平如水气如山，百里征程九十艰。十年养晦思仲甫，去易留难忆求南。浮沉大狱人间世，变起萧墙行路难。革命完人自古少，丹东（Dantan）、路伯（Robers Pier）与罗兰（Rollan）。”

对“文案”所发生之党内外有关政治陷害问题：

文虎被捕在一九三三年，但一九三一年一月，王明出版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两条路线）的小册子，王到处宣扬文虎在一九三一年已向南京公开散发传单告密了。一九三三年文虎被捕后，王明路线之临时中央起初表示惊异，认为文虎既于三年前投蒋，何以今日又被捕，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事实尚不仅此，王明路

线临时中央对“非委”被难人员一贯是采取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的，他们唆使向忠发、顾顺章等大量逮捕过去“非委”的同志，送往敌手（宋明诗、于芝生等大肆破坏“非委”机关）。继此，他们对过去“非委”的蒙难人员采取政治攻势，谣言攻势，实行挑拨离间，并明令“临中”工作人员告密，陷害“非委”人员，把他们送到死亡路上。“临中”见文虎陷狱后，幸灾乐祸，喜形于色，胡说文虎被捕是“非委”委员自己告密（实际是向的秘书小丁之弟），又说文虎已被任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种种胡言乱语，无非是中伤陷害，逞其毒谋罢了。

向忠发、顾顺章等一起对无党籍的被捕人员进行诬陷与强迫自首，原是他的拿手好戏，但是，天夺其魄，他们的一切阴谋诡计不能得逞，由于“民权运动同盟”及人民群众的努力，终于自狱中救出文虎。当然，这经过是颇为曲折的。

当“文案”发生之初，文虎自认为案情严重，恐无生还之望，一切委诸命运，听其自然！后因外间有杨铨等热心营救，虽一线希望，仍感希望渺茫。至后案情发展渐告明白，首先证明本人既于三年前久失党籍，一切陷害于法无据，而“民权运动同盟”的营救又表现出相当强大的力量，因此无条件被保释出狱已有相当的理由，崖回路转，似有绝处逢生之象。

但当时办理文虎一案的鹰犬们都不以此举为然，因他们办理此案经过时间颇长，所费经费浩大，他们希望从中得到大批奖金作为补偿，但是由于“民权运动同盟”的营救，他们的希望渐成泡影，因而鹰犬们心有不甘，必欲置文虎于政治绝境而后快。如此，办案人便捏造事实，竟假文虎名义发表一个声明，据事后了解，声明的内容为：

- 1、“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所必需。
- 2、实行“三民主义”。
- 3、拥护总理遗嘱。

这一声明显然是由办案人员伙同王明路线投敌分子，根据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原则，包掣成功的。他们别有用心的用意是借刀杀人，使文虎将来有冤莫白，同时也在于破坏“民权运动同盟”的合法营救活动，说文虎为“非委”主席，而“非委”即武装暴动委员会等，用这些话进行破坏，幸而从事营救方面的北大同学坚持原则，继续进行不懈，及时揭破他们的阴谋，使他们的阴谋无由得逞，即想把文虎送往反省院“自新”的阴谋完全破产，无法实现。终于经过种种努力而使文虎安全出狱。

文虎的出狱，使一切真相大白于天下！被证明的事实主要为：

- 1、文虎被捕时已脱离 C.P. 三年，根本无“自首”资格；
- 2、文虎被捕后，无加入国民党及其政府为官作吏等事，更无自首

之事实。

向忠发、顾顺章等人，一方面伙同“临中”对“非委”人员告密，进行政治陷害，无所不用其极！以此为敌人增加声势；同时又大量纵容“临中”所属党员（特别是“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大批自首，投靠国民党。这些叛党分子是在“临中”之下的所谓“忠实”党员，实则他们大部分是政治投机商，无所谓“气节”，而朝秦暮楚，但却一生官运亨通，富贵寿考，往来国共之间，游刃有余。

关于双清楼<sup>1</sup>与文虎往还经过纪要：

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间，国共合作时期，汪<sup>2</sup>与文虎旧识。一九二四年两人曾共乘车到中华书局进德会讲演，汪称文虎为北大道德学会清流人物。（道德学会为蔡子民所发起，文虎与润之等加入为会员，该会标榜会员不做官，不纳妾，不聚财富。）

在一九二七年武汉革命政府时代，文虎与汪互为国、共出席两党联席会议代表，时相往还。汪曾将自著刊行之“双清楼诗词”赠文虎阅览，文虎对其诗词颇加激赏。

一九三三年，文虎被逮下狱，杏佛首为文虎一案向汪游说，请求支援，汪回念旧谊，无落井下石之心，有顺水推舟之意，兼被舆论所迫，遂有公开发表谈话之情事。该谈话内容称文虎被禁锢，经有关方面长期考查，属事出有因，而查无实证，可以恢复自由，云云。（该谈话以新闻公报形式由中央社刊出）。

文虎出狱后，汪访文虎于中央研究院，倾谈别后八年情况，帐触至多，语并及仲甫。最后，汪说：“先生如愿留宁，只要我权力所及，无论何职，唯君命所选任。”文虎默然未应，汪只得另谈他事。临行，汪派其秘书陈某用专车送文虎回汉口中门寓所，至寓后，陈某重申主人之意，说：“先生是清高的，如不愿留宁，可否出国游历，将来在立法和监察方面担任委员，亦无不可。”文虎忖思，赵孟之所贵，赵孟能贱之，乃立答：“目前个人身体虚弱，以后再谈。”自此以后，双方均未再晤。

王牌、向忠发投敌以后，伙同顾顺章、胡均和、汪浩等组织了一个“明新同盟社”，意为“弃暗投明”，反共立功，并从事破坏活动。其活动可分为几方面，一个叫“武工”，以武力行动；另一方式是“文化剿匪”。他们利用一种报纸作为政治陷害阵地，使受害人不能辩白，外间不辩真假。参加活动的绝大部分为“临中”和“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中人，宋明诗、汪浩、向忠发、顾顺章、胡均和、王琳英、唐

<sup>1</sup> 双清楼应为双照楼。下书名同。— 补注

<sup>2</sup> 汪，即汪精卫。— 补注

虞等七人。

到河大<sup>1</sup>：

文虎在南京出狱以后，因憎厌当地之政治龌龊，不愿久居，乃于一九三四年离开南京。

文虎动身是在一日下午，刘炎送文虎到下关车站。共乘一辆雇用的马车，车身宽大，由四匹马拉着，车行速度很快。当马车向下关疾驰时，于斜阳鞭影之中，回首遥望鸡鸣寺、龙蟠里，想想一年来的猖狂生活，如同隔世，感慨无穷！

马车驶到挹江门外下关车站，乃改乘舟北渡扬子江，时黄昏过后，但见江面辽阔，海潮纷涌而至，江声澎湃。自下关始，渡江舟船数以百计，张帆扬楫，直向浦口，遥望瓜洲，星火点点，历历在目。刘炎轻语文虎：“昔人江中赋诗，有句云：‘名利舟中客，英雄浪里花。’可谓警句。”文虎颌首默然！

车行一昼夜，便抵徐州（铜山），此地系江北名都，乃文虎十五年前旧游之地。当时文虎是一普通的学生，在风潮澎湃中，第一次由历史将他推上远东政治舞台。回思当初文虎在徐州戏马台初识方逸公，共同开辟了中原民众革命战场。尔今天各一方，不知飘泊人间何处，思之悄然！

第二日，车达开封。开封是中古时代六代（五代和北宋）建都之处，财力雄厚，人物殷盛，为著名学府河南大学所在地。当时北大同学李甫辰（南阳人）即在河大任教。

文虎到开封后寓京台旅馆，和杨丙辰老师的秘书李甫辰商谈到河大教书的问题。以后甫辰日夕过访，抱膝长谈。有时驱车游览城郊，访樊楼，登繁（音博）塔及龙亭宋门（旧夷门）、黄河大堤等处，兴趣盎然。

甫辰云：“老兄十五年来龙争虎斗，生活很是繁忙，今日望峰息影，玄黄血战如同梦寐，身心应稍获安闲。但为人师亦大感不易，教得不合，学生会叫倒好；教得好，权门走狗也会‘照顾’你，设法把你排挤出队。”文虎曰：“我学植荒疏多年，教书谈何容易，但我目前愿意从头学起，不值得患得患失。”随后，有北大同学告诉甫辰，说河大风潮正在酝酿更换校长，外传校长候选人颇多，其中杨先生的人望较好，呼声最高。甫辰说：如果杨先生继任校长能成功的话，我们同学大家设法引进河大教书。

几位继任校长人选中，其他几人各有政治派别，入主出奴，互不

<sup>1</sup> 在手抄本上，罗星原注明“自传”的后半部分，即从到开封河南大学至湖南大学期间，系罗章龙本人亲自笔述。— 补注

相让，因此校长人选问题持久不决。反之，杨老先生在政治上无党无派，是中立人物，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最后当局为调和争执起见，遂以杨继任河大校长。

杨先生原任北京大学教授兼德文系主任，颇有写作和翻译作品，蜚声士林，望重乡里。就职后引进北大、女师大同学数人，分任教学及学校行政职务。那时要引进一个人做正教授是很困难的，他派李甫辰亲送河大经济系正教授的聘书到京台旅馆交文虎，从此文虎就开始了终生的教授生活。经济系学生派代表来到京台旅馆，欢迎文虎到学校讲课，文虎将几年来的研究成果写成了几篇讲稿，试讲几次，颇为成功，学生表示满意。

那时，河大聘任教授需经校长提名、教授聘任委员会同意、全校校务会议通过批准，方能聘任。在审查资历时，除自北大方面了解毕业成绩外，对留学考察阶段还需有人负责证实，这些复杂繁琐的手续都在杨校长和河大几个负责的北大同学全力支持下通过，最后才得到任正教授的通知。

关于审查资历的问题，还有一段事实要加以说明。先是文虎在北大六年，但实际上课只有三年（即预科二年，本科一年），在这三年中，文虎埋头在图书馆浩如烟海的中外典籍之中，如泛沧溟，真可谓无书不读（当时北大图书馆典藏近百万册，珍本档案尚不在内）。但自一九二一年暑假后，文虎即停止上课，专门在各地从事建立中国共产党的事业与领导工人运动，成为一名地下职业革命家。至此课业完全抛弃，只是在考试期间由在校同学宋天放、李梅羹、“夜郎三王”等代为照料和完成考试。在毕业考试的那一学期，即一九二四年暑期，文虎正在欧洲工作。蔡校长拍电召文虎回京应考，因路远不能及时回国，乃由同班同学李墨耕等出主意，为余代庖，领取试卷，包办了各项论文，顺利地完成了毕业考试。

文虎开课以后，以全力编写《中国国民经济史》，旋因河大经济系主任在风潮中去职，文虎由于学生代表提名，经过河大校务会议通过，仍任命文虎兼任河南大学经济系主任。文虎自述，从此他又被迫转入另一个名位是非场，卷入旋涡，受到各方的种种冲击，最后乃发生学生何文（魏郁）被捕和德籍教授 Tilenz 被刺的两件惨案，更后一些时间，又发生西京兵谏事变，最后是河大搬迁，文虎携家自东徂西，落荒而走，此是后话。

于叙述这些经历之前，先将汴梁大学生生活简介如次：

开封是五代（梁唐晋汉周）和北宋定都之所，位于黄河南岸，花园口大堤即在城外不远处，形势雄伟，天下壮观，河大为近代建筑，花园洋房，校东南为古夷门及宋园，西北为龙亭与潘杨二湖，东北为

铁塔，西南是繁塔和樊楼。文虎在河大任教期间与刘炎同住，地址在水车胡同二号独院一楼上下四间，花圃半亩，院外深巷，亦时闻卖花声，风物绝幽。邻居为南阳梅家夫妇，二人均大学生。文虎等常于星期天徜徉铁塔、河堤一带，或荡舟约游潘、杨二湖之间。这时期生活宁静，朝夕从游者有学生魏郁（即何文，丹阳人）、廖佩之（灵宝人）、杨紫珊（镇平人）等，时相过从，问难析疑，辩论终日不辍，以此为乐。后廖结婚，杨组剧团，风流云散，乃离水车小院迁入教授宿舍。河大教授宿舍在校内北区，楼居二间，仿若精舍。女生宿舍号称“西宫”（即在其南），幽静无哗，时闻歌吟清韵，宿舍之旁有篮球场、射箭圃等。

整个河大是留学生治校时代，河大教授大都是留欧美的北大同学，阵容如下：孙祥正（理）、张静吾（医）、刘海鹏、张云青、李云亭、沈小宋、萧一山、张延凤等。

一九三五年暑假<sup>1</sup>，文虎为备课，前往青岛。当时同往者有何文、梦平，住在汇泉山东大学。附近有绣球花圃，每日课余步行到海水浴场，荡舟、游泳；有时过栈桥，渡舟至小青岛，摘黄花满怀而归。一日正午时，归途正当海潮临岸，山东大学男女同学二人乘小船至小青岛，未至岸，小舟为巨浪打沉，二人不幸被潮推至栈桥以外的远方去了。从此以后，大家相戒，不轻易到小青岛去了。

文虎在青岛游了李村和崂山。登游崂山，专用汽车直达山麓，同游者何文、梦平，宿山顶道士院。下半晚攀登高峰观日出，因山处海滨，故日出景象比泰山还壮丽奇瑰。并曾赋诗一首以示同游者。

游崂山后，文虎见到河大学生许少游（四川人），其父现任青岛海军基地舰长，通过他的介绍，许郑重邀文虎等参观青岛海军船坞，德海军旧要塞。炮台巨炮犹存，全系机械化设备。炮台中厨室内有十七年前牛肉一大锅，因当年敌人急至，德军来不及就餐，敌（日军）自后袭来，失败，不降。为纪念这些兵士，其他陈设仍保持当年情况。许父并邀文虎参观当地规模盛大的海军演习，其射击、旗语表演均极精彩。军舰有名厨，宴客时所供西餐大菜均极名贵云。

文虎在青岛游览期间，一天在海水浴场偶然遇见多年不见的李渤海。李原北大文科学生，山东济南人，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六年担任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部员，为人好大喜功，但有才干，亦有文采，工书法，书宗北魏，深为文虎所倚重。一九二九年北京天津接连发生重大破获案，李与吴汝铭等数十人为“临中”所卖，遂陷狱中。自是以后杳无消息，至此忽然相见。他乡遇故知，双方互相均

<sup>1</sup> 据罗家所存照片的背注和同行者何文的回忆，青岛之行当在一九三六年。——补注

感欣悦。经交谈始知李于一九二九年被囚于北京，出狱后任职，现在张学良行营担任秘书。文虎当时认为李既是权势人物，谈后即漠然忘怀。但隔了两天，李又临文虎寓所，邀请文虎赴其家宴会。文虎固辞不获，只得赴宴。至则其夫人、子女全家出迎，态度非常诚恳，文虎深为感动。

李渤海寓青岛国际饭店，该店设备富丽堂皇，中国厨师远近闻名，所住房全套一楼五间，有客室、书房、浴室、汽车间等。饭后共坐凉台闲话。李语文虎，不久当至开封大学专程拜访，就商要务，届时并请驾临东北大学讲学，以慰众望，说罢珍重道别。

一九三五年八月文虎等一行由青岛返河大时，徇何文之请，绕道乘轮经上海到苏州，在苏州游观北局虎丘、留园、邓慰梅林等处。魏郁（何文）妹紫玉时肄业蚕桑学校，陪同往附近名胜游览。在苏州住一星期始返汴京，时已近秋季始业时间。大家正忙于上课，不料接二连三发生了一系列恼人的事件，干扰了正常生活，由是波澜渐起。这里应先从一桩不甚重要之外来干扰事件说起。

先是，文虎在巴黎时认识一湖南同学名朱克靖的，在大革命时文虎曾介绍朱任第一军政治部主任。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五日以后，朱忽潜踪遁影，不知何去，最近突来到河大访文虎，自称现任本省某专区合作仓库主任，按照政府规定须觅得一保人担任十万现金责任，方能上任。朱因要求文虎在保证书上签名，文虎辞以无此经济能力，朱说只要求文虎答应以现任职务及收入担保即可。朱的品性是一个拓驰不羁的人，也是政治遁逃人物，素信仰普鲁东学说，咒骂“一切财产都是脏物”。他对金钱是别有一种看法，认为贪污几万亦属应该。因此文虎为之担保是一桩极担风险之事；但如问题不解决，朱一家就无法维持生活。因此文虎只得同意为朱担保，以解其个人困难。此事办理不久，朱忽宣告失踪，其上司派人追查其行踪，兼追究所欠公款情况，调查到保证人有关问题时引起河大满城风雨。好在朱的同僚余某不久又出面正式办理交代，官官相护，敷衍了案，此事未再发展。后朱到云岭找项德隆，组织“新四军战地服务团”，于茂名之战被俘牺牲。

以上所述的事，当时对文虎来说，只不过是稍露一些政治上的蛛丝马迹罢了。而更显著的是河大经济系四年级学生何文被捕。

何文，丹阳人，时年二十二岁，兼任河大经济系办公室书记。河大原为河南省立大学，一九三五年暑假改为国立，另由南京委派校长，杨丙辰先生因无政治奥援，被挤下台。新校长到校，大事变革旧制，排斥异己，亦在学生中肃清异己分子，致使人心惶惶，何文被捕即其

1 应为一九三六年夏。—补注

2 史载朱克靖一九四八年死于南京。—补注

一端。

一日课后，廖佩芝来系办公室，失色告文虎云：“老师最好暂时离开开封，以免遭到毒手！”文虎答：“现在应该先想办法把何文要出来，再谈其它。”廖佩芝辞出后，文虎立即出门去找北大同学王星舟。进门坐定，文虎即说明来意，星舟笑云：“土偶过江，自身莫保，你还管这些闲事干嘛？”文虎说：“这不是闲事，我不管无人管。”星舟乃把近日所闻刘峙的话转告文虎。

原来豫省方面在幽禁何文以前，据说有人曾向刘峙建议，首先把文虎看管起来。刘沉吟有间，徐答道：“系铃容易解铃难，不如暂待，先把他的学生抓起来做个示范！这不过打草惊蛇罢了。”文虎听后向星舟解说道：“何必牵连无辜！她是年幼无知，既然如此，我愿挺身入狱，请先把她释出。”王笑道：“话是可以这般说，但最好莫让他们转念到你身上，否则就更麻烦了。”文虎告辞出来之后，星舟立即往见刘峙，请求说何文年幼无知，请从轻发落。刘批示取保开释，乃由文虎等出名取保了案。

何文事件解决后不久又发生轰动北方的一桩惊人案子，即河大德国教师 Tilenz 被谋杀案。

狄伦子（Tilenz），河大德文教授，一九三五年河大任教。狄住教授宿舍，平日深居简出，唯与文虎邻室而居，故时相过从。课后两人尝出游到北门城关一带散步。两人身材相称，衣服亦大体相同。某日晚饭后，狄又邀文虎同往出游，文虎因临时有事未去，狄乃独自一人散步。行至北城沙丘忽遇刺，一弹从身后飞至，洞穿颅骨，血流满地而死，事后刺客逃遁。法吏调查，检验结果证实，狄伦子平时绝少交游，亦无仇人，此次被杀，身边手表、财物、金饰俱在，可见并非谋财，从而断定是谋杀。但如何遭到误杀，因为人证难以确断，最后将狄伦子车夫下狱，以敷衍德领事，使两个无辜之人遭害！

狄伦子噩耗传到德国，德国政府乃派驻上海德领事阜格尔（Voegd）专程来汴经纪其丧事，并办理有关善后事宜。阜格尔研究案情后亦同意狄是误被谋杀，劝中国政府不必株连过多，但要求把案情弄个明白。中国地方政府亦不愿再事扩大案件，即将狄的车夫处以死刑，含糊了案。

事后，从各方面调查分析结果，此案确系政治谋杀案，且与文虎有关。案发前一日即发现有人跟踪文虎的行踪，至于幕后操纵者为谁，据分析与王明派分子邓石<sup>1</sup>有关。当时王明等一伙正在疯狂锄诛政敌，因刺客训练有素，非一般人所能为。有人说，直接参谋其事者有河大

1 “邓石”与下文的“◇子建”当为同一人，即邓拓。“拓”字只书半边，为作者故意；“◇子建”即“邓子建”，邓拓在校时所用名。—补注

经济系二年级学生◇子建。自从狄案发生后，文虎在河南大学生活渐起波澜，不遑宁处。一九三六年暑假乃赴镇海普陀避暑，实即避难。

普陀系位于舟山海面一小岛，属浙江镇海县，为陈焦琴与金志诚的家乡。当地岱山为东海有名渔场。普陀岛上有大小佛寺数百座，僧侣号万人，全岛无妇女，亦无女尼。文虎寄居白衣禅堂，该禅堂供奉白衣观音像，禅堂在海岸千步沙附近，风景幽绝。住持僧云：北伐时守武昌名将刘玉春观破尘缘，现在某寺落发为僧。文虎果然遇到，但刘不愿多谈话。

文虎又闻岱山渔民生活贫苦，常采取直接行动，抗租抗税，失败后往往遁逃岛上，故岛上僧人中不少系亡命客，而世外桃源亦渐成为搜捕抗争之场。暑假期满，文虎乃返开封，继续任教。

文虎自镇海归校后不久，一日吴汝铭忽从西安来访，携李渤海致文虎亲笔信致意。吴汝铭自一九三〇年<sup>1</sup>与文虎分别后即失去联络，不相闻问，当时相见之下，喜形于色。从吴谈话中知道李渤海、李希逸等（天津张义庄一伙）俱在军中，李渤海且是张学良的机要秘书，他们一致希望文虎即日西行，应东北大学讲学之聘。文虎初犹迟疑，最近决定西行入秦。

文虎此次西行系藉口率领河大经济系毕业生参观实习为名，学生共三十多人，便道游览华山、西安等处。在西安停驻时，吴汝铭介绍文虎与张学良晤谈。此人在开封时曾见过一次<sup>2</sup>，这时他约文虎到东北大学讲学，藉便朝夕“聆教”。便中又会见了西安李渤海全体人员，他们二十余人，设宴玉楼东，通宵聚饮，狂欢达旦，宴后游王曲、杜甫祠、临潼、雁塔、寒窑、下马陵、碑林等处。游毕，在西大街某庄一女律师同志家举行座谈。出席众人兴致甚豪，数年来积郁之情，一旦尽情倾吐为快。临暮，大家集中精神，对于当前时局交换意见。李吴二人发言最多，他们着重提出一个改变当前时局的建议和实行方案，这是当时所称的兵谏方案。方案实施以前的准备是动员舆论，在当时军士、学生和市民中组织力量，发起请愿运动，最后提出兵谏，可望三番满和！

文虎当时同意他们的主张，希望他们拿出钜鹿作战的精神，把西安的阿房宫付之楚人一炬！吴坚请文虎于九月间辞去教职来西安共起炉灶，共策进行，文颌之。会毕，文虎率学生实习团回校考试，本拟于九月间履约束装前去，不料事与愿违，临时突患胃炎，卧病不起。突外间喧传张学良已举兵变，临潼以东，交通断绝，洛郑戒严。

在举兵前夕，李首率学生、市民游行队伍至临潼，义愤声讨，元

1 当在一九三一年。—补注

2 开封见过张学良，系张密访罗，经查史料时在一九三五年四月下旬。—补注

愆就俘，人心大快，但旋因举棋未定，联鸡不进，坐失机宜，遂失去进攻机会。结果矢来无向，致转胜为败，陷于俘囚，人谋不成，可堪浩叹！事后，特立告文虎，此举原可望全胜，扭转全局，但内受愚，张学良由主动转为被动，身败名裂。（张冲：解铃系铃）<sup>1</sup>

此事结束后，汴城反动派势力嚣张，河大全校混乱，人人自危，不遑宁处，但不久日寇进攻，安阳马其洛防线瓦解，敌机日夜飞临开封上空，活动频繁。由是河大决定南迁，文虎亦乘便进入豫南大别山深处，以避意外。

河大南迁是借用张学良、靳云鹗在鸡公山的别墅为临时校址，教师分住旅社。鸡公山高一千五百公尺，山中泉甘水肥，风景宜人。文虎在此居半年，附近有泻红涧，七里香诸胜。七里香有藤花一株，绿叶黄花、无刺，能香七里之远，故名七里香，风景最优。每当严冬，大雪封山，兼旬不能出门，惟见银花满树，蔚为奇观。

一九三七年<sup>2</sup>夏季将临，日寇深入山东方面，军事紧张，韩复榘开城逃走，随身携带现金辐重等四十列车。车在武胜关被冯玉祥连人带车劫去，并将韩杀死，即葬鸡公山下荒坡<sup>3</sup>。同时从开封、郑州南逃的难民数十万人，坐敞棚车，连遭车祸，死伤盈谷满埒，其景象颇似北宋时代金人入汴情景。

某日，文虎正准备下山，忽见一着西装客人来访，文虎定神谛视，认识来人为十年不见的旧友罗汉。罗汉语文虎云：“今日相访，主要是与兄叙旧，以慰多年契阔之情，同时奉仲甫之命，请兄下山一叙。”两人倾谈之下，知道他们最近所发生的情况。文留汉在山上住了几宿，便约定相偕下山，来到武汉。

文虎到汉口，住扬子江饭店，是晚罗汉偕仲甫、特立二人来到旅馆，由是十年阔别老友再度相见。翌日，三人在双柏树会谈一次，并在仲甫家便餐，由仲甫夫人亲自招待。在座马衡（故宫博物院院长）、罗汉，尽欢而散。饭后在双柏树下聚坐闲谈，仲甫鬓发已苍，然神采奕奕，犹似当年风度。

仲甫郑重说道：“我等分久当合。扎结三矢，便成连弩，既可致远，又可威敌！”言简意远，座中闻者感动！特立十年军中生活，风尘满面，然已百炼成钢，气象雍容，意识形态均告成熟。特立感慨云：

1 括号为罗星原抄写时补加，指西京兵变时张冲专访罗章龙，要罗给在西安的李、吴等人下指示，罗写了“解铃系铃”四字交张。—补注

2 从此段起往后，所述一九三七、一九三八、一九三九年间事，年份上明显有误，不另做注改。—补注

3 史载韩复榘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四日在武汉由蒋介石下令处死，次日收殓，移至武昌长春观内暂厝，后由其二太太纪氏、亲信王某等安葬鸡公山，再后又移葬北京万安公墓。—补注

“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今后我决不作退休之计，赴汤蹈火，破釜沉舟，在所不计！”又向文虎云：“你从今日起应该洗手不再教书才是，不问收获，只问耕耘可也。”仲甫见特立意志卓绝，说：“只要你们合作，‘二人同心，其利断金’，万事便可从头做起，大家愿当过河小卒，勇猛向前！”文虎终席默然，主意不定！

当时文虎面临歧途，鉴于全国大学分崩离析，无税驾栖止之所，便决意放弃教授生活，但一生不工不农，无所营谋，更无他事可作，重作冯妇，更难免罪过。当时恰有某某游说文虎南行，文虎未加深虑，遂允其请，从武汉回到长沙，待车出发。特立闻讯追至长沙，邀文虎同行。两人共栖望城坡农舍，一面躲避空袭，一面闲话当年，如此淹留两星期，最后，特立孑身赴苍梧，文虎踟躇南行，止于海隅宋王石。时心无所向，忽张延凤有电自北来，云：“西北联大重振旗鼓，约往任教。”文虎乃决心重理旧日生涯。

当时，西大远在陕南山区偏隅之地，对外交通奇困，文虎乃决计重回武汉，取道入川，转展进入陕南。文虎一路千辛万苦，迁延数星期，始达武汉，途中经过蒲圻空袭，坪石兵变与长沙大火灾，行李荡然无存！——在日机袭击蒲圻大桥时，车上旅客纷纷走避，文虎从高坡下坠，幸有芦苇托住，仅受微伤；坪石车站壮丁队反抗虐待，暴动反抗，大劫掠逃，故旅客受累甚重；长沙半夜大火，造成重大伤亡，肇祸者长沙警备司令被处决，后其女随孙茂教授到城固，详谈火灾内幕。

文虎于一九三七年六月到达武汉，时日寇西进，空袭昼夜不停，人口大疏散，市内空房甚多，特别是汉口日本租界区域。由于日租界数以万计的日本侨民纷纷回国，空出归国日侨所造房屋有数百户之多，设备依旧，家具齐全。文虎乃设法交涉，寄居在一日侨的空屋中，该房屋原主人名宫崎大郎，所居精室，陈设雅致，壁间悬古字画颇多，房内有日本浴室，厨内用磁砖铺地，地席亦极精美。文虎在汉口日租界住一星期，见到朱克靖，他说◇◇◇亦寓汉口，不几日去云岭。

文虎乃觅船西上。时空袭频繁，江上船只逃驶一空，仅有少数残轮，可往宜昌，然乘客万分拥挤，不易得到轮位，偶遇一熟识船员，经他介绍，在一艘轮上找到一就小室，可容二人。

一九三七年七月下旬，文虎乃登轮入蜀。

文虎与女儿梦平登轮后，住在船首舷侧，纵览江景，非常真切。船行颇缓，途经五日始到宜昌。宜昌为入川中途转运站，当时船艘奇缺，待船旅客已达数万。旅馆、民房俱告客满，无地可容，不少人露宿街头。文虎登岸后，望门投止，家户人满，忽见河大学生刘新民路过。刘见文虎，惊问老师几时来到宜昌，现寓何处。文虎告以困难所

在，刘新民云，学生现正率领一个抗日宣传队驻在宜昌中学工作，老师可到中学暂住。文虎遂偕梦平随刘新民到宜昌中学居住。该宣传队有河大一九三五年级学生二十人，师生重逢，十分欣慰。他们对文虎热诚招待，开座谈会，设筵，举行欢迎会…。文虎在旅途中所遭遇的烦愁困难一时完全消解。于是在宜昌中学住了数日，并与同学们共商行止。

在宜昌，河大学生传来消息，云河大已更换校长王某，决定迁至豫西山区镇坪继续上课。且河大全系学生希望文虎仍回河大执教。留在宜昌的河大学生也一致表示愿送文虎回去。因他们认为从宜昌到镇坪近，到陕南远，不必舍近求远。文虎当时也感到犹豫而未作决定，但有一家住豫西的学生告文虎云，豫西当地崇山峻岭，土匪横行，杀人越货视为常事，因此她不主张文虎去河大。后来，果然一年后日寇深入，发生一大惨案，医学院院长被打，教授被劫，学生八人被俘去，还有几名学生致死，河大又改迁嵩县。反之，另一学生却宣扬汉中气候、人情、风物都较豫西为宜，文虎最后乃决定去陕南，不回河大。

在宜昌候船约一个星期，毫无消息，正感失望之际，某晚文虎在文娱晚会上忽然遇河大学生李士元。李于一九三五年毕业于河大经济系，为该班高材生，现任河南省银行金库主任。李说该行已自购一轮运钞票，直航重庆，对外不售客票，但可以通过他的介绍通融照顾，觅到二个舱位，直航重庆。文虎闻讯大喜过望，文虎未待戏终场，即回到住处清理行李，深夜由李士元陪同登轮。约二小时后，轮即启碇西航。此轮因装运重要财物，对外一切保持机密，船上除少数高级银行行员以外，并无他人附乘。沿江行驶，非必要不靠码头，亦不装卸货物。

文虎与梦平共处一小室，该室位置在船首前端。船溯江而上，经过三峡，速度不快，有时上滩须藉绞车铁索之力，速度缓慢。但见两岸，山如绣屏，水如明镜，风物田园，秀丽如画。综观山川，秀美奇险，兼而有之，实天下壮观！

由于旅行长期劳顿，梦平在登轮后二日忽患疟疾，病势沉重，船上无医药设备，勉强找到一个略识中医的行员，经过诊断处方，但无处取药，令人十分焦急！船行几日后，到达巫山，因需加煤买菜，船长下令停泊几小时。轮船抛锚江中，文虎乃决定上岸，到巫山市买药。时在深夜，舷右有急漩，直径约五公尺，水流颇速。文虎乃雇小舟登岸，操舟者为一老汉。昏暗稍不慎，小舟陷入漩涡中，不得进。正危急时，文虎乃操橈，奋力帮助老人操作，半小时后始达彼岸。老人登岸，引导文虎至一药店，买些应用药剂，带回船上，时已近天晓，船即起碇，继续上驶。梦平因服药对症，病势渐渐好转，经数日始愈。



江行十日，轮船抵雾都重庆，文虎偕梦平在嘉陵江朝天门登岸。时方盛夏，上午十时左右，但见雾中一片冷清清气象，市内行人稀少，家家户户掩门闭户。文虎先后找了几家旅社，阒无居人，均于门口招贴“停止营业”四字，初不解所谓，后方知原来他们都下乡避空袭去了。最后经人指引，来到一处，即在打铜街附近一条巷内，找到一家小旅社名叫德记旅社，文虎叩门问有无空房，管事人答：“有，我社房间尽空着。”由于旅社主人、工人都已走了，一切供应全无！文虎向管事老人交涉，老人同意，只给房间，此外不管；饮食打扫，一切自理。文虎进旅社安息。

当时重庆，经常发生空袭警报，号称“疲劳轰炸”，旅社附近也有过炸弹落下爆炸，幸无重大死伤。但旅社内部最感困难的是伙食供应极度缺乏。文虎考虑到当时情况，一则梦平病后需休息调养些时候才能再度长途跋涉；二则平海从上海逃难，流落湘西永绥战地孤儿院，需接回重庆，共往西北。如此二事办理完毕均需相当时间，因此乃决定到郊区暂租民房居住一个时期。

在郊区租房条件很困难，由于人地极为生疏，又兼房少客多，一时竟无从入手。幸而某天下午郊游时，在空袭警报解除后，在防空壕附近，偶然遇一上海老太太，她口操宁波方言，与文虎交谈。自诉从家乡逃难到此，儿媳同行，初时安宁，不幸其子媳前不久牺牲于空袭之下。她想把现租的房子出让，筹集旅费，便可成行。文虎怜其遭遇，便与伊交涉，愿以重价承租他的住房。她乃领文虎回家办理房屋转让手续，文虎即日迁入新居，暂作寓所。新寓在重庆南岸，地名玄坛庙新院巷，为一旧式别墅，一切水电设备齐全，有林台花木之胜。

住房问题暂时解决，刘炎乃自告奋勇，亲到永绥把平海找回，此路汽车经川东、湘西几个县，往返约两个月可到（经过黔江、酉阳、秀山、洪江、芷江、永绥等山区县份）。

文虎住玄坛庙时，延风教授已为文虎在国立编译馆安置工作，要文虎前往报到。文虎因与该馆主事者接谈，但因意见不谐，辞谢未往。时薛农山奉命来访，约到报社任职，文虎亦无意于此。

文虎淹留重庆期间，经常生活在大雾之中，工作主要是为大学备课，出外则进出防空壕。时特立寓城内大梁子张家花园，常往来。仲甫远居江津，曾遣其甥○○专程来访，邀文虎往该地避器，因路远辞谢而未往。此外有友陆若冰、罗汉等时相过从，抵掌而谈以为乐。

此期间，重庆陷于严重空袭之灾难中，内中除大遂道惨案死伤数万人，震动中外，为众所周知外。文虎亲身经历大规模空袭有数次：首为意大利飞机七十架，连续轰炸全市公园、朝天门、龙门浩等处，前后持续几昼夜，死亡三千人。文虎在轮渡中几遭覆舟之灾。某日日

机轰炸黄山，玄坛庙一带，炸沉轮船三艘，焚屋数十栋，炸塌防空洞数处，积尸两岸，不计其数。文虎所居新院巷附近亦落有五百磅重量炸弹六枚，家家户户均有死伤。文虎与梦平在历次遇险中，幸告无恙。友人罗汉即在空袭中丧命，一说被政敌谋害。

刘炎经过千辛万苦，终于将平海找回重庆，文虎乃决定动身往西北，但车票无眉目，亦无车直达，找车十分困难。某日，文虎有在外交部工作之友人携来一本西文书，要文虎帮他解释几处疑点。事毕，闲谈中知道外交部苏联顾问最近要经西北回国述职。文虎因委托蒲○○向当局致意，兼问可否乘搭此车到西北去。蒲当下答允即往探问，旋回复云要文虎亲自进城交涉，可望成事。

翌日，文虎进城向有关方面了解，才知道确有其事。据说，苏联顾问十余人一行决定本星期内启程回国，政府拨法国式软席大客车一辆，行李车一辆，翻译二人，汽车司机四人，又随行警卫班八人。路线是：重庆—成都—广元—南郑—宝鸡—兰州。负责方面同意文虎附载到南郑，并向苏联顾问团团团长潘伯夫（Panbof，真名为瓦·伊·崔可夫）说明情况。文虎乃往见潘伯夫，潘伯夫为苏联有名国务活动人物，系彼得堡大学毕业，留学欧洲，能操英、德、法语。文虎与潘伯夫交谈，潘伯夫一见如故，甚表欢迎，称文虎“博学通才”，愿结为旅途良友，并嘱主事者让出前排三个座位给文虎、梦平、平海三人乘坐。一切手续办理完竣，文虎三人即随车出发。此去如同顺风扬帆的船，驶入满涨潮汐的海，其情绪愉快可想而知。但话虽如此，西北之行实属艰苦之长途旅行。军事时期，兵戈满地，豺狼当道，何处是乐土！因此文虎对茫茫前途仍不免心怀惴惴。临行陆若冰来送行，窥知文虎心事，多方设词劝慰，车行过玄坛庙，陆若冰戏向庙祝就神前问讯，信手拈一千家诗句云：“春风得意花千里，秋月扬辉桂一枝。”陆以句示文虎，文虎见乱词颇含禅机，困惑稍解，但仍疑信参半。陆笑云：一切不必多疑，不要患得患失，光辉就在秋天。

一九三九年夏旧历七月十五日，清晨十时，顾问团专车从两路口出发，临登车时，由于十分匆忙，文虎遗留下几件行李，放在张家花园，寄存到第二年冬季，子烈才托朋友（“列宁号”驾驶员）把它带到襄城，因军命不得停留，他把行李交给襄城站长，用信通知文虎，文虎派学生黄云升骑自行车取回。

顾问团座车与行李车均崭新，车上携带有外交特别通行证，沿途关卡毫无留难，渡河入市亦享有优先待遇，因此车行速度很快，沿途停车时间少。自重庆出发，车行一日，宿隆昌县，招待宾馆设在隆昌县政府，饮食淋浴条件均优，次日即到达成都。

文虎等一行到成都，住实业街沙利文旅馆，大家参观访问，游览

三日，第四日与刘炎分别北行，自那时起，刘炎留成都，二人分道扬镳，不复再聚矣！

文虎等在成都停留时，游览下列各胜迹：北城文殊寺，南门武侯庙与青羊宫，东城望江楼，西城草堂寺。潘伯夫问了有关张献忠入蜀的许多传说。他似乎很浏览了或听到了些笔记、野史，称张为“中国的许多传说”。他似乎很浏览了或听到了些笔记、野史，称张为“中国的许多传说”。他似乎很浏览了或听到了些笔记、野史，称张为“中国的许多传说”。他似乎很浏览了或听到了些笔记、野史，称张为“中国的许多传说”。

从重庆到西北一路要经过四川境内几条大的江河，这就是沱江、涪江、嘉陵江等大江，其它较小的如沙河等，不计其数！汽车西行，通过江河时，正当秋汛季节。秋水时至，百川灌河，两岸之间，不辨牛马。每逢至一渡口，沿河两岸，车辆拥挤，人马喧逐，时出事故。有时山洪疾下，水浪推车入江；有时崖石下坠，人车被压；有时中流激浪，渡船失驭，被浪击沉。至于个人失足落水，马匹惊散之事，往往而有！

车次沙河，正值秋泛时节，沙河河面宽一千二百公尺，水势正涨，已漫过桥面二尺。司机张师傅问潘伯夫是否前进，潘伯夫派人察看水势，回报正在上涨，后面军车源源而至，拥塞在一个小坡道上，已有五十多辆，急如星火，纷纷急欲渡河。潘伯夫乃命四人以绳索攀援涉水过桥，探索桥址，又亲自坐驾驶台开车徐行，至茫茫风浪中，几经危险，始达彼岸，时天色已大暗！遂摸索前进，又二小时始抵一县，全车人衣履尽湿，张师傅称，平生开车十多年，从未遇此险状。而潘伯夫却洋洋如平常，大有履险如夷之态。

又一次渡一巨川时，载运行李车船忽被大浪冲击漂失，流走江浪之中，潘伯夫眼明手快，一把抢住行李船头绳子，还摔了两跤。文虎和全体人员一齐登岸拉纤，逆水行舟，拉行几公里，才把载行李车的船拉回渡口。

渡过四川大江大河，经过十多天长途汽车跋涉后，始达汉中（南郑）。

在一初秋的清晨，文虎等一行从汉中向城固进发，他们乘坐凉轿三顶，沿汉江北岸自西徂东，见一路屯落满布，川原如绣，秦岭北峙，巴山南屏，汉江贯流其间，地利、人和兼而有之，行约三十多里，遥眺城固钟楼矗立天际，雉牒环城，风景如画。人们在天高气爽，秋月扬辉的季节，抵达了汉江平原的古代名郡城固县城。综计自重庆出发，途经璧山、永川、荣昌、隆昌、内江、资中、资阳、简阳、成都、新

都、广汉、德阳、罗江、绵阳、梓潼、剑阁、剑门关、昭化、广元、宁强（宁羌）、定军山、沔县、褒城、汉中、南郑等，共历二十三个县，全程汽车行使，包括休息日在内共用十五天。

到达城固，初寓西关上海旅社。当天下午往西北大学访问，胡庶华校长匆匆至大门口迎文虎入内，大有倒履相迎之意。胡校长次日会同西大同人设宴洗尘，即以文虎到校消息向全校学生公布，其热诚推重，有非他人能所及者。西大教员与学生大部分从华北与开封转来，其中多与文虎旧识，故彼此感情融洽。

文虎在校长指引下向学校报到，办理排课、注册等手续。偶然在教师办公室见到一位久别重逢的余教授，现在西大教外文。余问及文虎住房问题，文虎答以“尚未解决”，余乃自言现住田公馆，房屋颇宽敞，愿让与文虎两间，以解目前之困难。文虎乃于次日迁入新居暂住。两月后，另在李家宅租到唐德元教授（于右任妹婿）房一所，全院有房五间，客厅、书房齐全，院宇幽静，可堪久居。

西大全称是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原由北京向后方迁移的北平大学、师范学院、医学院、工学院等联合组成（后联合解散改称西北大学）。这所大学收罗前后方男女高中毕业生数千人，规模宏大（计四院二十多系），师资众多，又因地处偏隅，交通阻隔，文虎除闭户读书外，也无所容心。

城固位于秦岭南麓，巴山之北，汉水横贯其间，地势平坦，泉甘水肥，为古代“周南”“召南”文化孕育的摇篮。关雎风化之所自。沿汉水北岸，沙洲芦荻，每当春秋佳日，游人杂沓，雉鸣纷鸣，杂花生树，令人留恋忘返！南郑、汉中毗连十数县，自周秦以来，即为经济、战争、文化形胜必争之地。因此，二千年以还，西汉刘邦、三国曹操、张鲁、孔明、司马懿等均出没汉江平原一带，互争雄长。今古异迹，令人慨慷。此地又有张骞故里、汉王台、子房山、拜将台、胡姬营、定军山、褒姒故里、庙台子、蔡伦纸坊、雪浪<sup>1</sup>、栈道、五门堰等名胜古迹，风物绝佳，足供游息。仿佛这里是世外地界，显示出一片升平景象，且学术气氛浓厚，并与政治无直接关联。

文虎在西大通过张延凤夫妇介绍与张桂兰结婚。

张桂兰，城固古路坝人，时年二十四岁，家世清贫，几代均佃农。古路坝为陕南最大的天主教区，当地居民数万均为教民，自成风尚，全镇居民均生活在意大利宗教气氛中。因此，张桂兰自幼生活、思想受天主教影响甚深，很像生长在欧洲中古时代的罗马市民，有艰苦耐劳的品质，朴实无华的作风。

文虎当时携家住在李宅，生活颇为恬淡安静，于生活上颇得她的

<sup>1</sup> 为“霰雪”之误。下同。— 补注

内助，同时也不免有几分怅惘。逾年（即一九四二年）平汉出生在城固。

在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七年间，子女开始完成他们自己的学业与工作。梦平读完高中，考入西北大学经济系毕业，成绩优异，进入省银行工作。平海读完初中，考取师范学院兰州高中（平海一九四七年曾以同等学历考入西北大学商业系，由于志愿不合，自动放弃学籍，仍读高中），毕业后考入四川大学物理系，大学三年级参军退学。

文虎当时上课地点在城固小东关外法商学院。法商学院占地百亩，原实业学堂旧址，是一所高大楼房，有课堂十多间，学生与教员宿舍一百余间。一九三五年特立军过陕南时曾围城攻打，城固守军一团，火力强大，围攻十日不克。当时特立乃领军经子午谷，进入川北，夺取通南巴。特立在城固驻在实业学堂，方家堰、刘家村一带，连营数十里，旌旗蔽野盈山岗。法商学院弹洞多处，两年后始渐平复。

法商学院，院内有古代琵琶树四株，红桂六株。桂树秋开红花，为他处罕见，池中有娃娃鱼。每逢冬季，琵琶花盛开，花香浓烈，闻数里外，其它花木亦繁。法商学院距城二里许，其附近有黄学宫，门首有明代书法家严嵩所书“宫墙万仞”四字，书法绝妙。法商学院后院有公墓一区，凡本校教师从前方来到后方，身后都有妥善安葬，庶生老病逝各得其所，因此，教师服务精神振奋，临难不屈。

文虎居城固时，西大学生往来于李家宅者有罗珊姐、罗云峰（两人为姊弟，满洲人，珊姐为格格公主），蔡秀贞（南阳）、段成章（河南）、王敬栋（山东）、段开秀（青岛）、王雷鸣（山西）、刘淑端（阜南）、范玉宝（西安）等。他们课余和星期日先后来到李家宅看望老师，或座谈学术、探讨问题、析疑剖难；或会文作诗，推敲韵律；或携粮到近郊旅行，游泳汉江，垂钓柳林。桃林、褒城、沔县、古路坝、张骞墓为经常郊游之处。

某次，文虎与学生数人偕游褒城栈道。褒城为古战场所在地，亦周幽王褒姒故乡、入蜀栈道的起点，其附近汉江南岸，壁立高数十丈，三国时，曹操曾至此游览，见汉江滚滚，波浪滔天，叹为观止！故书“雪浪”二字，字大如牛，刻石高崖之上，书法苍劲，后人视为墨宝。西大学生王某好书法，习汉隶，思涉浪到对岸临摹“雪浪”二字，乃乘木筏渡江。不幸木筏至中流一时操纵失灵，被巨浪冲击下沉，王随木筏漂流，载浮载沉，流走经二十里始遇舟相救，脱险归来，安全返回褒城。一场虚惊使王留下一篇生动的纪游文字，刊登在西大校刊上。

汉江流过城固，江面宽一公里，水势湍急，洪流滚滚，所建木桥板坚固，为汉水上流第一大桥，其附近为天然浴场。参加游泳之学生、市民恒数百人，且常发生溺毙人命事。一九四三年大洪水，漂失房屋

庐舍人畜甚多。西大经济系学生田氏兄弟一九四四年同游溺毙，闻者叹息。

文虎在西北大学教书期间，足迹不出县城，日夕讲学，闭户著书，交游极少。在此期间完成一些讲稿的写作，平生精力大部分尽于此。著述脱离现实政治，超越奴隶思想境界之外，对当时权势人物深恶痛绝，不少假借，因此常引起当代权门的嫉忌，周转各大学之间，遑遑然不可终日，生活困顿，艰苦备尝。

文虎所著《中国国民经济史》上、下册，一九三五至一九四五年写成，一九四六年由重庆商务印书馆《大学丛书》印行，风行士林，不胫而走！全书五十万字，自原始经济至近代经济，凡三十五章。历取各时期的经济进程及其特质，博览约取，深入浅出，被各大学采用作教本。发表之论文重要者有：一《全元经济论》，二《经济史型论》，三《经济史期论》等，五十余万字，在大学领域影响颇为深远。当时由于文虎在学术界威信大增，因此全国大学约聘讲学，函电纷驰，但因战时交通不便，一动不如一静，便均谢绝。此外，还写作《沧海楼诗词》若干卷，在《经济新潮》社刊行。

文虎自一九三九年来到城固，祠尚安土重迁，大有终老此乡之意，但后来内外风潮迭起，又渐感不安。最后，静极思动，乃奋起，脱离此山城，到成都大学任教。原因是战时之城固，生活表面平静，实则社会动荡，盗匪纷起，郊区之外，行旅裹足；而学校内部互相倾轧，亦有非局外人能眷恋之境地。现就这些方面所发生之事故择要述之如次：

其一为西大教师住宅劫案。先是姜君为西北联大俄文讲师，东北哈尔滨工业专科学校毕业，一九三七年聘来城固任教。姜年少气盛，生活好讲排场，起居阔绰，招摇过市。姜初到城固，设西餐宴请宾客，列席者十余客。姜藏有全套赛银刀叉，雪白发亮，耀眼增光，邻居见之，惊其富豪，名扬远近，渐为当地盗匪所垂涎，阴谋劫夺。而姜无所察觉，失去警惕。某日深夜，有盗匪一伙，明火执兵器，破门入内，乘姜不备将其砍死，随将所用西餐餐具、银茶具、手表、金饰、皮大衣等全部饱掠而走。案发，县政府缉拿凶犯，在洋县擒其主盗（正在市集销售皮大衣），以后继续捕拿盗匪八人，凶犯全部就获。县政府因案情重大，从严处理，不分主从一律枪决，一时盗风稍减，但仍未完全消灭。

不久，古路坝、元宫亦发生同类事件，县政府捉拿二十余人，处死刑者数人，其盗魁为一年轻妇女，美貌勇敢，临刑面不改色，悬头大西门东岳庙前。是晚女首悬处有人用墨笔写道：“宁可人头高挂，不把威风输给他！”当地民风强悍，于此可见。女盗魁名孙水云，城

固神仙树人，孙善骑射，全家人均以劫掠为职业，名震汉南。

当地镇巴、洋县、西乡一带，西南山区，遍地荆棘，寸步难行。当地民间传说的英雄人物有罗彦辉、王三春、王三槐（寡妇）等，遐迩名扬，流传不绝。

陕南地方各政治恶霸明争暗斗，异常激烈！城固县号称肥缺，为各派逐鹿中心，城固县长丁耀中案发生即其一例。丁耀中，安徽人，能干有为，被诬“通敌”，乃遭禁锢。丁与看守者共谋越狱，深夜乘小舟，从汉水东下，爬山到重庆，向当局鸣冤申诉。后申诉得直，获得平反，对县长亦未予以惩处，含糊了案。

西北大学内部纷争亦多，自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七年约十年间，西大校长更换了七人，院长、系主任更不计其数！与此适应的更有多次学生风潮，大都与个人派系争夺权位有关联。如一九四五年校长某被理学院院长煽动群众起来把他推翻，自立为临时校长，教育部不同意，外亦称为“西大伪组织”，这个伪组织与原来当权派曾发生武斗，争夺占领学校行政部门，来回反复，争夺不休，并曾用手枪大打出手，造成一时恐怖状态。当时大多数教授出主入奴，处境甚为不快。文虎虽长期处于中立，但总不免直接、间接受到冲击。其中最大的一次风潮为夺印风潮。一九四六年西大在城固时，期间，校长到重庆述职，学生乘机发动武装暴动，用暴动方式举行武装政变，由几十个学生深夜围缴西北大学校警枪支，夺取校印、存款，占领办公室，这样风潮扩大，延续了几个月。其中有人建议仿张鲁故事，拖枪到汉中巴山地区之汉水南岸八鹤山落草游击，但因无接济未实现，被刘仲辉派军队包围，缴械解散。

一九四六年城固夺印风潮发生后，外间谣言纷纷，西安官方说此事与文虎有关，又说文虎为此次风潮的幕后人物，明令逐客。文虎无法辩明，为远嫌起见，决定离开城固到成都去，名义上是请假养病（慢性胃病），实际是藉此远走高飞，脱离是非场所，冲出西北方面网罗。

文虎于一九四六年暑假聘约期满时向西北大退还下学期聘约，西大不同意，坚请践约。双方为此周旋甚久，最后仍是文虎退还下期聘书，决定离开西大。西大学生罗云峰姊弟对文虎成都之行予以种种赞助，她们交涉要来一辆南运汽油的专车，把文虎及其家眷送至广元，再电嘱广元方面派车送往成都。

北大理学院同学张荣阁导游广元全市，并参观武则天庙，庙在嘉陵江南岸，千秋庙貌，万里江山，气象雄伟。文虎于此赋诗云：“则天庙貌壮清都，万里江流涨势纾，一代才人春去疾，深山犹自闻啼鹃！”三天后，文虎自广元乘车继续前进，途中在剑阁县险遭洪水——车到剑阁时，天色已晚，文虎等准备在此夜宿，但司机说再走一站，遂继

续前进。深夜，剑阁山洪暴发，文虎等幸免于难。

在罗江时，汽车在水淹三尺的道路上徐徐前进，直到新都水势才稍退。当汽车缓缓开进成都北门时，忽见家家停丧，户户出柩，邻里相对悲号不止，众方以为异，后始明白近旬以来，成都霍乱流行，已丧亡七千余人，南来旅客不由大为懊悔！文虎进入市内住一喷泉附近的西式旅馆，华西大学得讯，派助教杨君前来迎接进校安顿。

文虎住在华西大学天竺街教授宿舍，后为府河，所住楼房一所，十分清洁幽雅，有园林花木之胜。成都是文虎旧游之地，也是很多人向往之乡。古语说：“生到成都，死无遗憾！”当地消费职业，游观娱乐，真是富庶繁华，见所未见，文化亦十分发达，即保姆个个知书能写，比湖南长沙一带还胜一筹。至于大学生则文化水平较西北为高。总之，四川一省人口七千多万，版图辽阔，文物殷庶，一时无二。

文虎在华西大学期间，课务清闲，每星期上课几小时外，余时均作休息。成都是几年前旧游之地，北大同学在此任教者颇多，有人数近百的北大同学会，定期在望江楼聚餐联欢，交游颇广，大家于课余时间游逛青羊宫、花会、武侯庙、草堂寺、文殊寺等地。

文虎在成都时初遇久别经时的高玉涵。玉涵一九二四年在柏林时同学，归国后参加大革命，毁家纾难，以资助《向导》经费。一九二五年当选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大革命失败后，亡命四方，最近来到《新报》任主笔，著“九死一生记”。他住万里桥畔，时到华西天竺闲谈。

文虎继后识该报经理邓季惺，邓为一普通中年妇女，创办该报，从无到有。夫妇二人自任编辑、印刷、广告、发行各项繁杂工作。该报在南京开办，每日发行几百份，收入不足以维持开支；继续不断扩展，现已积资百万以上，每日发行十万份，广告收入亦超过各大报。邓为人局格开朗，能选贤任能，并与各大学能文教授联系，故多得众所赞助。

文虎在成都受当地四川大学、成华大学及其他中等专科学校约聘，偶亦应约往诸院校作学术讲演。

文虎经过一年之久治疗，由于长期服龙胆酊和休息，胃病业已痊愈，身体渐复健康，有志乡土，乃作归计。时华大当局坚留不放手，杨右之、罗志恕、熊子健教授亦多方劝阻，谓目前交通梗阻，行旅不便，可候时清，然后出川。文虎去意甚坚，均婉谢之。

一九四七年暑假期间，由于华大同学刘君的介绍，经四川邮局同意，文虎乃乘邮车北行。临行前，同学开会欢送，同事设宴饯行，刘炎亦来送行，文虎赋诗为别，于是在成都的教授生活于此告一段落。

文虎此次从成都北行是乘坐邮车，该车只装邮件，不载普通客人。

车行经过柳沟和太庙二地时，均遇匪警。幸司机老张挺身向对方说明，晓以大义，对方乃放行。中途过褒城时，曾电在汉中银行工作的梦平来褒城晤谈，因天雨道阻，梦平竟未来会。乃附邮车北驰天水，邮车到达宝鸡，即请转陇海铁路东行，乘火车到达西安。此时西北大学已从城固迁往西安，西大新校即前东北大学旧址，在小南门外慈恩寺北。西北大学校园广大，四周围以短墙，方圆数十里，大学分文、理、法商学院，凡二千余系，有教师员生五千人。

文虎在西大最后半年中，终日扰扰，忙于课务，无大成就，仅有数事颇可足纪！

其一，一九四六年夏季，西大前届毕业生房仲龄（女）介绍其兄仲乔来会，仲乔在西安出资办理《正报》，政治立场中立，言论公正，不偏不倚。谈话结果，文虎以西大经济系名义，在该报出“经济周刊”，随后文虎又不经该报印刷，自行出版“经济新潮”季刊，这是文虎到西大最后一年的文字因缘。除上述两个刊物外，文虎未在其其它报刊写文章，这也是素来的态度。

其二，龚孟希◇◇专研究中古以来欧洲战争史，以当代孙膑自许。文虎观其作《登慈恩寺塔》古风，意境颇新。

其三，当时时局动乱，是非不明，青年学生醉生梦死，其品学兼优者尤属寥寥，唯经济系学生王敬栋，行谊卓绝，可风，堪称出类拔萃！

先是，经济系一群学生群队回乡，经河南到山东，其中一人忽患重病，偃卧旅社不能行动，王敬栋怜其病困，乃设法医治，并护送其回家。由于战时交通困难，比及返校，已逾“旷课不得超过五分之一”的规定。教务处照章给予开除学籍之处理，同学不平，再三申诉，无效。文虎乃致函教务处，表扬王敬栋的侠义行为，并以己之去就力争。校长无奈，重新召集会议，再开讨论，结果一致同意文虎的提议，恢复王敬栋的学籍。

其四，西大学生刘淑端，阜阳人，一九四六年暑假西大毕业，成绩优异，名冠全级。原定回安徽省亲，由于抗战交通阻断，流寓西安。夫妇二人及小孩均无法生活，经济困难到达极点！她租住小南门外柳树林一座土窑安身，窑深五尺，阔三尺<sup>1</sup>，仅铺一木板，以蓆为门，遇雨则积水倒灌入窑，不堪立足。她于一九四七年间即写信给文虎，请求介绍工作，文虎乃向学校推荐，因竞争助教者有十余人之多，西大当局颇难应付，故而久延未决。文虎一再向学校争取，经过一月始决定任刘为经济系助教。刘收到聘书，大喜过望，嫣然一笑，立即到经济系办公室上班，并即迁进教师宿舍安置。其夫王昭洲亦因文虎之介

<sup>1</sup> 手抄本上罗星原标“？”，似存疑；询刘本人回忆其境，略有出入。— 补注

绍找到工作。刘对此事感激不已，文虎亦自认为，平生助人为乐，为学生介绍工作等事甚多，但以此举为最称心快意。刘淑端进校后，成绩优秀，由助教升为讲师云。

溯自文虎居城固前后八年（一九三九至四六年）<sup>1</sup>，个人的学术生活与政治完全隔离，足迹未出县城，亦未到过西安一步，此次路过西安被留暂住实属意外。

先是在成都时，大学方面早已预将下年度聘书送文虎，坚约文虎长期留成都讲学，但文虎事先已应湖南大学之聘，情不可却。当时东去交通阻梗，不得不绕道西安南行，乃决定经西安回长沙。不料此事已为西大方面所探知，过西安时，西大学生结队到旅次向文虎请求先到西北大学新迁校址稍作休息，西大当局亦纠缠不已，文虎乃勉允其请，表示可短期留居西大，俟系务安排就绪后继续南行。

留住西大原属暂时之计，西北军政当局屡下逐客之令，亦被西大员生顶回。

文虎在西大半年期间，埋首调整课程，安排系务，完成讲稿，并未出校门一步，但当地党政军界、权门鹰犬东厂西厂，虎视眈眈，令人如坐针毡，寝席不安！同时湖南大学方面，先后来电敦促启程，履行聘约，急如星火。

至一九四七年冬十月，西大校长另换马某，陕西人，此君庸碌无能，但是非常奸滑，结党营私，妄想在西大实行“门罗主义”，排斥外省籍教员，结果学潮迭起，全校优良师资均不自安，文虎乃慨然有南归故乡之意。时东面铁路轨道已断，西路栈道阻塞，文虎乃决计南行飞渡秦岭，经武汉到达长沙。临行通过张石田教授向航空局买得三个座位。当时乘客拥挤，顺序排队，动辄数月才能得到座位。西安至武汉票价每人四百五十万元，三人合计千万余元，行李附载二十公斤免费。第二天拂晓前起飞。乘客由于想减少行李过磅重量，故身上的衣服特重，并背一个大口袋。有些人把大量钞票缚于腰间、腿部，行步蹒跚，登机困难，令人发噤。

一同乘机南下除医学院院长汤教授夫妇外尚有其他众多人员。早上五点钟大家即登机。登机后情绪紧张，默无一言。机上服务员告知大家，镇静，不要惊慌，一切要遵守秩序，各就各位，肃静无哗。每人发给糖果食品一袋，并嘱大家紧靠椅背系好安全绳。马达开动后，飞机开始在跑道上滑行，约几分钟后，突然大吼一声，机身渐渐凌空而起，越飞越高，倾刻便升入高空，但见城廓人民，山河大地悬在眼底。飞机渡过南山秦岭时，上面是晴空蓝天，脚下却铺着一片片白云，层层如同绵絮，十分柔和幽静，十一点飞过云梦泽上空，只见薄雾浸

<sup>1</sup> 罗章龙居城固当从一九三九年起。— 补注

空，郁郁苍苍，顷刻间便飞临汉江平原。但见川原山岳起伏，蜿蜒如同蚁蛭，渡长江时低飞在数百米上空，地面牛群、水车如同儿童玩具，观此，心情为之一畅。

全机乘客见到了徐家棚附近的机场，大家如释重负，心情愉快，开始谈笑。医师笑谓，这叫做“起死回生”。其意为乘飞机起飞时即是向死路迈进，而回到地面上也就是回生了。十一点半，飞机在机场安全着陆，全程亦告结束。

文虎在徐家棚机场着陆后，即由航空公司派专车送往黄鹤楼大旅社。文虎自一九二七年离开武汉后，二十年后之今日重来，见山川如旧，人面皆非，乃登黄鹤楼、晴川阁，游览三日。再登火车，得到软席座位，向长沙进发。翌晨火车到达长沙，在小吴门车站下车后，先雇车到犁头街湖南大学办事处接洽，该办事处负责人即电话通知湖大派人来长沙迎接文虎到校安置。于是文虎全家渡江，被引导到湖大教授宿舍，住在至善村五号。

文虎到岳麓山次日，气温突变，连晚下雪，满山遍野冰雪弥天。清晨，文虎携全家步行登山到山顶云麓宫赏雪。文虎自一九一七年偕润之登云麓宫踏雪，转眼亦三十年。面对城廓依旧，物换星移，不禁百感交集，乃赋诗一首，诗云：“云麓宫前树，山河劫后身；陵埋金剑锈，户沸诵弦新。水落蛟龙远，峰回雁阵亲；山河频北眺，风雪怅归人。”

返归宿舍，当地报社记者段梦辉来访，顺便将《重登云麓宫》诗在《湖南报》刊出。于是文虎旧友纷纷来访，一时聊破沉寂。

文虎到岳麓山后，西北大学学生数人随文转学，如段开秀、龚一华等。段开秀参加湖大转学生考试，成绩最优。在湖大毕业后，分配在东北工厂工作，这年他在文家住了一个学期。

文虎在湖大，课务清闲，以讲学著书为务，当时刊行《中国国民经史》上、下册，《史学论》<sup>1</sup>一册，《欧洲经济政策》一册，另其它讲稿几种。

湖南大学校长胡庶华，字春藻，湖南攸县人。中国首届留学德意志学生，学习冶金专业，誉望甚高。其办学精神极嘉，求贤若渴，大公无私，并实行民主治校。因此，湖大教授阵容整齐，著作如林，名满海内。

校内名教授数十人，分住至善村、麓山馆、稻香村、枫径亭等处宿舍，待遇优惠，生活无虞；故学术空气极为浓厚，学会组织遍满校园。教授中与文虎往还较密者有下列诸子：

杨遇夫（树达，长沙）中国语文系主任；

<sup>1</sup> 可能是《经济史学原论》之误。— 补注

谭戒甫（长沙）经史名家；

李祖荫（零陵）留日，法律学系主任；

易鼎新（醴陵）留美，电力学教授；

何之泰（安徽）水利系主任；

文斗（长沙）留英，机械系主任；

潘源来（浏阳）留英，经济学专家；

曾昭权（湘乡）留英，电机专家，系主任；

唐芄荪（长沙）数学家。

文虎在湖大任教期间，先后担任经济系主任、校务委员会教授代表、全校学习部主任等职。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一日，外孙女星原出生于岳麓山至善村。

一九五〇年，山西大学曾约文虎至太原讲学，山西大学校长赵宗复、王任之、系主任刘君，均旧识。文虎到太原山西大学住了一个时期，同时当地太谷铭贤学院亦邀往讲学四星期。太谷是明末李自成犴金散失之地，故而也是近代中国金融重镇，钱庄、票号，汇款业务最早起源的地方，全县乡村一律是砖瓦洋房，与广东中山县情况相仿佛。

铭贤学院是美国教会动用中国庚子赔款数十万美元开办的，主要是用以纪念庚子年在山西遇难的几位教士。学院建筑豪华，号称“小燕京”。南院有墓园，内有庚子死难的八名外籍男女教士。坟墓上各有中西墓志铭石刻一块，详纪死者生年死日及死事经过。

铭贤学院院长田子方，山西五台人，原为法国巴黎大学留生，风流倜傥，博学多闻，好交游。其夫人赵妙容为当地幼儿院院长。田子方家传古代西夏（赵元昊）时代制钱一枚，据国际考古专家鉴定，该钱币在国际考古市场为绝无仅有之珍品，该西夏古钱一枚可值美金五万以上。文虎观该钱，比唐通制钱稍厚，古色古香，光泽夺目，铸有西夏文年号。文虎乃笑向田云：“‘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先生应注意及之！”田笑答：“‘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田之为人机警善辩，如此风趣，可见一斑！

文虎在山西大学讲课时，有该校女生常嫒在座听讲，文虎在山西大学讲课结束离校时，常嫒又随文虎到铭贤学院听其讲课，每堂课必做笔记。文虎离开铭贤学院时，常嫒向赵妙容表示，愿随文虎转学到南方。妙容云：常嫒家住榆次，生平足迹未尝出乡里，此次忽欲南行，实不可解。文虎乃央请赵向常嫒解说，常终不悻，究不知其故之所在，疑莫能明。

文虎自山西回到长沙不久，忽一日萧子璋自北京来湖南大学相访。二人自一九一八年北京一别，契阔至今，历三十年之久。相见之下，彼此均甚感欣慰。萧并携苏联籍夫人和年幼儿女来访故乡，惜乎新民

学会初期会员已寥寥无几！

萧子璋与文虎共车到爱晚亭一游，又同访沔痴寄庐。因无当年向导，到溁湾市附近追寻，亦无处可觅，直到后来才访到新民学会召开成立大会之旧址周家台，并见到当时在会场执事的周家大爹，时年已六十余，拍照留念为别。

一九五一年文虎偕经济系教师刘某，工学院教授文斗等率领工作队到湘南进行工作。全体队员一千五百六十人，工作地区是郴州、宜章、桂阳、零陵、酃县、临武等县，都是崇山峻岭，人稀地广，盗匪出没的山区地带。

文虎率领一队学生到郴县，步行到宜章观音寺，进驻在一座女神庙，开始从事休整队伍，了解当地情况。时正阴历春节将临，队部会议决定，春节度过即开始工作。为欢度春节，加强了伙食组的工作，组织了一个春节文艺队，同时也注意到加强警卫方面的工作。为改善伙食，伙食组派人用手榴弹炸鱼塘，捞了十几条大鱼，又派人进山猎获了一只獐子，以为加餐之用。

正在除夕聚餐即将举行时，忽发现一厨房工人请假回家看母亲，厨工负责人留他不住，那人就匆匆走去。负责人乃另派一伙计带了一些吃的东西去追他。这伙计与那请假的邓伙计平时很友好，便向邓说，吃的东西是送给你母亲的，并嘱邓说，回家交给母亲后仍回队吃年夜饭。小邓听说很受感动，回答说：“我现在并不是回家看母亲，今晚有很重大的事，你对我很好，我说给你听吧，你不必回队了，今晚观音寺四乡农民大暴动，三更放响炮，见工作队的人便杀，一个不留！”小张听罢大惊，乃力劝小邓回队，说观音寺火力强大，四乡农民枪械少，绝不会成大事，并晓以大义，要他立功。小邓应允，乃回队引导武装部队搜查，擒获为首暴动头领八人，又召集农民开会说明经过。一场大乱，便消灭于无形了。

观音寺事平后，文虎率队进驻塘湾乡公所。这里有几百户人家，三千多居民，田少山多。解放前农民聚族而居，半耕半匪，在歉收年景，男女老幼无不为民，湘蒲至广东连县公路经常发生劫夺案件，出事地点便在塘湾。他们掠夺的国际列车脏物还存留不少。由于当地居民匪不分，清除极为不易，每每元魁匪首，犯案以后，愿居外地，便逍遥法外。匪首因有百姓掩护，往来出没村庄墟落间，亦无法捕获，境内金鸡岭匪寨地居湘粤边界，长期无法攻破。工作队进驻乡公所后，以全力搜捕匪首，费九牛二虎之力，始将当地最大匪首集团分化瓦解，歼其渠魁。在双方搏斗中付出很大代价，共牺牲战士四名，农民二名。工作至此告一段落。

文虎经过半年之久，直到完成工作。一九五一年春由乡公所刘所

长、邓福生领四杆火，将文虎护送到坪石水牛湾，登车返长沙。邓福生为中夏族叔，中途导文虎登金鸡寨，见悬崖峭壁，上有三个大水塘，泉流永久不竭，中养鱼长数尺，自古以来，号称绝险，不易攻下。

自一九四七年到一九五三年，文虎讲学于湖南大学前后亘六年之久。一九五三年由于院系调整，文虎乃离开长沙前往武昌湖北大学任教，继续教授生涯。

（此段之前，由水牛湾返长沙后之原稿均已散失，阙。）

十二、椿园年表（节选）<sup>1</sup>

一八九六（丙申）年

十一月三十日（农历丙申十月二十六日）生于湖南，浏阳，沔江村。

一八九七（丁酉）年

一岁病危，死而复苏。经过四十日后始脱险。

一八九八（戊戌）年

浏阳人谭嗣同等共谋夺取慈禧大权还政光绪，失败，谭等六人被杀，号称戊戌政变。谭嗣同遗著出版问世，影响深远。

一八九九（己亥）年

曾祖可贞公定居化龙桥，躬自佃耕为生。

是年，湘东各县洪水泛滥成灾，灾民遍地，乡民多出外逃荒。父泰钧公赴上海高昌庙江南制造局作工。（江南制造局一八六五年创办。）

一九〇〇（庚子）年

八月，唐才常等成立自立军，在汉口起义事泄，唐才常、唐才中与林圭等二十人被杀，（二唐均浏阳人，林亦湘人。）

<sup>1</sup> 根据罗章龙遗存稿的抄件录入整理。鉴于罗氏后人在原件封面上注“此年表时间错误太多，仅供参考”，所以收入此“续编”为节选本，略去的内容主要是作者未亲历的背景事件的记述，和各年份的文著、刊诗等，删节总量约占原稿的五分之二，具体删点不再注明。另附作者生平著述目录，作为“年表”的补充。— 补注

一九〇一（辛丑）年

进蒙学馆。

浏阳三口征义堂武装起义，义军进攻县城，后失利，义军首领周国虞等殉难。

一九〇二（壬寅）年

一月，大妹湘南（章勋）生<sup>1</sup>。

一九〇三（癸卯）年

春，就读广学书屋。

二妹章箴出生。

一九〇四（甲辰）年

八岁，考入狮山书院小学。（公费。）

一九〇六（丙午）年

正月，弟章凤出生。

十岁，考入浏阳县立南台学校肄业。（南台学校原名南台书院，旧为湘东有名学府，邑人谭嗣同、邹达峰、唐才常等均曾读书、讲学于此，招收学生全属公费制度。南台师资阵营齐整，教师多留学生，深通中西学问。校中设置有外国语文、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世界地理、历史等课程。校长刘人熙提倡经世致用之学，勉励同学“志伊尹之所志，学颜渊之所学。”十年后，刘参加反北方军阀工作，一度任湖南都督。）

岁饥，平浏矿工农民数万揭竿而起，武力抗清，揭扫清复汉旗帜，双方在三口、永和作战，起义军战败，死数千人，全省震动。

一九〇七（丁未）年

十一岁，冬遭母丧，依姑母咏裳读书、习字，种菜，挑水。

初友宋天放、陈虬园、吴唐江等，均南台小学同学。

十一月，南台学校发生罢课风潮，学生整队游行闹县公署，学校被迫提前放假。

一九〇八（戊申）年

十二岁，夏与同学春阳、秋荻，读书天岩寨山中，并入山狩猎、

<sup>1</sup> 罗湘南，1927年为避白色恐怖，逃难至上海，进纱厂工作，曾在中共杨树浦区委工作。— 补注



伐木，以习劳苦。

宗兄彦芳赴日本东京留学，参加反清革命同盟会。

一九〇九（己酉）年

与萧乐天、李让泉、杨栢、温雄飞诸同学共组南台学会。倡导“群策群力，拯世安民。”

一九一〇（庚戌）年

与同学贺天健（春阳）等同游道吾山，登醴泉峰，夜宿扬明观。

一九一一（辛亥）年

在南台学校肄业四年期满，毕业，时年十五岁。

武昌起义。辛亥革命。一月后湖南首先响应，驱逐清廷督抚，成立湖南军政府。南台学友纷起参加学生军。

一九一二（壬子）年

十六岁，考入湖南省立第一联合中学肄业（一九一六年毕业），同学参加学生军者均退伍入学。

一九一三（癸丑）年

从德国教师海理威 Heiliway 学习德国语言文学。

一九一四（甲寅）年

从邱湘舟先生读书大瑶黛屏寺。研习离骚、辞赋、唐诗、宋词等。（同学邱田中、刘枵瓢等。）

一九一五（乙卯）年

步行游南岳，登祝融峰。访船山旧址。

从宗兄罗缙阶（劭白）习法律、政治与哲学于宇泰定庐。

《新青年》杂志创刊于上海。

秋，初会见二十八划生，往还，酝酿组织新民学会。

一九一六（丙辰）年

从黄铭功师研读群经、二十四史、周秦诸子、汉魏丛书等。（黄为清代进士，有《琴台文集》。）

同学孙鹏飞曾率所部一营起义，战败被杀。又有同学萧盛礼在浏阳起义驱张，占领县城，一月后战溃出走。孙、萧军事失败影响甚大。

自是以后青年学生讳言军事，未免因噎废食。

一九一七（丁巳）年

一月，仲甫受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兼文学院院长，《新青年》杂志刊布“文学革命论”。

二月，与萧子昇、二十八划生、何叔衡等发起组织新民学会。首次在城南天心阁聚会。

四月十八日，<sup>1</sup>参加新民学会成立大会（岳麓山周家台沔痴庐），到十一人。

冬，夏景云来归。

一九一八（戊午）年

春，东渡赴日本留学。（行前从罗雨沧学日本语文。）乘华盛轮自长沙出发，直航上海，途中登君山、大小孤山、北固山、金山、焦山与吴淞炮台，又泛舟太湖，登鼋头渚，归自阊门，游虎丘。

五月，因东渡受阻自上海返长沙。

九月，与二十八划生等十二人（均新民学会会员）离长沙乘长沙轮赴武汉转北京。车过河南郟城（漯河）适沙河秋泛，留孟庙村，水退始北行。到达北京。

秋，考入国立北京大学肄业（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四年毕业，居住北大亢慕义斋）。

冬，访北京宣武门外浏阳会馆莽苍苍斋（谭嗣同故居）。

十二月，北京大学师生创刊《每周评论》，为政治批评性刊物。

寓三眼井吉安夹道，与诸友月夜访厂甸、海王村，观灯谜（“耕稼陶渔”句），与子昇骑驴赴香山，并观紫光阁画像等。

一九一九（己未）年

五月四日，北大学生会偕同组织政治集会示威游行，由文虎<sup>2</sup>、特立、吴名、罗汉、匡日休等率领国立八校学生队闯入赵家楼纵火焚烧卖国贼住宅，痛打章宗祥，五四运动由是爆发。

六月三日，文虎率领北大宣传队出发讲演，在长安街被逮捕，入北河沿临时监狱。徐树铮声言：架炮景山，轰毁北京大学。

六月，◇◇◇<sup>3</sup>在天桥散发市民传单，倡议直接行动，被捕入狱。

<sup>1</sup> 当为4月14日，星期日。— 补注

<sup>2</sup> 文虎，罗章龙常用笔名；特立，即张国焘；吴名，即吴雨铭（吴汝铭）。— 补注

<sup>3</sup> ◇◇◇，罗氏后人补注：陈独秀。— 补注

旋经北京大学号召各界群起营救释出。离京南下。

七月十四日，《湘江评论》创刊于长沙。二十八划生来信索稿，当撰文送《每周评论》，孤松<sup>1</sup>介绍。

七月，访守常于昌黎五峰山，商谈社会革命宣传组织方略。

秋，与令夫、仲翼<sup>2</sup>等出古北口，行猎三日，观览塞外形势，又登居庸关，过南口留五日还。

十二月，组织曦园，建立自学组织，成员为北京国立八校学员。

### 一九二〇（庚申）年

三月，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初有会员十九人。（按：学会酝酿组织与活动始于一九一八年秋季。）

蔡子民与文虎往来信函。

春间，第三国际特派Voitinsky<sup>3</sup>伍廷康来中国，在北大红楼图书馆商谈中国与世界革命方略，从事北方中共建党工作，成立北方五人小组（李守常、罗文虎、张特立、邓康与刘一字<sup>4</sup>）。

关谦谍报案发生：共青团成立大会于北京大学第二院举行，到会人员李守常等三十二人，开会由罗章龙主席，开会时京师警厅谍报员关谦混入会场，刺探开会经过情况，归报主管，并公函北京大学缉拿罗章龙、李大钊等归案讯办。此项档案尚存北京大学。

暑期涉太行井径，过阳泉至于太原，泛舟汾河。秋南下渡漳河至六合沟、焦作等地，建立铁路矿山革命工作基地。

同瑞俊、恩明<sup>5</sup>赴胶济铁路与淄博矿山，建立路矿工会基层组织，介绍李青山、伦克忠、胡信之等入党。

至青岛观德国炮台旧墟，转赴芝罘与龙口，回到泰安。

至泰安登泰山绝顶，并登徂徕、梁甫诸山。

出席济南中共山东小组成立会。

十月，北京成立“非宗教同盟”，自著“宗教与科学”一文出版。

十一月二十五日，《新民学会通讯集》刊出讨论建国与重大政治问题的通信。（《新民学会通讯集》四。）

出彰仪门经芦沟桥访问长辛店，会见史文彬。

1 孤松，李大钊笔名，字守常。— 补注

2 令夫，即韩麟符；仲翼，即王仲一。（此年表中又记作王仲异。）— 罗氏后人注

3 Voitinsky，即维经斯基（又译伍廷康、吴廷康），俄国人。— 补注

4 邓康，即邓中夏；刘一字，即刘仁静。罗另记，最初参加红楼座谈成立五人小组，并无邓中夏，实为李梅羹（墨耕），邓稍后加入该小组。— 补注

5 俊瑞，即王俊瑞；恩明，即邓恩铭。— 补注

### 一九二一（辛酉）年

一月，主持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正式开学，介绍辛店机车工人史文彬入党。自后在京汉铁路沿线保定、石家庄、彰德、郑州、信阳、江岸等站，先后成立中共与共青团党团支部。

二月，京师卫戍总司令王怀庆咨呈国务院请查禁北京大学发行《先驱》半月刊（共青团刊物）。此事与上年关谦谍报案先后发生。（原件存北京大学，系民国二十年二月二十七日）。

共产国际代表Slievlied Maring<sup>1</sup>来到北京，晤谈计议北方工作，决定扩大北方产业工会与党团组织。先后介绍孙云朋（天津）、康景星（高牌店）、葛树贵（辛店）、王浚、曾玉良、林祥谦（江岸）、司文德、汪胜友（郑州）、李玉（丰台）等入党担任领导工作。

五月，北京中共党报《工人周刊》创刊，由文虎主编。（该报创刊连续出版五年，至一九二六年止，共刊出二百余期。）

介绍唐山机车厂工人邓培入党，六月二日开平煤矿曾发生罢工斗争。京奉铁路、关外铁路、唐山矿区均次第建立中共组织与革命工会、地下组织。

七月二十六日，钟英<sup>2</sup>来信，决定各省设立劳动组合书记部及各部主任人选，文虎被任为北方书记部主任。

九月，国际代表马宁到桂林访孙中山，双方协定六点，决定国共合作。后马宁回到北京报告关于国共合作前途远景。

十一月十七日，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正式公开扩大组织，征求会员，由大会选出九人干事会，选任亢斋<sup>3</sup>书记，在北方各大学院及铁路、矿山、工厂、城市开展活动，三月内京内外会员登记递增至二百余人。

十一月，亲赴洛阳组织陇海路罢工，经过十日斗争，胜利结束。洛阳、开封、观音堂、徐州、商丘、巩县沿线中共组织先后建立。

十二月，巡行全路，过观音堂，遇交通系刺客行刺，当经工纠队奋勇击退。

会见游天洋与白眉珊。

到徐州工作，东至连云港。

会见姚佐唐。

介绍王荷波（浦镇大厂）、李宝成（济南机务厂）、姚佐唐（徐州机厂）、沈干城（杭州）等加入中共为党员，建立津浦、沪宁、沪

1 Slievlied Maring，即马林，荷兰人。— 补注

2 钟英，中共中央代号。— 补注

3 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又称亢斋义斋（意为共产主义书屋），简称亢斋，罗章龙当选首任书记，后以亢斋为笔名。— 补注

杭甬中共党团组织。

岁杪，出发山海关到奉天、长春、哈尔滨、大连、营口等城市，进行组织党与工会工作。

沿南口、张家口、丰镇、大同等站工作，建立以王宏文、张清泰为中心的中共党团支部。

一九二二（壬戌）年

一月，少共国际代表Green<sup>1</sup>夫妇来中国，商谈远东大会事。

二月一日，北大校长蔡元培来信。（内容关于营救何孟雄等在龙江出狱事。）

六月，赴唐山召开唐山中共与共青团员会议，正式建立中共唐山组织，同时建立团委会。

《向导》周报一九二二年九月十三日创刊于上海，公布通讯处：北京大学第一院罗璈阶<sup>2</sup>。

二月，与商章孙合译《英马奴埃·康德传》由上海中华书局哲学丛书出版发行。

八月，出席北方区中共工委、北方书记部主任各铁路党团负责人联席会议，成立北方铁路矿山斗争委员会，统一计划与行动。

八月下旬，亲赴长辛店组织罢工。

八月廿二日，应邀出席苏俄使馆宴会。会见Joffe<sup>3</sup>。（越飞于八月十二日到达北京。）

八月二十三日晚，亲自签发长辛店八月罢工通令，次日开始行动。

八月二十四日，举行长辛店大厂罢工，参加者五千余人，胜利结束。（时奉直战争在琉璃河进行。）

九月，国共合作，设立国民党改组委员会。

十月二十七日，偕孟雄赴京西各站，组织京绥铁路罢工，经过二十一日，胜利。

十一月十日，组织山海关罢工，经过八日，胜利复工。

C. T. S<sup>4</sup>来信（三次）。

滦家湾兵变：为组织粤汉北段罢工事，乘武长路火车深夜过滦家湾，适当地驻防北军闹饷哗变，抢劫客车，与护路警察激战，双方死伤十数人。

巡行北京至南口、张家口、包头、大同沿站，筹建全路中共党与

1 Green，即格林。— 补注

2 罗璈阶，罗章龙学名，周岁时由族人命。— 补注

3 Joffe，即越飞，苏联人。— 补注

4 C. T. S，罗氏后人补注：“陈独秀？”经查，陈的英文签名为 T. S. Chen。— 补注

团组织工作。

十月二十日，赴唐山与邓少山等组织开滦五矿五万煤矿工人大罢工。

十一月二十四日，下达开滦五矿罢工令。

十一月二十五日，矿工与军警发生武装冲突，死八人，伤数十人。

十一月，北京大学成立开滦矿工罢工经济后援会。

罢工指挥部坚持斗争，经过三周后，旋经开滦镇守使署与当地滦县县政府、公私法团出面调解，签约解决。矿局同意增加工资一部份，按双方协定条件，胜利复工。

为开滦罢工事致中共中央说帖。

十二月初，巡行至浦镇，为敌军警绑架劫持，经荷波、仲一率众援救，脱险后，浦镇工会正式公开成立。浦镇、南京、无锡、杭州、宁波，各沿线中共组织先后建立。

十二月十五日，正太铁路罢工，经过二十一日，胜利复工。

太原中共开始建党，主要成员为郭增昌、高尚德、王仲异、贺昌、韩泉方等，王仲异任书记。

十二月二十六日，李大钊自海滨山庄来信，商谈京畿各路矿斗争问题。

与王、白共涉伊、洛、灋、涧四水至龙门，访白香山故居，至会兴镇。

出席主持北方铁路矿山工会纠察队联席会议。

一九二三（癸亥）年

一月九日，津浦铁路浦镇大厂全体工人举行罢工，结果胜利复工。

一月卅日，国民党公布改组宣言，聘鲍罗廷为高等顾问，旋设立上海执行部，主要负责人由国共双方共同组成，共方为罗章龙、毛泽东等担任执行部组织指导工作。

一月，会见苏兆征与林维民。

一月五日，文虎主持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备委员会，在郑州召开第三次会议。决定：二月一日在郑州举行京总成立大会。（京总章程草案公布。）

一月二十五日，文虎亲临郑州，主持二月一日京总大会。（寓花地岗。）

二月一日，京汉铁路各站代表六十五人齐集郑州，举行群众大会，与军警发生冲突。

二月一日晚，中共京汉铁路党团总书记亢斋（文虎）召集紧急会议，决定二月四日正午举行京汉路同盟政治罢工，立即成立全路罢工

总指挥部，文虎亲任总指挥。

二月四日，下达命令：全路十六站，宣布实行总同盟罢工。全路客货车一律停驶，在罢工期间，众志成城，纪律严明。

二月七日，军阀曹锟、吴佩孚调兵遣将，北段自长辛店，南段至江岸（沿途保定、郑州、信阳诸站），发生严重惨杀。当场死工人四十余人，伤者不计其数，是为“二七惨案”。书记部自文虎以下死伤与入狱者数十人，施洋、林祥谦、葛树贵、曾玉良等牺牲。文虎在长辛店浴血战斗中负伤，史文彬、吴汝铭等入狱。

“二七”大罢工直接参加罢工行动工人十余万人，全国工人响应者巨百万人，影响所及，震动全国，国内外同情文电纷起声援。

三月，文虎著《京汉工人流血记》在北京出版，广州重版八次印行。南北各地继续出版有关记载纪念“二七”斗争书刊数十种。

五月，中共召开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于广州。

中共“三大”会，代表当代中国革命新兴力量，新中央常务委员会引进工人运动积极成员参加，面貌焕然一新。

五月，文虎出席中共“三大”会议，当选中央委员，任中共中央常委委员兼秘书长。铁路工会主席均担任“三大”中央常委领导工作。因此，“三大”会后，中国革命进展发扬蹈励，一日千里。

八月起，文虎担任《向导》周报主编。（至一九二四年七月止。）

九月，送王璧出国，乘苏联义勇舰队赴海参崴。

安徽与浙东中共组织正式建立，其主要成员为：江常师、薛祚汉、高语罕、柯庆施等，浙东为：陈焦琴、金志诚、谢怀龙<sup>2</sup>、于秀松、沈干城、宣中华、孙津川等。

九月，文虎与恽代英赴淞江中学，与当地同志创立苏南中共组织，书记侯绍裘。

秋，王春熙自维扬到上海。（王春熙一九三一年二月牺牲于上海龙华。）

会见德国 Knana Zefkin、Tellman 与 Pick 等。

十二月，中共中央发布十三号重要文件，决定国共合作，全国具体工作方案，由委员长与秘书长签名发布。

会见陈延年与彭湃。

一九二四（甲子）年

1 秘书长即中央秘书，时中央无秘书长职。此职初由毛泽东担任，毛返湘后由罗章龙兼。— 补注

2 谢怀龙，原名谢黛茜。— 罗氏后人注。

谢，女，浙江人，后与罗结合并由陈独秀证婚。约 1927 年春回浙江，同年在上海被捕遇难。— 补注

一月，赴南昌会见赵醒侗，出席中共江西省委会议，赣省委主要成员为赵醒侗（书记）、王凤飞、邓鹤鸣、刘俊山、刘畴西、方志敏、周群、吴先群、王秋心、王怀心、张万兴等。

二月七日，全国铁路总工会在北京成立，文虎（时在外地）当选铁总党团书记。

出席莫斯科东方大学会议讲话，会晤校长 Radek。<sup>1</sup>

访问 Peterburg。

出席职工国际大会，寓 Lux 大旅社。<sup>2</sup>

中共巴黎支部建立，（驻拉丁区。）主要成员为张崧年、陈延年、陈乔年、镜松、卓光等。

游凡尔塞、塞因、喷泉，登 Eiffer 塔等。

出席中共柏林支部成立会，主要成员为高玉函、<sup>3</sup>李季子、王人旋、廖焕星、朱德等。（寓柏林 Hotel am Zoo。<sup>4</sup>）

访珊沙洗、汪湖、巨人山 Riessenberg。

出席汉堡国际运输工人会议，当选该会书记兼机关报主编（德文版在汉堡发行），会见 Fimen。<sup>5</sup>

自汉堡渡海至荷兰，访问 Amsterdam 与 Rotterdam。<sup>6</sup>

访问 Tannenburg（旧德俄战场）。

过色丹 Sedan 访旧普法战场。

访 Blussel、Schwitz 晤会 Cachon 等。

访问波兰 Warschau、Riga。

五月五日，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三周年纪念日，上海执行部国共两党工作人员齐集莫里哀路孙的住宅，举行纪念活动，并在孙寓的花园中合影留念。参加合影。

毛泽东、罗章龙分任国民党执行部组织部秘书和组织指导干事。

七月，中国国民党中央在广州设立农民运动讲习所。

一九二五（乙丑）年

一月，中共中央四大会在上海举行，文虎连续当选中央委员。职工国际派代表团来中国访问，（团长为 Austolobsky。）留铁总一周而去。（见一九二五年十月出版铁总报告。）

二月三日，文虎至青岛，组织胶济铁路罢工，经过八日，胜利复

1 Radek，即拉狄克。— 补注

2 即卢克斯旅馆，罗章龙在此曾晤李大钊。— 补注

3 高玉函，即高语罕，据罗章龙言曾入选“五大”中央委员会。— 补注

4 即动物园旅馆。— 补注

5 Fimen，即菲门，荷兰人，国际运输会议负责人。— 补注

6 即阿姆斯特丹、鹿特丹。— 补注

工。

五月，文虎主编中共中央机关报《中国工人》月刊，（至一九二九年底止。）发表国际工会运动论文四篇。

五月一日，由北京铁路总工会倡议主动联合海总、汉冶萍总工会与广州工人代表会，协同召开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到会南北各工会一一六六个，代表二八二名，代表产业工会会员一五四万。成立全总，通过促成北伐决议案。

自著《广州一周记》在《中国青年》发表。（一二三期，一九二六年六月十三日出版。）

六月，谢怀龙从上海到北京。

七月一日，广州国民政府成立。以汪精卫为主席。

出席太平洋会议及报告。

一九二六（丙寅）年

二月七日，全国铁路总工会在天津召开第三次铁总会议，选举罗宇云（文虎、亢斋）为委员长。（据一九二六年铁总年鉴。）

三月十九日，文虎至香港，召开香港运输业工会联合会，联合海员等十七个工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运输工人二十四万人。当即通过决议，加入运输工人委员会。由文虎代表国际运输工人委员会接受。

乘海轮宁波号遇险，同行海员阿谢海葬。

在飓风中渡黑水洋，夜泊成山角。

南海航行至珠江口，偕同仲夏、延年<sup>1</sup>登虎门要塞。

自著《西行漫记》在《中国青年》发表。

四月二十日，全国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文<sup>2</sup>代表中共中央向大会致词指出：“农民运动必须接受工人阶级的领导。工人阶级是现代革命运动中最急进的先锋。……”（见《向导》一五一期。）

主编《铁总年鉴》，第一集与第二集在天津出版。

秋，访禹陵，登会稽山，临钱塘江口，海门观潮，返次萧山。

自著《革命战士集》在天津出版。

自京南下出席广州北伐筹备会议。

天津张庄案、义庆里案发生。天津市长张学铭（张学良之弟）下令搜捕张义庄中共市委机关，谢怀龙（津市团委书记）突围脱险。

九月，文虎离京赴沪。自崇明溯江乘小艇经江阴、镇江、南京、芜湖、安庆、九江至武汉。

1 仲夏、延年：邓中夏、陈延年。— 罗氏后人补注  
2 文，罗章龙晚年忆旧时自称。— 补注

十月，国际代表团到武汉，会见 Dolio、Tomson、Berau 等。  
黄海航行中，突遇暴风不息，轮舵被击，沉落海中，轮船漂流数昼夜，粮水供应断绝，经一周后文虎始脱险。

一九二七（丁卯）年

一月，广东国民革命政府迁武汉办公，成立国共合作政府与政治联席会议，中委文虎等被任为出席联席会议中共方面代表。

一月，上海中共中央未迁武汉前，由驻汉中委文虎、兆征、荷波、平山、特立等成立武汉中央办事处（即中央分局），代行中央职权。

改组湖北省委，任中委文虎兼宣传部长。

一月三日，汉口英租界水兵枪击工人，湖北省委召集紧急会议，决定收回英租界。四日工人队伍进入租界，示威包围营领事馆，英领事恐慌，请求保护。双方谈判结果，英领事奉本国政府命令同意中国政府收回租界。五日英领事下旗，登英舰回国。同时收回九江英国租界。

一月，中共中央设立武汉工人运动讲习所于汉口黄陂会馆，招收学员一千名，任命文虎为正所长，许之贞为副所长。

中国◇◇◇<sup>1</sup>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迁武汉办公。（所址在武昌都府堤。）

中共中央正式迁移武汉办公。

二月初间，蒋介石乘舰艇从九江上驶到武汉。九日，蒋介石请迁都南昌，中共湖北省委立即举行群众大会以示抗议，蒋狼狈逃赣。

三月七日与八日，武汉《国民日报》记载武汉市民拥护提高党权群众大会，刊载有中共中央代表亢斋出席大会讲演词，为汉宁决裂先导。

四月，鄂省委决定干部开始进行军事训练，每周在洪山举行实弹射击。

夏，景云病逝于乡。

五月初，出席中共五大，在五大会上当选为五届中央委员。

五月上旬，湖北省委扩大会议通过紧急行动方案，倡议就地武装暴动，推翻国民党反动政权。旋向中共中央提出请求立即施行，但上级不同意遂作罢。

六月九日，中国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在汉口举行。出席代表四百人，代表全国有组织工会会员二九〇万人。文在大会上代表中共中央致词。

六月，中共中央召开五大二中全会，讨论巩固全国革命阵地，加

1 ◇◇◇，依前文当为国民党。— 补注

强斗争实力，决定大部分中央委员分散到各省地方党部，武装部队、工会、农会等基层组织，加强领导，指挥实际斗争。并决定中央机关决定迁回上海，在武汉方面设立长江局。

中共中央独秀离职赴沪。

六月，中共中央常委决定派中委◇◇◇、◇◇◇<sup>1</sup>二人即日赴长沙，改组湖南省委，进行军事反击。

七月，鲍罗廷、罗易等离开武汉后，七月下旬Lominadze、Neomann<sup>2</sup>自上海来到武汉。

中共中央决定，现留居长沙文虎与润之二人，以中委身份在湖南组织武装斗争。

怀龙自武汉返上海后被捕，牺牲。

八月七日，国际代表召集汉口会议，解散五大中央委员会，成立临时中央，指派瞿秋白为书记。

八月中旬，Neuman到长沙麻园岭苏领事馆召集会议，出席者驻长中委◇◇◇<sup>3</sup>及湖南省委委员。

中委文虎到长沙后，寓秋阳楼，主持省委工作。中委润之即赴铜鼓，指挥军事。

刘拾珍<sup>4</sup>自雪峰山到长沙。

罗章凤、赵振坤<sup>5</sup>与朱瑞等赴苏联学习军事。

长沙苏联领事馆被封闭，领事被迫出境。

九月，长沙湖南省委采取行动。

十月，文虎离长沙泛舟洞庭到武汉，寓长江局（珞珈牌路），出席长江局三省联席会议，会毕乘轮东下，一周抵上海。

十一月，召开扩大会议于上海，上海会议决定全国工农运动新计划，恢复中央工委，加强工农革命基层力量，文虎担任工委书记，恢复全国总工会，举行全国工运会议。同时调苏兆征、史文彬等回上海，恢复铁总与海总工作。

十一月，亢斋在上海中央局工作，寓虬江楼。主持全国工人运动。

十二月初，张太雷来信。（附复函。）

十二月，中共中央工委决定国际工会运动重新布局，太平洋工会秘书处在上海恢复办公。任文虎为中国全总首席代表。

一九二八（戊辰）年

1 ◇◇◇、◇◇◇：毛泽东、罗章龙。— 罗氏后人补注

2 Lominadze、Neomann，即洛米那则（苏联人）、洛埃曼。— 补注

3 ◇◇◇：罗文虎。— 罗氏后人补注

4 刘拾珍即刘炎。又名刘鄂，后与罗章龙结合，抗战初两人在四川分手。— 补注

5 赵振坤，即赵一曼。— 补注

三月，陈廉思从江北到虬江楼居住。

三月，出席太平洋劳动会议报告。（见《中国工人》第八期。）

送何瞻岵等出国，何自吴淞口外登轮，赋诗为别。

夏，文虎偕出席中共六代会代表团赴莫斯科开会，同行者有各省代表项英、毛简青等一百余人，沿途及越国境事务，均由当时苏联驻上海与哈尔滨两地领事馆协助办理。

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郊区别墅举行。开会四个星期，出席代表一百余人，选举文虎、史文彬、苏兆征、何孟雄、王仲一等三十余人为中委。

中共六大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在莫斯科举行。会毕各出席代表分别由赤塔及绥芬二路归国。文虎在苏留驻期到热海疗养，旋回国在中央工作。

乘国际列车从赤塔过阿木尔、海兰泡、庙街至海参崴回中国。

两渡国境简刘鄂。

七月二十二日，平江起义。滕代远自平江紫云公馆致文虎信，报告平江起义经过。

上海下海庙之役，文虎被敌围困，印人白南辛奋勇营救，得出险，白因此被捕入狱。

主编《劳动新闻》。

一九二九年（己巳）年

主编中共《全总通讯》，第一、第二与第三集在上海出版。

一九二八至二九年，井冈山使者刘士奇（岳州人，第三师政委）、陈毅（字仲弘，四川人，第一师政委）、滕代远（麻阳人、平江起义组织者），先后到沪访问汇报当地工作及黄洋界战役。

过台湾海峡遇飓风。

南海之行。出席九龙会议，革命工会地下工作会议，列席代表有海总陈郁、方才、叶全、夏德与香港工代会邓发、崔昌、秀珠等四十余人。

与贺其颖登宋王石眺崖山。

十一月十五日，◇◇◇<sup>1</sup>等八十一人签名发表声明。

一九三〇（庚午）年

文虎主编《中国工人宝鉴》在上海重刊发行。

遭父丧，被湖南军阀迫害逝世。

得湘南家书。

1 ◇◇◇：陈独秀。— 罗氏后人补注

罗章凤、朱瑞自莫斯科学习期满归国。

九月，《红旗》泄密案，王明在上海英租界被拘<sup>1</sup>，输情于敌，免死获释。

十月，虹口公园游说<sup>2</sup>一幕。

在四中全会<sup>3</sup>上，大多数六届中央委员反对密孚非法行动，当场退出会场，四中全会破裂。

### 一九三一（辛未）年

一月，上海新闻路花园会议，史文彬、陈郁等严词谴责密孚阴谋，危害革命，全体一致通过拒签声明<sup>4</sup>。

一月二十六日后<sup>5</sup>，中共六大中央委员成立“中共中央◇◇委员会”<sup>6</sup>，中委委员共二十二名，候补委员十五名，选举◇◇◇<sup>7</sup>为中央书记，林育南为秘书长，史文彬、何孟雄、李求实等分任常委。

“◇委”<sup>8</sup>常委中央通过并公布“反对四中全会力争紧急会议提纲”<sup>9</sup>（签名者九十六人），同时发表“告全党同志书”。

夏曦游说<sup>10</sup>。（石路旅馆。）

柯庆施赠言<sup>11</sup>。

王◇◇<sup>12</sup>主张息事宁人。（北站旅馆。）

阿郁<sup>13</sup>去留。（反复。）

一月十七日，中共中央“◇委”<sup>14</sup>与江苏省委联合召开工作会议于上海英租界东方饭店，（出席四十六人。）上海龙华案发生，被捕二十九人。

接孟雄等自上海龙华狱中来信，证实内奸告密情况。

二月，“非委”委员何孟雄、李求实、林育南等二十三人蒙难。（此案为临中唐虞告密所造成。）

1 王明被捕是在年1月。— 补注

2 虹口公园游说，即王明向罗章龙游说，要罗支持其夺取党内领导权。— 补注

3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1931年1月7日在上海召开。— 补注

4 拒签声明，指拒绝承认六届四中全会合法性声明。— 补注

5 “非委”成立约在1931年1月12日。— 补注

6 中共中央◇◇委员会：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 罗氏后人补注

7 ◇◇◇：罗章龙。— 罗氏后人补注

8 ◇委：非委。— 罗氏后人补注

9 “反对四中全会力争紧急会议提纲”，即《力争紧急会议，反对四中全会报告大纲》。— 补注

10 夏曦游说，即夏曦劝说罗章龙、林育南、刘炎等不要与米夫王明集团硬顶，暗示将发生残酷事件。— 补注

11 柯庆施赠言，亦是调和与王明篡党集团的斗争。— 补注

12 王◇◇：王首道。— 罗氏后人补注

13 阿郁，即陈郁。陈先参加“非委”，随后又退出。— 补注

14 ◇委：非委。— 罗氏后人补注

三月，临中<sup>1</sup>派夏曦到湘鄂西区组织中央分局，以夏为书记，开展反右残斗。

临中派张国焘到豫鄂皖区任该区书记。

五月，螻生<sup>2</sup>被派赴广东工作，一去无踪，下落不明。

九月，沈阳“九一八”事变，日军占领东北，◇◇<sup>3</sup>亲赴北满主持工作。

### 一九三二（壬申）年

邓云特<sup>4</sup>被捕，进江苏反省院，供出案情，获释。

六月“◇◇”<sup>5</sup>中央负责人史文彬到北方工作，被◇◇<sup>6</sup>告发陷狱<sup>7</sup>，夫妇及外甥均牺牲。

北平、天津案发生后，傅◇公<sup>8</sup>告密，供出案情，“非◇”<sup>9</sup>中委王仲一等被害于狱中。

七月十七日上海中共中央江苏“非委”召开反帝同盟大会于共舞台，经◇◇<sup>10</sup>告发，军警围捕，死伤多人，被捕一百五十余人，顾作辛<sup>11</sup>等脱险。（一说八月十六日。）

哈尔滨南岗案，江英、陈阿虎、张叔真、张淑媛等入狱。

八月，山东益都暴动，主持人郑心亭牺牲。

沈阳、大连案，秦力森、陈劲夫、沈沂风等入狱。

天妃宫案，“◇委”<sup>12</sup>中央委员◇◇◇<sup>13</sup>被逮送南京入狱。

岳州路◇兴◇案，◇◇◇等十四人陷狱。

蔡元培、杨杏佛组织民权保障同盟，营救政治犯。

### 一九三三（癸酉）年

邓中夏下放沪中区，被捕，死于南京。<sup>14</sup>

临中自上海逃出，遁往苏区。

1 临中，即六届四中全会组成的中央。— 补注

2 螻生：蔡和森。— 罗氏后人补注

3 ◇◇：文虎。— 罗氏后人补注

4 邓云特，即邓拓。邓出狱由褚民谊等保释。— 补注

5 ◇◇：非委。— 罗氏后人补注

6 ◇◇，可能是临中。— 补注

7 史文彬北上后不久折返家乡山东，并未陷狱牺牲，后死于抗战期间。— 补注

8 傅◇公：傅茂公，彭真。— 罗氏后人补注

9 非◇：非委。— 罗氏后人补注

10 ◇◇，可能是临中。— 补注

11 顾作辛：顾作新。— 罗氏后人补注

12 ◇委：非委。— 罗氏后人补注

13 ◇◇◇，可能即罗章龙本人。罗被捕在1933年4月。— 补注

14 邓中夏1933年5月被捕，9月就义。— 补注

五月，潘汉年被捕<sup>1</sup>后即投敌，应修人拒捕身死。

鄂西段德昌在反右运动中被◇◇所杀。<sup>2</sup>

“◇◇” 常委委员张昆弟在洪湖地区被害。<sup>3</sup>

同时柳直荀在湘西反右运动中亦被杀。<sup>4</sup>

◇令夫<sup>5</sup>在张垣被刺身死。

五月二十六日，冯玉祥、方振武等成立抗日同盟军，攻占多伦。

张◇◇<sup>6</sup>任秘书长，八月十四日失败，离张家口。

十一月，吉鸿昌被捕遭杀害。<sup>7</sup>

六月，杨铨（杏佛）在上海被刺身死。杨系中国民权运动同盟总干事。

十一月二十日，福建人民政府成立，举起反蒋旗号，十二月蒋率军向福建进攻。

一九三四（甲戌）年<sup>8</sup>

春，应河南大学约聘，到开封任河大教授兼经济系主任。<sup>9</sup>自此以后，息影大学，超越政治，从事著述与讲坛生活。（自此时起，政治动态从此停记。<sup>10</sup>）

出席河大教授会。河大教授会成员如下：杨丙辰、刘海朋、罗仲言、高晋生、萧一生、张延风、郑次石、熊伯履、张静吾、孙祥正、郝象吾、李云亭、张遂青等。

暑假，游览苏州，过阊门、登虎丘、泛太湖与南湖。

会见范雨霁、魏纹鹃。

十月，第一方面军长征开始。

十二月，◇◇◇<sup>11</sup>出走入川北，建立通南巴地区政府。

一九三五（乙亥）年

◇◇◇<sup>12</sup>离川陕，八月抵毛儿盖。

登崂山临海，观日出。<sup>1</sup>

1 潘汉年 1933 年被捕事待查。— 补注

2 段德昌 1933 年 5 月被杀于湘鄂西苏区。— 补注

3 ◇◇：非委。张昆弟 1932 年秋被杀于湘鄂西苏区。— 补注

4 柳直荀 1932 年 9 月被杀于湘鄂西苏区。— 补注

5 ◇令夫：韩麟符。韩麟符 1934 年 10 月初遇刺死于山西榆次。— 补注

6 张◇◇，即张慕陶。— 补注

7 吉鸿昌 1934 年 11 月死于天津。— 补注

8 自 1934 年至 1942 年原件的年份上有重复，已归并。— 补注

9 罗章龙到河南大学是 1934 年秋冬期间。— 补注

10 此前后年份政治动态仍有记述。— 补注

11 ◇◇◇：张特立。— 罗氏后人补注

12 ◇◇，当为特立或国焘。— 补注

青岛海滨饭店会见李渤海、孙菩园。<sup>2</sup>

参观北洋海军演习。

一九三六（丙子）年

到西京<sup>3</sup>，游杜甫祠、杜曲与王曲。

登西岳华山，步行过百尺幢<sup>4</sup>，上苍龙岭，宿中峰。

会见韩寅昆。

河大外籍教授Tilenz<sup>5</sup>被刺身死，遂离豫赴武汉。

住汉口日租界外侨公寓。

返长沙住望城坡木工家。

一九三七（丁丑）年

夏，日本军队威协开封，空袭频乃，河南大学决定迁往鸡公山，全校师生南迁，<sup>6</sup>在河大新址继续任教。

会见南阳杨紫珊、丹阳魏郁、灵宝廖佩英。

一九三八（戊寅）年

◇◇◇<sup>7</sup>自宁到武汉，双柏庙会谈。<sup>8</sup>

秋，自荆门溯长江西上，经宜昌，过瞿塘、滠源、巫峡，入川至重庆。

船过巫峡梦平<sup>9</sup>患重病，旋愈。

到重庆寓南岸玄坛庙新院巷夏宅。

严令凤自江津来见。

会见夏夫人，陆若冰同游南泉，登建文峰，荡舟花溪。

重庆日机大轰炸，死伤惨重。

偕子夕夫妇，<sup>10</sup>策骑游龙门浩。

1 青岛之行的登崂山、会晤李渤海、参观海军三事当在 1936 年夏。— 补注

2 李渤海，即黎天才，“非委”东北军支部领导兼张学良机要秘书，公开任职西北“剿总”政治处副处长，孙为黎夫人。三人密晤，与策动西安事变有关，时间当在 1936 年夏。— 补注

3 该年到西安，第一次为 4 月间，以带领学生实习为名，其后再赴西安待查。在西安曾同张学良会面，历次西行皆与策动兵变有关。— 补注

4 百尺幢，应为千尺幢或百尺峡。— 补注

5 Tilenz，即狄伦次，德国人，1936 年 5 月 31 日晚在开封郊外遇刺身亡。— 补注

6 河南大学南迁在 1937 年冬。— 补注

7 ◇◇◇：陈仲甫。— 罗氏后人补注

8 双柏庙会谈还有张国焘参加。— 补注

9 梦平，罗章龙之女。— 补注

10 偕子烈夫妇：张国焘、杨子烈夫妇。子夕，即杨子烈，罗章龙故意改其名。— 补注



一九三九（己卯）年

刘鄢自湘西来会，◇◇◇<sup>1</sup>自永绥来重庆。

自重庆西行至成都，寓沙利文馆店，休息三日乃离成都北行出川，赴南郑。此次长途旅行系与潘伯夫<sup>2</sup>△△△同车，自出发至汉中城固西北大学，经行二十一天始达。

寓城固丰乐桥李家宅一号（原系唐得源教授住房），地居汉江北岸，北依秦岭，南望巴山，因署所居曰“秦麓草堂”。

与◇◇◇<sup>3</sup>结婚。

一九四二（壬午）年——一九四四（甲申）年

七月十三日平汉<sup>4</sup>出生。

梦平毕业于国立第七中学，考入西北大学经济系肄业。

访胡姬营（张謇故里）、宗营镇。

登汉王城，观赏涇江及褒斜道落日。

游石门、睡冢山，见摩岩“雪浪”<sup>5</sup>与“石门颂”碑，王朋珏同行。

西大学生罗云峰、王雷鸣、罗洁如、段成、范玉葆、蔡秀珍、刘淑端等毕业。

日本敌机群空袭南郑，双方空军在南山上空发生激战，毁敌机一架，坠落龙王庙。

城固小西门外兵工厂火药库爆炸，死伤重大。

日全蚀<sup>6</sup>，昼晦暝，树叶呈双影，天空星辰出现，鸦雀归巢，实为三百年来西北第一次见到的全蚀。

与子夕<sup>7</sup>往来信函。

一九四五（乙酉）年

七月，城固西北大学反校长风潮发生，学生实行夺校印、逐校长，占领金库，收缴保卫队枪支。坚持二个月后被迫离校。

应华西大学约聘，到成都讲学一年。助教石瑞予，寓华西坝天竺街大学教授宿舍。

会晤邓◇惺<sup>8</sup>、龙琼瑛、章倚虹、柳朝阳（天文学家）。

1 ◇◇◇：罗平海。平海，罗章龙子，此前流落湘西某孤儿院，由刘炎领回。— 补注

2 潘伯夫，苏联人，苏派驻重庆军事顾问，此行系回国述职。— 补注

3 ◇◇◇：张可南，时年24岁，城固占路坝人。1976年病故。— 补注

4 平汉，罗章龙子，生于1942年。— 补注

5 雪浪，当为“褒雪”，相传为曹操书。褒通滚。— 补注

6 日全蚀，据罗章龙存诗所记，发生在1944年。— 补注

7 子夕：张国焘、杨子烈。— 罗氏后人补注

8 邓◇惺：邓季星，新民晚报女老板。— 罗氏后人补注

万里桥会晤玉函夫妇<sup>1</sup>、石瑞予、国帼恩等。  
出席望江楼石涛里华大同学讲演会。

一九四六（丙戌）年

夏，访川西新都桂湖、乐山、灌县（玉垒、离堆）、雅安、西康等处。

夏，刘鄢东归。

陆瑞鸿回武昌。

华西大学讲学期满，离川入陕，此行原定专返长沙过西安，被西大师生挽留任教，乃允暂任西大教职，住小南门外西北大学教舍二号。

十月，主编《经济新潮》月刊及周刊（一至六十八期），在西安（西北大学版）印行。

十二月，登慈恩寺塔，访阿房宫、未央宫旧址，得秦砖汉瓦多件。聘阜阳刘淑端任西大经济系助教。（土窑三月。）

《中国国民经济史》出版，上海商务印书馆“大学丛书”（重庆版印行）。

一九四七（丁亥）年

十二月，自西安乘中航机飞汉口转长沙，就任湖南大学教授兼经济系主任。（自一九四七年至一九五三年均在湖大任教。）

一九四八（戊子）年

二月，重登云麓宫，重访四彝斋、御书楼、浏水堕泪碑与周家台。

五月，自著《中国国民经济史》（大学丛书）在上海商务印书馆重印。

七月，自著《经济史学原论》在长沙出版。

十月，段开秀自青岛来湖大转学，住至善村，开贞同住。

一九四九（己丑）年

北大同学◇非白<sup>2</sup>、◇若愚来访，商谈编著“秦史”有关问题。初晤杨树达教授。

与杨遇夫<sup>3</sup>往来信函。

十一月一日，星原<sup>4</sup>生于岳麓山至善村。

1 玉函夫妇：高玉函夫妇。— 罗氏后人补注

2 ◇非白，即马非百。— 补注

3 杨遇夫，即杨树达。— 补注

4 星原，罗章龙外孙女，随母姓，又名星元。— 补注

冬，陶◇瑜<sup>1</sup>来校，赠字帖。

开秀北归。

自著《世界经济史》在湖南长沙出版。（湖大印行。）

#### 一九五〇（庚寅）年

湘南行，访郴州义帝冢、苏仙祠，行经宜章、坪石、观音寺等处。

二月，山西大学校长聘约，赴太原讲学。（见山西大学校刊纪事。）

二月，访太谷学院校园诸西人墓碑。

参观大同、丰镇、云岗石佛，登雁门关。（妙容夫妇同行。）

到北京，太液池畔书斋对话<sup>2</sup>。

陈书农来访。

湖大学习会成立，成员有周道隆、杨遇夫教授等五十余人。

北京大学来信，内称：一九二六年亢慕义斋存放北大学生宿舍有关革命文物书籍等木箱多件，已查明在北京日伪占领、汤尔和长北大时期，全部被日伪宪兵军警劫去，下落不明。

四月二十日，Emil Schaw夫妇<sup>3</sup>自欧洲归国，来长沙，见文虎于湖南大学，赠送其所著书，同车往周家台，沩痴寄庐访问新民学会旧址，见周姥已八十九岁。

八月二十日，◇岸◇<sup>4</sup>归国第一次来信。

#### 一九五一（辛卯）年

二月三日，袁任远（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兼省长）向文传达北京会议决定<sup>5</sup>。

三月，与王辛元<sup>6</sup>往来信函。

#### 一九五二（壬辰）年

三月，任湖大学习部主任兼教授会代表。

四月，晤文麟夫妇。

五月，会见廖翠羽、胡叔秦与黄明晖。

#### 一九五三（癸巳）年

1 陶◇瑜，即陶承（陶隐），欧阳立安母，曾著《我的一家》。— 补注

2 是年春，毛泽东与罗章龙相会于北京中南海毛书房内。— 补注

3 Emil Schaw 夫妇，即萧三与俄籍夫人。— 补注

4 ◇岸◇：毛岸英。毛信有影印件存。— 补注

5 北京会议，由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重议罗章龙案，仍维持四中全会中央处理决定。时间应是上一年。— 补注

6 王辛元：王新元。— 罗氏后人补注

国立湖南大学宣布撤销。

通过院系调整到武汉中南财经学院（后改湖北大学）经济系担任教授。（前后二十◇年。<sup>1</sup>）

寓武昌蛇山抱冰堂侧湖大教授宿舍六号楼。

#### 一九五四（甲午）年

春，朱明远院长约游东湖，举行聚餐会。

万◇之<sup>2</sup>来武昌工作。

#### 一九五五（乙未）年

春，赴长沙陶园晤花石皇英。

#### 一九五六（丙申）年

维扬余 Winter Leben 来去。

花园羊群主 W.

#### 一九五七（丁酉）年

自著“近百年（1948—1949）中国经济政治大事年表”完稿。（共二十二册，约八十万字。）<sup>3</sup>

亢斋启事。（刊学习报）

英南自荆门明妃村到武大。

湖北大学反右运动。

教授马哲民、秦庆钧、黄宣章、马洪、汪士楷、胡善恒、沈仪藻、欧涤臣、陈缓孙、刘光华、杨时展、孟广容、刘丙新、林树湘、刘隆恕、吴澄华、章导<sup>4</sup>

#### 一九五八（戊戌）年

夏，徐环君自临江来武汉。

王仲州<sup>5</sup>来信。

九月，缝纫厂案，◇◇◇<sup>6</sup>入监三月，无罪释放。

#### 一九五九（己亥）年

1 罗章龙 1979 年调北京中国革命博物馆任顾问。— 补注

2 万◇之：万素之，一保姆。— 罗氏后人补注

3 交财经学院，后散失。— 罗氏后人补注

4 以下原抄件删去 40 余字。— 补注

5 王仲州：王仲一兄弟。— 罗氏后人补注

6 ◇◇◇：张可南。— 罗氏后人补注

二月，夏明第一次来访，湖北大学访问，谈有关北方中共建党历史问题。

八月，北京煤炭工业部党委书记赵世兰来访。自一九五九年八月至一九六一年五月，先后来信八次。

一九六〇（庚子）年

夏，七月匡庐消夏行（第一次），同行者孙女星元，住河南路松门别墅，恒妹<sup>1</sup>从南京来。

秋，与刘文渊、康戎同谒康逊墓。

十一月，中共唐山市委张星北第一次来访，谈唐山建党与开滦五矿同盟罢工史事。又先后来信三次。

一九六一（辛丑）年

四月，中共唐山市委王桂林来访（第二次），主要谈唐山市、山海关、皇姑屯、沈阳、京奉路斗争史实诸事。

八月，夏明第二次来访（巍巍同行），自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一年前后信函九次。

八月，北方红旗著者韦君宜（女）、马◇◇二人来访，谈亢斋组织长辛店八月罢工、二七斗争和火神庙浴血负伤诸战役。

一九六二（壬寅）年

六月，平汉去东西湖。

夏，朱劭天书记来谈话。

秋，夏明三次来访（子戈同来），谈上海中央工委（一九二四至一九三一年）史事。

九月，星元进实验中学。

一九六三（癸卯）年

四月十七日，北京人民大学教授◇◇<sup>2</sup>来访。

夏，桂林郑瑞凤来武昌沧海楼学习外文。

七月，避暑住庐山，同行者星元（第二次）。

会见单国英、国华与张秀英（平乡）。

一九六四（甲辰）年

十月，校长◇◇<sup>1</sup>来谈（东湖建造住房事）。

1 恒妹：堂妹罗章恒（文虎七叔的女儿）。— 罗氏后人补注

2 ◇◇：胡华。— 罗氏后人补注

一九六五（乙巳）年

三上庐山，住庐山医院，访陶元亮故里（栗里）、三叠屏[泉]与花径。

七月，自芜湖乘淮南铁路寝车，北行至合肥，过八公山旧战场。游东西梁山。

夏，至安徽巢湖半汤温泉小楼疗养，（医生陈建兰、护士李秀兰，晤江希汉与徐阿炳。）住三月。

一九六六（丙午）年

五月，星元赴京投考美术学院。

九月二十九日，金猴入室<sup>2</sup>，图书散失。

九月三十日，省委靳宪余、刘◇◇二人乘车来谈奉命取书事。<sup>3</sup>

十一月十七日，董必武来信。<sup>4</sup>

纺织工业学院陈坤（女）来了解有关王新元问题。

一九六七（丁未）年

七月二十二日，乘寝车赴湘。

七月二十三日，访易俗河、马家河、姚家岭。（刘玉华。）

八月十三日，流寓易俗河。

九月三日，车向荷塘出发，经易家湾车站，车被劫去<sup>5</sup>。

九月五日，过姚家巷<sup>6</sup>。

九月十日，深夜冒雨回武昌。

一九六八（戊申）年

六月十五日，进居No. II Stock<sup>7</sup>，有教授、党委书记等四十五人，至春节回家。

熊解、温冰吉来谈。

十一月二十九日，辽宁大学红卫兵总部刘歆等来访，了解东北“非

1 ◇◇：林山。（东湖建房系毛泽东批准交办事。）— 罗氏后人补注

2 金猴入室，即湖北大学“金猴战斗队”抄罗章龙家。此日与罗章龙其他回忆记载略有出入，但均在9月下旬。— 补注

3 省委统战部。— 罗氏后人补注

靳、刘二人持省委统战部介绍信访罗，奉毛泽东之命取罗撰党史回忆文稿。时在“金猴入室”前，约中旬期间。— 补注

4 董信有影印件存。— 补注

5 三轮货车，脚踏式。— 罗氏后人补注

6 长沙，章明家。罗章明，十叔的大女儿。— 罗氏后人补注

7 可能是“文化大革命”中的“牛棚”。— 补注

委”，并了解顾卓新问题。

一九六九（己酉）年

一月，唐山市党委来人谈三十年代先后在下列参加过唐山工作的人，工作情况：袁乃祥、马云青（老五）、孔原、胡锡奎（王玉清）、尹◇一、吴服景、许元启、彭振纲、龚德元（无为）等。

三月四日 Frei

三月，梦平下放到常宁回江。本年三月二十六日起，昆明工学院前后三次派人来访，谈工程师张兆淮一九二四年入党问题，一九二五年在河南总工会，一九二七年在武汉省委分配工作情况等。

四月一日，北京纺织工业部轻工学院陈震坤来访，询问王新元政治历史及其与夏夫人、刘拾珍等同志情况。

五月，上海革委会三人到校，访问一九三〇年代中共党员徐益（大妹）、代小红（重远）、朱英如、王玉璋、金志诚<sup>1</sup>、丘碧新夫妇（龙岩）等工作情况。

十二月三日，上海革委会来人了解艾芜（唐◇◇）、雷◇◇、王德、朱伦、王平（松江书记）、朱英等人事。

十二月七日，本校全体员工下放漳河。

十二月十日，万金名来访谈话。

十二月十九日，中央组织部军代表二人来访，谈帅孟奇（陈王氏）出狱后，一九三二至四三年到民训会工作及其归队等问题。

十月二十四日，贵州革委会来人了解侯◇◇。

十二月二十四日，星惠<sup>2</sup>出生。

一九七〇（庚戌）年

四月十二至十四日，北京高教部来人了解刘子载问题。

五月，星元下放湖南常宁曲潭。

十一月，全校员工下放京山。

一九七一（辛亥）年

十二月，广州中山纪念馆、博物馆革委会汪杰等四人二次来访，谈中共三代会中央常委会工作。

一九七二（壬子）年

一月一日 Klein Min Mund

1 金志诚，即金维映（阿金）。— 补注

2 星惠：罗平汉大女儿。— 罗氏后人补注

二月，河南省革会来人（郑◇◇），了解“二七”大罢工详细内容。

四月十一至十五日，京汉江岸“二七”革命纪念馆史定六、潘光钰、朱文忠与武汉市文教局石元池等五人来访，谈话关于“二七”罢工提纲。

梦平九月迁回衡阳。十一月星元回汉。

一九七三（癸丑）年

八月三十日，患急性肠炎，午夜进第三医院施行急救<sup>1</sup>，住院三星期，八月十五日出院<sup>2</sup>，医生洪◇护士孙胜景。

会见◇◇老师。

十二月三十日，上海市革委会写作组余子道等二人（复旦大学教工）访问有关萧楚女等一九二七年参加湖北省委工作经过。（按：楚女一九二七年四月到湖北省委宣传部工作，时文虎任宣传部长云。）

一九七四（甲寅）年

五月，星元户口转回。

六月，晤周惠君医生，拔全牙，十二月镶牙毕。

六月二十八日至七月十一日，郑州大学政治党史教研室教师郑毅涛、林德隆、蒋相炎、唐伯学等来访，主要查问一九二五年七月本人领导福中煤矿工会坚持八个月的罢工斗争经过。

北京“二七”纪念馆吴太伯、乔桂生与刘积来，询问“二七”大罢工的十个问题，征求答案。

一九七五（乙卯）年

元月十三至二十六日，农讲所纪念馆馆长吴梅林偕张至善、周斌、王敏敏等四人来访，谈一九二七年武汉大革命时代史事。

十一月十四日十五日两日，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委会派党员干部武、何二人由南宁到武汉，会谈有关谭寿林烈士史料有关问题。

附页一<sup>3</sup>

年表补三条

1 细菌性痢疾，高烧40℃。— 罗氏后人补注

2 入院与出院日依原文。— 补注

3 年表誊抄装订后夹有小纸片两张，均为罗章龙手迹。依原件录入，并以空行隔开。— 补注

1926年补初至昆明

192◇年度五岭

沿黄河巡观堤防渡口桥梁

参考

仲言(1)文选(2)诗选(3)诗话(4)通信集 已刊著作

蔡元培年表编写方法

一九二一年蔡元培年表引马克思学会资料

## 附页二<sup>1</sup>

罗仲言

一九一八年秋考入北京大学预科。

一九二四年秋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

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五年在德国工作和学习。

从一九三五年<sup>2</sup>起在河南大学任经济系教授兼系主任。以后连续在西北大学、华西大学、湖南大学任经济系教授、系主任。

一九四七年至一九四九年在湖南大学任一级教授。

发表的著作有：

《康德传》与商承祖合译，中华书局发行，一九二二年一版，一九三三年第四版。

《中国国民经济史》上、下册，商务印书馆，一九四四年出版。一九四五年学术审议给奖。

《史学原论》<sup>3</sup>一九四七年出版，发行者经济新潮社，上海黎明书局。

《社会主义国民经济计划原理》一九五〇年湖南大学出版。

## 附录：罗章龙著述目录（罗平海整理）

以下是罗章龙生前汇集的已发表的大部分文章和书籍目录，有些只剩文章名目，而内容已不复寻（其名目来自当年有关报刊的广告），也有少数文章目录是重复转载的。另外，有少数文章是生前

1 原件末有罗氏后人草拟的罗仲言学术活动大事一页，此依原件录入并作技术性校订。

— 补注

2 罗到河南大学在1934年秋冬间。— 补注

3 当为《经济史学原论》。— 补注

已写好，去世后发表的。共计528篇。

本书目中包含有我党最早的工运史料：如《京汉工人流血记》、《一九二五年的中国铁路工会》和《铁总年鉴》，我党出版的最早一部烈士传《革命战士集》等。此外遗漏的当不在少数，错误亦在所难免，容日后改正和补充。

- 1 对联征文 罗章龙等 新生活 第十九期 1919.12.28
- 2 红外套（中篇小说 RED MAINTEL） 章龙译 新国民报 1920.
- 3 推霞（TIECHA） 罗墩阶译 晨报副刊 1920.
- 4 讲演：旗族同胞别忘了四百万经费分配问题 罗章龙 新生活 第二十七期 1920.02.29
- 5 讲演：世界工读运动的讨论 罗章龙 新生活 第三十期 1920.03.21
- 6 世界工读运动的讨论 罗章龙 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 1920.04.04
- 7 罗墩阶给毛泽东的信 罗墩阶 《新民学会通信集》 1920.07
- 8 孚梨茨（独幕剧 FRITZ） 罗章龙译 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 1920.10.15
- 9 军暴 罗章龙译 晨报副刊（第七版） 1920.11.07
- 10 我们工人所感觉的“双十节” 景云 《工人周刊》第12号 1921.10.09
- 11 发起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启事 罗章龙执笔 《北京大学日报》894号第4版 1921.11.17
- 12 各铁路工友应急起援助陇海路罢工 慕敢 《工人周刊》第19号 1921.11.29
- 13 陇海路劳动考察记 记者 《工人周刊》第22号 1921.12.18
- 14 《康德传》 罗墩阶、商章孙合译 中华书局哲学丛书 中华书局 1922
- 15 八月罢工后长辛店发谢函 文虎执笔 1922.08.30
- 16 中俄会议与被掠夺民族——中国的命运 罗章龙 《民权（双十节特刊）》第2张 1922.10.10
- 17 我们何故反对宗教 罗章龙 《非宗教论》 1922.11.05
- 18 再论反对宗教 罗章龙 《非宗教论》 1922.11.05
- 19 非宗教论序 编者 《非宗教论》 1922.11.05
- 20 工人周刊第十四期发刊词 文虎 《工人周刊》第14期 1922.11.05
- 21 二七大屠杀的经过 罗章龙报告 《向导》第20期 1923.02
- 22 京汉工人流血记 文虎编 工人周刊社 1923.03
- 23 “二七”屠杀之原因 文虎 《二七劳工流血纪念》 1923.03
- 24 京汉工人流血记序 文虎 《工人周刊》第63号 1923.05
- 25 年年五月一日 文虎 《工人周刊》第63号 1923.05.01
- 26 本号发刊的话 文虎 《工人周刊》第64号 1923.05.23

- 27 护路阴谋中之曼德计划 章龙 《向导》第36期 1923.08.15
- 28 “自动处置”声中之共管案 章龙 《向导》第37期 1923.08.22
- 29 大米案与中美“邦交” 章龙 《向导》第37期 1923.08.22
- 30 国际共管与“国际自管” 章龙 《向导》第37期 1923.08.22
- 31 共管案之变幻及其归宿 章龙 《向导》第38期 1923.08.29
- 32 限制天空军备会议——重新宰割弱小民族 章龙 《向导》第39期  
1923.09.08
- 33 引人入胜的外交案——组织联合舰队 章龙 《向导》第40期  
1923.09.16
- 34 山东民众的革命潮流 章龙 《向导》第40期 1923.09.16
- 35 华会以后美国对华的德政一斑 章龙 《向导》第40期 1923.09.16
- 36 直派的大选股东究竟是谁? 文虎 《向导》第40期 1923.09.16
- 37 国际联盟与中奥 章龙 《向导》第40期 1923.09.16
- 38 试看英人护路的又一论证 章龙 《向导》第41期 1923.09.23
- 39 外交家的体面 章龙 《向导》第41期 1923.09.23
- 40 江西马家村农民抗税运动 章龙 《向导》第41期 1923.09.23
- 41 救灾声中日本军阀的暴行 章龙 《向导》第41期 1923.09.23
- 42 丧权辱国的临案复牒 章龙 《向导》第42期 1923.09.30
- 43 大批“悬案”开始解决 章龙 《向导》第43期 1923.10.17
- 44 欢迎山东革命的民众 章龙 《向导》第43期 1923.10.17
- 45 陈炯明枪刺下的海丰农民 章龙 《向导》第43期 1923.10.17
- 46 美国侨商公然在沪大开侵略会议 章龙 《向导》第44期 1923.10.27
- 47 长沙市民新耻辱 章龙 《向导》第44期 1923.10.27
- 47 临案解决以后 章龙 《向导》第44期 1923.10.27
- 48 俄国农村之一幕 章龙译 《中国青年》第6期 1923.11.24
- 50 革命 VON HEINE 文虎 《新青年季刊》第2期 1923.12
- 51 进行曲(赤军) 文虎 《新青年季刊》第2期 1923.12
- 52 西北利亚脱逃记(1905年俄罗斯革命) 罗章龙译 《新建设》第一卷  
第二期 1923.12.20
- 53 国际工人运动 罗章龙讲演 上海民国日报觉悟栏 1924
- 54 西北利亚脱逃记(1905年俄罗斯革命) 罗章龙译 《新建设》第一卷  
第三期 1924.01
- 55 密勒记者语妙天下 章龙 《向导》第51期 1924.01.09
- 56 蛮狠的美国侨商 章龙 《向导》第52期 1924.01.20
- 57 威尔逊与列宁 章龙 《向导》第53,54期合刊 1924.02.20
- 58 西北利亚脱逃记(托洛斯基著) 罗章龙译 《新建设》第一卷第四期  
1924.03

- 59 意械问题与外交团 章龙 《向导》第57期 1924.03.19
- 60 行宪会议—宪法运动的葬仪! 章龙 《向导》第58期 1924.03.26
- 61 中俄交涉声中的谰言 章龙 《向导》第60期 1924.04.02
- 62 原来如此 章龙 《向导》第61期 1924.04.16
- 63 关税会议的“时机” 章龙 《向导》第63期 1924.04.30
- 64 排外与排内 章龙 《向导》第64期 1924.05.07
- 65 美国退还赔款的阴谋(时事评论) 章龙 《向导》第65期 1924.05.14
- 66 佚名(原系德文待查) LEO.D.L 国际运输工人报(西文版) 1924.06
- 67 关税会议绝望了 章龙 《向导》第70期 1924.06.18
- 68 俄使馆问题(也是一种惩罚吗?) 章龙 《向导》第70期 1924.06.18
- 69 上海租界的治安 章龙 《向导》第71期 1924.06.18
- 70 交民巷的独霸局面不保了! 章龙 《向导》第73期 1924.07.09
- 71 十年以来的世界工会运动 罗章龙 《中国工人》第3期 1925.01
- 72 赤色职工国际与国际职工协会 罗章龙 《中国工人》第3期 1925.01
- 73 出席汉堡第四次国际运输工人大会报告 罗章龙 《中国工人》第3期  
1925.01
- 74 论国际工会运动 罗章龙 《中国工人》第3期 1925.01
- 75 全国铁路总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宣言 罗章龙 1925.02
- 76 革命歌 文虎 《二七二周年纪念册》 1925.02.07
- 77 全国铁路总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致闭幕词 文虎 1925.02.10
- 78 《一九二五年的中国铁路工会》 文虎编 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 1925.03
- 79 国际运输工人部宣传委员会致运输工人书 文虎 《中国工人》第4期  
1925.04
- 80 “一九二五年的中国铁路工会”序 文虎 《一九二五年的中国铁路工会》  
中国铁路总工会印行 1925.05
- 81 十年来世界工会运动概观 罗章龙讲 余泽鸿记 上海《民国日报》副刊  
《觉悟》 1925.12
- 82 反革命口中之暴民专制 沧海 《民生周刊》2卷3期 1925.12.12
- 83 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1923—1926 章龙 《中国劳动通讯集》 1926
- 84 铁总报告 文虎 《铁总年鉴》 1926.02
- 85 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第三次代表大会闭幕词及闭幕通电 文虎  
1926.02.12
- 86 “二七”三周年纪念日追溯一年来中国铁路工会的发展 章龙 《向导》  
第145期 1926.02.20
- 87 西行杂记 罗章龙 《中国青年》第119期 1926.04.24
- 88 铁总年鉴序 罗章龙 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 1926.05
- 89 革命战士集自序 罗章龙 《铁总年鉴》 1926.05

- 90 苏俄的农村 罗章龙 《中国青年》第120期 1926.05.30
- 91 广州一周记 罗章龙 《中国青年》第123期 1926.05.30
- 92 广州一周记(续) 罗章龙 《中国青年》第124期 1926.07.14
- 93 悼我们的战士——王中秀同志 章龙 《向导》第162期 1926.07.14
- 94 北方铁路工人生活之困状与自救 章龙 《向导》第165期 1926.07.28
- 95 王尽美 罗章龙 《革命战士集》 1926.09
- 96 游天洋 罗章龙 《革命战士集》 1926.09
- 97 高克谦 罗章龙 《革命战士集》 1926.09
- 98 李味农 罗章龙 《革命战士集》 1926.09
- 99 伦克忠 罗章龙 《革命战士集》 1926.09
- 100 戴培元 罗章龙 《革命战士集》 1926.09
- 101 马七 罗章龙 《革命战士集》 1926.09
- 102 一个参战工人的回忆——姚佐唐口述 罗章龙 《革命战士集》  
1926.09
- 103 王长保传 罗章龙 1926.09
- 104 韩玉山传 罗章龙 1926.09
- 105 《铁总年鉴》 罗章龙编 《铁总年鉴》 1926.10
- 106 铁总年鉴再版附记 文虎 《铁总年鉴》 1926.10
- 107 群众周刊发刊词 罗章龙 《群众》第1期 中共湖北省委 1926.11.01
- 108 “二七”以来中国工人的争斗 罗章龙 《群众》第9期 1927.02
- 109 国民党党务问题 章龙 《群众》第10期 1927.02
- 110 英帝国主义的最后战略 章龙 《群众》第10期 1927.02
- 111 中国共产党湖北区执行委员会为上海事件告工农群众 文虎撰 《群众》  
第11、12期 1927.03.11
- 112 上海罢工在目前政治上的意义 罗章龙 《群众》第11、12期合刊  
1927.03.11
- 113 论目前湖北农村斗争 罗章龙 《群众》第13期 1927.04
- 114 白色恐怖中的上海 虎 《群众》第14期 1927.07
- 115 裁军会议原来如此 虎 《群众》第14期 1927.07
- 116 对牛弹琴 虎 《群众》第14期 1927.07
- 117 国家主义派再到什么地方去 虎 《群众》第14期 1927.07
- 118 曾国藩与张宗昌 虎 《群众》第14期 1927.07
- 119 中山纪念告民众 革命与妥协 罗章龙 《群众》第14期 1927.07
- 120 劳工代表代表谁 虎 《群众》第14期 1927.07
- 121 《工人宝鉴》小引 沧海 《工人宝鉴》第1册 中共中央工委 1928
- 122 劳动保护法 文虎 《中国工人》第1期 1928
- 123 中华全国总工会扩大会议的意义 真君 《布尔什维克》第19期

- 1928.02.27
- 124 出席太平洋劳动会议秘书处第三次会议报告 文虎 《中国工人》第8  
期 1928.10
- 125 中华全国总工会关于最近中国工运报告 沧海 中国工会历史文献(2)  
1928.10.21
- 126 军阀割据下铁路工人的生活与斗争 沧海 《中国工人》第1期  
1928.12.01
- 127 冯玉祥的矛盾 沧海 《中国工人》第1期 1928.12.01
- 128 青天白日下的冤鬼 沧 《中国工人》第1期 1928.12.01
- 129 训政与专制 沧 《中国工人》第1期 1928.12.01
- 130 罢工是要国民党赞成的吗? 沧 《中国工人》第1期 1928.12.01
- 131 反动工会的形形色色 沧 《中国工人》第1期 镰刀与铁锤  
1928.12.01
- 132 中华全国总工会反汤麦宣言 文虎执笔 《中国工人》第2期  
1928.12.15
- 133 汤局长妙语一束 沧海 《中国工人》第2期 镰刀与铁锤 1928.12.15
- 134 汤麦的妖言与中国资产阶级的鬼脸 沧海 《中国工人》第2期  
1928.12.15
- 135 请看国民党破坏上海法商水电罢工之内幕 沧海 《中国工人》第4期  
1928.12.20
- 136 上海法电车罢工纪事 记者 《中国工人》第4期 1928.12.20
- 137 关于《斗争导报》 文虎(沧海) 1929
- 138 中华全国总工会为广州暴动纪念宣言 文虎执笔 《中国工人》第3期  
1929.01.01
- 139 纪念广州暴动的无名英雄 沧海 《中国工人》第3期 1929.01.01
- 140 禁售日货即共产党 沧海 《中国工人》第3期 镰刀与铁锤  
1929.01.01
- 141 这叫做“扶植劳工” 沧海 《中国工人》第3期 镰刀与铁锤  
1929.01.01
- 142 阎锡山当面说谎 沧海 《中国工人》第3期 镰刀与铁锤 1929.01.01
- 143 刘纪文的反动论调 沧海 《中国工人》第3期 镰刀与铁锤  
1929.01.01
- 144 国民党外交可怜 沧海 《中国工人》第3期 镰刀与铁锤 1929.01.01
- 145 邮务局长好威风 沧海 《中国工人》第3期 镰刀与铁锤 1929.01.01
- 146 国民党奈芳泽何? 沧海 《中国工人》第3期 镰刀与铁锤  
1929.01.01
- 147 青岛商阜局赵琪的良心主义 沧海 《中国工人》第3期 镰刀与铁锤

1929. 01. 01
- 148 金元总统胡佛 沧海 《中国工人》第3期 镰刀与铁锤 1929. 01. 01
- 149 汤姆士去华的尾声 沧海 《中国工人》第3期 镰刀与铁锤 1929. 01. 01
- 150 官僚工会现形记 沧海 《中国工人》第3期 镰刀与铁锤 1929. 01. 01
- 151 国民党惩治工贼的办法 沧海 《中国工人》第3期 镰刀与铁锤 1929. 01. 01
- 152 工人与法律 沧海 《中国工人》第3期 镰刀与铁锤 1929. 01. 01
- 153 总工会变同乡会 沧海 《中国工人》第3期 镰刀与铁锤 1929. 01. 01
- 154 张牙舞爪的法西斯蒂 沧海 《中国工人》第3期 镰刀与铁锤 1929. 01. 01
- 155 床次与田中的话 沧海 《中国工人》第3期 镰刀与铁锤 1929. 01. 01
- 156 中华全国总工会关于最近中国工运报告 沧海 溪石 《中国工人》第4期 特载 1929. 01. 15
- 157 反对国民党摧残工人的恶法律 沧海 《中国工人》第4期 1929. 01. 15
- 158 资本主义的破坏性 沧海 《中国工人》第4期 镰刀与铁锤 1929. 01. 15
- 159 国际联盟的大道理 沧海 《中国工人》第4期 镰刀与铁锤 1929. 01. 15
- 160 冯玉祥又杀工人 沧海 《中国工人》第4期 镰刀与铁锤 1929. 01. 15
- 161 蒋介石的法律 沧海 《中国工人》第4期 镰刀与铁锤 1929. 01. 15
- 162 资本家眼中的工厂法 沧海 《中国工人》第4期 镰刀与铁锤 1929. 01. 15
- 163 新交通系的政策 沧海 《中国工人》第4期 镰刀与铁锤 1929. 01. 15
- 164 东方移民律下之中国工人 沧海 《中国工人》第4期 镰刀与铁锤 1929. 01. 15
- 165 上海邮政罢工的经过与教训 沧海 《工人宝鉴》第1期 1929. 02. 01
- 166 年关紧迫中全国工人斗争的阵势 沧海 《中国工人》第5期 1929. 02. 01
- 167 劳资调解下之南洋烟公司工潮 沧海 《中国工人》第5期 1929. 02. 01
- 168 评天津英美烟工厂的罢工 沧海 《中国工人》第5期 1929. 02. 01
- 169 新新公司罢工的胜利条件 沧海 《中国工人》第5期 1929. 02. 01
- 170 汉口对日罢工的危机 沧海 《中国工人》第5期 1929. 02. 01
- 171 广东职工运动的新趋势 斧公 《中国工人》第5期 1929. 02. 01
- 172 劳资间之心理建设原来如此 沧海 万生 《中国工人》第5期 镰刀与铁锤 1929. 02. 01
- 173 五省裁厘会议 沧海 万生 《中国工人》第5期 镰刀与铁锤

1929. 02. 01
- 174 献媚枯骨 沧海 万生 《中国工人》第5期 镰刀与铁锤 1929. 02. 01
- 175 应该特别表彰的职工 沧海 万生 《中国工人》第5期 镰刀与铁锤 1929. 02. 01
- 176 社会局的敷衍手段 沧海 万生 《中国工人》第5期 镰刀与铁锤 1929. 02. 01
- 177 阎工工会新供状 沧海 万生 《中国工人》第5期 镰刀与铁锤 1929. 02. 01
- 178 上海法界水电工友二次罢工之始末 溪石 《中国工人》第5期 1929. 02. 01
- 179 评论一篇 沧海 《中国工人》第5期 1929. 02. 01
- 180 纪念“二七”烈士 沧海 《中国工人》第6期 1929. 02. 07
- 181 中华全国总工会“二七”六周年纪念宣言 文虎执笔 《中国工人》第6期 1929. 02. 07
- 182 出席太平洋劳动会议秘书处第三次会议报告 文虎 《中国工会历史文献》(2) 133 1929. 05
- 183 蒋介石无耻之谈 沧海 《中国工人》第7期 1929. 05. 01
- 184 日资本家坑杀矿工 沧海 《中国工人》第7期 1929. 05. 01
- 185 合理化的灾难 沧海 《中国工人》第7期 1929. 05. 01
- 186 国民党的工厂法是什么东西? 沧海 《中国工人》第7期 1929. 05. 01
- 187 反对军阀战争危机宣言 文虎执笔 《中国工人》第7期 1929. 05. 01
- 188 为邮政总局无故开除工人告工友书 文虎执笔 《中国工人》第7期 1929. 05. 01
- 189 惊人的消息——国民党政府聘外人顾问 沧海 《中国工人》第7期 镰刀与铁锤 1929. 05. 01
- 190 编造会议的失败 沧海 《中国工人》第7期 镰刀与铁锤 1929. 05. 01
- 191 上海丝厂资本家的毒辣 沧海 《中国工人》第7期 镰刀与铁锤 1929. 05. 01
- 192 纪念黄庞的不幸 沧海 《中国工人》第7期 镰刀与铁锤 1929. 05. 01
- 193 一个华侨的话 沧海 《中国工人》第7期 镰刀与铁锤 1929. 05. 01
- 194 商办公会 沧海 《中国工人》第7期 镰刀与铁锤 1929. 05. 01
- 195 征工新发明 沧海 《中国工人》第7期 镰刀与铁锤 1929. 05. 01
- 196 又一官办走狗工会 沧海 《中国工人》第7期 镰刀与铁锤 1929. 05. 01
- 197 汤玉麟快人快语 沧海 《中国工人》第7期 镰刀与铁锤 1929. 05. 01
- 198 滑稽斗争的一幕 沧海 《中国工人》第7期 镰刀与铁锤 1929. 05. 01
- 199 全国职工运动目前的总任务 文虎 《中国工人》第8期? 1929. 05. 15



- 200 中华全国总工会第二次扩大会议 沧海 《中国工人》第 8 期  
1929.05.15
- 201 全总报告(续) 沧海 《劳动》周刊第 17 期 1929.11
- 202 纪念苏兆征 沧海 《苏兆征纪念册》 中共中央工委、中华全国总工会  
1930.02
- 203 苏兆征同志传 文虎 《苏兆征纪念册》 中华全国总工会 1930.02
- 204 全总通讯(一、二、三集) 文虎主编 全总通讯(一、二、三集) 1930.02
- 205 全国工友起来反抗帝国主义国民党资本家在上海屠杀工人——全国总工  
会通告 文虎执笔 《劳动》周刊第 21 期 上海劳动周报社  
1930.02.07
- 206 中华全国总工会为帝国主义国民党资本家屠杀上海工人事件宣言 文虎  
执笔 《劳动》周刊第 21 期 上海劳动周报社 1930.02.07
- 207 号召全世界无产阶级向帝国主义资本家国民党猛攻! 中华全国总工会通  
电 文虎执笔 《劳动》周刊第 21 期 上海劳动周报社 1930.02.07
- 208 安迪生电泡厂工友流血斗争的意义 沧 《劳动》周刊第 21 期  
1930.02.07
- 209 二七纪念 全国工人争自由运动——中华全国总工会通告 文虎执笔  
《劳动》周刊第 22 期 上海劳动周报社 1930.02.07
- 210 纪念二七战士 文虎执笔 《劳动》周刊第 22 期 1930.02.07
- 211 “二七”经过谈 沧 《劳动》周刊第 22 期 1930.02.07
- 212 纪念“二七” 快来加入赤色工会 沧 《劳动》周刊第 22 期  
1930.02.07
- 213 工厂委员会有什么好处? 沧 《劳动》周刊第 23 期 1930.02.14
- 214 苏兆征——为共产主义的伟大目标斗争 沧海 《劳动》周刊第 24 期  
1930.02.21
- 215 苏兆征同志小传 文虎执笔 《劳动》周刊第 24 期 1930.02.21
- 216 中共中央全国总工会发起召集苏维埃区域的代表大会(文虎执笔) 《劳  
动》周刊第 24 期 1930.02.21
- 217 反抗帝国主义国民党资本家屠杀工人——全总为棉织厂惨案告上海工友  
(文虎执笔) 《劳动》周刊第 25 期 上海劳动周报社 1930.03
- 218 全总复中共中央函(文虎执笔) 《劳动》周刊第 25 期 1930.03
- 219 组织产业工会 俊 《劳动》周刊第 25 期 1930.03
- 220 海员工友现在怎样办? 沧 《劳动》周刊第 27 期 1930.03.18
- 221 上海四八惨案的伟大意义 沧 《劳动》周刊第 28 期 1930.04.10
- 222 代论:中华全国总工会为“五一”纪念宣言(文虎执笔) 《劳动》周  
刊第 30 期 1930.05.01
- 223 纪念五一拥护苏维埃区全国代表大会 君 《劳动》周刊第 30 期

- 1930.05.01
- 224 纪念“五一”与打倒黄色工会 张俊 《劳动》周刊第 30 期 1930.05.01
- 225 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武装进攻中国苏维埃区域 沧 《劳动》周刊第 30  
期 1930.05.01
- 226 中国的红军 沧 《劳动》周刊第 30 期 1930.05.01
- 227 中华全国总工会拥护苏维埃区全国代表大会宣言 (文虎执笔) 《劳  
动》周刊第 31 期 1930.05.14
- 228 我们怎样拥护红军 沧 《劳动》周刊第 31 期 1930.05.14
- 229 社论:斗争与组织 张俊 《劳动》周刊第 32 期 1930.05.18
- 230 庆祝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成功(文虎执笔) 《劳动》周刊第 34 期  
1930.06.07
- 231 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成功与中国工人阶级 沧海 《劳动》周刊第 34  
期 1930.06.07
- 232 目前斗争的道路 沧 《劳动》周刊第 35 期 1930.06.14
- 233 海员的三大斗争 沧 《劳动》周刊第 35 期 1930.06.14
- 234 全总为反对军阀与拥护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宣言 (文虎执笔)  
《劳动》周刊第 36 期 1930.07
- 235 《1928—1930 年中国职工运动状况》(《中国劳动运动的现状》) 柏格  
森著 中华全国总工会 1930.07
- 236 中华全国总工会通告第二十号——《八一》运动 (文虎执笔) 《劳  
动》周刊第 37 期 1930.07.16
- 237 关于赤色工会组织的两个重要问题 沧海 《劳动》周刊第 37 期  
1930.07.16
- 238 国民党压榨工人血汗的新机器——工商管理协会 沧 《劳动》周刊第  
37 期 1930.07.16
- 239 序言(中国劳动运动的现状) 文虎 《1928—1930 年中国职工运动状  
况》 1930.07.27
- 240 发刊的话 沧海 《斗争导报》 1930.11
- 241 力争紧急会议反对四中全会报告大纲(文虎执笔) 1931.01
- 242 《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 罗仲言 河南大学印行 1933
- 243 《中国产业史》 罗仲言 河南大学印行 1935
- 244 敌国长期建设之梦 罗仲言 重庆《经世》战时特刊第 36 期 重庆《经  
世》战时特刊 1939.04
- 245 《中国国民经济史》(上册) 罗仲言 商务印书馆《大学丛书》 1944
- 246 论秦汉帝国经济具有国民经济之通质 沧 正报 社论 1945.02.01
- 247 国共努力的新途径 沧 正报 社论 1946.10.18

- 248 从苏北土地改革政策谈起 沧 正报 社论 1946. 10. 19
- 249 泛滥欧洲的经济逆潮 罗仲言 正报 星期专论 1946. 10. 20
- 250 再论土地改革 沧 正报 社论 1946. 10. 21
- 251 论安全与侵略 沧 正报 社论 1946. 10. 22
- 252 日本赔偿问题 沧 正报 社论 1946. 10. 25
- 253 拯救德国人民 沧 正报 社论 1946. 10. 28
- 254 论否决权 沧 正报 社论 1946. 10. 30
- 255 如何肃清政治利润 沧 正报 社论 1946. 11
- 256 评中美通商航海条约 沧 正报 社论 1946. 11. 08
- 257 论国民党执政以来的经济政策 沧 正报 社论 1946. 11. 09
- 258 论商业会议及其任务——读全国商联大会宣言后 沧 正报 社论 1946. 11. 11
- 259 三十五年来经济改革成败论 沧 (罗仲言) 《经济评论》二期一版 1946. 11. 11
- 260 远东贸易竞争的新阵营 沧 正报 社论 1946. 11. 18
- 261 台湾与日本农业改革的借鉴 沧 正报 社论 1946. 11. 20
- 262 不平之鸣! ——为西安市公教人员呼吁 沧 正报 社论 1946. 11. 22
- 263 如何稳定利息 沧 正报 社论 1946. 11. 25
- 264 渔业与海军——从日本侵渔业事件说起 沧 正报 社论 1946. 11. 27
- 265 宪法中之经济条款 沧 正报 社论 1946. 11. 29
- 266 论新金元主义——读外交部对中美商约声明有感 沧 正报 社论 1946. 12. 02
- 267 英国生产国有化的借鉴 沧 正报 社论 1946. 12. 04
- 268 迁都评议 沧 正报 社论 1946. 12. 06
- 269 评美国工潮 沧 正报 社论 1946. 12. 09
- 270 国际裁军问题 沧 正报 社论 1946. 12. 11
- 271 农业改革与政治改革 沧 正报 社论 1946. 12. 13
- 272 伊朗内战之教训 沧 正报 社论 1946. 12. 16
- 273 再论国际裁军 沧 正报 社论 1946. 12. 18
- 274 论日本丝织业独占计划——并质驻日盟军总部 沧 正报 社论 1946. 12. 20
- 275 世界经济何往? 沧 正报 社论 1946. 12. 23
- 276 论孙币 沧 正报 社论 1946. 12. 25
- 277 金融工商危机如何消解? 沧 正报 社论 1946. 12. 27
- 278 论改组政府 沧 正报 社论 1946. 12. 30
- 279 《经济史学原论》 罗仲言 西北大学印行 1947
- 280 各政党 沧 正报 社论 1947. 01

- 281 国际政治的连环 沧 正报 社论 1947. 01
- 282 论民众求心运动 沧 正报 社论 1947. 01
- 283 论国家总预算 沧 正报 社论 1947. 01. 08
- 284 经济哲学发凡 沧 正报 社论 1947. 01. 10
- 285 论美国危机 沧 正报 社论 1947. 01. 13
- 286 经济新潮创刊词 仲言 正报《经济新潮》创刊号 1947. 01. 17
- 287 经庐学记 孟莘 正报《经济新潮》创刊号 1947. 01. 17
- 288 两极之争 沧 正报 社论 1947. 01. 17
- 289 中国经济史学评议 沧 正报 1947. 01. 17
- 290 自国民经济学到世界经济学 沧 正报 1947. 01. 17
- 291 中国经济史分期新论(1) 仲言 正报《经济新潮》第2期 1947. 01. 31
- 292 论美国共和党经济政策之转向 沧 正报 社论 1947. 01. 31
- 293 论充分就业 沧 正报 社论 1947. 02
- 294 中西经济同异论略 沧 正报 社论 1947. 02. 01
- 295 到学术自由之路 沧 正报 社论 1947. 02. 07
- 296 经庐学记 孟莘 正报《经济新潮》第3期 1947. 02. 07
- 297 中国经济史分期新论(2) 仲言 正报《经济新潮》第3期 1947. 02. 07
- 298 论建学东西北大同人兼示从学诸子(即建学诗) 沧 正报 1947. 02. 07
- 299 如何清算日本战争潜力? 沧 正报 社论 1947. 02. 10
- 300 金潮善后问题 沧 正报 社论 1947. 02. 14
- 301 经庐学记 孟莘 正报《经济新潮》第4期 1947. 02. 14
- 302 学术通讯 仲言 正报《经济新潮》第4期 1947. 02. 14
- 303 中国经济史分期新论(3) 仲言 正报《经济新潮》第4期 1947. 02. 14
- 304 利息合理化! 沧 正报 社论 1947. 02. 17
- 305 新政的前瞻 沧 正报 社论 1947. 02. 21
- 306 学术通讯(王雷鸣) 仲言 正报《经济新潮》第5期 1947. 02. 28
- 307 中国经济史分期新论(4) 仲言 正报《经济新潮》第5期 1947. 02. 28
- 308 普陀心居杂咏(诗六首) 沧海 正报 社论 1947. 02. 28
- 309 沧海楼诗 沧海 正报《经济新潮》第5期 诗 1947. 02. 28
- 310 经济独裁与民主 沧 正报 社论 1947. 03
- 311 读宋子文的财政经济报告 沧 正报 社论 1947. 03. 03
- 312 台湾善后问题 沧 正报 社论 1947. 03. 10
- 313 为经济复兴而奋斗的法国 沧 正报 社论 1947. 03. 14
- 314 沧海楼诗 沧海 正报《经济新潮》第7期 1947. 03. 14
- 315 经济紧急措施以后 沧 正报 社论 1947. 03. 21
- 316 帝国经济释义 仲言 正报《经济新潮》第8期 1947. 03. 21
- 317 沧海楼诗 沧海 正报《经济新潮》第8期 1947. 03. 21

- 318 论经济改革 沧 正报 社论 1947.03.24
- 319 再论经济改革 沧 正报 社论 1947.03.28
- 320 《沧海楼诗》 沧海 正报《经济新潮》第9期 1947.03.28
- 321 帝国经济释义(二) 仲言 正报《经济新潮》第9期 1947.03.28
- 322 英国工党的经济难局 沧 正报 社论 1947.03.31
- 323 悼八烈士文 沧·正报 社论 1947.04
- 324 国立西北大学筹设经济研究所计划书 罗仲言 正报《经济新潮》第10期 1947.04.03
- 325 普陀山杂居咏等 沧海 正报《经济新潮》第10期 1947.04.03
- 326 访歌德故居(诗三首) 沧 正报 社论 1947.04.03
- 327 新闻自由问题 沧 正报 社论 1947.04.05
- 328 论多党训政 沧 正报 社论 1947.04.07
- 329 新自由贸易主义——国际贸易会议成败观 沧 正报 社论 1947.04.11
- 330 全元论(一) 罗仲言 正报《经济新潮》第11期 1947.04.11
- 331 沧海楼诗:送卿汝辑归京 沧海 正报《经济新潮》第11期 1947.04.11
- 332 清算欧洲第一主义 沧 正报 社论 1947.04.14
- 333 当前银行之任务 沧 正报 社论 1947.04.17
- 334 全元论(二) 罗仲言 正报《经济新潮》第12期 1947.04.18
- 335 国际民主之争 沧 正报 社论 1947.04.21
- 336 春元渐展之英国工潮 沧 正报 社论 1947.04.25
- 337 全元论(三) 罗仲言 正报《经济新潮》第13期 1947.04.25
- 338 经庐学记 孟莘 正报《经济新潮》第13期 1947.04.25
- 339 华侨经济改进问题 沧 正报 社论 1947.04.28
- 340 清代十三行之兴废 景云 正报《经济新潮》第14期 1947.05.04
- 341 全元论(四) 罗仲言 正报《经济新潮》第14期 1947.05.04
- 342 日本经济措施的教训 沧 正报 社论 1947.05.05
- 343 全元论(五) 罗仲言 正报《经济新潮》第15期 1947.05.09
- 344 论币制改革应有的准备(上) 沧 正报 社论 1947.05.09
- 345 论币制改革应有的准备(下) 沧 正报 社论 1947.05.10
- 346 报与学 罗仲言 正报 3 1947.05.15
- 347 正报三周年纪念柬全社同仁 沧海 正报 特刊 1947.05.15
- 348 何谓杜鲁门主义 沧 正报 社论 1947.05.16
- 349 经济学之全 仲言 正报《经济新潮》第16期 1947.05.16
- 350 经庐学记——价值理论之今昔观 孟莘 正报《经济新潮》第16期 1947.05.16
- 351 日本赔偿案将铸大错 沧 正报 社论 1947.05.19

- 352 从中国对外贸易论世界经济的荣枯 沧 正报 社论 1947.05.23
- 353 评张群的施政报告 沧 正报 社论 1947.05.26
- 354 魏晋南北朝之经济特质 仲言 正报《经济新潮》第18期 1947.05.30
- 355 新银行法与地方银行的改进 沧 正报 社论 1947.06.02
- 356 沧海楼诗:孙继儒入青年军 沧海 正报《经济新潮》第19期 1947.06.04
- 357 价格论 孟莘 正报《经济新潮》第19期 1947.06.04
- 358 魏晋南北朝的经济特质(续) 仲言 正报《经济新潮》第19期 1947.06.04
- 359 论和平租借 沧 正报 社论 1947.06.07
- 360 魏晋南北朝之经济特质(再续) 仲言 正报《经济新潮》第20期 1947.06.13
- 361 财富的分配 梦 正报《经济新潮》第20期 1947.06.13
- 362 沧海楼诗:南泉酬陆阳 沧海 正报《经济新潮》第20期 1947.06.13
- 363 地租论(分配论之二) 平 正报《经济新潮》第21期 1947.06.20
- 364 隋唐帝国经济论(上) 仲言 正报《经济新潮》第21期 1947.06.20
- 365 如何加强统制外汇,控制市场 沧 正报 社论 1947.06.23
- 366 地租论(四) 平 正报《经济新潮》第22期 1947.06.27
- 367 隋唐帝国经济论(下) 仲言 正报《经济新潮》第22期 1947.06.27
- 368 五代宋元间经济均衡与互变 仲言 正报《经济新潮》第23期 1947.07.04
- 369 沧海楼诗:送伯淳东归 沧海 正报《经济新潮》第23期 1947.07.04
- 370 五代宋元间经济均衡论之互变(四) 仲言 正报《经济新潮》第24期 1947.07.11
- 371 中古时代之货币理论 海 正报《经济新潮》第25期 1947.07.18
- 372 五代宋元间经济均衡论之互变(续完) 仲言 正报《经济新潮》第25期 1947.07.18
- 373 从经济观点论明代倭寇 海 正报《经济新潮》第26期 1947.07.25
- 374 明清帝国经济完成论 仲言 正报《经济新潮》第26期 1947.07.25
- 375 沧海楼诗:偕平海游城固汉王城 沧海 正报《经济新潮》第26期 1947.07.25
- 376 中国经济史的出路 仲言 正报《经济新潮》第27期 1947.08.01
- 377 明清帝国经济完成论(续) 仲言 正报《经济新潮》第27期 1947.08.01
- 378 沧海楼诗:登崂山观海(诗) 沧海 正报《经济新潮》第27期 1947.08.01
- 379 中国经济史的出路(续) 仲言 正报《经济新潮》第28期 1947.08.08

- 380 经济史型论 仲言 正报《经济新潮》第28期 1947.08.08
- 381 明清帝国经济完成论(续3) 仲言 正报《经济新潮》第28期 1947.08.08
- 382 明清——帝国经济完成论(续完) 仲言 正报《经济新潮》第29期 1947.08.15
- 383 经济史型(续) 仲言 正报《经济新潮》第29期 1947.08.15
- 384 经济史型(续完) 仲言 正报《经济新潮》第30期 1947.08.22
- 385 沧海楼诗:金陵感旧 沧海 正报《经济新潮》第30期 1947.08.22
- 386 中国经济技艺发明从考 莘 正报《经济新潮》4 1947.08.29
- 387 欧亚经济史型同异辨 仲言 正报《经济新潮》第31期 1947.08.29
- 388 欧亚经济史型同异辨(续) 仲言 正报《经济新潮》第32期 1947.09.08
- 389 西大经济系系务会议一瞥 罗仲言 正报《学府风光》 1947.10.15
- 390 朝鲜独立问题 沧 正报《社论》 1947.11
- 391 政治的低能与失德 沧 正报《社论》 1947.11
- 392 经济二三事答客问 沧 正报《社论》 1947.11.04
- 393 西学渊源论 沧 正报《社论》 1947.12.07
- 394 《近代欧洲各国经济政策》 罗仲言 近代欧洲各国经济政策 湖南大学印行 1948
- 395 《中国国民经济史》(下册) 罗仲言 湖南大学印行 1948
- 396 《中国近百年政治经济大事年表》 罗仲言 1948
- 397 《长江航运概况》 罗仲言 1949
- 398 《社会主义国民经济计划原理》 罗仲言 湖南大学印行 1950
- 399 《社会主义社会》 罗仲言 湖南大学印行 1950.05
- 400 社会主义国民经济计划原理增订版序 罗仲言 湖南大学印行 1952.08
- 401 罗章龙同志谈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二二年期间的社会主义青年团 罗章龙 1957.01
- 402 回忆新民学会(由湖南到北京) 罗章龙 《五四运动回忆录(续)》 1979.11
- 403 大革命时代兵工厂工会 罗章龙 1979.02
- 404 罗章龙教授谈“五四运动” 罗章龙 《党史研究资料》(一) 中国革命博物馆 1979.4.20
- 405 回忆“五四”运动和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罗章龙 《文史资料》第61辑 1979.04
- 406 回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罗章龙 《新文学史料》第3辑 1979.05

- 407 罗章龙谈二七罢工 罗章龙 《党史研究资料》(四) 1979.06
- 408 罗章龙教授谈唐山、开滦五矿罢工 罗章龙 《党史研究资料》(六) 1979.07
- 409 我所知道的彭湃 罗章龙 1979.08
- 410 国际代表马林 罗章龙 《党史研究资料》(十三) 1979.10
- 411 回忆二七罢工 罗章龙 《文史资料选辑》第66辑 全国政协 1979.10
- 412 回忆董必武同志 罗章龙 《回忆董必武》第一辑 1979.11
- 413 亢斋汗漫游诗话(一) 罗章龙 《湘江文艺》1979年第11期 1979.11
- 414 纪念蔡和森同志诞辰85周年 罗章龙 1979.12
- 415 亢斋汗漫游诗话(二) 罗章龙 《湘江文艺》1979年第12期 1979.12
- 416 湖南大学马克思列宁学说研究会纪实(1947年) 罗章龙 1980
- 417 回忆王尽美光辉的一生 罗章龙 《王尽美传》 1980
- 418 回忆陈潭秋同志 罗章龙 1980
- 419 回忆共进社 罗章龙 1980
- 420 回忆何叔衡同志 罗章龙 湖南省委宣传部 1980
- 421 回忆罗学瓚同志 罗章龙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80
- 422 回忆缪伯英同志 罗章龙 全国妇联 1980
- 423 回忆王尽美同志 罗章龙 1980
- 424 回忆王瑞俊 罗章龙 1980
- 425 罗章凤小传 罗章龙 1980
- 426 一九二七年湖南秋收起义 罗章龙 安源党史研究 1980
- 427 陇海路罢工记 罗章龙 青运史资料 1980
- 428 回忆向警予 罗章龙 全国妇运史研究 1980
- 429 亢斋汗漫游诗话(四) 罗章龙 《湘江文艺》第四期 1980
- 430 石家庄早期的建党情况 罗章龙 1980
- 431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与三大中央 罗章龙 《社会科学动态》第2期 1980.01
- 432 罗章龙教授谈“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情况” 罗章龙 1980.02
- 433 罢工诗抄 罗章龙 《新华月报》1980第二期 1980.02
- 434 亢斋汗漫游诗话(三)(评论) 罗章龙 《湘江文艺》1980年第二期 1980.02
- 435 亢斋汗漫游诗话(七) 罗章龙 《湘江文艺》第2期 1980.02
- 436 回忆蔡和森同志 罗章龙 《新湘评论》1980年第三期 1980.03
- 437 少奇同志早期革命活动片断回忆 罗章龙 红旗飘飘20 1980.03
- 438 回忆蔡和森同志 罗章龙 《回忆蔡和森》 1980.03
- 439 亢慕义斋诗:巾幗英烈颂 罗章龙 《星星》 1980.03
- 440 亢慕义斋风云集诗 罗章龙 《冀东文艺》总第22期 1980.05

- 441 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 罗章龙 《社会科学战线》总 11 期 1980.07.25
- 442 亢斋回忆录——记和守常在一起的日子里 罗章龙 《回忆李大钊》 1980.07.25
- 443 忆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与邵振青 罗章龙 《新闻研究资料》1980 年第 4 辑 1980.08
- 444 回忆董必武同志 罗章龙 《楚晖》丛书 80 年(1) 1980.09
- 445 亢斋汗漫游诗话(五) 罗章龙 《湘江文艺》1980 年第六期 1980.10
- 446 亢斋汗漫游诗话(六) 罗章龙 《湘江文艺》1980 年第七期 1980.11
- 447 回忆董必武同志 罗章龙 《忆董老》第一辑 1980.11
- 448 一恸永难纾 罗章龙 《回忆陈谭秋》 1981.01
- 449 风云集诗稿(选载,诗四首) 罗章龙 《中岳》1981 第 1 期 1981.01
- 450 亢慕义斋风云集(1) 罗章龙 1981.01
- 451 二七罢工纪事诗(三首) 罗章龙 《百花园》(总第 51 期) 1981.01
- 452 亢慕义斋风云集 罗章龙 《长江文艺》1981 年第 1 期 1981.01
- 453 亢斋汗漫游诗话(六) 罗章龙 《湘江文艺》1981 第 1 期 1981.01
- 454 亢斋汗漫游诗话 罗章龙 《湘江文艺》1981 第 2 期 1981.02
- 455 罗章龙同志访问记 薛毅 河南工运史研究资料 1 1981.02
- 456 《京汉工人流血记》重版序 罗章龙 《京汉铁路工人流血记》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1.02.07
- 457 《为人类工作——马克思生平记述》 罗章龙译 顾俊礼校 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03
- 458 罗章龙谈邓中夏 罗章龙 1981.05
- 459 上海东方饭店会议前后 罗章龙 新华文摘总 29 期 1981.05
- 460 前言(开放系统经济理论论文集) 罗章龙 《开放系统经济理论论文集》 中国未来学会 1981.05
- 461 西北纪行诗 罗章龙 《浪花》1981 年第 2 期 1981.06
- 462 关于东北建党的回忆 罗章龙 北方论丛 1981 第 4 期(总 48 期) 1981.06
- 463 亢慕义斋风云集(三首) 罗章龙 上海文学(总第四十六期) 1981.07
- 464 陇海路大罢工 罗章龙 《北方地区工人运动资料选编》 1981.09
- 465 罗章龙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 罗章龙 《北方地区工人运动资料选编》 1981.09
- 466 亢慕义斋吟 罗章龙 《长城》1981 年第三期 1981.09
- 467 亢斋春晓 北方风云——记早期的北方工人运动 罗章龙 天津文史资料选辑 第 17 辑 1981.10
- 468 《京汉铁路工人流血记》(重版) 罗章龙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1.10
- 469 罗章龙谈北京团及《先驱》 罗章龙 青运史资料与研究 第一集

- 1982.02.20
- 470 亢慕义斋词七首 罗章龙 《诗词集刊》总第四集 1982.03
- 471 悼王荷波 罗章龙 《榕花》1982 年第 1 期 1982.03
- 472 十年道谊兼师友 试剑石前泪洒沱——忆恽代英同志 罗章龙 《回忆恽代英》 1982.05
- 473 忆云南诸英烈 罗章龙 《云南社会科学》(总第 8 期) 1982.07
- 474 忆陇海路斗争题辞 罗章龙 洛阳人民出版社 1982.07.06
- 475 回忆陈郁同志 罗章龙 《回忆陈郁同志》 1982.08
- 476 罗章龙同志谈陇海路罢工——兼谈归德(商丘)的早期工人运动和建党活动 1982.09
- 477 《革命战士集(再版)》 罗章龙 河北文史资料选辑第八辑 1982.09
- 478 亢慕义斋诗选(十一首) 罗章龙 《诗词集刊》总第六集 1982.10
- 479 罗章龙同志谈一九二一年陇海铁路大罢工及商丘早期工人运动和党团建设 1982.11
- 480 罢工诗抄 文虎 《党史资料通讯》第 2 期 1982.11
- 481 陇海路大罢工 罗章龙 《党史资料通讯》第 2 期 1982.11
- 482 白眉珊 罗章龙 《党史资料通讯》 1982.11
- 483 亢慕义斋词两首 罗章龙 《诗词集刊》总第六集 1982.12
- 484 缅怀王荷波同志 罗章龙 《风展红旗》第二辑 1983.02
- 485 罗章龙同志谈陇海铁路首次罢工及归德铁路早期工人运动和党团建设 商丘市党史资料通讯第 1 期 1983.03
- 486 红楼感旧录(一至四) 罗章龙 团结报 1983.04
- 487 谈谈唐山建党与早期工人运动 罗章龙 中共唐山市委党史办公室编 1983.05
- 488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和第一次国共合作 罗章龙 《党史资料丛刊》总 16 期 1983.09
- 489 诗词五首 罗章龙 《桂海诗刊》第二集 1983.10
- 490 建学诗(内外篇) 罗章龙李皓 《诗词集刊》总第十集 1983.12
- 491 亢斋岁月 西北风雷——忆李子洲同志 罗章龙 1984.
- 492 国共合作在上海执行部 罗章龙回忆 团结报 641 号 1984.01
- 493 诗五首 罗章龙 《桂海诗刊》第三集 1984.02
- 494 忆太雷同志 罗章龙 《回忆张太雷》人民出版社 1984.02
- 495 故人慷慨多奇节 革命安危系一身——忆刘天章同志 罗章龙 1984.03
- 496 新民学会 罗章龙 《岳麓诗词》试刊号 1984.04
- 497 亢慕义斋诗十六首 罗章龙 《龙门阵》总第二十二期 1984.04
- 498 追忆蔡子民校长 罗章龙 《蔡元培先生纪念集》 1984.07

- 499 《椿园载记》 罗章龙 三联书店（内部发行） 1984.08
- 500 浏阳革命先行者纪略 罗章龙 《湖南党史通讯》9 1984.09
- 501 缅怀早期北方工人运动的几位战友 罗章龙 《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29辑 1984.10
- 502 关于安源工人运动和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片断史实 罗章龙 《安源党史研究》 1984.12
- 503 黄海帅旗李慰农 罗章龙 《青岛惨案史料》工人出版社 1985.05
- 504 回忆杨廷夫先生 罗章龙 《杨树达诞辰百周年纪念集》 1985.05
- 505 登云麓宫 罗章龙 《岳麓诗词》总第三期 1985.07
- 506 怀念向警予 罗章龙 武汉市妇联妇运史编纂组 1985.09
- 507 我到东北考察工运 罗章龙 《黑龙江党史资料》第四辑 1985.12
- 508 自甘韬晦 埋首革命——回忆杨明斋 罗章龙 华东石油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6 第一期 1986.01
- 509 回忆第一次国共合作（原稿） 罗章龙 1986.03
- 510 岳麓感旧诗二首 罗章龙 《岳麓诗词》总第五期 1986.06
- 511 康德传重版序 罗章龙 《康德生平》商务印书馆 1986.09
- 512 《康德生平》 罗章龙等译 《康德生平》商务印书馆 1986.09
- 513 北航纪事——亢斋回忆片断 罗章龙 《河北师院学报》1986 第4期 1986.12
- 514 罗章龙（四首） 罗章龙 《中国当代诗词选》 1986.12
- 515 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创立65周年纪念献辞 罗章龙 《岳麓诗词》总第八期 1987.03
- 516 岳麓感旧诗 罗章龙 《人民政协报》1987年3月27日第四版
- 517 《椿园诗草》 罗章龙 《椿园诗草》 岳麓书社 1987.06
- 518 怀刘炎等三首 罗章龙 《岳麓诗词》总第九期 1987.06
- 519 罗章龙谈话记录和信件等共20篇 罗章龙口述 《唐山革命史资料汇编》第6辑 1987.07
- 520 秋阳楼等二首 罗章龙 《岳麓诗词》总第十四、五期 1988.12
- 521 白题《椿园诗草》 罗章龙 《岳麓诗词》总第十八、九期 1989.12
- 522 北京共产主义小组 罗章龙口述 孙薰整理 《海淀文史选编》第四辑 1991.06
- 523 忆湖南秋收起义 罗章龙 《党史研究资料》 1995.05
- 524 谒守常墓（万安公墓） 罗章龙 《古今咏海淀诗词选》 1996.04
- 525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风雨历程（上） 罗章龙 《中共党史资料》总第66期 1998.06
- 526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风雨历程（下） 罗章龙 《中共党史资料》总第67期 1998.09
- 527 参加中共六大 罗章龙 《中共党史资料》总第77期 2001.03
- 528 重返北方区委工作 罗章龙 《中共党史资料》总第80期 2001.12

### 十三、罗章龙自撰简历<sup>1</sup>

- 1912年考入长沙第一联合中学，是全省最好的中学，公费待遇。
- 1915年初次会见毛泽东（二十八划生）。
- 1917年4月14日参加发起成立新民学会。
- 1918年2月准备赴日留学，临行毛泽东赠诗古风一首：诗首句云：“云开衡岳积阴上……”，诗全文共154字。
- 1918年7月同，毛泽东等八人离湘赴北京。
- 1918年9月考入北京大学文学院哲学系。
- 1919年5月，组织五四运动行动小组，参加火烧赵家楼。6月3日上街演讲被捕，6月5日释出。
- 1920年参加北方共产主义小组会议，由国际代表威金斯基介绍加入共产党，后任北大党支部第一任书记。
- 1920年3月开始创立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有会员19人。
- 1921年11月17日在《北大日刊》上刊登启事，同时在北大第二院开正式成立大会，罗章龙被选为学会书记。1923年会员发展至250人。
- 1920年到长辛店从事工人运动，任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教务长。
- 1921年罗被选任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工人周刊》主编。
- 1921年罗被选为上海会议代表，因工作忙，未往上海出席一大。
- 1921年—1923年，罗任中共北京大学党支部书记，中共北方委委员、常委、区组织部长。
- 1921年11月18日离京赴洛阳，会同游天净、白眉珊，指挥陇海铁路同盟大罢工，27日罢工胜利结束。
- 1922年到石家庄、郑州、洛阳、徐州等地从事建党建团工作。
- 1922年7月到上海参加二大，任大会主席团主席之一，被选为中

<sup>1</sup> 1912年以前部分与罗章龙自传相同，故省略 — 罗星原注

史委员。

1922年在长辛店指挥京汉铁路八月罢工，胜利。

1922年10月，组织和指挥开滦五矿大罢工，11月17日罢工结束。

1922年10月25日抵南口，指导27日京绥路全路罢工，三天后胜利结束罢工。

1922年12月到石家庄，指导正太铁路工人大罢工。

1923年1月25日到郑州，指导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派史文彬、李大汉等五人到洛阳见吴佩孚。2月3日，罗章龙签发京汉全路罢工命令。2月7日晨到长辛店率领工会纠察队到当地火神庙营救史文彬等十一人。双方发生武装冲突，葛树贵等牺牲。罗右腿中弹受伤，被纠察队员抬回丰台治疗脱险，照常工作。

1923年3月写作《京汉工人流血记》并出版。

1923年6月到广州出席中共三大，被选为中央委员，五人中央局成员，会计，后兼任秘书，中央宣传部长。

1924年，罗参加指导国民党执行部，担任过国民党执行部组织部组织指导干事。

1923年—1924年间，罗章龙在三大中央工作时期，先后到南方、北方、东北等地区从事建党工作。

- (1) 到江苏会同侯绍裘，孙津川建立江苏省委。
- (2) 到江西会同赵醒侗、方志敏等建立江西省委。
- (3) 到浙江杭州会同俞秀松、胡焦琴建立浙江省委。
- (4) 到山东会同王瑞俊、李味农、伦克忠、郑心亭等建立山东省委。
- (5) 到河北会同韩麟符、于方舟、张兆丰、安幸生等组织天津沧州地区建党工作。
- (6) 到山西会同高君宇、王仲一等组织山西建党工作。
- (7) 到广东召开九龙会议与澎湃、陈郁、谭寿林等组织广东、广西党团工作。
- (8) 到东北会同唐宏景、江英、张昭德等组织东北建党工作。

1924年、1925年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莫斯科），出席国际运输工会会议，当选为书记（德国汉堡），兼赤色职工国际执行委员（莫斯科）。

1925年1月四大，当选中央委员。

1925年5月一度到河南焦作，指导焦作矿山大罢工，罢工经过三个月，胜利结束。

1925年5月在河南开封，成立河南全省总工会。

1925年5月到天津主持全国铁路总工会六大会，当选铁总委员长

兼党团书记。出版《铁总年鉴》、《中国革命战士集》。

1926年指导张隐韬在沧州地区组织武装起义，张隐韬英勇牺牲。

1926年6月离开北京赴武昌工作，任中共中央武昌局常委、中央工委书记，湖南省委宣传部长，汉口市委书记，工运讲习所负责主持，与苏联顾问鲍罗廷夫妇共事。

1927年4月参加五大会，担任大会秘书长兼执行主席。当选中央委员、常委。

1927年武汉市委派刘志丹赴陕西关中组织武装起义。

1927年7月同毛泽东一道赴长沙。9月组织发动秋收暴动。任长沙行动委员会书记。

1927年国际代表电召罗章龙赴上海出席十一月中央扩大会议，在扩大会议上，罗当选为中央工委书记，主持全总工作。

1928年6月赴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任主席团秘书长，当选中央委员。11月自莫斯科回上海，主持全国工运工作，出版1928年—1930年《中国工运概况》。

1928年—1931年任中共中央工委书记，中共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兼全国总工会。（上海）

1930年，米夫、王明先后回国实行篡党夺权，召开非法的六届四中全会，罗章龙等人提出反对王明路线，公开发表《力争紧急会议，反对四中全会报告大纲》等文件，请求国际撤回米夫、王明。

1931年元月，罗章龙等组织成立了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罗担任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主席。

1934年—1937年在河南大学经济系任教授（开封）。

1937年—1947年在西北大学经济系任教授（陕西城固，西安）。其中1946年到四川成都华西大学经济系任教一年。

1947年—1953年任湖南大学教授。

1953年—1978年任中南财经学院（后改名湖北大学，中南财经大学）教授。

1978年—1995年任中国革命博物馆顾问。同时担任五、六、七、八届全国政协委员。

## 后 记

我是文虎（章龙）的外孙女。1949年我出生在外公家，当时是湖南长沙岳麓山的湖南大学，1954年，我和外婆来到武汉市武昌，外公先一年在院系调整时调入中南财经学院。我跟随外公文虎生活了三十年，他写作回忆录大部分由我誊抄，前后情况我都清楚。

文虎写作《亢斋载记》的高峰是1963年，1965年基本完成，并装订成册。1966年初，我将《亢斋载记》抄件一份交给一位亲戚保管。1966年9月，扫四旧时，《亢斋载记》原稿被学生抄走并散失。同时散失了20年代滕代远给文虎的毛笔信原件一封，内容是平江起义时在当地紫云公馆写的战况汇报书；另外，被抄走散失的有林育南亲笔书写的反立三路线的文字数页，也是原纸原件，还有一些照片和一块林育南的铜板像等。

1973年，我将《亢斋载记》抄件取回，文虎再次对全稿进行整理，补充了一些章节，如北京印厂案，汉口八月会议等。1974-1978年间，文虎写成了《大革命时期中共军运工作纪略》，还写了有关“非常委员会”的一些资料。这些都没有补充进入《亢斋载记》的章节中。到了1978年，《亢斋散记》也定稿。

1969年我向文虎提议写自传，以作为《亢斋载记》的补充，主要内容是少年时代和教书期间的事迹。开始时，由文虎口述，我作记录，进入自传的后半部分，由文虎亲自笔述。

《亢斋汗漫游诗话》由文虎亲笔记述，定稿于1965年之前，以后



陆续有补充。最先发表于1980年前后的《湘江文艺》。

《亢斋载记》的前半部分后来易名《椿园载记》，23万余字，1984年9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内部发行，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了13600册，对外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出版。当时人民出版社由陈文伟先生负责此书的出版事宜。1984年版《椿园载记》的整理者主要是罗平海先生。1989年《椿园载记》第二次印刷，仅400本，据闻是特供少数人阅读的。改用了东方出版社名义出版，却没有提及第一次印刷的事。《椿园载记》1984年能够出版发行，我要感谢胡耀邦先生对文虎的关心和支持。

继续整理出版文虎的全部文稿，遇到很多困难。文虎生前将著作的整理出版事宜委托给我。这些年，我只能依靠热心肠人的辛勤工作，使得文虎的遗稿编成书，能够与广大的读者见面。我也表示衷心的感谢。

罗星原

2004年6月于武昌

## 罗氏后人想说的话

罗星原

我从出生那天起，在外公家生活了三十年。我从未见过面的父亲是山东滕州人，所以我也算是一个山东人。

几十年来，我的外公文虎（罗章龙）给我讲述了他一生中的各种经历，我对文虎有着很深的了解。

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工作做得最多、地位很高的五个人是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罗章龙、毛泽东。在1923年三大中央局中，毛泽东和罗章龙先后担任过中央秘书（仅次于委员长陈独秀的第二把手），这决不是偶然的。

我外公罗章龙在二大至六大都被选为中央委员。

一大时，罗章龙收到上海中央来信，信中说要在上海召开一次会议，信中并未说明这是一次党的成立大会。罗章龙因为工作忙，他主编的《工人周刊》要按时出版，他让比较清闲的刘仁静去上海出席会议。

罗章龙出席了二大，并被选为二大中央委员。（附罗章龙手迹）

1982年3月13日，罗章龙对我说：“我出席二大时很吃香，仲甫很抬我。因为我领导的工人运动规模较大，我是二大主席团执行主席之一，当中央委员要看工作。”我立即问他：“您为什么不跟别人谈这件事？”他说：“我不去争。这事并不重要。我说我是二大中央委员，就会引起争吵。”

1998年10月18日，我看中央电视台播出《从一大到十五大》第三集，中共第二次代表大会。该电视片中提到徐梅坤。二大的情况来源于徐的都不可信。因为七十年代，有人来我家访问关于三大的情况，徐梅坤自称参加了三大，徐所说的大会会址和会议房间布置被做成模型，访问人员把模型照片给罗章龙看。等访问人员离开我家后，罗章龙对我说，徐梅坤说的都是假的。但罗章龙没有向来访人员揭露徐的谎言。处于当时的情势，罗章龙不想得罪人。

我的想法是徐梅坤没有参加三大，也不是三大候补中央委员，徐梅坤更不可能参加二大。

关于张国焘的回忆录中，二大、三大都没有提到罗章龙。

1982年2月22日，罗章龙对我说：“张国焘在回忆录中不提我的原因是当时（张写书的时候）他可能想回来，想留条后路，他知道他们恨我。”

张国焘想回大陆来，不愿受罗章龙的牵连，所以张写回忆录时避免提到罗。

罗章龙是三大中央委员，五人中央局成员，分工会计，后兼秘书，中央宣传部。并担任国民党执行部组织指导干事。毛泽东时任国民党执行部组织部秘书（执行部组织部实际负责人）。

中共四大，罗章龙当选候补中央委员，任全国铁路总工会委员长兼党团书记。我后来看到陈独秀当时签署的一份通告，四大中央委员加候补中央委员一共九人。

罗章龙1982年1月15日对我说：“四大，伍廷康是太上皇。伍廷康说，北方书记部的人不听中央的，什么事自己做主干，事后才跟中央说一声，不听话，请彭述之、尹宽、赵世炎、王若飞合作。陈独秀接受了伍廷康的意见，四大中央让这些人掌了权。北方书记部人终将这些人击退，在五大会上，把权夺了回来。

罗章龙是六大中央委员，不是候补中央委员。

我曾就此事于1994年夏天请教于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专家李俊臣先生，李先生对我说，罗章龙是六大中央委员，不是候补中央委员。

张国焘的回忆录中，他回忆的六大中央委员也包括罗章龙。

1931年临时中央作出关于开除罗章龙中央委员及党籍的决议案，

也说是中央委员，也不是候补中央委员。

1927年国际代表电召罗章龙赴上海出席十一月中央扩大会议，在扩大会议上，罗章龙当选为中央工委书记，主持全总工作。

六大会上，罗章龙担任湖南代表团团长。罗作工运报告四小时，又作湖南秋收暴动报告六小时。湖南代表团是个大代表团，有代表二十人。六大时，王仲一是北方代表团团长，苏兆征时广东代表团团长，项英是湖北代表团团长，余飞是江苏代表团团长。

八七会议以前，中共中央并没有设政治局，而称作中央局，如三大中央局委员是陈独秀、毛泽东、罗章龙、谭平山、王荷波等。

李立三、康生一伙伪造了六大中央委员名单，他们还曾伪造过全国劳动大会名单。

关于中共三大，是因为解放后发现了三大的一些原始文件，所以比较真实。

2005年4月

I251  
H555  
V. 2



2007090093



Prin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84942LV00006B/200/A

07 · 090093



9 781933 447018